拉康研讨班 · 第三期

# 精神病

## Les psychoses

1955—1956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三期研讨班《精神病》（Les psychoses，1955—1956）共25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s psychoses；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Freudian Structures in the Psychose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 目录

第1课 · 1955年11月16日 .....6
第2课 · 1955年11月23日 .....34
第3课 · 1955年11月30日 .....63
第4课 · 1955年12月7日 .....93
第5课 · 1955年12月14日 .....130
第6课 · 1955年12月21日 .....150
第7课 · 1956年1月11日 .....154
第8课 · 1956年1月18日 .....184
第9课 · 1956年1月25日 .....212
第10课 · 1956年2月1日 .....240
第11课 · 1956年2月8日 .....269
第12课 · 1956年2月15日 .....293
第13课 · 1956年3月14日 .....323
第14课 · 1956年3月21日 .....349
第15课 · 1956年4月11日 .....371
第16课 · 1956年4月18日 .....393
第17课 · 1956年4月25日 .....416
第18课 · 1956年5月2日 .....435
第19课 · 1956年5月9日 .....451
第20课 · 1956年5月31日 .....467

第21课 · 1956年6月6日 .....488
第22课 · 1956年6月13日 .....514
第23课 · 1956年6月20日 .....542
第24课 · 1956年6月27日 .....562
第25课 · 1956年7月4日 .....590

# 第1课 · 1955年11月16日

正如你们已经得知的，今年开始讨论精神病问题。我们远不能一上来就谈精神病的治疗，更谈不上弗洛伊德那里的精神病治疗——这项内容严格说来等于零，因为弗洛伊德从未谈过它，至多只有完全点到为止的暗示。

我们先试着从弗洛伊德学说出发，看看他在这个领域带来了什么；随后，在这些评注内部，我们又必定要借助前几年已经阐发的概念，把精神病目前向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引入其中：

- 首先是临床性质和疾病分类学性质的问题；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所能带来的全部收益，也许还没有在这里得到充分揭示；

- 还有治疗问题：我们今年的工作无疑必须通向这里。

因为这个瞄准点……

这当然不是偶然；姑且说它是一次口误吧——一次有意义的口误

……这个瞄准点已经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它近乎一种最初的显而易见。像往常一样，最少受到注意的，恰恰在已经做过、正在做以及此刻正在进行的事情之中。谈到精神病的治疗，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似乎更愿意处理精神分裂症，对它的兴趣强烈得多，也从中期待更多成果，远甚于对偏执狂的处理。

我现在就把这项观察作为一个问号交给你们。我们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作答，但从一开始，它无疑就会潜伏在我们很大一部分进路之下。换言之，偏执狂所处的地位有些特殊，有些结点性——这里既指一个结，也指一个抗拒性的核心。这个地位确有所指；我们选择偏执狂作为入口，开始处理精神病问题及其同弗洛伊德学说的关系，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

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弗洛伊德最先感兴趣的是偏执狂……

他当然并非不知道精神分裂症及其学术运动；

精神分裂症概念形成时，他正是同时代人

……然而，有一点非常显眼、也非常奇特：弗洛伊德固然认可、赞赏、甚至鼓励围绕苏黎世学派开展的工作，也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和理论同布洛伊勒周围正在形成的东西联系起来，却始终同它保持着相当距离。

我马上给你们指出一处可以查阅的文本。我们还会回到那里，但现在先了解它也不无用处。我要提醒你们：施雷伯病例观察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所带来的一切成果的奠基性文本，是一篇重要文本；在它的结尾，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在偏执狂一边与另一边所有他希望人们称作“妄想痴呆”的东西之间，提出一条——容我这样说——“分水岭”……

> “妄想痴呆”正好是弗洛伊德希望赋予严格说来的精神分裂症领域的名称；或者说，在精神分析疾病分类学中，他建议把这个领域称作精神分裂症领域

……妄想痴呆恰好覆盖了痴呆的整个领域。我现在给你们标出这些坐标；要理解我们后面所说的内容，它们不可或缺。

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精神病领域一分为二：一边是严格说来的精神病……

为了大致知道它在整个精神病学领域覆盖什么，我们要指出：精神病并不等于痴呆。如果你们愿意，精神病——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使用这个词的奢侈——对应于人们向来所谓、并且至今仍然有理由称作“疯病”的东西

……在疯病领域中，弗洛伊德作出了两分，而且界线十分清楚。他在精神病的疾病分类学上插手得并不算多，但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考虑到这一区分出自何人，我们不能把它视作完全无关紧要。

我顺便请你们注意：在这一点上，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我们只能看到弗洛伊德并不完全合乎他的时代；歧义也正在这里：

- 要么他远远落后于时代，
- 要么相反，他远远超前于时代。

不过乍看之下，他确实非常落后。换言之，他赋予偏执狂一词的外延，显然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通常赋予它的范围。

我给也许不熟悉这些事情的人提供几个坐标。我不打算从偏执狂在十九世纪初随一位康德门徒、精神病学家首次出现讲起，为你们作一番所谓偏执狂史；那只是一个完全偶发的插曲。

偏执狂的外延达到最大，恰恰是在它几乎同所谓“疯病”混为一谈的时候。当时，收容院里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患者都带着“偏执狂”这张标签。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一切精神病或疯病，全都成了偏执狂。

可是在法国，我们有另一种倾向：我们对“偏执狂”一词的理解，几乎把它固定在它进入法国疾病分类学的那个时刻……

那是一个极晚的时刻：前后相差约五十年

……当时，它被等同于一种在构想上同它在德国精神病学中所代表的一切根本不同的东西。

在法国，我们所谓的偏执狂患者……

或者至少，在某个叫雅克·拉康的人试图用《偏执狂性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这篇论文给人们的头脑投入巨大混乱以前，人们所谓的偏执狂患者——这种混乱只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局限在适宜的小圈子里；此后，人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谈论偏执狂患者

……在那时，就是所谓“偏执型体质”。换句话说，这些人邪恶、不宽容、脾气坏；骄傲、多疑、易受冒犯、自我评价过高——在任何人看来，偏执狂的根基都是这一组性格特征。

从这个前提出发，事情就简单多了，一切都能得到解释：当一个人的偏执特征过了头，他就会陷入妄想。

法国当时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我丝毫没有夸张。我并不是说，这是塞里厄与卡普格拉[注1]的观点所造成的……

> [注1] 保罗·塞里厄、约瑟夫·卡普格拉：《推理性疯病：解释妄想》，阿尔康出版社，1909年。

因为只要你们读过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那里相反有着极其精细的临床观察；它恰好让人能够重构偏执狂性精神病实际上依何种结构形成的基础与根基

……它更多来自一本著作的传播。在《偏执型体质》[注2]这个标题下，热尼尔-佩兰先生使一种性格学式的人格异常观念取得支配地位；这种人格异常主要由一种完全可以称作“性格的倒错结构”构成——这本书本身也带着这种灵感的印记和风格。它像一切倒错一样，偶尔会越出界限，落入一种可怕的疯狂；而所谓疯狂，不过是把这种恼人性格的一切特征夸大到漫无边际。

> [注2] 热尼尔-佩兰：《偏执狂患者》，巴黎：马卢瓦纳出版社，1926年；另参马塞尔·蒙塔叙《偏执型体质》，巴黎博士论文。

你们会注意到，这种构想完全可以称为一种心理学的、心理学化的、甚至心理发生论的构想。即使它在形式上处处援引某种器质性基础——例如气质——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所谓的“心理发生”。心理发生恰恰就是如此：某种东西先在一个特定层面上得到评价和界定，随后，它的关系和发展联系又被设想为完全连续的；这种连贯性自主而特有，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给自足。归根到底，这里所涉及的正是一门心理科学；即使作者的笔下同时否定某种观点，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因此，我曾试图在自己的论文中引入另一种看法。当时我当然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有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法国精神病学中扮演了

极其重要的角色，即德·克莱朗博先生。他的工作、直接教导，乃至——我敢说——同他的熟识，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引向了这条道路。

德·克莱朗博先生……

我在这场进入我们领域的导论性谈话中提起他本人、他的行动、影响和姓名，是为了你们当中那些对他的著作只有一般、粗略或道听途说的认识的人；我想这样的人应该为数不少

……素来被视作一种极端器质主义构想的强硬捍卫者；他许多理论陈述的明确意图，确实就在这里。

然而，我认为，正是从这里可以把握他实际造成的影响——不仅是他本人和他的教学，还包括这项发现的真正意义。这部工作无论理论目标如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具体临床价值：克莱朗博以完全原创而新颖的方式辨认出数量可观的临床描述性综合征——这里姑且赋予“综合征”最宽泛的含义；此后，这些综合征便被纳入精神病学经验的共同遗产。

在精神病领域，克莱朗博至今仍然绝对不可或缺。他带来了极为宝贵的发现；在他以前从未有人看到过，后来甚至也没有人重新接续。我说的是由毒物决定的中毒性精神病：乙醚成瘾等等。

在克莱朗博的著作和教学中，精神自动症概念看起来受一种关切所支配：证明精神病的发展或演变中一连串现象在根本上是他所谓的“非观念性”（anidéïque），即不依照观念序列展开——不过，在这位大师的话语中，这个说法本身也没有更多意义。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仅仅依据一种假定的可理解性来辨认现象，就预设了某种东西：

- 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被称作“观念”的连续性；
- 也就是说，按照我刚才向你们描述偏执狂患者及其妄想发展的方式，那一连串现象本应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这里已经存在一种对可理解性的参照。人们正是用它来确定什么东西突然显现，打断了链条；那东西作为一道裂口出现，令人无法理解，同后面发生的事情也无法衔接。

如果把这个假定称作相当天真，未免夸张；毫无疑问，再没有比它更常见的假定了。况且，对许多人来说……

恐怕对你们也仍然如此，至少对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如此

……自从一种称为精神分析的探究运动被引入以来，构成精神病学最大进步的观念，似乎就在于恢复现象链条内部的意义。

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设想……

正如这种设想仍弥漫在住院医值班室的精神里，弥漫在精神病学家的一般意见、他们的“常识”（sensus commune）里

……这里所谓的意义，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东西；换言之，我们学到的新东西，就是去理解患者。

这纯粹是一种幻象！可理解性概念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也是我们研究中完全根本的动力：某种东西可能得到理解，而且同所谓“理解

关系”严格不可区分；雅斯贝尔斯把这种关系变成了他那部所谓“普通”精神病理学的枢轴。

有些事情似乎能够理解，仿佛不言自明。例如，一个人悲伤，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心中想要的东西。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有些人得到了心中想要的一切，却仍然悲伤；悲伤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激情。

我还是想稍微强调一下：你们扇一个孩子耳光，他哭了——这很“好理解”，以至没有人想到，他完全不必然要哭。我记得有个小男孩，每次挨耳光都会问：“这是爱抚还是耳光？”如果别人告诉他：“这是耳光！”他就哭；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规则之一：既然挨了耳光，就必须哭；如果那是爱抚，他便兴高采烈。必须说，他同那对性子有点急的父母相处的方式，会主动传达这一类语境信号；在雅斯贝尔斯先生阐述的“理解关系”概念中，这种情形相当常见。

下次课以前，你们可以查阅雅斯贝尔斯先生《普通精神病理学》[注3]中题为“理解关系概念”的那一章，写得非常明确。你们还会在那里看到——这正是一篇持续展开的话语的用处——其中的不连贯很快便暴露出来；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概念何以无法成立。归根到底，雅斯贝尔斯只把理解关系作为一种始终位于极限的东西来援引；一旦真正接近它，它便不可把握。至于他认为最明显的例子、他的那些坐标和参照中心，则很快而且不可避免地同“理解关系”概念混为一谈；它们其实是某种理想参照。

> [注3] 卡尔·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Bibliothèque des introuvables，2000年。

最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他自己的文本中，即使他用尽维持这种幻象的技巧，也无法避免举出那些早已被事实驳倒的例子。例如，自杀无疑是朝向衰退、朝向死亡的倾向，因此人人似乎都会说——但只有别人特意去问，才会让他说出这句话——自杀理应更容易发生在自然衰落的季节，也就是秋天。可人人早就知道，统计表明春天的自杀远多于秋天。

这并不更可理解，也不更不可理解；只要提供必要的关节，再围绕这个问题阐述任何你想阐述的东西就够了。若承认“春天的自杀人数多于秋天”这项事实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这份惊讶只能依托那种始终不一致、名叫“理解关系”的幻象——仿佛在这种秩序中，真有任何东西可能被把握。

在这个意义上，哪怕我们终于能够设想……

这很难设想，因为它严格说来不可设想；可是，凡是没有得到接近、严密追究并纳入真正概念的东西，都与此相同：它始终是一个潜在假定，支撑着人们认为精神病学近三十年来发生的某种色调变化

……哪怕我们终于把心理发生概念等同于重新引入那些著名的“理解关系”——把它们重新引入我们同自己的精神病学对象、即患者的关系中——如果心理发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要说……

因为经过两年关于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的教学，我想你们当中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我要说什么

……对于那些还不能理解的人，我现在就告诉他们：精神分析最大的秘密，就是不存在心理发生。

如果心理发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精神分析恰恰凭借：

- 它的整个运动，
- 它的全部灵感，
- 它的全部动力，
- 它带来的一切，
- 它把我们引向的一切，
- 以及它必须把我们维持于其中的一切，……离这种心理发生最为遥远。

还有一种走得更远的说法：在严格说来属于心理学的秩序中，若要试着逼近一些，也就是说，若采取心理学化的视角，那么心理学就是动物行为学，就是个体从生物学角度同其自然环境中诸事物发生的一整套行为与关系。这是一项完全正当的定义，说明什么可以严格视为心理学：这里有一种事实关系的秩序，可以说是一种能够客体化的东西；这个领域边界足够清楚，足以构成一项科学对象。

我们还必须再向前走一点，甚至必须说：无论一门心理学在自己的自然领域中建立得多么完善，人类心理学本身恰恰……

正如伏尔泰谈到自然史时所说：“它没有那么自然”

……总而言之，是最不自然的东西。

人类行为中一切严格属于心理学秩序的东西，都受制于深刻的异常；它每时每刻呈现的悖论，单凭自身就足以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必须引入什么秩序，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其中，才至少能够理清头绪（直译：让母猫找回自己的小猫）。

如果忘掉真正构成精神分析突出轮廓与根本动力的东西，我们就会重新回到……

这也是精神分析那种自然的、恒常的、每天都能观察到的倾向

……重新回到各种早已形成的神话。这些神话从某个尚待确定的时代开始形成，大致从十七世纪末一直延续到精神分析出现。

如果把所谓传统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归拢在一起，这类神话完全可以作如下界定：

- 人格统一的神话，
- 综合的神话，
- 高级功能与低级功能的神话，
- 围绕自动作用等术语产生的混淆，……所有这类对客观领域的组织，都在每时每刻显露出崩裂、撕扯与断裂，显露出对事实的否定，甚至显露出对最直接经验的误认。

话虽如此，可不要误会：我在这里也丝毫不是要把另一则神话放到首要位置，即那种构成所谓心理学、乃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之基础的“直接经验”神话。与任何其他科学一样，这种“直接经验”没有任何特权，

不能让我们停步、将我们俘获。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对所讨论的事情作出最终令人满意的阐发时，它根本不是衡量我们应当抵达何处的尺度。

从这个角度说，弗洛伊德学说和弗洛伊德的教导所提供的东西——你们知道——完全符合其他科学领域中已经发生的事情，不管我们认为它同自己特有的神话多么不同。它像其他科学一样，使那些超出直接经验、根本无法由感官把握的动力介入。就像在物理学中，我们最终保留的不是直接经验所感到并区分的颜色本身，而是颜色背后的、制约颜色的某种东西。

我们同样不能误认弗洛伊德进展中这个完全根本的维度。它并不是——这同我刚才谈到的“理解关系”不同——简单停留在所谓直接经验上。无论何时何地，这项经验都不是在某种前概念、前本质的东西中被把握的纯粹经验。

它已经切实受到某种人为事物的结构化，而这个人为事物正是分析关系。分析关系由下列情形构成：主体向医生坦白他前来诉说的某种东西，以及医生如何处理它。一切阐发都从这里开始；这也就把分析关系变成了精神分析入门的工具及其首要运作方式。

通过我刚才提醒你们的这一切，我想，你们应该已经认出这个领域的三种秩序。一段时间以来，我不断教导、反复唠叨：要理解这项经验，就必须把它们纳入我们的视角，也就是：

- 象征界，
- 想象界，
- 以及实在。

刚才，象征界已经非常明确地出现了：我从两条不同的进路，清楚提到一种显然超出一切理解的东西。一切理解都嵌入其中，而它又如此明显地扰乱着人的一切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我先前的话语中，想象界也已经露头：我只须向你们提起动物行为学，提起那些既迷人又具有捕获作用的形式。它们仿佛铺设出轨道，形成一系列通道；动物行为就在其中定向，朝自己的自然目标行进。

皮耶隆先生并不受我们推崇，却把自己的一本书题为《感觉，生命的向导》。这是一个很美的标题。我不知道它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适用于感觉；无论如何，书的内容肯定没有证实这一点。不过，这个视角当然有其正确的根底。这个标题同全书多少拼接得有些勉强；它似乎提出了一项连书本身都未能实现的计划。

然而，想象界无疑是整个动物领域的“生命向导”。至于图像在我们这个由象征界深刻结构化的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当然至关重要。这个作用又完全由象征秩序重新接管、重新揉塑并重新激活。只要我们还能把握到某种足以让自己看见图像之纯粹状态的东西，图像就总会或多

或少整合进这个象征秩序；我要提醒你们，在人那里，象征秩序的根本性质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

反过来说，属于象征秩序的东西，同属于想象或实在秩序的东西有什么差别？在想象或实在秩序中，无论某个东西是否构成阈限，它周围总有程度上的增减，总有一片余地；我们面对的是连续性。在象征秩序中，每一个要素都凭借同另一个要素的对立而取得价值。

为了进入我们即将开始探讨的经验领域，即精神病者的经验，让我们取一个完全初步的例子。有一位精神病者向我们讲述，他最近进入了一个何等陌生的世界：对他而言，一切都变成了符号。事情不仅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受到窥探、观察与监视：“有人说话，有人议论，有人在暗示，有人在看他，有人眨眼睛”；它还可能走得远得多，侵入——你们马上会看到歧义在这里形成——我们所谓无生命、非人的现实对象领域。

在判断它是什么以前，先看得更仔细一些。例如，他在街上遇见一辆带某种颜色的汽车，它就会对他具有一种价值——汽车并不完全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对象。那辆汽车是红色的；对他而言，它便具有某种意义。红色汽车恰好在那一刻开过，绝不是无缘无故。

让我们围绕这个再简单不过的现象提出问题：主体对这辆红色汽车之价值产生的妄想直觉。即使它对主体具有最大程度的意指，他也往往完全无法明确说出这项仍然含混的意义：它有利，还是构成威胁？有时，他无法在这项特征上作出判断；但那辆汽车无疑是为某件事而在那里。

因此，围绕这个最难把握、也可以说最未分化的现象，我们能够辨认出三种完全不同的构想，来理解一名主体同这辆红色汽车的相遇……

我还没有说他属于精神病的哪一个类别

……以及他围绕红色汽车作出的这项陈述：

- 第一，我们可以从知觉异常的角度看待它。不要以为我们早已远离这种看法；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人们还在现象层面提出问题……

……精神失常的主体究竟体验到什么样的初级现象：他是否是个把红色看成绿色、或把绿色看成红色的色盲？没有人去实际查看；反正他只是没有分辨颜色

- 第二，我们也可以把这场红色汽车的相遇放在另一种相遇的同一层面：一只知更鸟遇到同类时，会向对方展示那片使自己得名、人人熟知的红色胸羽。这次相遇本身就足以引起相应行为；一系列实验已经证明，鸟类的这种羽饰同守卫领地边界相对应。它单凭自身就决定了……

……双方相遇时某种个体—对手行为；这就是红色的想象性功能。你们也可以说，在理解关系的秩序中，这项功能表现为：红色在主体那

里会加速某个过程，使他“见红”，让他觉得红色自身直接表现着敌意或愤怒[注]。

> [注] 法语 voir rouge 字面为“看见红色”，也是“暴怒”的习语；原文借这层双义把知觉到红色同敌意或愤怒的即时表达连在一起。

- 第三，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在象征秩序中理解这辆红色汽车，正如在纸牌游戏中理解红色：它凭借同黑色的对立而取得意义，也就是作为一门已经组织起来的语言的一部分。

这里正好区分出了三种域，也区分出了三种层面。当我们追问这个初级现象以及它在主体演变的某个确定时刻具有怎样的当前价值时，我们的“理解”可以分别进入这三个层面。

有一点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说一目了然：弗洛伊德进入偏执狂领域时所引入的东西……

在这里，它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鲜明；也许因为它更集中，也因为它同当时的话语形成了更强烈的反差

……涉及精神病时，我们立刻看到，弗洛伊德以一种近乎绝对开端的勇气……

我们最终已经不再意识到其中的技术经纬：这是一种创造。人们尽可以说，早已有科学关注梦的意义；但那些旧研究同《梦的解析》中运用的方法、同那项就在我们眼前完成的先驱工作绝对毫无关系。这项先驱工作最终得出一个公式：“梦在对你说某种东西。”唯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梦借以说出某种东西的那番加工——它像人说话一样说出某种东西。此前从未有人这样说过。

人们曾经说，梦有意义，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某种东西；但现在是梦在说某种东西。

梦会说话。我们姑且承认，那些天真的实践或许已经使人看到其中有一点这样的东西，恰好有一点。

……可是，弗洛伊德竟拿起一位偏执狂患者写的书——也就是施雷伯这本书。弗洛伊德写作自己的著作时，以非常柏拉图式的方式推荐大家阅读它，因为他说：“在读我以前，一定要读它。”于是，弗洛伊德拿起这本《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作出一番商博良式的破译，像破译象形文字那样破译它。在这个非凡人物告诉我们的一切背后，他重新找出了某种东西……

在一个人越过界限以后，从精神病者那种深刻外在而陌生的经验领域向我们说话时，他可能留下辩护、交流或传讯式的各种文学作品；在所有这类作品中，这无疑是最出色的一本。

它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这里发生了一场例外的相遇：弗洛伊德的天才，遇上了一种极其罕见的东西。

……在施雷伯的展开中，弗洛伊德抓住了文本，而且没有许下空洞承诺。我们会一起看到：在某个时刻，弗洛伊德真正显出一记天才之举，它绝不可能得益于所谓“直觉洞察”。这严格说来是语言学家〔商博良〕的天才之举：他在文本中看到同一个符号多次出现，便预设、从一个观念出发，认为它一定意味着某种东西；例如，依据我们对那门语言模糊知道的情况，它也许表示其中最常见的元音“e”。正是从这项天才猜想出发，他得以大致恢复那门语言中相关符号的全部用法。

例如，弗洛伊德作出一项惊人的认定，把施雷伯那里的“天庭之鸟”同“少女”联系起来；它完全具有这类现象的性质。这项轰动性的假设让人能够从这里出发，重构整个文本链条；不止如此，它不但使我们理解相关的能指材料，也使我们能够重构那门语言——施雷伯本人谈到的著名“根本语言”，整部文本正是用它写成的。

由此，象征性解释本身的绝对支配地位便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我所坚持的，是它完整而充分结构化的意义。我们必须始终把精神分析发现安置在它原初的层面上。这样说够了吗?

当然不够。因为假如只是这样，那么本案的一切都不会超出这项确实轰动的翻译；与此同时，它也会把弗洛伊德的运作领域严格留在神经症的同一层面上。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方法在这里所表明的，无非是它确实能够在象征秩序中作出同等有效的阅读，却完全无法说明精神病与神经症的差异和精神病的独特性。

因此，问题显然在远远超出这一点的地方提出——对弗洛伊德文本的阅读无疑会再一次证明它。正是这些问题将成为我们今年的研究对象，也使我们有理由把它们列入计划：它们出现在对这番话语意义的发现之中。

严格说来，这确实是一篇精神失常者的话语——而且是一篇印刷出来的话语。我们处在象征秩序中，唯有象征秩序能够对此作出回答，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篇精神失常者话语的材料本身向我们展示什么?

它在说话；可是，弗洛伊德翻译出来的意义并不是在其词汇层面展开的，而是在受到命名的东西这一层面展开的：这篇话语的命名要素，

取自某种同自身身体具有极其密切关系的东西——你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我们经由象征界这道入口，才开始窥见并深入人同自身身体的这种关系；它标志着所谓想象界的领域。你们看，这个领域最终受到缩减，但在人那里确实不可还原。

因为，倘若人的某种东西对应着动物行为的这项想象性功能，那就是使人以选择性的方式受到联结的一切；这种联结始终尽可能难以把握，位于某种象征参与的边缘，却仍不可还原。唯有整个精神分析经验让我们得以把握它最后的动力：人具有若干形式动力，即身体的总体形式，以及这个身体上被称作性感区的某些部位。施雷伯病例的象征分析向我们证明的正是这一点。

从这里开始，接下来的问题恰好环绕着那些在我们操作领域中实际活动并发挥效力的范畴。人们通常说，在精神病中，无意识就在表面上；也正因为它已经如此显露，它似乎反而没有产生更好或更大的效果。我们还不太知道该怎样考虑这件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视角本身颇有启发；我们马上就能作出一项观察：正如弗洛伊德始终强调的，无意识取得效力，大概并不纯粹来自它身为 Unbewusst、身为“非意识”这个否定性特征。

我们翻译弗洛伊德，并且说：这个无意识是一门语言。从我们的视角看，有一点无疑清楚得多：例如，无意识已经得到表述，并不因此意味着它得到承认。证据是，一切仿佛弗洛伊德正在翻译一门外语，甚至还依照一种完全根本的切分重构这门语言。

主体同自己的语言所处的关系，也许就同弗洛伊德同这门语言所处的关系一样；甚至可以肯定，确实如此。我们可以在这里正当地援引

Spaltung〔分裂〕现象。如果我们承认有人能够用一门自己完全不懂的语言说话，那么我们选择的这项隐喻，就能用来描述主体在精神病中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会以此为满足吗?

当然不会。因为问题不在于：这个就在表面、已经得到清楚表述的无意识，为什么对主体来说仍受到排除、可以说未被承担；问题在于：这个无意识为什么会在实在中出现。归根到底，这才是根本问题。

我希望你们当中有足够多人还记得让·伊波利特先生在这里为我们评注的弗洛伊德《否定》（Verneinung）。我很遗憾他今天上午不在场；否则我便能当着他重述他从这篇《否定》中析出的术语，也能借他的在场确保自己没有歪曲它们。

对这篇光芒四射的文本所作的分析，清楚揭示出：无意识中的东西并非全都只是受到压抑——也就是在已经言语化以后又遭主体误认。在整个言语化过程背后，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原初肯定（Bejahung），即象征层面上的接纳[注]；而这项肯定本身可能缺失。

> [注] admission dans le sens du symbolique 与 Bejahung primordiale 同位，不是“接纳某物进入象征意义”，而是在象征层面上对某物的原初接纳，使其得以进入象征秩序。米勒定本第20页保留同一措辞；紧接着又说主体可能“拒绝让某物进入自己的象征世界”，本译据此前后关系处理。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这一点又同其他文本彼此印证——我只提我们曾在这里停留过的那些文本。尤其有一段文字极具意义，而且再明确不过：它承认存在一种排除现象；出于若干理由，Verwerfung〔拒斥〕一词看来十分适切，可以用来称呼它，从而把它同发生在远为后期阶段的 Verneinung〔否定〕区别开来。

在象征化之初——这件事仍可能发生在主体已经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可能出现如下情形：主体拒绝让某种自己确实经验过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象征世界；在这个场合，那东西正是阉割威胁。从主体随后的整个发展可以知道，他对此根本不想知道任何东西；弗洛伊德明文说，这是压抑意义上的“不想知道”。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这就是他使用的公式，而它清楚意味着：下列二者之间存在区别：

- 受到压抑的东西，
- 以及由于它受到压抑这项事实而返回的东西。

因为二者不过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被压抑者始终在那里，却以完整得到表述的方式在症状及许多其他现象中表达自身；这同拒斥完全不同。因此，我去年把象征秩序中的某些现象同机器里的情形相比，现在重新提起也并非毫无用处。

我简要提醒一下。你们知道，所有被送入机器回路的东西——这里说的是我们那些现代意义上的小机器；它们还不完全会说话，但随时就要开始说话——都必须依照机器自身的节奏进入。人们把可以拿来“喂养”机器的东西送进去，也就是一串串小数字；我们期待机器随后作出重大变换，把我们也许要用十万年才能算出的结果交还给我们。可是，我们只能在尊重机器固有节奏的前提下输入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尊重某种根本节奏的存在，否则其余一切都会掉到下面，因未能进入而根本没有被输入。我们可以重新采用一个表现这件事的形象。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在象征秩序中遭拒斥的一切，都会在实在中重新出现。”

弗洛伊德的文本在这一点上毫不含混：如果狼人并非没有精神病倾向或特征……

正如后续观察所表明的，他绝非没有在精神病一侧潜藏一些资源；他在弗洛伊德治疗结束以后、到我们后来得到的那次观察重新接手以前，曾经出现一段短暂的偏执狂发作，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狼人始终拒绝让阉割进入〔象征〕层面——尽管从他的行为看来，阉割显然已经进入——如果他把阉割从严格说来的象征功能中排出，使一个“我”不仅无法在当下承担它，甚至也无法把它当作可能之物承担，那么这件事同他在童年出现的那次短暂幻觉具有最紧密的联系。弗洛伊德极其详尽地转述了这次幻觉：狼人玩小刀时，突然看见自己切断了手指，手指只剩一小片皮肤连着。

主体以一种极其精确、仿佛临摹亲身体验的风格讲述此事。那个场景只被把握了短短一刻；甚至一切时间坐标似乎都消失了。他坐到保姆身旁的长凳上——保姆恰好是他最初经验的倾诉对象——却不敢向她提起。这一点意义何其重大：他平时什么都同她谈，尤其会谈这种事，此刻却悬置了向她说话的一切可能。那里出现了一道深渊，一次真正沉入时间的坠落；心理经验短暂地遭到切断。随后，他从中出来，发现自己什么事也没有：“一切都结束了，别再谈它。”

弗洛伊德把这个现象同一种极其特殊的“对事情本身一无所知”联系起来——他的文本说，这里的“一无所知”是在被压抑者的意义上。这个

联系可以用如下公式表达：在象征秩序中遭拒斥者，会在实在中重新涌现。你们知道，这恰恰是《否定》全文的根底、意义和锋刃：

- 主体话语中相关之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即否认——出现；这种出现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 为什么在场的东西又如此不起作用？

下列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紧密关系：

- 一边是否认，以及某种东西在纯智性秩序中的重新出现；它没有被主体整合；
- 另一边是幻觉，也就是遭主体拒斥的东西在实在中的重新出现。这二者展示出一整套关系的幅度与谱系，也展示出一项居于绝对首要位置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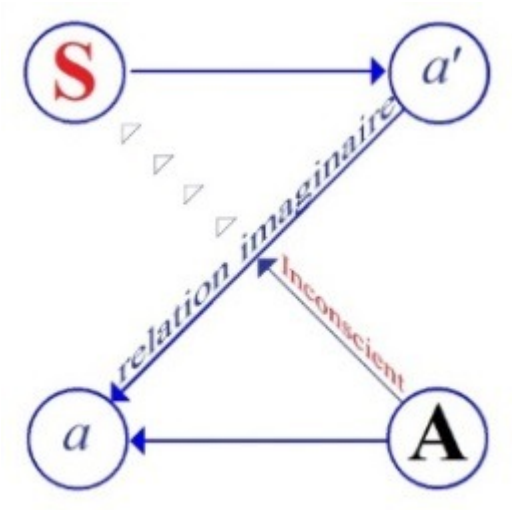
因此，问题在于：严格说来的幻觉现象涉及什么？幻觉现象的源头，在我们暂时所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始终保留这个词语组合——“主体在象征界中的历史”里。这个说法难以成立，因为一切历史依定义都是象征的；不过，我们先采用这个公式。

必须建立一项根本区别：神经症的被压抑者，是否同精神病中涉及的被压抑者拥有相同来源，是否处在“象征界中的历史”这个同一层面。

当然，它同相关内容建立起最紧密的关系；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

- 这些区别立刻就让我们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辨认这些内容；
- 而且事实上，它们单凭自身就已经提供一把钥匙，让我们能够以比以往简单得多的方式提出问题。

例如，有一点完全可以确定：言语幻觉有一种呈现形式，它仿佛给主体的行为和活动加上一层复述；主体听到它，就像有第三者在说：“她正在做这个”，或者“他正在做这个；他同我说过话，但他不会回答；他正在穿衣服”，又或者“他正在脱衣服；他正在照镜子”……从我们去年的图式*所采取的视角看，这里涉及的东西是：



主体与那个大他者之间，原本可以通过象征秩序中完成的充实言说直接沟通；可是，这项沟通被一条迂回打断了：它必须经过两个自我的 a 与 a′ ，经过它们的想象性关系。

这至少在首要层面上暗含一种根本的三重性。有一点十分清楚：它同下列事实最直接地重合——毫无疑问，开口说话的是主体的自我；这个自我能够正常地用第三人称向另一个人谈论主体，谈论他，也就是谈论主体的 S。

从主体及其言说的根本结构来看，这件事虽然并非绝对明白，却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精神病的一整部分现象也可以由此得到理解：主体以一种极端悖论、同时又堪称典范的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的——“不应说灵魂在思想，而应说人在用自己的灵魂思想。”

不过，我们已经远离这个公式。我相信，如果说精神病主体在其最典型的幻觉形式中——也就是某物在实在中出现、并带着作为初级现象根本特征的“现实感”出现的时刻——严格说来是在用自己的自我说话，我们就离实际发生的事情近得多。

我们绝不会以如此完整的方式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同自我的关系具有根本歧义，而且这项歧义已经标示得足够清楚。对自身自我的每一次承担中，总有某种可以被深刻撤回的东西。精神病的某些初级现象向我们展示的，却严格说来是一个被完全当作工具来承担的自我：主体

同自己的自我认同，又同这个自我说话。正是这个自我在谈论他、即主体，或者谈论 S；这个词具有两层含混意义：

- 字母〔S〕，
- 以及德语的 Es〔本我/它〕。

今天，我在这里以这种形式把它交给你们，只是为了指出：今年，当我们试图相对于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这三种域，准确定位精神病的各种形式时，将会被带往何处。

它们会把我们带到并维持在一个问题中。这个问题已经出现，而且一直像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要从最后的动力上准确说明，在处理、治疗过程中，我们应当赋予某种域或某种动力——例如自我——怎样的功能，以及这件事包含的一切。

归根到底，在这种分析的极限处隐约显现的，正是整个对象关系问题。如果分析关系奠基于对象征秩序自主性的误认，这种误认就会自动混淆想象层面与实在层面。当然，象征关系并不会因此消失，因为人们仍在说话，甚至只做说话这一件事。结果，主体中要求在真实象征交换自身的层面得到承认的东西……

这个层面并不容易抵达，因为小他者在不断干扰它

……要求在自身象征真实性中得到承认的东西，不仅严格说来受到误认，而且还被一种特殊的承认取代：对想象界、对幻想的承认。严格说来，这就是所谓疯狂的前厅——以某种方式，把主体中属于想象秩

序的一切都当真。我们只能惊叹，它竟然没有把主体引向更深的异化。

毫无疑问，这已经充分表明主体必须具有某种易感倾向；我们当然也不怀疑，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维也纳时，有人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听我试着解释几件小事，便问我是否认为精神病具有器质性。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过时、早被超越；我们早就不再区分心理学与生理学。当然，并非谁想发疯都能发疯——在那段久远而有些古老的岁月，我们曾把这句话贴在住院医值班室的墙上。

尽管如此，某些众所周知的病例仍必须归因于分析关系的某种操作方式……

它严格说来把我们所谈的想象关系当真，以想象层面的承认取代象征层面的承认

……在进入分析之初，若不谨慎地操作“对象关系”，便会相当迅速地触发或多或少持续、甚至有时永久的妄想；这些病例同样早已为人熟知。

这些事实已经得到承认和分类，所以人人都知道它可能发生；但从没有人解释过，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一场分析在最初阶段就可能触发一场精神病。这显然既取决于主体的素质——正如人们总会指出的——也取决于操作分析的某种方式。

我想，今天我只能先把我们将要开展的工作何以值得关注介绍给你们，并让你们意识到这样一项事实[注]：从概念阐发、概念净化、概念

运用，以及由此形成我们自身分析训练的角度说，这项工作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视点。无论偏执狂领域多么令人生畏而枯燥，研究它对我们都有用。我想自己也由此完成了计划，也就是今天题目所许诺的内容，并且向你们指出了若干十分明确的影响。

> [注] 此处法文 l'imagination au fait 句法异常，可能存在转录讹误；译文依上下文暂按“让你们意识到这样一项事实”处理，无法据现有底本确定原话。

这项概念阐发带给我们的“训练”——即视角的校正——可以最直接地影响我们将怎样思考，或者至少怎样避免去思考：每天的经验是什么，以及它在目标上应当是什么。

# 第2课 · 1955年11月23日

我认为，我们越试图接近偏执狂概念的历史，就越会发现它何等能说明问题；精神病学运动的进步——或者没有进步，随你们怎么说——能给我们的教益，也就越明显。

归根到底，再没有哪个概念比它更具悖论性。我上次特意把“疯病”这个古老词语放在首位，并非没有理由；它是人们用来指称疯狂的根本俗语，而疯狂始终同偏执狂保持同义。可以切实地说，历位作者在“偏执狂”一词中显露出全部歧义；这种歧义从根本上体现于“疯狂”一词的使用。

当然，如果考察这个词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并非昨天才出现，甚至不始于精神病学的诞生。我无意在这里铺陈那种太过容易卖弄的学问，不过仍可以提醒你们：“疯狂”一词从来就是智慧之语言——或自称智慧的语言——的一部分；那部著名的《愚人颂》本身已经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日期。

这种对疯狂的凸显，等同于后来所谓正常的人类行为——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常”这个词——而且至今仍保有全部价值。我们只须说：当时用哲学家的语言、在哲学家之间说出的东西，是借谈疯狂来谈智慧；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最终完全认真、逐字逐句地看待它。转折发生在帕斯卡那里，带着他那种严肃而深思熟虑的全部重音：

- 毫无疑问，存在一种必要的疯狂；
- 若不随所有人的疯狂一起发疯，那反而会由于另一重疯狂而成为疯子。

这些回顾并非全无用处；它们让我们看到，在尝试处理问题时，前提中已经暗含的悖论有何危险。可以说，直到弗洛伊德，人们都把疯狂还原为若干行为和“模式”；另一些人又以这些“模式”为依据，自以为能够评判所有人的行为。

归根到底，模式对模式，二者的差别并不会立刻映入眼帘。人们也从未真正把重音放到那个能让我们描绘所谓“正常”乃至可理解行为、并据此定位严格说来的偏执狂行为的东西上。

偏执狂概念在历史中确实就这样演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克雷佩林长期坚持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归根到底，它同某种临床敏感性相连：经验丰富的人凭借一种天赋、一种感觉，能够认出所谓自然征象——这才是真正的医学天赋，是一种看清哪个征象能够准确切分现实的眼光。我们暂且停留在定义层面。

整个十九世纪，偏执狂的划分范围无疑比某个时刻以后宽广得多；那个时刻对应上世纪末，也就是1899年前后。

当时正值克雷佩林著作第四版或第五版。直到1899年，他才在“偏执狂”这个相当宽广的框架内部引入一个范围更小的次级分类……

此前，这个框架大体覆盖了后来在这次缩减后被归入早发性痴呆、构成其偏执型分区的内容

……随后，他为偏执狂提出一项颇有意思的定义，把它同此前一并收入偏执狂这个宽泛类别的其他偏执性妄想形式区分开来：

> “偏执狂同其他形式不同，其特征是：一个持久而不可动摇的妄想系统，在内因作用下隐匿发展并持续演变；在它形成的同时，思想、意志与行动仍完整保持清晰和秩序。”

这样一项定义出自克雷佩林这位如此杰出的临床家之手，却可以说逐点违背了一切临床材料；也就是说，其中没有一句是真的。

所谓“发展”并不“隐匿”，它总有冲击和阶段。虽然我不完全确定，但“丰产时刻”这个概念似乎是由我引入的。这个“丰产时刻”总能被察觉；偏执狂开始时，总有某种东西打断他后来所谓“妄想在内因支配下持续演变”的过程。

偏执狂的演变显然不能被限定于“内因”。只须翻到同一位作者和同时代作者笔下的病因学章节——塞里厄与卡普格拉五年后完成了他们的研究——就会看到：当人们寻找偏执狂的触发原因时，总会带着必要的问号提到某种危机、主体生活中的情感事件或生命危机；人们总会寻找某种切实涉及主体外部关系的东西。

有一种妄想的根本特征就是关系妄想，即“关系性妄想”——这个词不是克雷奇默提出的，而是韦尼克创造的。若讨论这种妄想时竟不提外因，反而会十分奇怪。

“一个持久而不可动摇的妄想系统持续演变……”

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哪怕最简短的偏执狂病例观察，也会清楚表明妄想系统有所变化。至于它是否被动摇，在我看来只是次要问题。这里切实涉及一种同主体间心理作用、同外部介入、同偏执狂患者周围某种世界秩序的维持具有一定关系的东西。患者远非不考虑这种秩序；随着妄想演变，他还会试图把它同自己的妄想组合起来。

“……在它形成的同时，思想、意志与行动仍完整保持清晰和秩序。”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好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追问，什么叫“清晰”和“秩序”，以及主体陈述自身妄想时，是否真能找到配得上这些名称的东西。这在偏执狂病例中远非最无趣的问题。不过，这充其量仍是一项非常粗略的刻画，正足以使我们围绕偏执狂重新质疑“清晰”与“秩序”这两个概念。

至于“思想、意志与行动”，问题确实就在这里。我们来到此处，是为了依据一系列具体行为——其中包括疯狂的行为——试着界定思想、意志与行动，而不是以它们为出发点。否则，它们会把我们带进一门学院式心理学；在成为足够严密、至少能在我们的经验层面彼此交换的概念以前，这门心理学看来还必须彻底返工。

我认为，围绕偏执狂概念的一切进展之所以含混，当然同许多事情有关，也许首先同临床分类不充分有关。我想，在座的精神病学家对不同临床类型有足够了解，知道例如“解释妄想”与“诉求妄想”根本不是一

回事；两种妄想形式的结构已经得到充分区分，正足以提出下列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

- 一种妄想成为“解释妄想”，
- 而另一种妄想并不成为“诉求妄想”。

然而，我认为，要理解问题真正位于何处，首先不应朝着把临床类型分散、粉碎成尘的方向前进。我的老师克莱朗博的研究，令人赞叹地凸显了偏执狂性精神病与激情性精神病的差异；上次我已经开始向你们介绍他的功能、作用、人格与学说。不过，这项差异也许不应像人们最初那样，用如此粗重的方式定位；恰恰在心理学区分的层面，他的工作取得了最大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次研讨班更详细地说明它。

无论如何，我认为，看清我们的问题位于偏执狂整个框架的层面上，完全有益。这个困难扮演着根本角色；它首先会切实给人一种感觉：一个世纪的临床工作似乎一直在问题周围打滑。

也就是说，临床每次稍稍深入一步，就会立刻失去已经征服的阵地；我甚至要说，失去阵地恰恰是由于它把病例观察核心中直接可感、可触的东西概念化的方式。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明显地暴露出哪怕只是直接读到的观察同理论化之间的矛盾。几乎可以说，再没有什么疯狂话语比精神病学家恰恰围绕偏执狂说出的那些话更显眼、更可感。

有一点在我看来完全属于问题的动力，我们将沿下面这条道路接近它。比如，读一读我那篇关于偏执狂性精神病的工作，你们就会看

到：为了在真正构成问题神经的地方重新着手临床分析，我把重音放在所谓“初级现象”上……

我有意从老师克莱朗博那里借用这个词

……通过把研究准确地集中于初级现象，我试图证明：这些现象同一切可能从他所谓“观念推演”——也就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东西——中推出的结果，具有根本差异。实际上，这些现象并不比一整套妄想建构背后的东西更为初级。

早在当时，我已经同样坚定地强调：这种现象并不比一片叶子相对于整株植物更为初级；在叶片上，我们会看到叶脉彼此交叠、嵌入方式的某个细节，而某种整株植物共有的东西，则在构成植物整体的某些形式中重现或得到遮蔽。

我非常明确地强调：涉及妄想时，无论考察妄想本身的组成、动机和主题化，还是考察初级现象层面，都能找到类似结构。换言之，如果可以这样说，同一股结构化力量既出现在其中一个部分，也出现在它的整体中。

因此，“初级现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人格内部某种初始核心或克莱朗博所谓“寄生点”，随后主体围绕它形成一种建构、形成纤维状反应，把它包裹、封闭成囊，同时又把它整合进来——也就是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解释”它。

妄想并不是从初级现象推演出来的——这里底本写作“并未被摧毁”[注]；它重现了同一股构成力量。妄想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初级现象。也就是说，这里的“初级”概念只能被当作一个直接而实用的概

念：它指一种得到明确分化、无法还原为自身以外任何东西、只能被界定为结构的结构。

> [注] 此处底本作 Le délire n'est pas détruit，字面为"妄想并未被摧毁"，同随后"妄想也同样是初级现象"的论证衔接异常；译文依上下文暂按可能的 n'est pas déduit（"并不是从中推演出来的"）处理，同时保留底本异文，无法据现有文本确定原话。

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如此深刻地误认了结构这股动力，我刚才所说的、环绕偏执狂的一整套话语，才会始终保有这种能力。你们阅读弗洛伊德以及几乎所有其他作者时，都可以作一个实验：你们总能在那里找到整页、有时甚至整章的文字；把它们从上下文中抽出来，大声朗读，就会发现其中对严格说来所有人〔即所谓"正常人"〕的行为作出了最精彩的阐述。

我刚才读给你们听的克雷佩林偏执狂定义，几乎就成了正常行为的定义。你们会不断遇到这个悖论，甚至在精神分析作者那里也不例外，尤其当他们进入我刚才所谓"模式"的层面时。这个词只是在最近才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取得支配地位，可它很久以前便已潜伏其中。比如，为准备今天的谈话，我重读了亚伯拉罕一篇约作于1908年的旧文[注1]，主题是早发性痴呆。他谈到早发性痴呆患者同对象的关系，说：看看这个患者；一连几个月，他把石头一块块堆起来。这些只是普通小石子，对他而言却仿佛至宝。

> [注1] 参见卡尔·亚伯拉罕：《癔症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性差异》（参见本课末尾的 PDF 文档）。

亚伯拉罕正在向我们解释主体的情感淡漠：主体给自己收藏并过度评价的对象赋予过度的情感价值。主体的情感淡漠这种毛病会走向哪里呢？他在搁板上越堆越多，搁板终于断裂，房间里轰然巨响，人们把

一切都扫走。亚伯拉罕说，这个悖论就在眼前：此人似乎如此看重这些对象，却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加注意；他的注意与欲望所指向的全部对象遭到清理，他也毫不抗议。他只是重新开始，又去积攒另一批东西。

这里显然涉及早发性痴呆；但把它写成这种形式，这则小寓言就具有如此明显的人性，以至我们很想把它变成一篇寓言，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同样的事。我甚至还要说：能够积累大量对我们毫无价值的东西，又能眼看它们一夜之间被当作损失一笔勾销，随后干脆重新开始，这甚至是一个很好的征象。倘若我们始终依恋失去的东西，那时反而可以说：某些对象受到了过度评价，主体无法承受它们的丧失或自己遭受的挫折。

这些号称具有证明力的描述手段完全含混；我们不禁要问，维持这种幻觉哪怕一刻，究竟何以可能。除非有一种我们真可称作批判意识蒙蔽的东西：人们一打开技术著作，尤其关于我们经验和职业技术的著作，全体读者仿佛就被它攫住。上次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可理解”这个词何等飘忽而不断逃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竟没有把这项观察规定为跨入门槛时必须先学会的首要教训和必备公式。

先不要相信自己理解了！从根本误解这个观念出发。这是首要态度；否则，你们当然可以把任何东西全都理解成任何东西。一位作者在某种语境中把某项行为交给你们，作为情感淡漠的征象；换个地方，同一个人在仅仅承认自己的损失以后还能重新开始工作，反而会受到极高的评价。

人们不断诉诸某些被视为公认而根本的概念，尽管它们根本不是如此。说到底，我正要走向这里：要把握处理偏执狂问题的这项困难，就必须准确抓住——

- 偏执狂恰恰位于理解这个层面上；
- 而“初级现象”——依我刚才的界定，也就是不可还原的现象——无论位于妄想层面，还是位于解释层面……[注]

> [注] 此处法文在 qu’il soit au niveau du délire, qu’il soit au niveau de l’interprétation 后中断，没有与前文配合的完整谓语；译文保留其未完成状态。

不过，我想你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东西，知道问题涉及什么：有一个主体，世界开始对他取得一种意指。什么是解释？一段时间以来，主体受到一系列现象侵扰：他在街上发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可究竟是什么事？只要向他提问，你们就会看到许多东西。你们会看到，有些点连他自己也觉得神秘，另一些点他却能说出一些内容。换言之，他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符号化；他怎样符号化它？

他已经用意指的术语来符号化。也就是说，他并不总是知道——如果仔细追究，你们常会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事情对自己究竟有利还是不利。他探寻同类的某项行为，或者外部世界里被他注意到并视为有意

指的某项特征，究竟在指示什么。上次我谈过红色汽车，并试着以此向你们说明：根据下列不同角度，红色可能取得何等迥异的效力：

- 它的知觉价值；
- 它的想象性价值；
- 我甚至说，你们必须清楚区分它的象征价值同它的想象性价值；这项差异很容易让人感受到。

在人类行为中，同样有若干特征出现在知觉领域中。这个世界从来不只是一个纯粹非人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人构成的世界；此前完全中性的特征，会在其中对主体取得一种价值。

归根到底，主体尤其在妄想的某个阶段说了什么？首先出现的是意指概念。他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那就是意指；某个时刻连同它所包含的那些特征来到首要位置，向他突然显现。他的关系领域负载着一种意指。在许多病例中，他很难再走得更远；可是，最显眼的正是这项意指本身彻底来到最前景。

它强加自身，是一种不信任，却又对他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单凭它属于这项域，我们也就理解：偏执狂之所以如此难以把握，同时又具有首要的吸引力，恰恰因为它处在理解层面——如果可以这样说，是作为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处在理解层面。

人们之所以能围绕它谈“推理性疯病”、谈“保持”“清晰”和“意志中的秩序”，唯一的理由是：无论在现象中走得多远，我们都觉得自己仍处于

可理解的领域；即使被理解的东西无法真正由主体表述、命名，也无法嵌入一个切实阐明它的语境，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仅仅因为某物已经处在理解层面，我们就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理解它，仿佛只须再向前走一点。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幻觉：既然所涉及的是理解，我们便已经理解了。

然而，恰恰不是！有个人曾指出这一点，虽然他停留在这项完全初步的观察上。夏尔·布隆代尔写过一本名为《病态意识》的书，其中说，精神病理现象的特性恰恰在于欺骗这种理解。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不过，此书之后的精神病学经验或精神病理思想发展带来了许多东西，他却顽固地拒绝理解其中任何一项。

然而，问题恰好应当从这里重新着手：它确实总是可理解的。在我们训练学生“理解”病例评析时，这也是一项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我们总要在这里把他们拦住。他们已经理解的时刻，总会同他们错过本来应当作出或不应作出的解释的时刻相重合。主体话语中总会有一个时刻格外凸显……

它仿佛呈现出问题的开口，呈现出进入病例的辩证入口

……而初学者总会在此刻急忙用一项理解填满病例，并通常极其天真地用一个公式表达它：“主体想说的就是这个。”你怎么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主体并没有这样说。听一听他实际说出的东西，至少会发现本来可能浮现、可能提出一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单凭自身就足以构成有效的解释，或者至少足以启动解释。

事实上，我现在就要让你们看一看这番话语汇聚到哪里。重要的不是下列某个时刻——

- 主体知觉的时刻，
- 他的妄想推演的时刻，
- 他自我解释的时刻，
- 他同你对话的时刻，……究竟或多或少能够理解。重要的是，在其中某些点上有某种事情发生了；要描述它，只能使用下面这个公式：某个点上确实存在一个——如果你们坚持，也可以说完全能够理解的——核心，但这个核心能否理解根本毫无意义。

完全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核心对一切辩证运动都不可接近、惰性而停滞。让我们取初步解释中存在的那个意指要素。它不断重复，通过一再重现而运作；有时推进得更远、阐发得更多，主体有时会在意指的阐发上走远得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会始终带着同一个内含的问号反复出现；没有任何回答被带给它，也没有任何人尝试把它整合进一场对话。

这个现象始终被缩减为某种对严格说来的一切辩证组合绝不开放的东西。在激情性精神病中，现象表面看来更接近所谓正常；人们强调激情性诉求居于支配地位，这又意味着什么？

主体无法承受某项损失或损害，整个生活似乎都集中于弥补自己蒙受的损害，集中于由此产生的诉求和全部诉讼行动；这些行动如此突出，有时仿佛远远压过了其中利害本身的重要性。这同样属于一种相

同秩序：一切可能的辩证运动都在这里停住了，只是这一次集中于完全不同的位置。

上次我已经指出，解释现象围绕什么定位：围绕某种同时分有自我与他者的东西；精神分析理论恰好使我们能够把自我界定为始终相对的。在激情性精神病中，这个所谓可理解核心显然位于离主体的“我”近得多的地方；但它仍是一个辩证惰性的核心，构成主体的特征。

简而言之，正是因为人们始终从根本上误认病理经验现象学中的辩证维度本身——可以说，这种误认标志着一类心智——所以，自一个半世纪前精神病学发端、人类临床观察建立为自身以来，进入这个领域仿佛就意味着：用“首先去理解”取代我刚才希望大家普遍接受的起始公式。从我们开始处理人这个对象的时刻起，人们便从根本上误认这项维度；然而在其他地方、在人文科学中，辩证维度的自主性似乎处处都保持活力、得到承认，并且可以说得到日常运用。

人们像克雷佩林刚才那样强调主体各种能力的完整，强调他的“意愿”和“行动”；这些看来同我们期待人类具有的一切完全同质，任何地方都没有缺损、裂缝或功能紊乱。唯一绝未受到质疑的是：

- 人类行为的特性，是把自己的行动、欲望和价值安置在一种辩证运动中；因此，我们看到它们不仅每时每刻发生变化，还会连续变化，甚至由于对话的一次迂回而转入严格相反的价值；

- 我们还会察觉这项绝对首要的真理。即使在问题的寓言中，它也隐藏在最通俗的故事形式下：某一刻构成损失和不利的东西，下一刻便可能变成诸神赐予的幸福本身；

- 欲望和依恋的一切部分，乃至一项人类活动最持久的意指，都随时可能重新受到质疑；

- 符号也始终可能随着个体整个位置的辩证关系而翻转。

……这项经验如此普通，以至令人无比惊讶的是：人们仅仅因为突然面对一个可以客体化的东西——自己的同类——就把这个维度彻底忘掉了。不过，它从未完全遭到遗忘；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找到痕迹：

- 每当观察者在某种意义上让自己的本能、让对问题所在的感觉引导自己时；

- 也在“推理性疯病”的文本中；这类文本当然远为生动、更富表现力，也更能说明问题，正是为了向我们展示问题所在。

在相关现象中，解释一词显然会引起各种歧义；尤其当它被嵌入“推理性疯病”这种语境时，人们会谈组合型偏执狂，仿佛现象组合本身就藏着秘密。

换言之，至少在这里，有一个术语本应得到提升，取得全部价值，使我们毫不犹豫地运用它：“谁在说话？”这个问题似乎理应支配整个偏执狂问题。上次我已经稍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提醒你们，所谓言语幻觉在偏执狂中占据完全核心的位置，也提到人们围绕它搭建的理论。人们花了很久才察觉一件有时明明就在眼前的事：从“谁在说话？”这个问题的严格字面意义看，在幻觉中，主体正在你面前亲口说出他声称自己听到的内容。

职业生涯早期，塞格拉先生必须在《精神与神经疾病临床讲义》中作出一记惊人之举[注2]，指出言语幻觉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人们能够察觉……

> [注2]　儒勒·塞格拉：《精神与神经疾病临床讲义》（萨尔佩特里耶，1887—1894），阿瑟兰与乌佐出版社，1895年。

有些病例有非常明显的征象，另一些则须看得再仔细一点

……他们自己正在亲口说出那些声称听见的词语——无论他们知道、不知道，还是不愿知道自己正在说出这些词。

无论如何，这构成了一场小小的革命：听觉幻觉的源头不在外部，必定在内部。那么，还有什么比设想它可能对应于某个同样被称作感觉区的区域受到轻微刺激更诱人的呢？

剩下的问题是，这个看法能否继续适用于语言领域。严格说来，是否真有那些著名的言语性精神幻觉？它们是否总或多或少都是精神运动性幻觉？归根到底，在病理形式中可以很容易概括为言说现象的东西，在正常形式中能否同下面这个现象分离……

看来塞格拉只是从具体角度接近了事情

……也就是这个十分显著而可感的事实：主体说话时，会听见自己。

这是言说现象在最初步经验层面上的一个绝对根本维度：听见你的并不只是另一个人。某些所谓沟通理论以一幅图像为基础：一边是发送者，一边是接收者，中间有某种东西通过。只凭这幅图像，根本不可能把言说现象图式化。

人们似乎忘了，在人类言说中——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只要涉及人类言说，发送者就始终同时也是接收者。换言之，我们听见自己话语的声音；我们可能不去注意，却肯定听见了。这些再简单不过的观察，本应支配所谓言语性精神运动幻觉的整个问题；也许恰恰因为它太过显而易见，在分析这些现象时反而完全退居次要位置。当然，塞格拉的这场小小革命远未独力向我们交出谜底。

塞格拉始终停留在对幻觉的现象探索层面，后来也不得不修正自己最初理论中过分绝对、包罗一切的部分。他恢复了某些幻觉概念应有的地位；它们完全无法在这套域中得到理论说明。他还带来了不容误认的临床洞见与描述上的精细，我建议你们设法了解。这些内容很多都很有教益——也许它们的错误比它们自身的贡献更有教益。

我们不能对相关领域作一项纯粹的负面实验，也就是只凭错误建构某种东西；另一方面，错误的领域又过于繁茂，几乎取之不尽。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几条捷径，试着切入问题核心。

我们将遵循弗洛伊德的建议来做，也就是同弗洛伊德一起进入施雷伯病例分析，对施雷伯病例作一次哪怕快速、却完整的阅读。我会尽可能多地把段落交给你们，因为若完整读出全文，未免过于冗长乏味。

施雷伯这个人在德国司法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884至1885年间，他患过一场短暂疾病……

- 他本人向我们讲述了这场疾病的详情；
- 这场精神疾病表现为一种疑病妄想。……随后，他离开为自己治疗的弗莱希希教授疗养院；看来他已经完全痊愈，没有任何明显后遗症。

此后约八年间，他过着表面正常的生活。他本人指出，只有一件事给自己的家庭幸福蒙上阴影、扰乱了平衡：他和妻子都因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八年以后……

所有作者都一致指出，施雷伯的文字表明，这个时刻同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晋升相重合：他被任命为莱比锡的上诉法院院长

……他在所谓“假期”以前获知晋升，并于十月到任。

看来，正如许多精神危机中时常发生的那样，他在某个时刻有些不胜职务重负。根据交叉材料，他获得这次晋升时五十一岁左右……

对于莱比锡上诉法院院长这个头衔而言，这个年龄相当年轻

……这让他有些惊慌失措。他发现自己周围都是比自己经验丰富得多、更熟练处理棘手事务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得不超负荷工作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严重紊乱开始出现。

因此，经过八年正常生活，他再次出现紊乱。最初是各种不同现象：失眠、思维奔逸，以及思想中出现一些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主题。它们使他很快再次就医，并导致严格说来的收治。最初，他仍被收进莱比锡同一家弗莱希希教授的疗养院；随后，他在另一家机构——德累斯顿皮尔松教授的疗养院——短暂停留，又被送进皮尔马附近的一所疗养院。

他从1894年一直住到1901年；妄想在那里经历一连串阶段。至少表面看来，他能够就这些阶段给出一份组织异常严整、日期似乎极其可靠的叙述。他在住院的最后几个月写下这份叙述，准备出版一本出院后立刻问世的书。因此，他在争取出院权利时，从未向任何人隐瞒自己将把这项经验告知全人类；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把经验中那些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的启示告诉大家。

弗洛伊德在1909年拿起这本1905年出版的书。他在假期中同费伦齐谈论它，并于1910年12月写成我们今天读到的那篇关于一个偏执型妄想病例之自传的论文。

我们直接打开施雷伯的书。正文前有一封写给枢密顾问弗莱希希教授的信；它很有意思，恰好向我们展示：妄想主体能够在怎样的媒介中批判自己最为坚持的那些术语。至少对你们当中不太熟悉此类病例的

人来说，这一点值得特别指出。你们会看到，弗莱希希教授在施雷伯的妄想建构中占据完全核心的位置。

〔朗读施雷伯写给弗莱希希教授的信，日期为1903年3月，载《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第11—14页。〕

因此，你们看到，他以礼貌的语调、清晰有序的展开来引入这本书；第一章至少表面看来构成了一整套关于上帝与不朽的理论。这已经向你们表明，施雷伯妄想的核心术语，首先要求承认“时间神经”的功能[注]。

> [注] 此处底本作 des nerfs du temps（“时间神经”），但在本课随后及施雷伯理论的通常表述中，核心术语是“神经”“神圣射线”与灵魂；现有底本不足以确定此处是否存在转录讹误，译文保留原词。

〔朗读《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节选，第23—24页。〕

一切都在这里：这些射线不受限制，更不会局限于人所认识的那种人类个体性边界。它们将形成一个解释网络；但它远不只用来解释，因为患者也切身体验着它。我们的患者会以这个网络为经纬，像在画布上一样织出整套妄想。

神经之间的关系——尤其主体神经同神圣神经之间的关系——将经历一连串曲折，其中包括 Nervenanhang 这个词，也就是神经附接。这是一种可以介入相关交换的吸引形式，能使相关个体、即主体的神经，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某个人物的行动；妄想发展过程中，主体会以不同方式判断此人的意图。

换言之，他试图准确定位这些意图。意图起初当然远非善意——患者感受到的灾难性效果已经足以说明——却也并非排除一切回击；因为随着妄想推进，这些意图所具有的功能发生改变，被整合进一种真正的渐进过程。例如：

- 妄想初期由弗莱希希医生的人格支配；
- 妄想末期则牵涉上帝的整个结构——你们会看到，这个结构远非简单——

……上帝远非没有被牵涉其中。

神圣射线得到验证，甚至发生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进展；换言之，射线构成灵魂的根基，却不同于这些灵魂的身份。因为施雷伯明确强调：不能把这些灵魂的不朽理解为严格属于人格层面、归结为灵魂自身身份的东西。

他用一种颇为可信的方式陈述这一切，因此理论并非不可接受。他认为，自我身份是否得到保存并不需要论证；反过来，那些神经的载体、特有性质及其记录下的表达，后来会被重新并入神圣射线。这些东西仿佛一种原材料，始终可以被神圣行动重新取回、重新发动；它既滋养神圣行动，反过来又被神圣行动用来构成后续创造。

这里有一整幅代谢图景，在极其广阔的层面上得到展开，而且细节异常丰富——你们将会看到；这些功能的细节极其重要。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说话属于神圣射线的本性。这里有一种神经之灵魂，同某种根本语言混合在一起；我会借适当段落向你们说明，主体以何等精细的方式界定它，而这份精细现在就值得凸显。

这个根本层面同一种韵味十足的德语颇为亲近；它把委婉语推用到极致，甚至运用词语的双价能力。也许下一次，我能更有效地一点点读给你们听。这里显然最有趣的是：我们不能不从中认出，它同弗洛伊德那篇著名的《原始词语的相反意义》具有惊人的亲缘关系[注3]。你们还记得那篇文章：弗洛伊德以为自己发现，不承认矛盾的无意识语言同这样一项事实彼此类似——原始词语可能用同一个词指称从两极观察的同一种〔特征〕；同一个词既能表示“好”也能表示“坏”，既能表示“年轻”也能表示“年老”，既能表示“长”也能表示“短”，等等。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始词语的相反意义》（1910），载《应用精神分析论文集》，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

去年，我们曾在一场讲座中听到本维尼斯特先生从语言学角度作出的有力批评。尽管如此，弗洛伊德的观察仍从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中取得全部意义；如果真有某种东西可以再为它增添价值，那就是施雷伯这个人在行文间赋予它的重音。初步接近这本书时，我们必须看到：妄想建构何等丰富，又能让多少结构显现出来；它恰好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

- 类似并不只存在于内容中，也不只存在于那些通常所谓“图像象征作用”所带来的一切中；
- 它还存在于结构本身：其中某些图式接近我们自己可能需要从经验中提取的图式。

这套关于“会说话的神圣神经”的理论，一方面能够由主体整合，另一方面又同他从根本上彻底分离；你们可以从中隐约感到，它同我教给你们的无意识运作描述〔并非〕完全不同。我们在施雷伯病例中看

到：某种在理论上被认为完全正确的东西，以特定形式得到客体化；当然，这也留下翻转的可能——也就是要问，所谓人性是否本身也分有某种被理论化的妄想病例。

在我们惯常活动的那些棘手领域中，一切情感建构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本人也作过这项观察；在施雷伯病例分析结尾，他指出，归根到底，自己从未见过任何东西如此相似于力比多理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二者的同质性……

包括它所含的一切撤回投注、“逐步稀释”[注4]、分离反应与远距影响

> [注4] Potemisation 为英语用语，指通过顺势疗法式的连续稀释，使有毒物质变得可以饮用。

……他从未见过任何东西，比施雷伯的神圣射线理论更像力比多理论——更像他自己表述出来的那套理论。不过，他并不因此更加动容；因为他的整个阐发都是为了说明：在施雷伯病例中，如此惊人地接近人际交换和心内经济之真实结构关系的现象，可能涉及什么。

因此，你们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例已经相当严重的疯狂。这些妄想式引言将引出施雷伯病例随后向我们展开的一切，也能让你们想象：施雷伯那套完全“迷失了方向”的理论构造具有何等非凡的丰富性。你们看到，我们正处在这项歧义的中心；这一次，它被推到效力的最高程度，因为它会远远延续下去，超出此前人们围绕妄想打转时所采取的表层进路。

这是第一次，我们面对施雷伯这样堪称典范的病例，又有一种如此敏锐的心智介入，提出完全鲜明的结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得到外推、应用于一切病例；它们看来构成一项耀眼而同时富于启发的新事物，

尤其使人能够在全新基础上重新分类偏执狂。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在妄想文本本身、在主体表达的东西中，相关结构并不像神经症中那样只以暗含内容或隐藏关系存在，而是切实得到明说、理论化，甚至充分展开。只要我们想到去看它、把它视作它实际所是的东西——甚至不能说必须先有钥匙——妄想已经提供了一份完全可读的复本，一份理论研究所处理之物的复本。精神病这个特殊领域的典范性与启示意义正在这里；我曾建议你们以“偏执狂”这个“名称”，为它保留最大的外延和最大弹性。我们今年给予它特别关注，也因此得到辩护。

## Chapter II

## 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ÆCOX [1] (1908)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has enabled us to recognize important analogies in the structure of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æcox.[2] It will be sufficient in this paper to mention the most outstanding ones. The symptoms of both diseases originate in repressed sexual complexes. In both cases normal as well as perverse impulses can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of symptoms. The means of expression employed by both diseases ar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same. (I need only refer to sexual symbolism.)

But that in spite of thes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ere exists a fundamental antithesis between the two diseases, all observers agree. Up to the present, however, they have not defined this antithesis satisfactorily. They have only described differences of degree, and these only bring out once mor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forms of illness. Seeing that certai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common to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æcox are of a psycho-sexual nature,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re this analogy ends. And so, in seeking to discover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llnesses, we are again brought back to the psycho-sexual sphere.

Freud's *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1905) offers us a basis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is kind, and in

[1] [No. 11, A. B.]
[2] See particularly Jung, *Über die Psychologie der Dementia Præcox* (1907).

〔双击缩略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始词语的相反意义》〔返回 26-11〕〕

（1910）〔出版说明〕

在我的《梦的解析》中，我曾把一项命题作为分析工作尚未得到理解的结果提出；现在，我要在这篇报告开头重述它〔原文注1〕：“梦对于相反与矛盾范畴的态度极为引人注目。它干脆忽略矛盾。‘不’对梦仿佛并不存在。相反者特别容易被拉进一个统一体，或由同一个东西表现出来。梦甚至可以自由地以任意要素在愿望中的反面来表现这个要素；因此，一开始根本无法判断任何能够具有反面的要素，在梦思想中究竟以肯定形式还是以否定形式存在。”古代的释梦者看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梦中一物可以表示其反面”这个前提。现代梦研究者只要承认梦具有意义并可以解释，偶尔也会认识到这项可能〔原文注2〕。我想，假定所有沿着科学释梦道路追随我的人都已发现上述命题得到证实，也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我只是偶然读到语言研究者 K. 阿贝尔的一项工作以后，才开始理解梦的工作为何具有这种奇特倾向：它无视否定，并用同一种表现手段表达彼此相反的内容。该文于1884年作为独立小册子出版，次年又收入作者的《语言学论文集》。这个题目本身很有意思，因此，我把阿贝尔论文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段落依全文附在这里——尽管删去了大多数例子——是有理由的。它向我们提供一项惊人说明：上述梦的工作方式，同我们所知最古老语言的一项特性彼此重合。

阿贝尔首先强调：埃及语在第一批象形文字铭文出现很久以前就必定已经发展起来。随后他写道（第4页）：“在埃及语——这个原始世界

唯一留存下来的遗迹——中，可以找到相当数量具有两种意义的词，其中一种意义正好同另一种相反。只要人能够设想这种显而易见的荒谬，不妨想象：德语 stark〔强〕这个词既表示'强'，又表示'弱'；柏林人用名词 Licht〔光〕同时指'光明'和'黑暗'；一位慕尼黑市民把啤酒叫作 Bier，另一位市民谈到水时却使用同一个词。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古埃及人在日常语言中惯常采用的惊人做法。面对它，谁还能责怪一个人不敢相信地摇头呢？……"〔例略。〕

"面对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相反意义实例（见附录），有一点不容怀疑：至少在一种语言中，曾经有大量词语同时指称一件事及其反面。无论多么惊人，事实就在眼前，我们必须正视它。"（同上，第7页）作者随后排除用偶然同音来解释这个事实，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把它归因于埃及人的心智发展水平低下："然而，埃及绝不是荒谬的故乡。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理性最早的发展地之一……当今天拥有文明的那些民族还在向嗜血偶像献祭活人时，埃及已经懂得一种纯粹而庄严的道德，并已制定出十诫中的很大一部分。一个在如此黑暗的时代点燃正义与文化火炬的民族，不可能在日常言说和思考中如此愚蠢……能够制造玻璃，并像使用机器一样抬起、搬运巨大石块的人，至少也应有足够理性，不至于把一件事同时看作它自己和它的反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同埃及人竟容许自己使用如此奇特而自相矛盾的语言调和起来？……他们为何习惯于把同一个声音载体赋予最互相敌对的思想，把彼此对立最强烈的东西结合进一种不可解的统一？"（同上，第9页）

在尝试解释以前，还必须提到埃及语这种不可理解做法的进一步升级。"埃及语词汇的一切离奇之处中，也许最非同寻常的是：除了一身结合相反意义的词以外，它还有另一类复合词；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汇

被合成一个复合词，而这个复合词却只具有两个组成部分中一个部分的意义。因此，在这门非同寻常的语言中，不仅有既表示‘强’又表示‘弱’、既表示‘命令’又表示‘服从’的词，还有‘老—少’‘远—近’‘系—解’‘外—内’等复合词……尽管这些词的构成包含最不相同的内容，第一个却只表示‘少’，第二个只表示‘近’，第三个只表示‘系’，第四个只表示‘内’……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些复合词中简直有意把概念上的矛盾结合起来；这并不是为了像中文有时所做的那样创造第三个概念，而只是为了借复合词表达其中一个彼此对立的组成部分本来单独就能表达的意义……”

不过，这个谜比看起来更容易解开。我们的概念通过比较产生。“倘若永远明亮，我们就不会区分明暗，也就不可能具有光明的概念和词语……”“显而易见，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一件事只有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通过同其他事物相区分，才拥有独立存在……”“既然每个概念都是其反面的孪生兄弟，那么最初若不以反面来衡量它，人们怎样能够想到它，又怎样能够把它传达给同样试图思考它的人？……”（同上，第15页）“既然只有同弱相对，强这个概念才可能被设想，那么表示‘强’的词便同时含有对‘弱’的回忆；‘强’正是借后者才进入存在。这个词实际上既不表示‘强’也不表示‘弱’，而是表示二者的关系和差异；正是这项差异同等地创造了双方……”“人只能通过同反面对立，才获得自己最早、最简单的概念；只是逐渐地，他才学会分开对立的两面，不再有意识地用其中一面衡量另一面，而能单独思考每一面。”

语言不仅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根本上还用来把思想传达给别人，因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原始埃及人”每次怎样让同类知道，“自己指的是这个双性概念的哪一面”？在书写中，这是借所谓“限定符”图像完成

的；它们被放在字母符号后面，指示后者的意义，本身却不需要读出来。“当埃及语 ken 要表示‘强’时，按字母书写的语音后面会放一个直立、持有武器的男子图像；当同一个词要表达‘弱’时，表示语音的字母后面则跟着一个蹲坐而无精打采的人。大多数其他双义词也以类似方式伴随解释性图像。”（同上，第18页）依阿贝尔之见，在口语中，手势负责给说出的词添加所需的正负符号。

阿贝尔认为，出现这种相反双义现象的是“最古老的词根”。随着语言继续发展，歧义逐渐消失；至少在古埃及语中，我们可以追踪从这种状态一直过渡到现代词汇单义性的全部阶段。“原先双义的词在后来的语言中各自分裂成两个单义词；两个相反意义分别独占同一个词根的一种语音‘减弱’（变形）。”例如，早在象形文字中，ken“强—弱”就分裂成 ken“强”与 kan“弱”。“换言之，那些最初只能在对立中找到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得到人类心智的充分练习，最终使两个部分各自取得独立存在，并因此各自拥有一个单独的语音代表。”

阿贝尔认为，在埃及语中很容易得到证明的相反原初义，也可以扩展到闪米特语族和印欧语族。“这种证明能在其他语族中推进多远，仍有待观察；因为尽管相反意义最初必定呈现于每一个种族的思考者面前，它却未必在各处都变得可以从词义中辨认，或得到保存。”

阿贝尔还强调：哲学家贝恩似乎并不知道实际语言现象，却仅凭纯理论理由，就把词语的这种双义规定为一种逻辑必然。相关段落（《逻辑学》，第1卷，第54页）以如下句子开头：“一切知识、思想或意识在本质上都具有相对性，这一点必定会在语言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能知道的一切都被视作从某种其他东西发生的过渡，那么每项经验都

必须具有两面；要么每个名称必须具有双重意义，要么每种意义都必须拥有两个名称。”

我从“埃及语、印欧语和阿拉伯语相反意义实例附录”中选出若干甚至能给不懂这些语言的我们留下印象的例子。拉丁语 altus 既表示“高”也表示“深”，sacer 既表示“神圣”也表示“受诅咒”；这里，相反意义仍完整存在，词形并未变化。用来区分相反意义的语音变化，则可以由下列例子证明：clamare，喊叫——clam，轻声、安静；siccus，干——succus，汁。德语 Boden 至今仍可指房屋最上端和最下端。我们的 bös〔坏〕对应一个 bass〔好〕；古萨克森语 bat〔好〕对英语 bad〔坏〕；英语 to lock〔锁闭〕对德语 Lücke, Loch〔缝隙、孔洞〕；德语 kleben〔粘合〕对英语 to cleave〔劈开〕；德语 Stumm〔无声〕对 Stimme〔声音〕，等等。如此一来，那项备受嘲笑的词源解释 lucus a non lucendo 也许仍可取得一种良好意义。

在《语言的起源》（1885，第305页）中，阿贝尔还指出古老思维劳作留下的其他痕迹。英国人今天要表达“没有”仍说 without，也就是“有—无”；东普鲁士人也作同样用法。With 本身今天对应我们的“同、与”，最初却既表示“与”也表示“没有”，这仍可从 withdraw〔离开、撤回〕和 withhold〔扣留〕看出。我们也能从德语 wider〔反对〕与 wieder〔重新、再度〕看到同一种变化。

为了同梦的工作比较，古埃及语还有另一项极其奇特的性质。“在埃及语中，词语——我们姑且说，看起来——既可以颠倒语音，也可以颠倒意义。假定德语 gut〔好〕是一个埃及语词，它除了‘好’以外也可能表示‘坏’，除了读作 gut 也可以读作 tug。”这类语音倒置数量极多，无法用偶然解释；在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中同样可以举出大量例子。若先限于日耳曼语，可注意：Topf—pot; boat—tub; wait—täuwen; hurry

—Ruhe; care—reck; Balken—Klobe, club。若把其他印欧语言也纳入考虑，相关例子便会相应增加，例如：capere—packen; ren—Niere; the leaf〔叶〕—folium；〔俄语〕dum-a〔思想〕、thymos—梵语 mêdh, mûdha〔灵魂〕、Mut；Rauchen〔吸烟〕—俄语 Kur-ít；kreischen—to shriek〔尖叫〕，等等。

阿贝尔试图用词根的双写、重叠来解释语音倒置现象。我们在这里会觉得难以跟随这位语言研究者。我们想到，儿童多么喜欢把词的语音顺序颠倒过来；梦的工作又何等频繁地为了各种目的颠倒自己的表现材料——这里颠倒的不再是字母，而是图像的顺序。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语音倒置追溯到一个影响更深的要素〔原文注3〕。梦的工作在本文开头强调的特性，同语言研究者揭示的最古老语言实践彼此一致；从这种一致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证实：梦中的思想表达具有退行而古老的性质。于是，我们精神病学家不得不形成一项猜想：如果对语言发展了解得更多，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梦的语言，也更容易翻译它〔原文注4〕。

---

〔出版说明〕初刊于《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第2卷第1期，维也纳，1910年，第179—184页；另见《弗洛伊德全集》，第8卷，第214—221页。

〔原文注1〕《梦的解析》第六章：“梦的工作”。

〔原文注2〕例如参见 G. H. 冯·舒伯特《梦的象征作用》，第4版，1862年，第二章：“梦的语言”。

〔原文注3〕关于语音倒置（音位换位）现象——它同梦的工作也许比相反意义（对立）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另参 W. 迈耶-林特尔恩，载1909年3月7日《科隆日报》。

〔原文注4〕还有一个很自然的假定：词语原初具有的相反意义，构成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机制；各种不同倾向利用这套机制，才会产生说出反面内容的口误。

# 第3课 · 1955年11月30日

精神分析家的生活……

就在同一天，几位被我分析的人仿佛不约而同，反复提醒我这一点

……精神分析家的生活并不美好。把精神分析家比作垃圾场确有道理，因为他每天都必须“承受”各种话语和言论；它们的价值无疑十分可疑，对前来诉说的主体而言更是如此。一名精神分析家——倘若他真是分析家——不仅惯于克服这种感受；说实话，只要他真实而名副其实地成为分析家，这种感受就会消失。

不过我必须说，当他的职能迫使他穷尽所谓精神分析文献所包含的全部工作时，这种感受就会以全部力量重新出现。再没有什么练习比这更令科学注意力困惑：只要你真的必须用功，也就是不得不在很短时间里阅读各位作者围绕相同主题提出的那些表面同质的观点，就会发现每次运用基本概念时，都牵涉公然且持续不断的矛盾；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们。

以施雷伯主席病例为例，你们只掌握一套总体而近乎开创性的图式，用来证明精神分析为偏执狂的发病机制带来的重大创新：相关倾向——换言之，作为无意识动机的根本驱力——无非是一种同性恋倾向。把注意力引向围绕这个概念聚集的一整套事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创新，深刻改变了我们观察偏执狂的整个视角。然而，这种同性恋究竟是什么，它在主体经济的哪一点介入——换句话说，它怎样决定

精神病——我可以作证：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只勾勒出最含混、甚至最互相矛盾的进路。

人们假定同性恋倾向在某个尚待确定的时刻闯入，又提出对它的“防御”；只要给“防御”一词以明确含义，这个概念就远未证明自身。所幸，对大部分精神分析研究的继续——即在可思之梦的黑暗中不断摸索——而言，这个“防御”概念恰恰从未得到明确规定。

因为，下列两种意义之间显然存在持续不断的歧义：

- 一边是“防御”同普通精神病理学、同疾病事实之间的关系。这种“防御”同引起它的原因远非总有普遍而单义的关系；人们只把防御视作维持某种平衡的一条道路，或者又把它本身视作致病因素；

- 另一边是我们讨论心理时提出的防御概念：它是某种得到表述、重新加工并变换特定动机的东西。

于是，人们把这个“防御”概念所指向的倾向纳入考虑，并向我们保证：要寻找最初决定施雷伯精神病的时刻，应当考察他的疾病各阶段受到触发的时刻。

你们知道，他在1886或1887年前后发生过第一次危机。人们试图借他的回忆录——其中确有一些材料——向我们展示这场危机的坐标。据说，当时可以注意到施雷伯生活中的一项特征：他本来即将参加帝国议会选举；疾病突然发生，参选也就无从谈起。随后约八年间——也就是持续约一年的第一次危机结束后——施雷伯法官表现正常，只除了一点：成为父亲这个愿望、甚至希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

于是，八九年以后，他获得一个新的晋升……

在某种意义上过早：依他的年龄，人们原本预料不到他会获任如此高位

……即莱比锡上诉法院院长。据说，被提拔到这个显要职位，赋予他一种权威；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把他提升到一种父亲功能，使他承担一项即使不算完整，也比他可能期待的一切都更充分、更沉重的责任。

这使我们觉得，这次晋升同危机的触发具有关系。换言之：

- 在第一种情形中，人们强调他未能抵达自己抱负的目标；危机之所以触发，似乎是为了使他不必面对那些斗争；
- 在另一种情形中，职位从外部降临，几乎被人断定为与他的功绩不相称；人们却赋予它同样的触发价值。

施雷伯主席没有子女，人们便以此为事实证据，表明父亲概念扮演着首要角色；当他进入这项父亲位置时，据说他的阉割恐惧也随之复活……

围绕父亲相关内容产生的同性恋欲求

……它直接参与了危机的触发，并将造成一切病理性扭曲和变形，造成那些逐步推动其妄想演变的幻象。

毫无疑问，妄想从一开始就有医疗环境中的男性人物在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受到点名，依次来到前景，进入施雷伯主席那种高度偏执型迫害的中心；这表明，这些男性人物具有首要价值。

说到底，这是一种转移；它当然不能按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看待，却是某种同转移同属一种秩序、又同那些曾负责照料他的人具有特殊联系的东西。人物选择由此得到充分解释。不过，在试图满足于这种总体协调以前，我们应当看到：当人们为它寻找动机时，采取的做法完全忽略了反面证据。换言之，人们把对斗争的恐惧同过早、甚至无缘无故的成功，都视作意义相同的简单征象；在两种情形中都得出肯定结论。

假如施雷伯主席在两次危机之间碰巧成了父亲，人们显然又会强调这项事实，充分发挥他无法承受父亲功能这项事实的价值。简言之，“冲突”概念始终以一种可谓含混的方式被调动：人们似乎把冲突的来源同另一种有时远不容易看见的东西——恰恰是冲突的缺席——放在同一层面。也就是说，因为冲突留下了一块可以说是没有冲突的空位，某种反应、建构和主体性的发动才会出现。

这只是一个顺带的简单提示，为了让你们看到：在把握机制时，我们遇到的仍是上节课讨论的同一歧义，也就是妄想意指本身的歧义。必

须说清楚，这里涉及通常所谓内容，而我更愿意称之为“精神病性言说”。这种惊人价值的歧义会在一切层面显现：

- 从临床接触开始；在某段时间里，你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同你沟通的人，因为他同你说着同一种语言；

- 可当你们继续推进，尤其如果你们是精神分析家，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同样能够理解——正如我上次向你们展示的，甚至太过能够理解——以至有时产生一种幻觉或海市蜃楼：仿佛这里无非是某个人比普通人更加惊人、更加深入地穿透了无意识系统的机制本身。

施雷伯在第二章某处顺带表达了这一点：

> “我蒙受了凡人很少能够蒙受的启示。”

因此，正是在妄想者的系统中，我们仿佛会找到有时格外突出的可理解要素；今天的讨论将围绕这项歧义展开。我会试着向你们说明，想沿哪条进路带领你们，使我们能够从这个双重问题中析出一些东西：

- 一边是精神病的意指，也就是“精神病性言说”；

- 另一边是精神病的机制，也就是一个主体怎样进入精神病；后一个问题同前一个同样重要。

我会试着向你们展示自己将沿哪条进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在我看来，唯有这条进路能够真正定位问题，避免我们在妄想的各种解释——包括精神分析式解释——的不同层面上始终维持的混淆。我要提醒那些来参加我病例展示的人：上一次，我展示了一名显然患有精神病的女患者。他们会记得，我花了多长时间才让她显露出某种烙印或征象，

证明她确实是一名妄想患者，而不只是性格异常、脾气难处并同周围人争执的人。

我们作了远远超过这类工作通常所能花费的一小时的询问，才终于清楚看到：她几乎始终不肯越出的同一种语言的边界上，仍有另一种语言；它具有妄想者语言特有、时常非同寻常的韵味。在这种语言中，某些词取得特殊的重音和密度；有时，这一点甚至在词的形式、即能指的形式中显现出来，赋予词语一种公然的新词性质——偏执狂作品中的这个特征极其醒目。

在前几天那位患者的病例中，galopiner（“加洛皮内”）这个词终于出现，无疑为此前告诉我们的一切签下了署名。此前那些内容也很容易被译成另一种东西；我们当然很容易这样做，因为患者本人已为我们指路，而且“挫折”一词最近也已经成为体面人的日常词汇：谁不是整天向你谈论自己曾经、将会遭受的挫折，或周围其他人正在遭受的挫折？[注]

> [注] Galopiner 是患者使用并由拉康当作诊断“署名”的特殊新词；为了保留其能指物质性和暂不可化约的意义，译文保留法文并加音译，不把它预先归并为“受挫”“胡闹”等现成词。

可这位患者成为受害者，绝不只是因为她的尊严、独立或私事遭到某种挫折。她显然身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galopiner 这个词以及她无疑向我们隐瞒的许多其他词，构成了根本坐标。

我们将从这里着手澄清问题，先从外部进路、从第一次检查入手。我想让你们在这里停留片刻，感受我去年试图使你们熟练掌握的那些范畴多么重要。因为仅仅把语言学理论带给你们还不够。你们记得，语

言学区分能指与所指：能指必须按照语言材料的意义来把握；而不可跌入的陷阱和洞穴，就是相信所指等于事物和对象。

所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就是意指。前两年，我曾借语言学家圣奥古斯丁向你们解释这一点。他论意义的章节恰如本维尼斯特先生一样，向我们清楚表明：意指始终指向意指，也就是指向另一个意指。无论从哪一点把握，语言系统都绝不会通向一个直接指向现实中某一点的索引；语言的整个网络覆盖了全部现实。你永远不能说："被指称的就是这个。"因为即使你终于能够这样做，也永远不会知道——例如，我指着这张桌子时——自己指的是颜色、厚度、作为一个对象的桌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必须把这项区分放在心里。此刻，我们先停在那个简单而初步的小现象前：前几天那位患者所用的 galopiner。此外还有其他词；施雷伯谈到"神经附接"时，也不断强调这类词的原创性。他明确说，这是经过检验的灵魂或神圣射线告诉他的。

有些词可以说是关键词。他本人强调，自己从来不可能想出这些表达；它们是原创的、充实的词，同他用来组织话语、传达经验的其他词截然不同。他自己并未弄错：这里存在不同层次。此刻，你们必须正是在这个有别于能指层次的层次上把握〔galopiner 或"神经附接"〕：从它的物质性质出发，从它同共同语言发生特殊不协调的形式出发；这种形式就叫作"新词"。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还有一点值得停留；只有从语言中意指始终指向另一个意指这个观念出发，它才会向你们显现：

- 这些词——在施雷伯的文本中可以看清，而面对任何这类患者时也能紧贴现象观察——

- 妄想语言中这些令你停步的词，总有一项特殊之处：它们绝不会在指向另一个意指的过程中耗尽。可以说，它们的意指本质上指向“意指”本身。

这是一种在某些方面除自身以外不指向任何东西的意指；那里始终留有某种不可还原之物。患者本人清楚强调：

- 正因为如此，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无法得到界定；词本身携带着重量；

- 在被还原为另一个意指以前，它自身就意指某种恰恰不可言说的东西；它首先指向意指本身。

在这些主体所承受的一切现象的具体表现中，我们会在两极看到这一点。先把讨论限于现象的这个阶段：无论涵盖主体所表现、所声称的一切现象的内言语被推进到什么程度，都有两极把这种性质推到最高点。

施雷伯的文本在这里又为我们清楚标出两类现象：

1. 一类现象中，来源传达的新词清楚成形。妄想直觉是一种充实的现象，它以某种方式淹没并填满主体，向他揭开一个全新的经验视野。主体强调其原创印记与特殊韵味本身；当他谈到自己经由经验

得到启蒙、被引入的“根本语言”时，强调的正是这一切。无论词是什么、采取什么形式，它都呈现出以同一个词指称某种用法的性质。词——依我们赋予它的全部重音——就是谜底、奥秘的关键词，是情境的灵魂……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1. 在相反的一极，当意指不再指向任何东西时，它采取另一种形式……

那就是彻底的空无：一个不断重复、反复重现并在耳边絮叨的公式，以及许多其他表现传讯内容之刻板坚持的形式。与“词”相对，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叠句。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在〔意指的〕这两种形式中……

- 一种最为充实〔1〕，
- 另一种最为空洞〔2〕，……倘若这里确实涉及意指，那么在这个阶段，恰恰是这些点使意指停住。它们仿佛主体话语之网、话语网络中的铅坠；这种结构特征让我们从最初的临床接触起，就认出某种东西赋予主体话语以妄想的性质和署名。

你们已经看见，正是“语言”这个术语……

同一种语言甚至会在初次接触主体——有时即使面对妄想最严重的主体——时使我们上当

……推动我们超越语言概念，提出“话语”这个术语。因为这些患者之所以引人关注、甚至具有研究意义，确实在于：他们同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

倘若没有这项要素，我们对他们便会一无所知；可是，正是在：

- 话语的经济中，
- 意指同意指的关系中，
- 以及他们的话语同话语共同秩序的关系中，……我们才已经定位到那项使我们辨认出这里涉及妄想的根本特征；这项特征也显现在对偏执型精神病者或妄想痴呆患者话语的分析中。

我过去曾试着勾勒这种分析，在1930年前后发表于《医学—心理学年鉴》的一篇文章中作过尝试[注1]。那里分析的是一个精神分裂性言语病例；我们确实在话语的一切层面——也就是语义单位层面和句法关系单位层面——分析话语并辨认结构。相关结构很可能位于人们所谓“精神分裂性解体”的特定层面；这个说法也许并非毫无理由，不过人们在该病例中使用它时，无疑并不完全知道它究竟有何效力。

> [注1] 雅克·拉康：《“灵感式”书写：精神分裂书写》（E.L.P.），《医学—心理学年鉴》，1931年，第2卷，第508—522页。

我刚才谈到语言；你们也应当借此顺带看见并触及某种不足、陷阱和有害倾向。它在一些分析家的公式中表现得足够明显，他们对你们说：

“必须用患者的语言同患者说话。”

你们看，我们仍处在何等初级的层面。当然，说这种话的人应当得到宽恕，正如所有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都应得到宽恕……〔《路加福音》23:34〕

不过，这已经足以告诉你们：这种说法无非是某个领域、或精神分析经验的整个阶段所发出的某种悔改信号。人们用如此粗略的方式提起问题，便以为自己很快完成了斗争，很快就把账结清了。

然而，它实际揭露的无疑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它清楚表明，人们让相关对象——也就是患者——同自己保持多远的距离，因为问题被说成：

- 我们说他的语言；
- 我们说简单人和傻子的语言。

标出这种距离，偶尔把语言变成所谓纯粹简单的工具、变成让一无所知者理解自己的方式，恰好已经彻底回避了实际问题，即言说的现实性。归根到底，问题就在这里。现在，我暂且放下分析家。我们看到，无论围绕妄想的精神病学讨论称作现象学、心理发生论还是器质发生论，它都环绕着什么打转。比如，考察克莱朗博那些异常精细而敏锐的分析时，这场讨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有些人以为，问题在于确定它是器质现象还是非器质现象。据说，现象学本身能够让人察觉这一点。姑且同意，但让我们看得更仔细。问题其实是：归根到底，患者是否真正在说话？当然，如果没有区分语言与言说，答案就是肯定的：他在说话；可是，他说话就像一只精巧

玩偶会睁眼闭眼、吸入液体等等。只要满足于这一点，那么玩偶当然也会说话。

我们由此清楚看到，克莱朗博分析初级现象并在其结构中寻找署名时，真正涉及什么：那东西随便可以叫作“机械性”“匍匐蔓延性”或天知道什么术语；相关说法本身充满新词。

我们发现，即使在这种分析中，人格也始终受到预设，从未得到界定。之所以说它受到预设，是因为人们以他所谓“观念发生性质”为依据，也就是以一种首要可理解性为依据；情感同其语言表达之间的联系，被预设为不言自明。人们从这里出发，去证明某种次级之物，首要之物借它说出自身。是否把这项次级之物称作“自动的”，根本不会改变问题。

有人告诉我们：如果现象学本身能够证明这项次级要素层面上发生的事情明显具有自动性质，那就证明这种紊乱不属于心理发生。

可是，把现象界定为“自动的”“机械的”或“非心理发生的”，首先——这就是第一项论据——恰恰仍要依据一个心理发生论的参照才能得到理解。人们预设有一个主体能够自行理解，而这个主体又在观察自己。这被视作理所当然；因为如果不是这个主体，其他现象又怎样被把握为外来之物？

请顺带看清这里的问题。我们处理的并不是哲学中的经典问题：思想是否……

从莱布尼茨以来，至少从人们开始把意识当作确定性根基的时刻起，这个问题就阻住了整个哲学

……思想要成为思想，是否必定必须把自己思作正在思想？也就是说，一项思想若要把某种思想当作思想来思，它是否必定必须察觉自己正在思想自己所思的内容？

这显然远非简单，因为它立即开启一场“无穷镜像游戏”。所有曾在这个问题上停留的人都顺带指出：倘若思想的本性就是把自己思作正在思想，那就必须有第三项思想，把自己思作一项受到思想的、正在思想的思想，如此无穷后退。这个小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它单凭自身就足以证明：若把主体奠基在对自身透明的思想现象中，这个根基并不充分。不过，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另一件事。

从我们面对一种被体验、被感受为寄生性的现象，并承认主体把它本身认作这种现象的时刻起……

也就是说，把它认作一种在客观上毫无动机、只写入器官结构所规定的装置、写入假定的神经通路易化紊乱的东西

……我们就无法逃避一个概念：主体受到这样的结构化，以至他能够对自身内部发生的事情作一番“内窥”。

这里的“内窥”，指实际发生在这些装置里的事情——这个概念在相关文本的一切层面都会涌现。凡是把主体中发生的事情集中于器官内部现象的理论，都不得不在每个时刻把主体性不协调的一切现象本身作为内窥结果来把握。

好吧！弗洛伊德比其他作者更微妙地接近这些事情；或者说，他采取一种隐含方式，根本看不到其他问题。不过，他同样被迫承认：主体必定处在某个享有特权的角落里，能够从那里“内窥”自身内部发生的

事情。我们谈到主体对胃、肺或其他身体内部过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妄想式“内窥”时，这个概念不会令任何人惊讶。可一旦谈到脑内现象，它显然就带有非常特殊的倾向，因为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主体对神经纤维系统内部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内窥。

所有作者都会顺带坚持这一点，却不自知；而他们论证的一次转折已经让我们无法不看见它。当主体成为思想回声的对象时，我们同克莱朗博一起承认，这是时间值改变造成的一次分流：脑内讯息——如果可以这样说，两份电报中的一份——从一个点发出；其中一份走上一条通道，另一份走上另一条受阻的通道。后一份讯息比前一份更晚抵达，某个必定处在某处的主体注意到它，并把它登记为前一份讯息的回声。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享有特权的点，可以从那里作出这项辨认。换言之，无论怎样建构器质发生论或自动作用论，都逃不过一个结果：某处存在一个享有特权的点，主体能从那里注意到这些可能的延迟、不协调，注意到一个系统同另一个系统之间仅仅不相一致而表现出的紊乱。

简言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心理发生论者。因为这个享有特权的点恰好无非就是灵魂；而人们甚至比那些赋予灵魂最粗陋现实性的人更加崇拜偶像，因为他们把灵魂安置在一个特殊点。无论那里是纤维还是非纤维，是系统还是其他东西，最终总会抵达施雷伯主席在自己的话语中指出的那根唯一纤维。它终究牢牢依附于人格；因为除了通常所谓“综合功能”，没有什么能赋予它这种特权性质。

综合的特性，就是在某处拥有一个汇合点、会聚点。这个点即使是观念性的，也仍然存在。因此，从分析角度看，无论我们：

- 成为器质发生论者，
- 还是成为我所谓隐含意义、尚未展开意义上的心理发生论者，……我们都不得不预设：某处始终有一个享有特权的点，或有一个享有特权的实体。

这足以解释精神病现象的层面了吗？如果精神分析确实为精神病问题带来了某种有意义、富于启发而照亮问题的东西，显然是因为：

- 这类假设的贫乏和不育恰好一目了然；
- 精神分析在精神病中揭示出的最富有成果、最丰富、最具动力、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切，恰好冲垮了精神病学数十年间围绕这些纯功能概念不断搭建的微小构造；

自我作为这类概念的伪装，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根本枢轴。

正是在这一切意义上，精神分析带来了新东西。可是，应当怎样接近这项新东西，才不至于换一条道路、换一种方法，再次坠入一大批同样以各种方式伪装起来的自我？唯一的进路，是在现象向我们显现的同一域中提出问题，也就是言说之域。

然而，要有效地在言说之域提出问题，就必须正视言说的在场。它如此鲜明，正是它创造了精神病现象学的全部丰富性：我们在其中看到言说可能具有的一切侧面、一切分解和一切折射；言语幻觉作为精神

病中的根本现象，又恰恰是“言说是什么”这个问题中最成问题的现象之一。

我们能否在言说现象本身上停留片刻，问一问：只须考察它，是否就能看见一种极其根本、原初而鲜明的结构显露出来？我们将在这种结构内部作出不再属于神话的区别，也就是不必再把一个称作“主体”的东西预设在某个地方。

什么是言说？为什么我刚才问：〔妄想性精神病〕主体究竟是否在说话？让我们在这个事实上停留片刻：言说同一份语言记录有什么差别？言说首先恰恰就是对他人说话。

我只想提醒你们一个自己曾多次放在教学前景的特征：“对他人说话”这件乍看简单的事具有怎样的性质。最近一段时间，科学关注的前景出现了讯息是什么、讯息具有怎样功能的问题。

每当我们在这里以严格意义使用“言说”，我都曾告诉你们：言说的结构，就是主体从他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言说——根本的言说，至少是在作出承诺的用语层面存在的言说——以我刚才所说的这项结构为基础。“主体从他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两种完全典范性的形式。我曾告诉你们，第一种是 fides〔信义〕，即已经许下的言说：“你是我的妻子”或“你是我的主人”。我曾反复坚持这个典范公式。它意味着：你就是仍处在我的言说中的那个东西；而只有当我站到你的位置上开口时，才能肯定这一点。它从你那里来到我这里，使我确信自己作出的承诺；这个言说也把你卷入承诺。

言说作为两个主体之位置的奠基者，其统一性在这里得到显现。即使这对你们仍不完全明显，反面检验——像往常一样——会清楚得多。辨认主体对主体关系的征象，区分你们处在主体对主体而不是主体对客体关系中的标准，恰好就是我刚才提出的 fides 之反面：佯骗。只要能够假定一个人所说或所做——二者是一回事——是为了佯骗你，你面对的就是一个主体。这当然包括其中全部辩证运动，甚至包括他为了让你相信反面而说出真话。你们知道那个犹太故事：一个人说“我要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明明每天都去克拉科夫，为什么还告诉我你要去？你这样说，是为了让我相信你要去别处。”弗洛伊德曾经凸显这个故事。

主体告诉我的东西同可能的佯骗具有根本关系，这仍是同一件事。在这里，他也把讯息送给我，而我接收到相关言说，也就是颠倒形式的讯息；因为问题严格说来当然是“我把握到什么是真的”，而我从中收到的，恰恰是真实的反面。

这就是结构的两面：

- 奠基性言说，
- 以及说谎的言说、欺骗性的言说本身。

一切可能的沟通形式都在这个层面取得自身原点，因为我们已经推广了沟通概念。照目前的势头，我们几乎就要依据沟通，重写生物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整套理论。只须稍读诺伯特·维纳先生[注2]，你们就会看到这条路能走得多远。

> [注2]　诺伯特·维纳：《控制论与社会：人的人类用途》，UGE“10/18”丛书，1962年。

在他凸显的诸多悖论中，有一则奇怪的神话。他构想、假定一个万物皆可传输的时代：只要手段足够强大，就可以把一个人用电报传到纽约。也就是依次发送构成其有机体的一切定位数据，再在那里自动重造此人；既然我们对可能的传输没有必要设限，就能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地点，逐点重新综合他的全部真实身份。

这种东西显然是一种奇怪的障眼法；人人都为其中各种主体性幻象惊叹。不过，指出一个简单事实就足以让奇迹坍塌，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在这些条件下，把一个人用电报传送两厘米，并不会比传到纽约更不神奇；因此，这无非就是我们每天移动同样距离时所做的事情。这种对术语的惊人混淆，已经充分表明："沟通"这类概念必须谨慎使用。

不过，沟通概念已经得到推广。你们很清楚——另一方面，它甚至被引入物理学的一般概念，所以肯定具有一种功能——我现在要在这些沟通形式中明确规定：作为"向他者说话"的言说是什么。归根到底，它就是使作为他者的对方开口说话。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把这个他者写成大写 A 的"大他者"。

这里的大写当然有另一项理由。每当语言给我们的东西迫使我们添加补充符号时，理由都会不同；这一次，理由是：大他者奠定了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一切。拿嗓音来说：

- "你是我的妻子"：归根到底，你怎么知道？
- "你是我的主人"：归根到底，你们真有那么确定吗？

这些言说之所以具有奠基价值，恰恰因为它的讯息所瞄准的东西，同佯骗中显现的东西一样，是作为绝对他者在场的大他者；也就是说，他恰好受到承认，却不被认识。这一点十分根本。同样，佯骗意味着：你归根到底不知道它是否真是佯骗，也不知道它是确有其事，还是恰好为了佯骗你。正是这项要素、大他者之他异性中这项直接的未知，标志着对他者说出的言说同他者的关系。我会让你们在这项结构描述的层面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唯有从这里出发，才能提出问题。

这就是言说唯一的区别性特征吗？也许是！我们不知道。言说当然还有其他特征；它不只对大他者说，也谈论作为对象的小他者。一个主体向你谈起自己时，涉及的恰好就是这个。

请仔细观察：前几天那位偏执狂患者——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使用 galopiner 一词的女人——同你说话时，存在两个层次。你知道她是一个主体——这是对我刚才所说内容的完全直接的运用——你知道她是一个主体……

也就是说，当你说她的人格仍然健全、你只是面对一场“部分妄想”时，表达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她恰恰试图蒙骗你。换言之，当你在临床上辨认出一场“部分妄想”时，这一点就是情境假设的一部分。

- 前几天，我恰恰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让她说出 galopiner。也就是说，她使我一个半小时毫无进展，并在这一个半小时里表现得十分健全。

- 正因如此，她才是一名处在临床所能察觉的妄想边界上的患者。

- 正因如此，你们才坚持这个主体具有我们行话所谓人格的健全部分。她恰恰通过谈论小他者、能够嘲弄小他者，而作为主体存在。

现在，她谈到自己；有时，她谈得恰好多了一点，超出自己愿意说的程度，于是我们察觉她正在陷入妄想。此刻，她在谈某种东西，谈我们共同面对的对象，谈小写 a 的小他者。始终是她在说话，但这里出现了另一种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并没有交出其全部简单性。情形并不像她在同我谈论随便哪个已经得到承认的对象；她谈的是极其引人关注而且炙手可热的东西，谈的是她仍然把自己卷入其中的东西。简言之，她在作证。

我们接下来要稍稍深入的，正是“作证”这个概念。作证本身也只是纯粹简单的沟通吗？当然不是。然而有一点十分清楚：我们作为沟通赋予价值的一切，都属于作证的秩序；而在一切属于人的事情中，处在极限上的无利害沟通，归根到底只能被设想成一项可以说已经失效的见证，也就是人人都同意的东西。

人人都知道，这是知识传递的理想；科学共同体的整个思想本身就以此为基础：沟通最终由一项人人都能同意的实验裁决。不过仍必须看

到：即使只看人们要求你建立这项实验的起点，它仍然以见证功能为依托。

我请你们注意，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种他异性。我不能重新讲述过去围绕所谓“偏执狂式认识”说过的一切——何况今年的讨论会迫使我不断回到它。在论文以后更加久远的年代，我第一次向当时颇具原创性的“精神病学演进”小组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偏执狂式认识”。这个说法意味着：

- 一切对象认识本身都具有偏执狂式亲缘；
- 一切人类认识都从所谓嫉妒的辩证法中取得源头、根基与起点；我们看到，嫉妒作为沟通的原初表现出现。

这里涉及一个可以一般观察、可以从行为主义角度观察的概念。只须看看两个面对彼此的幼儿之间发生什么，就足以表明其中包含根本的传递主义：一个孩子打了另一个孩子，却说“是另一个孩子打了我”；这不是因为他在撒谎，而是因为他严格说来就是另一个孩子。人类世界正是在这个基础和根基上同动物世界彼此衔接并分化；人类对象同动物对象的区别，在于人类对象能够被收集，能够以中性状态延展并无限增殖：

- 从需要角度看，它们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兴趣对象，却仍然成为人类对象；
- 人类对象不依赖本能准备；主体并不是像一种化学价或任一项同另一项彼此嵌合那样，同对象相互适配。人类世界是一个覆满对象的

世界，其基础在于：引起人类兴趣的对象，就是大他者欲望的对象。为什么这件事可能发生？

因为人的自我本身就是小他者。

- 从他自身倾向的涌现中，
- 从他同这幅小他者图像的关系中，人的自我才是——而且严格说来就是——一个由欲望构成的不连贯“整体”与“集合”。这才是“碎裂身体”一词的真实含义；自我的第一次综合在根本上就是 alter〔他者〕，是 alter ego〔另一个自我〕，是一种异化的综合。作为欲望主体的人，其构成中心是小他者，因为小他者赋予他自身的统一；主体最初接近对象时，把对象看作小他者欲望的对象。

你们看到，这在偏执狂关系内部界定了一个来自另一源头的东西；想象与实在的区别恰好就在这里。每当我们谈论小他者并谈到某个对象时，这个对象内部都暗含另一重原初他异性，因为：

- 对象原初就是竞争与争夺的对象；
- 对象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作为小他者欲望的对象发挥功能。

在这幅最初的认识图景中，偏执狂式认识建立在嫉妒的争夺之中，建立在我曾试图以镜像阶段界定的最初认同中。对象根基处这项争夺基础和竞争基础，恰恰在言说中得到克服，因为言说牵涉第三者：言说始终是契约与约定；人们围绕争夺与竞争，对某种东西达成一致。大家同意：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不过，这

场原初竞争中的攻击性要素，仍会在一切谈论小他者、谈论作为第三者的小他者和谈论对象的话语中留下印记。

只须让“见证”一词的回响自行展开：它在拉丁语中称作 testis，而人们作证时，是拿自己的睾丸（testis）作证；这并非没有理由，因为这里始终牵涉主体的投入。凡是带有见证印记的东西，都始终潜伏着有机体。归根到底，一切属于见证秩序的东西中，始终存在一场潜在斗争。在当下的整个辩证运动中，在对象构成的整个辩证运动中，我们重新发现一项潜在可能：主体会被要求取消小他者。理由很简单——这场辩证运动从我在小他者中的异化开始；于是会有一个时刻，因为小他者不同意，我自己也可能被置于遭取消的位置。

无意识的辩证法始终把无法同小他者共存——也就是斗争——包含为自身的一项可能。“主奴辩证法”连同它那种可以说“心理发生的”价值，在这里重新出现。它也许并不完全具有决定性；《精神现象学》大概没有穷尽精神发展所涉及的一切。不过，我们当然不能不看到它的心理学价值：某种同人类世界本身的构成具有最紧密关系的东西，就发生在一项根本争夺、发生在一场最初而根本的“殊死斗争”中。

只不过，从形式上看，问题确实就在这项如此根本的争夺中。最终，我们看到利害重新出现：主人夺走了奴隶的享乐，也就是说，他夺取了欲望对象，因为那是奴隶的欲望对象；但与此同时，他失去了自己的人性。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享乐对象，而是争夺本身。

此后，他的人性又归功于谁？只归功于奴隶的承认。然而，主人并不承认奴隶，这项承认便严格说来毫无价值。结果，正如在事情的具体演变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获得胜利、征服了享乐的人变成十足的傻

瓜，也就是除了享乐以外再无能力。被剥夺享乐的人反而保留整个人类关系，因为他承认了主人，所以仍有可能得到主人的承认；也就是说，他将穿越漫长世纪投入斗争，要求那个能够有效承认自己的人承认自己。

这里必须区分：

- 大写 A 的大他者，也就是作为不被认识者的大他者；
- 小写 a 的小他者，也就是作为我的小他者——它是一切认识的来源。……欲望的全部辩证法都必须安置在这个间距中，安置在两种关系所张开的夹角中。因为问题是：
- 主体在同你说话吗？
- 他在谈什么？我显然不会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这恰好是从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这是真实言说吗？”在起点，我们无法知道。可他确实在向你谈某种东西；他谈什么？谈他自己！

然而，你们从一开始便清楚看到：他谈的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对象的对象。我此前没有让这个对象入场，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这项二元辩证法的延伸：他向你谈论某个曾向他说话的东西。偏执狂结构的根基本身正在这里：主体理解了某种东西，并把它表述出来；那就是我刚才围绕意指谈到的东西——某种东西取得了言说形式，正在对他说话。

当然，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幻想中的存在，甚至主体本人也不怀疑；因为主体始终能够表述这些言说之来源完全含混的性质。偏执狂所涉

及的，正是这个向主体说话的存在具有怎样的结构；主体将围绕它向你作证。

你们现在就应当看到，下列两者之间存在何等层次差异：

- 一切属于异化的内容；异化是想象界的一种完全普遍的形式；
- 以及“精神病中的这种异化究竟是什么”这个确切问题。……因为我暂且把下面这个点保持开放：
- 它也许不只涉及认同；
- 也许不只是整套布景倒向了 alter〔小他者〕一侧。……而从主体说话的时刻起，作为言说者的主体便可能存在并显现……

也就是说，他不是对小写 a 的小他者说话，也不是谈论小写 a 的小他者，而是同大写 A 的大他者说话

……他在真实地说话，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有精神病问题，精神病者只会是说话机器。恰恰因为他在向你说话，你才把他的见证纳入考虑。

问题在于：这个人人都同意是幻想性存在的东西，究竟具有怎样的结构？它恰好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 S，即一个后面带问号的 S。主体中开口说话的这个部分是什么？精神分析说：它是无意识。

当然，要让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意义，你们首先必须承认：可以说，无意识恰好是主体中某种正在说话的东西。我们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主体中有某种东西在说话，它越过主体，甚至在主体不知道时仍然说

话；它说出的比主体以为的更多。谈到精神病时，精神分析说：就是它在说话。这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整个问题在于：它怎样说话，偏执狂话语具有怎样的结构。

弗洛伊德在这里带来一项极其惊人的东西；今天我只想提醒你们相关表述，从而显示问题怎样开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神经症中可能要求得到承认的根本倾向是“我爱他，那个小他者”和“你爱我”。在〔精神病〕这里，我们并不处在“我爱你”或“你爱我”的层面。弗洛伊德的辩证法十分惊人，然而在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上，我们随后足足困惑了十年。

他说，有三种方式可以否定这句话，而且直截了当。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精神病者的无意识如此善于语法、却如此不擅长语文学；因为从语文学角度看，这一切都极为可疑，主语功能同动词的补语彼此相连。不要以为事情会像初一法语语法书那样简单；这里牵涉各种争论，各种语言都有许多说“我爱他”的方式。

弗洛伊德没有在这一切上停留。他说，这里有三个“我”、三种功能，也有三类妄想，而且这套做法奏效。他说：

- 第一种否定方式是说：“爱他的不是我，是她。”也就是我的伴侣、我的分身；爱他的是她。

- 第二种方式是说：“我爱的不是他，而是她。”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在这个层面，防御并不充分；恰恰因为主体是偏执狂患者，投射机制也介入了。换言之，这一次受到替换的不是主体，反而是补语，

所以伪装并不充分；投射必须介入。也就是，他不能只说“我爱的不是他”，还必须说“是她爱我”。

- 第三种可能：“我不爱他，我恨他。”必须相信，这里的反转也仍然“不够”——至少弗洛伊德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投射机制同样必须介入，于是变成“他恨我”，我们就进入迫害妄想。这项高度综合当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不过你们也清楚看到，它同时留下了多少问题。

请注意：每当遭到抹除的不是“我”本身时，投射机制都必须作为补充机制介入。这并非全然不可接受，但我们仍希望得到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太过清楚的是：把形式最纯粹的“不”、即否定分别施加于这些项，绝不具有同样价值。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套做法大体接近了某种东西；换言之，它奏效了。也就是说，它必定从某一面把事情定位在真正层面上——尽管它把自己放在原则性的词语争辩层面。我们会更仔细地考察它。也许我今天上午带来的内容已经使你们初步看到，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我爱他”是什么？

它是一条讯息吗？我的意思是，这仍是一个留给我们追问的问题。

它是一项见证吗？它是对一项事实的赤裸承认吗？换言之，是处在中性状态的事实吗？

这个问题值得提出。另一方面，我们暂且把事情留在讯息的术语中。清楚的是，在第一种情形“是她爱他”中，可以说，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承担自己的讯息；区别正在这里。这种异化无疑把我们放在小他者的层面上：自我借 alter ego〔另一个自我〕说话，而这个另一个自我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性别。

我们先限于这项观察：颠倒的异化。我们还会追问，为何嫉妒妄想中有一个要素处在前景：同小他者本身发生认同，同时带着一种性别化符号；但最初“同小他者认同”的方向并没有给出这个符号。这是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顺带让你们亲手触到：这样分析结构，就会看到这里无论如何不涉及投射。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同一个“投射”术语用于弗洛伊德讨论嫉妒妄想时所指的另一种现象：一种或多或少整合进神经症机制的投射，即把自己的不忠归到小他者身上，也就是……

弗洛伊德把二者区分得十分清楚，因为临床中的区别也十分清楚

……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嫉妒妻子，是因为自己有几桩小小的风流过失需要自责。

这不必然、甚至绝不是同一种机制。可能属于精神病的嫉妒妄想，不能用同一机制来说明；无论按弗洛伊德的域，还是按我刚才试图把它纳入的域，这里都是：通过颠倒的异化，你同自己的妻子这个主体认同，把她变成自己誓言的传信人；这些誓言甚至并不指向另一个特定男人——临床表明事情不是如此——而是指向数量几乎不定的男人。人人都知道，严格说来的偏执狂式嫉妒妄想可以无限重复，会在经验的每一个转角重新涌现；几乎所有进入、甚至根本没有进入视野的主体，都可能被它牵涉。

在另一种情形〔第二种〕中，我们以讯息形式把握：“我爱的不是他，而是她爱我。”我们会说，情爱妄想中确实有某项讯息抵达；但这是另一类异化，不再是颠倒的，而是转向的异化。因为当我相信自己受到一种不可言说而神秘的纽带联结时，我指向的已经不再是最初言说所

指向的那个人。这条纽带如此奇特，引起了所有问题，以至人们会谈柏拉图式爱情。

同作为这个对象的特殊小他者之间的纽带，甚至还没有任何具体关系。它往往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对象；主体满足于通过书信同他沟通，甚至不知道信是否真的送达。这是一种结构非常特殊的东西。

至少可以说，讯息发生转向的异化时，会伴随小他者的去人格化。它比表面上可能包含的“英雄气概”更加显眼——情爱妄想者自己所谓“经受一切考验的抵抗”，正是这种英雄气概。情爱妄想指向的那个小他者如此中性化，以至可以说，他被放大到世界本身的尺寸；因为正如克莱朗博所说，“整个历险关乎普遍利益”，是情爱妄想的一项根本特征。

在第三种情形中，我们面对一种远为接近否认的东西；它很可能为我们握住一把钥匙，使我们下次能够用真实形式，真正集中于问题实际所在的点。

这是一种转换的异化：爱变成了恨，否认在其中至关重要；小他者整个系统发生深刻改变——它不断倍增，围绕世界形成外延性的解释网络——向你们表明，严格说来的想象性扰乱在这里被推到最高程度。

你们看到，一切妄想的根本关系，现在正向我们的研究提出自身。我们越是能够区分主体、区分那个开口言说者——无论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区分作为主体之想象关系对象的想象性小 a，就越能推进这项研究。这个小他者是个体自我的根、基础和重心，而在自我中，无论语言多么在场，都绝对没有言说。我们还必须把它同大写 A 的大他者区分开。

我们将试着围绕这些术语取得坐标，从而作出一项根本区别：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同神经症中发生的事情。

# 第4课 · 1955年12月7日

弗洛伊德在分别题为《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注1]和《神经症与精神病》[注2]的两篇文章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材料。

> [注1]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1924）；另见法文译本。

> [注2]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

我要着重说明：神经症与精神病在扰乱主体同现实的关系时，有何不同。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以非常细致而有结构的方式重申，神经症中的压抑究竟是什么意思。弗洛伊德在那里提醒我们：主体同现实的关系在两种情形中组织得如此不同，必有一项深层的结构性理由。显然，神经症患者同现实的关系不会等同于精神病患者；后者的临床特征恰恰在于向你给出、传达并说明一种遭到深刻败坏的现实关系，而这就是所谓妄想。

因此，弗洛伊德的问题是：我们的说明应当怎样表述这项差别。谈到神经症时，我们确实让逃避、回避以及同一部分现实的冲突扮演某种角色；至于发病环节，创伤概念作为神经症最初的紧张，是一个病因学概念。现实在神经症发病中的功能是一回事；到了神经症中主体同现实发生某种断裂的时刻，则是另一回事。

弗洛伊德强调，神经症起初牺牲的现实，是心理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进入一项极其重要的区分：“现实”并不等于“外部现实”。主体在神经症发动之初删略了——按后来的说法，盲点化了——自身心理现实的一部分；换一种语言说，就是本我的一部分，而这件事被遗忘了。

它没有理由不继续让人听见自己，而且会以我的全部教学所强调的方式，以得到表述的、“象征的”方式让人听见。说到这里，在其他见证之外，我们不能不顺带引用弗洛伊德的一项提示；若能把它表述得更清楚，本来会更好。

〔德文〕“然而，精神病新建的幻想性外部世界意欲取代外部现实；神经症的幻想世界则像儿童游戏一样，乐于依附现实的一部分——但不是它不得不抵御的那一部分——并赋予它一种特殊意指和秘密意义，而我们把这种意义称作‘象征的’，并不总是完全准确。”

我的意思是，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一文中，弗洛伊德坚持并表述了这些差别。他明确说明：那个幻想世界——他正是在这里这样称呼它——仿佛一个同现实分隔的“储藏室”，主体在那里保存着建构外部世界时可以调用的资源。

精神病会从这个储藏室取用材料；我们稍后会看到它用这些材料做什么。但弗洛伊德说，神经症很不一样：主体一度删略的那份现实，会借赋予它特殊意指与秘密意义而尝试使它重新出现；我们把这种意义称作“象征的”，却没有总在恰当之处落下重音。他在那里明确强调：我们以印象主义方式使用“象征的”这个词，却从未真正依照问题本身把它精确规定下来。

我顺带向你们说明……

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愿望，也就是在文本中给出参照，

我并非总能这样做，因为不能让我的话语因此中断；

但必要时，我仍会把引文带给你们

……弗洛伊德那里还有其他意味深长的段落：他诉诸象征秩序并感到必须充分表述它。神经症中涉及的正是这一点；而他把精神病同它对置，因为精神病同外部现实之间曾出现一个孔洞和断裂，随后人们会召来幻想填满这道裂隙。

我们能完全满足于如此简单的定义和对立吗?

必须看到，在神经症的第二个时刻，现实无法在外部世界中以象征方式得到充分的重新表述，因此神经症才会出现局部逃离现实。这里的逃离采取另一种形式：主体无法始终面对现实的那一部分；这个空洞导致主体以秘密方式重新组织保留下来的现实。

我们能满足于以此划分神经症与精神病吗？况且，在精神病中，现实本身的确首先出现一个孔洞，随后才由幻想世界填补。肯定不能！弗洛伊德在阅读施雷伯文本以后也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只看症状是怎样造成的，还必须考察这种形成的机制。我们无疑会首先考虑这样一种可能：用精神病幻想的补片，替换外部世界结构中的孔洞、裂缝或断裂点。

为了解释它，我们有投射机制。今天我从这里开始，当然并非偶然——它正承接我的论述——不过我要格外强调一点。几位研读我已经评注过的弗洛伊德文本的人告诉我：他们重读一段我曾强调其重要性的文字时，仍不确定怎样理解那段其实很清楚的话。它谈到狼人那次片段性幻觉，其中显出了他的偏执狂潜势。

他们非常清楚地把握了我要说、已经表述并强调的这句话：

“在象征界中遭拒斥的一切，都会在实在中重新出现。”[注]

> [注] 此处底本作 réparait（“修补”），但依本课前后文及拉康反复使用的公式，应为 reparaît（“重新出现”）；译文按公式处理并保留底本异文。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围绕我怎样翻译“患者对此一无所知”，讨论便可能展开。通过压抑机制对待被压抑者，就是对它有所知，因为压抑与被压抑者的返回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它在主体的意识语言以外得到表达。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令其中一些人感到困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这里以何种方式存在一种知识。不过我要再举一个取自施雷伯主席的事实。当弗洛伊德解释投射的特有机制时，这个机制当然立刻被提出来说明幻想在现实中的重新出现；但弗洛伊德在这里明确停下来，指出我们不能干脆只谈投射：

- 显而易见，在所谓“投射性”嫉妒妄想中，投射以一种方式运作：主体把自己或多或少确实感到、或在想象中感到有罪的不忠，归到伴侣身上；

- 迫害妄想的出现却是另一回事。它固然通过实在中的解释直觉表现出来，但这里涉及的是我们的理论置于妄想基础处的那项著名同性恋驱力。

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这样表达：

> “把内在受到抑制的感觉说成重新向外投射，并不正确也不准确……”

Verdrängung〔压抑〕是一种象征化，是被压抑者的返回；相反，Unterdrückung〔抑制〕只表示某种东西在内部受到抑制。

“……我们更应当说，遭到……的东西”

你们或许还记得他在使用下面这个词时落下的强调重音；无论人们知道与否，谁也无法让我相信弗洛伊德不懂得揭开“隔离”这个委婉说法。

“……遭到拒绝的东西，从外部返回。”

〔德文〕“偏执狂的症状形成中，最醒目的是那个堪称投射的特征。一项内部知觉受到抑制；作为它的替代，其内容经过某种变形以后，以来自外部的知觉形式进入意识。在迫害妄想中，变形由情感的转化构成：本应在内部感受到的爱，被知觉为来自外部的恨。若不是及时想起两点，人们很容易把这个奇特过程看作偏执狂最重要、绝对具有特征诊断意义的东西：第一，投射在各种偏执狂形式中并不扮演同样的角色；第二，它不只发生在偏执狂中，也发生在心理生活的其他条件下，甚至经常参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当我们不在自身内部寻找某些感官感觉的原因，而像处理其他感觉一样把原因放到外部时，这个正常过程也配得上投射之名。”

我想，这又是一篇同我已在相同层面引用过的文本并列的文字；你们知道，它们都是枢纽文本。

其中恰好包括伊波利特先生为我们评注过的《否定》[注3]。这篇文本让我们能够精确表述下面这个观念：存在一个可以说是象征化起源的

时刻——请理解，这个起源不是发展中的某个点。象征化必须有一个开端，而且下列事情可以在发展的任何时刻发生：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否定》（德文原文），1925年，载《结果、观念、问题》，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 它同弗洛伊德理论所展开的肯定〔Bejahung〕相反；
- 它是一项原初否定〔Verneinung〕；具有临床后果的否定是它的后续形式。

简言之，否定与肯定两种机制之间的根本区分，使所谓"投射"从此必须加上引号；甚至最好放弃这个词，因为这里出现的东西同心理学投射具有本质不同的性质。心理学投射比如会使我们面对那些令自己怀有十分混杂情感的人时，总以困惑而怀疑的态度接纳他们的一切行为，猜疑其意图。

精神病中的这种投射不是同一回事。它只表示这样一种机制：被纳入拒斥〔Verwerfung〕、被排除于构成主体的一般象征化之外的东西，从外部返回。

这究竟是怎样一套肉豆蔻戏法、怎样一场奇特的变戏法，竟使我们受它摆布？在你们记录这一切现象的方式中，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分明都写在那里。既然我们不认识那个变戏法的人，就可以提出我今年围绕施雷伯主席列入议程的问题。

为什么把它列入议程？因为它能让我们以一种避免混淆的方式表述精神分析理论不断误置的所谓"现实关系"。同时，它还使我们能够构想

并表述分析的目的：当人们谈论“适应现实”时，究竟在谈什么？只要尚未界定现实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而现实绝非简单之物。

为了引入通向问题的道路，我要从一件完全切近当下的事情出发。因为不能把以上一切说成纯粹的文本评注，仿佛只涉及单纯的解经。这些问题每天都活在我们的实践中，活在督导里我们处理的主体之中，也活在我们指导解释、构想如何对待阻抗的方式中。我要举一个例子；你们中有些人上星期五在我的患者展示中听过。我展示了共享同一套妄想的两个人，也就是所谓“二联妄想”。

其中较年轻的那个人是女儿；她同母亲一样，都很难让人看清其特征。在我负责以前——考虑到患者在教学科室中的作用——她大概已经接受过十来次检查和展示。即使陷入妄想，这类练习也会很快让人厌烦；她的配合意愿并不特别好。

不过，一些事情仍显露出来。比如，这套偏执狂妄想——因为她的确是一位偏执狂患者——远非以所谓“自大”“不信任”“易受冒犯”或“僵硬”这些“心理学的”性格基础为前提；至少在年轻女子身上，它反而表现出一种异常善意的情感。

我甚至几乎要说，她有一种感觉……

同她觉得自己深受其害、却很难清楚展示的那条解释链并列

……她觉得自己只能是一个如此和善、如此善良的人；而且在经受如此多考验以后，她只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情。我们从关于她的见证中也确实看到：同她打过交道的科室主任谈起她时，只说她是一位迷人而人见人爱的女人。

简言之，我费尽力气才接近她这个主体及其同他人的关系，随后逼近了一个显然在场的中心。当然，她最根本的关切在于向我证明：自己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以免把材料交给医生作出她预先确信会出现的恶意解释。

尽管如此，她还是告诉我，有一天她出门经过走廊时，碰上一个“没教养的家伙”。她对此并不意外，因为那个讨厌的已婚男人，正是她一位作风轻浮的女邻居的固定情人。当她经过时，那个人……

这件事仍让她耿耿于怀，所以她终究不能向我隐瞒

……对她说了句脏话。她也不愿把这句脏话告诉我，因为——用她自己的说法——它会贬低她。

不过，我想自己接近她时表现出的某种温和，使我们谈了五分钟后终究建立起不错的默契。她带着让步的笑承认，在这件事里自己也不是全然无辜。也就是说，她经过时终究说了一句话；比起听到的脏话，她更容易向我承认自己说过什么。她说的是：“我刚从肉铺出来。”

当然，我同所有人一样，也会犯你们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告诉你们不要做的事情全做了。即使碰巧成功，我仍旧错了：从科学角度看，一个正确意见依然只是意见。斯宾诺莎曾展开说明这一点。

若你们理解了，那很好，但请留在心里；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抵达真理。即使你碰巧理解了，你仍没有理解。当然，我自己也理解；这证明我们所有人同妄想者都有一点共同之处，也就是我同大家一样，内在具有正常人身上的妄想成分。

“我刚从肉铺出来。”如果有人告诉我这里有东西需要理解，我完全可以说这句话在指猪。我说的不是“母猪”，而是“猪肉”；不过她完全同意，那正是她希望我理解的，或许也是她希望对方理解的。然而这恰恰是我们不该做的，因为真正应当关注的是：她为什么偏要让对方理解这一点？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以暗示表达？这才是要紧之处。如果因为理解了便停在那里，那我就只是过早地自以为理解。

这向你们显示了进入患者游戏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同她的阻抗合作。患者的阻抗始终是你们自己的阻抗；一项阻抗若成功，是因为你们已经深陷其中，因为你们“理解”了。你们理解了，因此你们错了；真正需要理解的，恰恰是人们为什么给出某种东西让人理解。我们必须抵达这里，这才是核心。为什么她说“我刚从肉铺出来”，而不直接说“猪！”？

首先请理解，你们在这里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能够切实触及我在许多其他患者检查经验中未能遇到的东西。当时我已经坚持指出……

我的评注只说到这里，因为当时时间不够，

无法把这个要素充分展开

……我向你们指出，这是一颗珍珠。事实上，我已经展示它同一项发现具有非常明显的类比：人们有一天注意到，一些抱怨听觉幻觉的患者，会明显做出喉咙和嘴唇的运动；换言之，我们发现那些话正是他们自己发音的。这里的情形并不相同，却与之类似；它因类似而有趣，又因并不相同而更有趣。

请试着看清这一点，并稍微对它发生兴趣。这颗珍珠在于她告诉我们：

“我说：‘我刚从肉铺出来。’”

到这里，她终于抖出了关键：他又说了什么？他说：“母猪！”

这就是所谓“针锋相对的回答”：线对针、我的灵魂对我的生命，人生中似乎就是这样运作。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一下。你们也许会想：“这下他可满意了——这不正是他教我们的吗：在言说中，主体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

不要弄错，恰恰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项差别；我认为，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这条讯息远非完全等同于言说——至少不是我向你们表述的那种言说。言说是一种中介形式，主体经由它从大他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

首先，这个人物是谁？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已婚男人，也是那位深深卷入主体受害妄想的女邻居的情人。女邻居虽不是妄想的中心，却是根本人物。主体同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模棱两可：他们当然是迫害性、敌对性人物；不过，正如在场听问诊的人曾惊讶的那样，她的态度并不特别具有诉求性，更多是困惑——这些长舌妇究竟怎样写出那份申请，要把两位患者送进医院？

主体同外部的关系反而由另一点刻画：她倾向于重复一切人都关注她们这个主题。这无疑有助于理解我们在观察中抓到的一些情爱妄想式萌芽；它们严格说并非情爱妄想，却确实表现为“人们关注她们”这类感觉。这里的“母猪”究竟是什么？

它的确是她的讯息，但难道不更是她自己的讯息吗？从一开始的全部陈述以及那种感觉来看，女邻居一直逼迫两个孤立的女人；她们……

- 一生始终紧密相联；
- 在较年轻者结婚时也无法分离；
- 后来突然逃离了一个似乎在夫妻关系中形成的戏剧性处境；

据医疗证明，这个处境看来主要始于年轻女子的恐惧：她的丈夫威胁要把她“切成片”。

我们于是觉得，这句辱骂……

因为“辱骂”这个词在此确实至关重要；

偏执狂临床现象学始终强调它

……同两位患者觉得自己奉命针对那个女邻居执行的防御、甚至驱逐过程相吻合；女邻居被视作从根本上具有侵入性。

她总在两人洗漱时、刚开始做某件事时、吃饭或读书时来敲门；她本质上倾向于闯入，因此首要任务就是把她赶开。直到这项驱逐、拒绝和排斥充分生效，两人真正“清除”她以后，事情才开始成为问题。

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在投射或防御机制层面或多或少看到某种东西？这两位患者……

- 亲密生活一直在男性要素之外展开；
- 始终把男性要素当成无法与之相合的陌生者；
- 她们的世界本质上是女性世界。

她们同同性者的关系，是否属于这样一种投射：两人由于需要、由于必须保持自己并继续结伴而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女性世界中；从最广意义说，这似乎同同性恋固着相关，而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固着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样一来，她们与其说处在从大他者那里接收自身关系的位置，不如说亲自把自身关系对小他者说出来。

辱骂是不是这项关系中的一种防御方式，仿佛经反射而返回？一旦关系确立，它为何能够扩展到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是谁，也就很容易理解。当然，这个构想完全可能，并且已经提示我们：这里涉及的不是以颠倒形式接收的讯息，而是主体自己的讯息。

我们应当停在这里吗？当然不能。这还不够，因为上述解释虽能让我们理解她们为何觉得周围充满敌意，却没有触及问题。问题是："母猪"确实被听见了，是在实在中听见的；那个人物说了"母猪"。是现实在说话。谁在说话？

我们正是在这个术语中抓住问题。既然存在幻觉，就是现实在说话；这是前提的一部分。我们把现实设定为由感觉、知觉构成的东西。这里没有歧义。她并没有说：

“我觉得他仿佛回答我：‘母猪！’”她说：

“我说‘我刚从肉铺出来’，他就对我说‘母猪！’”

我们要么满足于对自己说：“好了，她出现幻觉了，就这样……”；要么尝试……

这看起来或许是一项疯狂事业；但精神分析家迄今所扮演的角色，

不正是投身于疯狂事业吗？

……尝试再走远一点，看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按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对象的现实——几乎就是日常意义上的某种实在之物——真是这里涉及的东西吗？

首先，谁在说话？在问“谁在说话？”以前，我们能不能先问：通常在现实中为我们说话的是谁？有人对我们说话时，真是现实在说吗？我想，上次围绕小他者与大他者所作的评论，其用处正在于使你们注意：即使说话的是大他者——大写A——大他者也不只是摆在你面前、正在发音的现实个体〔小他者〕。大他者超出这个现实，因为在真实言说中，大他者是你让自己在其面前得到承认者。严格说，你只有在大他者首先得到承认时，才能借言说让自己得到承认；大他者必须得到承认，你才能得到承认。

要让对方成为同你发生言说关系的大他者，需要这种互惠性、这个额外维度。我给过你们一些典型例子：言说给出“你是我的主人”或“你是

我的妻子”。另一方面，欺骗性言说虽是它的反面，却同它等价，也恰恰预设了某种得到承认的绝对大他者：

- 某种超出你所能知道的一切而被瞄准的东西；
- 某种其承认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超出已知的东西；正是通过承认它、在承认之中，你才把它设立起来——不是设作现实中的单纯要素、一枚棋子或一个木偶，而是设作某种不可还原之物；
- 某种你的言说能否让自己得到承认，其价值本身取决于它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东西；
- 某种在言说中诞生的东西。当你对某人说“你是我的妻子”时，隐含地也在说“我是你的男人”；但你首先说的是“你是我的妻子”，也就是把她设立在得到你承认的位置，由此她才可能承认你。

因此，这种言说始终是语言的彼岸，即使它借话语发生。事情确实如此：从这项承诺开始——其实从任何其他言说开始，即便它是一句谎话——随后的一整套话语都会把你卷入；这里的“话语”也包括行动、步骤和扭身动作。木偶从此确实会被带入游戏，但第一个被卷进去的木偶就是你自己，而这一切始于一项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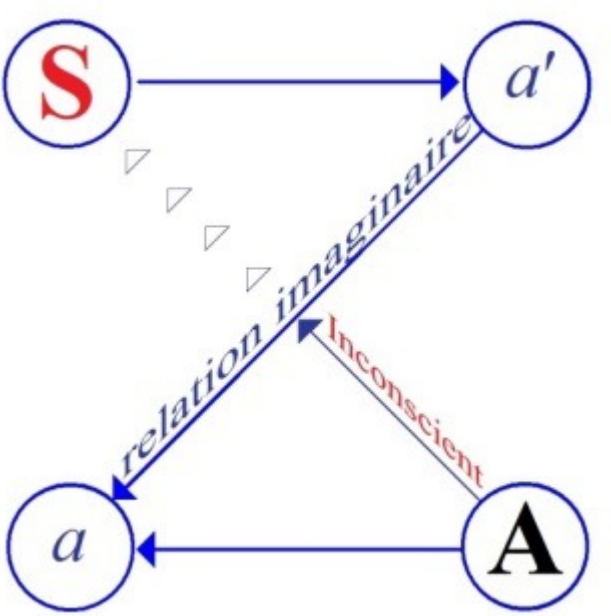
这场游戏始于一项言说，完全可以同《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情形相比：女王的仆从和宫廷人物穿上纸牌服装开始打牌，自己变成“红桃国王”“黑桃王后”和“方块杰克”。

从一项言说开始，你就被卷入其中：

- 不仅要用话语维持、否认、拒绝、反驳或确认它；
- 大多数时候还要做各种符合游戏规则的事情。即使女王随时更换规则，问题也毫无改变：一旦进入符号的游戏〔另参《失窃的信》中的α、β、γ、δ〕，你终究始终被迫依某种规则行事。

换言之，谁都知道，木偶说话时，并不是木偶自己在说，而是有人躲在后面说话。问题在于这次遇到的人物发挥什么功能。对主体而言，我们能够说的是：显然有某种实在之物在那里说话；这才有趣。她没有说是某个躲在他背后的人在说话；她从小他者那里接收自己的言说——不是颠倒的言说，而是在那个也就是她自己的小他者、在她的镜中反映和同类者那里接收。这个问题甚至无须争论。“母猪！”立刻以针锋相对的方式给出；在“我刚从肉铺出来”和它之间，我们不知道哪一下才是第一下。

言说在实在中表达，在木偶身上表达。这个处境中的大他者不在伙伴彼岸，而在主体自身彼岸；这正是暗示的标志与结构：暗示在自身所说的东西之外指示自己。




换言之，如果我们在图式中放置上次所说内容包含的四方游戏：

- S；
- A；
- 小写a；
- 小写a′ 。

小写a就是她在走廊遇见的男人。这里没有大写A；有某种东西从a走向a′ 。a′ 是说“我刚从肉铺出来”者；人们说谁“刚从肉铺出来”？说的是S。

小写a则说：“母猪！”

作为同我们说话并以妄想者身份说过话的人，a′ 无疑从某处以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她从小他者那里接收它，而她所说的则涉及作为主体的自身彼岸。只因身为人类主体，依定义她便只能以暗示谈论它。要谈到我们从根本上就是的这个S、这个主体，只有一种道路的两种形式：

- 要么真正对大写A的大他者说话，并从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涉及你的讯息；
- 要么——这是另一种方式——以暗示指明它的方向和存在。

正因此，她才严格说是一位偏执狂患者。对她而言，循环包含对大他者的排除；回路封闭在两个小他者上：

- 一边是面前说话的木偶，她自己的讯息在木偶身上回响；
- 另一边是她自己；她作为自我始终是另一个人，并且以暗示说话。

重要之处甚至正在这里：她如此恰当地以暗示谈论，以至不知道自己说出了什么。归根到底，若仔细看，她说了什么？她说：“我刚从肉铺出来。”谁从肉铺出来？一头被切开的猪。她不知道自己在这样说，却终究说了出来。她对那个与之说话的小他者谈到自己：

- “我这头母猪，刚从肉铺出来。”“我已经分解了，是碎裂身体，是‘四散的肢体〔membra dispecta〕’，是妄想者；所以我的世界同我自己一样，正分崩离析。”

她对他说的正是这些。事实上，即使这套表达方式在我们看来何等可以理解，至少也必须说，它多少有些古怪。

你们以为这就是我们能得出的一切吗？不是！还有另一件事，它属于某种时间性、某种时序。患者的话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不知道谁先说话。

看来不一定是我们的患者先说，至少无法确定；无论如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不可能用发音来给“非实在化的言词”计时。不过请注意：如果我刚作的展开是正确的，如果主体的言说确实处于这个秩序中，那么至少可以说，那句陈述——即“我刚从肉铺出来”——预设了“母猪！”这个回答；恰恰因为这个回答才是呼语——带有称呼形式——也就是患者真正说出的东西。

我已经指出，这同真实言说中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在“你是我的妻子”或“你是我的主人”中，陈述反而就是回答。回应言说的，正是把对方确立为“我的妻子”或“我的主人”；因此，在那里，回答预设陈述，恰好同这个病例相反。由此可见，面对主体与妄想言说，大他者真正遭到排除；妄想言说本身背后没有从大他者那里接收的真理。

事实上，真理如此缺乏，以至主体自己也没有把任何真理放进这个现象。面对它，主体最终处在原始现象的困惑中；要过很久，他才尝试围绕现象重建一种我们将称作“妄想秩序”的秩序。主体恢复它，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依靠推演和建构；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恢复方式不可能同原始现象本身毫无关系。

因此，大他者真正受到排除；涉及主体的东西由小他者在实在中说出。但由哪个他者说？由小他者，由一抹他者之影。比如我们的施雷

伯会说，近来遇到的所有伙伴、所有人类，都只是一些“草草拼凑起来”的小人。请同样注意这个“影子般的小他者”所带来的非现实、趋向非现实的特征；不过底本的措辞还不止如此。

原文是“胡乱拼成的人〔bâclés à la six-quatre-deux〕”。我还无法给出完全有效的译法；德语中有一些回响，我试图用“拼凑”传达出来。

不过，我们或许会在这里发现另一件事：关注过言说以后，现在要关注语言。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的三分显然同样适用于语言。弗洛伊德谨慎地从语言分析中排除运动发音，正说明他把语言的自主性区分出来；而实在的语言就是具体话语，因为语言自己在说。

语言结构所表述的另外两个术语——能指与所指——无疑处在另一个层次的关系中，也就是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关系中。这里的能指必须按能指材料本身理解。我顺带说一句：若你们不能清楚看到能指材料就是我一再告诉你们的东西——材料就在桌上、就在这些书里，你对此无能为力——那就什么也理解不了。人工语言总试图依照意指把自身连接起来。最近有人向我谈起支配世界语的推演形式：知道“公牛”，便可以推出“母牛”“小母牛”“牛犊”以及任何想要的词。我回答：“那就请问问，世界语怎样说‘打倒警察！’；它想必能从‘国王万岁！’推出来。”仅此便足以反驳人工语言的存在方式：它们的特性是切碎意指，所以才如此愚蠢，通常也无人使用。[注]

> [注] 法语俚语 mort aux vaches 字面是“奶牛去死”，实际是反警察口号；原文借它说明词义不能从“牛”的词族形态机械推出。

因此，能指属于象征界，是材料。其次是意指；意指始终指向另一意指。当然，一旦你赋予某个能指一项意指，使它在意指功能中作为“意

指某物者”创造出另一个能指，能指也会卷入其中。正因此我们能够谈论语言，但能指—所指的分隔总会再次出现。

另一方面，意指具有想象界的性质，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归根到底，它同想象界一样始终消逝。用通常的说法，它严格联结于令你发生兴趣的东西，也就是将你捕获其中的东西。倘若你知道饥饿与爱是一回事，你便会像一切动物一样拥有真正明确的动机；可由于能指存在，始终牵引你走得远得多的，是你那一点个人意指——它同时又具有令人绝望的普遍性，太人性的普遍性。

只不过，那个该死的能指体系就在那里，而你们尚未理解：

- 它怎样在那里；
- 它怎样存在；
- 它有什么用；
- 它把你引向哪里——正是它在引导你。

这里发生了什么？围绕这项根本区分，我们要作几项评论。首先，能指中会发生一种改变：它呈现某种类似沉淀的现象，某些要素突然变重，取得重量与惰性力量，以惊人的方式在作为既定之物的语言共时整体、在结构体系中“凝结”。主体说话时无论做什么，都掌握着语言的全部材料；具体话语正从那里形成。

首先有一个作为“语言”的共时整体，即构成语言的各组结构性对立所形成的同时性体系。其次有某种在时间中历时地发生的东西，那就是

话语。索绪尔先生告诉我们，话语不能不被置于某个时间方向，而且这个方向以线性方式得到界定。

我让他为这个断言负责；不是说我认为它错误，因为它从根本上正确：没有一篇话语不带有某种时间秩序，因而也没有一篇话语不带有某种具体序列，即使序列只是潜在的。如果我从页底开始，倒着向上读，显然不会同按正确方向阅读产生相同结果。

在某些情形中，这甚至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混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同"我父亲是我的儿子"意义不同；只须把句子颠倒即可。说它只是一条线并不完全准确，我们更可能称之为一幅"谱表"，不过那里确实有线。

因此是历时的……话语在历时性中安置下来。这个共时存在的能指，在妄想言语中已由一项值得注意的事情得到充分刻画：它的一些要素孤立出来、取得价值、负载意指；但这种意指只是"意指本身"，它首先表现为词语所取得的特殊意义与分量。[注]

> [注]　米勒定本第43页把速记稿本句整理为：患者本人强调，这个词本身有其重量。两版的上下文都表明 sens 指词的"意义"，不是空间上的"方向"。

例如 Nervenanhang——神经附接。这个词本身属于根本语言；施雷伯主体能够清楚区分那些经由神经附接而仿佛受灵感启示般来到他那里的词。这些词来到并不断向他重复，带有选择性的意指，而他并不总能理解。例如"灵魂谋杀"对他仍是问题，但他知道它具有一种特殊意义。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 精神病主体被语言栖居

整本书可以说盛开并散布着这类词，但他是用确实属于我们的话语谈论它们。也就是说，他的书写得异常清晰、流畅而易读，其连贯程度不亚于许多哲学体系。反观我们这个时代，常有人走到半路突然仿佛被一只狼蛛咬中[注4]，一下子看见包法利主义，或者看见“绵延”突然成了世界之钥，随后便围绕一个概念重建整个世界；却没人知道他为何偏偏选择、捡来这个概念。

> [注4] 这里影射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关于狼蛛与社会谎言的篇章。

我看不出施雷伯的体系比这些哲学家的体系价值更低；我刚才只是勾勒了后者的一般主题。我甚至要说，正如你们必将看到的，施雷伯文本有时更值得学习，因为它走得极远。弗洛伊德结束论述时最终显出的意思，归根到底是：这个人写下了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东西。“这很像我写过的东西，”弗洛伊德说。

这本书采用共同话语写成，却向我们标出一些取得特殊重量的词；可以说，这种重量已经使能指体系本身的整体分解和断裂。我们把它称作“爱欲化”，并避免过于简单的解释。

我们要分析发生了什么：能指负载着某种东西，而且主体对此看得很清楚。施雷伯甚至一度用“审级”这个词，界定他所应对世界中得到表述的各种力量。他也有自己那些小小审级，并说：

“‘审级’这个词是我自己的，不是那些他者告诉我的；它属于我的日常话语。”

言说就这样出现在能指层面。在意指层面发生什么，你们同样正在看见：毫无疑问，它位于梦的层面，表现为辱骂；情话也一样，它始终是语言体系的一次断裂。

无论“母猪！”是否负载着某种晦暗意义——很可能确实如此——我们已经得到这种分解的指示。意指如同一切名副其实的意指，始终指向另一意指；在主体的病例中，恰好由此刻画暗示。她说“我刚从肉铺出来”，向我们指出这句话指向另一意指。当然，它的方向稍有偏斜：她更希望由我来理解……

对那些对你说“你懂的”的人，请始终保持警惕；

他们总想把你送到真正该去之处以外

……她在这里也这样做，向我示意：“您当然懂。”

这意味着她自己并不十分确定；她的意指与其说指向一个连续、可调和的意指体系，不如说指向作为不可言说之物的意指，指向她自己的根本现实，正如我所说，也指向她个人的碎裂。

此外，还有发音这一确实的实在；这就是那颗被变戏法的人传进小他者手里的“肉豆蔻”。重要的是看见，实在的言说——我是指得到发音的言说——怎样出现在场域的另一个点，而且不是随便哪个点：它出现在作为外部世界要素的小他者、木偶身上。

我想今天先讲到这里。我原打算把论述再推进一些；并不是说它至此构成一个封闭体系，只是我不想让你们太晚回去。

这项结构分析有一个目的：向你们展示并开启我下次将进入的问题。言说是主体、大写S的媒介；这个主体始终是我们的问题，而分析警告我们，它并非“庸众所想的那种东西”。

- 一方面，有摆在你面前的实在人物〔实在〕：他占据空间；严格说来，你的诊室能放进十个人，却放不进一百五十个。一个人的在场包含这一点——他占地方。

- 另一方面，有你所看见的东西〔想象界〕；它绝非随便什么，而是明显能迷住你，甚至会让你突然扑到对方颈上——这种冒失举动属于想象界。

- 此外，还有另一种东西：我们谈过的大他者〔象征界〕，它也就是主体；它不是……

你以为的那种东西，不是面前所见之物的反映，也不只是你看见自己正在看时所发生的东西。

倘若这不是真的，就意味着弗洛伊德从未说过一句真话，因为无意识指的正是这一点。面对这项言说，我们要看大写S同大写A的关系中发生什么；我们要看现实在这一切中位于何处。但要知道这一点，必须先谈材料：有主体，还有a，即他异性的小他者。在这种他异性中，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他异形式。

我们将观察这种他异性怎样在施雷伯那样完整的妄想中显现。我先向你们指出：在那里，与大写S相对应的他异性之大他者——也就是这个大他者——存在于某处。在这项他异性中，有一些本身是主体的他者，但它们并不为我们所知。

而在这项他异性中：

- 首先有基础、世界秩序：白昼与黑夜、太阳与月亮，那些始终回到同一位置的东西〔实在〕；施雷伯称之为世界的自然秩序，没有它便寸步难行。
- 还有一种属于象征界性质的他异性，即我们越过所见之物而向其说话的大他者。
- 两者之间还有对象〔想象界〕。

我们在言说中同样有三项：

1. 能指〔象征界〕；
1. 意指〔想象界〕；
1. 实在的具体话语〔实在〕。

在大写S一边，我们也有某种处于想象界层面的东西：自我与碎裂身体——无论是否碎裂，实际上更多还是碎裂的。

依照这张小小总表，下次我们会尝试理解施雷伯那里发生什么。他是一位抵达充分盛放的妄想者，归根到底也是一位适应得非常好的妄想者；这正是施雷伯病例的特点。他从未停止滔滔不绝地胡言乱语，却适应得如此之好，以至疗养院院长说：“他真是太和善了。”

幸运的是，这个人在自己的体系充分盛放时，把整套体系传达给了我们。

在追问他怎样进入体系、叙述“精神病前期”的历史、沿发展方向追问问题以前，我们要先依照材料得到的样子来取用它们——这样做自有理由。弗洛伊德的观察也只依据这些材料；他始终只有那本书，从未见过患者。人们总说要从发生观念出发——这句话造成了难以解释的混乱；我们或许稍后才会转向施雷伯妄想文本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我们要尝试从内部观察发生了什么，看看整个事情怎样充分展开。你们会看到，一个依语言坐标建构的体系，其不同要素怎样发生改变；面对只通过一本书给予我们的东西，这样做终究完全正当。或许正是这种方法能让我们有效重建病例的动力。

不过首先，让我们从辩证法出发。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1924)

我最近曾把神经症与精神病的一项区别规定如下〔原文注1〕：在神经症中，自我依赖现实而压制本我——驱力生活——的一部分；在精神病中，同一个自我则服务于本我，从现实的一部分撤退。因此，神经症由现实影响占优势，精神病则由本我占优势。精神病从一开始便会发生现实丧失；人们似乎可以认为，神经症避免了现实丧失。

然而，这完全不符合人人都能取得的经验：每一种神经症都会以某种方式扰乱患者同现实的关系，成为他从现实撤退的一种手段；发展严重时，更直接表现为逃离现实生活。这个矛盾看似棘手，其实很容易消除；澄清它只会增进我们对神经症的理解。

只要我们着眼于神经症的起始处境——自我服务于现实，压抑一项驱力冲动——矛盾便仍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神经症本身。神经症毋宁由补偿本我受损部分的过程构成，也就是对压抑的反应以及压抑的失败。此后，同现实关系的松动才成为神经症形成第二步的后果。若详细研究表明，现实丧失恰好涉及那部分现实——正是它的要求引起驱力压抑——我们不应感到惊讶。

把神经症刻画为失败压抑的结果，并不新鲜；我们一向如此表述，只因进入新的关联，才有必要重申。若考察一个病因——“创伤场景”——已知的神经症病例，同一疑难会以格外鲜明的方式再次出现；在那里可以看到患者怎样转离经验，把它交付遗忘。我想回到多年前分析过的一个病例〔原文注2〕：一位爱上姐夫的年轻女子站在姐姐临终的床边，突然被这个念头震动：“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你。”这个场景立刻遭到遗忘，同时启动了造成癔症性疼痛的退行过程。

这个病例特别有助于看清神经症用什么方式解决冲突：它压抑相关的驱力要求——对姐夫的爱——从而贬低现实中的改变。精神病性反应则会否认姐姐死亡这个事实。

我们或许会预期，精神病形成时也会发生同神经症类似的过程，当然是在其他审级之间发生。也就是说，精神病同样显出两步：第一步使自我脱离现实，第二步试图修复损害，以牺牲本我为代价重建现实关系。精神病中确实可以观察到某种类似情形：同样有两步，第二步带着修复性质；但类比随后让位于两种过程远为广泛的同向性。

精神病的第二步同样试图补偿现实丧失；不过它不像神经症那样以限制本我为代价，因而也不是以牺牲现实关系来补偿，而是走上一条更加专断的道路：创造一种新现实，使它不再提供被放弃的旧现实所造

成的同样冒犯。于是，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第二步由相同倾向承载；两者都服务于本我的权力追求，因为本我不让现实强迫自己。

神经症与精神病都是本我反抗外部世界的表现，是它不快——或者也可以说不能——适应现实困境、适应必然〔Anankē〕的表现。两者之间的差别，与其说在随后进行的修复尝试中，不如说更强烈地出现在最初的起始反应中。最终结果这样表达最初的差别：在神经症中，现实的一部分被逃避；在精神病中，它则被改造。或者说，精神病在最初逃离以后进入主动改造阶段；神经症则在最初服从以后作出迟来的逃离尝试。还可以换一种说法：神经症不否认现实，只是不愿知道它；精神病否认现实并试图取代它。

我们把同时结合两种反应某些特征的行为称作正常或"健康"：它像神经症一样不否认现实，却又像精神病一样努力改变现实。当然，这种合目的的正常行为会对外部世界作出现实工作，并不满足于像精神病那样只造成内部改变；它不再是自体塑造的，而是异体塑造的。

精神病对现实的改造，发生在主体过去同现实发生关系所留下的心理沉淀物上，也就是发生在迄今从现实取得、并在心理生活中代表现实的记忆痕迹、表象和判断上。不过，这项关系从来不是封闭的；新的知觉不断丰富并改变它。因此，精神病还必须为自己取得同新现实相对应的知觉，而最彻底的实现途径就是幻觉。

许多精神病形式和病例中的记忆错觉、妄想形成与幻觉都具有极其痛苦的性质，并伴随焦虑发展；这大概表明，整个改造过程是在强烈抵抗的力量之中完成的。我们可以依照更熟悉的神经症模型来构想它。在神经症中，每当被压抑驱力向前突进，主体就以焦虑反应；冲突的结果终究只是妥协，作为满足并不完整。精神病中被排斥的现实部分

很可能也不断向心理生活逼近，如同神经症中被压抑的驱力，因此两者产生相同后果。

精神病用哪些机制转离现实并重建现实，这些机制又能取得多大成效，专门精神病学尚未开始研究这项任务。神经症与精神病还有一项类比：两者第二步着手完成的任务都部分失败。在神经症中，被压抑驱力无法创造完整替代；在精神病中，现实的代表无法被浇铸成令人满足的形式——至少并非一切精神疾病形式都能如此。

不过，两种情形的重音分布不同。精神病的重音完全落在第一步；这一步本身就是病理性的，只能导致患病。神经症的重音则落在第二步，即压抑的失败；第一步本可成功，而且在健康范围内已经无数次成功，尽管并非毫无代价，也会留下所需心理耗费的痕迹。这些差异以及或许还有许多差异，都源于致病冲突起始处境在拓扑上的不同：自我是向其对现实世界的依恋让步，还是向其对本我的依赖让步。

神经症通常满足于避开相关现实部分，保护自己不与它相遇。但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的尖锐差别，又因神经症同样试图用更合欲望的现实取代不受欢迎的现实而减弱。幻想世界的存在提供了这种可能。现实原则确立时，这个领域曾同现实的外部世界分离；从那以后，它仿佛一片“保护区”，不受生活需要的要求。自我并非不能进入它，只是它同自我的联结相当松散。神经症从这个幻想世界获取重新形成欲望的材料，通常沿着退行到更令人满足的现实往昔这条路，在那里找到材料。

幻想世界在精神病中无疑扮演相同角色，同样是储藏室，为新现实的建构提供材料和模型。然而，精神病新建的幻想性外部世界意欲取代外部现实；神经症的幻想世界却像儿童游戏一样，乐于依附现实的一

部分——但不是它不得不抵御的那一部分——并赋予它一种特殊意指和秘密意义，而我们把这种意义称作“象征的”，并不总是完全准确。因此，对神经症和精神病而言，需要考虑的不仅是现实丧失，还有现实替代。

〔首次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4年第10卷第4期，第374—379页；《弗洛伊德全集》第13卷，第363—368页。原文注1：参见《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原文注2：参见《癔症研究》（1895）。〕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1923〕）

我在最近出版的《自我与本我》〔1923b〕中划分了心理装置；以此为基础，一系列关系可以得到简单清楚的呈现。至于其他问题，例如超我的起源和作用，仍有足够多的晦暗与悬而未决之处。我们现在有权要求，这种划分对其他事情也证明有用而富有成果，哪怕只是让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待已知之物，以另一种方式组织并更有说服力地描述它。这样的运用或许还能使我们有益地从灰色理论回到常青的经验。

上述著作描述了自我的多重依赖：它处在外部世界与本我之间的中介位置，并努力同时满足所有主人。沿着别人提出的一条思路——它涉及精神病的发生与预防——我得到一个简单公式，或许触及神经症与精神病最重要的发生差别：神经症是自我同本我冲突的结果；精神病则是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类似扰乱的结果。

提醒人们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法保持怀疑，当然完全正当。我们最多也只期待这个公式在最粗略的意义上正确；但即使如此，也已有所收获。我们立刻会想起一系列似乎支持它的认识和发现。

依照我们全部分析的结果，转移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我不肯接纳本我中一项强大的驱力冲动，不肯把它送入运动性解决，或者不给它所瞄准的对象。自我随后以压抑机制抵御它；被压抑者反抗这项命运，沿自我无法支配的道路创造一项替代性代表，并以妥协形式——即症状——强加给自我。自我觉得自身统一性受这个闯入者威胁和损害，于是继续同症状斗争，如同此前抵御原初驱力冲动；这一切构成神经症图景。

自我实行压抑时，归根到底服从超我的命令；而这些命令又来自现实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那些影响在超我中取得代表。这一点并不构成反驳。事实依然是：自我站到了这些力量一边，它们的要求在自我中强过本我的驱力要求；正是自我针对本我的那一部分实行压抑，并以阻抗的反投注加固压抑。自我服务于超我与现实而同本我发生冲突；一切转移神经症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依我们目前对精神病机制的认识，也很容易举出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遭到扰乱的例子。迈内特的精神错乱——急性幻觉性混乱，或许是精神病最极端、最醒目的形式——完全不知觉外部世界，或使知觉毫无效力。通常，外部世界沿两条道路支配自我：第一，随时可能重新出现的当下知觉；第二，先前知觉留下的记忆宝库，它作为“内部世界”构成自我的财产与组成部分。在精神错乱中，不仅新的知觉遭到拒收，就连迄今以外部世界之映像代表它的内部世界，也被撤走了意指——即投注。自我专断地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外部和内部世界。

两项事实毫无疑问：这个新世界按照本我的欲望冲动建成；同外部世界断裂的动机，则是现实造成的一次严重而似乎无法忍受的欲望受

挫。这种精神病同正常梦的内在亲缘关系清晰可见；但做梦以睡眠状态为条件，而睡眠的特征之一，就是完全转离知觉与外部世界。

至于其他精神病形式即精神分裂症，我们知道它们倾向于以情感迟钝告终，也就是丧失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参与。若干分析曾教给我们：妄想像一块补片，恰好出现在自我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初裂开的地方。我们如今之所以还未更清楚地看见同外部世界冲突这一条件，是因为在精神病的疾病图景中，致病过程的现象常被治愈或重建尝试的现象覆盖。

精神神经症或精神病发作的共同病因，始终是受挫：一个在我们受种系发生决定的组织中扎根甚深、永远未被克服的童年欲望没有实现。这种受挫归根到底始终来自外部；在个别病例中，它也可能来自承担现实要求之代表的内部审级——超我。致病效应取决于：在这样的冲突张力中，自我是继续忠于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尝试压制本我；还是让本我压倒自己，因而脱离现实。

不过，超我的存在使这个看似简单的处境复杂化。超我以尚未看清的联结同时结合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的影响；它仿佛自我全部努力所瞄准之物——调和其多重依赖——的理想典范。我们本应在一切精神疾病形式中考虑超我的行为，但迄今还没有这样做。可以暂时设定：必定还有一类疾病以自我同超我之间的冲突为基础。分析使我们有理由把忧郁症看作这一组的典型；这样，我们会为这类扰乱采用“自恋性精神神经症”之名。若能找到理由把忧郁症之类状态同其他精神病区分开，也确实符合我们的印象。

由此我们发现，那个简单的发生公式不必放弃，反而能够得到补充：转移神经症对应自我与本我的冲突，自恋性神经症对应自我与超我的

冲突，精神病对应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当然，我们起初还无法判断：自己究竟取得了新认识，还是只丰富了公式宝库。不过我认为，这种应用可能应当鼓励我们继续关注把心理装置分为自我、超我与本我的提议。

神经症与精神病由自我同各个支配性审级的冲突引起，也就相当于自我功能的一次失败——尽管自我本在努力调和各种要求。这个论点需要另一场讨论来补充：在怎样的条件下、借助哪些手段，自我能够从这些必然始终存在的冲突中脱身而不患病？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必定有极其多样的因素需要考虑。不过有两项因素可以立刻提出。

首先，所有这些处境的结局无疑取决于经济关系，取决于彼此斗争的倾向在量上的相对大小。其次，自我或许能够通过使自身变形、接受统一性的损失、甚至使自身开裂或分割，来避免向任何一边彻底断裂。这样一来，人的不一贯、古怪与愚行，便同他们的性倒错处在类似光线下；接纳性倒错也使他们免去压抑。

最后，还应当考虑：自我借什么类似于压抑的机制同外部世界脱离？我认为，没有新的研究便无法回答；不过，同压抑一样，它的内容应当是撤回由自我向外发出的投注。

---

〔首次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24年第10卷第1期，第1—5页；《弗洛伊德全集》第13卷，第387—391页。〕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否定》（1925）

我们的患者在分析工作中提出联想的方式，使我们有机会作出一些有趣观察。“您现在会以为我要说一句冒犯人的话，但我确实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是借投射拒绝一个刚浮现的联想。又比如：“您问梦里这个人可能是谁。不是母亲。”我们纠正说：“所以就是母亲。”解释时，我们可以撇开否定，抽取联想的纯粹内容。患者仿佛在说：“关于这个人，我确实想到了母亲；但我不愿让这个联想成立。”

有时，人们可以用一种十分方便的方式，取得对无意识被压抑者的所需说明。我们问：“您认为那种处境中最不可能是什么？当时离您的思想最远的是什么？”如果患者落入圈套，说出他最难相信的东西，那么他几乎总是承认了正确的东西。

这种试验经常在一位已经懂得自己症状的强迫症患者那里找到很好的对应。他说：“我有了一个新的强迫观念。我立刻想到，它可能表示某件特定的事。但是，不，那不可能是真的；否则这个念头就不会来到我这里。”他借这项从治疗中学来的理由拒绝的，当然正是新强迫观念的正确意义。

一项受到压抑的表象或思想内容，可以在让自己遭到“否定”的条件下进入意识。否定是认识被压抑者的一种方式；严格说来，它已经是对压抑的取消，却当然不是对被压抑者的接纳。在这里可以看见，智性功能怎样同情感过程分离。借否定的帮助，压抑过程的一项后果得到逆转：被压抑者的表象内容不再被排除于意识之外。由此产生的是在智性上接纳被压抑者，而压抑的本质依旧持续〔原文注1〕。

在分析工作进程中，我们经常对同一处境造成另一种非常重要而又相当奇特的改变。我们成功克服否定，也使患者在智性上充分接纳被压抑者；然而压抑过程本身并没有因此取消。

智性判断功能的任务是肯定或否定一种思想的内容；上述评论把我们引向这项功能的心理起源。在判断中否定某物，归根到底就是："这是我宁愿压抑的东西。"判罪是压抑在智性上的替代；它的"不"是压抑的标记，仿佛一张产地证明——"德国制造"。借助否定符号，思想得以最初摆脱压抑的限制，并用一些内容丰富自己；思想的运作不能缺少这些内容。

判断功能本质上必须作出两项决定。第一，它应当判给或否认某物的一项属性；第二，它应当承认或否认一个表象在现实中的存在。需要裁定的属性，最初可能是好或坏、有用或有害。用最古老的口腔驱力冲动的语言说："我要吃下这个"或"我要吐出那个"；再作更广泛的转译："我要把这个纳入自身，把那个排除在自身之外。"也就是："它应当在我里面或在我外面。"

正如我在别处阐明的，原初的快乐自我愿把一切好的东西纳入自身，把一切坏的东西从自身抛出。坏的、对自我陌生的、位于外部的东西，对原初自我而言起初彼此等同〔原文注2〕。

判断功能的另一项决定，即关于所表象之物在现实中的存在，由最终形成的现实自我的利益作出；这个自我从最初的快乐自我发展而来。这就是现实检验。如今的问题不再是某个被知觉的东西——事物——是否应被纳入自我，而是某个作为表象存在于自我中的东西，能否也在知觉——现实——中重新找到。正如所见，这再次是外部与内部的

问题。非现实的、仅仅得到表象的、主体性的东西，只存在于内部；另一个现实的东西也在外部存在。

在这一发展中，对快乐原则的顾虑已被放到一边。经验教会我们：重要的不只是一件事物——满足对象——是否具有“好”属性，因而值得纳入自我；还在于它是否存在于外部世界，使人能在需要时占有它。

要理解这项进展，必须记住：一切表象都来自知觉，是知觉的重复。因此，最初只要表象存在，便足以担保被表象者的现实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是一开始便存在。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思想能够借在表象中再生产，使一度知觉到的东西重新当下化，而对象不必仍在外部存在。因此，现实检验最初、最直接的目的，不是在现实知觉中找到一个同表象相应的对象，而是重新找到它，确认它仍然存在。

思想能力的另一项性质，进一步造成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疏离。在表象中再生产知觉，并不总是知觉的忠实重复；它可能因省略而改变，也可能因融合不同要素而变形。现实检验随后必须检查这些变形抵达何种程度。不过我们也认识到，现实检验得以确立的条件，是那些一度带来现实满足的对象已经丧失。

判断是决定运动行动之选择的智性行动；它终止思想的延宕，使人从思考过渡到行动。我在别处也曾讨论思想延宕。它可以被看作一种试探行动，是以极少释放耗费进行的运动性摸索。让我们想想：自我以前在哪里练习这种摸索，在什么地方学会如今用于思想过程的技术？那发生在心理装置的感觉端，也就是感官知觉那里。

依我们的假设，知觉不是纯粹被动的过程；自我周期性地把少量投注送入知觉系统，借它们品尝外部刺激，并在每次试探性突进以后重新撤回。

研究判断或许第一次让我们洞见，一项智性功能怎样从初级驱力冲动的游戏中发生。判断是最初依快乐原则进行的“纳入自我”或“从自我驱逐”的合目的发展。它的两极似乎对应于我们设定的两组驱力之对立。肯定——作为结合的替代物——属于厄洛斯；否定——作为驱逐的后继——属于毁灭驱力。某些精神病患者的一般性否定欲、否定主义，很可能应被理解为：力比多成分撤回造成驱力混合解除的一项标志。

不过，判断功能之所以能够运作，只因否定符号的创造使思想取得最初程度的独立，摆脱压抑的结果，因而也摆脱快乐原则的强制。下列事实非常符合这种否定观：在分析中找不到来自无意识的“不”；自我对无意识的承认会以否定公式表达。倘若被分析者以“这个我没有想到”或“这个我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作出反应，那么再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无意识已被成功揭露。

---

〔首次发表于《意象》1925年第11卷第3期，第217—221页；《弗洛伊德全集》第14卷，第11—15页。原文注1：同一个过程也是人们熟知的“招来”现象的基础。“太好了，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偏头痛了！”然而，这已经是一次发作的最初……〕

〔……预告；人已经感觉到它正在逼近，却仍不愿相信。原文注2：另参《驱力及其命运》中的论述。〕

# 第5课 · 1955年12月14日

前几天，我们接诊了一位病情严重的患者。这个临床病例当然不是我挑选的，却极其有趣，因为他仿佛把无意识关系在进入分析话语时遭遇的困难公开演示了出来。之所以能公开演示，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形：在另一个类似主体那里本来可能进入压抑机制的一切，在他这里都由另一种语言承载着。

一种适用范围颇窄、被称为方言的语言——确切说就是科西嘉方言——曾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为他运作，甚至可以说把方言所特有的个别化功能推到了极致。他自幼生活在巴黎，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是异常封闭在自身法则中的人物，而他同这两位亲代人物一起生活，被禁闭在对科西嘉方言的排他使用中。

这两位亲代人物之间发生过一些相当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们不断以矛盾并存的方式表现出彼此极端的依恋，同时又害怕那个被称为异来对象的“女人”闯入。争吵公开进行，也就是说，孩子被最直接地卷入父母的夫妻亲密关系；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科西嘉方言中。

家里发生的一切，若不用科西嘉方言便无法构想。那里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精英世界，即科西嘉方言的世界；外面发生的一切则属于另一个层面。两者的分离至今仍出现在主体的生活里，表现为他所叙述的两种对世关系之间的差异：面对她时是一种，走在街上时又是另一种。这造成了什么？

这是最有示范性的病例。它造成两件事：

- 一件在问诊中显而易见的事，是主体很难重新唤起旧层面中的任何东西，也就是很难干脆用童年的方言表达出来；那始终是他同母亲交谈时唯一使用的语言。他自己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您是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就说不出来。”而我问他的恰恰是：请用科西嘉方言表达，请把他同父亲之间可能说过的话复述给我。

-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他那里又看见一种神经症，也发现某种行为的痕迹；这项行为显出一个严格说来可以称作退行性的机制——“退行”是我始终谨慎使用的词。我们看见，他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实行其生殖性；在想象层面，他同样以非常醒目的方式走向某种排泄功能的退行性活动。

不过，通常属于被压抑内容秩序的一切，也就是在神经症中借症状表达的一切，在这里都完好地呈现着，我丝毫不难发现：由于有另一种语言承载，它反而更容易表达出来。

我曾用审查一份报纸来作比较：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极小，而且采用一种只有少得不能再少的人才能理解的语言、方言。语言本身的功能——也就是共同话语的介入与确立，我甚至几乎要说公共话语的确立——在主体那里，是压抑机制得以发挥其特有功能的一项重要因素。压抑本身源于这样一种不可能：主体无法把言说的某段过去同若干功能协调起来，其中首要的是……

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与主体幼年关系的特有世界相联的言说，

因而无法进入共同话语的言说

……却仍在承认的场域中运作，仍作为言说在这门已经给予主体的、独特的原始语言中运作。它不同于他的科西嘉方言；在科西嘉方言里，他可以说出最非同寻常的话，比如对父亲说：“你要是不走，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个神经症主体本来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建构神经症，才能说出同样的事情；可在这里，只要他身处其另一种语言的层面，这一切便清楚可见。那门语言不仅是方言，而且是一门家族内部的语言。

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压抑是什么？就是他用自己的症状制造出这门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说，如果他是癔症患者或强迫症患者，他就用自己同小他者之间的想象辩证法来制造它。

因此你们看到，神经症症状在其建构中扮演着一门语言的角色，使压抑得以表达。这恰好让我们切实把握：压抑与被压抑者的返回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个过程的正反两面。

这同我们的问题并非毫不相干。由我们已经抵达的位置，你们知道我们将怎样处理施雷伯主席：我们要在一篇并非不参与共同话语的话语中进行观察。正如你们今天将看到的，他正是在共同话语中向我们说明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且仍在持续的事情，说明一种同我们视为现实的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

请充分理解：我们要在他的话语本身中作分析，因为这篇话语见证着我们所谓现实无可置疑的转变。这个现实不仅在他身上得到见证；主体的见证当然也会改变结构，而我们正是透过他的见证、在实在结构中取得一项以言语为主导的证明，因为证据来自主体的这份书面见证。

只有从我们认识到言说在精神神经症症状的结构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之时起，我们才能依照一种有条理的方法向前推进：

- 我们并不说精神病同神经症具有相同的病因；
- 我们甚至不说精神病像神经症一样，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事实，远非如此；但我们知道，就精神病能够在话语中表达的方式而言，它极为丰富而富有成果。

施雷伯主席留给我们的这份文字便是明证。它被置于我们的注意之下，也置于几乎深受吸引的弗洛伊德眼前；弗洛伊德以这些见证为基础，通过内部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结构化的世界。

我们要问：在主体的话语中能够走多远，什么能让我们界定并逼近精神病的构成机制。请理解，你们每时每刻都必须坚持有条理地一步步推进，不能一再越过其间的起伏，只因表面上看见它同某种神经症机制类似便径直跳过去。这样的例子我能给出许多……文献最终正是这样做的，尤其见于卡坦这位专门研究过施雷伯病例的作者笔下。

在那里，人们把下列看法视作理所当然：一切仿佛都围绕着对具有威胁性的手淫所作的斗争……

这种手淫被归因于据称曾在施雷伯与一个人物之间显现的爱欲性与同性恋投注；这个人物既构成其迫害体系的原型，也构成其核心，

即弗莱希希教授

……这场斗争的中心点据说就在这里。施雷伯主席不仅投入了全部力量与全部投注，甚至不惜颠覆现实：也就是说，在短暂的“世界黄

昏”以后，他重建了一个新的非现实世界，在那里便不必向那种被视作如此危险的手淫屈服。

难道每个人都感觉不到吗：这一类斗争机制即便在神经症的某个接合点上运作，其结果在这里也实在太不成比例？反过来看，施雷伯主席非常清楚地叙述其精神病的前史和最初阶段，并向我们证明：在第一次精神病性发作、颇有根据地被称作“精神病前期”的阶段，与精神病期逐步确立之间——他的著作正写于后一个时期，并处在这个时期稳定化的顶峰——出现过这样一个幻想：

> “那会是一件美妙的事……”
>
> 他说，这个念头令他吃惊；他也强调，自己迎接这个念头时
>
> 同时怀着愤慨。
>
> ……“做一个正在承受交媾的女人会是一件美妙的事”，“做一个承受交媾的女人，应当真是美妙。”

我们难道不会觉得，这里有某种道德冲突？我们面对的是一些近来在精神分析中被忘得太多的现象：由于人们不再使用那个词，也就不知道如何给事物分类。它属于弗洛伊德在梦的动力学中引入、并且在《释梦》中极其重要的一类现象，叫作前意识现象。

这远非要从中区分出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我们更会觉得，事情至少是从自我出发的。“那会很美妙……”这个重音，完全具有一种诱人念头的性质，而自我丝毫没有误认它。

在《释梦》批评惩罚梦的一段文字中——我会读给你们听——弗洛伊德非常明确地承认：在无意识欲望介入梦的同一层面，还可能有另一

种东西介入。在一种界定明确、范围有限、远比通常所谓“惩罚梦”少见的梦中，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机制。一般来说：

> “当我们不用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而代之以自我与被压抑者的对立时，形成机制便透明得多。”

这句话写于《释梦》时期，当时自我概念尚未取得支配地位；不过你们看到，它已经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思想里。

> “这里只须指出：惩罚梦不一定同前一天令人痛苦的残余持续存在相联。恰恰相反，它们似乎最常在白日残余具有安抚性质、却表达着被禁止的满足时产生。所有这些遭禁止的思想，在梦的显现内容中都由其反面取代……
>
> 因此在我看来，惩罚梦的本质特征如下：产生它们的不是来自被压抑者的无意识欲望……而是一个同它方向相反、对它作出反应的惩罚欲望；这个欲望虽然是无意识的——更确切说是前意识的——却属于自我。”〔PUF　1950年版，第458页；1967年版，第475页；2004年版，第612页〕
>
> 〔下列德文原文表达同一内容：惩罚梦一般并不以令人痛苦的白日残余为条件；它们最容易在相反的前提下产生，即白日残余虽有满足性质，却表达不被允许的满足。进入显梦的并非这些思想本身，而是它们的直接反面，正如α组梦中那样。因此，惩罚梦的本质在于：成为梦之形成者的不是来自被压抑者——无意识系统——的无意识欲望，而是反对它、属于自我、虽属无意识〔即前意识〕的惩罚欲望。〕

我想，凡沿着我逐步引导你们走的道路、留意弗洛伊德话语中每时每刻浮现的独特机制的人，都会把这里的机制同否定〔Verneinung〕区分开来。

你们在这里再次发现：正是沿着区分某种已经得到象征化之物与某种未曾得到象征化之物的方向，我们才被带到这个事件。它显示疾病一开始便有某物在自我中出现的可能，而且我再说一遍，它以一种非冲突的方式出现："做一个正在承受交媾的女人会很美妙。"这句话揭示了某物第一次确实在自我中浮现。

这同妄想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妄想最终恰恰使施雷伯主席本人构想：人可以说将成为"上帝永久的女人"，因为达到完成程度的妄想最后正盛放在那里。请把两端放在一起：

- 一端，是这个念头第一次在施雷伯的思想中出现；当时处于疾病过程的第一次表面健康间歇；

- 另一端，是终末状态：一套妄想确立下来，赋予他动机，并把他置于一个全能人物面前；他作为一个彻底女性化的存在，同这个人物保持永久的爱欲关系。可以认为，他确实——我愿说是在心理上——成为……

在他的话语所能表达的限度内——一个女人；这正是他自己说的。

……我要说，这项关系并没有复杂到让我们看不清；但它也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很明显，从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从对某物的一瞥，走到确立像他那样的妄想话语与行为，中间必有一些阶段、步骤和危机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那一瞥无疑有理由被看作某种启示。然而，问题恰好要沿着分析这些机制的方向提出：至少我们不能预先断言，它们同神经症中通常遇到的机制——严格说即压抑机制——性质相同；压抑机制本身则完全像一种语言现象那样得到结构化。

我正在让你们瞥见的是：面对施雷伯这位偏执狂患者、这位精神病患者，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精神病机制中占支配地位的，或许是另一种严格说来属于想象界的机制；这项机制将从……

- 第一次瞥见对自身的认同、第一次在女性形象中捕获自身，
- 一直走到整个世界体系的盛放，而这个体系真正同女性认同的想象完全一致。

好。我们的问题要沿什么方向提出？除了假设，我们没有任何手段解决它，除非能在自己唯一拥有的材料中，也就是在文献本身、主体的话语中清楚抓住它的痕迹。因此上次我向你们介绍了一项首先必须确立术语、基础、指导线索与研究方向的工作，即考察话语本身的结构。也正因此，上次我开始区分言说本身的三个领域。

你们还记得，我们能够在言说现象本身内部纳入三个层面：

- 象征界与想象界，由能指和意指来代表；
- 第三个术语是实在；它在话语中确实被置于其历时维度中。主体不仅拥有一整套能指材料——无论它是不是他的母语——还会运用

它，把意指表达出来，使意指进入实在。因为或多或少地迷住、困在某种意指里是一回事；在一篇话语中表达这个意指则是另一回事，而话语依其本性，注定要把意指传达出去，使它同其他以不同方式“接收”的意指彼此协调。

“接收”一词包含着使话语成为共同话语、成为共同认可的话语的枢纽。你们不会不知道“话语”这个概念何等根本：即使对我们所谓客观性、对科学所客观化的世界而言，沟通话语这个要素也绝对不可少。科学上得到肯定的对象，首先必须能够传达，并体现于科学交流之中，尽管人们总会忘记科学世界的这个条件。因为即便你建成并成功完成了最轰动的实验，把结果传达给另一个人以后，他若不能重做一遍，这个实验便毫无用处；我们正是凭借这个标准，判定某物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接收”。

我画出那个三项表格时，曾为你们标出可以用来分析妄想者话语的不同关系。我画的不是世界图，而是构成一切关系基本条件的图式。我告诉过你们：在垂直方向上，有主体、言说与他异性——即大他者——的层面。言说功能的枢纽在于大他者的主体性，也就是大他者同主体一样，本质上能够佯装和说谎。我还说过：在这个大他者中，必须有一个完全实在的对象所占的区域。

当然，现实的这次引入始终是言说的函数。换言之，要让任何东西能够相对于主体与大他者，同实在中的某种基础发生关系，就必须在某处有某种不欺骗的东西。这是主体对主体的言说这项基本结构的辩证相关项：这种言说必须能够欺骗，因而也必须有某种不欺骗的东西。

请仔细观察：依言说及其恒久功能所进入的文化区域不同，这项功能由非常不同的东西承担。若以为世界上始终是相同、甚至性质也相同的要素承担它，你们就完全错了。对你们这些身处这里的当代人来说承担这项功能的东西，并不等同于替一个我们完全可以与之沟通的人——比如亚里士多德——承担它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显然都完全可以传达；然而，那个不欺骗的要素对他而言具有怎样的性质、在世界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同我们这里有着绝对根本的差异。

那些停留在表象上的头脑——所谓强硬头脑往往恰是如此——不论怎样想，你们若相信……

我甚至是说，你们当中最实证主义、最摆脱一切宗教观念的那些人

……你们若以为，只因自己生活在人类思想演变的这个确切时点，那些稳定要素便不再参与笛卡尔《沉思》中坦率而严密地表述的东西——即上帝不会欺骗我们——那就完全错了。

这一点如此真实——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以至于一个如此明晓怎样运用象征秩序、并以此为自身主要工作的人物，即爱因斯坦，也曾明确重申：

“上帝很狡黠，”他说，“但他是诚实的。”

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实在无论多么难以洞察，都不会恶意捉弄我们，不会故意做些事情让我们上当。尽管绝对没有人停下来思考这一点，它对科学世界的构成却至关重要。

话说回来，我所承认、所称的“不骗人的上帝”这一参照，对我们而言已经成了唯一得到承认的原则；我甚至要说，它仿佛由科学取得的结果所奠定……

我们知道，事实上从未观察到任何东西，足以表明自然深处某处存在一个骗人的恶魔；但你们没有意识到——姑且作第一重近似——

为了迈出科学以及实验科学构成的最初几步，

作出这项信仰行动曾经多么必要

……对我们已成为原则的是：物质本身——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说——不会作弊。它不会故意给我们展示某些东西，好让实验失败、让我们造出会爆炸的机器。这类事情的确发生，但犯错的是我们；不可能是物质有意欺骗我们。

然而这一步绝非现成之物；要如此确定地迈出去，少不了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所建构的科学以特有的坚韧、固执和勇气发展于这一传统内部，并非没有原因。

这件事还可以反转来看：问题之所以被提得如此彻底，也恰恰因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一个单一原则不仅位于一切事物的基础——我指的不只是一位认可宇宙法则的原则。你们知道，神学家一直为这些法则本身的存在所困扰，至今依然如此：不仅宇宙被从无中创造，法则本身也是被创造的。某种理性主义同某种唯意志论的神学争论便在这里展开：最终，就连善恶的标准是否也取决于我们所谓的上帝之任性？

正因为犹太—基督教思想把问题推进到如此彻底的地步，才可能以完全决定性的方式作出一种行动；称它为“信仰行动”毫不过分，即肯定：“有某种东西绝不欺骗。”

这种东西恰好被缩减为这项行动而再无其他，这一点如此重要：只须想想，照现在的路走下去，倘若我们发现不仅有质子、介子等等，还有一个未曾计算在内的“额外项”、一个多出来的成员、一个会在原子力学中说谎的人物，会发生什么——到那时我们就一点也笑不出来了。

但我说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情形全然不同，这一点很清楚。对他而言，自然中只有一种东西能让他确信作为实在的大他者不说谎：那些自身不会说谎的东西，因为它们总会回到同一个位置，也就是天球。

天球被视为世界中不朽坏之物，并且属于另一种本质；这个观念在人类思想中一直延续到极晚，甚至仍栖居于基督教思想中，因为它不可或缺。直到人们同意——如你们所见，已经非常晚——从字面上接受犹太—基督教立场，真正追问上帝与世界的言说，情形才改变。在此之前，无论从哲学家还是神学家的思想中，都无法剥离天球具有更高本质这一观念。我们会说“尺度是物质化的见证”；但对他们而言，作为见证不欺骗之物的，正是尺度本身。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这些天球本身无疑具有神性；十分奇特的是，它们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中也长久保持神性。这个传统继承了古代思想，而继承的并不只是一份经院遗产；天球对人曾经如此自然，以至如今不再关心天球上发生什么的我们，反而处于绝无仅有的位置。直

到很晚近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心中把天空里发生的事情当成现实绝对不可少的参照要素；除我们的文化外，一切文化都留下了见证。

确实只有我们的文化呈现出这种特性。我想，在座诸位几乎都有这个共同特征——可能只有少数怀有天文学兴趣的人例外——我们绝不会想到星体与行星的规律回归，也不想日食；它们对我们毫不重要，我们知道一切会自行运转。

然而，请看我们同另一种所谓“心态”——我并不喜欢这个糟糕的词——之间有多大距离和差别。对我们来说，自然关系中发生的一切只由一条原则担保：自然不可能欺骗我们。归根到底，这就是对“不骗人的上帝”的肯定：某处存在某种东西，担保呈现为实在之物的真理。

这同最常见的自然常态立场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后一种立场出现在绝大多数文化——我指的甚至是最发达的文化——的思想中；天文观测历来证明它们不仅反思水平很高，而且无论怎样表象，这些文化都把现实的担保置于天空。

这绝非同我们的主题无关，因为施雷伯主席《回忆录》第一章立刻就让我们置身其中，把我们直接带到星辰的综合。把它当作反手淫斗争的一项核心环节，实在相当出人意料：它要么毫无关联；要么若确有关联，理解这项关联或许并非坏事。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其中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每一根智力神经都分别代表人的整个精神个体；可以说，全部记忆都铭刻在每一根智力神经里。这是一套高

度精细的理论；即便只作为讨论中的一个阶段，也不难在其他得到认可的科学著作中找到相近立场。

我们在这位神经病患者那里触及了灵魂概念同印象永久性之间的联系；这无疑并非出于某种异常的想象机制。灵魂概念以保存想象性印象的要求和需要为基础，这一点在此清晰可感。[注]

> [注] 此处底本作 conversation des impressions imaginaires，字面是“想象性印象的交谈”，同上下文“印象的永久性”衔接异常；译文依可能的 conservation（“保存”）处理，并保留底本异文。

我几乎要说，这里存在着相信灵魂不朽的基础——我说的是基础，不是证明。主体考察自身时，无法设想自己的存在会终止；而且更进一步，他认为，一项印象既已存在，便不可能不参与这样一个事实：它永远是某种不在别处的东西。[注]

> [注] 此处底本作 ne peut pas concevoir son existence，字面是“不能设想自己的存在”，同灵魂不朽的论证相悖；译文依上下文补出“会终止”，现有底本不足以确定原话。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妄想者并不比人类中一个真正极其广大的部分——若不说绝大部分——更加陷入妄想。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我们离斯宾诺莎式宇宙并不远，因为它本质上建立在思维属性与广延属性彼此同延之上。我们身处的这个维度也很有意思，可以借它定位哲学思想某些阶段或步骤所具有的想象性质。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他从这个上帝概念出发时便提出了问题。我们以后会看到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显然同他最近的话语有关，也就是同他把妄想系统化并传达给我们的那篇话语有关。他逼近自己的经验，于是面对这样一个两难：这里的上帝——可以说是“我的妄想之神”，他自己几乎就是这样说的——是同他保持永久爱欲关系的上帝。他谈的是自身经验；正如你们将看到的，这项关系的问题在于谁会把更多射线吸向自身：施雷伯会不会赢得上帝的爱，以至危及上帝的存在？还是上帝会占有施雷伯，随后又把他撇在那里？

我用颇为诙谐的方式勾勒它，可事情毫不可笑，因为这是一个患者的妄想文本。他提出的两难是：上帝对他而言，是否始终是某种仿佛构成世界背面的东西？你们看到，这并不完全是我刚才谈的那个上帝；后者同上帝与广延等价的整套观念相联，却仍担保广延并非幻象。

两难的一边是他提出的这个上帝，另一边则是他以最赤裸的经验所见证的东西：一个同他发生关系、仿佛活有机体一般的上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即使他看见两端之间的矛盾，你们也可以想见，那不会处在所谓纯粹形式逻辑的层面；我们的患者和任何人一样，根本不处在那里。形式逻辑那些著名矛盾在他那里并不会比在我们这里更有效。除了别人逼我们争论、使我们对形式逻辑格外敏感的时刻，我们完全能够让最异质、甚至最不协调的体系在思想中同时共存，仿佛形式逻辑已被彻底忘掉。每个人只须诉诸自己的经验。

因此，这不是形式逻辑上的矛盾，而是主体认真提出并切身感受到的一道问题；它恰好构成其经验的一个维度。一方面，他维持着上帝的影子与想象轮廓，其形式就是我称作近乎斯宾诺莎式的上帝；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一个同自己保持永久爱欲关系的上帝。两者构成一种被体验到的、活生生的矛盾。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不是形而上学问题——精神病患者真实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况且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或许任何时候都没有意义。问题在于：凭什么可以在主体的关系中，从结构上定位这样一个事实——一篇话语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并亲自见证一项结构化关系；主体以同等者的方式同那个与他发生关系、同他保持爱欲关系的人物，也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上帝，建立了这项关系。

正是同一个上帝，借所有这些流溢、所有这些“神圣射线”——那里有一整列形态——对他说话，并同他一起以这门语言表达自己。从共同语言的通行方式看，这门语言已经解构；但它又依照一些更根本的关系重新得到结构化。我们必须追问的正是这些关系，而他把这门语言称作“根本语言”。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随后，相对于整篇话语，一种极其惊人的东西突然浮现：它从最古老的信仰一直通向“上帝是太阳与雨水的主人”这项事实。这足以让我们提出问题。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我们不能不注意想象关系同神圣射线之间的联系，因为它提出的这项评论，让人联想到我们在别处看到的表述……

我觉得这里有一项对弗洛伊德文字的参照，因为弗洛伊德所坚持的是：在一切压抑机制中，某物都处于这样一种双重关系：

- 一方面，它无疑受到抑制，也就是被推向一个方向；
- 另一方面，它又被早已存在、先前就受到压抑的东西吸向另一边。

它自身的动力、意向的重音，以及这种固然沿同一方向运作的双极性，同施雷伯在阐述自身经验时所表达的感受具有惊人的类比；我们路过这里时不能不认出它。

同样，刚才我向你们指出过：对他而言，神圣在场提出的两项要求之间存在某种分歧：

- 一项要求注定要回应他，证明维持身边这个外部世界布景的正当性；你们会看到，“布景”这个说法对他何等贴切；
- 另一项要求则来自他体验到的上帝；这个上帝是那股生命力之摆动的伙伴，而这股力量从此将成为他赖以生活、受苦和搏动的维度。

两项要求之间的偏离，对他而言由下列说法解决：

“全部真理或许处在第四维度，以这些表象线的某条对角线形式存在；人无法构想它。”

他就这样摆脱了困难。这如同人们通常诉诸所谓形而上学沟通：这种沟通远远配不上自身对象；人们完全不知道怎样调和自由与超越的必然性两个术语，便满足于说某处有一个第四维度和一条对角线。若把链条两端分别拉开，两端就是两个层面的区分；它同另外两者的辩证法也具有关系——而后者在一切话语运用中都清晰可见——这一点你们不会看不到。

〔朗读施雷伯主席《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一章，第23—27页。〕

我们抵达了一个要点，下次我会更着重讨论：归根到底，尽管施雷伯具有那番经验，上帝只有同尸体才保持完全、实在而真实的关系。这极其值得注意，尤其是在我们刚听到那些前提以后：正如他也曾在某处表述的，上帝对活物一无所知；或者说，上帝、神圣的无所不在，永远只从外部把握事物，从不从内部把握。

这些命题似乎既非不证自明，也不是从某种一致性中可以预料的……

我愿说，是从我们自己可能预先设想的、带有偏见或先入之见的一致性中

……可以预料的；下次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个体系。

今天只须看看我们在文本中迈出的最初几步，以及你们眼前已经勾勒出的开端：发展到最终程度的精神病性关系，表现为把欺骗这项根本辩证法引入一个可以说相对于真实关系呈“横向”的维度。

主体可以对另一个人说话，因为他同对方之间牵涉信义或佯骗。这里则属于一种被承受的想象界：想象界的根本特征作为被动现象、作为主体的切身经验发生；它将在思想本身内部颠覆任何秩序——无论是不是神话秩序——的术语，并使世界……

正如你们将看到的，它还会在主体的话语中发展得远为充分

……转变成我们所谓的这套幻景。然而对他而言，它正是亲身经验中最确定的部分：他并非同另一个人，而是同这个第一存在、同实在本身的担保者，建立一种彼此欺骗的游戏关系。

也就是说，施雷伯的这个上帝，是他在一种经验中重建出来的；他自己非常清楚地注意到，这项经验同他最初的范畴全然不同。此前他根本不把这些问题当回事，甚至不认为它们存在；从这个角度说，他不只是无神论者，而更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

上帝这个人物首先被他体验为无限的一端：不是另一个人，也不是某种同自己相似的东西，而是永久实行欺骗者。可以说，在他的妄想中，上帝相对于他自身的夸大妄想，本质上处在对立的一端、构成极端项；但这个术语依其本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陷入了自己的游戏。

施雷伯的妄想将向我们展开的正是这一点：上帝陷入了自己的游戏。上帝原想诱惑施雷伯、夺取他的力量，把施雷伯变成废料、垃圾和腐尸；他曾允许自己的中介形态对施雷伯施行一切毁灭活动，最终却陷入了自己的游戏。换言之，归根到底，上帝最大的危险就是太爱施雷伯。

这就是一个横向再横向的区域。它位于两端之间：一端是大他者中担保实在之物的转变，也就是上帝之稳定世界的在场与存在；另一端是这一切同施雷伯的关系，而施雷伯是作为有机现实、作为碎裂身体的主体。他的大部分幻想、幻觉以及奇迹式或神奇的建构，都由各种可以清楚认出身体等价关系的要素构成，甚至包括我们将从分析文献中借用的一些要素。我们会展示“小人”幻觉能够走到何处，也会看到它在有机层面代表什么。

枢纽由此建立：整个法则在这个想象维度中取得一项意指关系。我把它称作横向的，正因为它沿着对角方向，同由言说的效力所界定的主体对主体关系相反。

这项分析只是一个开端；下次我们会继续。

# 第6课 · 1955年12月21日

我发觉，在跨越我的话语——尤其是我的话语——与对施雷伯主席著作那尽管引人入胜的阅读之间的电势差时，你们似乎遇到了一点困难。这项技术上的困难使我想到，今后也许不该再如此依赖一种逐文随讲的评注。我原以为，可以从头到尾读下去，并沿途采撷我想用来推动你们前进的那些结构与组织要素。经验表明，我大概必须另作安排，也就是说，必须由我亲自从整部文本中挑出得到明确表述的内容。

剩下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以某种方式给你们提供若干精选材料；但你们也看得出，这对我意味着多少工作。这项方法上的考虑，又同另一件事凑在一起：我本来并未完全决定要举行今天的研讨班，只是因为我对你们怀有深厚感情，才被推动着来讲。还有一点也已成为惯例：假期前夕，在程度大致与你们相当的中等教育机构中，人们有时会在最后一课安排一小段阅读。

我于是想，仔细考虑以后，今天为你们作一次选读，也许并非不合时宜，也并非毫无用处。选的是一篇近期的东西，至少尚未发表；它出自我手，但仍处在我们主题的延长线上。你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没有参加我前几年的研讨班，可以由此取得一些坐标。这里涉及的是我在维也纳作的——或者说，据称由我作的——那篇演讲，地点是霍夫医生的精神病临床机构；它正好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精神病临床机构〔圣安娜医院〕。

我那篇演讲的主题是：“精神分析中回归弗洛伊德的意义”，目的是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下巴黎的运动和我们教学的风格——即使不谈其总体方向。我必须告诉你们，那篇演讲也是在和我这里的讲课同样的即兴条件下作出的，甚至即兴程度更甚；因为我在这里的讲课毕竟有所准备，而对于那个在我看来颇为一般的主题，则完全没有类似准备，我只好相信自己能够适应听众。因此，我现在要向你们提供一种书面重构；我已尽己所能，使它忠于那篇演讲的即兴精神与语调变化。

因此，我大概把某些段落展开得更多，使这份重构比演讲当时实际占用的篇幅更长。也许我还把后来加在其中的若干展开一并收入了；演讲之后另有一次规模较小的聚会，当时面对的是参加过第一场演讲的少数分析技术人员，我谈的更多是技术问题，即：一般而言，解释具有什么意义。即便如此，这个问题至少乍看之下还是让他们颇感惊讶；这证明，我们始终有必要设法建立对话。

在接下来的历险中，你们会听到一篇朗读。我会尽可能用一种“口头讲述”的语调来读；我的文本正努力复现这种语调，而我希望，它这一次能比上一次的阅读更好地维持你们的注意。哪怕只是为了激起你们的好奇心，我也先提醒一句：这篇演讲讲到中途时，我遭遇了一件颇为奇特的事。

那件事在这里无法重演，只能以某种模拟的方式写入文本，因为我几乎可以说，我缺少相应的器材。在那里，我面前有一座类似讲台的东西，附带某些可以调动它的装置；它比这一座更精巧，是一座与人等高的讲台。事情大概发生在某个时刻：即使听众的兴趣没有减弱，至少我的兴趣多少低落了；因为在那里，我同听众的接触并不总像在这里、在你们中间时这样良好。

事情是，那座讲台前来助我一臂之力；因为必须相信，我当时确实倾向于利用、乃至滥用这种帮助。最终，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仔细想来，倘若把它同我们最近在索邦听一位昔日朋友讲的话相比——上星期六，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惊人的事……

也就是《花边女工》如何变形成犀牛角[注1]，最后又变成一棵花椰菜

> [注1] 参见罗贝尔·德沙尔纳关于萨尔瓦多·达利的长片《花边女工与犀牛的非凡历险》（1954）；或索菲·德拉桑的传记《献给达利的加拉》，J.-C. 拉泰斯出版社，2006年。

……那么，那座讲台竟开始说起话来，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它那里把话语权夺回来。

这也许会给我的演讲构成带来一点轻微的失衡。

我先从维也纳谈起，并借机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种脉动图式：两次大战、德语国家盛行的反分析迫害，以及这种迫害前往撞击我们世界边界时所发生的事，怎样支配了精神分析的扩展。

也就是说，它去到了那边的某个地方，具体说就是美洲。我顺带强调——不想在此多作停留——这些异乡人、乃至移民要素，对美国的新〔理论〕无疑起到了完全根本的作用；这种理论具有一个严格说来属于美国自身的维度：根本的非历史主义。

在一切具有这种风格的事业中，这一点都绝对关键；只有借此才能理解，分析技术怎样为适应另一类要求而采取了相应形态。这些要求同一切环境要求一样，当然也许有其正当性；但它们因此试图把那个群体同精神分析深刻的历史化意义切断，确实造成了一种偏离方向的影

响。至于这种影响的后果，我不会说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毕竟，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主要以一种消极方式表现出来，而且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其回流程度仍然很低——从某方面说，也许谢天谢地。

随后，我简要回顾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我们工作的时间安排与规模——便开始追问自己将怎样处理“回归弗洛伊德的真实意义”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回归，是由于上述出发点与美国式偏离，也是由于某种托拉斯、某种在这里凹陷下去的中央低地。我向他们指出，无论如何，这里正在发生一点小小的动静，它已经开始重新上升。

〔朗读《弗洛伊德之物》，收入《文集》，第401—436页〕

# 第7课 · 1956年1月11日

今天我要提醒你们：不仅是我处理施雷伯病例的总体计划，还有这些研讨班的根本宗旨。两者不可分开，而且不让自己的视野收窄总是好事。当然，我们一步步行进一段时间以后，鼻子前难免只剩墙壁；不过，我带你们走的是一些艰难地带，这趟漫步对我们的要求或许比别处更高。因此还有必要提醒你们，这段路究竟位于怎样的平面之内。

这些研讨班的宗旨，应当以几种彼此交叠、最终归于同一件事的方式表达。我可以说，我在这里是要提醒你们：应当认真对待我们的经验；成为精神分析家，并不免除你们保持聪明和敏感的责任。别人给了你们几把钥匙，并不表示你们可以趁机什么都不再思考，并且——把话说白——可以顺着人类的一般倾向，恰好借已经到手的几个关键词，努力使一切维持原样。

人们确实可以用某种方式使用“无意识”“驱力”，或者“前俄狄浦斯关系”“防御”这类范畴，却丝毫不引出它们所包含的真实后果。一般说来，人们会把这些看作别人的事情——沿这个层面处理总很容易——仿佛只是对象世界多出了一层复杂性；实际上，它丝毫没有触及你同世界关系的根基。要成为精神分析家，你们也完全不必始终想着：世界并不完全像人人所设想的那样，而是卷在这些你们号称已经熟悉的机制中——除非你们稍微摇醒自己。

但不要弄错：另一方面，我也不是要在这里建立弗洛伊德发现的形而上学，更没有把一项计划规定为从它推出同最广意义上的存在相关的全部后果——尽管这样做完全正当。这不是我的宗旨，我没有把它设

为对象。那样做并非无用，甚至值得提倡；不过我想，也可以把它留给别人。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工作，会比另一些工作更容易指出通向它的道路。

不过，也别以为你们不可以朝这个方向扇动几下翅膀。你们内心的每次振翅，以及弗洛伊德发现向我们揭示的人类处境的这套形而上学……

你们追问它，终究不会有任何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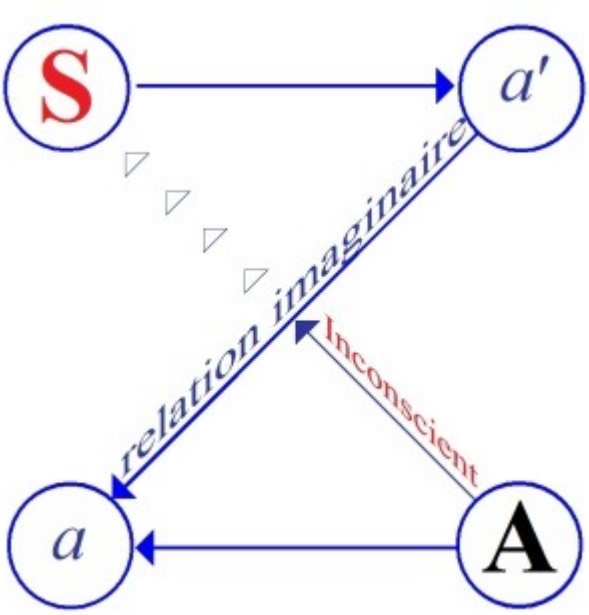
但归根到底，我要说，它不是这里的核心要点

……这套形而上学，你们并不会忘记；它总会迎头落到你们身上。

我们可以信任事物实际得到结构化的方式；通过弗洛伊德的发现和经验，我们能够以稍深一些的方式切实触及它们。它们就在这里，而你们置身其中。弗洛伊德的发现恰好在我们的时代出现，并非无缘无故；你们又经过一连串极其混杂的偶然，亲自成为它的保管者。然而，这套完全可以写入人同象征界之关系的形而上学，对你们的浸没程度远远超出技术人员的经验。我有时也指出：我们在各种接近精神分析的学科、体系或问题中发现它的痕迹和在场，并非偶然。

我们在这里把自己限制于一件却十分根本的事：你们是技术人员，但所处理的是存在于这项发现内部的事物。这门技术通过言说展开。

至少让我们尝试正确地把你们必须在经验中穿行的世界结构化。这个世界从言说的视角得到结构和弯曲——“弯曲”这个词，我想会引出一些评论——而言说在其中占据中心。




正因此，也相对于这一点，我的小方格从主体走向大他者；而在这里，它还以某种方式从象征界走向实在：主体 → 自我 → 身体。〔S → I → R〕

在相反方向上则是：

- 大他者作为主体间性的大他者；你只有在它是主体〔S〕，也就是能够说谎时，才能把握它；
- 反过来，还有那个始终可以在原位重新找到的大他者；我称它为星辰的大他者，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界与对象的稳定体系〔R〕。

两者之间，是具有三个阶段的言说：

- 能指〔S〕；
- 意指〔I〕；
- 话语〔R〕。

这不是世界体系，而是我们经验的定位体系；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得到结构化的。我们所处理的各种现象表现，都可以在它内部得到定位。若不认真对待这个结构，我们便什么也不能理解。

当然，“认真”本身就在问题核心。正常主体的特征在于：对他而言，若干现实确实存在；然而他的特征也恰恰在于，从不把它们完全当真。你们被各种毫不怀疑的现实包围，其中有些特别具有威胁性，却并不完全认真对待它们。你们借保罗·克洛岱尔的副标题相信：“最坏的并不总是确定的。”[注1]于是你们维持在一种幸福的不确定状态中，它使足够宽广的生存成为可能。

> [注1] 参见保罗·克洛岱尔《缎子鞋》中的副标题。

对正常主体而言，确定性不仅极为少见；即使在他可以正当追问的事情上，他也会发现，确定性严格同一项行动相关。他投入并逼近一项行动——我没有说已经触及它。

不过，确定性这个范畴究竟怎样？我不准备在这里详谈，因为我们不是要从心理学上描述“最近之物”的现象学；我们照例要绕道尝试抵达它，而今天的“最远之物”就是疯子施雷伯。

既然施雷伯这个疯子是最远之物，我们就应从整体上把握他。让我们稍微保持距离；作出下面这项评论，便会发现他同其他疯子共有一点……

你们始终会重新发现这一点；我之所以为你们作患者展示，

就是要让你们切身把握患者给予我们的最直接材料

……疯子给予我们的就是这一点……

心理学家因为不直接看他、不真正同他相处，

才会提出那些虚假问题；而事情同这些问题恰好相反

……人们总问他为什么相信自身幻觉的现实性；然而，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说法根本对不上，于是人们又为这种所谓信念发生劳神费力。

首先应当稍作澄清：他并不相信自己幻觉的现实性。这样的例子成千上万。今天我不想铺开，因为我要紧贴自己的文本，也就是紧贴疯子施雷伯；不过，这一点甚至非精神病学家也完全可以把握。

近来我偶然翻开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在第386页“物与自然世界”一节[注2]中，你们可以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评论。很容易发现：只须向主体指出，他正在听见某物，而我们没有听见，便能从他那里取得最坦率的承认。他说：

> [注2]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物与自然世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5年。

“是的，没错，只有我一个人听见了。”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现实性并不是问题所在：主体完全承认，这些东西从根本上并不现实；他会用自己能够作出的种种言语说明，承认它们的性质不同于现实秩序。甚至连它们的非现实性，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似乎需要别人推动，他才会去检验现实；其实甚至不必推动，他自己也朝那个方向推进，很清楚这里的现实性成了问题。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反过来，正常主体让现实安稳落在自己的盘子里；精神病主体却对所发生的事具有一种确定性。从幻觉到解释，再到最细微、最微妙的现象以及一般意指现象，他确定这一切都涉及自己。对他而言，关键不是现实性，而是确定性。即使他表示自己的体验并不属于现实秩序，他也丝毫没有取消“这涉及我”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根本性的。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他所确定的东西，其性质可以完全模棱两可，可以覆盖从恶意到善意的整条谱系；在某个特定现象上，两端甚至可以始终全然混同。然而，这件事对他而言具有某种不可动摇的意指。无论说得恰当与否，构成所谓初级现象以及发展得更充分的妄想信念现象的，正是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只须翻阅弗洛伊德对施雷伯著作所作的精彩浓缩，你们便能切实看到一个例子。归根到底，经由弗洛伊德，你们可以接触并把握这个维度；弗洛伊德在分析它的同时也把它呈现出来。当然，我们仍会诉诸文本的若干部分。

施雷伯妄想发展中最居核心、最具“关键”性质的现象之一，就是他所谓的“灵魂谋杀”。我们会看到，仅这个说法便包含堆积如山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现象对他的妄想、对他用来构想那场构成妄想的世界再转变，都处在最初位置；而他本人把它呈现为完全不可解的谜。

我要强调：不只是《回忆录》中向我们说明其神经疾病理由的第三章……

遭到删禁；我们被告知其中内容不能发表，但仍知道

这一章包含有关施雷伯本人家庭的评论

……也就是说，它或许本可以让我们更近地观察：施雷伯妄想的根本关系、甚至最初关系，怎样相对于其兄弟、父亲或某位近亲表现出来；它无疑也能使我们更有把握地分析通常所谓的意指性、转移性要素，看看它们怎样在妄想的某个时刻发挥作用。

但这毕竟不太值得遗憾，因为我们仍须看见：细节和附加材料过多，有时反而阻止我们看清同样根本的形式特征。要紧的是……

我们并不是要透过他对亲人的某种情感经验来理解；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所谓“灵魂谋杀”可能是什么

……我们所看见的是：主体本人并不理解它，却仍把它表述出来，并把它区分为自己进入的新经验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把这项经验传达给我们，叙述其展开，说明各种关系方式；在他自己的阐发努力中，这些方式的层次与透视逐渐给予他，也一点点向他交付自身的意义。

这项灵魂谋杀无论对他多么费解，他自己仍把它视作一项在某个时刻绝对确定的枢纽；它也恰恰在这个对他依然费解的时刻，包含下列关联。

这里谈的是一场谋杀，却找不到灵魂的踪迹。另一方面，带着确定性谈论一个灵魂也绝不寻常：如此确定地区分何为灵魂、何为附着在它周围的一切，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种能力似乎偏偏被赋予了这位妄想者，并且带着一种确定性，使他的见证具有一种根本的凸显。

我们必须停留在这些事情上，不能丢掉它们全然原初的区别性特征。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真正发生的事，而不是用几个关键词，仿佛借现实性与确定性的对立已经解释了疯狂，便把现象打发掉。

换言之，你们必须训练自己，无论妄想确定性在哪里，都能重新认出它。比如，你们应当发现：嫉妒现象发生在正常主体那里时，和发生在妄想者那里时，其实际情形与可能形态截然不同。正常型嫉妒具有幽默甚至滑稽的一面，无须多作唤起；无论摆在它面前的现实证据如何，它都以世上最自然的方式拒绝确定性。

那个著名故事说，正常的嫉妒者一直追到房门口，而妻子正同另一个男人锁在里面。反过来，妄想者根本不需要任何现实参照，几乎立刻就围绕妄想主题跨入确定性。两者的鲜明对比，足以让你们理解正常嫉妒与妄想性嫉妒的差别。于是，当人们把“投射”这类本来正常的机制移用于妄想性嫉妒的发生时，你们理应有所警惕。

然而你们通常看到的正是这种外推。只须阅读弗洛伊德本人关于施雷伯主席的文字，便能发现他恰恰排除了“投射”这个术语——也就是在偏执狂某个阶段或某项枢纽的发生中，排除自我同小他者的关系或自

我同自我的关系。可以说，当时他没有时间展开这个问题，却把随时贸然引入它的危险全部指出。即使白纸黑字写得如此清楚，也无法阻止人们在妄想的发生与解释中滥用“投射”。

我还要多说一点：妄想者越沿妄想阶梯上升——总的来说这正是它的特征——就越确定那些被设定为越来越不现实的“事物”。在偏执狂这个具体病例中，这正是它同早发性痴呆的差别：妄想者以充沛而丰富的方式表述这些事物。这种丰富是最根本的临床特征之一；即使它极为醒目，也仍不应遭到忽略。它刻画了偏执狂话语产物的秩序和层面；这些产物大多还会盛放成文学作品——这里的“文学”只表示一张张写满字的纸。这是偏执狂性精神病发展的一项特征。

它甚至可以抵达幻景式妄想秩序的某些极端，而我们能够为这些极端划定界限。正因此，我们应当在那些或许过早被分离为严格偏执狂的妄想，与经典疾病分类学所谓“妄想痴呆性”形成之间，维持某种统一。

不过你们还应注意另一件事：疯子在这个层面无论多么是一位作家，我们仍必须指出——即使施雷伯主席这种病例也不例外。他提供的作品，其展开如此惊人，性质如此完整、封闭、充实而完成；对我们这些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也确实极具吸引力。然而有件事格外醒目：这个人物经过发展以后，把自身妄想构想为自己同上帝的根本关系，把自

己构想为上帝的女性对应者、上帝的女人；由此，他对自身取得如下观念：

- 一切都可以理解；
-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还要说：
- 对所有人而言，一切终将得到安排，因为他在一个其生存根基都受到威胁的人类，同一项他以极其特殊方式与之联结的神圣力量之间，扮演中介角色；
- 一切都在这次和解中得到安排。

这标出了他疾病中的一个转折，位于以下两端之间：

- 一端是无法解释的症状时刻，是经验遭到深刻扰乱的时刻；这次扰乱极其残酷而痛苦，构成其精神病的初期；
- 另一端是他开始把这一切提升到理解、并同时对自身精神病取得某种掌握的时期。

正是Versöhnung，这次和解，把他安置为上帝的女人，并带出它所包含的全部展开：

- 一个极其丰富、复杂而得到表述的世界；然而我们不能不惊讶：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显示哪怕最微弱的在场、最轻微的情感流露……

……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发生的、哪怕最细微的真实沟通；

- 没有一种承担能让我们觉得这里确实建立了两个存在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不必诉诸同伟大神秘主义者的文本作比较——对这类文本而言，这种比较本会显得不协调。

不过，若这个试验能令你们发生兴趣，不妨翻开十字若望的任何一页。他对灵魂上升经验的表达，归根到底并不是完全无法在这里唤起的东西：他同样以奉献和领受的姿态出现，甚至把它比作“灵魂同神圣在场成婚”。

然而两边给予我们的重音绝无共同之处。我甚至要说，只须面对任何一份真实宗教经验的见证，你们都会看到全部差别。在施雷伯那篇漫长话语背后——他终于决定把其中见证的东西接纳为自己问题设置的解答——我们从未感觉某种原初经验得到传达，从未感觉主体本人被这项经验捕获并纳入其中。这是一份真正客体化的见证。

由此，我们提出妄想者这类见证究竟涉及什么的问题。不要说疯子是一个不需要他人承认的人，因为施雷伯写下这部巨著，正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体验；他甚至希望学者必要时到他的身体上寻找那些逐渐渗入他的女性神经之在场的证据，从而能够客观证明他同神圣现实发生过的独一关系。这一切清楚地表现为争取得到承认的努力。既然它是一篇话语，并且公开出版，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号：对疯子这个因自身经验而如此孤立的人物而言，这种承认的需要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显然有一个问题，使下列看似直截了当的区分变得比初见时复杂：疯子既然是疯子，恰好就是不需要得到承认的人。他不求承认，

满足于自己的世界，能够自己理解自己；这些在初看时似乎把他区分出来的特征，本身并非没有矛盾，而矛盾的钥匙或许全在他向我们提供妄想见证时所说的东西中。某种东西在这里逃开了我们；当我们得知他的话语时，只能相对于这篇话语概括这个处境。

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固然是作家，却不是诗人。每当一部作品把我们引入一个世界时，我们既进入这个不同于自身的世界，也感觉到一个存在的在场；某种根本关系由此同样成为我们的关系。施雷伯没有把我们引向这样的新经验维度。读十字若望时，我们不会再怀疑神秘体验的真实性；读普鲁斯特或热拉尔·德·奈瓦尔时亦然。这确实是所谓创造的诗：一个主体在那里承担一种同世界发生象征关系的新秩序。

施雷伯这个人物恰好相反。在整篇文本的每一刻，我们都能切实触到他的转变现象：他观察自己，向我们解释自己怎样遭到侵犯、操纵和改造，怎样成为各种现象的所在，怎样以一切方式被“说出”、被“啁啾”。“啁啾”并不是随便挑选的词，那里涉及的正是它。

细看便会发现，他所谓“天上的鸟”发出一种啁啾；他成了整座现象鸟舍的所在。他不是这一切，可这一切对他又最为重要，因为他正为此作出自己的庞大传达：在这部约五百页的书中传达这些现象。它们绝非偶然产物，而是一场漫长建构的结果；这场建构为他的内在历险提供了解答。

那么归根到底，我们该怎样谈论妄想者？他孤身一人吗？我们同样没有这种感觉。他被各种存在栖居；这些存在固然难以置信，属于“观念性的”，但作为第一材料，它们具有确定的意指性质。随着妄想推进，

它们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表述。起初以及在某些时刻，疑问只涉及意指究竟指向什么；它肯定指向某物，这一点对他毫无疑问。

在施雷伯这样的主体那里，事情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整个世界都卷入这套意指妄想。我们可以说，他远非孤独；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以某种方式就是他自己。

但反过来，他在自身意指中使之存在的一切，又仿佛都被掏空了他自己。他以千百种方式说明并表述这一点。例如，他发现并说：上帝——即他的想象对话者——对内部的一切、对活物的一切毫不理解；上帝从来只同影子或尸体打交道。他的整个世界同样已经变成一套幻景，其中充斥着那个法语勉强译作“草草拼凑的人影”的东西。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论证将落在哪里。一个主体发生这样的建构、转变和创造；在分析视角的光照下，我们有几条道路可以理解它。最容易走的，总是那些已经熟悉的道路。

分析很早便引入一个范畴；你们知道，它如今处于前景，在目前关于这类事情的一切论述中都出现，那就是防御概念：所有这一切都有某种用途，而主体想要防御的，正是那个东西。

- 你们知道，神经症就是这样得到解释的。
- 你们也知道，我何等强调这项参照并不完整、何等棘手，因为它会引出各种仓促而有害的介入。
- 另一方面，你们也知道，要摆脱它何等困难，因为它终究触及某种可以客体化的东西。

正因此，这个范畴和概念才如此顽固、如此诱人，为我们提供一种强烈倾向，要求按照它来指导介入：主体在防御，那么我们就帮助他理解自己只是在防御，也就是向他展示他究竟防御什么。

一旦进入这个平面与要点，你们就会面对多重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完全错过介入应当发生的平面。你始终只能先区分防御在哪个秩序中表现。如果防御显然处在象征秩序，那么我的教学同你们在别处所见之间的全部差别便在这里：这里涉及某种可以沿充实意义上的言说而得到澄清的东西，也就是某种在主体那里同时牵涉能指与所指的东西；主体当下向你呈现的材料中，两者——能指与所指——必须都在场。

此时，你的确可以向他展示这个能指同这个所指的联结，因为两者都已出现在他的话语中。若两者不都在场，若你觉得主体正在防御某种只有你看见、他自己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无比清楚地看出主体对现实发生偏离——“防御”概念便不足以授权你把主体径直带到现实面前。

请回想我很久以前谈过的克里斯那个精彩病例：这个人物一直被“自己是剽窃者”的观念以及剽窃罪疚所纠缠。克里斯以防御之名，把自己的介入视作天才之举。因为近来我们只剩下防御概念，而这个自我显然必须在三条战线上斗争：

- 面对本我；
- 面对超我；
- 面对外部世界。于是我们自以为有权在任何一个平面介入。那个患者说自己又一次从一位同事的著作中借用了某些内容；既然书忽然

> 就在手边，我们便径直读了它，发现同事的著作里根本没有任何足以称作原创、因而可能遭患者借用的观念。我们把这件事指出来，并认为它属于分析。幸好，我们同时既够诚实，又够盲目。

为了证明这项解释确有根据，患者下次会谈带来一个漂亮的小故事：上次离开会谈以后，他到一家餐馆品尝了自己最喜欢的菜——

新鲜脑子。我们欣喜若狂：它回应了！但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意味着，主体本人对事情毫无理解，对自己带给你的材料也同样一无所知。既然只是按中了正确按钮，我们便看不出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这是一项行动化；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认，行动化完全等价于妄想型幻觉现象。这里确切涉及的是：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 你过早把属于现实秩序的某种东西象征化了；
- 你没有在象征层面内部处理问题。

在剽窃者这样的场合，对分析家而言，在象征层面内部处理问题，应当围绕下面这个观念展开：

- 首先，剽窃并不存在；
- 也就是说，不存在象征的私有产权；
- 符号属于所有人。

分析家应当从这里开始提问：为什么象征秩序与层面中的事物，对主体取得了“显现还是不显现”这种重音和重量？问题就在这里。分析家必须等待主体提供材料，让自己的解释得以介入。这个剽窃很可能确实属于幻想，因为患者是一位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在来到克里斯这里以前，他已经接受过一次无疑有效的分析，却仍抗拒这项绝不可忽略的尝试。

相关知识卡 克里斯的“新鲜脑子”病例：剽窃与行动化

反过来，把介入放在现实层面，归根到底就是借分析范畴返回最原始的心理治疗。你开始把现实告诉他：事实对不上，他实际上不是剽窃者。

主体怎样回应？他以最清楚的方式，在更深一层的现实中重新制造问题，以便充分表明问题恰好在那里：某种顽固之物从现实中浮现，无论对他说什么，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根基。既然你向他证明他不是剽窃者，他便借新鲜脑子向你展示事情究竟为何：症状在更遥远的一点重新出现，而这一点并不比最初展示它的地方更有基础或更多存在。不过，真是他在展示某种东西吗？我要再向前一步，说：

- 他什么也没有展示；
- 是某种东西自己显现出来。

这把我们带到我今年要围绕施雷伯主席努力向你们证明的问题核心。整个病例仿佛被放大，使微观事物达到庞大尺度。围绕这项观察，我必须证明的东西发挥根本作用；弗洛伊德虽未把它推到最终表述——因为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在他的时代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般尖锐和

紧迫——却已经以最清楚的方式写下：某种从内部消失、遭到拒斥的东西，在外部重新出现。

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引用，它绝对至关重要；我要继续评注并回到它。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先在性——逻辑上的，而不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在性。精神病证明：在一切象征化以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象征化的一部分没有发生。换言之，在严格所谓“神经症辩证法”以前，还有一个阶段；而神经症辩证法完全联结于一点：压抑与被压抑者的返回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整个神经症都是一项得到表述的言说。

但还有另一件事：主体存在中某种全然原初的东西没有进入象征化；它不是遭到压抑，而是遭到拒斥。我先提出这一点，以固定有待证明的环节。这同样不是一项假设，而是对问题的表述。这里存在第一阶段；它不是你们必须在发生过程中定位的某个阶段。不过，这个阶段在发生中的位置——主体最初的象征关联处发生什么；主体的根本出现；主体开始同一个让其消失的对象游戏——当然仍会向我们提出问题。

但不要让这个发生学时刻迷住你。它必然只让你在一个有限对象——那个正在游戏的幼儿——的发展中看见一种现象。幼儿确实正开始练习对符号的最初把握；但若被他迷住，你们就会看不见以下事实：

- 符号已经在那里，无比庞大，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
- 语言已经存在；
- 它装满了图书馆和词典。

不只如此：语言从那里溢出，贯穿你的一切行动，包围行动，令你做出所做之事；你已经下注、已经被卷入〔另参帕斯卡尔〕，语言随时都能要求你移动、把你带到某处。面对那个正在发明要素、进入符号根本维度的幼儿，你会把这一切完全忘掉。

符号所在之处，也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浸没在符号中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原初拒斥〔Verwerfung〕的可能，存在某种没有得到象征化的东西。这个未得到象征化之物，将在实在中显现。

正因此，必须引入实在这个范畴。它无处不在，在弗洛伊德文本中不容忽略。我这样命名它，是因为相对于言说行动及象征界，它界定了一个不同的场域；从这里出发，精神病现象本身的演变才可能得到照亮。

让我们暂时停在这项第一重区分，停在一种不可能之可能的层面所发生的事情上，也就是停在一项原初肯定〔Bejahung〕那里。第一道二分从它开始建立：

- 一边，凡经受纯粹肯定之物，都可能遭逢不同命运；
- 另一边，凡落入原初拒斥者，都会遭逢另一种命运：在一切存在之物与一切被接纳进原初象征化之物之间，出现一道远为深刻的沟壑。

今天我先向前走，但只是沿这个层面点亮提灯，让你们知道我要去哪里、想让你们切实触到什么、准备在你们面前证明什么。换言之，不要把它看成一种任意建构，也不要只看作顺从弗洛伊德文本、对它作

或多或少字面评注的产物；因为我刚才说的，正是我们在《否定》那篇非凡文本中读到的东西。

两年前，伊波利特先生曾好意为我们研读那篇文章。这里既不是顺从文本，也不是某种任意建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引入严格性、连贯性与理性，尤其是给这里涉及的施雷伯主席精神病引入这些东西。此后，我会随着材料的出现，始终沿证明的方向说明：一切其他病例理解方式会造成怎样的困难；换言之，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从这个原初假设出发理解它。

因此，起初存在肯定——即“对存在者的肯定”——或者拒斥。这项肯定后续的演变，则偶然地、其实也总是构成我们即将观察的一切：主体从可以说的文本中只选择一部分，并不足以保证至少这一部分便能对得上；它内部仍有一些东西对不上。古典学院心理学的全部灵感都以为一切必须吻合，以为人既然活着，就是所谓“适应了的”存在。若不从相反观念出发，眼前这一点实在过于明显。

若接受这种看法，你便不是精神分析家。成为精神分析家，只是对一项显见事实睁开眼睛：没有什么比“人类现实”更加混乱。反过来说，只要你还相信自己拥有一个所谓“适应良好”而理性的自我，懂得航行，懂得辨认应做和不应做之事，也懂得顾及精神分析向你展示的种种现实；只要你以为精神分析就是这些，那就只好把你远远送离这里。

精神分析向你展示——并在此同经验相接——没有什么比人的命运更愚蠢。人总会受骗；即使做成了一件事，那也恰恰不是自己想要的。

没有谁比那个号称实现全部愿望的人更加失望。只须同他坦率谈三分钟——或许只有分析躺椅这个装置才让人知道——便会发现：归根到底，那玩意儿恰好是他根本不在乎的东西；而在它旁边，他又为了不知什么、为了各种事情格外烦恼。

分析正是察觉并考虑这一点：

- 也就是说，事情并非偶然如此，并非本可以换成另一种样子；
- 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偶然，我们一生只会遇见不幸的人，而这只是我们特有的命运，幸福的人一定都在别处。

倘若你不把这种想法从脑中除去，就是什么也没有理解。这就是我所谓“认真对待事情”：我说必须“认真对待事情”，正是要你们认真看待自己从不把事情当真这个事实。

因此，在这项肯定内部仍会发生各种意外。首先，没有什么表明原初切除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我甚至要说，我们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对其动机一无所知，因为那里超出一切象征化机制。即使有一天有人知道什么，也不大可能是分析家。不过，主体必须用剩下来的东西为自己组成一个世界，尤其必须在其中定位自己，也就是设法大体成为他所接纳的东西：生为男性时成为男人，反之则成为女人。

这会提出问题。我把它置于最前景并非无缘无故，因为分析恰好强调，这里有一道根本问题。若干现象将在它内部发生；这正是分析的特有场域，因此你们绝不能忘记，凡涉及……

- 人类存在作为主体的行为；
- 他借以实现自身、干脆借以“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逃脱言说法则的支配。

如果经验还向我们展示另一件事，那就是弗洛伊德发现所表明的：自然适配在人类那里受到深刻扰乱。这不只是因为人作为哺乳动物，双性性发挥根本作用。从生物学角度看，这项根本双性性其实并不太令人惊讶，因为人必须经过一些准入、正常化和调节的道路；这些道路比哺乳动物、乃至一般脊椎动物所服从的道路更复杂、也有所不同。它之所以更复杂，是因为象征化——换言之，法则——在那里扮演首要角色。

弗洛伊德的经验和发现所表示的也正是这一点：俄狄浦斯情结“从起源处〔ab origine〕”便在那里，也就是存在于这项原初法则之中。应当这样理解弗洛伊德为何如此坚持俄狄浦斯，以至围绕图腾与禁忌建构出一门社会学。

显然，法则总会被预先找到，因为只有在法则已存在之处，它才可供观察。因此不能再问起源问题：法则从一开始、从起源之处便已在那里。若不承认人类性活动必须借一项根本法则、穿过这项法则而实现，便无从表述它；这项法则只是一项象征化法则。这就是上述说法的意义。

因此，在它内部将发生你们能够想象的一切，而且分布在三个层面：

- 凝缩〔Verdichtung〕；
- 压抑〔Verdrängung〕；
- 否定〔Verneinung〕。

凝缩就是误解的法则。我们凭借它生存，也凭借它同时做几件事。比如，一个男人能够在某种象征关系中占据女性位置，从而满足自身的女性倾向；与此同时，他在想象层面与实在层面仍完全是一个拥有男性气概的男人。

这项女性性质的功能可能以强弱不等的程度持续存在，并在一种根本的领受性中获得满足；这项领受性是基本的存在角色之一，并非隐喻：当我们领受言说时，我们确实领受到某种东西。

我们行为中某物显现的同一时刻，参与言说关系的方式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意义；这些相关意指中的一种，恰好可能在这个机会中——我只把它作为例子——满足那个对我们的存在而言十分根本的女性位置。

压抑不是误解的法则；它发生在事情对不上的时候，也就是两条不同的象征链……

因为在每条象征链中，我们都受它内部连贯性的约束；这项连贯性迫使我们在某个时刻，把曾给予另一个人的东西归还给他

……有时彼此对不上，我们无法在所有层面同时偿还。换言之，一项法则对我们变得不可忍受，并不是它本身不可忍受，而是我们把自己

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为这件事付账，严格说似乎要求我们在意指层面作出一项无法完成的牺牲。

然而，链始终继续运行。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它从行动、话语和行为中压抑下去时，它仍在底下运行，继续表达自己的要求，并通过神经症症状主张自身债权。正因此，压抑构成神经症的枢纽。

还有一种叫作否定的东西，它很可能属于话语秩序，即我们能够沿得到表述的道路使之显现的一切。它同分析中所谓“现实原则”的浮现具有最密切的关系，并严格在这个层面介入。弗洛伊德在我们评注其作品时经过的三四处，以最清楚的方式表述过它：问题不在于我们对什么作出肯定，而在于我们把存在价值赋予什么。在弗洛伊德的词汇中，把存在价值赋予某物就是他所谓“存在判断”。他以远远领先于同时代思想的深度，把它刻画为：问题始终在于重新找到一个对象。

这包含什么，又是什么意思？它表示，人对现实的一切把握都服从一项原初条件：人类世界的构成在于，主体不断寻找自身欲望的对象，却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直接带到那里。

现实只要由欲望支撑，起初便以幻觉形式出现。在对象世界诞生的理论中——例如《释梦》末尾所表述的现实，以及每逢根本讨论现实时重新出现的现实——主体始终悬置在构成其根本对象之物面前，即满足对象面前。

我要说，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一部分，如今在所有号称发展前俄狄浦斯关系问题的论述中被大量重拾。它归根到底都在说：主体始终试图重新找到原初母子关系的满足。不过，弗洛伊德曾引入两个永远不可分割、无法各自单独思考的原则——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如今人们

却只挑选其中的快乐原则，把全部重音放在它上面，说它支配并包围现实原则。

这样做误认了现实原则的本质。它的本质恰恰是：主体不是找到对象，不是沿生命适应或多或少预先确立、也或多或少遇阻的自然水道与轨道被带向对象——动物界或许如此；相反，他必须重新找到自身欲望对象那种从根本上以幻觉形式出现的浮现。他必须重新找到这个对象；当然，也就是说他从来找不到它。

现实原则恰好就在这里。弗洛伊德写道：主体重新找到的始终只是另一个对象；它可能以多少令人满足的方式回应相关需要，但主体总只能找到“一个对象”。因为依定义，他必须重新找到某种重复之物；而作为对象，它又同原对象有所区分。弗洛伊德辩证法引入现实原则的整场游戏，都围绕这个核心旋转。

临床经验要求我们构想：实在中还会出现另一种东西……

它不同于主体这样检验和寻找、不同于主体借反思装置或掌控装置——即他的自我——

所走向的东西

……还有另一种东西，逸出这场寻找的框架，逸出名为自我的寻找装置……

也就是逸出自我所包含的一切根本异化

……还有另一种东西，可能在主体存在的某个时刻浮现：

- 或者以零散形式浮现，比如狼人病例所报告的那类小型、零散幻觉；

- 或者以更具威胁、更广泛且更有伸缩性的方式浮现，如施雷伯主席病例中那样。现实中可能浮现另一种东西，也就是一项看似不起眼的巨大意指。由于它从未进入象征化体系，同任何东西都无法联结，反而更不显眼；但在特定条件下，它会威胁整座大厦。严格说来，这就是“精神病现象”。

换言之，在施雷伯主席病例中，显然有某物遭到拒斥，并在其存在的某个时刻重新浮现。“某个时刻”这件事已经会使我们追问：什么决定精神病的侵入？沿这种方式研究，你们会看到，决定它的东西同决定神经症侵入的东西何等不同；两组条件严格彼此相反。

有某种东西使一项涉及主体、却只在他的视野与伦理中极其模糊地勾勒出来的意指重新出现。在施雷伯主席病例中，它恰好同我刚才所谈的原初双性性具有最密切的关系：施雷伯主席从未以任何方式整合过任何一种女性形式——我们也会尝试在文本中观察这一点——而这对他极其重要。

很难设想，施雷伯主席只因拒绝或压抑驱力——比如对弗莱希希医生或多或少含混的转移倾向——或为了压制某项倾向，就建构出这套庞大妄想。总应有一个同结果稍微相称的审级。这里涉及的是女性功能的根本象征意指；我先指出，我们只有在“生殖”这个术语的层面才能重新找到它。你们会看到为何必须把它置于这里：我们不会说去势、女性化或怀孕幻想，事情一直抵达“生殖”。

这件事并不是在他生存有所亏缺的时刻，而恰恰在其生存顶峰，以闯入实在的形式向他显现。他从未认识的东西以全然陌异的方式浮现，逐步彻底淹没他的全部范畴，迫使他真正重构自身世界。我们要问：能否像一些人毫不犹豫所说的那样，把它称作和解、补偿或治愈过程？他们会说，妄想稳定时比妄想闯入时更平静。那究竟是不是治愈？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只有滥用这个词，才能在这里说“治愈”。

那么，未得到象征化之物在实在中重新出现时，发生了什么？当然会有事情发生；把防御这个术语带到这里并非毫无意义。换言之，若某些坐标相对于全部象征化而在实在中出现，它们显然是在意指层面出现的：一项不知从何而来、也不指向任何东西，却又十分根本的意指；甚至主体确信这项意指——它涉及他。

随后发生什么？主体每逢经历秩序冲突，都会启动某种东西，也就是压抑；此刻它当然同样启动。为什么压抑在这里对不上？也就是说，它为什么没有产生神经症中出现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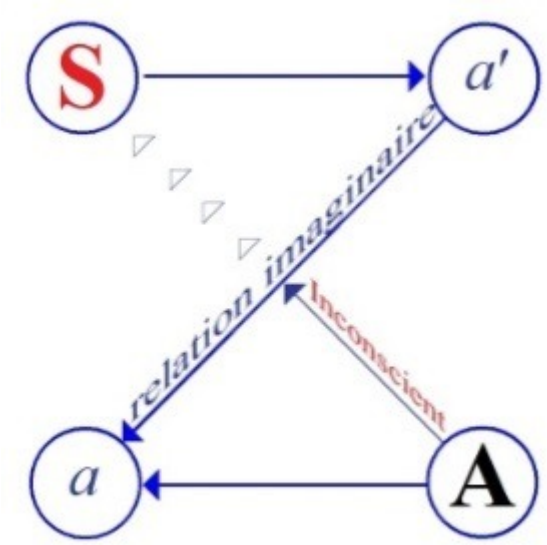
在知道为什么以前，必须先认真研究怎样发生，尤其要强调神经症与精神病在结构上的差别。

当一项比如说女性的或使人被动的驱力，出现在一个先前象征化的不同环节——例如幼儿神经症——已使它进入游戏的主体那里时，它会在若干症状中得到表达。换言之，被压抑者终究仍在表达；既然压抑与被压抑者的返回是同一件事，那么在压抑内部，欲望仍能同新近到来的东西达成解决，形成妥协。

换言之，这正是神经症的特征。疯子向我们展示一件既再明显不过、人们却偏偏不愿看见的事：否定〔Verneinung〕同拒斥〔Verwerfung〕并不处于同一层面；精神病起初在实在中重新出现的东西，不可能由否定机制一边的反应充分回应。

我们还要回到“起初”这个问题：精神病的起点是什么？精神病会不会像神经症一样具有前史，也就是存在幼儿精神病？我不是说我们会回答，但至少会提出问题。恰恰相反，一切似乎表明精神病没有这种前史。出于一些至少值得研究的理由，某种原初未得到象征化的东西，会在特殊条件下出现在外部世界。遭到拒斥之物一旦在外部世界显现和浮现，主体便全然没有能力以否定成功应对所发生之事。

接下来要理解的是：为什么此刻可能发生的一切，都绝对排除于神经症的象征化妥协之外，并转译到另一个层面，也就是在想象界发生真正的连锁反应——落在我们那个小小魔方的反对角线上：




主体此刻完全被某种想象增殖吞没。他无法重新建立主体同大他者的契约，无法在新近出现之物同自身之间作任何中介，于是进入另一种同第一种全然不同的中介方式：以某种想象的群集与增殖取代象征中介。一项可能中介的核心点和标志，以变形而深刻非象征的方式进入其中；能指本身也将发生深刻重构。于是，某些对主体意指最重大的直觉——我已经强调过它们——取得特殊重音，一些词语取得特殊重量；你们会在施雷伯主席所谓“根本语言”中看到这一点。

不过，这也标示着想象世界内部仍存在能指的要求；换言之，主体同世界的关系完全相对化为一种镜像关系。主体的世界——确切说施雷伯主席的世界——在此时成为对他具有意指的世界，主要由他同那个对他而言是小他者的存在、即上帝本身之间的关系组成。在这位上帝

那里，据说实现了某种被称作男女关系的东西，或者实现了某种使他能够承担这个位置的东西。

等我们详细研究妄想时，你们会看到，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两个角色是：

- 上帝，或者说上帝所包含的一切；宇宙同上帝相联，其中也包括天球观念；

- 以及施雷伯本人；他在字面上分解成众多想象存在，它们在内部来回、升降，经历各种变形。两端——世界以及他从此构想为自身的东西——构成两个严格彼此接替的结构。正常人的生活只会删略、遮蔽并严格驯化它们，而这里的充分展开则令我们格外着迷。

也就是说，碎裂身体同想象宇宙之间的整套辩证法，原本潜伏在正常结构下方；考察这套妄想的价值之一，就是让我们看见想象辩证法本身充分展开、占据全部空间。我们由此看到，它何以不同于一切可以设想的所谓自然驱力关系；差别源于我们已在镜像阶段的起源与枢纽处标出的种属结构。正是这项结构，预先使人的想象世界成为某种分解之物。

我们在这里找到它充分展开的状态。这是分析妄想本身的一项意义，也是分析家始终强调的东西：所谓“幻想的游戏”以绝对充分的双重性显现。施雷伯主席的世界缩减为两个“他者”，而它们彼此相对而成；说到底，一方只向另一方提供自己的颠倒图像。

但重要的是观察：这一切怎样、又为何回应一项要求——即便这项回应显然迂回而失败——要求把实在中浮现、并代表主体从未象征化的

自身之物整合进来。换言之，一项象征秩序的要求无法以任何方式整合进过去已经投入运作、主体赖以生活的辩证运动，因此引出整套连锁瓦解，仿佛从织锦中不断抽走经纬；这幅织锦就叫妄想。

相对于正常话语，它是一套妄想。不过你们会看到，它并不必然同正常话语绝对断裂；至少有一点证明这一点：主体本人完全能够满足于它，而且生活在一个并非一切沟通都彻底中断的世界里。

问题就在这里，也就是恰好位于拒斥同否定的接合处。下次考察时，我们将沿着第一重回答继续推进。

# 第8课 · 1956年1月18日

我原本打算深入疯狂的本质，并且以为那里确实有某种疯狂。不过，想到我们正在做的并不是一项如此孤立、因而如此冒险的事业，而且在这个方向上已有若干先例，我便稍感安心。这些先例教给我们：从现象中确实可以提取出某种东西；因此，我们的道路也正在于承担这项关于现象的研究。这毕竟使我们安心一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有多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仿佛出于一种奇特的宿命，一切人类事业，尤其是最艰难的事业，总是趋向某种回落；换句话说，总是趋向那种被称为懒惰的神秘事物。

要不带成见地衡量这一点，只需洗净眼睛和理解力，摆脱围绕分析概念传到我们耳边的一切喧嚣，再读一遍弗洛伊德的文本。我们便会再次看出：这是一篇非凡的文本，而它几乎只是把通向谜的道路交给了我们。

归根结底，他对施雷伯主席妄想所作的全部说明，都汇流到“自恋”这一概念上，并使之成为说明的枢纽。至少在弗洛伊德写作这篇文章的年代，这个概念显然还不能被视为已经澄清。这恰好向我们证明，不能把问题缩减掉，仿佛这一切早已得到公认，仿佛自恋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在走向外部对象以前，主体会经历一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对象的阶段。诚然，“自恋”一词正是在这一维度和层面上取得意义。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自恋”一词只是在这一角度、这一意义上被使用呢？

然而，施雷伯主席的自传——弗洛伊德正是围绕自恋概念援引它——向我们表明，归根结底，使他的自恋感到抗拒的，是他在父亲面前采取一种女性位置；这个位置包含着阉割。而在一种以根本性的夸大妄想为基础的关系中，这件事却能得到更好的满足：从他的伙伴是上帝的那一刻起，阉割对他便不再算什么。简言之，弗洛伊德交给我们的图式，可以按照他在同一篇文本中提出的公式概括如下：

- “我不爱他”，
- “我爱的是上帝”，
- 再经由颠倒：“是上帝爱我”。

这样一来，我们不过是严格运用弗洛伊德在同一篇文本中为偏执狂的一般概念给出的公式，来概括最终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概括这一妄想的充分展开及其意指。

上一次我已经向你们充分指出，这或许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弗洛伊德的那些公式，无论多么富有启发，也同样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在迫害妄想中，“我不爱他”变成“我恨他”，再经颠倒变成“他恨我”；这一转换确实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像是一份密码，使我们能够把握迫害机制中的某种东西。但很清楚，问题恰恰全在这个其间已经发生变化、而且现在恨我的‘他’。这个“他”呈现出倍增、中性化的特征，仿佛被抽空了某种我们将试着说出的东西——那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主体性。

迫害现象以及作为其支撑的迫害者，都取得一种无限重复的符号性质；这恰恰标出了它的谜：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小他者、伙伴究竟变成了什么？迫害者已经变成了那个迫害性对象的影子。

施雷伯主席的妄想充分展开时所涉及的那位上帝，情形也同样如此。我曾顺带提醒你们，施雷伯主席与上帝的关系，同我们略微熟悉的任何主体与超越性存在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何等距离。这个距离如此明显，提起它几乎显得可笑：只要最粗略地看一眼任何一点神秘体验的产物，便足以看出这一点。

这里的上帝虽然被称作上帝，也被作为上帝加以建构和描述，甚至描述得极其细密，但对于施雷伯在妄想终局为自己设定的这个唯一的神圣伙伴究竟具有何种性质，我们仍然只能感到困惑。

因此，我们一开始便感觉到，问题的确仍处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核心之中，即力比多对外部对象之兴趣的撤回。但我们还必须努力阐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撤回发生在哪一个层面，因为：

- 一方面，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有某种东西深深触及了对象；
- 另一方面，只告诉我们发生了力比多的撤回，显然还不够，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谈论力比多的移置，而这本来就是神经症机制的根底。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它？哪些层面和界域能使我们窥见小他者性质上的这些改变——我们分明感觉到，它们始终处在异化、疯狂之本质的根底？这里，我准备稍稍回到前面，试着提出这个问题，同时以新的眼光看一看一些早已熟悉的现象。

让我们选一个并非精神病的例子：可以说，这是由弗洛伊德建构起来的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经验的奠基性个案——朵拉个案。朵拉是一位癔症患者。作为癔症患者，她同对象有着特殊的关系。你们知道，在个案观察以及治疗的推进中，一个始终未消除的歧义给弗洛伊德造成了多大困扰：她的爱之对象究竟是谁？

弗洛伊德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整件事之所以失败——也就是说，治疗过早中断，未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无疑是因为他误认了她的爱之对象。换言之，弗洛伊德原先以为自己看见了这样一场冲突：她无法脱离最初的爱之对象，也就是父亲，转向一个更正常的对象，也就是另一个男人。然而，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对朵拉而言，那个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个案报告中被称作K夫人的女人，而她恰好是朵拉父亲的情妇。我们先从个案材料出发，随后我再作评论。

你们知道，整个故事构成了一场由四个人物占据的四人小步舞：“K夫人”、“父亲”、“朵拉”和“K先生”。K先生对朵拉而言起着自我的作用。换句话说，朵拉正是通过K先生这一中介，才得以实际维持她同K夫人的关系；整个个案材料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只请你们跟随我，暂且相信我。我已经在一篇针对拉加什博士关于转移问题报告的介入文章中写得相当充分[注1]，你们很容易查阅。这一位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朵拉能够维持一种尚可承受的关系。事情十分清楚：只有当我所称的“四人小步舞”中某种东西发生改变以后，她才同意接受治疗。我们可以认为——眼下不必多说；这背后还

有更深的理由，不过一般说来我可以这样表述——与没有K先生相比，这种四边形关系要可承受得多。

> [注1] 参见雅克·拉康：《对D.拉加什〈转移问题〉报告的介入》（E.L.P.）；D.拉加什：《转移问题》，载《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2年1—6月，第16卷第1—2期。

换句话说：

- 这个作为中介的第四者之所以是维持局面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朵拉爱恋的对象同她性别相同；
- 而是因为，如果朵拉直接同父亲形成竞争，某种东西在这组三角关系中便尤其不可承受。她同父亲之间有着动机极深的关系，恰恰是认同关系；在父母这对伴侣中，母亲又是一个完全淡出的角色，这更强化了这种认同。正因为如此，这个局面才得以在这一群体构型中维持为一种不仅可以承受、而且确实受到支撑的关系。

证明这一点的，正是K先生说出那句堪称决定性的话以后发生的事：

“我的妻子对我什么也不是。”

从K先生在这场游戏中明确说出这句话、使朵拉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支撑——他对K夫人根本没有兴趣——的那一刻起，局面就在严格意义上变得不可承受，也确实没有被她承受下来。这一刻发生的一切，恰如她在回答他：

“那么，你对我来说又能是什么呢？”

这句话刚说完，她便立刻给了他一记耳光；而在此以前，她一直同他维持着某种暧昧关系，这一关系恰恰是维持四人群体所必需的。局面的平衡正是在这里被打破。我要强调的是其中最明显的一面：朵拉不过是一位年轻的癔症患者，她的症状不多，而且在她那些不同的层面上都不难解释。

我想你们还记得，我曾怎样强调那种著名的“失声”。它只发生在她同爱之对象独处、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刻；而且它无疑同此时这种关系本身极为特殊的爱欲化有关。只要她过分接近自己的欲望对象——也就是K夫人——口腔功能就会从其通常用途之中被抽离出来。

不过，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K夫人不在时出现的一点失声，并不足以使她匆忙跑到弗洛伊德那里，也不足以让她的家人认为局面已经不可忍受，非把她送去治疗不可。

真正发生的是：当局面失去补偿、第四个人物离场时，朵拉相对于父亲很明确地出现了一个小型迫害综合征。此前的局面固然有些危险，却并未越出分寸；人们至多按我们所谓“维也纳轻歌剧”的尺度来理解它。

正如后来所有观察都强调的那样，朵拉一直表现得无可挑剔，好让事情不要闹大，好让她父亲同这个他所爱的女人保持正常关系——不过，他同这个女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仍颇为含混。朵拉的举止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她替整个局面遮掩，并没有大吵大闹；归根结底，她在其中还颇为自在。然而，从局面失去补偿的那一刻起，她便明确陈述、提出控诉并断言：父亲想让她卖淫，把她交给K先生，以换取自己同K夫人之间暧昧关系的延续。

那么，我要说朵拉是偏执狂患者吗？我从未这样说过，而且在精神病诊断问题上，我一向十分谨慎。我曾特意到这里看过一位女患者，她的行为显然极难处理，同周围人冲突不断。人们请我去，实际上是为了让我断言那是精神病，而不只是初看起来的强迫性神经症。

我拒绝作出精神病诊断，理由十分关键。我认为，这也正是我们作出这一诊断时必须要求的条件：必须存在某些特殊的紊乱，亦即我们今年研究的对象。我正试着带你们进入其中，并向你们说明必须懂得区分这些紊乱——它们是语言秩序中的异化紊乱。这条一般公式至少能使我们划出一道边界、把握一条界线。仅仅：

- 因为主体针对那些被认为正在加害于他的人物提出了诉求；
- 因为主体同外部环境中的某个人物进入一场诉求性冲突，……我们并不会因此就已经处在精神病之中。

这种诉求可能并无正当根据，可能带有自负妄想的成分，却不会因此就是精神病；不过，它也并非同精神病毫无关系。证明正在于：在我今天向你们提出这条暂时作为约定的界线之前，人们一直完全把两者放在同一连续体上，并总是把偏执狂患者定义为“一个敏感、偏狭、多疑，并同周围人处于公开言语冲突中的人”。换言之，这里还有另一种东西；这里有一个小型妄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称呼它。

朵拉相对于父亲经历了一个具有意义的现象。在某些界线以内，它仍是一个解释性现象，甚至近乎幻觉；它尚未发展成妄想。不过，它已经极其接近那种不可言说、直觉式的关系：主体直觉到他人的敌意和恶意，而这种直觉所关涉的，恰好是主体曾以最具选择性、最深刻的

方式真正参与其中，并且其参与对维持局面至关重要的那个情境。这个现象本身确实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由于所涉四边形缺少了一个要素，这个人物的他异性层次发生了某种改变。正是那个使局面得以维持的构成部分之一缺席，局面才随之败坏。

只要运用得谨慎，我们确实可以使用距离化这一概念。人们常常滥用它，但这也不是我们拒绝使用它的理由；条件是，我们要努力赋予它一种更符合事实中可见、可判断之物的具体用法。由此，我们便来到“自恋”问题的核心。

经过我们全部工作的建构，现在应当怎样理解自恋？我们把自恋关系看作人际关系中居于中心的想象关系。这一切显示出了什么？分析家的经验围绕这个概念汇聚并结晶出了什么？

首先就是它的歧义：

- 它既是一种爱欲关系：一切爱欲认同，一切被另一个人的图像攫取、把持，都通过自恋关系发生，形成一种俘获或爱欲迷摄的关系；

- 同一关系也被交给我们，作为所谓攻击性张力的基础。

这一点不能不引人注意。我甚至要说，即使把它保留在这种堪称初步的建构状态，还不进一步深究这种攻击性关系究竟是什么、它在人类界域中采取何种特殊形态，我们也已经拥有了某种无可争议的事实：自恋概念一进入分析理论，攻击性这一基调便日益、逐步地进入分析

家关切的中心；我甚至要说，它也进入了分析家的技术性关切的中心。

我认为，重要的是努力再向前一步。你们知道，镜像阶段恰恰就是为此服务的：它要揭示这种攻击性关系的特殊性质及其意义；它要表明，攻击性关系进入这件事、进入所谓自我的秩序，并非没有缘故：

- 它构成了那个逐级形成、被称作自我之物的生成；
- 自我本身已经是另一个人，而且自我是在主体内部的一种二元性中建立起来的；
- 自我是主体在另一个人身上遇到的那种主人，而主体又在自身核心把这个主人设立为一种支配功能。

因此：

- 在同另一个人的全部关系中，主体都将面对这样一种歧义，他仿佛必须：

作出选择：“不是他，就是我”；

- 在同另一个人的一切关系中，哪怕是爱欲关系，也都会响起这种排斥关系的回声。因为人在想象层面上被构成为主体的方式，使另一个人总是随时可能重新占据相对于他的主人位置；与此同时，他体内又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总有一部分对他而言是异己的，像是一个“植入他体内的主人”，凌驾于他的全部倾向、行为、本能和驱力之上。

这不过是把一个悖论表述得更严格、也更突出而已：驱力与自我之间存在冲突，主体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被他采纳，有些不被采纳。人们称之为自我的“综合功能”，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因为这种综合恰恰从未完成；把它称作“支配功能”会更恰当。这个主人究竟在哪里？在内部，还是在外部？它总是既在内部，也在外部。正因如此，同另一个人之间一切纯粹想象的平衡，都带有某种根本的不稳定性。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稍稍联系一下动物心理学。

我们知道，动物……

至少从我们看见的情形来看，我们自以为知道；这一点似乎自带充分的明显性，

以至于动物历来都被人用作参照点。

……动物的生活远没有我们这么复杂。它们兴致来时，便同别的动物发生关系。产生这种兴致的方式有两种：把它们吃掉，跟它们交配。

这一切按照一种被称为自然的节律发生，也就是所谓本能行为的节律。动物同其同类的关系，非常确切地维持在一种想象关系之中——不管它们情愿不情愿。

人们通过突出图像在触发这些周期时的根本性质，把这一点揭示了出来。它在上述两个界域中表现得尤其清楚。人们向我们表明，母鸡和其他家禽一看到某种猛禽的轮廓，就会陷入惊慌；它们对这种轮廓可能敏感到不同程度。这一轮廓能够使家禽逃跑、啾鸣和尖叫，而稍有不同的轮廓却不会引发这些反应。

这些轮廓本身的揭示，已经足以表明想象性质何等关键。触发性行为的情形也一样：无论雄性还是雌性的刺鱼，都完全可以被欺骗。刺鱼是一种鱼；求偶时，其中一方的背部会显现特定颜色，而这种颜色能够在另一方身上触发整套行为序列，最终使两者接近。

这一过程还能推进得更远，一直延续到协助雌鱼孵育；这构成了性行为的整体。ἔρως［erōs，爱欲］同攻击性关系之间的这个临界点，没有理由不存在于动物身上。

似乎还没有人以应有的强调，对洛伦茨书中关于求偶的一幅图感到惊讶。洛伦茨开篇放了一幅很漂亮的图：刺鱼站在镜子前。洛伦茨确实让一条雄刺鱼面对了自己的图像，它随后表现得十分奇怪。说明这个现象所需的全部要素都在书里；我只须说，洛伦茨之所以没有把这一点突出出来，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我的研讨班。然而，他竟觉得应该把这幅最令人费解的图放在书首，仍然很耐人寻味。

不过，只要查看正文，我们就能找到解释。书里写道，ἔρως［erōs，爱欲］与攻击本能之间的这条界线，在刺鱼的空间行为中完全可以显示出来，甚至显现在外。刺鱼确实有自己的领地。它并非始终拥有领地，但在我刚才谈到的求偶期及其后的产卵期，领地尤其明确。我指出的那些同雌鱼有关的活动，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空间、一个特定场域内；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在水草或多或少茂密的河底，需要占据一定位置。

那么，假定这块地方就在其中。有一点看来可以确定：刺鱼打洞似乎同交配行为本身、甚至同这种“婚飞”的行动都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那里确实存在一场真正的舞蹈，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有自身功能：

- 首先要诱惑雌鱼；
- 接着温柔地引导它顺从；
- 然后让它到雄鱼事先筑好的一条小隧道里产卵。不过，有一件事并不好解释：这一切做完以后，雄鱼竟还有时间到处打出许多小洞。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存在与虚无》中关于洞的现象学；你们知道，萨特在人的心理学中赋予它何等重要性，尤其是在海滩上消遣的资产者那里。他从中看到一种几乎堪称人为的否定性表现。

我认为，刺鱼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它也打出自己的小洞，把自己的否定性烙印在外部环境上。我甚至要说，这些洞完全有理由使我们想到，这确实是动物在某种它显然据为己有的东西上留下的印记：绝不容许另一条雄鱼进入这些小洞标记出来的区域；一旦进入，战斗反射便立刻被触发。

刺鱼的小洞是这种否定性的一种爱欲表现，而它还以另一种方式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充满好奇的实验者想弄清这种战斗反应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他们以两种方式进行实验：一是改变雄性主体同雄性竞争者之间的距离；二是把这个雄性竞争者缩减为一个仅仅足以代表潜在雄性同类的形态，也就是用诱饵替代入侵者。

这就是试图标出攻击反应界线的两种方式。在两类实验中，研究者都观察到一件引人注目的事：那些洞是在求偶期、甚至求偶开始以前挖出的；挖洞是一个同爱欲行为和性行为有本质联系的动作：

- 当入侵者是一条真正的雄鱼时，如果它接近刺鱼领地所界定的位置，达到某个距离，攻击反应就会发生；

- 在另一段距离上，攻击反应却不发生：因此存在某种临界点，作为主体的刺鱼会在“攻击”与“不攻击”之间摇摆。

的确，从“不攻击”跨到“攻击”，或许并不是单纯从少到多的变化。某一临界行为的出现或缺失，可以通过距离差异来界定；也可以通过形态特征是否充分来界定。就在形态特征略显不足的界线上，会发生一件奇特的事：爱欲行为中的一个部分发生移置，而这个部分恰恰就是挖洞。

换句话说，当雄刺鱼不知道在同同性同类的正常关系层面上该怎么办，不知道该不该攻击时，它便开始做一种只有在交配时才做的事情。

我以刺鱼为例向你们说明了这种反应，但它绝非刺鱼所独有。在鸟类中，争斗常常会突然中断，其中一只鸟开始拼命梳理羽毛，就像平时要取悦雌鸟时所做的那样。

这种移置同样引起了动物行为学家的注意。我要你们稍作停留、却没有特别加以强调的，正是它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镜子前的雄刺鱼对着自己的图像所做的，恰恰就是挖洞动作。它低下头，身体呈斜姿，

尾部朝上、头部朝下。在那许多展示其行为的图像中，只有当它即将把头扎进沙里挖洞时，才会采取这个姿势。

换句话说，镜中图像显然没有让它无动于衷，却也没有使它进入完整的爱欲行为周期；镜像的作用，确切说来，是把它置于ἔρως［erōs，爱欲］与攻击性之间的临界反应中，而挖洞正是这一反应的标志。重要之处就在这个反应。你们看到，甚至在动物身上，只要它遭逢诱饵之谜——也就是说，被放进一个显然人为而含混的情境——这种反应也会得到如此奇特的展示；情境已经使它出现某种失调和行为移置，而且表现得十分独特。

既然我们已经把握到镜中图像对人的重要性，而且这一图像对人具有功能上的关键作用，这些事情大概就不再那么令人惊讶。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一图像在功能上至关重要：人正是以这种形式、以一种异化的方式，获得了某种矫形性的补足，来弥补一种构成性的不足、紊乱和失调。这种失调同人的本质有关：人这种动物出生得过早，而且从来没有彻底统一，因为这种统一恰恰经由一条异化的道路，以一个异己图像的形式完成。于是，在失调、冲突以及“不是我就是另一个人”的攻击性张力所提供的活动原则内部，形成了一项独特的心理功能；这一张力绝对整合在人的一切想象性运作之中。

问题就在这里，这正是我们必须努力设想的一点：这种结构对人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只能以一种神话式的、其本身也完全想象的方式来设想，因为人的行为从来不能被单纯还原为想象关系。

不过，让我们暂时假定：一个人置身于某种颠倒的伊甸园，在同类关系中完全被还原为这种既同化又异化的迷摄，并同时占据了以同类图像为轴心的两项功能之两极。那么会发生什么？

为了把它说得形象一些，我过去已经借用过小机器的例子。近来人们喜欢制造一些看似动物的机器——当然，它们根本不像动物。人们巧妙地组装出整套机制，用来研究若干行为并观察会发生什么；再给机器披上一张小狐狸皮。狐狸皮丝毫不改变机器的秩序，不过人们还是告诉我们，它像动物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真的；而且，这类行为的一部分可以被当作某种不可预测的东西来研究。对于我们怎样理解一种能够自我供能的运作，这确有一定启发。让我们以它为出发点，设想应当怎样表象这种人的想象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制造一台机器，也就是勾勒出一个足够稳定的模型。

在这个意义上，这套系统显然只会走向全面堵塞。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假定这样一台机器：它内部的自我调节装置只有零碎的形式；它只有借助另一个正在协调运作的机器之图像，才能获得自身协调。比如，负责驱动右腿的器官，只有在某种或多或少具有光电性质的接收装置，恰好在需要运作的时刻呈现出另一个机器协调运作的图像时，才能同负责驱动左腿的器官协调起来。另一个机器的图像，成了特定主体内部协调运作的根本条件。

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把若干这样的机器放进同一回路，情形就会像游乐场里那些在空地上全速奔驰、主要乐趣就是彼此相撞的小汽车。这样的游乐设施如此令人快乐，恐怕并非偶然，因为彼此相撞必定是人身上一种极其根本的东西。不过，在一组这样的机器中，每一台都通

过看见另一台而得到统一和调节；对于它们会怎样运动，建立一条总体的数学方程并非全无可能。

可以设想，这一切只会使所有小机器集中到游乐场中央，彼此卡死，形成一个单一的聚合体。压缩的唯一界线，就是各台机器外壳的阻力；也就是说，情境本身包含着一种根本碰撞，最终只能造成总体性的挤压和毁坏。

这只是一则寓言，旨在向你们说明：在人同另一个人的根本想象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歧义。正是在这种想象关系自身的缺陷或裂隙中，铭刻着一项必要条件：必须有某种别的东西，来保存原本无法保存的东西。无论我的寓言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它所要使你们理解的是：必须有某种别的东西来维持关系、功能与距离。

这仍不是什么新说法；它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俄狄浦斯情结意味着：一切关系在想象层面上从根本而言都是乱伦性的、自身紧张的和冲突性的；人的自然关系本身注定会走向冲突与毁灭。

要使人能够建立最自然的关系——雄性与雌性的关系——就必须有某种东西通过第三者的中介发生作用。这个第三者作为一种图像、作为某种成功事物的范型，代表着一种和谐；正是这份和谐，才使一种“自然”关系得以建立——这里的自然只意味着可以存续。然而，这种关系恰恰又并不自然，因为它自身包含着一条法则、一条链条和一种象征秩序；简言之，它包含着所谓法的秩序对人类秩序的介入。换一种说法——而且严格说来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言说秩序的介入。

换言之，父亲之所以发挥作用，不是因为他是自然意义上的父亲，而是因为他被称为“父亲”；某种秩序以“父亲”这个名称的存在为基础。只

有从这里出发，某种不必总是以整个局面的碰撞、爆裂和断裂告终的东西才成为可能。

我之所以重申这一点，是因为它绝对关键。需要向你们突出的，是象征秩序在何等程度上必须被理解为某种叠加其上的东西；没有它，像人这样歪歪扭扭的主体甚至无法过上一种单纯可能的动物生活。至少，事情就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给我们的；而且出于完全显而易见的理由，一切都让我们想到，事情历来如此。

也就是说，每当我们找到某种像人的骨骸、同人类或远或近有亲缘关系的骨骸时，只有在墓穴中发现它，我们才把它称为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彻底“发疯”的事：尸体不过是生命留下的一堆残骸，究竟有什么理由要把它放进一圈石头围成的空间？

要这样做，必定已经建立起一整套象征秩序。也就是说，某位先生曾在社会秩序中是某某先生；这个事实要求人们在他周围放置某种东西，单纯提醒大家他曾是某某——墓碑正该做这件事——而且，他曾被称作某某这一事实本身，是某种超出他的东西。

这并不预设任何关于“灵魂不朽”的信仰；它只预设他的名字同他的活体存在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个名字本身会相对于这段存在延续下去。这一点值得重申，因为假如你们看不出，分析的独创性正是在于把它凸显出来，那就让人不禁要问：你们究竟在分析中做什么？

只有当这个关键已经被清楚标出时，像我们将要阅读的这个［……］才会变得有意思。它将以一种示范性的方式向我们显示：我们必须懂得怎样从结构现象学所呈现的形态中把握某种东西。因为只有当人们

认为事物是可能的，才会真正停下来考察它；否则，人们只会说：“事情就是这样。”然后便尽量不去看事情确实如此。

如果你们首先把这个图式放在心里——也就是：法的分节、某种象征秩序对于人的存在本身具有根本作用，却又同这段存在相区分；这个秩序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看作在每一个主体之外自存——那么，当你们看见一份很长、无疑异常而卓越、却肯定并非独一无二的个案材料时，就不会感到惊讶。

归根结底，它之所以独一无二，大概只是由于若干偶然条件：

- 施雷伯主席有条件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尽管书稿遭到了删改；
- 另外，弗洛伊德恰好对它发生了兴趣。

你们会在其中看到一种真正的侵入，它席卷了可以称作“想象的主体性”的一切；而同它相关联的是：

- 镜像关系取得一种极其显著的支配地位；
- 作为同一身份的小他者发生极其显著的溶解，……因为你们会看到，这一点时时都在加剧。

从施雷伯能够谈论那些人物的那一刻起——此前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他无权谈论他们；我们还会回到这段漫长时期的意义——他把同类分

成两类来谈。你们会看到，尽管有所区别，这两类人物仍处在某一界线的同一侧：

- 那些表面上还活着、还在走动的人，比如他的看守和护士，都是“人的影子，

仓促拼凑而成”；这是最早作出这一译法的皮雄的说法；

- 另一些较为重要的人物则是灵魂。它们发挥作用，而且侵入性极强，甚至在某一时刻进入施雷伯的身体。

这些灵魂大多是死者；越到后来，最终所有灵魂几乎都是死者。它们有时仍留在那里，人们仍会遇见它们，它们还显出某种外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那不过是外观和替身。以弗莱希希为例：弗莱希希已经死了，而那个主体本人不过是他自身同一身份的某种第二个样本。施雷伯有一刻得到启示：前一年必定发生过某件事，那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的死亡；报纸甚至已经向他宣告了这件事。施雷伯还记得一位过去的同事，那个人比他更有才华；他是另一个人。这种同一身份的溶解、这种同一身份的碎裂——因为他是另一个人，却又仍是同一个人；他还记得那个另一个人——给想象层面上同其同类的一切关系都盖上了自己的印记。

另一些时候，他也谈到弗莱希希：弗莱希希同样已经死去，因而升到严格说来只有灵魂存在的地方。人的灵魂在那里进入彼岸，逐渐被同化到神圣的大统一体之中。不过，它们当然必须逐渐丧失自身的个体性质；要到达那里，还须经历某种考验，摆脱一种不纯之物——那不是别的，正是它们的激情。凡是严格说来意指它们欲望的一切，都被

施雷伯明确分节出来；这一切所为的，不过是进入高层界域并获得解脱。

从这些灵魂中剥离不纯之物，并不会不伴随字面意义上的碎裂。主体对此毫不表示歉意；这种对自我同一性概念的侵犯无疑本该使他震惊，但事情就是如此：

“我只能为那些经由启示向我显现的事情作证，”他说。

正因如此，我们在他的整个经历中看到一个碎裂的弗莱希希、一个高级的弗莱希希、一个光明的弗莱希希。我略去许多极富特色的细节；我希望你们能对它们产生足够兴趣，好让我们逐一追踪。除此以外，还有某种低级部分，它一度甚至被分裂成四十至六十个小灵魂。

总之，这种文体以极其明确的方式成形，并带有我前几天向你们指出的妄想话语所特有的那种强大断言力量。它同一个观念如此汇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另一个人的想象同一身份，同一种可碎裂的可能性有着深刻关系；小他者在结构上可以分裂、倍增——妄想正把这一构想表现并断言了出来。

还有一种更为深远、也更为醒目的东西：这些图像在妄想所展开的纯粹想象性相互关系中彼此套叠。这样的套叠以两种方式呈现：

- 施雷伯同这些碎裂图像的关系，也就是同一人物拥有多个同一身份；

- 反过来，还有一些完全令人费解的小型同一身份。施雷伯不仅见证它们在场，也见证它们在自己体内进行各种钻刺而有害的操作；他

> 把它们称作“小人”。这个图像强烈吸引了精神分析家的想象，他们试图判断这些小人究竟是儿童、精子，还是别的什么。为什么它们就不能只是小人呢?

这些同一身份全都被构想为幻景；相对于施雷伯自己的同一身份，它们具有某种机关或功能的价值。它们能够从根本上穿透他、把他本人分割开来、侵入他并寄居于他体内。施雷伯对自己同这些图像之关系的理解是：这些图像本身——他在其中许多图像上都记录了这一现象——必定会越来越被吸收、缩小，仿佛被他施雷伯自己的抵抗所吞没。

要使它们保持自主——对他而言，这也就意味着使它们能够继续伤害他，因为这些图像通常危害极大——它们就必须完成他本人称为“附着于诸大地”的操作。这里涉及的事物具有根本价值。“附着于诸大地”不只指地面，也指行星之地、星界之地；非常确切地说，它指向我在那个小魔方里称作星辰的层面，而这并不是我为眼前场合发明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向你们谈到星辰在人类现实中的功能。历来在所有文化中，赋予星座的名称都在建立某些基本象征关系时发挥关键作用，这当然不是没有缘故。这些关系有时延伸得极远；而当我们面对一种被称作更“原始”的文化时，它们反倒越加明显。某个灵魂碎片会附着在某处：

- 仙后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还有仙后座的兄弟们……

这绝不是凭空冒出的观念，因为这一切都同学生社团的故事相连。所谓仙后座的兄弟，同时也是施雷伯求学时期参加学生社团的人。妄想把它们同这些兄弟会连接起来；而分析已经相当充分地揭示了兄弟会所具有的自恋性质、甚至同性恋性质，使我们足以从中认出施雷伯经历中那些想象性前史的一项典型标记。

这已经充分表明事情具有何种性质。不过，有意思的恰恰是：即使在想象的社会化图式中，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构想——必须防止一切突然缩减为虚无，防止妄想中展开的整张想象关系之网突然卷回去，消失在某种幽黑的裂口中。在起初，施雷伯同这种状态并不遥远：一切彻底终结，至少遮蔽它的整幅帷幕会被抹除。我认为，这一点颇富启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网怎样覆盖在最初的轮廓之上；而在人际关系的想象层面上保存图像的某种可感性，这张网绝对必不可少。

不过，最有意思的远不是这一点；精神分析家无疑对刚才这些内容着墨最多。他们甚至把所有涉及主体溶解和碎裂的关系精雕细琢了一番，极其详尽地讨论了很长时间：在主体被假定具有的力比多投注内部，以下事实可能有什么意义——

- 某一时刻，弗莱希希在妄想中占据支配地位；
- 另一时刻，支配者则变成处在上帝不同层级上的某个神圣图像，……因为上帝也分层，既有前部的上帝，也有后部的上帝。所有这些曾使精神分析家多么感兴趣，人们又曾从中推导出多少东西！

当然，这一切并非不能接受若干解释。然而，有一件事似乎从未吸引任何人的注意：

- 无论这套幻景多么丰富；
- 无论把它铺展开来多么有趣；
- 无论它多么灵活，使我们能够在其中重新找到那些供分析游戏追逐的不同对象，……同所有这些现象相比，有一个事实具有压倒性分量：从施雷伯妄想的一端到另一端，始终存在着层次极其细腻的听觉现象。它们被分别描述为轻轻的耳语、窸窣声，一直到他夜间面对阿里曼时听见的水声……

后来他修正说，那里并不只有阿里曼，也应当有奥尔穆兹；

善与恶的两位神不能被彼此分开、孤立。

……在同阿里曼的这场相遇中，有一刻他同对方正面相对。他是以心灵之眼看见阿里曼的；这种看见不同于他的若干其他幻视，却带着照相般的清晰度。

因此，他同上帝面对面。上帝对他说出一句意义重大的话，把一切各归其位，宛如最典型的神圣讯息。上帝对施雷伯——世界彻底陷入暮色以后仅存的那个人——说道：

“腐肉。”

我们要按照德语语感来理解这个词。法语译本使用了“腐肉”这个词，但原词在德语中比“腐肉”在法语中日常得多。在法国，朋友之间很少互称“腐肉”，除非一时格外兴奋；我们通常会用别的词。

这个词在德语中更常用，并不带有法语“腐肉”那种彻底消灭对方的面向。它还有一些潜在意味，同这个人物趋向女性化的方向相呼应；若要在法语中更贴近这种语调，也许最好译成朋友交谈中确实更容易听见的“甜蜜的烂货”。

重要的是，在上帝与施雷伯唯一一次面对面的相遇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腐肉”一词，绝不是孤立的。它频繁出现在施雷伯同这个想象世界的另一面之间发生的一切之中。这个另一面可以说是想象世界的对应面，而且绝对关键；以下一切都在其中发生：

- 一切爱欲关系——如果我们不想一开始就立刻投入它的悲怆之中；
- 施雷伯的斗争与冲突所针对的一切；
- 对他真正重要的一切；
- 他所遭受的一切；
- 他作为对象所承受的一切，也就是神圣射线及其庞大展开；他的确定性正在这里。我要在这里结束，并引出下一课：施雷伯以一种同样复合、却又被分解得异常丰富的形式，把语言的整个领域都展现了出来。在这里，你们已经遇到言说的最高点，因为归根结底，毁灭性的辱骂正是言说行动的一个巅峰。围绕这个巅峰，施雷伯将以

一种恢宏的透视，把整个言语场域的一列列山脉铺展在你们面前。我正想把你们的注意引向这里。

也就是说，从语言学角度可以设想的、关于语言功能的一切分解，都能在施雷伯的体验中遇见。他以极细腻的笔触区分其中的层次；当他谈到严格属于“根本语言”的事物时，所提供的信息细致得无可挑剔。这种根本语言调节着他同此后唯一存在者——那位奇特的上帝——之间的真实关系。

他给这些形式命名并加以区分。其中一类具有他所谓的“echt”性质；这个词几乎无法翻译，它意味着本真的、真实的。这种性质总是通过值得单独关注的言语形式交给他。这样的形式有好几种，颇富启发性，因为我们可以借它们来理解能指的功能。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形式。施雷伯以十分细腻而详尽的方式告诉我们，它们是背诵下来的形式，被灌输、注入神力的某些边缘成分，甚至已经从神力中坠落的成分。这些形式全无意义，只是一种显然旨在遮蔽他的叠句。

在两者之间，他又补充了几种言语流的样式。借此，我们能够把句子现象展开的不同维度逐一分离出来，并稍作停留——除非身为语言学家，否则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我说的不是意指现象，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切身触及句子本身的功能：句子并不非得随身携带自己的意义。

例如，在他生命中的一段时期，断句现象极其频繁——我甚至会说，几乎始终不断——地在这份主体性中涌现。它作为断句本身被交给他，也就是说，它留下意义的悬置；意义同时又被给出，但在听觉

上，句子是在中途被截断的。并不包含在句子字面中的余下部分，则作为意义、也作为句子的收尾被隐含出来。

这突出显示了象征链的连续性维度：一个被截断的句子会召唤某种收尾；这个收尾可以来自非常广阔而不确定的范围，却也不能随便是什么。另一个情形则属于另一维度，也就是被等同于少女的“天空之鸟”，那里完全是另一回事：

- 对她们而言，连续的事物毫无意义。原文中的弗洛伊德由此确信，这确实是在同女人对话[注]；

> [注] 此处法文原文作“弗洛伊德”，但按上下文，主语可能是“施雷伯”；疑为转录误差。

- 对她们无须费力，问题只在于发出轻柔的呢喃。绝对引人注目的，正是这种分解。

这一点也值得我们从细节上停下来考察：主体同语言之关系本身的演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同想象世界中一样，对他存在着一种始终被他知晓的危险：整套幻景可能缩减为一个最终实施毁灭的统一体；它所毁灭的不是施雷伯的存在，而恰恰是本质上就是语言的上帝之存在——这是他明确写下的。他说：“射线必须说话。”因此，必须时时发生一些转移注意的现象，才不至于使上帝完全被吸收到主体的中心存在——施雷伯——之中。这同样不该被我们视为不言自明；无论如何，它将为我们说明创造性关系中具有根本真实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正因为它具有创造性，一旦抽掉它的功能和本质，我们确实就会抵达一种与之相应、作为其衬里的虚无观念。言说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如果它发生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出自主体的任

意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是创造者，而且突出地是在同大他者的关系中成为创造者：

- 不是同作为对象的大他者；
- 甚至也不是同作为图像的大他者；
- 不是同作为对象之影的大他者；
- 也不是同作为想象相关项的大他者，……而是同真正处在其本质维度中的大他者。我们总或多或少地把这一维度省略掉，但它对于人类世界的构成仍具有决定性。这个大他者无法被还原为任何东西，只能被理解为另一个主体；也就是作为“他”的大他者。施雷伯世界的特征正在于：这个“他”已经丧失，“你”却仍然存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显然仍远远不够。这里涉及同某种存在本身相关联的主体概念；我们可以说：“是他做了这件事。”不是我眼前看见的这个人——他当然装作若无其事——而是那个“就是他”：

- 大他者本身之中存在着一个维度；
- 存在着这样一个存在者，他回应并担保我自己的存在；没有他，主体自身的存在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我”；
- 同这个“他”的关系，其戏剧支撑着施雷伯世界的整个溶解；
- 这个“他”被缩减为唯一的伙伴；上帝最终既无性，又具有多种性别，把施雷伯所面对的世界里尚存的一切都包容在自身之中，并在这一点上呈现出两个十分费解的面向。

当然，由于上帝的存在，仍有人能够说出一句真正的言说；这句言说出自他，也向着他悬置。不过，这句话的特性是始终极其费解；“根本语言”的一切话语都具有这个特征。另一方面，这位上帝本身似乎又是施雷伯的影子：他也受到他异性的这种想象性败坏的侵袭，因而成为一个同施雷伯一样的人物，遭到那种处在整个过程起点的女性化打击。

我们必须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集中在这里。我们当然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主体，除了深入考察其语言现象学以外，也无法进入他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围绕语言现象、围绕那些……

或多或少带有幻觉性、寄生性、奇异性、直觉性和迫害性的语言现象，

……从施雷伯个案所涉及的这些现象出发，开辟一条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道路。

正是在这里，施雷伯个案给精神病现象学带来了一个迄今尚未得到阐明的新维度。

- 。

# 第9课 · 1956年1月25日

我们现在不妨一起进入施雷伯的文本，因为对我们来说，施雷伯个案也就是施雷伯的文本。今年我在努力做什么？我试图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所谓“个案的经济学”，也就是怎样理解、哪怕只是怎样设想它的演变。

你们应当已经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析的构想正在悄然发生某种滑移。前几天我提醒过你们，弗洛伊德给出的说明归根结底就是转向“自恋的”层面。患者滑入一种本质上“自恋的经济学”，显然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命题；如果真正停下来考察，本可以从中推出全部后果。然而，很清楚，人们并没有这样做。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已经忘记：弗洛伊德写作施雷伯个案时，恰好走到了他著作中的哪个位置；也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清楚说明，在这个位置上强调自恋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人们也不再定位这一说明在当时代表着怎样的新意，也就是不再追问它是相对于哪一种旧有说明而提出的。

如今，如果你们找一位重新处理同一问题、也就是精神病问题的作者，他显然会把“防御”概念推到前台。要举一位对精神病个案作出过最精细论述的作者，提卡坦就够了。我还会回到卡坦的文章，不过我不想让我们沿着“评论别人的评论”这条路走下去。

我们必须从个案出发，看看人们怎样理解和评论它。弗洛伊德评论施雷伯个案时所说的话，正给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在分析开篇，他首先建议我们阅读施雷伯的书。

既然我们是精神科医生，或者至少以不同程度接触过精神病学，自然会用精神科医生的眼睛阅读，先试着形成一个关于个案中发生之事的概念。接近个案经济学的第一步，就是看清涌到眼前的那大量事实。这些事实毕竟有其重要性，而我们要看清它们为何重要。

“自恋”概念在弗洛伊德整个思想中是怎样被引入的？我们毕竟不能忘记其中的阶段。如今，人们无论谈什么都谈防御，并以为自己只是在重复弗洛伊德著作中一个极古老的概念。不错，它确实很古老；防御概念很早便发挥作用，弗洛伊德早在1884—1885年就提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词。不过，他当时是在完全精确的意义上使用它的：谈到Abwehrhysterie（防御性癔症）时，他把它同另外两类癔症区分开来。

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疾病分类学。你们若愿意查阅我所指的那篇文章，就会看到：他把一类癔症设想成依赖性的现象——按照布洛伊勒式的理解，它们是催眠样状态中所发生之事的次生产物，依赖于一个同催眠样状态中的意识紊乱相对应的丰产时刻。

弗洛伊德后来把这类癔症排除在精神分析疾病分类学之外。他并未否认催眠样状态，只是说：“我们不研究这个；我们不会把它当作鉴别特

征。”在分类问题上，必须清楚理解这一点。一切分类中发生的事，同一切科学中发生的事一样：

- 你们先从一种极原始的植物学开始，数一朵花上那些看起来像有色器官的东西有多少；

- 你们把它们称作花瓣，因为在具有若干可数单位的花朵中，它们看上去总是一样。这种做法极其原始；问题在于进一步考察：外行初看之下称作花瓣的可见之物，能否根据其功能也这样命名；

- 深入研究以后，你们有时会发现，那些所谓花瓣根本不是花瓣，而是萼片；它们的功能完全不同。

换句话说，解剖学的、发生学的——也就是胚胎学的——类比层面，以及生理学、功能性要素，都可能参与分类；在一段时期内，它们甚至可能使不同分类层面彼此重叠。要让分类具有意义，它就必须是一种自然分类。那么，我们该怎样寻找这种“自然”呢？

眼下，我们仍在癔症层面。弗洛伊德没有排斥那些涉及催眠样状态的癔症；他说的是：从现在起，我们不再考虑它们，因为在分析经验的层面，重要的是另一种东西。这另一种东西在最初的清理中便已出现，它正构成“Abwehrhysterie（防御性癔症）”概念：严格以创伤记忆为参照。

我们正处在防御概念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层面——必须直呼其名：这是回忆过程的层面。我甚至没有说“记忆”；我们处在回忆过程的紊乱中，也就是处在主体能够用言语分节什么、能够回忆起什么的问题上。

关键要素在于使所谓“患者的小故事”说出来，在于他是否能够说出这个“小故事”，也在于把它说出来这一事实。安娜·O——有人曾把一枚印有她肖像的邮票带给我看，因为她后来成了社会工作者中的女王——把这称作“talking cure（谈话治疗）”。

只要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就会看到，Abwehrhysterie（防御性癔症）是一种非常接近、也完全开放于我所给公式的癔症：

“事情之所以不再能被表述，是因为它们已经在症状中的别处得到了表述；问题在于重新释放这段话语。”

我们完全处在这个层面。当时没有丝毫退行或本能理论的痕迹，然而，全部精神分析已经在那里了。弗洛伊德还区分出第三类癔症，它同样有某种东西可讲，但这东西哪里都没有被讲出来。在理论建构的这个阶段，如果他能告诉我们这场运作究竟在哪里发生，反而会很奇怪；不过，轮廓已经勾画得十分清楚。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充满这样的预留石，可以说，它们令我欣喜。每当我们拿起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都会发现，它不仅从来不是我们预想的样子，而且始终只是一种极其朴素、清晰得令人赞叹的东西。

不过，没有一篇弗洛伊德文本不以谜为养分；这些谜正对应于我所谓的“预留石”。事情所形成的格局使我们可以说：在弗洛伊德有生之年，真正把原创概念带进来，用以切入并整理他为我们发现的新领域的人，只有他自己。我们又怎会对此惊讶？他处理每一个概念时，都带着整整一个问题世界。弗洛伊德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向我们掩盖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每一篇文本都是问题性的文本，阅读弗洛伊德便是重新打开问题。

所以，“记忆紊乱”仍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的出发地。即便这一阶段已经被超越，也必须衡量走过的路。在精神分析这样的事业中，如果我们竟能允许自己无视历史，反倒十分奇怪。我不是要在这里讲述我们所谓“记忆紊乱”阶段同“本能退行”阶段之间的历史。前几年我已经作过足够说明，可以指出：

- 本能退行的机制，是在人们探索并调动回忆紊乱的过程中发现的；而且，这些机制本身依赖一项工作：早期精神分析试图通过它填补主体历史中的空缺；

- 随后我们发现，那些事件躲进了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出现了我上次所谈的那种行为移置；我们由此看出，问题不只是重新找到：

事件在记忆中——换言之，在时间顺序上——的位置，不只是恢复失去的一段时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在地形学层面。也就是说，对退行中截然不同的几个层面的区分，已经隐含在这里。

换句话说，人们总在忘记：一个概念走到前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概念便不再保有自身分量与价值。正是在这种地形学退行内部——也就是事件取得其根本行为意义的地方——人们才在某一时刻发现了“自恋”。

也就是说，人们发现世界的想象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同象征结构的改变彼此干涉。我们必须这样称呼它，因为回忆过程必然属于象征秩序。当弗洛伊德已经走到那个位置时，这意味着什么？当他谈论妄想，并以力比多的自恋退行来说明妄想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我们试图通过恢复某种东西来理解时，已经发生了一项性质上的差异。原本要求得到承认或显现的欲望，如今确实显现出来；在妄想中，应当得到承认的东西无论实现得多么清晰，其显现所在的整个层面，同它原本要求得到承认的层面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这里发生了层面的转移。力比多从对象撤回，代表着随后将在妄想中以或多或少可辨认的方式呈现之物的去对象化；它呈现为妄想的代表，而这份妄想原本要求使自身得到认识。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便完全看不出精神病同神经症有何区别，也无法明白，为什么要恢复所谓“主体同现实的关系”会如此困难，因为原则上……

至少弗洛伊德某些段落是这样说的；其说法远没有人们想象和转述得那么粗略——首先，

……整套妄想就在那里，可以阅读。

它确实可以阅读，却又被转写在另一层面。在神经症中，事情始终停留在象征秩序之内，也就是始终保有能指和所指的那种双重性；弗洛伊德用“神经症的妥协”一词来表达它。那么，在妄想秩序中，事情怎样转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层面——在那里，它仍可阅读，却没有出口？

这正是弗洛伊德写完施雷伯个案时仍然敞开的经济学问题。我眼下说得很粗线条；无论如何，我想，你们应当就以这种方式接受它们，好真正定位问题所在。换句话说：

- 在神经症中，被压抑者会在 in loco（原处）重新出现，也就是在它遭到压抑之处、在人融入并参与其中——既作为行动者，也作为演出者——的那个符号环境里重新出现。

神经症中的被压抑者在原处戴着面具重新出现；

- 如果我们懂得阅读弗洛伊德，便会看到：精神病中的被压抑者在另一个地方、in altero（他处），也就是在想象界中重新出现，而且确实不戴面具。

这十分清楚，既不新奇，也不异端；我们只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点，能避免提出无用的问题。弗洛伊德为施雷伯研究画上句点时，这条根本教训不能被视为终点。恰恰相反，问题正是从那一刻起才开始提出。这种转化确实可能发生。

此后，每个人都试图接过工作。正因为如此，卡坦才向我们提出了某些精神病理论，包括精神病前期的各个阶段等等。我们还会详细回到那里。不过，大体上，我们已经可以把握问题，并阅读卡坦关于施雷伯个案所写的一切。

他曾试图提出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分析理论，文章载于题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年度文集第五卷。阅读卡坦，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分析理论走过的道路。弗洛伊德的复杂动力行动总是让主体中心的问题保持如

此开放；例如，他在偏执狂分析中一步一步推进，向我们展示了以下演变：

- 一种本质上属于力比多的紊乱；
- 一组可以转移、转化并发生退行的欲望所构成的复杂游戏；
- 一整套其中心在我们看来根本成问题的辩证法，……然而，从分析中出现某种迟疑的那一刻起——大约也就是弗洛伊德去世前后，因为我谈到的这些防御概念文章都晚于此——这个复杂动力行动便取得了一种“防御”的意义：防御由某个重新找回的东西发动和指挥，也就是那个历来熟悉的老中心——自我；自我站在那里操纵控制杆。

于是，精神病不再从驱力动力学和复杂经济学的层面得到解释，而被明确解释为自我为了应付各种要求所采用的手段。自我不仅重新成为中心，也成为紊乱的原因：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抵御驱力。“防御”概念不再有别的意义，只是像人抵御诱惑那样进行自卫。施雷伯个案的全部动力学，都从他必须处理、摆脱一种所谓同性恋驱力的需要得到说明；这项驱力包含对自我的威胁，而且这些威胁被自我理解、知觉并感受为针对自身完整性的威胁。

阉割不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只表示身体完整性的丧失。人们明确告诉我们：自我——用他们的说法——不够强大，无法在外部环境中找到支点，并由此抵御来自本我的驱力；于是，它找到另一项资源。既然自我是一个装置，它便酝酿、创造出一种新事物，一种被称作幻觉的新产物，作为处理和转化本能的另一种方式。这项本能会以变形的

方式在幻觉中被看见；幻觉是它特有的一种升华，只不过带来严重弊端。自我的防御正是在这一层面被设想的。

我们难道没有在这里看见一种视野的缩窄和还原吗？它在临床上的不足显而易见。归根结底，有一种想象方式能够满足需要的推动；这个观念潜藏在弗洛伊德学说中，甚至有其根据并得到过分节，但它从来只被当作现象决定机制中的一个要素。

弗洛伊德从未对幻觉性精神病下过这样一种定义：它可以同通过满足饥饿的梦幻来满足饥饿需要的幻想简单相比。只要看一眼临床现象就会发现，一套妄想绝不服务于这样的目的；这一点再明显不过。

恰恰是我们满足自身需要的愿望，为我们递上了一次并不困难的重逢：我们在人类神经症研究中早已熟悉的某些想象群组。重新找到一个对象，总是令人愉快。弗洛伊德甚至告诉我们，人的对象世界就是沿着这条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当我们在精神病中重新找到神经症的某些象征主题时，会感到强烈满足，毫不足怪——人们重新遇见自己已经表象过的东西，总会高兴。这种做法完全正当；不过必须看清，它只覆盖整幅图景中极小的一部分。

在施雷伯个案中，只要有所选择，我们确实可以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把这种转化图式化为“同性恋的”转化——哪怕再加上“想象的”一词：同性恋推动转化成这样一套妄想，其中施雷伯成为上帝的女人，成为神圣善意与恩宠的承受者。

这个图式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施雷伯文本的整个展开中，找到各种真正精细的调式来支持这一构想。对精神病的这样一种理论分节也同样如此。它向我们说明，精神病并不是一种能够完全

随心所欲地操作、像处理神经症那样处理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在被压抑欲望的实现之间作出一项根本区分：

- 神经症中的实现发生在象征层面；
- 精神病中的实现发生在想象层面。

我上次把这一点作为区分两个层面的原则立场带给你们。单凭这项区分，已经颇为令人满意；但它不能使我们真正满足。为什么？因为精神病并不只是这个。它不只是主体同外部世界之间一种想象的、幻景式关系的展开，而是另一种东西。今天，我只想让你们衡量整个现象的体量。让我们先承认我刚才所说的内容：确实存在一种可称作“施雷伯式”的构想——借用施雷伯本人谈论新一代施雷伯式人类诞生的说法——也就是人类将从仍保有真实存在的他那里重新生成。

让我们谈谈这个唯一者——施雷伯——同其费解的伙伴上帝之间的对话。这位上帝本身也是施雷伯式的。难道这就是全部妄想吗？并不是！这不仅不是全部妄想，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只在这个层面理解它。人们可以不去理会其余部分；然而，精神病是如此庞大而完整的现象，如果只保留想象事件中清晰的东西，满足于一种极其片面的说明，仍然颇为奇怪。

如果我们真想感觉到自己有所推进、对精神病理解了些什么，就必须能够分节出一种理论，说明我今天上午将通过若干读段向你们展示的那大量现象。我们必须认识到总体上所谓“言语异化”的维度，认识到它在妄想晚期具有何等巨大的重要性。我们将从终点开始，再逆向努力理解。我选择这条道路，不只出于讲述技巧；它符合我们手中材料的性质，因为这份材料是一篇文本。

这位患者从1883年至1884年患病，随后得到八年缓解。第一次危机开始后的第九年，病理过程重新启动：1893年10月，病情复发。他进入第一次接受治疗的同一家诊所，即弗莱希希医生的诊所，并一直住到1894年6月中旬。

在那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施雷伯在弗莱希希诊所中的状态十分复杂；从临床面貌看，可以称作“幻觉性意识混乱”，甚至“幻觉性木僵状态”。在那段时期，这位主体远非没有方向感、对正常现象的辨认能力和记忆——正如我们所知，早发性痴呆患者也能够保有这些能力。后来，他会报告自己经历的一切；这些报告的一部分无疑已经扭曲，而“混乱”这个词正好表示他对某些片段雾气弥漫般的记忆。另一些要素，特别是他同当时周围不同人物之间关系的妄想性要素，则保存得相当充分，使他能够提供有效见证。不过，这仍然是其妄想与精神病中最晦暗的时期。

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这套妄想了解这一见证——我们当时并不在场，而医生关于早期阶段的证明材料也算不上丰富。不过，当主体后来作证时，这段时期已经相当清楚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中，使他能够在其中作出区分。当时发生了许多事，尤其是兴趣中心发生了移置，转向一类我们可以称作人格性关系的关系——这个小标题直接取自施雷伯文本本身——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他同所谓“灵魂”的关系。

这些“灵魂”不是活人，甚至远不只是他当时所面对的那些人的影子；它们是具有特殊属性的死者。施雷伯同它们有着特殊关系，并提供了各种细节；这些细节紧密牵涉身体变形、身体交换、侵入身体和包入身体等感受。在这套妄想中，痛苦基调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我此刻

还不会称它为疑病症；在我们的词汇中，这个词仍过于含糊。我只是在标出大的轮廓。

因此，从现象学角度谨慎地说，当时肯定出现了一项被标作典型的东西，可以称作“世界的暮色”。也就是说，他不再同真实的人在一起——“不再与……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特征的要素——而是同一些别的要素在一起，它们或许比真实的人纠缠得多。它们确实纠缠得如此厉害，以至于痛苦的关系样式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痛苦关系又包含真正的自主性丧失，因为他感到自己遭到侵占、包入和侵入。他把这一切体验为对自身存在的深刻扰乱，并认为它在严格意义上无法忍受。这也使他采取各种行为；他必然只能以隐晦方式告诉我们这些行为，不过，从院方对待他的方式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端倪：他受到监视。

夜间，他被关进隔离室，身边一切可能使用的器具都被拿走。很清楚，他当时处在极其严重的急性状态，作为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大约在1884年2—3月发生了一次转变——这是他本人告诉我们的[注]。重心从那些灵魂转移开来；此前，他同这些存在的交换都属于躯体侵入或躯体碎裂的层面。如今出现了另一种东西：后来被他称作“受审灵魂”的那些灵魂，由严格意义上的神圣王国取代，也就是他所谓上帝的后部王国——奥尔穆兹和阿里曼，因为它们以二分形式显现。

> [注]　此处底本作“1884年2—3月”，但本段所述第二次发病始于1893年10月，按时间顺序或应为“1894年”；译文保留底本年份并标明疑点。

与此同时，他所谓“纯粹射线”也出现了。这种东西的行为完全不同于那些被称为“受审”的灵魂，也就是“不纯射线”。区别在于：

• 后者具有不纯意图，表现为他对于遭到强奸、下毒的恐惧；

还表现为身体变形；在第一个时期，去男性化已经出现；

• 前者同他则具有另一种关系样式，不过这些关系也绝非没有歧义。

施雷伯在整个倾诉中都会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纯粹性的效果使他陷入何等深的困惑。既然它是纯粹的，我们只能把它归于一种神圣意图；然而，他的文本仍让人瞥见某些奇特的共谋，也让人看见这种所谓纯粹性怎样以奇特方式受到各类要素的扰乱和侵袭：

• 这些要素首先来自“受审灵魂”；

• 它们对“神圣射线”、这些“纯粹射线”耍弄各种花招；

• 它们千方百计地试图夺取射线的全部力量，供自己使用；

• 它们还横插在施雷伯同射线的有益作用之间。

文本在这里极其精确地描述了大多数所谓受审灵魂的一整套战术。它们从根本上都是怀着极恶意图的灵魂，而为首的正是弗莱希希。弗莱希希采取的战术，是把自己的灵魂切碎，将碎片分散到施雷伯为你们铺展的超空间里；这个空间横插在施雷伯同所涉的遥远上帝之间。

这里出现了距离概念：“我是那个遥远者。”我们在一则记载上帝向他吐露的话的注释中读到这个公式；它仿佛应和着《圣经》中的“我是自

有永有者”。对施雷伯而言，上帝并不是“存在着”的那位上帝，而是离得很远的那一位；距离概念将发挥作用。不过，“纯粹射线”的进入带着极特殊的特征：这些“纯粹射线”会说话。

它们说话，而且本质上是会说话的……

射线、会说话的射线、上帝的神经，以及它们可能采取的一切特殊形式，彼此等价；这些形式甚至包括我们很快会回到的各种奇迹化形态，尤其是鸟。

……这一点绝对关键。

这对应于一个由他所谓Grundsprache（根本语言）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这是一种滋味十足的高地德语，极爱使用委婉语和反语：例如，它把惩罚称作“奖赏”。

这就是它的说话方式；惩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确实是一种奖赏。我们还会回到这套“根本语言”的文体，因为它让我们能够重新提出原始词语的相反意义问题。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容同后来语言学的批评之间仍有很大误解。弗洛伊德的错误只是援引了一位被认为走得稍远的语言学家——阿贝尔；不过，阿贝尔毕竟触及了一点正确的东西。

本维尼斯特先生去年从能指角度为我们带来了一项完全有效的说明：在一个能指系统中，不可能有一个词同时指称两个相反事物，因为词恰恰就是用来区分事物的。词一旦存在，就必然形成成对的对立；作为能指，词不能把两个极端结合在自身之中。不过，一旦转到意指，

就是另一回事。他举例说明：把一口深井称作 altus 并不奇怪；因为在拉丁人的透视中，心理出发点位于井底，高度正从那里开始。

这个问题延伸得很远。我们只须想到，德语把“最后的审判”称作 Jüngstes Gericht，字面就是“最年轻的审判”，便会感到震动。在法国，谈到最后的审判时，人们不会使用青春的图像。虽然我们会说 votre petit dernier（你家最小的那个）来指最年幼者，但“最后的审判”首先唤起的绝不是这个；一切都立刻暗示某种属于老年而非青春的东西。因此，这个问题毕竟值得停下来思考，而这套Grundsprache（根本语言）会为我们提供漂亮的例子。

1894年，他被转送到科斯维茨皮尔松医生的私人疗养院，并在那里住了十五天。这是一家私人“疗养院”；从他的描述来看，这可以说是一家颇为别致的“疗养院”。患者眼中那里的各种特征，会使仍保有一点幽默感的人会心一笑。条件并不算差：环境颇为雅致，带着私人疗养院那种体面外观；与此同时，又有一种深切的疏忽，文本一点也没有替它遮掩。他在那里没有住多久，随后被送往皮尔纳一所历史最古老的收容院——“收容院”在这里取其可敬的旧义。

他起初在开姆尼茨任职。第一次患病以前，他被任命到莱比锡；就在复发之前，他又在德累斯顿被任命为上诉法院主席。他从德累斯顿前往莱比锡治病。科斯维茨相对于莱比锡位于易北河另一侧的某处；不过，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位于易北河上游、他在那里度过十年光阴的皮尔纳。

进入皮尔纳时，他的病情仍很严重。直到1897—1898年，他才开始撰写回忆录。由于他住的是公立收容院，各项决定可能延迟，在1896至1898

年间的某个时期，院方夜间仍把他关进所谓“疯人隔离室”。他会用一只小铁皮盒带进铅笔和纸片，并为此编出各种借口；在那里，他开始写下一些小笔记，也就是他所谓的“小研究”。他留给我们的有《回忆录》一书；不过，据说还有大约五十篇“小研究”，他不时提到它们。那些就是当时写下、后来充当材料的笔记。

因此，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

这篇文本最早也只能写于1898年，而且写作一直延续到他获释之时，因为书中收入了获释的法律程序，也就是一直写到1903年；

……我们手中的文本，对疾病的终末状态作出了远为可靠、坚定的见证——这里的“终末”只限于我们所知的病程结局。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何时去世；只知道他在1907年再次复发，被重新收入一家疗养院，而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将从他撰写回忆录时的视角出发。

从这个时间点起，他自然能够为某些事情作证；不过，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我刚才所谓“言语异化现象”的经济功能问题——暂且把它们称作“言语幻觉”——它们本身也已经足够成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关心的是：分析精神病时的分析视角，同我所谓通常的精神病学视角究竟有何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仍然“白忙一场，回到原地”。很清楚，就真正理解精神病的经济学而言，我们今天仍可以原封不动地阅读一份1903年的紧张症报告。

你们可以亲自试一试——当然，要找一篇优秀研究。我们可以说，精神病分析在理解这些现象上一步也没有前进。那么，假如“分析家的视角”应当有所不同，我严格说来什么也看不见。除非我们在结构分析中

引入别的鉴别要素，否则我完全看不出分析还能带来什么原创之处。这里有一个例外：面对言语幻觉时，我们不再只问——

- 主体听得稍微清楚一些，还是非常清楚；
- 声音是否很响；
- 是否突然炸响；
- 他是否确实用耳朵听见；
- 声音是否来自内部；
- 是否来自心脏或腹部，……这些事情当然很有意思，却归根结底从一种颇为幼稚的观念出发：主体听见了我们听不见的东西，使我们大吃一惊。仿佛我们自己不是时时也会有某种所谓的“幻视”——一些公式忽然落进脑中，对我们具有某种强烈攫取、指引方向，甚至有时如闪电般照亮和发出警示的价值。

当然，我们不会像精神病患者那样使用这些东西；不过，某些属于言语秩序的东西确实会发生，而且主体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体验为自己接收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仍以课堂上教给我们的原则为出发点，认为有意思的只是弄清它究竟是感觉、知觉、统觉，还是解释；简言之，如果我们在这个同现实的基本关系问题上始终停留在学院式或学校式层面，停留在一种显然极不完整的认识论建构中，那么事情才真正开始把我们难住。

这种理论让要素从感觉出发，经由知觉，逐级上升到因果性和实在组织的领域。然而，至少从康德以来，哲学已经呼喊了很长时间，试图

警告我们：必定存在现实的不同事物和不同层面；相关问题在其中得到表达、组织和提出时，也属于不同的提问层面。因此，一句话是否真的被听见，或许根本不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仍然“一无所获”。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主体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我们正在询问的东西：我们暗示他们给出某些回答，也就是把只令我们而非他们感兴趣的区别和范畴，引入他们的体验。他们感兴趣的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事：言语幻觉那种奇异、强加和外在的性质。这包含某种极有意思的东西，但恰恰必须在关系本身中加以考察。

从患者的反应方式就能清楚看到：并不是在他听得最清楚的地方……

按照那种把“听见”理解为“用耳朵听见”的通常说法，

……他才受到最强烈的触动。

有些患者的某类幻觉看似极其鲜明，却始终只是幻觉；另一些患者的幻觉反而并不鲜明，极具内言语性质，但对主体却具有最为决定性的特征——他赋予它全部的确定性。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在我们开始谈论精神病时，我便引入了这项区分：确定性同现实性之间的区分。这里才是要点；它使我们进入这些现象内部的结构差异。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看出，对我们而言，这些差异绝不只是上层结构的差异。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中的确定性：现实性与“这涉及我”

奇怪的是，这一点似乎只对我们成立。然而，在临床工作者中有一个事实：只有对我们而言，言说才具有极端的分量和重要性。因为同其他临床工作者不同，我们知道，这份言说始终在那里，无论它有没有被说出；它以已经分节的状态在场并进行记录，也就是已经得到历史化、已经被纳入成对关系与象征对立的网络。

主体那未经区分的全部体验——我指主体体验的一连串过程，它们仿佛投射在银幕上的图像；按照柏格森的看法，必须把它们完全恢复，才能在主体的绵延中把握和理解主体。很清楚，我们在临床上触及的从来不是这样的东西。通过一场无休止的分析，我们或许会发现，这种连续性仿佛铭刻在现象底部；但不幸的是，它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也从不趋向浮现：那就是一个主体自出生以来经历过的一切之连续体。

留下来的是象征分节视角下的决定性时刻，是“历史”意义上的决定性时刻——就像你们说“法国史”时的“历史”：某一天，蒙庞西耶小姐站在街垒上。她或许偶然在那里，从某种视角看或许无关紧要；但可以确定的是，历史中留下的只有这一点：她在那里，而且人们赋予了它一种意义。这个意义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在当时，它总有几分真实；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后来在历史中成为的那份真实。不过，它毕竟必须从某处产生：要么来自后来的一次重构，要么在事件发生当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一点分节的轮廓。

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恢复记忆时，我们所谓现实感是一种歧义性的东西。它根本取决于一项回忆——也就是某个印象的再次涌现——能否被组织进历史连续性。赋予它现实基调的既不是这一方，也不是另一方，而是两者：两个层面的某种结合方式也会产生非

现实感。因为在情感层面，现实感同非现实感只有毫厘之差；非现实感其实只是一项信号，表示主体正处在现实中，却还缺少一点东西。换句话说，曾给心理学家制造如此多难题的“似曾相识”感，可以被我们称作一种同名现象。

其机关总是在象征调性中半开。某种东西带着充足的象征意指被体验；它重现了一个主体过去经历、后来遗忘的同构象征情境。这个情境因此再度活起来，主体却不理解它的来龙去脉，于是感觉眼前的语境、当下的场景仿佛已经见过。“似曾相识”极其接近分析经验在“已经讲过”这一层面带给我们的东西，区别在于它恰好是反面：它并不处在“已经讲过”的秩序，而是在从未讲过的秩序中；不过，两者属于同一个层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所分节的无意识之存在，就必须假定：这句永久存在的象征语句、这项以自身织网覆盖全部人类体验的象征建构，始终在那里，或多或少处于潜伏状态；它仿佛是人类适应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只不过人们不加思索地让它通过。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本可以把这称作荒谬绝伦；然而，只有对我们来说，它不可能是荒谬，因为“无意识思想”这个观念本身——弗洛伊德带来的伟大而具体、实践性的悖论——所意味的正是这一点，并无别的意思。

当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思想”这个说法时……

他还在《梦的解析》中加上 sit venia verbo（姑且容我这样用词），使这句致歉本身同所用的词发生矛盾，

……他表达的无非是：“思想”意味着“在语言中得到分节的事物”。在《梦的解析》的层面，这个词不包含别的问题。而这套我们或许可以称作“内在的”语言……

不要让我说出我没有说的话；我只是为了使你们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内在”这个词恰恰已经歪曲了一切——

……这种内在独白同外部对话处在完全的连续性中；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说，无意识也是大他者的话语。

不过，毕竟存在某种属于这个秩序的东西，也就是某种连续的东西；但它并非发生在每一个时刻……

这里也必须开始准确说出自己的意思，

沿着所走方向推进，同时懂得修正它——

……也就是说，它恰恰并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里存在间隔、悬置、切分和严格象征性解决的法则；这些悬置和切分标记着一切计算的结构，也使我们所谓的“内在语句”恰恰不是以连续方式铭刻下来。

这是由于一种已经同日常可能性紧密相连的结构，也就是语言本身的结构或惰性。对人来说，问题恰恰是怎样应付这种连续调制，使它不至于过分占据自己。正因如此，事情才以某种方式安排起来，让意识转离它。不过，既然我们承认无意识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即使意识已经转开，我所说的这份调制、这句具有全部复杂性的“内在语句”，仍然继续进行。除此之外，不可能赋予无意识任何别的意义。

如果无意识不是这个，它就是一头绝对无法理解的六脚怪物；至少从分析视角看，完全不可理解。当然，我们说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既然人们正在寻找自我本身的功能，那么自我的一项工作，恰恰就是不让自己被这句不断流通、占据我们的“语句”毒害；这句话始终等待着回答，并要以千百种或多或少经过伪装、令人不安的形式重新涌现。换句话说，《福音书》中的句子——“他们有耳，却不听见……”——必须按字面理解。

我们不必持续听见那种已经得到分节、把我们的行动本身组织为“被言说的行动”的东西，这正是自我的一项功能。这个结论并非来自精神病分析；它只是再一次突出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各项预设。不过，当我们面对精神病中这些暂且称作畸形学的现象，并看到这一切公开运作时，事情毕竟变得很有意思。这里确实发生了某种东西；但我不能反过来又把它当作核心和本质现象，正如我刚才不接受把想象要素当作核心与本质现象一样。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这里有一种被遗忘的现象：在精神病个案中，我刚才所谓“独白”、“语句”、“内在话语”的显露、涌出和启示具有何等重要性。我并不想引入新词；最好只是让你们勾勒出研究方向。重要的是，在精神病中，我们以最明确、最得到分节的形式，恰好看见了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我们之所以最先有能力看见，正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准备好听见它；既然如此，当主体见证它是自身体验文本的一部分时，我们便没有理由拒绝承认。

［朗读《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第248页：“那些声音在我身上显现［……］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

这是他在正文附录中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它不在主体正文中，却具有极重要的回顾性见证价值。这里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多年来，这句“语句”逐渐变慢——我们还要看这种减慢意味着什么。施雷伯通过距离拉大的隐喻赋予它一种意义：上帝的射线退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对他而言，这足以解释减慢；更准确地说，足以解释这些句子到达他时所采取样式中的延迟和推后。不只有减慢；我已经告诉你们，还有延迟和悬置。施雷伯特别强调了以悬置应对延迟的方式。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里已经提出了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吗？

这套话语在多年间延续、呈现并演变的现象学本身，经历了从最初意义极其充实，到一些要素变得不可感、意义被抽空的过程。那些声音还作出极其古怪的评论。例如，有一句常被译作“一切无意义都会自行取消”；这个译法并不坏，不过可以肯定，无意义在这里取得了全部分量。仅就这些话语而言，它们所具有的悬置性质——也就是这份话语、这张连续织网——逐渐成为我们这位主体疾病的永久伴奏；它从他进入皮尔纳索嫩施泰因疗养院后的最初几个月开始。

这里发生之事的结构不应被我们忽视。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其中一句话这样开头：“我们现在缺少……”随后便停在那里；按照他的见证，他没有再听见任何东西。不过，这样一句中断的话对他具有如下隐含意义：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我们缺少——说话的是那些声音——主导思想……”

在这种语法上始终得到细致分节的断句中，意指以双重方式在场：一方面，它作为期待中的东西在场，因为这里存在悬置；另一方面，它

又作为重复的东西在场，因为施雷伯总是把它同“自己已经听过这句话”的感觉联系起来。你们会对我说：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 “好吧，这很不错；不过，哪怕我们假定一句话是完整的，像‘我缺少主导思想……’这样的表达，
>
> 难道不比一个句子更有力量、更是一开始就已经取得的东西吗？”

很清楚，从我们进入语言分析的那一刻起，也应当关注语言的历史，并认识到语言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自然。那些在我们看来不言自明的表达，也必须按其成立程度的不同分出层次。

占据他的那些声音所形成的连续话语是心理学式的：他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他所谓“灵魂观念”，也就是这些声音拥有一整套心理理论。我必须说，我们差不多可以［在那里找到？］人们通常会称作把人的心理学投射出去的一切：这些声音带来各种思想层面的目录——一切思想之思想、肯定的思想、反思的思想、恐惧的思想；

- 它们把这些思想逐一标明；
- 把它们逐一分节出来；
- 尤其还会说明哪些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乎规范的。

它们可以说有自己的心理学和灵魂观念，甚至还要再走一步：它们拥有关于行为模式的观念，走到了行为主义理论的最前沿。大西洋彼岸的这套理论正试图向每个人说明：

- 应当怎样向一位姑娘献上一束花；
- 怎样做才合乎规范。

这些声音对男女应当怎样彼此接近、甚至怎样躺上床，也有明确观念。施雷伯对此略感惊讶："事情就是这样，"他说，"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文本本身被缩减为这些纯形式的句子，也就是缩减为机械灌输或叠句；它们有时甚至让我们觉得颇为难堪。

这恰好使我们能够提出一类问题。我记得，阅读索迈兹先生约在1660—1670年间编写的《风雅才女大词典》[注1]时，有一件事曾给我很深印象。当然，那些风雅才女是可笑的；不过，所谓"风雅才女派"运动对于语言史、思想史和风俗史的重要性，至少不亚于我们亲爱的超现实主义。大家毕竟知道，超现实主义并非无足轻重：如果1920年前后没有出现一群以奇特方式操弄符号和标记的人，我们今天看到的海报肯定不会是同一种样子。

> [注1] 安托万·博多，索迈兹领主：《风雅才女大词典，或闺房语言之钥》（1660）。

从语言角度说，"风雅才女派"运动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重要。当然，天才莫里哀围绕它讲过许多东西；不过，在"风雅才女"这个题目上，他大概也让它说出了比自己原本想说的更多的东西。

例如，阅读这本小词典时，你们会学到一件事：如今看起来完全自然的说法，其数量之多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其中有一句尤其醒目；今天听来不言自明，在当时却极其惊人，也就是说，它很难进入人们的脑袋。索迈兹先生把它记了下来，还告诉我们是谁发明了它：诗人圣阿芒第一个说出“我找不到那个词”。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把扶手椅称作“谈话的便利设施”，纯属偶然：有些说法成功了，另一些没有成功。人们本来完全可以像说“我找不到那个词”一样，把扶手椅称作“谈话的便利设施”。那不过是出自沙龙的一种言谈转折；人们当时试图在那里创造稍微精致一些的语言。一种语言的状态，既由其中缺少的东西、也由其中在场的东西来刻画。同样，当你们在那些著名“奇迹之鸟”的对话中遇到这类东西——可以随便怎样同它们说话；比如对它们说“需要空气”，它们却听成“暮色”——也会看到这种古怪之处。

这毕竟很有意思，因为实际上，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从未听过有人在一种并不特别通俗的说话方式中，经常把 amnistie（大赦）和 armistice（停战）混为一谈？

再比如，如果我依次问你们每一个人，怎样理解“superstition（迷信）”，我敢肯定，我们会得到一幅相当精彩的图景，看到这个被你们日常使用的词在你们头脑中何等含混。过一会儿，superstructure（上层结构）一词大概也会冒出来！“伴随现象”在医学中同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意义。拉埃内克把所有疾病共有的现象，例如发热，称作“伴随现象”。

西塞罗告诉了我们“迷信”一词的起源。你们最好读一读西塞罗，因为能从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例如，你们会衡量出：古人围绕诸神本性提出的问题，同我们的问题之间既有距离，也有接近；甚至在眼前这个确实涉及诸神的个案中，这些问题也会引出表达问题。

西塞罗在《论诸神的本性》中告诉我们“迷信”意味着什么：所谓迷信者，即 superstitiosi，是那些整日祈祷、举行祭祀，好让后代能够比自己活得更久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把虔敬全部据为一种服务于某个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在他们看来必定十分根本。

这使我们对古人如何理解血脉延续有所认识；这项观念在一切原始文化中都极为重要。了解这条语源参照同样十分重要，它或许能让我们最好地把握应当怎样真正定义迷信：

• 它恰恰是对一整篇文本中某个部分的突出、抽取；

是以牺牲其他行为为代价，突出其中一种行为；

• 也就是它同一切局部形成物的关系，同一切……

严格说来属于神经症机制中的系统性移置的关系。

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所说的话；要理解它，就必须看见其中的衬里、回响和彼此叠加的意指。无论这些叠加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承认其中存在种种误解，因为误解从来不会偶然形成。对思考语言有机体的人而言，关键是尽可能知道得多；也就是说，要围绕一个词、一种转折或

一个固定说法，建立尽可能完整的资料卡。因为很清楚，语言完全在歧义中运作：

- 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
- 也就是说，在最日常的交谈中，语言只具有一种纯粹虚构的价值；你们只是让对方感觉，你们确实始终在那里；
- 也就是说，你们能够给出别人期待的回答，而这个回答同任何可以深入探究的东西毫无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说出的语言和话语，有十分之九都是彻底虚构的话语。

# 第10课 · 1956年2月1日

我提醒你们：谈到施雷伯使用的一个表达——那些声音告诉他，它们缺少某种东西——时，我曾指出，这类说法并不那么不言自明。我们能够在语言史中看见它们的诞生得到精确记载；而且，创造发生时的层次已经相当高，以至于它恰好出现在一个关心表达问题的圈子中。如今，这些表达在我们看来仿佛从能指的既定排列中自然流出；然而，它们确实都有经过历史验证的生成。

我说过，如今听来如此自然的“我找不到那个词”，在索迈兹的记录中出自“风雅才女们的闺房沙龙”。这句话在当时被视为如此非凡，以至

于作者专门记下它的出现，并把它归于圣阿芒。我同时还告诉你们，我在那里另找到了将近一百个——还不到一百个——这样的表达：

- “C’est la plus naturelle des femmes.（她是女人中最自然的一位。）”
- “Il est brouillé avec un tel.（他同某某闹翻了。）”
- “Il a le sens droit.（他的判断很正。）”
- “Tour de visage, tour d’esprit.（面容的转折，心智的转折。）”
- “Je me connais un peu en gens.（我多少懂得识人。）”
- “C’est un coup sûr.（这是十拿九稳的一着。）”
- “Jouer à coup sûr.（稳操胜券地行事。）”
- “Il agit sans façon.（他行事不拘礼数。）”
- “Il m’a fait mille amitiés.（他对我百般亲热。）”
- “Cela est assez de mon goût.（这颇合我的口味。）”
- “Il n’entre dans aucun détail.（他不涉及任何细节。）”
- “Il s’est embarqué en une mauvaise affaire.（他卷进了一桩坏事。）”
- “Il pousse les gens à bout.（他把人逼到极限。）”
- “Sacrifier ses amis.（牺牲自己的朋友。）”

- “Cela est fort.（这可真够厉害。）”
- “Faire des avances.（主动示好。）”
- “Faire figure dans le monde.（在社交界崭露头角。）”

这一切在你们听来，都是最自然、最不言自明的表达；然而，索迈兹和1663年贝里所著的修辞学都把它们记作风雅才女圈子创造的说法。这足以告诉你们：一个固定说法后来成为日常用语，并不意味着它原本就不言自明、只是依照对实在的简单把握塑造而成；千万不要对此抱有幻觉。

事实远非如此：

- 这些表达都或多或少预设了漫长的建构过程，其中卷入了各种含意，以及各种缩减实在的可能方式；
- 它们仿佛还预设了某种可以称作形而上学的进展：人们以特定方式运用某些能指，并据此行动；这又预设了各种各样的前提。“我找不到那个词”这一句话，本身便预设了许多东西；首先，它预设那个词就在那里。

今天，我们将继续上次的讨论，并按照已经确立的方法原则，试着更深入地进入施雷伯主席的妄想。要向前推进，我们将抓住文献——反正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我已经提醒你们，这份文献写于一个特定时间；那时，他的精神病已经发展到相当晚期，使他能够表述自己的妄想。

对此，我理所当然要有所保留。我们能够假定为更原始、更早、更源初的东西，当然会从手中溜走：精神病的原发期或丰产期中，那种著名、不可言说而无法传达的“体验”，足以让我们自由地对它着迷，也就是觉得自己错过了最精彩的东西。可是，认为自己错过了某物最精彩的部分，通常只是让人转开眼睛，不去考察手中现有、也许很值得考察的东西。

归根结底，只要我们不能确定终末状态必然代表某种价值减损，它为什么就会比初始状态少一些教益？

简言之，只要我们确立了这样一项原则：在无意识问题上，主体同象征界的关系具有根本地位，事情就不同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接受许多体系中隐含的想法：主体最终放进词语中的东西，只是对某种不可化约的体验所作的不恰当建构，而且注定扭曲；仿佛那份体验本身才是现实，主体必须让话语去适应它。这正是布隆代尔《病态意识》一书底部的假设；我有时用它作为你们的一个良好参照。布隆代尔把这一点展示得很清楚。

按照这种看法，精神病者和妄想者的体验中存在某种绝对原创、不可化约的东西；因此，他给我们的内容只能欺骗我们。于是，我们只好放弃进入这份不可穿透的体验。不幸的是，这还是我们时代思想中一项隐含的心理学预设：人们对“理智化”一词既日常又滥用的做法，所代表的正是这一点。

在理智化之外，仿佛总有一种不可化约的东西；尤其对某类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智力按定义注定会错过它。柏格森为建立这套立场出了很大力，而我们无疑都对此怀有成见——一种危险的成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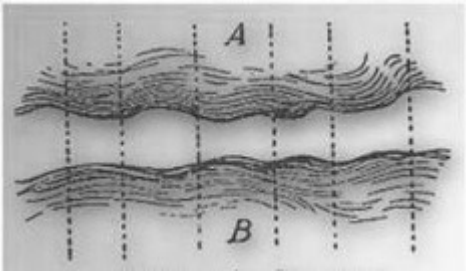
事实上，二者必居其一：

- 要么妄想——也就是精神病——根本不属于我们分析家的领域，也就是说，它同所谓无意识毫无关系；

- 要么，无意识就是我们近几年认为可以建构、并且已经共同建构出来的东西：无意识从根本上由语言构成结构、织成网络并连缀为链。也就是说，能指不仅同所指发挥同样重大的作用，而且发挥着根本作用。因为语言的特征就在于能指系统本身，以及它提出各种问题的复杂运作；

我们只停留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这里讲的不是一门语言学课程。

不过，你们从此前的讨论中已经瞥见足够多，知道能指与所指之间远不是集合论所谓的一一对应关系。所指也不是未经加工的事物，仿佛这些事物已经按照一种向意指开放的秩序被交给我们。意指就是始终指向另一项意指的人类话语。在著名的语言学课程中，索绪尔先生用一股流来表示话语；而在图式上方，他又画出另一股流：那就是话语的意指，只要它从一端到另一端支撑着整套话语。




这就是话语，是我们听见的东西。这个图式确实向我们表明，把一句话切分成不同要素时，已经包含一定程度的任意性。切分并不容易；

当然存在词这样的单位，可仔细考察时，它们也没有那么统一。不过，这一点暂且无关紧要；索绪尔就是这样表示的。

图式唯一的典型之处，在于他认为：使能指得到切分的，是两股流之间的某种相关性；也就是在某个时刻，人们能够同时切分能指和所指，引入一个同时构成停顿和单位的东西。这个图式本身可以讨论，因为相对于语言系统总体的全部材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历时方向上：

- 也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滑移；
- 也就是说，不断演变的人类意指系统时时发生移置，并改变能指的内容；
- 也就是说，能指会取得不同用法。

我刚才举的例子，目的无非是让你们感觉到这一点：在相同能指之下，各个时代都会发生这种意指滑移；它们证明，我们无法在两个系统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对我们而言关键在这里：能指系统——也就是一门具有若干可辨认单位的语言之存在——具有一些使每种语言各具特性的特殊性质。正因为这些性质：

- 并非任何音节都能同任何其他音节等价；
- 事情并不相同：某些音节在某一种语言中不可能出现；词的用法也各不相同，换言之，它们组成的固定说法各不相同。

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存在，并从一开始便制约着无意识中发生的一切，直达其最原初的织网。我不时用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无意识确如弗洛伊德所描绘的那样，那么一个双关语本身就可以成为支撑某个症状的关键铰钉；而在另一个语言系统、甚至一门邻近语言中，这个双关语可能根本不存在。当然，这只是特别突出某种根本事实的一个特例。

这不是说，症状总是建立在某一个能指本身的存在上；它建立在整体同整体——更准确地说，完整系统同完整系统、一个能指宇宙同另一个能指宇宙——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症状始终包含这项根本关系；这一点如此彻底地属于弗洛伊德学说，以至于“多重决定”一词及弗洛伊德提出的那项必要条件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要有症状，至少必须存在双重性。

也就是说，至少必须卷入两场冲突：一场当前的，一场过去的。它不表示别的东西。事实上，如果没有能指与所指的根本双重性……

无意识中保存的材料同旧有冲突相连，并在那里作为潜在的能指、虚拟的能指而继续存在；它被当前冲突的所指重新捕获，为这场冲突充当语言，也就是充当症状——

……我们就无法设想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决定论。

因此，当我们带着“妄想可以在精神分析层面得到理解”的想法接近妄想时……

也就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发现，以及这项发现使我们能够用来思考这些症状的方式，

……你们便会看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以下东西排斥为……

- 无效的内容；
- 纯粹言语妥协的产物，或者换一种仍会使用的说法，次级制作物：也就是妄想在终末状态呈现自身的方式。施雷伯经历数年极端痛苦的考验以后，向我们说明他的世界体系；当然，他不可能始终提供一份在我们看来完全经得起批评的体验报告，但这并不使终末妄想失去价值。

当然，我们也懂得分析和识别这种事实：随着偏执狂患者的妄想发展，他会回溯性地重新投射、重新思考自己的过去，甚至在极早的年月中寻找自己所遭受迫害和阴谋的起源。有时，他很难为某个事件确定位置；我们能够清楚感觉到，他倾向于通过某种镜像游戏的重复使事件更新，并把它重新投射到一段本身日益不确定的过去——正如他所写，一段永恒返回的过去。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施雷伯这样的著作中，主体大致能够还原某些事情。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主体在妄想体系当前的展开中抵达了什么、施雷伯主席用怎样的能指组织铺陈出如此浩大的著作，对我们仍保有完整价值。因为我们假定，从妄想开端到终点，各能指要素之间始终存在深刻而连续的连带关系。这是某种……

不仅完全可以设想，而且从此以后完全合乎逻辑的东西。

……妄想最终编排中的某种东西，仍向我们充分指示着开端时已经参与其中的原初要素。

无论如何，我们完全有理由尝试这项研究。对妄想本身的分析，或许能够把主体同某个界域的根本关系交给我们；无意识的一切表现一旦发生，都在这个界域中得到组织和展开。

甚至，当我们看见主体的演变抵达某一程度时，或许还能以某种方式认识到：即使不是精神病的最终机制，至少也是精神病的演变相对于主体最一般关系所包含的东西。这项一般关系所指向的，是构成人类现实的那个秩序——象征界本身。

换句话说，也许我们能够在演变中切身把握：相对于象征秩序，主体在精神病的发展过程中——从起源时刻，经过不同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只要精神病确有一个终末阶段——是怎样相对于这整套象征秩序定位自身的。这套秩序：

- 被视为原初秩序；
- 被视为有别于实在环境的独特环境；
- 被视为人始终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环境，而且从根本上有别于实在界和想象界的秩序。

由此出发，我们便能脚踏实地、以我所谓最大的严肃态度，处理主体妄想的细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追问它意味着什么，不能预先这样想：既然主体当然是妄想者，他的体系当然不协调、无法应用——这确实是鉴别特征之一：它无法应用到其同类社会所交流的内容中——因此它“荒谬”，正如人们所说，甚至还十分麻烦。

即便精神科医生，面对一个开始向他讲述五花八门事情的主体，第一反应也是如此。听一个人如此斩钉截铁地断言自己的体验，而且这些断言同我们习惯接受的正常因果秩序相反，确实十分令人不快。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进行的询问，往往只是想“把小木栓塞回小孔里”。贝玑在其晚期著作中谈到自己承担的经验时，曾这样描述那些人：大灾难已经宣告，他们却仍想让事物保有同此前一样的关系；他们始终要把小木栓留在原来的小孔中。

询问精神病患者时，有一种推进方式正是这样：“先生，请按顺序说……”他们对患者这样讲，而章节早已替他划分完毕。精神科医生反倒常常应该从整体概念出发：妄想同其他事物一样，首先要作为一个组织了某些能指的意指场来判断。因此，良好问诊、良好检查和良好精神病调查的第一条规则，或许应当是尽可能长时间地让患者说话；随后再形成判断。

不过，在你们刚才从黑板上看见、如今已经擦掉的那部精神病学漂亮历史及其层层划分中，人们似乎并没有以别的方式处理事情——历来都是这样处理的。我不是说，临床工作者的观察始终如此；他们对事情的整体把握有时相当不错。不过，初级现象概念，以及对幻觉、注意紊乱、知觉紊乱和这些现象在各种官能秩序中不同大层次的区分，无疑都使我们同妄想者的关系变得更加晦暗。

施雷伯之所以获准一直说下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没有人对他说什么。他有充分时间写下那本巨著，而这使我们能够按照刚才所说的方法提出问题。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我读了一段文字，其中已经出现了我们所谓无意义同那些声音之活动的结合与对立。为了进

入问题，我把那称作声音的主流；这些声音来自他所谓“上帝诸王国”的不同实体。

他在其中引入了各种区分。随着我们的推进，你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话语施动者的这种复数性，本身就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主体并没有把它理解为自主的复数。文本中有些地方极美：他用某种［……］谈论这些声音的不同角色，使我们感觉到它们同神圣根底的关系。我们不能因此滑向“它们从那里流溢出来”的说法，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已经开始自行建构。必须跟随主体的语言：他没有说“流溢”。

我手中这册书的页边留有某个人写下的批注。此人大概自以为学识渊博，因为他在施雷伯的“行列”一词旁写了这样那样的解释；他无疑从远处听说过普罗提诺。但我想，“流出”才是严格的新柏拉图主义术语，用来解释灵魂同诺斯替主义之上帝的关系。面对这种仓促理解，我们仍应稍加谨慎。我不认为这里涉及类似“流出”的东西；而要让我写下这类注释，至少应先真正理解普罗提诺的流出说，可那显然超出了这位批注者的知识范围。

这个［……］及其不同支撑，主体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其特征是一种不连续的话语。在我读给你们的段落中，主体反复强调：这套话语发出的声音极轻，以至于他称之为“耳语”。不过，它又时时在那里。主体能够用自己的活动和言谈把它盖过去——这正是他的说法——但它随时准备以同一种声响重新出现或继续响起，仿佛某种东西插在他的句子中间。上次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好吧，让我们回到这里，问一问这究竟是什么话语。当然，这不只是一种假设状态；即便按照今天常说的做法，把它当作出发原则或工作假设，我们也不妨先提出：对主体而言，它并非不可能已经被赋予声音。

这已经说了很多，甚至可能说得太多；不过，眼下暂且保留它。

对主体而言，这同我们假定的连续话语有关；这套话语为每个主体逐刻记录其行为，仿佛为主体的生命配上一条复线。我们之所以必须接受这个假设，不仅是因为刚才已经假定无意识具有这样的结构和织网；而且有充分理由、甚至某些可能途径，使我们能够在最直接的经验中把握它。

不久以前，有人向我讲过这样一次经历：一个人突然面对汽车或摩托车即将从身上碾过的威胁；一切都让人想到，他作出了躲开的正确动作。不过，最有意思、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颅脑创伤”这个词突然以孤立形式涌现出来，可以说在“心里”被发出了声音。

严格说来，这项运作显然不属于为避免相遇和碰撞、从而躲过颅脑创伤而形成的那条良好反射链。这个言语化同情境略有距离；而且，它还预设这个人具有各种特殊决定因素，使颅脑创伤对他而言格外可怕，或也许只是对他格外有意义。

不过，我们在这里清楚看到那套随时准备浮现的话语怎样潜伏。它确实会在自身层面上介入，相对于主体整体行为的乐曲占据另一音域，并在这一刻发出声音。主体所面对、在他向我们谈及的疾病阶段呈现给他的这套话语，正处在这种占据支配地位的 Unsinn（无意义）之中。

不过，这个 Unsinn 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无意义，不是我们可以设想为主体只是被动承受的东西。写下它的主体确实把它描绘成自己所承受之物；然而，在这个 Unsinn 层面上说话的东西——上帝——又以完全清楚的方式显现自身。

上一次我已经提醒并向你们展示这一点；我给出了这套荒谬话语、也就是 Unsinn 中的一句话。说话的主体……

同写作并向我们倾诉的主体并非毫无关系；我们很清楚这一点，

否则便不会称他为疯子——

……这个说话的主体会说出如下话语：

“一切无意义都会被扬起、被取消、被转置……”

这里的 Aufheben 是一个意义极其丰富复杂的词：某种东西在其中得到建构、受到反驳，也发生转化。这显然标志着这套 Unsinn 特有的卷入、探索和求助。主体把这个断言交给我们，说它相对于自己听见的一切，都是其永久对话者向他发出的致辞、向他传来的话。

因此，我们很清楚，这种无意义绝不是康德分析负值时所谓的[注1]单纯缺少意义、单纯的匮缺。它是一种极其积极的 Unsinn，一种组织严密的 Unsinn：各种矛盾在其中得到分节。当然，我们这位主体的妄想之全部意义和丰富性恰好就在这里；施雷伯传给我们的这套话语、这部妄想小说之所以令人着迷，正因为妄想中的要素彼此对立、彼此组合、持续推进并得到分节。

[注1] 伊曼努尔·康德：《试论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巴黎：Vrin，1972。

这套 Unsinn 是相对于某种东西的无意义——我们还要看它相对于什么——却远非独力组成一段空无意义的话语；它绝不是一种匮缺。为了继续前进并开始分析其中的意义，我们要考虑从哪一端着手。可以有不同起点。例如，我可以继续强调这套话语的文本、其中的问题和回答。因为我刚才告诉你们，说话主体的某种反思层次在声音中得到分节；它在话语本身中完全可以辨认，而且报告这些事情的主体也把它当作具有意指的东西。

不过，这会把我们带进极端复杂之中，还会预设一套已经预先决定的意义组织系统。这样做并非不可能；而且，我已经开始进入这条道路——

上一次，我强调了意义悬置这一现象何等能说明问题：那些声音在自身节律中让人等待，甚至不把句子说完。这是一种特殊的意指唤起方式，无疑为我们保留了把它理解为一种结构的可能性。[注]

> [注] 斯塔费拉逐字稿保留“声音按其节律让人等待，甚至不把句子说完”；米勒定本第139页压缩为“声音不把句子说完”。两版都把 suspension du sens 指向未完成句造成的意义悬置，本译保留逐字稿较完整的信息。

我无须提醒你们，我们谈到演示会上见过的那位女患者之幻觉时，我曾说过什么。就在她听见别人对她说“母猪！”的同时，她在牙缝里嘟囔：“我刚从肉铺回来。”

你们还记得，我曾赋予这道暗示性的声音、这种对主体的间接指向何等重要性；我们在这里再次遇到了它。我们当时已经能够从中瞥见某种非常接近以下关系图式的东西：

- 具体说话、支撑话语的主体；
- 以及无意识主体。后者逐字存在于这段幻觉话语及其结构本身之中，并且正是它受到根本指向。我们不能把它称作一个彼岸，因为大他者恰恰在妄想中缺失；不妨说，它是一个此岸，一种内在的彼岸。

我认为，这样做已经在引入一些假设和图式；如果我们要完全严谨地推进，也许引入得太快了。相对于材料，这些图式很可能会被视为先入之见。妄想内容中还有足够多更容易接近的材料，使我们或许能够换一种方式、不慌不忙地推进。事实上，问题恰恰就在于不慌不忙。愿意花时间本身，已经表明一种善意态度；我在这里坚持认为，要进入妄想结构，这种态度不可或缺。

我会说，从一开始就立刻把妄想放进精神病学的括号，正是我刚才所指的误解之源；人们迄今始终停留在这种误解中。只要一开始便断定它是一种异常现象，就注定无法理解它。而且，当人们进入施雷伯主席的妄想这样诱人的事物时，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强大理由。人们会直截了当地问：

“你难道不会偶尔害怕自己发疯吗？”

这确实是真的！天知道，我们认识的某些好老师正可能有这种感觉：如果认真对待“这些整天对你胡言乱语的家伙”所说的如此古怪之事，一直听下去，会把自己带到哪里？

我们精神分析家对于自身良好平衡，并没有每个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牢靠信念，因此不至于无法理解这里的最终机关：正常主体从根本上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不认真对待自身内在话语中的大部分内容。

请在正常主体身上、因而也在你们自己身上仔细观察这一点：有多少关键事物，你们的根本工作恰恰是对它一无所知。这也许正是你们同精神失常者之间最初的差异。对许多人来说，即使没有明说，精神失常者也体现着这样一种终点：如果我们开始认真对待那些虽然只以问题形式在我们体内得到表述的东西，它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因此，让我们不必过分害怕，认真对待我们的主体——施雷伯主席。这里有一种奇特的“无意义”；它并非意义的匮缺，但我们还无法洞悉其目标、分节和终点。让我们试着从一个侧面接近眼前可见之物；我们并非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罗盘。

这里的条件尤其有利，也使这套妄想话语尤其便于把握。首先：它有对话者吗？确实有一个对话者；而且这将制约我们接近它的方式——这个对话者在根底上是唯一的。这个 Einheit（统一体），我承认，对哲学家来说颇为有趣。

在我们杂志《精神分析》创刊号中，你们会读到我翻译的那篇关于 λόγος［logos］的文章[注2]；文章把 λόγος 同赫拉克利特的 Εν［Hen，一］等同起来。我们现在恰恰在问：施雷伯的妄想是否可以被明确界

定为某种我暂不直接说明的东西——因为还须先勾勒其轮廓——即主体同语言整体本身的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样式。

> [注2] 《逻各斯》：拉康翻译的马丁·海德格尔文本，刊于《精神分析》1956年第1期，第59—79页。

其实，随手翻开开头几页，便已经能够看到这样的公式。这个主体面对语言世界，感觉自己仿佛不是其中那个向我们讲述的人；面对这套永久话语，他觉得自己已经异化。他在其中向我们表达出某种东西，显示以下两者之间已经存在根本关系：

- 在话语承担者那里，他感觉到一个统一体；
- 与此同时，在他说来承担话语各个部分的样式和次级施动者中，他又感觉到一种复数性。

不过，那个统一体确实在那里，具有根本地位并支配一切；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他把这个统一体称作上帝[注3]。到这里，我们认得路了：他说那是上帝。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让他使用这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词？

> [注3] 参见莱布尼茨《神义论》：“从上帝的最高完满性可以推出：他在创造宇宙时选择了最可能的方案，使其中具有最大的多样性与最严整的秩序……”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普遍性甚至构成上帝存在的一项证明；而我们从另一方面也知道，对我们大多数同时代人而言，要弄清这个词究竟包含什么，是何等困难。

……那么，妄想者谈到上帝时，我们为什么偏偏拒绝暂且信任他的说法？更何况，这里毕竟有一种极其醒目的东西，而他本人也强调其重要性。

他明确告诉我们：自己是启蒙运动的门徒，甚至是这个传统最后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成长于一个根本不谈这些事情的家庭，并把自己的阅读书目列给我们。他还把这一点当作自身体验严肃性的证据之一——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据，他还没有走到那么远。他并不讨论自己是否弄错，只是说：

> “这是一个如此发生的事实，而且我握有最直接的证据。只要‘上帝’这个词具有意义，那就只能是上帝。
>
> 但此前我从未认真对待‘上帝’这个词；从经历这些事情的那一刻起，
>
> 我才体验了上帝。”

这里并非经验担保上帝，而是上帝担保他的经验。既然他在向我们谈论上帝：

> “我必定是从某处取得这个词；既然我没有从童年成见的行囊里取得它，
>
> 我的经验就是未经沾染的。”

正是在这里，他引入了各种区分，而且区分得十分细致。他归根结底不仅是一位好见证人，没有滥用神学；还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我甚至要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古典精神科医生。我会给你们证据：在他的文本中，我会让你们看见一处对克雷佩林第六版著作的引文，他曾亲

手把它仔细读过。这使他能够作出十分精细的区分。例如，他会嘲笑克雷佩林的某些表达：像克雷佩林这样的人，竟把妄想者的体验具有高度说服力、周围人所说的一切完全无法削弱它，当作一件奇怪的事；这让他觉得很可笑。

> “请注意，”施雷伯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这里恰好可以看出，我并不是医生所说的那种妄想者，因为我完全能够让事情不仅接受周围人的说法，甚至接受常识的修正。
>
> 例如，我当然能很好地区分性质极不相同的现象。”施雷伯说，“有时，我会听见用铁链牵引前进的蒸汽船声；那会发出巨响。这些精神科医生声称在其中找到了解释，这一点完全有效。我的思想当然会以某种方式嵌入船链单调噪声的规律间隔，甚至嵌入火车的噪声。像所有人一样，当坐在列车车厢中时，我也会按照那种熟悉的噪声，为脑中盘旋的思想调制节奏。可是，它当然会取得很大重要性：在某一刻，我所体验的思想从中找到一种支撑，被赋予一种虚假的凸显。可是，我能够清楚地区分这些事情。这种现象我确实有；但我现在拥有、并向你们谈论的是那些声音。你们不可能拒绝承认这些声音的分量和意义；它们完全是另一回事，
>
> 我把它们本身区分得很清楚。”

在主体的这项分析中，我们有机会从内部批评某些关于解释或幻觉发生的理论。我举的这个例子近乎粗糙，但施雷伯的文本把它强调得十分清楚。还有其他例子；而在我们现在将要移动到的层面，我认为也能引入同样重要的区分。这位上帝已经向他显现。那么，上帝是什么？首先是“在场”。我认为，只要分析这份“在场”以及作为其功能的东

西，我们便能开始看见或认出某种东西。刚才谈到它时，我们已经遇见一种缺少修养的头脑常犯的混淆：把上帝在物质中的多重化身，同它在物质中的各种卷入混为一谈。

我们也会在精神病学这样全然不同的领域中看到人们这样做：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够类比病理层面与正常层面所发生之事的道路，人们便把一切混到一起。因此必须谨慎。首先，让我们注意一件事：要说明某种上帝观念毕竟位于一个可称作“天意的”层面，我根本无须远寻见证。

我并不是说，从神学角度看，这是接近问题的最佳方式。不过，我偶然翻开一本试图向我们谈论伊壁鸠鲁诸神的书。引入问题的作者——也许是从护教视角出发——先提出如下观察：

> “自从人们信仰诸神以来，便确信诸神支配人事；信仰的这两个面向彼此相连……信仰产生于一项反复千百次的观察：我们的多数行动达不到目标；构想得再好的计划同其实现之间，必然仍留有一道间隙；
>
> 于是，我们停留在不确定中，而不确定正是希望与恐惧之母。”

这段文字写得很好，出自费斯蒂吉耶神父[注4]。他文笔极佳，也是一位出色的古希腊专家。这篇导言谈诸神信仰的恒常性，其文体倾向也许受题目本身制约：整个伊壁鸠鲁主义恰恰围绕诸神在人事中的在场问题建立。否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把神圣假设如此片面地缩减为

天意功能——也就是认为我们的善意理应得到回报——实在颇为惊人。

> [注4] 安德烈-让·费斯蒂吉耶：《伊壁鸠鲁及其诸神》（1948），巴黎大学出版社，1996，Quadrige丛书。

有一件事格外醒目：这位主体同自己妄想中的上帝保持着恒常而永久的关系，其中没有一丝缺席的痕迹。标记一次缺席，当然没有标记一次“在场”那么重要和决定性；但我要说的是，在现象分析中，断言“没有某种东西”，始终值得怀疑。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掌握施雷伯主席妄想的更多细节，也许会有材料反驳这项缺席；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一次缺席的标记，对于定位一种结构也可能极其重要。

我们只须指出：至少，手中已经有一个起点，可以开始界定眼前究竟有什么在场。在这个层面，我们不必考虑任何类似内容，因为无论从神学上是否成立，我们都知道，“天意”和这个实施报偿的机关，对于无意识的运作及其浮现到意识层面何等关键。

主体从来都会表现出这个层面对他何等重要：好人应当遇到好事。但在这套妄想建构的一切时刻，这一层面却完全缺席；而这套妄想本质上明明具有神学内容，有一位神圣的对话者，其中却没有丝毫这样的痕迹。这样说看似不多，其实已经说了很多。至少，它提示我们：施雷伯个案中可以称作神圣情爱妄想的东西——为了简便暂且这样说——肯定不能立刻放在超我层面理解。

于是，这位上帝出现在这里。施雷伯同他有怎样的关系样式？我们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始终在说话的人。我甚至会说，他就是那个为了

什么也不说而一刻不停地说话的人。事情确实如此，以至于施雷伯用许多页讨论这位说话的上帝一刻不停地说话却什么也不说，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要稍微深入其中。

这位为了什么也不说而说话的上帝，毕竟同施雷伯有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远不只限于令人厌烦的说话功能。它们极其精确，其动机一刻也不能同上帝特有的在场样式、也就是言说样式分开。上帝一方面通过不同代表在那里不停闲聊，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暧昧的关系样式向施雷伯呈现；这两件事处在同一维度。

我认为，可以用我现在将给出的方式表述他们的根本关系，因为它仿佛从妄想开端起便已经在场。换句话说，我将告诉你们，同这份神圣在场的关系样式究竟是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便看到它得到记载，那时上帝尚未显露，而妄想已经具有极其明确的支撑：弗莱希希式的人物，开端时尤其是弗莱希希本人，也就是我谈过的第一位治疗者。我将使用的德语表达，正是主体用来表示自己同根本对话者之关系样式的表达。也正是借助它，我们将在这里——而且只是在弗洛伊德以后，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已经这样

做过——把妄想最初的对话者同最后的对话者连成一个连续体。我们承认这种连续性：

- 弗莱希希同后来所谓“受审灵魂”之间具有共同之处；
- 它们又同后来的“上帝诸王国”具有共同之处；诸王国还分成前部与后部、上部与下部，带着各种意指；
- 最后则是“最终的上帝”。施雷伯的位置完成某种夸大妄想式的安置时，一切似乎都归结在这里。

所涉及的表达如下：上帝、妄想中这个根本人物同主体的关系是——

- 要么是在事情最终抵达的状态中，上帝以同主体发生快感关系的方式在场；
- 要么是在开端那种带着爱欲色彩的迫近中，发生某种强奸，或出现专门针对其男性气质的威胁；弗洛伊德把全部重音放在这一点上，认为它处在妄想起源处。无论这场结合后来怎样发展，在开端，只要对方是弗莱希希或他所说的另一个灵魂，它便被看作彻底令人反感，并且在每一点上都可以同强奸相比；
- 要么是在结局中，出现某种快感的倾泻；据说上帝从中找到的满足，甚至远多于我们的主体。

开端时发生的是一种威胁；强奸中使人反感的正是这项威胁。到了结局、也到了实现阶段，主体体验到一种格外疼痛而艰难的事情：上帝或任何另一个人将要把他——法国译者颇有根据地译作“撇在一边”——就这样撇在一边。

这个译法并不坏，因为它包含各种带有女性情感色彩的回响。德语原词的强调弱得多，含义也比法语翻译暗示的“抛弃”宽广；它就是“让其躺在那里”。这个主题仿佛一条在场感极强的音乐主题，几乎像在某些文学或历史主题中反复遇见的红线。

在施雷伯妄想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撇在一边”的威胁始终返回，成为真正的关键要素。最初，它属于强奸者、迫害者的阴暗意图，却是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主体同自己遭受的全部异己现象之间有一种总体关系；它从根本上构成一项歧义关系：无论这些现象多么痛苦、沉重、烦扰而无法忍受，对主体而言，维持同它们的关系——更准确地说，维持同一种结构的关系——仍构成某种必要性；而它被消除、消失或断裂，则被主体理解为绝对无法忍受。

这种无法忍受最终具体化了。每当“liegen　lassen（撇在一边 / 让其躺着）”的初始状态出现，主体都会极其详尽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他同上帝在两个层面发生关系：一是听觉层面；二是与之重叠、更加神秘的“在场”关系。上帝的“在场”同各种歧义现象相连，但肯定也同他所谓“伙伴的至福”相连——而且伙伴的至福远多于他自己的至福。每当某种东西打断这份或强或弱的实现状态，神圣在场撤回时，主体内部便爆发各种撕裂和疼痛，达到不同程度的无法忍受；他向我们作了极为丰富的描述。

他所面对的这个人物极其罕见；而把他们之间这种如此特殊的关系作为整体来看，它又构成已经建立之关系样式的永久特征。那么，这个人物还以怎样的方式向他呈现？

主体还对一件事给出了极丰富而充分的说明：这个人物同他处在双重关系中，两重关系彼此分开、互有区别，却从不脱节——一重是某种对话，另一重是爱欲关系。这个人物还具有另一项特征。

这项特征恰好显现在他的要求中，尤其显现在他的对话要求中：他对严格属于人的东西什么也不懂。这一点在施雷伯笔下常常十分辛辣。上帝向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尤其诱使他给出问题中已经暗含的回答；但施雷伯绝不放任自己这样回答，因为他说：“人们给我设下的陷阱实在太蠢了。”

这确实是一项极具特征的根本内容。这位上帝——他告诉我们……

我甚至要说，他作出了各种颇为悦目而合理化的展开，

向我们同时表明其确定性的维度和说明方式——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设想，上帝竟然真的对人的需要一无所知？

他时时都在说：怎么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如果我暂时停止思考，进入那片虚无——神圣在场正等待它出现，好借机永远撤走——怎么可能因为我不再想某件事，就相信我已经变成十足的白痴，甚至重新落入虚无？我要让他看看。事实上，每当这种危险出现时，事情正是这样发生：我重新投入一项智力活动，显示自己的在场。

随后，他进一步阐述并评论：有过千百次经验以后，上帝怎么还会相信，只要我有一瞬松懈，目的就能实现？任何来自经验的东西，都完全教育不了这位上帝。上帝不能受教，经验无法使他改善；看到这一点十分有趣。施雷伯对此反复强调，而且展开的论述远不愚蠢。他提

出不同假设，甚至给出一些放进严格的神学讨论也不会显得突兀的论据。事实上，他从以下观念出发：

- 上帝既然完满，就不可能变得更加完满；
- 不可能变得更加完满的东西，无法再被改善；
- 因此，在神圣层面上，经验层次有所进步这个概念本身完全不可设想。

不过，他仍觉得这套论证有些诡辩，因为还留下一个不可化约的问题：我们设想的这份完满，面对人的事物却完全无能而闭塞；这毕竟形成了一处缺口。于是，他重新向我们说明上帝怎样什么也不懂，尤其明确指出：上帝只知道事物的表面。这同那位洞察肺腑、洞察人心的上帝恰好相反；他既不察肺腑，也不察人心，只看见眼前所见，只记下那些收到回执、被记录系统收集的事。被展示在外的内容始终会得到记录；至于内部，上帝什么也不懂。他之所以最后仍能重新找到某种东西，只是因为一切都铭刻在某处；一切经由总体化功能被重新找回。也就是说，到了最后……

内部的一切都会逐渐转到外部，

而且另一方面，也会被记在某处的一张张小卡片上；

……等总体化完成，上帝毕竟会对一切了如指掌。

同样，施雷伯解释得十分清楚：上帝显然不可能亲自关注诸如地球上蒸汽机的存在、火车头的运作这类偶然、琐碎的事。不过，他说，灵魂死后升往至福之境，还必须经历一段净化期；它们已经以话语形式

记录了这一切。上帝正是收集这些话语，因为那些灵魂会逐渐进入上帝怀中，并被他整合进去。

因此，上帝毕竟会对地球上的细小发明有所了解，从空竹一直到原子弹。这里写得很漂亮，因为这个体系既前后一致，又让人感觉它经由一种异常天真的进展被发现：某种东西所具有的能指后果不断建立和展开，并且贯穿发展的不同阶段，始终和谐而连续。

不过，真正严肃、足以向我们提示研究方向的是：问题从根本上在于主体同某种涉及语言、象征秩序及话语本身之整体运作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受到扰乱的关系。它包含的丰富内容，远多于我能向你们讲述的部分。

例如，其中有一段关于上帝同机会游戏之关系的讨论，精彩非凡：

“上帝能预知彩票将开出哪个号码吗？”

这个问题并不愚蠢。在座有些人对上帝抱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也完全可以提出同一问题。人们把各种小号码写在纸片上，再放进一个制作精良的大球里翻滚；这预设怎样的全知秩序？这里出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球内整体平衡得如此良好，以至于每个号码在实在层面严格等价；要说明神圣的预知怎样仍能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号码，就必须预设上帝同象征界有一种关系，而这个问题从未以其完整形态得到提出。

因为球的设计目的恰好就是：让不同号码从实在角度看毫无差别。于是，这便预设上帝进入了话语；彩票之间只剩下象征差异。这个问题可以看作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理论的一项延伸。

不过，对我们来说，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一切只是施雷伯从痛苦经历中得到的发现；而它还包含另一个问题：上帝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意图并不清楚。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看见一种妄想声音——也就是从某种原初经验中涌出的东西——怎样在主体身上带来这种灼热的语言强度。这表现为：他仍以敬意维护上帝的全知；同时，在某一层面上，他又不得不维护上帝的善意，因为这些属性对上帝而言实在过于实质性。

但他又不可能看不见——尤其在妄想初期，痛苦现象经由各种有害人物降临时——上帝本人曾允许这一切。上帝至今仍允许各种滥用。事实上，这些滥用又催生更大的滥用；到了最后，药物比疾病还要严酷。因为“神圣在场”同施雷伯本人卷入如此紧密的结合，最终竟依赖于自己的对象，而这个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施雷伯主席。归根结底，这里有某种东西逐渐在宇宙秩序中引入根本紊乱。关于他同世界的关系，文本中有些话极美；其中有一句尤其漂亮：

“请记住，一切使事物成为世界的东西，自身都包含一项矛盾。”

这是那些声音所说的话。它的美感和力度无需我再提醒你们。所涉及的上帝无疑采取着一种绝对无法接受的策略：一种半吊子的折中策略，也是一种半真半假的捉弄。施雷伯用了“背信”这个词，把“神圣背信”轻轻带过；随后又加注说明自己的意思。它同神圣在场之间的关系格外含混，而且必定会提出问题。

今天，我们把讨论限制在作为说话主体和根本对话者的上帝之关系上，因此就停在这里。下一步，你们将看到：只要分析这位神圣人格自身的结构，我们能够瞥见什么；换言之，要分析整套幻景同实在本

身的关系——至少到了妄想结局，主体仍时时维持实在的在场及其协调，而且这种关系样式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紊乱。我们将同时把握这里呈现的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再向前迈出一步。我希望，这将使我们发现妄想性对话本身的机制——也就是这位主体的结构与构成——究竟具有何种性质。

# 第11课 · 1956年2月8日

似乎有人认为，我上次引用施雷伯主席的一项观察并仿佛肯定其恰当性时，走得稍微快了一点。当时涉及的是上帝的全能与无所不在。我指出，对这个把上帝经验完全体验为话语的人而言，问题恰好出现在事件中最接近所谓符号之使用的接合点上；符号在这里同实在相对立，也就是涉及象征对立引入的一切。

换句话说，我曾短暂停留在一项事实上——确实说得很快，也许不够明确：恰好是这个问题阻住了患者的思考，十分值得注意。在他的层面和经验中，他觉得很难理解，上帝怎样能够——这是他选的例子——预知彩票将开出的号码。

当然，这项观察并不排除愿意回答他的人对这种异议提出任何批评。确实有人向我指出：这些号码还可以通过空间坐标加以区分；而当人们讨论个体化问题时，到了极限，这正是区分个体所依据的东西。

换言之，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两个归入同一类型、因而从某种视角看显得功能重复的个体？这同样是一种空间视角；而且，要提出这个问题，仍须确立本质优先的原则，用它来说明存在何以成立。

我只想指出：主体具有推理能力的部分，对某种必须加以区分的东西非常敏感。这东西不同于对话秩序——即他永久的内在对话；更准确地说，是一段被他体验为异己的话语，在自问自答之间形成某种摆动，并由此向他显现一份在场。当他向我们传达自身经验时，这一点

无可争议；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份经验在他那里产生了一种此前毫无准备的信仰。

而当他试图把握，怎样的现实秩序能够对应这份“在场”时……

对他而言，这份“在场”覆盖了宇宙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已经指出，他会区分上帝及其力量推进到的秩序，同它们止步的秩序——

……恰好是在这位对人一无所知的语言之上帝那里，只要事情得到言说……

他甚至告诉我们，人的内部、人的生命感乃至生命本身，对上帝来说都无法理解、无法穿透；只有当一切转化为一份无限记载以后，上帝才会收集并接纳它——

……然而，又恰好是在同一个人物那里……

这个推理能力很强的人，此刻面对一种对他具有全部现实特征的经验；而他始终能够区分那份无可争议的“在场”自身有效的分量——

……仍是这个人物，在推理未来事件时，引入了一项引人注目的区分。他恰好停在几个涉及人对语言进行人为操弄的例子上，并说：在这些地方，上帝无疑无须介入。这是一种偶然的未来；围绕它，人类自由以及上帝无法预知其后果的问题，确实可以提出。

这里确实涉及记写问题；正是对语言使用中几个在他看来显然截然不同的层面所作的区分，使这个问题涌现。对我们而言，唯一能使它真正具有意义的视角，在于象征区分具有根本的优先地位，也就是“正”

与“负”的象征对立：它们自身毫无重量。诚然，它们必须有物质支撑；但严格说来，除彼此对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区分它们。

因此，即使它们不能脱离物质支撑来设想，其中仍有某种东西逃脱了其他一切实在坐标，只服从偶然性中的等价法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建立一场象征性交替游戏，就必须同时假定：在实际效力上，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换句话说，我们预期“正”和“负”出现的机会相等——并非由于一条经验性的先行法则；游戏恰好在实现这项预先设定的条件时，才被视为公正。这条机会均等的标准，在严格意义上是一条先验法则。

因此，在这个层面，我们确实可以说——至少从知识论上把握象征界时——象征界在这里给出一条先验法则；按照自身定义，它甚至把一种运作方式引入实在，而这套方式逃脱了我们从事实和实在秩序出发所能形成的任何推导，无论我们怎样把这项推导分解以后重新组合。归根结底，如果我们继续进入这套妄想，当然不能只把它当作妄想来评论，只看它片面而封闭的特征。我们必须时时重新追问：妄想为什么令我们感兴趣？

我们必须重申，它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其中显现出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即使无须时时重新点燃这个问题，这仍是妄想最初、最突出的轮廓。

要理解这一点，只须把它同某些人经常而轻率地用来说明分析作用方式的公式并置：分析依靠“自我的健康部分”。难道还有比这里更清楚的例子，显示健康部分同异化部分在自我中形成鲜明对照吗？

毫无疑问，妄想——也就是历来经典地称为“部分妄想”的奇特现象——正是如此。还有什么比施雷伯主席的著作更醒目的例子？他以如此可交流、可感、动人，至少如此宽容的方式，陈述自己的世界观与经验；与此同时，他又以毫不逊色的断言力量，坚持那些完全无法接受的幻觉体验。

谁不知道——我要说，这是精神病学最初的事实——无论怎样依靠“自我的健康部分”，都无法使显然异化的部分后退一毫米？这是精神病学的首要事实。初学者正是通过放弃从这个所谓治疗点看到的全部希望，才开始认识疯狂本身的存在。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事情历来如此：人们只好诉诸其他或多或少神秘的力量，称之为情感性、想象或共同感觉，以解释为什么妄想抗拒一切推理式还原——尽管它呈现得分节如此完整，表面上又如此可以受话语一致性法则支配。

精神分析带来的是某种为精神病患者的妄想赋予特殊认可的东西：它在分析经验通常运作的同一层面，使妄想取得正当性；也就是说，它在精神病患者的话语中，重新找到自己通常作为无意识话语发现的东西。

不过，这并没有给经验带来成功。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这里涉及一段已经浮现到自我中的话语，因此无论以何种形式，它都在那里显现。即使我们承认，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颠倒，被放进 Verneinung（否定）的括号并标上否定符号，它仍然已经在那里得到分节；而且无论分节得多么完整，它都不可化约、无法操纵、无法治愈。

为了突出这里所涉及事物的独创性，我们可以说：归根结底，精神病患者是无意识的见证人，即使不是无意识的殉道者。这里的“殉道

者”[注1]取其“见证人”的原义；而且不止如此：他确实是在一份公开见证的意义上成为殉道者。

> [注1] “殉道者”借自教会拉丁语 martyr，源于希腊语 μάρτυς（属格 μάρτυρος），原义为“见证人”，后来专指“上帝的见证人、殉道者”（《法语宝库词典》）。

- 神经症患者也是无意识存在的见证人，但他是一位隐蔽的见证人；我们必须寻找他在见证什么，必须把它解码出来。

- 初看起来，精神病患者则是一位公开的见证人。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仿佛已经固定并凝止在一个位置：他无法真正恢复自己见证之物的意义，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见证同其他人的话语分享。

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使你们更切近地对它产生兴趣，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同构和移置——却不是人们通常进行的那一类——涉及怎样理解“隐蔽的话语或见证”同“公开的话语或见证”的对立。

通过下面的例子，你们会看见：话语的正常世界中已经存在某种不对称；它仿佛预先开启了神经症同精神病之对立所涉及的那种不对称。

我们生活在一个奴隶制已经废除——也就是不再得到承认——的社会。任何社会学家或哲学家都清楚，奴役并未因此消失；它甚至成了相当著名的诉求对象。不过，同样清楚的是：

- 如果奴役没有消失，那么可以说，它已经普遍化；

- 劳动世界中那些被称作剥削者的人，相对于整个经济同样处在仆役关系中，其程度不亚于普通人。

换句话说，主奴双重性在我们社会的每个参与者内部已经普遍化；所谓“意识的根本奴役”显而易见，足以使我们理解：意识的这种不幸状态，同一段秘密话语之间存在关系。正是这段话语引发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博爱讯息”。

某种新东西在世界中出现……

不只是随基督教一起出现；例如，斯多葛主义已经为它作了准备——

……简言之，在普遍化的奴役背后，有一段包含在新讯息中的秘密话语，一段仿佛处于被压抑状态的解放讯息。

这同我们所谓公开的自由话语之关系完全相同吗？当然不尽相同。不久以前，人们注意到单纯反抗这一事实，同社会行动的有效改造能力之间存在某种不和与对立。我甚至要说，全部现代革命都是在这项区分上建立起来的；人们发现：

- 自由话语按定义不仅无效，而且相对于自身目标和对象已经深度异化；
- 只要自由趋向推动社会中的某种持续运动，同自由话语相连的一切示范性姿态，严格说来都成为进步之敌。

尽管如此，自由话语仍在每个人的根底得到分节；它代表个人享有自主的某种权利，至少在某些可能性上，构成个人相对于一切主人——甚至也可以说，相对于一切上帝——的某种独立断言。

现代人至少需要一块领域才能在精神上呼吸，那就是他作为个人、作为存在所拥有的不可化约自主性。这个东西在每一点上都值得同一种

我们不妨称作“妄想的”话语相比。不是说它对现代个人在世界中的在场及其同类关系毫无作用；但如果要求每个人准确说清其份额，比如我问你们每一个人：在事物当前状态下，不可剥夺的自由究竟是哪一部分——

即使你们以“人权”、幸福权或千百种其他答案来回应，也不用走多远，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个人那里，它从根本上都是一段我会称作亲密而个人的话语，几乎不在任何一点上同邻人的话语相遇。简言之，一段永久的自由话语存在于现代个人内部；只要他试图把自己同他人的一致抽象地建立在这段话语上，就会时时面对一些严格说来令人泄气的问题：不仅无法同他人的话语协调，也无法同他人的行为协调。

而且，每一刻发生的远不只是让这段话语同每个人实际带来的内容、同现实中行动的要求和必要性彼此折中。我们的处境更接近妄想者的顺从态度：他不得不承认外部现实始终存在。我们的患者施雷伯在某一时刻也是如此。他很难说明这份现实为什么仍在那里，却必须承认实在确实始终在那里；必须承认没有什么发生明显改变或衰老。对他而言，这正是最奇怪之处，因为它的确定性低于妄想经验带给他的确定性；不过，他顺从了。

当然，我们每个人对自由话语的意识远没有这么强烈；不过，在许多事情上，尤其当我们试图以自由之名行动时，面对不得不承受的现实、面对无法共同朝自由方向行动的局面，我们的态度完全带着这样一种性质：顺从地放弃、舍弃那段本来是内在话语关键部分的东西。那段话语说，我们不仅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以一个事实为基础：在我们的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从根本上要求某些原初自由。

这段话语不让我们安宁。我甚至要说，如果我们不是只在理论家的重构中，而是以具体方式探究“思考”意味着什么，就会看到心理学家那些时时试图赋予“思想”一词意义的努力颇为可笑……

- 例如，把思想还原为一项已经开始、被省略或被表象的行动；

- 或者试图从某种东西中推出思想，使人永远停留在面对基本实在的经验层面，也就是面对那个据说属于他的对象实在。……可是，事情太清楚了：对每个人而言，思想或许构成某种不太值得称道的东西，可以叫作或多或少徒劳的精神反刍；但又何必徒劳地贬低它？

每个人都会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时时同内在解放的观念有关，同某种由于他的存在而包含在自身之中、并要求显现的东西有关。围绕这里，他很快便抵达自身话语的某种僵局。话语像旋转木马一样周而复始；任何浸泡在现代世界文化灵魂中的活生生现实，都包含这种绕圈运动。于是，人不得不反复回到某些问题上；在个人行动层面，它们无可争议地总是有限、总是犹疑。只有当一个人真正以思想者身份接手这些问题时，才开始称它们为“混乱的”——但这不是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通常停在哪里？就停在以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上：

- 一段在某一层面始终必不可少的话语；

- 以及一份原则上、且经验证明根本不把这段话语计算在内的现实。

那么，分析经验还要把一切参照到如此深刻地同一套不协调的话语复本相连的东西——即我们认识的每个主体、每个现代人的自我；而分析经验所面对的恰恰就是现代人——这难道不显得深为可笑吗？

分析经验、它的工具和原则，难道不正是明显地完全投入了以下事实吗？

- 在我们文化当前的人际关系状态中，任何人面对哪怕最小的一项建议请求，只要它以哪怕最基本的方式触及原则，都不会感到自在，也不会觉得自己可以诚实回答；

- 在某种情形下，我们无法回答一个人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如果我们诚实，之所以有所保留，并不只是因为对主体的生活了解太少。婚姻本身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仍然开放的问题；而且它开放到这种程度：当我们被请来充当良心导师，把它应用到每个具体个案时，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充分能力作答。

每当一个人不抛下自己去扮演某个角色，不把自己摆成全知者或道德家的时候，都会体验这个共同事实……

这也是对任何可以正当地称作心理治疗师的人首先应有的要求，因为心理治疗已经教给他，这种冒险介入包含怎样的风险——

……分析起初恰恰从放弃在共同话语层面选边站队出发。共同话语围绕风俗的本质、人的地位以及个人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深深撕裂；分析正是避开这个层面，去别处寻找，并把自己限制在别处的某种东西上。

也就是一段它不知是否正确地称作“更深”的话语。这段话语无疑不同，而且铭刻在眼前这个存在者的痛苦本身之中，铭刻在某种已经得到分节、却通过症状和结构逃脱于他的东西之中；因为强迫性神经症不只是一组症状，也是一种结构。

精神分析只有把目标移到别处，指向话语在主体内部产生的效果，才会向前推进并承担风险。它从来不会站到公开问题的层面、站到自由话语的层面上，即使这段话语带着自身矛盾、不协调和个人面向，始终存在于每个人内部；它又是一种所有人共同汇入其中的内在话语，始终隐约呈现出妄想性质。

那么，施雷伯这样的个案经验——或任何能够如此详尽报告话语结构的患者——能否使我们更切近地接近自我真正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再把自我仅仅理解为“综合功能”、某种我们总喜欢通过抽象途径来定义的协调者；而是看到，在每个人内部，自我始终不可分割地同某种“死手”、某个费解部分相连。那就是一段既必不可少又无法承受的话语，部分构成了我们在经验中所面对的现实之人的话语。

施雷伯的话语当然不同于存在于每个人内部的那段异己话语——每个人又把自己理解为自主个体；它具有另一种结构。施雷伯在某章开头颇为幽默地写道：“人们说我是偏执狂患者。”当时，人们仍未充分摆脱克雷佩林的第一套分类，因此尽管他的症状显然远远超出偏执狂，还是把他归为“偏执狂患者”。不过，弗洛伊德称他为“妄想痴呆患者”时走得更远，因为“妄想痴呆”正是弗洛伊德为精神分裂症提出的名称。

让我们回到施雷伯本人。他说：

> “人们说我是偏执狂患者，又说偏执狂患者把一切都联系到自己身上。如果是这样，他们就错了。不是我把一切联系到我身上，而是他把一切联系到我身上：正是这位上帝，经由不同施动者、角色和延伸物，在我体内不停说话。无论我经历什么，他都会立刻

作出那项不幸的评论，说事情指向我，甚至出自我。我无法演奏——施雷伯是一位音乐家——《魔笛》中的某支曲子，而那个说话者不会立刻把相应的情感归给我；

可是我并没有那些情感。”

换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再举一个例子：施雷伯主席不仅本人没有这样想；当声音介入并告诉他，他正在说的事情关乎自己时，他还会大为愤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学要素。当然，我们身处一场镜影游戏；但大他者的这种介入绝不是普通镜影。大他者在这一点上被视为彻底异己，甚至误入歧途；正是它的介入在第二层次上引发了一种向主体的汇聚、一种外部世界的意向化。而主体本人只要还在斗争、断言自身并说出“我”，就会以极大力量排斥这种汇聚。

当然，这些内容被交给我们时，人们把它们称作幻觉。我的意思是，它们并没有以“幻觉”之名向我们呈现；只是我们听到叙述时，称之为幻觉。按照“幻觉”一词目前通行的定义，我们是否绝对有权这样称呼？一般理解认为，幻觉是在外部世界涌现的东西；“错误知觉”——也就是某个夸大的表象强行作为知觉出现——这个说法，始终把幻觉单纯设定为实在文本中的紊乱和断裂。换言之，它把幻觉安置在实在中。

必须先问一个前提问题：无论如何，言语幻觉是否要求若干预先说明和一项原则分析，用来怀疑和审问“幻觉”这个词本身的引入是否合法？因为这个词通常的定义，以及我们在言语幻觉问题上根深蒂固的理解，或许并不适合它。

当然，在这里，我们突然又走上一条也许已经令你们有些疲倦的道路，也就是……

- 提醒你们话语秩序本身的基础；
- 质疑把话语简单当作现实“上层结构”的做法；
- 驳斥语言纯粹作为符号的性质，也就是否认命名同对象世界之间存在等价关系；……这一切都是我时时提醒你们的语言根本功能。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不得不回到它。让我们稍微换一个角度，使它更接近经验。眼前涉及一位患者。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像言语幻觉一样充满歧义。古典分析已经使我们瞥见：至少在一部分言语幻觉个案中，能够辨认出主体的主动和创造部分。我指的就是所谓言语性精神运动幻觉：观察者满怀欣喜地收集患者最初的发音动作，认为这让他们有望以一种对理性何等令人满足的方式，接近幻觉现象的本质。

简言之，我们已经看出，这些问题值得在“口耳相传”的关系领域中处理。这种关系不只存在于一个主体同另一个主体之间，也存在于每个主体自身之中。请注意，哪怕在最普通的情况下，一个人在说话的同时，也会听见自己。

走到这里，人们便以为自己已经前进了一步，能够瞥见许多东西。事实上，我认为，言语幻觉问题的分析始终显著贫乏，恰恰因为这项观察还不够。主体听见自己正在说什么，这正是我们不应停下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回到他听见另一个人时发生的经验，或只须想一想：如果你们开始专注于听到内容的发音方式、重音，甚至方言表达，专注于任何仅仅属于逐字记录对话者话语的东西，会发生什么？

很清楚，只要沿这个方向稍加突出，或者说再添一点想象，事情就会显现。当然，也许任何人都无法把它推进到极端；外语是唯一例外，而在那种情况下，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你们在一段话语中听见的东西，不同于声学上记录并在现象的声学层面反映出来的东西。

如果从聋哑人的层面来看，这项观察会显得极其简单。聋哑人也能通过视觉符号接收话语：手指组成传统手语字母，再同其他手势结合。很清楚，聋哑人面对一个选择：他究竟是注意对话者漂亮的双手，还是被手中形成的［讯息？］吸引？如果他注意的只是手本身，就没有在记录这些手传递的话语。我还要再进一步：他所记录的是这些符号本身的连续序列、没有它便不存在序列的符号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组织；严格说来，它同我们放在语言基础上的组织——基本音位对立——完全可以相比。那么，我们能否说，他严格意义上“看见”了这套组织？

这里当然有时间性和视觉性的支撑，正如在另一处有声音支撑；但我们看到，发生了某种东西，而被听见的是这条序列。因此，它始终处在一种得到分节的时间综合层面；这种时间综合不是连续体，并在每一点上都可以同那串符号序列相比。

不过，我们仍不能停在这里。聋哑人即使记录了呈现给自己的序列，也完全可能什么都不懂：如果别人用一门他不懂的语言向他打手语，他就像听见外语话语的人一样，已经完整“听见”那句话；但它仍是一句死话。只有当一句话在真正意义上被听懂——也就是呈现出一项意指——时，它才活起来。这意味着什么？

只要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认为意指总是关涉某件东西，并真正确信意指只有在指向另一项意指时才具有效力，就会清楚看到：句子之所以活着，同主体正在倾听、侧耳期待并按照它将指向的意指听取它这一事实深刻相连。换句话说，主体能够区分已经理解的句子同尚未理解、却仍被听见的句子，靠的恰好就是前几天妄想个案现象学突出显示的机制：主体总能或多或少地预先完成一个句子。意指一旦勾勒出来，其本性便是时时趋向于为听者闭合。也就是说，话语听者对发出话语者的参与是永久的。

换句话说，听与说之间存在一项并非纯粹外在的联系。我们的出发点只是说，一个人会听见自己说话；但这项联系只存在于语言现象自身的层面。当能指牵引出意指时，听与说便在这个层面——而不是现象的感官层面——互为正反两面。倾听话语、把耳朵交给它，已经意味着或多或少地服从它：“服从”一词所说的正是迎向某种听取。

这项分析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运动——换言之，方向和意义——总是走向某种东西，走向另一项意指，走向意指的闭合。它始终指向此前的东西，或折回自身；但这里确实有一种方向意义上的“意义”。这是否仍意味着我们没有停止点？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我不断坚持“意指始终指向意指”，肯定总在你们头脑中留下一点不确定：仿佛其中有什么东西注定永远错过话语的目标。而话语的目标不只是在事物世界上加一层覆盖，甚至不只是把它隐藏起来；它有时还要在事物世界中取得支撑。

至于话语停在哪里，人们早已驳倒一种看法：对事物的指示不可能被视为根本停止点。我们当然已经看到，话语同任何指示都绝不等价。

无论把话语的最终要素设想得多么微小，你们都不可能用它替代话语，也不可能只用食指替代它。

请记住圣奥古斯丁那项非常准确的观察。只须想到：当我指着某件东西、作出一个似乎随时可以同话语最终项等价的手势时，人们永远不会知道我的手指所指的是对象的颜色、对象作为物质的整体，还是一个斑点或一道裂缝。简言之，无论涉及指示秩序中的哪个层面，都必须有词语中的另一种东西加以辨别；正是它构成话语相对于一切指示的独特属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只停在这里。假如寻找话语最终停下来的地方，就必须在那个被称作存在的成问题之项上，找到话语的根本参照。

我不想在这里作一番过分深入的哲学论述，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话语从根本上有所指向，而其最终参照只能关涉某种我们没有别的词、只能称作“存在”的东西。请你们暂且停在这样一个情景：一段风暴而疲惫的日子即将结束，你看着时间渐晚，阴影开始笼罩周围。视具体情形而定，某种东西是否会进入你的脑中，并化身为“夜晚的宁静”这个表达？归根结底，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它确实存在。任何情感生活正常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它同对日光渐暗、万物平息和激情线条变淡的现象性把握完全不同。“夜晚的宁静”中有某种东西，在你周围的一切之中已经既是一份在场，也是一项选择。

换言之，至少必须问：“夜晚的宁静”这个表达同你的体验之间有什么联系？提出下面的问题并不荒谬：离开这个表达，对于某些我们暂且

假定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特存在建立起来的存在者来说，“夜晚的宁静”是否仍能从黄昏时刻可能提取的所有其他东西中区分出来？

没有支撑它的言语表述，它是否仍能同当时的时间性现实可能被把握的其他任何层面区分开来？例如：

- 对世界在场所产生的一种潘神式感受；
- 同一时刻，你会在猫的行为中准确看到一种格外令人不安的东西：它仿佛正在每个角落寻找某个幽灵的在场；
- 还有我们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归于原始人的、面对日落产生的焦虑：我们想，他们也许会认为太阳不再回来——不过，这种焦虑也并非不可设想。……简言之，这个时刻可以被嵌入忧虑、寻觅、焦虑或一种全然不同的意指。问题仍然完整保留着：那种被称作“夜晚的宁静”的存在秩序，同其言语表达之间有什么关系？它在我们的体验中确实存在，而且广泛地同各种其他存在相等价。

不过，即使我们把这个问题悬而不决——也就是把被称作“夜晚的宁静”的存在及其同言语表达之关系留在那里——仍能在自己身上观察到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一种是我们主动召唤它，或多或少在话语中为它作好准备，然后把它说出；另一种是它使我们惊讶、打断并安抚我们。

当时，各种躁动正在我们体内运行。我们恰恰会发现：就在自己没有把它分节出来、没有侧耳倾听它——换言之，它处在我们的场域以外——的那一刻，它突然从背后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正是在那一刻趋向于听见。也就是说，它以一种或多或少内言语式、或多或少受到启

发的表达使我们惊讶，像是来自外部的耳语。这是话语的一种显现：它几乎不属于我们，却在那里应和着这份“在场”突然对我们具有的能指性质。我们不知道这项分节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夜晚的宁静”。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项经验事实，却无须裁定底层问题——即作为语言能指的能指，同那种若非如此便永远不会为我们命名的东西之间有何根本关系。我们把握到的是：我们越少把它分节出来，它就越向我们说话。我们同这个“存在”所涉及的东西越是疏远，它就越倾向于伴随一种或多或少带来安宁的表述，向我们呈现。这项表述对我们显得不确定，处在自主运动场域同某种从外部向我们说出的东西之边界上；到了极限，正是通过它，世界向我们说话。

我刚才提出了话语停止点的问题；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概念：作为语言存在者的“夜晚的宁静”，其存在或不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注意到：越是在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希望它出现、甚至很久没有想过它的情况下，它越会根本地作为一个能指向我们呈现，那么它在我们话语中的确信价值，便会发生奇特的翻转。

分析绝不可能通过任何实验主义建构来为这项存在提供根据。这里有一个既定事实：我们会以某种方式把夜晚这一刻当作能指，而我们可能对它开放，也可能对它关闭。恰好在我们一直对它关闭的范围内，它才伴随这些奇特的回声现象——或回声现象的开端——被我们接收：当这一现象将我们攫住时，有某种东西在把握的边缘被听见，最常为我们表述成“夜晚的宁静”。简言之，我们如今已经抵达一个边界：话语一旦越过意指，就通向实在中的能指。这个能指始终保有完整歧义；我们永远不知道，它究竟从同话语的结合中取得了多少。不过，这项分析已经开始表明：能指越使我们惊讶——也就是原则上越

逃脱我们——它便越会带着一圈或多或少相称的话语现象之流苏，向我们呈现。因此，面对“夜晚的宁静”时，来到我们耳边的这个说法并不会显得过分不合适。

我们要做的，是寻找施雷伯主席经验的中心究竟有什么——这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工作假设：他感觉到某种东西，却并不知道它。在其经验场域的边缘，这东西像浪花一样，由一个他没有作为能指知觉、却在边界上组织起我上次所谈全部现象的能指激起。主体始终把那条连续话语线体验为对自身话语能力的永久考验；它不仅是考验，还是挑战和要求。一旦脱离它，主体便会突然感到自己同妄想时世界中唯一仍存在的那份在场断裂：绝对大他者、那个把世界中一切真实而本真的在场抽空，把周围同伴都缩减为人的影子的对话者。

这套话语意味着什么？附着于它、并构成主体生命之基础和根本调性的不可言说快感又意味着什么？这里需要定位问题，并尝试一种分析；这个个案显得格外畸形学，我准备在你们面前继续保持对它的追问。作为开端，请注意：这位主体的观察格外鲜活，对真相又有牢不可破的依恋；他记下了自己真正悬系其上、虽伴随痛苦的这套话语中断时，会发生什么。

这套话语一旦中断，就会出现不同于内在连续话语的其他现象。后者会令人焦虑地减慢、悬置和中断，迫使主体补完已经开始的句子；而此刻，通常以所谓下部形式呈现的那位歧义而二分的上帝会撤回。这给主体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感觉，尤其伴随四项属于语言秩序的标记。

首先，主体此时会遭受他所谓的“吼叫奇迹”。也就是说，他偶尔无法阻止自己突然发出一声漫长、颇为惊人甚至令人焦虑的叫喊；它极其粗暴地抓住他，以至于他本人记下：

- 如果当时嘴里含着东西，这一声吼甚至会使他把东西吐出来；
- 他必须真正克制自己，才能不在公共场合吼出声来，而且绝不是每次都能压住。

这个现象相当醒目，因为我们可以把喊叫看作嘴的运动对言说参与的最极端、最简约的边缘。如果有一种东西，使言说同绝对无意指的发声功能结合——而这项功能内部却包含一切可能的能指——那就是狗对着月亮长嚎时令我们战栗的东西。另一个现象是呼救。据说，在或远或近的地方，刚刚同他分开的神圣神经会听见这声呼救；不过，那些神经在离开时还能在身后留下一条彗尾般的东西，也就是一小片神圣射线。

这种东西很像贯穿其妄想的无机总体性直觉；他在这些直觉上体现自己所谓的灵魂。在最初那个由“附着于诸大地”界定的时期，他不可能同神圣射线发生这种倾泻式交融，而不让当时作为“God　Hass”的一个或几个灵魂跳进自己嘴里——这是他的说法。

不过，近来随着想象世界达到某种稳定，这种事已经不再发生。相反，在他生活于其中的有生命实体世界内部，仍会出现令人焦虑的现象。上帝撤退时，其中一些实体被拖在后面，发出“救命！”的叫声。这同吼叫奇迹区分得十分清楚，是另一回事：呼救声得到分节并具有意义；吼叫只是一个纯粹能指，而呼救所具有的哪怕最基本的意指，在此却作为某种被听见的东西出现。

事情还没有结束：外部的各种声响……

无论它们是什么：疗养院走廊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或外面的声音——犬吠、马嘶——但总是某种具有人类意义的东西，

……按照他的说法，都会被“奇迹化”，因为这些声响恰好在那个时刻专为他制造。换句话说，在吼叫那种逐渐消散的意指，同呼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发声之间——呼救对他甚至不是呼唤，而是从外部使他惊讶的东西——我们看到一整套现象谱系，其特征是某种意指的爆裂。

这里有一种奇特结合：他完全看得出，那些是真实声响，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它们都是可以完整分类、属于他日常周遭的声音：在易北河上驶过的蒸汽船、走廊里的人物。但他有一种直觉或确信，认为这些声响当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为他发生，同那些中间时刻本身相连——主体从沉浸于妄想世界，返回外部世界中的遗弃状态。

其他奇迹也会发生；施雷伯围绕它们建立了一整套神圣创造理论。这些奇迹涉及若干通常是鸟的生物——要同属于神圣随从的会说话之鸟区分开来。这些是他在花园里看见的鸟鸣者，通常是小鸟和鸣禽；他承认，它们并不属于日常以外的其他物种。还有一些昆虫，也不是新品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同主体的家族前史有所关联：他有一位昆虫学家曾祖父。于是，他感觉这些鸟也是专为当前情形创造的；那道有能力创造生物的全能神圣话语，为他眼下之用创造了它们。

换言之，原先构成他同内在对话者之半痛苦、半爱欲化关系全部活动的意指，会发生某种消隐和回溯式返回；对意指的悬系也同样如此。如今，它突然以一连串小亮点照亮他的整个周遭。

因此，在吼叫奇迹和呼救这两个极端之间，一切仿佛使我们切身触及某种通路、某种过渡；它本身界定了一条边界。我们似乎看见主体从一条无疑已经爱欲化的纽带中沉浸着走出来。其标记已经给出：这是一种女性—男性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主体把其中的操练高度中性化，缩减为持续进行一场意指游戏。他本人称这些意指为“Unsinnig（荒谬的）”；但它们在内部得到运作时，反而以相反的意义发挥作用，因为问题在于填补句子的各个阶段。

这种操练的服从面在于：他无法不承受这项要求。任何其他回答方式在他看来都不符合游戏规则；即使他本可以问它们“你们究竟要我做什么？”，或者只回一句粗话，他仍必须同这些会说话的存在者之活动绑在一起，尤其同亲自以根本语言询问他的上帝绑在一起——无论这种询问多么荒谬、屈辱，他这样说。

主体从这个爱欲化而费解的意指场域中出来时——他的妄想根本现象似乎已经稳定在其中——当一个喘息期建立起来，他痛苦地感觉自己同它脱离，并回到一种看似原本会希望到来的喘息状态时，外部世界边缘总会发生某种幻觉。幻觉使语言的各项组成要素以“解离的”形式

逐一穿过外部世界；我们也可以认为，主体正借此重新找到一种新的连贯性，使这些要素走向以自己名义说话的主体：

- 首先是最基本形态的发声活动，甚至伴随一种同某种羞耻相连的无措；

- 另一方面，是由他接收到的一项意指，被标记为呼救；它严格对应并平行于主体当时遭受的遗弃；

- 接着则是另一种东西。经过我们的分析，它最终会比那个仍完整保留自身谜团的语言现象显得更加具有幻觉性；施雷伯本人也始终只把后者称作“内在话语”。

他还描述了神圣射线在诱发这些神圣话语以前走过的一整条极奇特路径。这难道不是他向我们展示的最奇怪现象之一、一份奇异见证吗？按照他的描述，神圣射线来到时会变成细线；他对这些线具有某种视觉把握，至少具有空间把握。它们总以一种运动前来攫住他：从地平线深处朝他而来，绕过他的头部，侵入他，再从后方刺入体内。这个现象正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圣话语在他那里开始运作的前奏。

一切都使我们想到，这个现象发生在一种可以称作“跨空间”的地方。我们应把它界定为同能指与意指的这些结构要素相连；这里存在某种空间化，它先于把语言现象本身设想为任何可能二元化过程。它不同于该现象停止时发生的事情：到了后一个时刻，实在本身被主体准确指认为另一类现象的支撑；这些现象同前者完全不同，却常被经典地缩减为信念——人们会说，他相信上帝为自己创造了那些东西。

如果“幻觉”一词应当同现实的转化相关联，那么，为了使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自身安置病态现象的方式保持一定一致性，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有权保留它。这里的关键，是一种处在现实感与非现实感边界的特殊感受，一种事物刚刚诞生、崭新出现的感觉；而且不是任何新事物，而是供他使用的新事物。它们闯入外部世界，即使其依托的现实对主体而言似乎并没有太大缺失。

那些东西本身只是在这一刻作为专为他而来的新事物显现。这属于另一秩序，不同于此前在我们看来同意指或意指作用相关的东西。严格说来，它才是幻觉，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幻觉：一份被创造的现实，实实在在地进入既有现实，作为某种新东西出现。我们关于幻觉的观念——幻觉是现实的发明——恰恰构成主体体验的支撑，即使他牢牢抓住的是外部世界中的一个要素。

我想，你们已经把握我今天试着唤起的图式，以及它包含的全部问题性；也就是必须追问，严格说来应当赋予“幻觉”一词什么意义。要以合宜方式分类这些现象，我认为，与其由观察者强加分类，不如观察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照和互补对立——主体本人正把这些对立带入自己的现象；这不是偶然事件，因为它们属于同一套主体组织。正因为对立由主体建立，它比观察者所作的区分更有价值。此外，还必须追踪这些现象在时间中的先后序列。

这种界定同我们把握自身主体场域的方式毫不冲突。我试图使你们看到，施雷伯那里有某种东西始终准备使他惊讶，最终却从未向他揭开自身；但我们已经知道，它位于他同语言的关系秩序中，因为它始终伴随着他——也就是说，由一个整体包围他的现象揭示出来。这位内在人格、这个语言现象被主体攫住、抓牢并操弄；主体以一种极其特

殊的强迫同它保持连接。它构成一个中心，妄想的解决最终在那里汇合。

我们正尝试建立一种主体拓扑学，而分析交给我们的全部根据正在于：可能存在一个无意识能指；问题是弄清这个无意识能指在精神病中位于何处。在这里，它看似处于主体之外，但这种外在性不同于人们把幻觉和妄想描述为现实紊乱时所说的外在性。主体通过怎样的爱欲固着同这种外在性保持连接？

这仍是我们必须努力理解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个必须作为言说空间来设想的问题。任何从那里返回的过程，都无法避开一场戏剧性过渡；严格意义上的幻觉现象正是在其中出现，也就是现实本身显得受到侵袭、同时取得意指，主体也被卷入其中。这项地形学观念，沿着已经提出的问题继续前进：以下两者有什么区别？

- Verwerfung（拒斥）可能处在严格精神病现象的起源；
- Verdrängung（压抑）则位于别处，处在主体能够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体验语言之最内在处。

我今天试图使你们理解的意义，正位于对拒斥与压抑之主体定位差异的这项对立中；眼下，这只是对该对立的初步近似。

# 第12课 · 1956年2月15日

我们以“精神病的弗洛伊德式结构”为题，开始处理精神病问题。可以说，这个标题颇为谦逊，因为它甚至没有抵达我们的研究真正指向之处。我们时时寻找、并且显然将构成研究对象的，是精神病的经济学；而我们沿着结构分析的道路寻找它。结构显现在严格意义上可以称作现象的东西中，例如显现在精神病里的妄想怎样自行呈现。结构中的某种东西会在那里显现，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毫无显现，反倒令人惊讶。

我们对这种现象分析的信任，同现象学视角的信任截然不同。粗略说来，现象学试图在现象中看见某种附着并自存于现实自身现象中的东西，认为必须按照现象本身的存在来把握和尊重它。很清楚，引导我们的不是这个视角。我们并不先验地信任现象，理由很简单：我们的进路是科学的；现代科学的出发点恰恰就是不信任现象，而是在它背后寻找某种更为自存、能够说明它的东西。

我们不必回避“说明”这个词。一段时间以来，精神病学发生了某种倒退：我们告诉自己，应当警惕说明，而宁愿先去理解。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说明的道路误入歧途，走进了死胡同。不过，我们已经拥有分析研究在说明层面取得成效的见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带着一项预期进入精神病领域：对现象作出恰当分析，同样会把我们引向结构和经济学。

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努力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并非为了疾病分类学上的单纯满足——仿佛这项已经再明显不过的区分还需要重做。相

反，我们当然是要使两者彼此接近；因为从结构视角进行分析时，对称、对立和根本结构关系能够显现出来，使我们逐步搭建一种在精神病中可被接受的结构。

出发点就在这里：无意识会在精神病中呈现。精神分析家承认这一点——无论对错，我们同他们一起承认，至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可能的出发点。无意识在那里，却没有运作。也就是说，它在那里这一事实本身不带来任何解决；恰恰相反，它带来一种极特殊的惰性。很久以来，仅这一点便已经向我们提出：分析不只是在推动某种东西，使它进入意识。当然，人们早已对此有所察觉。这里涉及的甚至也不只是一个需要减轻其防御悖论的自我，不是轻率所谓的“强化自我”。

一边是初生状态的精神分析曾走上的道路，一边是当前已经偏离的精神分析所走的道路；刚才两点把这两条路都排除了。当我们接近精神病时，这几乎不言自明；它们提示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一种更加复杂、更符合现象呈现方式的公式。

你们很快会拿到已经预告的杂志，以及其中题为《言说与语言》的专号[注1]。你们会在发刊词的某处读到这个公式：“如果精神分析栖居于语言之中，它就不能在自己的话语中误认语言而不使自身变质。”这正是我几年来教给你们的全部意义，也是我们如今处理精神病的位置：精神病中语言现象的提升和突出，对我们而言必定是最富成果的教益来源。

> [注1]《精神分析》第1期：“论言说与语言”，法国大学出版社，1955。

你们知道，自我问题围绕这里展开，而且在精神病中显然具有首要地位。因为自我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功能，恰恰在精神病中以悖论方

式失败；人们甚至严格赋予自我操纵并改变现实关系的权力，而且把这些改变界定为所谓防御目的。

按照目前一般采用的粗略理解，防御也构成偏执狂的起源。这位奇特的自我在我们的观念、在现代分析观念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到了这里，它据说还能以不同方式摆布外部世界。尤其在精神病个案中，自我能使某个旨在预警的信号以幻觉形式从外部世界涌现。我们由此重新遇见一种古老构想：某种推动涌起，而自我也把它知觉为危险。这样一来，我们便全能了。由于我上次的话有些部分显得过分漫游，另一些又过于费解，我提醒你们：当我谈到自我时，所说内容的意义，我会换一种方式再次说明。

无论应当赋予自我在经济学中怎样的作用，一个自我从来不会独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始终带着一个孪生者。这个奇特的孪生者就是我两年前研讨班中谈到的理想自我；而理想自我远未被穷尽。

在精神病最显眼的现象学中，理想自我向我们指出：它会说话。它同幻景的某个部分完全相同——这里仍应把它同我们在神经症现象中或

多或少隐含地揭示出的幻景或幻想区分开来——这是一份会说话的幻景。更准确地说，这个人物以话语形式存在；它：

- 应和主体的思想；
- 介入其中；
- 监视主体；
- 随着主体行动的连续展开，逐一为行动命名；
- 并加以评论。……这个东西值得关注；单凭想象界理论，单凭主体对镜像自我的拒斥，并不能提供它的全部材料。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使它的动力及一般意义变得可感。上一次，我试着向你们说明：无论怎样理解自我的功能——我最多只会赋予它现实话语的功能——它始终带有一个相关项，也就是一段同现实毫无关系的话语。

凭借大家都知道是我特征的那份无礼，我到别处没有选择任何例子，偏偏选了上次所谓“自由话语”。对据称“自主的”个人、对由特定自主观念构成结构的“现代人”而言，它具有根本地位。我曾简要向你们指出“自由话语”的性质，无法再作展开：它根本上片面而偏颇、无法说明、局部、碎裂且因人而异；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假定它对所有人具有根本意义。这正是“自由话语”深刻的妄想性质。

我从这里出发，向你们提供一份大致清单：相对于自我，这个“某处”可能是什么——当主体被精神病攫住时，妄想能够在那里增殖。我知道，这走得很远。当然，我不是说两者是同一件事：

- 我说，它们处在同一个位置；
- 我说，它是自我的相关项；
- 我说，没有自我不带着这个可以称作孕育着妄想的孪生者；
- 我还要借助我们的患者来说明；他不时给我们提供这些珍贵图像。精神病患者向我们交出的，正是对禁区的某种前进、探索和穿透；他在书中一章开头写道：

自己是“一具拖着另一具麻风尸体的麻风尸体”：这是自我的一幅漂亮图像。自我内部有某种从根本上已经死亡的东西，而且始终由作为话语的这个孪生者复现成双。

我们的问题是：这个自我的双重者、相关项和图像，究竟怎样在这片阴影中作出回应，使自我始终只是主体的一半？这份在精神病中实际变得会说话的幻景，怎么可能发生？是谁在说话？它真是另一个人吗——反射意义上的另一个人，也就是我在自恋辩证法中阐明过其功能的那个另一个人？它是否是主奴辩证法之想象部分里的另一个人，是我们曾在儿童传递主义中、在威势游戏里找到的另一个人？社会伙伴和同类者的整合在最初阶段正通过这场游戏展开；这个另一个人可以由同类整体图像的迷摄作用得到清楚设想。

会说话的真是这个另一个人——这个作为反射、作为想象物的另一个人、每一个作为同类者的小他者吗？这个小他者：

- 把我们自己的图像交给我们；
- 通过这份外观迷摄我们；
- 向我们提供自身总体性的投射。……会说话的是它吗？

这个问题值得提出，因为每当人们或谨慎、或不谨慎地谈到投射机制时，总会或多或少隐含地替它作出回答。区别恰好就在这里：精神病中运作的机制并不限于想象层面。

我正努力让你们清楚看到，“投射”并不始终具有同一种意义。投射是否应被限定为一种含义，无关紧要；这只是约定问题，但必须作出选择。如果所谓投射，指想象传递主义：儿童打了同伴以后，会毫不说谎地说“他打了我”，因为对他而言，两件事完全相同；那么，这界定的是一种属于想象关系的秩序。我们不断重新遇见它，并在各种机制中把握它。比如，有一种嫉妒会以这种方式进行投射：主体把自身的不忠倾向，或本该归到自己身上的不忠指控，投射到另一个人那里。这是投射机制的一个例子。

谁不知道，分析嫉妒妄想的入门第一课，恰恰就是看出：妄想投射的机制至少……

也许仍可称作“投射机制”，因为某种机关位于主体内部的东西会在外部显现——

……但嫉妒妄想肯定不同于我们暂且称作普通或正常的嫉妒。后者更接近我最初界定的投射，也就是恶意的传递主义。

两者不是同一件事；只要俯身观察现象，便足以看见。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嫉妒的文章也严格而完整地区分了它们。因此，问题在于弄清：当机制不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投射时，究竟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把“投射”限制为想象传递主义，再努力弄清另一个个案中真正运作的东西。

在精神病中，我们要把什么同想象机制区分开，又该到哪里寻找它？因为这些机制发生逃脱，从力比多投注中逃脱；这无疑意味着某种东西。通常，人们把力比多重新投注于自身身体，视为自恋机制；弗洛伊德本人也明确援引它来说明精神病现象。这个模型从某种角度确实说明并覆盖了相关现象中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若要让妄想关系重新获得可动性，似乎只须使它——用人们随口说出的表达——“重新变得具有对象性”；每当人们使用自恋词汇时，当然都预设这一点。

我要提醒你们，恰恰是这个东西——即使我们接受它——也没有穷尽问题。很久以来，人人都知道——只要他是精神科医生，这几乎被当作一项明显真理——对结构已经完全形成的偏执狂患者而言，无论这种投注是什么，恰恰根本无法使它重新获得可动性；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严格的精神病性紊乱中，原则上又比偏执狂患者走得远得多。为什么？难道我们不能恰好从这里看出一些东西：只有在想象界的秩序中，“自恋”一词才能获得确切含义，正如刚才只有相对于想象界，我们才能赋予投射以确切含义。在想象界的秩序中，异化可以说只是开端，理由很简单：异化具有构成作用；异化就是想象界本身。

归根结底，假如我们试图只在想象层面解决精神病，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表明，我们不能对它抱有任何期待。因为想象机制只给精神病性异化提供形式，却不提供其动力，也不告诉我们它位于何处。

我们共同抵达的始终还是这里。我们之所以并非手无寸铁、并非无话可说，恰恰因为在自己的前提和探索中——去年关于《分析技术》的研讨班[注2]，以及“超越快乐原则”[注3]和它对自我定义与结构的全部含意——已经形成一个观念：在想象的这个“小他者”背后，我们必须承认另一个“大他者”存在。赋予它一个大写字母当然不足以使我们满足；关键是把它定位为某种东西的必要相关项，而这个东西就是言说。

[注2] 雅克·拉康：1954—1955年研讨班《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巴黎：瑟伊出版社，1978。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德文：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载《精神分析论文集》，Payot，2004。

我们并不辨认出它是谁；只把它定位在“小他者”的彼岸某处。

正因如此，我们给它写上大写的A：为了把它区分出来。

我在这里把一件事放到侧面——我们始终也带着这项侧向目标：仅凭这些前提，便足以质疑一种日益反复得到表述、并被缩减为两人关系分析的分析治疗理论。

整条道路[注]都会被捕获在自我同某个另一个人的关系里。这个另一个人的性质当然可以变化，但：

> [注] 此处法文底本作 Toute la voix（“全部声音”），但按上下文或为 Toute la voie（“整条道路”）；译文依后者处理并保留异文。

- 作为另一个人，它始终会是唯一的另一个人；
- 正如经验所证明的，作为另一个人，它始终被想象关系捕获，被主体的自我同理想自我的关系捕获。至于据说需要恢复的对象关系，它仍铭刻在想象界中；
- 作为另一个人，它把分析带回一种奇怪经验，可以称作想象界的克莱因式底层：口腔情结和吞食对象。对一个严格说来并不会单凭自身便倾向异化的主体而言，这套对象只能建立在一项误解之上。

这项误解确实由某种想象的并入或吞食构成；但分析所涉及的其实是言说关系，所以它只能是对分析家话语的并入。当分析偏离为两人关系分析时，无论把它推到多远，最终都只能成为对分析家暗示、甚至被假定拥有之话语的并入；这恰好同分析完全相反。

让我把灯照亮：为了不让你们停留在含糊中，我会说明今天正把什么推到前台。现在我要说出自己的论点。我会从错误的一端、从那个让你们觉得不可缺少才能安心的发生学层面说起；随后再告诉你们，事情不是这样。不过，先让我们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它就会像我接下来讲的那样。

这个论点对全部心理经济学极其重要。它尤其重要：

- 有助于理解围绕我刚才所谓克莱因式幻景理论持续进行的各种极其混乱的争论；
- 有助于反驳人们对它提出的某些异议；同时，
- 有助于更好地定位它对理解早期压抑所能带来的真实或富有成果之处。克莱因理论首先预设早期压抑，而弗洛伊德则告诉我们：在俄狄浦斯衰退以前，严格意义上的压抑并不存在。

克莱因理论以怎样的方式设想最初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它在那里暗含的压抑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个论点对于区分所谓“自体爱欲”和“原初对象”也十分重要。你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两个彼此矛盾的方向：一方面，理论谈到最初母婴关系中的“原初对象”；另一方面，它又明确提出原初自体爱欲，也就是假定存在一个无论多么短暂的阶段，当时儿童还没有外部世界。在这些彼此对立的条件下显得无解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由现在所谓的论点照亮。我正在重复一些事情，但我发现，最好始终重复它们。

这个论点涉及人最初怎样进入同自身相关的现实。我指的是，我们假设有一份现实同他相关。这项假设隐含在任何关于主体的起点中；我们也知道，终有一处必须放弃它，因为如果这份现实不是始终受到质疑，根本就不会出现关于现实的问题。

这种最初进入现实的方式，是否曾在某一时刻具有生物相关项、Umwelt（周遭世界）的形式，就像我们设想动物同其环境分节时那

样？其中是否有一种兼具包围性和适配性的东西，使我们为动物发明了 Umwelt 这个概念？

我顺带提醒你们，这项假设之所以对动物有用，是因为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象。动物的存在确实要求若干不可或缺的严格条件；我们喜欢研究动物怎样运作，以便始终同这些原初条件保持协调。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作本能、行为或本能周期。如果还有什么不在其中，想必是我们没有看见；既然看不见，我们便很安心——事实上，为什么不安心？可以确定的是，这对人显然不够；人人都承认这一点。人的世界开放而不断增殖，而我们可以通过进入世界之途径的复数性来把握它。

我正试着以三个秩序为你们区分这些途径，因为这样做看来相当连贯、实用：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

一切都表明，分析经验向我们展示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归入这三种关系秩序。整个问题在于，每一种关系究竟在何时建立。我的论点具有这项特征——它或许也能为一些人解开上次那段“夜晚的宁静”精彩表演留下的谜：现实从一开始便带着象征性虚无化的标记。我认为，经过我们去年全部工作的说明和运用，这个说法的意义已经足够清楚，你们应当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不过，我仍会再说明一次，哪怕只是为了重新接上那份受到如此不同评价的夜晚宁静。

首先，这并不是一次像柏拉图所说的、造成“不协调且不合分析语调”的离题。我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在创新。只要仔细阅读施雷伯主席个案，就会看到：弗洛伊德在某一处把尼采的拟人发言当作临床论据，

用来理解他的另一位患者；那段文字让查拉图斯特拉开口，题为《日出之前》。

你们可以查阅这段文字。我前几天之所以亲自稍稍召唤“夜晚的宁静”，恰好是为了不在这里向你们朗读《日出之前》。你们会看到，它从根本上表现了我前几天试图使你们感到的同一件事，也就是我现在准备提出的内容：比如说，“白昼”很早便无疑被设定为一个存在者——前几天我谈的正是存在——只是你们通常不会这样停下来注意它。

我的意思是：

- “白昼”有别于它容纳、显现并偶尔呈现的一切对象；
- 它甚至很可能比其中任何对象都更有分量、更为在场；在人类经验中，哪怕最原始的经验，也不可能把它仅仅理解为一项经验的返回。

如果一定要进入细节——但我的目标当然并不在此，因为这里恰恰涉及一个先验位置——单凭细节也只须想到：人在生命最初几个月中，睡眠节律占据支配地位，并保存着对白昼的第一次把握。我们便有全部理由认为，某一时刻之所以出现以下情形，并不是经验性把握的结果……

我说，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这是我的论点；我说，我正以此说明我所谓“最初的象征性虚无化”之把握——

……白昼是一种人能够从中抽身出来的东西。人并不只像一切都让我们想到的动物那样，单纯沉浸在昼夜交替现象中；人把白昼本身设立出来。

白昼来到白昼的在场之中，其背景并非具体的黑夜，而是白昼可能缺席的背景；黑夜居于其中，反过来也一样。昼与夜很早便作为能指在那里，而不是经验的交替；它们很早便作为涵义标记存在，而经验的、具体的白昼，只是在起源处、极早地作为其想象相关项到来。这是我的假设；既然我从发生学视角说话，就没有别的办法在经验中为它提供证明。

我说，我们患者的经验以及相关关系所意指的东西，都要求我们设想一个原初阶段：能指本身在世界中出现，而世界正是问题所在。正如我告诉你们的，这是一项结构必要性。它使你们有些不知所措……

因此，我会加以说明：在儿童学会分节语言以前，我们假定能指已经出现，而且因为最简单的理由——我们必须这样假定——它们已经属于象征秩序。换句话说，面对你们中某些人的迟疑，我不妨把灯照亮。

今天，我要以一种教条式方式提出……

我恰恰厌恶以这种方式提出它，因为我认为通过辩证方式引入会更富成果；

不过，我们很快还会回到那里——

……眼下，我想告诉你们：当我说能指在原初时刻以某种方式出现，所说的已经是某种暗含语言的东西。这恰好同一个无处可在的存在者——白昼——之出现汇合。“作为白昼的白昼”并非现象：

- 它本身已经暗含这种象征涵义；
- 它已经预设声音在根本上的交替，声音作为在场与缺席的涵义标记。弗洛伊德的全部“超越快乐原则”概念，都以此为枢轴；那同我此刻在话语中指向的，恰好是同一个区域、同一片象征分节场。

我或对或错地使用的 Verwerfung（拒斥）一词，正是在这个区域中发生。我很高兴，你们中有一些人眼下正为这项 Verwerfung 苦恼：毕竟弗洛伊德并不经常谈到它；我从两三个偶尔露出一点踪迹的角落把它抓出来，有时甚至踪迹都没有显露，但我认为，为了理解文本，必须假定它在那里；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弗洛伊德当时说的内容。

谈到 Verwerfung 时，弗洛伊德说，主体甚至在压抑意义上也“不想知道”阉割。我赋予这句惊人话语如下意义：在压抑意义上，人对那个自己以某种方式“什么也不想知道”的东西，仍然知道一些；分析恰恰已经向我们表明，他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既然患者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话说——甚至在压抑意义上也对某些东西“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也许预设还有另一种机制能够参与运作。而 Verwerfung 一词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在前面几页，另一次则同这句话直接相连——

……于是我抓住这项 Verwerfung。我并不特别执着于这个词，主要在意的是它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弗洛伊德想表达的正是这一点，理由很简单。对我提出最切中异议的人告诉我：文本批评越细密，越靠近原文，就越不能理解它。当然，必须用一段文本的前后内容使它活起来；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总要通过后文来理解一段文本。

而对我提出最多异议的人，另一方面又建议我到弗洛伊德另一篇文本的某处，去寻找一种不是 Verwerfung、而比如是 Verleugnung（否认）的东西。很有意思，前缀“Ver-”在弗洛伊德那里不断增殖。我从未专门讲过弗洛伊德这些词的纯语义学，但我保证，立刻就能端出十来个。而且，弗洛伊德在最初阶段，恰恰从这些词中看见了区分癔症、强迫性神经症和偏执狂的钥匙。

癔症是一种变形、一种转换。这些词彼此靠近时十分有趣，竟都带着某种银行业务的涵义：换汇、转账；并置起来时，这层背景格外醒目，因为可以看到，它们正是从具有这类含义的词中选出的。

这会把我们带得很远。弗洛伊德直接接近神经症现象的最初方式中，包含许多可以提取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在这类入口上无限停留。关于这项意义工作，请暂且信任我。如果我在这里选择 Verwerfung 来让你们理解，是因为成熟思考和工作所得的成果把我带到这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请按我递给你们的样子接受这份“蜂蜜”，并试着用它做点什么。

这项 Verwerfung 必须按照《否定》一文的暗示来理解。那篇极其关键的文本，两年前曾由让·伊波利特先生在这里评论；我认为，他的评论提供了最佳理解。正因如此，我选择把它刊在即将出版的那本杂志

创刊号上。届时，你们可以手持原文，判断伊波利特和我沿 Verneinung（否定）这条道路前进，究竟是对是错。

在我看来，那篇文本无可争议地光彩夺目。不过，我认为仅靠通常解读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把一切混到一起。这里同 Verdrängung（压抑）毫无关系，而是暗含 Verwerfung：原初能指的一部分遭到拒斥。对特定主体、对每一个主体、对某个具体主体而言，这一部分无疑至关重要；它被抛进外部黑暗，在这个层面上形成缺失，后来必须沿一条不同于通常道路的途径重新夺回。我假设的这项根本机制，正是我想引导你们看到的偏执狂基础。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这是一个原初过程：某种东西从原始的内部被排除。这个内部不是身体内部，而是第一个能指身体，是某一能指系统作为原初且不可或缺的系统所占据的最初位置。我说 Verwerfung 时，所指正是这个。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如果我们跟随《否定》一文，弗洛伊德假定：现实世界正是在这次最初的能指选择内部构成。表象同对象彼此接近的整场游戏，发生在一个已经被标点、已经以能指方式构成结构的世界中；对象也已经得到构成。弗洛伊德正是在这里描述主体对现实的最初把握，换句话说，就是“存在判断”［Bejahung，肯定］。

也就是说：这不只是我的梦、幻觉或表象，而是一个对象。弗洛伊德——这里说话的是弗洛伊德，不是我——在其中看到，内部怎样检验外部，主体的现实怎样通过重新找到对象得到构成。主体把它称作“对象欲望”：对象始终在一场寻觅中重新被找到，而重新找到的又从来不

是同一个对象。这套辩证法、这份现实重构，对说明一切重复机制至关重要；它建立在最初的二分之上。这个二分同某些原始能指神话奇特重合：一边是已经得到把握的能指，另一边是遭到根本拒斥的能指。因此，在主体进入作为人类现实的现实之初，已经被引入了某种原初的不平衡。

这正是《否定》中一种奇特的先后次序所预设的内容：弗洛伊德通过类比说明，属性判断先于存在判断。最初存在对好与坏的划分；在弗洛伊德辩证法中，只有把它假定并解释为原初能指的一部分遭到拒斥，才能设想这项划分。那么，原初能指是什么意思？很清楚，在眼前这个场合，它严格说来什么也不表示；我向你们说明的全部内容都具有神话性质。我正准备趁机悄悄递给你们马塞尔·格里奥尔先生去年讲过的那个神话：原初胎盘被分为四份。第一位登场者是狐狸，它扯走自己的那份胎盘，在系统中引入原初而根本的不平衡，也由此开启后来涉及田地划分、亲属纽带等等的整个周期。

我们处在神话中；我讲给你们的当然同样是神话。我绝不认为，在任何地方真有过这样一个时刻或阶段，主体：

- 先获得能指，也就是我刚才所指意义上的原始能指；
- 随后意指游戏才进入其中；
- 再后来，能指与意指手挽着手，使我们进入话语领域。

不过，从这里出发存在某种表象的必要性；它如此必要，以至于我可以很自在地这样讲。这不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也是因为弗洛伊德本人沿同一方向走过；但必须看他是怎样走的。

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即第52封信。在这封信中，弗洛伊德重新处理所谓心理装置的回路；而且，不是任何心理装置……

不是一位教授坐在桌后、站在黑板前所设想的心理装置。他谦逊地给你们一个模型，归根结底，看起来仿佛能够运作。它运作不运作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经说出某种粗略看来像所谓现实的东西。

……弗洛伊德所讨论的，是他患者的心理装置。

正因如此，这封著名的弗利斯书信才把他带进一种真正如闪电般的丰产性；同弗洛伊德的任何其他著作相比，这一点在那里甚至更加显眼。某只忠诚的手把它传递下来，使它带着或多或少遗嘱式、见证式的意味到达我手中。不过，我必须说，它交给我们时遭到一连串删节和清理；无论理由是什么，任何读者都会觉得这些处理实在令人愤慨。在第52封信中，文本恰好在一个地方被切断；任何理由都不能为此辩护，因为紧随其后的补充，即使被认为已经过时或较为薄弱，本可使我们更了解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和研究。

弗洛伊德在第52封信中说了什么？首先有一点十分清楚：他试图说明的不是任意心理状态。令他感兴趣的是……

- 因为他正是从这里出发；
- 因为治疗经验中只有这些现象可以接近，并显得富有成果：……也就是记忆现象。他要说明的正是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装置图式，是为了说明记忆现象，也就是那些出了问题的东西。

这件事本身并不简单。不要以为人们提出的各种记忆理论本身都特别令人满意。

心理学家曾处理这个问题，也做过一些有道理的工作，在有效实验中发现过奇特的不一致。你们成为精神分析家，并不意味着可以免读心理学研究。例如，你们会看到，心理学家为了说明回想现象，经历了多少尴尬、辛苦和迂回。这些都是记忆现象。

全部弗洛伊德经验还显示出另一件事：我们精神分析家关心的这种记忆，同心理学家向我们展示动物面对经验时的记忆机制，完全不同。

我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你们有一只章鱼——这是最美的动物，在地中海文明中发挥过根本作用，如今很容易捕捞。人们把它放进一只小缸，尤其会在其中放入电极，观察章鱼怎样处理。它伸出触手，突然发生某种东西，使它以极快速度收回触手。我们看到，章鱼很快开始警惕；于是把它解剖，在充当脑的部位发现一根巨大神经。它不只外观看起来大；显微镜下可见的神经元直径也十分巨大。

我们发现，它正是章鱼用来记忆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把它切断，章鱼把握经验的能力便会明显下降。某条沟通路径被切断，会改变记忆记录；这使今天的我们想到，章鱼的记忆也许像一台小机器那样运作：某种东西在那里周而复始。我并不是要在这一点上把人同动物严格区分开，因为我教给你们的正是：人的记忆也在周而复始，只不过它由讯息构成。［参见后来的“欲望图”，1957—1958年研讨班。］

所谓“由讯息构成”，意思是一连串正号或负号的小符号“一个接一个”钻进去并在那里循环，就像歌剧院广场的小电灯不断亮起、熄灭，无限旋转。人的记忆就是这样；只不过，这项真理完全无法由经验接近。

弗洛伊德所把握的记忆，其特性正在这里。所谓原初过程和快乐原则，意味着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记忆并非任何记忆，而恰恰是某种经验完全无法接近的东西。

否则，请你们告诉我，无意识中的欲望永远不会熄灭，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按照定义，已经熄灭的欲望不再被谈论；这句话说的是，有些欲望永不熄灭。也就是说，有些东西继续在记忆中循环，使人以快乐原则之名无限重复同一种经验——在某些个案中，这些经验十分痛苦；恰好因为事情在记忆中得到特定标记，才以持续存在于无意识中的面貌来到我们眼前。如果我眼下说的，不只是把你们原则上已经知道、却又仿佛并不知道的内容重新分节出来；如果我不仅要使你们知道，还要使你们承认自己已经知道它，那么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做别的什么。这篇文本中还有另一点完全清楚：分析思想所关心的防御过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程，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是某种记忆过程从一个界域转到另一个界域；我们已经清楚限定了这些界域。只要记忆不再被放在“对作为刺激源的现实作出反应”的连续体中，而成为另一种东西，就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很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为此费尽力气，而弗洛伊德谈的只有这个：“紊乱”、“限制”、“记录”并非只是这封信中的词语；他极其明确地说，问题正是这些。

他理论中根本的新意，是断言记忆并不单一，而以不同方式得到记录。那么，这些不同界域是什么？第52封信正好为我的论点提供支持。我对此感到遗憾，因为你们会立刻扑向这封信，然后对自己说：不错，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但旁边那封并不是；于是，你们不会看见，这其实存在于所有书信中，存在于弗洛伊德思想发展的灵魂里。

如果基础上没有这个，许多事情都无法说明；比如，他本会变成一个荣格式的人。

那么，这一连串界域究竟是什么？你们会看到某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因为迄今在你们看来只有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人们早已知道事情怎样进行：通过意识系统进入。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是意识现象同记忆现象彼此排斥。他不仅在这封信中提出这一点，还在《梦的解析》结尾给出的心理装置过程体系中明确表述过。对他而言，这既像一项真理——虽不能说绝对来自实验——又像一种由整个系统的运用强迫他接受的必要性；同时，我们也能感到，其中有一个构成其思想的最初先验能指。无论如何，我不准备在这里充分澄清这项断言走得多远；它具有根本地位。

首先，如果考察心理把握的回路，起点是知觉；而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知觉，它便暗含意识。按照弗洛伊德体系，这又意味着它必须像著名的“神奇写字板”隐喻所展示的那样。写字板由一种或多或少像石板的材料构成，上面覆盖一张透明纸。你在纸上书写；把纸抬起来以后，上面什么也没有，纸面重新洁白。不过，你曾写下的一切，会以叠印形式重新出现在下面那层略带黏性的表面上。铅笔尖划过之处，纸张贴向底层，底层仿佛暂时被轻轻涂黑，于是记录下你写的内容。

你们知道，这就是弗洛伊德用来说明自己怎样理解知觉运作机制及其同记忆关系的根本隐喻。什么记忆？他关心的记忆。在这份记忆中，会有两个区域：无意识区域和前意识区域。经过前意识以后，又出现一个完成的意识；它只能是得到分节的意识。

我要指出，他自身构想的必要性显示在以下两者之间：

- 本质上转瞬即逝、一出现便消失的知觉[注]；

> [注] 此处法文底本作 Verneinung（否定），但按第52封信的记写序列及本段同“意识系统”的对照，或应为 Wahrnehmung（知觉）；译文依后者处理并保留异文。

- 以及他所谓“意识系统”、甚至已经所谓“自我”的构成；他甚至已经称它为“官方自我”。德语中的“官方”同法语字典中的“官方”完全是一个意思；

- 法译本甚至没有翻译这个词，只让人去查同办事员有关的条目。……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 Niederschrift（记写）。

这样的记写共有三种。第52封信提供的见证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弗洛伊德怎样建构最初这份关于记忆在分析中如何运作的把握：

- 中央当然是 Unbewusst（无意识）系统；那里甚至称作一种 Unbewusstsein（无意识状态）；

- 随后，Vorbewusst（前意识）系统同知觉分开；路径走向 Unbewusst，再走向 Vorbewusstsein（前意识）。你们看，其中少了一样东西！这篇文本谈的究竟是什么？

至少，我们必须真正从开端出发，也就是首先赋予这一切意义。必须清楚理解：尽管弗洛伊德在这里给出一些时间上的对应，说我们需要承认若干系统会在以下时期构成，但它并不同于我刚才提出的顺序：

- 这里是零岁至一岁半；
- 接着是一岁半至四岁；
- 再后是四岁至八岁；
- 随后则是十五岁以后。……尽管他给出这些时间标记，并告诉我们应当从这些时期寻找各界域的材料等等，我们仍不应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认为这些界域依次构成。我们为什么区分它们？它们怎样向我们显现？

它们在精神分析现象——甚至不必说病理现象——中向我们显现：防御系统要做的，是不让那些令我们不快的事情在某个记忆系统中再次出现。因此，我们处在官方经济学中；官方经济学要求我们不再记起不喜欢的东西。这只意味着：不要记起令我们不快的事情。它完全正常；让我们把它称作防御。

我不记得它，并不病态！这甚至正是应该做的：让我们忘掉不愉快的事情，只会从中获益。防御概念若不从这里出发，就已经歪曲了有意思的整个问题。围绕著名的情感退行和地形学退行，会出现一种病态防御，而它赋予“防御”一词病理性质。当某种在这些记录系统之一、在主体这些话语之一中正常遭到排斥和排除的东西——不可能有别的意思——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得到表达时，防御才是病态的。因为那项本来完全正当地在恰当层面的言说中受到审查的东西，已经转入另一

界域；它在那里表现为若干现象，只有因为这些现象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才继续有资格被称作防御。而这些影响本身毫无正当性，因为在一个系统中有效的东西，在另一个系统中并不有效。全部紊乱可以说正从机制的这种混淆中产生；我们由此才谈论病态防御系统。

不过，这意味着什么？为了理解它，我们将从最熟悉的现象、从弗洛伊德始终作为出发点并说明 Unbewusstsein（无意识状态）系统何以存在的现象谈起。

对 Unbewusstsein 系统而言，地形学退行的机制在一段完成的话语层面极其清楚。这是"官方自我"的话语；其中总体上叠加着某种协调，即话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致。这里的所指，就是我们所有人赖以生活并习以为常的意图、呻吟、晦暗和混乱；也正因为如此，每当陈述某件事时，我们总有一种不一致感：自己从来没有完全抵达想说的东西。

这就是话语的现实；它由这场游戏构成。归根结底，我们毕竟知道，在日常使用所需的程度上，所指已经被充分抓进话语。一旦想做得更好——也就是走向真理——我们理所当然地会陷入彻底不一致。正因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放弃；不过，意指与能指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关系，而它正由话语结构提供。

那么，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是：神经症中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发现了——

- 作为记忆界域的弗洛伊德无意识领域。它在话语层面运作，也就是存在于你们听我讲话时听到的东西中；这东西甚至比我能告诉你们

的内容存在得更强，因为你们很多时候根本没有理解——所以它确实存在；

- 作为一条时间性能指链的这段话语。神经症就在于：这个人不使用词，而是使用手边的一切。他掏空口袋，把裤子翻过来，把自己的功能和抑制都塞进去；他整个人钻入其中，再用它覆盖自身。在能指位置上，他本人变成能指；他的实在或想象进入话语。……如果神经症不是这个，如果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我就放弃。因此，这一点完全清楚，也完整界定了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场域。

别处发生的事情属于另一个场域：

- 这个场域令我们惊讶；
- 这个场域构成问题；
- Verneinung（否定）现象主要在其中出现。……按照传统，而且始终按照弗洛伊德，它被定位在［……］层面。

它在这里表达的东西同样必须来自某处，来自一次层次下降、一次从某一界域转入另一界域的过程；而它在这里以一种奇特方式显现，带着被否定、被否认、被当作不存在的特征。

至少，我们知道这里使用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语言的属性，而且是一个无疑显得极其原初的属性。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符号，就是在场

与缺席的涵义；作为能指材料，它确实如此。不过，这没有穷尽否定在语言内部的功能问题，因为它的双重性恰好在以下情形中显现：

- 当人们告诉你它在远处时，是因为眼下它在那里；
- 当你召回它时，恰恰因为它已经离去。

这里当然有一种同在场事物之否定的根本关系；但把它连贯地分节为否定，又是另一回事，本身提出一个问题。整个问题也许都在一种匮缺幻觉中；它来自否定最初、最普遍的日常用法。各种语言都包含一整套可能的否定形式，而且肯定十分重要，值得专门研究：法语中的否定、汉语中的否定等等。

重要的是，话语中看似一种简化的东西，隐藏着一套动力；而这套动力逃脱于我们、保持隐秘。如果认为 Verneinung 只是记录某个梦中出现之物所受到的重音，其中包含何种程度的幻觉？例如："那不是我父亲。"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另一面值多少。主体向你作出这项否定，而我们习惯把它理解成：那就是他的父亲。我们对此感到满意，于是不再继续。

不过，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刚才的情形还带着某种盲点和解释困难；而如果主体对你说："我不想对你说一件难听的事。"情形就完全不同。他说得当然十分客气。大家同样习惯认为，这里存在一套立即可感的动力：他实际上正要说一件难听的事。

正因为我们切身感觉到这一点，才会注意到那种匮缺幻觉所代表的谜。这里存在康德所谓的负量；它的功能不只是匮缺，而是真正具有积极性的减除功能。

Verneinung　　问题仍完全没有解决。重要的是看出——而这正是《否定》一文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只有把它同某种比我刚才所说的Verdrängung（压抑）更原初的东西关联起来，才能设想它。他必须正式承认——而且在这封信中确实如此——为了使最初那些意指结能够发展、使压抑日后在意指功能中回到这些结上，必须先有某种原初过程。原初 Verneinung 包含第一次符号化，即 Wahrnehmungszeichen（知觉符号）；换句话说，他承认我所谓原初能指场域的存在。

随后，他在信中谈到自己关注的三大神经精神病——癔症、强迫性神经症和偏执狂——之动力。所有内容都预设并要求这个原初状态、原初阶段存在；它正是我所谓 Verwerfung（拒斥）所选择的地点。他在第52封信中明确承认这一点。要理解它，只须回到弗洛伊德不断强调的内容：任何历史化，无论多么原始，也就是任何记忆系统中的组织，都要求一种至少已经是局部语言组织的东西预先存在，语言才能运作。

在弗洛伊德关心的记忆现象中，凡进入记忆秩序的一切，始终都是语言现象。换言之，必须先有能指材料，才能使任何东西取得意指。再换言之，弗洛伊德纳入考虑的东西——例如在狼人个案中——就是：

- 原初印象在那里停留了许多年，没有任何用途；而且从起点起，它已经具有能指性质；

- 只有当它必须在主体重构的历史中开口说话时，才开始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它不是以压抑身份运作，而是介入一岁半至四岁间那段极难重新把握的主体经验之建构。按照弗洛伊德提供的全部历史细节，儿童恰好稍早看见了那幅著名原初场景。能指从原初时刻便已

> 经给出；只要主体没有使它进入自身历史，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在一岁半至四岁半之间形成的历史中才取得重要性，不是因为当时性欲望比其他时期更少在场；恰恰是因为人借助性欲望使自己得到历史化，因为法第一次以全部形式进入，正是在性欲望层面。

由此，你们看见了弗洛伊德通过这封短信的简单图式交给我们的整体经济学。还有千百篇文本能够证实它。其中一篇文本，是你们当中某个人向我指出的……

我曾赞扬他，因为他围绕这里正在努力建构的内容提出反驳——

……他提醒我，例如在关于恋物癖的文本末尾，也能清楚看到某种同我刚才说明直接相关的东西。弗洛伊德在那里对自己作出的神经症与精神病之区分进行关键修订。他原先说，在精神病中，现实会被重塑，现实的一部分会被消除。

接着，他写下几句极其醒目的话：现实从来没有真正被暗点遮蔽。他区分了两件同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极其相关的事：各种功能可能仍在那里，准备表达自身；同这份现实相关的显现欲望也准备涌现，现实远没有被凿穿。可是，他说，在精神病个案中缺少的是那个真正的观念。

归根结底，弗洛伊德把它关联到象征界的缺陷。即使我所谈德文文本仍使用“现实”一词来指精神病中被遗忘的部分——也就是精神病中缺失的东西——你们从上下文仍会看到，它明确揭示并且只能意味着象征界中的缺失、孔洞和缺陷。

而且，当我向你们展示具体个案、展示刚开始在精神病中挣扎的患者时，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原初现象是什么？我曾给你们看过一位患者，他相信某个人向自己发出了邀请；这个人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也成为其存在的根本支点。患者说，这个人后来撤回了；他又在自己的历史中展示这一点。此后只有一份困惑，而它同一项确定性相关联；我刚才所谓禁区的进入和接近，正通过它得到宣告。仅仅接近这个区域，本身就构成进入精神病。人究竟怎样进入？

主体怎样才会不只是异化在作为同类的小他者中，而是变成某种从什么也不能说的场域内部发出召唤的东西，召唤全部其余部分、召唤一切可以说出的事物之场域？

也就是说，它召唤出你们在施雷伯主席个案中看到的一切显现：那些我称作“边缘的”现象。它们在现实层面以清晰可读的方式组织起来，属于想象秩序，而且确实帮助了主体，并对他取得意指。这里涉及爱欲关系的能指，涉及精神病的根本欲望；精神病患者爱自己的妄想，正如他们爱自己一样。

弗洛伊德在这里并不只是提出“自恋”；他切身触及某种东西，而且很快补充说，谜正位于这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谜。问题在于：主体进入的是怎样一种关系……

精神病现象本身总会以某种方式标记这项关系——

……主体同能指的这种关系、活着的主体同能指领域的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经验的哪些边界，会使整个主体倾覆进这套问题之中？

这就是我们今年提出的问题；我也希望，在暑假以前，能使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向前走几步。

# 第13课 · 1956年3月14日

我们稍稍回到前面的话题。我提醒你们，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点：通过对施雷伯文本的分析——这里按这个词通常的意义来用——我们越来越强烈地强调了语言现象在精神病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精神病的弗洛伊德式结构”。

但眼下的问题是：这些如此频繁地出现在精神病中的语言现象，在其中具有何种功能？假如……

分析果真如我们在这里所说，同一般的语言现象、同言说行为如此紧密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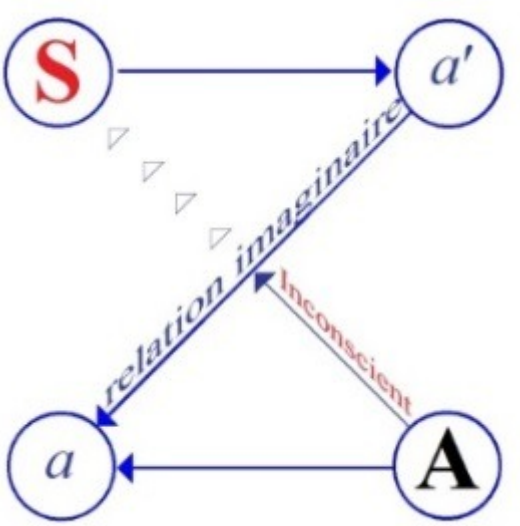
……那么，分析若不能使我们以一种有别于经典进路的方式看出精神病中的语言经济学，那将非常令人惊讶。经典进路所能做的，无非是诉诸关于语言及其不同层次的经典心理学理论。

我们已经抵达了某种东西……

这里要参照我们关于分析交流的基本图式。

……它向主体 S 显现；这个 S 同时也是“我”（I）应当生成的位置，是朝向大他者的 S。主体的言说从本质上必须抵达这个大他者，因为讯息也必须从大他者那里来到主体：大他者的回应，正是言说以及言说之奠基功能的关键所在。

在 S 与 A 之间，在分析应当揭示的基本言说那里，存在一条迂回、一条支路，也就是想象回路；它以经过 a 和 a’的形式，阻挡这一言说的通过。a 与 a’是主体的两个想象界端点，所谓镜像关系——即镜子阶段的关系——已经充分标示了它们。




主体借由这个 a 与 a’而被把握：主体在其身体性、其多重性、其自然的碎裂状态中处于 a’，也就是有机体；它又参照那个作为自我的想象统一体，也就是 a。主体在其中认识自己，也在其中误认自己；主体所谈论的正是它——却不知道是对谁说，因为他也不知道是谁在自己里面说话——所以，在 a’中被谈论的，也正是它。

当主体开始分析时——正如我在研讨班远古时期曾以图式方式说过的——主体一开始谈的是他自己。等到他把他自己——其间已发生显著变化的这个自己——谈给你听时，我们也就抵达分析的终点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在这里展开。

这意味着分析家作为自我的缺席。因为，如果现在把分析家放进这个作为主体言说图式的图式中，我们可以说，分析家位于 A 的某处；而在位置严格倒转之后，这里就是 a'，即分析家本可以开口、本可以回应主体的位置——只要他进入主体的游戏，进入与阻抗的配对，恰好去做别人教他不要做、至少试图教他不要做的事情。在那里，分析家便会处于 a'。

而分析家最自然地看见自己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也就是主体里面——如果他没有接受过分析的话。这种事不时会发生……我甚至要说，从某一方面来看，分析家从来都不完全是分析家，理由很简单：他是人，因此也参与那些阻碍主体言说通过的想象机制 [S → A]。

恰恰在于他懂得：

- 不认同于主体；
- 不陷入想象界的捕获；
- 也就是说，在这里要"死"得足够彻底，才不致被卷进这种想象关系；

……他才会懂得：在他的话语时时被要求介入之处，不去介入……

这种不介入要足以不妨碍主体的意象逐步迁移至 S，朝向那个就是 S 的东西——有待揭示的物；这个物也没有名字，无法找到自己的名字。

……因为迁移回路一旦由 S 直接通向 A 而告完成，原先处在主体话语之下的东西、主体必须穿过其虚假话语说出的东西，最终便会完成，

并在这里找到一条通路；而随着这种想象关系的经济作用逐步削弱，这条通路也会更容易打开。

我讲得很快，因为我不是来这里重讲分析对话的全部理论，而只是想向你们指出：这个词，或者说这个言说……

这里的“词”带着一种强调：它是谜的解答、问题的解答，也是一种提出问题的功能。

……就位于大他者那里。任何充实言说都总是经由大他者而实现；主体总是在“你是……”之中定位并认出他自己。

我们分析施雷伯妄想结构形成时所达到的那个观念——我是说，在那个把自我同这个想象的小他者、同施雷伯与之打交道的奇异上帝联系起来的相关体系形成之时。这个上帝：

- 什么都不理解；
- 误认他；
- 不回应；
- 模棱两可；
- 欺骗他。

这个体系正是他的妄想最终完成之处；与之相关的，是幻觉现象的一种沉淀、一种定位——我要说，定位得十分精确。由此，我们已经抵达，至少已经靠近这样一个观念：在精神病中，可以辨认并称作排除

大他者的某种东西；而在这个大他者中，存在原本是通过言说的这番承认而实现的。

至于言语幻觉中涉及的那些现象……

- 它们在自身结构中就显露出主体同自己的话语之间那种内在回声关系；

- 这些幻觉现象越来越变得——用主体自己的说法——“无意义”，或者如人们所说，变得“纯粹言语性的”：意义被掏空，只剩下各种反复灌输和没有对象的叠句。

……这一切使我们感到，要寻找的结构恰恰指向这个问题：这种同言说的特殊关系究竟是什么？

究竟缺少了什么，才使得：

- 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着手建构整个想象世界；

- 与此同时，他又从自身内部承受着话语功能的一种严格说来的自动症；话语对他而言，不只变成某种侵入性的、寄生性的东西，而且它的在场甚至变成了主体赖以悬系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已经抵达之处。我必须说，为了在这里再前进一步，我们必须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先退后一步。在精神病中，主体只能在我所谓的想象暗示中重构自己——我在一次病人展示中，曾就其他现象向你们“现场”展示过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现在抵达的确切位置。

问题就在于，主体在这种纯粹、简单的想象暗示中构成自己，而这种构成永远不可能完成；我们必须迈出一步，尝试推动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人们满足于此。想象暗示显得非常富有意义；人们在里面找到了无意识的全部材料、全部要素。然而，严格说来，似乎从未有人追问：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暗示本身没有任何解决能力，这一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且，尽管人们毕竟强调过它……

却又给它蒙上某种神秘色彩；我甚至要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竭力抹去这种结构与神经症结构之间的根本差异。

……在斯特拉斯堡，人们向我提出了同在维也纳一样的问题。

一些看来颇能感受到我所开启的某些视角的人，最后总会问我：

- “您怎样处理精神病？”

仿佛面对准备如此不足的听众时，光是强调技术的最基本常识还不够似的。我回答：

- “这个问题提得稍微早了一点。在谈技术，乃至谈心理治疗配方以前，必须先试着找到几个根本的路标。”

他们仍然坚持：

- “我们总不能什么也不为他们做吧！”

- “当然可以做。但等到一些问题被厘清以后，我们再来谈。”

在迈出这一步以前，我仍想……

因为精神病中这些语言现象令人着迷的性质，可能会强化我刚才所谓的一种误解；

……我想再回到这个问题上，而且要讲得相当坚持，好让我可以期待：此后，对于我，也对于今天听我讲课的人，这一点会得到彻底澄清。

我要让某个人开口说话。人们常常认为我主张：主体在分析层面要向我们传达的一切，都在其话语中以言语方式表达出来。这样一种极端立场，当然免不了引起那些止步于此者相当激烈的弃绝姿态；这种姿态有两种：

- 一种是“把手按在心口”；
- 另一种则是“把头歪向一边”——相对于我们不妨称作向上移位的真诚证明——仿佛这个动作要压在天平的另一只秤盘上，因为在我的质问者看来，我把这一边卸得太空了。

总的说来，人们还是信任我的。于是便会有这样的话：

- “幸好精神分析学会里不只有您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位天才女性：

弗朗索瓦丝·多尔多。她在自己的研讨班里向我们展示了身体意象至关重要的功能，展示主体如何以它为支点来处理自己同世界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了那种实体性的关系；语言关系无疑接合在它上面，但它却远比语言关系更具体、更可感。

我完全不是在批评弗朗索瓦丝·多尔多的教导。恰恰相反，当她在自己的技术中运用这种非凡的领会能力、这种对于主体想象维度的敏感时，她所作的用法——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条件下，至少在她面对儿童时如此——与这里所说的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她会谈论这一切；换言之，她也在教听她的人怎样谈论这一切。不过，只指出这一点并不能解决问题：仍有某种东西处于晦暗之中，而我想让你们听见的正是它。

显然，如果我说，即使在那些自以为跟得上我的人那里，仍持续存在某种有待消除的误解，我也并不惊讶——我还会再回到这一点。我的说法或许不够合宜……这样说，仿佛就意味着：既然我［……］那些追随我的人的信念，我便是在表达某种失望。

然而，如果——如同我教给你们的话语观念从根本上所严格包含的——我竟突然误认了自己的话语，那么我哪怕感到一丝这样的失望，都会与自己相矛盾：人与人之间话语的根基就是误解。

所以，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应该惊讶。不过，我不惊讶自己的话语会留下某种误解余地，并不只因为这一点。更因为……

- 如果人在实践中毕竟应当同自己的观念保持一致；

- 如果任何有效的话语都必须依据它自己产生的原则来评判；

……那么我要说，我以现在这种方式继续讲述，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即使未必绝对有意安排的——意图：我要给你们机会，使你们不能彻底理解它。至少由于这段余地，你们总还可能说自己“以为跟上了

我”；也就是说，你们面对这段提出问题的话语，仍会保持这样一个位置：通向逐步修正的大门始终敞开着。

换言之，如果我设法让自己非常容易被理解，使你们完全确信自己已经领会，那么按照刚才关于人与人之间话语的前提，误解反倒会无可挽回。正是由于我认为应当以现在这种方式接近这些问题，情况才不至如此。

因此，你们始终有可能重新审视已经说出的东西；而且这种审视会更容易，因为你们先前没有理解，完全可以归咎于我——也就是把责任卸到我身上。正是凭这一点，我才允许自己今天回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它的确切意思是：我并没有说，分析关系中所交流的东西都经由主体的话语传递。因此，我根本无须在分析交流这一现象本身之中，把言语交流领域同前言语交流领域区分开来。这种“前言语的”、甚至言语之外的交流在分析中始终存在，这一点毫无疑问。

问题在于，要看清分析中究竟是什么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分析领域。它同构成分析现象本身的东西完全相同，也就是症状。还有大量所谓正常或次正常的现象；在分析出现以前，它们的意义从未得到澄清。这些现象远远越出话语和言说，因为它们极其广泛地发生在主体的日常生活中，过去不仅一直成问题，而且从未被触及。

随后还有“口误”“记忆障碍”“梦”，以及分析所阐明的另一些现象，尤其是“诙谐语”。它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中具有如此关键的价值，因为它真正让人感受到、让人亲手触及：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分析现象同语言的关系具有何等彻底的连贯性。

我们先来说分析现象不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前言语”，恰恰是分析为之带来巨大光亮的东西；换言之，为了理解和辨认它，分析提供了一件上佳工具。

必须区分被一件工具、一个技术装置照亮的东西与这个技术装置本身；必须区分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这种“前言语”在分析学说中本质上同前意识相连。它是内在与外在印象的总和；主体可以依据自然关系来假定这些印象——如果人身上确实存在完全自然的关系的话。这样的关系确实存在，无论它们已遭到多么严重的扭曲。

一切属于前言语秩序的东西，都参与我们不妨称作一种世界内在的格式塔。主体从中接收的信息——按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说——无论多么特殊，依然是关于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信息。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这里曾经需要那些［……］，也有主体曾经是、并仍然是的儿童玩偶。他是排泄物客体，是下水道，是吸盘。正是分析召唤我们探索这个想象世界。这一切都参与一种野蛮的诗意；分析家绝非第一个让人感受到它的人，它也赋予某些诗作以魅力。我们在这里置身于我所谓“巨大情感意指的无数粼光”之中。

为了表达这一切，词语恰恰大量涌向主体，全都任他使用；它们的组合既完全可及、又取之不竭，就像与之相应的自然一样。这是儿童的世界，你们在里面感到十分自在，因为你们已经熟悉所有这些幻想：上等同于下，反面等同于正面，最广泛、最普遍的等价就是它的法则。也正因此，我们在其中确定结构时仍颇感犹疑。

归根结底，这种情感意指的话语一开始就触及虚构的源泉。它同激情诉求的话语之间相隔着一个世界；后者相形之下贫乏，已经开始絮

叨，因为在那里，理性的撞击已经出现。这种话语所作的工作，最终使它受到的损害远比其外观可能让人猜到的更加常见。

不过，让我们回到想象交流的话语：它的前言语支撑恰恰会自然而然地表达成话语，而且比其他任何支撑表达得更多、更好。我们也看到，单凭它自身，这便是一种最纤细、最不受任何东西疏导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处于一个从来就有人探索的领域——既有人以经验推导来探索，也有人以范畴性的先验推导来探索；我们重新回到一片完全熟悉的土地。这个前意识、这个我们称作想象界的东西的源泉和仓库，其实已经颇为人知；我要说，一种哲学传统早已相当成功地触及过它。可以说，康德的图式—理念处在这一领域的门槛上；至少，这个领域可以在那里获得自己最光彩的资历证明。

至于思想，经典传统中的意象与想象理论仍显得惊人地不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人们等待了这么久，才终于开始开启它的现象学，更不用说为这种现象学建立结构。

归根结底，我们很清楚，对于这个严格说来深不可测的领域：

- 即使我们在它的现象学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仍未能掌握它；
- 分析整理了意象在其塑形价值上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基本意象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后一个问题同生命起源、甚至生命本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望走得更远，我们当然更应期待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以及动物行为观察带来进展；
- 分析所作的清点绝没有穷尽想象功能的问题，即使它确实能够显出这种功能在经济学上的若干根本特征。

所以，这个前意识世界是意识（Bewusstsein）话语的对应物，其中容纳着整个内在世界：它积存在那里，随时准备重新涌现、进入意识之光，并在没有相反命令时任主体调用。我从未说过，这个世界本身具有语言结构。我只是说——因为这是明证——它铭写于语言之中，又在语言中重新铸造；但它仍保有自己特有的道路和沟通方式。分析的根本发现、分析的结构装置，绝不在这里；分析借以发现这个世界中某些东西的手段，也不在这里。

分析竟然把重点放在客体关系本身，这显然非常令人惊讶。把客体关系推到前台，归根结底是在为某种排他性的优势记功；

也就是让这个想象关系世界本身占据优势——这正是我要坚持指出的——从而遮蔽、推到次要地位，

使严格说来属于分析发现的领域恢复秩序、遭到抹除和省略。我还会再谈应当如何把责任分别归给各方。

可以肯定，例如一位名叫克里斯的人近来所发表的论述，清楚标志出这种视角渐次取得支配地位：

- 他把前意识心理过程重新推到前台——他明确如此称呼，因为他读过弗洛伊德——并把分析进展的经济学重心放在这里；这当然自有其意义；
- 他强调自我退行的生产性；
- 他把通向无意识的道路完全重新放到想象界平面上。

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如果我们跟随弗洛伊德，那么有一点再清楚不过：无论对前意识作出多么深入、多么穷尽的探索，都绝不可能由此抵达无意识现象本身。换言之，美国新学派让自我心理学取得极不相称的优先地位，由此造成的幻象，大致就像这样：设想一位理想的数学家突然发现了负数，却开始期望不断把一个正数除以二，等到这种运算的终点便能跨过零线，进入那个隐约瞥见、令人向往的负数领域。

这个错误之所以更加惊人、甚至粗陋，是因为弗洛伊德再三坚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无意识与前意识的根本差异更明确。然而，人们终究把这一切看成一个巨大的杂物袋，以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结构差异；尽管弗洛伊德的强调如此清楚，我仍惊讶于人们竟不能从中准确辨认出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东西。

人们想象，纵然说那里存在一道屏障，情形也不过像在粮仓里把两处隔开的隔板一样，老鼠［原文如此］最后总能钻过去。说到底，当前似乎支配分析实践的根本想象，就是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必定有某种东西彼此相通。只要朝一个方向不断推进，便能把墙壁钻穿。

追随这个观念，会迫使那些还算连贯的作者本人，在理论上添加一些颇为惊人的增补物，其中便有“无冲突领域”的回归——人们至少是这样称呼它的。这是一个极其越轨的观念，不只是在倒退，而且是在逾越。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

即使在最具新唯灵论色彩的心灵官能心理学领域，也没有听说过。

……从来没有人想过把意志安置在某种无冲突的帝国里。而为了说明在他们自己的视角中，究竟还有什么能继续充当分析进展的工具，这个新的“自我”学派的理论家所走到的，恰恰就是这种地步。

的确，如果我们受困于一种把自我变成现象之支配框架的观念，那么自我就成了那个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诉诸的根本框架。一切都经过自我。

于是就很难看出，自我的退行——它又反过来成了通向无意识的道路——怎样还能在任何地方保留一个中介要素；而要设想分析治疗的作用，这个要素又绝对不可或缺。除非把它放进某种真正“理想的”自我里——这里的“理想”带着引号，而且取这个词最糟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无冲突领域。于是，这个领域便成为种种最不可思议、最具反动性的实体化想象的神话场所。

同我们刚刚定位的前意识领域相对，无意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说，分析交流中的一切具有语言结构，这恰恰不意味着无意识在话语中表达自己。我说的是：属于无意识秩序的东西。阅读弗洛伊德的以下著作，会让这一点变得无比清楚、明显而透明：

- 《梦的解析》（Traumdeutung）；
-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
- 以及《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如果不作如下理解，就无法说明弗洛伊德探索这些问题时所走的迂回，也无法说明他在推进研究的过程中所赋予它们的层次感：分析现

象本身——无论是哪一种——并不是一种语言，如果“语言”意味着它是一段话语的话；而我从未说过它是一段话语。分析现象是以语言方式构成结构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现象变体，而且绝非无足轻重的一种；恰恰相反，它最为重要、最能揭示人本身同语言领域的关系——这就是分析现象。任何分析现象，任何以其自身资格参与分析领域、分析发现的现象，任何我们在症状、尤其在神经症中面对的现象，都是以语言方式构成结构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这种现象总会呈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根本双重性；意味着其中的能指拥有自身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分有语言中能指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能指区别于其他各种符号的那个点。我们将沿着前意识的想象领域，一路追踪它的痕迹。

我们从生物性符号出发；动物心理学的实验已经向我们表明它的重要性。在动物的结构、形态本身中，存在某种具有捕获价值的东西；凭借它，符号的接受者——例如看见知更鸟胸前红色的动物、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接收这一符号的动物——便进入一连串行为，进入一种此后统一起来的行为。这种行为把符号的携带者同感知它的动物连接起来。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切的观念，说明何谓自然意指。从这里出发，即使暂且不去追究这种东西在人类那里如何形成，我们显然也可以通过一系列过渡，逐步达到对自然符号的全面提纯和中性化。

符号会在某一点同其客体分离，那就是痕迹——沙滩上的脚印，属于那个未知人物，他后来会成为鲁滨逊在岛上的伙伴。鲁滨逊不会误认

这种符号。我要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符号同客体的分离；痕迹具有否定性和分离性，它把我们引向我所谓自然符号的秩序和领域，并抵达它严格说来最为消隐的极限点。

这里，符号与客体的区别再清楚不过，因为痕迹恰恰是客体离开、去了别处以后留下的东西。我甚至要说，从客观上看，并不需要任何主体或任何人来辨认符号，这个符号和这道痕迹便已经在那里。即使没有人观看，痕迹也仍然存在。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能指的秩序？能指确实已经在某处。它可以延伸到符号领域的许多要素上。但能指是一种不指向客体的符号，哪怕客体只以痕迹的状态存在也不指向；而痕迹却已经预示出它的根本特征。能指同样是某种缺席的符号。但只要能指构成语言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指向另一个符号的符号。换句话说，它与另一个符号在一个对子中彼此对立，而这个对子的关键要素正是其成对性质，也就是两者的配合。我近来已经相当频繁地回到“白昼”这样的主题，以至于让你们惊讶：从白昼与黑夜同时存在的那一刻起，白昼就已经处在能指中。这里涉及的东西，绝不能由经验来定义。经验只能指出一系列光与暗的调制、变换，甚至是脉动和交替，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过渡。

语言始于“白昼与黑夜”的对立。从白昼成为能指的那一刻起，它便被交付给一种游戏的种种变迁；在能指内部，依照能指自身的经济法则，白昼将能够意指相当不同的东西。

能指的这一性质，从根本上标记着一切属于无意识秩序的东西。弗洛伊德著作那套庞大的语文学构架，一直深入最私密的现象内部并在那

里运作；如果不把能指的优先地位、把能指在主体卷入各种分析现象的一切方式中的支配地位推到前台，那么这套构架就完全不可设想。

这应当把我们带向今天要迈出的下一步。我曾向你们谈到大他者是言说的根本；主体在其中承认自己、认出自己，也使自己得到承认。这才是关键所在。在神经症中，那个决定性的、凸显出来的要素，并不是人们所谓某一种受到扰乱的“口腔”“肛门”乃至“生殖器”关系，也不是某种同性恋联系本身。

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知道，在处理这种同性恋关系时，自己何等为难：我们不断在形形色色的主体身上凸显它，可这些主体的差异，又不允许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的本能关系平面，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引入某种同性恋关系。这里涉及的，照字面并严格说来，是一个问题，一道疑问；主体必须在能指平面、在“to be or not to be”——是或不是——的平面、在其存在的平面上认出自己。

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没有必要专门寻找一个格外有利的例子。我选取了一份旧的癔症观察记录。我之所以选择它——这是一例创伤性癔症——是因为它把妊娠与生育的幻想推到前台；这正是在我们施雷伯主席的病史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幻想。因为整个妄想最终归结为：当他相对于上帝的女性化终于走到终点时，一切都必须由他重新生育出来。到那时，将诞生一支带有施雷伯精神的新人类，一系列施雷伯式的孩子。

那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例癔症，恰恰是因为它将帮助我们紧密把握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差异。这里没有丝毫话语幻觉的成分；我们完完全全

处在癔症症状中。这是一份由约瑟夫·哈斯勒留下的观察记录，他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一位心理学家——

——他发表了自己在 1914—1918 年大战末期收集的一例观察。

事情发生在匈牙利革命时期。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故事。这个人 33 岁，是匈牙利新教徒——严谨、坚实，有农民传统——并在青春期末离家进城。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历过颇多变换，而这些变换并非没有意义：先当面包师，继而进入化学实验室，最后成为电车售票员。

这里说“售票员”，指的是拉铃并给车票打孔的人；他也驾驶过电车。有一天，他下车时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又被拖行了一小段。他头上撞出一个包，左侧有点痛。人们把他送到医院，却发现他什么事也没有；医生在他的头皮上缝了一针，闭合伤口。一切顺利。他从头到脚接受检查，人们确信什么病变也没有，于是出院。他照了许多次 X 光，自己也颇为配合。

随后，一系列发作逐渐形成。发作的特征是第一根肋骨处升起一种极为特殊的疼痛；这是一种真正十分奇特、神秘的发作，从这一点向外扩散，使主体陷入越来越严重的不适。他向左侧躺下，舒展开身体，又枕在一个固定住他的枕头上。症状持续存在，并随时间日益明显地恶化。疼痛发作会延续数日，按固定周期重现，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甚至使主体真正失去意识。

人们重新提出所有问题，又把他从头到脚检查一遍，仍然什么也找不到。大家想到创伤性癔症，于是把他送到哈斯勒那里接受分析。这份观察极有启发性，我们将从中看到重要的东西。材料十分丰富。这位

分析家属于第一代分析家，他以十分新鲜的眼光看待这些现象，从各个方向作了广泛探索。

不过，这份观察发表于 1921 年，已经带有当时开始笼罩观察与实践的某种系统化色彩；两者似乎相关，因为分析实践正在这个关头转向，后来那场把重心移向阻抗分析的全面翻转正由此产生。从历史角度看，哈斯勒当时也深受新的“自我心理学”影响。

另一方面，他很熟悉较早的理论，也就是弗洛伊德最初关于肛门性格的分析——力比多的经济要素可以在自我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这一观念。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主体的自我、行为风格，以及那些显露出退行要素的东西十分感兴趣；这些要素不仅铭写在症状中，也铭写在结构中。

他相当准确地标出了最初几次会谈中某些十分醒目的现象的重要性，也就是主体那种令他颇为困惑的态度：第一次会谈结束后，主体忽然在躺椅上坐起来，瞪着像摸彩球一样圆鼓鼓的眼睛看他，嘴巴张开，仿佛发现了一个意外出现、令人费解的怪物。

另一些时候，主体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移情现象。特别有一次，他猛然直起身子，又朝躺椅的另一头倒下，鼻子抵住椅面，同时把两条悬垂的腿呈给分析家；它的一般意义同样没有逃过分析家的眼睛。总之，这些要素包括想象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也包括立即倾泻而出的种种倾向；它们提出了主体本能倾向的问题，提出一种潜在的、甚至实际存在的同性恋，并伴随观察者所凸显的各类退行要素。

这一切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为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整体轮廓和意义。让我们更仔细地看。这个主体过去适应得相当不错。他同同伴的

关系，是一名积极工会分子的关系；他有点像个领头人，非常关心把自己同同伴联系起来的东西，并在他们中间享有无可争议的声望。作者还注意到，他自学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所有文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作者试图寻找肛门性格的特征，研究也在推进。但到头来，他对主体种种倾向所作的解释，既未被接受，也未遭拒绝；主体只是不动声色地收下，毫无感觉，一切都没有动。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正是弗洛伊德数年前处理狼人时遇到的同一道阻点；由于弗洛伊德在《狼人》研究中另有目标，他并未给出这道阻点的完整钥匙。

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份观察，因为它极富意义。神经症的触发——我是说，它使分析介入成为必要的症状面貌——向我们显出了什么？可以说，我们确实找到了一个创伤，而且这个创伤想必唤醒了某种东西。在主体的童年，我们简直成堆地找到创伤：他还很小、刚开始在地上爬动时，母亲踩到了他的拇指。人们当然会标出，那一刻必定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事情；因为据家庭传说，他从那以后甚至开始吮吸拇指。你们看，阉割—退行。还可以找到其他创伤。

然而，这里有个小小的麻烦。随着材料浮现，人们发现，在神经症的触发及失代偿中——因为主体在发生事故以前自然就已经是神经症患者，否则事故也不会造成癔症——起关键作用的显然不是撞击和事故。事情是在 X 光检查之后才变得复杂、恶化、爆发并以症状形式显露出来的，关键是 X 光检查本身。作者并未看出自己提供的材料具有何等分量；如果说他有某种先入之见，那恰恰指向相反方向。归根结底，正是在这场审问式的检验中——它把主体置于神秘仪器、也就是 X 光设备的射线之下——主体开始发作。而根据材料的全部语境，这些发作的方式、周期和风格，都十分明显地同一种妊娠幻想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主体的症状及症状表现中占支配地位的，无疑包括那些关系性要素：它们在想象层面为主体同客体的关系染上色彩，使人可以从中辨认肛门关系、这个或那个关系，或者同性恋关系。然而，症状所关涉的东西、这些要素本身被纳入其中的东西，是这样一个被提出的问题：

“我究竟是不是一个能够生育的人？”

而且是按照女性的语域来生育。问题处在大他者的层面、词的层面、象征要素的层面；因为作为分析家，我们理应十分清楚，人类主体的性欲整合全都同一种象征承认相连。

如果对主体性位置本身的承认不同象征装置相连，那么分析和弗洛伊德主义就只好消失，因为它们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假如关键不在于这种关系……

正如弗洛伊德从一开始直到最后都始终坚持、正如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那样；

……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即主体在一个预先成形的象征装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装置：

- 给出法则；
- 在性欲中建立法则，而且是此后将成为构成性法则的法则；
- 它攫取整个性欲，只在象征法则这一平面上确立和创设性欲，也只在这里允许主体抵达并实现它。

假如分析不知道这一点，它便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这个主体那里，问题是“我是谁？”或者“我存在吗？”。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存在关系，一种根本关系，一个基本能指。正因为这个问题被唤醒——它当然早已在那里；如今凭着这把钥匙，我们在整份观察中重新找到了它——正因为它作为象征问题被唤醒……

而不是作为主体间关系的某个阶段，或任何类型的想象性重新激活；

……正因为存在着某种超出关系本身的东西，预设主体想要抵达他作为疑问而尝试提出之物的那个词：

- 他的神经症才发生这次新的失代偿性触发；
- 症状本身也才组织起来。无论这些症状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本性，无论它们借取了何种材料，它们自身都会取得这样的价值：成为这个问题的表述、重新表述，乃至反复坚持。

当然，这把钥匙本身还不够。但它得到另一个事实的印证：主体过去生活中的一些要素，此时显出它们在他那里一直保有的全部鲜明性。有一天，他曾躲起来观察父母家附近的一名妇女；她不停地尖叫、呻吟，身体扭曲、疼痛，两腿抬高。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何况，分娩迟迟无法完成，医生不得不介入，把婴儿肢解；他看见那个被分块、也是唯一能取出来的婴儿，被送往走廊某处。

这件事在分析中同他对自身障碍的辨认联系起来；这些障碍本身在这里具有两重价值。它们的意指价值——例如主体开口、请求医生帮助时，其话语所呈现的女性化性质——极为醒目，几乎立即就能被把

握。当我们的分析家把最初的几点发现告诉主体时，主体回应说，检查他的那位医生也已察觉到类似的东西；医生曾对他的妻子说：

“我弄不清他究竟得了什么。如果他是个女人，我想我会理解得好得多。”

这位医生察觉到了它的意指面向，但他没能……

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分析装置；而这种装置只有在语言结构化的语域中才能设想。

……看出所有这一切仍然只是恰当、有利、可以加以利用的材料；其实换作任何其他材料，也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某种超出一切现实或非现实关系的东西，即主体对于自己切身所涉之物的疑问，也就是一个“我是谁？”：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究竟有没有生育能力？”

一旦握有这把钥匙，他的一生便显现出来，并在一个极具生产力的视角中重新排列。例如，人们会谈到这个主体对肛门和排泄功能的关注，并列出许多材料，说明这些东西对他何等重要。但他对自己排泄物的兴趣围绕什么运转？围绕这样一件事：排泄物中的果核被埋进土里以后，是否仍能发芽。主体有一个宏大志向，就是经营养鸡，尤其从事鸡蛋买卖。他还对各种植物学问题感兴趣，而这些问题全都围绕发芽或孵化展开。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电车售票员职业中遭遇的一系列事故，都同某种根本的东西相连；这种东西又关联着许多关于碎裂的事实，关联着他对一场分娩的感知——那场分娩的戏剧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是我们能够为主体问题找到的最终起源，却是它格外富于表现力的一次呈现。

还有一些要素使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故，尤其最后一次事故，看成主体也借以把自己整合进去的某种东西；因为这一点完全显明：他从电车上摔下去——电车对他而言已变成某种意指装置——他坠落，他自己分娩。这就是妊娠幻想的全部主题和唯一主题，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尤其那个戏剧性的结局。然而，它究竟作为何物而占据支配地位？

它是某种东西的能指，而全部语境都表明，主体所涉及的正是这个东西：他是否被整合进严格意义上的男性功能、父亲功能；而他恰恰从未能够抵达这一功能。他娶妻时，特意安排自己娶了一位已经有孩子的女人，而他同这个女人只能维持不充分的性关系。对他而言，象征认同的问题性质，支撑着对这份观察的一切可能理解。

换言之：

- 一切说出的东西；
- 一切表达的东西；
- 一切化为姿势的东西；
- 一切显现的东西；

都只有依据某种有待表述的回答才取得意义；这个回答涉及如下根本的象征关系：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当我这样向你们陈述并概括这份观察时，你们不可能不把它同我在朵拉病例中强调的东西联系起来。朵拉的病例最终抵达的，不正是关于主体自身性别的一个根本问题吗？我说“她自身的性别”，不是问她拥有什么性别，而是问：“作为女人究竟是什么？”朵拉的两个梦完全透明，谈的只有这一件事：“女性器官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面对一种奇特的情形：男性主体恰好处于同样的位置，也就是说：

- 女人追问，作为女人究竟是什么；
- 男性主体同样追问，作为女人究竟是什么。

下次我们将从这里继续。

因为这将引导我们凸显一些要素；若要理解神经症中症状的这种能指价值，它们至关重要。这就是弗洛伊德一直强调的俄狄浦斯情结关系中的不对称。换言之，如果女人不是以同男人对称的方式，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实现自己的性别……

也就是说，她并非就母亲客体认同于母亲，反倒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那样，认同于父亲客体；

……那么，她就必须经历某种东西——这使她多走一段额外的迂回，弗洛伊德从未放弃这一点；后来有人曾从女人、尤其从女人这一侧来

探讨这种东西——以便重新建立这种对称。这并非没有缘由，它也印证了我今天重新提出的想象界与象征界之分。

但你们会看到：女人要抵达自己性别的同一性、抵达作为这种性化的位置时，一方面承受着这段额外的迂回和劣势；另一方面，这种劣势却在癔症中反转为优势。

因为凭借对父亲的这种想象认同——尤其由于她的位置以及俄狄浦斯竞争使她得以询问的处境，这种认同对她完全可及——在癔症中，事情自然而然变得极容易设想，也极容易用图式表示。

你们会看到，对男人而言，恰恰因为俄狄浦斯情结以某种方式构成，使他能够实现并抵达那个最难抵达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实际的男性气概；也恰恰由于这一点，在神经症及神经症的迂回中，他的道路将更为复杂。

# 第14课 · 1956年3月21日

我要补充昨晚的论述：分析家的培养，以及什么会构成这种培养的固有场所，并传授我十分明确地称作一门科学的东西；它的一般特征，就是由语言学加以组织。当然，沿着这个方向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

我昨晚那场讲演的意思是：分析家的培养，首先在于让自己充分浸润于那些已经得到尽可能有力分节的东西——而听众中有一部分人离我们的研究非常遥远。反过来，你们将看到，一种折射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妨说，这是那种糟糕的象征主义、那种含混的象征主义观念所造成的折射。它把严格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中的两样东西混在一起：

- 一种是我们在这里共同理解的象征主义，即在语言中构成结构的象征主义；
- 另一种则是可以称作自然象征主义的东西。我昨晚把它放在一个统摄论述的公式之下：读咖啡渣，不等于读象形文字。

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昨晚所说的内容中有什么显得片面、有所欠缺，那当然也因为它只是我原先想充分展开的论述的伴随部分。不过，面对当时那样的听众，我认为仍必须多少让能指与所指的差异变得鲜活。我甚至举了一些例子，其中有些颇为幽默；我画出图式，随后转向分析中的应用。

我甚至不认为，听众有足够机会听出我怎样费心赋予论述某种具体维度，怎样搭起一副结构，好让人把握我们强调的东西。我曾提醒他

们，弗洛伊德的实践往往把某些东西推到前台；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以下事物的诱人面貌，因而把分析家的注意力迷住：

- 想象形式；
- 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意指关系；
- 主体世界在想象平面、直观平面上的意指价值。

我尤其提醒他们：

-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一切；
- 他着重强调的一切；
- 使这个领域得以组织、推进，并使我们能够把它界定为某种可以移置、同时又有严格入口的东西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严格地把它们投入运作。

与此相反，现象的动力学同某种歧义和根本双重性相连；它来自全部分析领域现象中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你们已经看到，问题在何等程度上围绕着词的问题性运转；而恰恰是一位荣格式分析家带来“象征”这个术语，也绝非偶然。

荣格神话的根底确实包含这样一个观念：象征被设想为我所谓“从深处升起的一朵花”，是每个人深处的东西、是作为类型之人的东西绽放出来。区分在于：象征究竟是这种东西，还是相反，它是一种包裹、容纳、介入并塑造某种东西的要素——我的对话者颇为漂亮地把后者称作创造。

第二部分关乎分析的这种偏折，也就是忘记能指—所指结构这一根本真理以后在分析中产生的后果。在那里，我当然只能指出……

正如我希望自己在整个论述中已经足够有力地分节出来的那样；

……只能指出，以自我为中心重新反观自身的分析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怎样称呼自己，以及当下纽约各圈子所推崇的理论怎样在这套学说中表达自己；

……我指出，这里有某种东西彻底改变了分析现象得以被接近的视角；我也试图说明，它怎样参与了同一种降格、同一种对根本区分的涂抹。

其结果，是把想象秩序中一个在动力上非常有效的弹簧推到前台，也就是自我与自我的关系。

至于这样做可能产生什么后果，我也只能略作勾画。我所强调的是：如果在某处发生了所谓“强化自我”，也就是强调那种始终同自我关系相连、并与之相关的幻想关系，那么这尤其发生在具有典型结构的神经症患者那里——不是所有主体都是神经症患者。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介入方式：例如神经症向性格神经症的扩展，以及无意识的其他意指性表现方式。不过，尤其在神经症中，这种介入所走的方向，恰好同如下事物的解消背道而驰——不只是症状的解消……

症状严格说来存在于其意指之中，不过有时仍可以被调动；

……而且是神经症结构的解消。

我曾在这里指出，我们应当称作强迫性神经症之“神经症结构”的，恰恰就是这一点；这正是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的意义：

- 当他提出新的地形学时；
- 当他强调自我的功能是一种想象功能时。

我还向在场者指出，仅仅粗略查看这一地形学的总体配置，似乎并不会立刻显出：自我绝不是人们——尤其在分析用法中——所说的那种东西。

昨晚我标出了其中最有意义的几点。你们看到，弗洛伊德把自我同严格意义上客体的幻想性质联系起来；而作为幻景的自我……

也就是他所谓“自我理想”：一种制造幻觉、取消现实化的功能，一种根本上使自我自恋化的功能——他白纸黑字这样说；

……却享有实行现实检验的特权。

正是这个功能向主体证明何者为现实。语境毫不含糊：这里准确说的是，主体之所以为任何东西估价、加以强调，并赋予其现实的重音，最终都归于自我作为自我功能的作用；而这个功能又被明言为根本的幻觉功能。我已经指出，从这种地形学出发，通常应当会产生某种结果。

问题是，在典型神经症中，自我究竟怎样被主体当作一个要素来利用；也就是主体怎样借助自我……

亚里士多德说：不能说“人思考”，也不应说“灵魂思考”，而应当说“人借助其灵魂思考”。

……我们则要说，神经症患者借助其自我提出他的神经症问题——那个秘密的问题、被堵住嘴的问题、未得到表述的问题。

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的是：

- 男性或女性癔症患者怎样运用自己的自我；
- 强迫症患者怎样运用自己的自我来提出问题，也就是恰恰：
- 为了不把它提出来；
- 为了维持它；
- 为了使它继续在场。

神经症的结构对我们而言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问题就在它的本性之中：很久以来，它一直只是一个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它本性上就是难题。神经症患者处在一个对称位置：他就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触动我们丝毫不亚于触动他，我们才最不愿意越来越准确地把它们表述出来。

我提醒你们，我一直以来向你们提出癔症问题的方式，就简单说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在朵拉病例中为它投下了最卓越的光。朵拉是谁？她确实被卷入一种得到清楚说明的症状状态；但在这份病例中，弗洛伊德自己承认，他对所谓“客体”犯了一个错误。

他之所以恰恰在客体上犯错，正是因为自己太过集中于客体问题，也就是没有把其中牵涉的根本主体双重性引入考量。他全神贯注于什么可能是朵拉的欲望客体，却没有首先追问——不仅没有问朵拉欲望什么，甚至没有问究竟是谁在朵拉里面欲望。

而他犯错的机括、对其技术的批评……

是他自己在承认自己弄错客体这件事时给出的；也就是说，它关乎主体关系的整个总体地形学；

……弗洛伊德恰恰在这里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因为在这场四人芭蕾中：

- 有朵拉；
- 她的父亲；
- K 先生；
- 以及 K 夫人。

弗洛伊德发现，朵拉真正感兴趣的客体是 K 夫人。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朵拉病例的构型如下：她认同于 K 先生；“朵拉的自我在哪里”这个问题，是通过如下答案解决的——朵拉的自我就是 K 先生。

在镜子阶段图式中，镜像所履行的功能，是主体把自己的意义安置在那里，以便认出自己；它是从同类身上认出自己的典型，也是主体第一次定位其自我的地方——一个想象认同的外部点。朵拉把这个点安置在 K 先生身上。正是从这里出发，正因为她就是 K 先生，她的所有

症状才获得最终意义。弗洛伊德为了说明它们，有时不得不作出略显牵强的转换解释；但如今，一切都变得简单得多。朵拉的失声症发生在 K 先生不在的时候。弗洛伊德给出的说明相当漂亮，却又并非不让人怀疑，因为它几乎漂亮得过头：

“既然他不在，她就再也不需要说话，只需写信。”

这毕竟让人有些疑惑。

她之所以这样突然失声，是因为客体化的方式没有安置在其他任何地方。失声发生，是因为朵拉被直接留在 K 夫人面前。朵拉对于父亲与 K 夫人关系所听闻的一切经验，似乎都同对某种性活动方式的把握相连；这种方式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即 K 夫人为朵拉的父亲口交。在朵拉同 K 夫人面对面的处境中，这显然更能说明为何会有口腔症状介入。不过，这一点在我的论述中完全是附带的。

重要的是：正因为朵拉认同于 K 先生、把自己的自我安置在 K 先生那里，那个根本处境才得以维持——她在神经症失代偿以前确实一直参与其中。朵拉的这种认同使整个处境成为可能；而她另一方面又为此抱怨，抱怨本身也是处境的一部分。

但问题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为什么？这恰恰是她询问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女性气质是什么的方式。

朵拉会说什么？女性癔症患者通过自己的神经症，从根本上说出了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触及了一个根本点。弗洛伊德对现象的把握之所以富有生产力，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症状的［象征］结构平面；这是一个立刻把我们带得更远的真理。

如果说弗洛伊德始终坚持的一切凸显出某种东西……

尽管分析经验所搅动的想象现象激起热情，人们又满怀好意地立刻寻找对称和类比：

“俄狄浦斯情结？多么清楚！男孩的情形已经解释得这么好！那么女孩那里当然也一定一样。而且，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所指出，许多事情的确这样运作。”

……那就是弗洛伊德始终强调俄狄浦斯情结的根本不对称。

这一点是否恰好能让我们进一步进入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辩证法？那个悖论性的面向，难道不正存在于此吗？

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女孩为了父亲而同母亲竞争时，所涉及的只不过是欲望客体？你们会说：她与母亲还有原初的爱之关系，它确实引入了一种不对称。不过，在弗洛伊德刚开始整理自己从经验中观察到的事实时，研究还远未走到这里；这些事实迫使他断言，在女孩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其实还有其他许多不对称要素。弗洛伊德强调的解剖要素使得两种性别在女性的身体组织中并不相同。不对称的原因难道只在这里吗？

弗洛伊德围绕这个主题所作的那些极为细密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个问题呈交、甚至强加给我们。我只需列出其中几篇：

- 《两性解剖差异的若干心理后果》是这一领域中一篇研究的标题；此外还有其他文章；
- 1931 年的《论女性的性欲》（前一篇写于 1925 年）；
- 以及我想写于 1924 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

我们看到，一种根本不对称出现在能指层面、象征层面。严格说来，女性的性别本身没有得到同样的象征化；至少，它的象征化不同于男性性别的象征化：两者来源不同，通达方式也不同。

这个原因无须到任何超出如下简单事实之处去寻找：在另一个位置存在一个极占优势的象征，而想象界在这里提供的却只有一项缺席。菲勒斯格式塔的优势，决定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为了实现俄狄浦斯情结，女人不得不迂回经过对父亲的认同。这同男孩那里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对称，并迫使她在一段时间里走同男孩相同的道路。

女人从父亲一侧进入俄狄浦斯情结。她的想象认同像男孩一样经由父亲而完成；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那个想象形式占据优势，但这个形式本身又被作为俄狄浦斯的中心象征要素。换言之，如果阉割情结在男孩和女孩实现俄狄浦斯的过程中都取得枢纽价值，那恰恰是因为，相对于父亲而言，菲勒斯是一个没有对应物、没有等价物的象征。这里涉及能指中的不对称；正是这种不对称，决定不同主体将循何种道路经过俄狄浦斯情结。

两条道路使他们走过同一条小径：

- 男孩那里是阉割的小径；
- 女孩那里也完全一样，经过那个被确定为女性性欲实现俄狄浦斯之枢纽的东西，也就是阴茎。

我们由此获得了一件颇具特征、也非常醒目的工具，表明能指在主体实现的通达道路——也就是俄狄浦斯经验——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里，对处境作出想象承担绝非不可设想；实际上，甚至存在某种补偿。如果一切只是在所谓亲历经验的秩序中实现，只属于自我感受及感觉的秩序，那么直接体验女性位置、并使之同男性位置的实现相对称所需的全部要素，其实都已具备。

然而，经验反倒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醒目而奇特的差异。为什么其中一个性别若要在主体中获得充分实现，便不得不支撑于另一个性别的形式支架和意象，至少要把它当作自己认同的支撑和基础？

仅此一点，就只能在某个位置找到自己的地方……我只想让你们注意：事情既然如此，这个事实本身便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

- 不可能自行排列妥当；
- 不可能只作为自然的一桩怪事而留存；
- 只能由如下事实来解释：只要象征秩序存在，一切便由它来规整。在象征材料缺失之处，主体实现根本认同、走向自身性欲实现的根本道路，便会遭遇阻碍和缺陷。

这个缺陷来自象征界在某一点缺少材料——因为它需要材料；于是，相对于男性性别所具有的凸显形态，女性性别恰好呈现为较少可欲的东西，具有一种缺席、空无和孔洞的性质。由此，一种根本不对称便显现出来。如果一切都能在驱力辩证法的秩序中得到把握，我们就看不出为何这种迂回和异常会成为必要。

不过，就男性与女性癔症患者的自我功能这一问题而言，这番评论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察觉到某种处在后续问题根底的东西。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能指材料、关乎能指这座道具仓库，也关乎主体同能指整体的关系，也就是同能指能够得到何种回应的关系。

我昨晚谈到“语言存在物”，当然是为了有力触动听众。语言存在物不是有组织的存在物：

- 它们是存在物，这一点毫无疑问；
- 它们是把自身形式压印在人身上的存在物，而我把它们比作化石，在某种程度上也完全恰当；
- 人身上存在着严格说来属于能指的存在物，这一点可以肯定；

……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自在地拥有实体性存在。若说这里有一道问题，问题恰恰在此。

让我们回到神经症中的自我功能。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有两个平面——象征界平面与想象界平面。让我们考察某些交错所造成的悖论，不妨称之为一种功能交叉；它一出现便格外醒目。象征界在人那里的功能唤起什么？它似乎把整个世界体系交给了我们。

正因为人拥有词，他才认识物；他认识多少物，恰好对应于他能够为多少物命名。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所谓的想象界：

- 想象关系同动物行为学的整个领域、同动物心理学、同性关系的功能以及被另一个人的意象捕获相连；
- 它是同一物种内部选择性伴侣的关键机括之一，而被选择者也同时是能够繁殖的伴侣；

……这一点似乎同样不言自明。换言之：

- 一个领域向人类认识秩序的一切中性状态开放；
- 另一个领域却恰恰是客体被爱欲化的领域；

……初看之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种情形。

然而，如果事情如此，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依照弗洛伊德和经验的教导，人类性位置的实现同一场考验、同穿越一种受到根本象征化的关系——俄狄浦斯关系——相连：

- 只有借助一个使主体异化的中间位置，也就是让主体欲望另一个人的客体，并通过另一个人的代理占有它；
- 只有当我们处在一个由能指与所指的双重性本身所构造的位置；
- 只有当男人与女人的功能得到严格意义上的象征化；
- 只有当这种功能确确实实地从想象领域被拔出，并安置进象征领域；

……任何正常而完成的性位置才得以实现。生殖器实现必须经过象征界，必须服从象征秩序这项根本要求；男人由此取得男性气概，女人也由此真正接受自己的女性功能。

反过来——这同样奇特而悖谬——正是在想象秩序中，存在着那种认同关系；客体从这里出发，被实现为竞争对象。认识领域从根本上嵌入认同于同类的原初偏执狂式辩证法。认同另一个人的最初可能性、最初敞开由此出发，也就是认同一个客体。一个客体作为客体被孤立、被中性化，又以特殊方式被爱欲化。正因此，进入人类欲望领域的基本物质客体，要比进入动物经验的多得无穷。

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它当然自有深刻理由——存在着自我在神经症结构化过程中所发挥之根本功能的源泉。当朵拉提出自己的问题，追问“女人是什么？”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只具有询问这一层意义：它试图对女性器官本身作出象征化。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对男人的认同确实是她借以认识的一种手段：如果她认同于作为阴茎携带者的男人，那是因为这个阴茎确实成了她的想象工具，用来把握自己无法象征化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性癔症患者……临床经验表明，女性癔症患者远多于男性，这是因为女人作为女人获得象征实现的道路复杂得多。反过来，就提出这一问题而言——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停留于半途，因为：

- 成为一个女人；
- 追问女人是什么；

……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情。我甚至还要说，正因为没有成为女人，主体才会追问；在某种程度上，追问恰恰是成为女人的反面。她的位置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就是女性主体实现不得不经历的迂回。

正因为她的位置本质上构成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同化，她才比异性主体更容易形成癔症。但另一方面，当问题以癔症的面貌成形时，癔症恰恰也是一种更为适切的解决。它沿最短道路取得这种形式：她很容易仅凭认同于父亲就提出问题。女性在癔症中的位置之所以格外清楚，原因正在这里。从这个意义、凭这一资格，这个位置由于结构简单而对自身呈现某种特殊稳定性。结构越简单，显露断裂点的机会就越少。

至于男性癔症中发生什么，情形将复杂得多。恰恰因为男人的俄狄浦斯实现结构得更好，那个构成女性癔症之问题的问题，在他那里就不太有机会被提出。但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因为，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帮助男性位置实现的能指材料中缺失——没有任何东西同菲勒斯对应——这显然远未穷尽男孩与女孩在俄狄浦斯位置上的不对称。癔症的实现中也存在同样的不对称，其表现是：男性与女性癔症患者提出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男性癔症患者的问题围绕某种关乎女性位置的东西运转——这就是我上次所举病例观察的意义。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那份观察中，问题围绕妊娠幻想运转。这足以穷尽问题吗？生育问题本身也不是女性特有的。我们已经看到，它还围绕碎裂主题、碎裂身体的幻想运转；严格说来，包括功能性碎裂，

甚至解剖学上的幻想性碎裂。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出，这些提供断裂点的东西本身就是癔症现象。

关于这种幻想解剖学，作者们早已强调它在癔症现象中的结构性质：瘫痪或麻木并不遵循神经分支的路径和地形。神经解剖学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覆盖癔症症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这里涉及的始终是想象解剖学。所有这一切构成癔症现象的星丛。不过，我们难道不能进一步说明：在［想象的］所指之外，究竟是什么赋予癔症患者身上那种无疑位于象征界、位于能指层面的东西以意义，而它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仍然［……］？

女性位置与男性位置有一个共同因素：两者都会——尽管道路和措辞无疑不同——面对生育问题。这已经为我们开启一条道路，让我们难以排除父亲身份和母亲身份的本质所具有的问题性质。

这种东西并非仅仅位于经验层面。女性确实拥有母性经验，而且它同父亲身份根本不同；父亲身份本身则在分析之光下提出各式各样的现象、表现和问题，而分析第一次使我们能够为它们带来一些光亮。

最近，我同一位学生谈到早已有人提出的“产翁习俗”（couvade）问题。他提醒我，民族志学家近期为这个始终成问题的问题带来了一些材料。很清楚，严格说来属于象征界领域的经验和调查事实，使人得以在某些时刻裁决“产翁习俗”的意义问题；它过去一直非常含混、令人费解。这些事实是在某种习俗中重新找到的；只有在那里，它们才显得清楚，例如中美洲某个或某些部落的习俗。

直到不久以前，人们仍在犹疑：这种习俗同关于父亲身份机制之意义的各种信念要素究竟有何关系；关系的反冲和罪疚要素又怎样经由女

人反射出来。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十分确切的要素：生育中父亲功能本身受到询问，也就是父亲究竟为一个新个体的创造贡献了什么。

我无须向你们说明，这项断言依据哪些事实。它在能指材料领域带来一个根本的明确化，使人可以判定："产翁习俗"位于有关男性生育是什么、男人怎样参与其中的问题层面。

沿着这条道路、采用这种进路，下面这种说法或许不显得牵强：神经症问题最终把我们引向的，就是反思能指与象征界是什么——它们提供一种形式，严格说来处于存在层面的主体能够嵌入其中，并在其中认出自己是这个或那个。

在这个具有说明性、因果性和协调性的语域中，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解释；而其最终依据无非就是能指链。因果性观念本身也无非如此。不过，仍有某种东西从这张织网中逸出。其实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在象征界层面，有两样东西从织网中逸出。其中之一，是对相继的说明，是存在物怎样一个接一个地从其他存在物那里产生；这正是生育的根本，也就是一个存在物从另一个存在物诞生。象征秩序通过在存在物之间建立相继秩序而覆盖了这一点；但它无法覆盖它们根本的个体化——从第一个存在物中出现另一个存在物，也就是发生创造这一事实。

而且严格说来，这里并不存在创造；整个象征主义都在断言：受造物并不生出受造物，若没有一种根本创造，受造物就不可思议。在象征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说明创造。换言之——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没有任何东西说明，为何必须有些存在物死亡，另一些存在物才能诞

生。生物学家说，有性繁殖同死亡的出现有根本关系；如果这是真的，就表明生物学家也在围绕同一个问题打转。

两个存在物在生命出现之际究竟由什么联系起来？只有当存在物本身被整合进象征界时，这件事才显得不言自明。也就是说，一旦主体在象征界中实现为男人或女人，这个问题便不再向他提出；只有当某种东西像事故一样发生、妨碍他进入象征界时，问题才会出现。

每个人生平中的偶发事件，同样可能造成这种情形。此时涌现的是根本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的问题，也由此成为必要。他说，生命每次再生产时，都要重走它被迫重复的同一个循环，以抵达共同的死亡目标；我们不妨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经验的反映。

归根结底，每一种神经症确实都在能指秩序、在某些特殊而无疑最根本的问题的秩序中，重复一个特定循环。这些问题产生于能指层面，但其背景是人同能指本身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存在某种根本无法被能指同化的东西——他独一无二的存在本身：

- 他为什么在这里？
- 他从哪里来？
- 他在做什么？

换言之，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能指出于一个简单理由，无法为他提供任何要素，那么他为什么会消失？

- 恰恰因为它作为能指，把他安置在死亡之外；
- 因为它作为能指，已经把他当作死者来对待，从本质上使他不朽。

死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神经症创造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方式。我昨晚已经指出这一点，今天暂且搁置，因为今年我们不准备研究强迫性神经症。

我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些一般结构考察，仍只是精神病患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前奏。我特别关注问题在癔症中怎样被提出，因为我们恰恰要知道：精神病机制——尤其施雷伯主席的机制——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病例中，我们也必须看出女性生育的问题怎样尤为鲜明地显现。它是什么意思？我之所以绕这段路，是要把它同问题在癔症患者那里呈现的方式相互定位；同时也借此说明我昨晚触及的那些要点。

为了说明我昨晚特别强调的东西，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弗洛伊德的一些文本。你们当中懂德语或英语的人可以去查阅，从而看出这些不是我自己推演出来的。弗洛伊德理解了神经症，也理解了其他若干东西。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的位置完全可以这样表达：我的工作，就是理解弗洛伊德做了什么。

因此，任何解释——哪怕是对弗洛伊德文本中隐含之物的解释——都绝对正当。所以，我请你们去阅读某些有力阐述这些问题的文本，并不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

令人醒目的是，早在 1896 年，也就是弗洛伊德自己所说他整理、搭建学说的那些年里，他就已经如此思考。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表自己要说的东西；主要著作从完成到出版，始终会有三四年的潜伏期。《梦的解析》在出版前三四年已经写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尤其如此，朵拉病例也是一样。

在这一时期，能指与所指的双重结构绝不是事后才出现的，这一点格外醒目。例如在第 46 封信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正是在这一刻，他开始从经验中看见并得以建构主体的发展阶段——而且这很早——并把它们同无意识及其机制的存在根本联系起来。

尤其醒目的是，他使用“Übersetzung”（翻译）一词，指称主体经验的某个阶段，视其是否得到翻译。翻译是什么意思？这里涉及主体在不同年龄层面发生的事情：

- 他区分的第一个年龄段：一至四岁；
- 随后一直到八岁；
- 接着是青春期前阶段；
- 最后是成熟期。

关键是看到，Übersetzung 观念——主体已经作出翻译这一事实——被推到前台。依照语境，回头参照弗洛伊德怎样如此有力地强调能指要素，是很有意思的。Bedeutung 不能被翻译成只规定能指而非所指的东西。同样，在我请你们查阅的第 52 封信中，你们将准确看到我曾经指出过的一段话。他说：

“我带着如下假设工作：我们的心理机制通过分层排列而产生；手边的材料不时依照新的关系接受改造，并发生铭写上的变动，也就是重新铭写。”

这个理论的根本新意，是断言记忆并非单一，而是复数、多重的，并以不同形式、不同种类得到登记。我提醒你们，他在这里所说的东西，同一项过于受到忽略的研究颇为近似。我前几天向你们讲解过那幅图式；弗洛伊德这样说明它，并强调不同阶段的特征恰恰在于：随着阶段推进，记忆铭写的复数性逐步完成，其中的差异也随之确立。对每一种记忆铭写，他都依据如下复杂性差异加以界定：

- 首先是 Wahrnehmung——知觉。这是第一个原初位置，只能停留为假设，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在主体那里显现出来。

- Bewusstsein——意识——同这种简单形式的记忆彼此排斥；弗洛伊德后来从未改变过这一点。在他看来，纯粹记忆现象作为铭写、作为在主体那里标记出一种新的反应可能性，必须完全内在于机制；也就是说，它在任何时候都不牵涉主体对自己的把握。

- Wahrnehmung 这个真正原初、纯属假设的阶段，是为了标出：必须在问题所涉之物的起点设定某种简单东西，也就是设定记忆本质上由复数语域构成这一观念的起点。

所以，第一个层次是知觉的首次登记；它同样完全无法进入意识，并由同时性联想组织。我们由此把原初建立同时性的要求确立为根基。去年，我们试着围绕符号作一些演示练习；当我们用三个一组的结构，为（+ +、+ −、− −）这样的符号建立存在理由时，它们才开始变

得有意思。把三个一组的组合放在一起，确实就是把它们建立在同时性之中。能指诞生于同时性，能指的存在也同样是一种共时共存。

此后，Bewusstsein 是第二种方式，它被组织成某种因果关系。无意识铭写对应着某种东西，因为它们指明这种新维度的原初诞生将把我们引向何处。这里涉及的将是概念性记忆；弗洛伊德说，它们“同样无法进入意识”。

因果关系观念第一次以自身资格在这里出现：作为能指而构成的能指，开始同另一样东西发生组织关系；而在这里，这个东西只能是所指的继发出现，以及所指所包含的那种捕获——这是绝不可能被误认的。

只有随后才出现 Vorbewusstsein——前意识——即这些东西之间的第三种改造方式。它同投注的意识显现相连；弗洛伊德说，从这一时期起，投注对应于我们的正式词语。正是从这个前意识出发，投注才依照某些明确规则进入意识。他还告诉我们，思想的这种第二意识很可能同词语表象的幻觉经验——词语的发出——相连。其最根本的例子就是言语幻觉经验；在与偏执狂相关的机制中，我们把词语表象听觉化。意识的出现同这一点相连；否则，意识始终不会同记忆发生联系。

在后续全部论述中，他向我们展示：Verdrängung——压抑——现象始终在于，某种属于能指表达秩序的东西掉落了；在从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处在某次铭写、某次图示中的东西掉落下来。也就是说，在某一阶段登记的东西过渡到下一阶段时，它的能指没有完成事后重新分类；而主体进入一种新的能指—意指组织阶段时，恰恰

要求这种重新分类。被压抑之物的存在，应当由此并以这种方式来解释。

它留在一种更早的铭写方式中。铭写观念——一切东西都插入一个支配全部过程、支配登记本身的能指——对于记忆理论至关重要；在弗洛伊德那里，这套理论正是他最初研究无意识现象的基础。

# 第15课 · 1956年4月11日

“Ad usum autem orationis incredibile est, nisi diligenter adtenderis, quanta opera machinata natura sit.”［“若仔细观察，自然为了使言说得以运用而付出的工夫，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西塞罗：《论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

你们不会惊讶于我用西塞罗这句话作为重新开课的题辞。它的意思是：“语言功能蕴藏着何等多的奇迹——nisi diligenter——只要你们愿意勤勉地留心观察。”你们知道，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努力做的。因此，本学期我们也将沿这个主题，重新开始研究精神病的弗洛伊德式结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结构方面留下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把它们称作弗洛伊德式的。

“结构”这个观念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来讨论。不是要回顾它的一般用法，而是要问：明确从结构观点接近一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想指出，我们在分析中有效运用的“结构”观念，包含若干坐标。

就连坐标这个观念，也已经属于“结构”观念。结构首先呈现为一组形成协变集合的要素。如果不是为了标定一个现象、标定某种构成协变集合的东西，我们就不会诉诸结构观念。我没有说“总体”。结构观念确实是一种分析性观念；只有当某个连贯之物被联系到另一个与之互补的东西时，结构观念才会提出。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同对应项闭合、并与其结构相互连带的关系，那么总体观念就会介入；但也可能存在一种开放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补充关系”。

那些以任何方式推进结构分析、研究闭合关系与开放关系怎样彼此连接的人，向来把一种理想视作最令人满意的结构：把闭合与开放连接起来，并从开放一侧将一种循环稍稍打开。我想，你们在这里已经得到足够引导，能够同时理解：结构观念本身已经是能指的一种显现。我刚刚略微指出它的动力学及其含意，这已经把你们引向结构观念。

关注结构本身，就意味着不能忽略能指问题。也就是说，像对能指一样，我们在结构中首先看到以“开放集合或闭合集合”观念为基础的“群关系”，其中各要素本质上彼此相互参照。我们在分析能指与所指关系时学会强调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同样可以在结构中找到。

这不应使我们惊讶，因为细看之下，结构与能指两个观念终究显得不可分离。事实上，当我们分析一种结构时，会发现理想情况下涉及的是能指关系；最令我们满意的，是尽可能彻底地把能指析离出来。在这一点上，［结构］观念把自然科学同我们所在的那些科学区分开来；你们知道，仅仅把后者称作“人文科学”还不够。

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能够划定的唯一界限。我要说的是，就自然科学在我们这里的发展而言，面对物理学，我们必须同时知道：

- 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的观念；
- 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同它区分开来。

恰恰应当依据能指与结构的这些定义，来划出分界和限度。

我们可以说，物理学给自己定下了一条法则：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人使用能指来意指。这一点把我们的物理学同神秘主义物理学区分开，也同本来毫不神秘的古代物理学区分开；

古代物理学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作出这项沉思。我已经多次提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你们应当明白我的意思。对我们而言，它已经成为一条根本法则，任何属于自然科学秩序的陈述都必须满足：能指固然存在于自然中，却没有任何人使用它。

因为，如果我们在自然中寻找的不是能指，就什么也找不到。析出一条自然法则，就是析出一个能指公式；它越不意指任何东西，我们就越满意。我们之所以对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完成感到完全满意，正因为如此。你们若以为那些把惯性质量同一个常数和几个指数联系起来的小公式 [$m = E/c^2$] 具有一丝一毫的意指，那就错了：它是纯粹的能指。也正凭借它，我们才把世界握在掌心。

认为能指会意指某种东西——也就是有人使用这个能指来意指某物——这种观念叫作“万物的征记”（signatura rerum），也是一位名叫雅各布·波墨的人所写著作的标题。它的意思是：正是那个名叫上帝者在这里，通过所有自然现象，用他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不要以为我们所谓基础科学的物理学，意味着消除一切意指。达到极限时，即便确有一种意指，也没有任何人来意指它。

不过，在物理学内部，仅仅一个能指系统的存在，至少已经包含如下意指：存在一个 Umwelt，也就是以下两个能指的最低限度结合：

- 万物是一；
- 或者，一是万物。

对于最一般意义上的这些科学能指，即使把它们缩减到最后这个公式，你们也不应以为它们天然给定，以为某种经验主义能把它们析离

出来。任何经验理论都无法说明最初几个整数为何存在。尽管荣格先生竭力想让我们相信相反的事情，历史、观察与民族志却向我们显示，在能指运用的某个层次……

无论是在某个共同体，还是在某个部族中；

……例如能够抵达数字“五”，本身就是一项征服。

在奥里诺科河流域，完全可以区分出已经学会意指数字“四”的部族，与数字“五”为之开启了惊人可能性的另一个部族；而这些可能性又同数字嵌入其中的整个能指系统完全连贯。不要把这当成幽默；必须逐字认真对待。有人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并记录了数字“三”进入亚马孙某部族时产生的雷霆般效果。

不要以为说出整数序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完全可以设想，超过某个界限以后，一切只会混入模糊的众多之中。经验表明确实如此。经验同样表明，数字“一”只有经过回返才取得最大效力；所以，在获得能指的经验中，我们不能从“一”这里亲手触及起源。这似乎同我向你们所作的一项评论相抵触——任何语言系统都包含全部意指。

你们将看到，它并不矛盾。我所说的，是任何语言系统都能够覆盖全部可能的意指；这不表示任何语言系统都已经穷尽能指的可能性。两者完全不同。我曾向你们作过一项暗示，这就是证明：例如，澳大利亚某部族的语言可以用新月来表达某个数字。这已经足以表明我的意思。

这些评论看起来或许离题甚远，但在我们重新开始今年的论述时，回到它们仍然至关重要……

而且我们每次重新从起点出发，都会回到同一个位置，因为我们始终在起点；

……因此，任何真正的能指本身都是一个不意指任何东西的能指。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恰恰因为能指越不意指任何东西，它就越不可摧毁。

这也显示，那些批评或嘲弄所谓词语的力量的人，走上了何等荒谬的方向。他们通过展示——这向来很容易——使用某个概念时会落入的矛盾，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唯名论，以及某种哲学中的矛盾。例如，为了让意思更明确，可以展示“社会”这类观念的用法何等武断、飘忽，因而多么容易批评。为什么不呢？“社会”这个词发明至今并不算太久。把个体遭遇之事归责于社会这一观念——这种要求最终转化为社会主义建构——在实在中走入具体死胡同；人们可以拿它取乐，而它确实也显明了“社会”这个观念本身的出现何等根本地武断。

我说的是社会，而不是例如城邦。所有这些都绝非不言自明。回到我们那位朋友西塞罗，在同一本《论神的本性》（De natura deorum）里，你们会发现：

- 如果可以这样说，诞生女神（Nation）是人口的女神；
- 诞生女神主持出生。

民族（nation）观念根本不在古代思想的视野中；证明这一点的，不只是一个词语的偶然巧合。所有这些都绝非不言自明。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社会”观念能够被我们怀疑，它才像船艏、像犁铧一样切入我们的社会现实。当我们试图理解精神病层面发生的

事情时，引导我们的观念必须从这里出发：当我谈论主体性的东西，或者我们在这里对它提出问题时，听者心中始终残留一种幻景：

- 主体性同客观性相对立；
- 主体性站在说话者一边，并因此相对于客观之物，站在幻觉一边——无论说话者扭曲它，还是把它容纳在自己里面。

这仍然是把主体性留在说话者一边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所涉及的、迄今在理解弗洛伊德主义时受到忽略，或更确切说被括起、被省略的维度如下：

- 主体性并不位于说话者一边；
- 主体性是我们在实在中遇到的某种东西。

这并不是说，主体性按照我们通常理解“实在”一词的方式被给予我们，也就是让实在包含客观性——分析著作不断把两者混淆。主体性之所以在实在中显现，是因为它预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能够使用能指本身，并像我们一样运用能指的主体：

- 他运用能指的游戏，不是为了意指某种东西，而恰恰是为了在有待意指的东西上欺骗我们；
- 他利用能指不同于意指这一事实，向我们呈现一个骗人的能指。

这种状态至关重要。你们当中还不知道的人可以去核实——我希望大多数人已经知道——现代物理学的第一步正是如此：在笛卡尔那里，

关于欺骗性上帝的讨论，是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物理学奠基时绝不能绕过的一步。

因此，对我们而言，主体性把精神分析赖以奠基的科学领域，同物理学的整个领域区分开。正是这种作为在场者出现在实在中的主体性机关，构成根本机括；它使我们在谈到例如称作神经症的一系列貌似自然的现象时，能够说出某种新的东西。

问题是要知道：

- 精神病是否也属于一系列自然现象；
- 它们是否处于另一个自然说明领域；
- 如果我们把没有任何人使用能指来意指的科学领域称作自然，那么精神病是否属于这个领域。

请你们记住这些定义；毕竟，这是我仔细澄清以后才交给你们的。我相信，它们尤其能给“目的因”批评这类问题带来最大的清晰度。我们如此反感“目的因”观念，却又不断加以运用……

我指的是在当前构成的科学中，以伪装形式运用，例如“恢复平衡”的观念；

……如果“目的因”只是一种：

- 反应过于主动的原因；
- 预先采取行动的原因；
- 因为趋向某物而行动的原因；
- 处在前方的原因；

……那么，它绝不可能从科学思想中消除。

爱因斯坦公式中包含的目的因，同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多；问题不在这里。差异恰恰在于：在这些能指中，没有任何人使用它们来意指任何东西，除了这一点——存在一个宇宙。

那些令我们发笑的事情……我曾在某位先生［……］的书里读到，他惊叹“水”这一要素的存在何等奇妙，并认为这显然证明造物主为了世界秩序与我们的快乐何等费心：如果水不是这种同时又奇妙地流动、沉重而坚实的要素，我们便看不到小船如此漂亮地航行于海面。这确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若以为这位先生［……］是个蠢人，那就错了。他只是仍然生活在一个认为自然生来就是为了说话的时代氛围中。由于我们对因果说明的要求经过某种净化，这种气氛才从我们这里消退。

不过，这种净化无非是为了排除一种想法：任何以能指性质呈现的东西，都是为了意指某物。那些所谓的天真想法，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请注意，眼下有人正在从事一项非常奇特的操作，试图摆脱某些困难……

这些困难恰恰出现在边界领域，在那里，人们不得不引入能指本身怎样被运用的问题；

……而摆脱困难所用的，恰恰是我们曾在这里不时讨论的“交流”观念。

如果我把汤姆金斯的文章收入那期你们多少都已熟悉的杂志，就是想向你们展示“交流”观念的一种天真用法。你们会看到，人们可以走得很远，而且果真已经走得很远——乃至用［讯息？］来书写自然史。有人说，在有机体内部，不同的内分泌系统彼此发送讯息；荷尔蒙前来通知卵巢，一切运转良好，或者反过来，有一点出了差错。

这是对交流观念的正当使用吗？追问在这种场合能否正当地使用“讯息”观念，绝不荒谬。为什么不呢？只要讯息不过是类似于我们把一道可见或不可见的光束射向光电管时发生的东西。事实上，为什么不呢？正如我想自己有一天告诉过你们的，这可以走得相当远。如果我们用探照灯的光束扫过天空，会看到某种东西在半空显现；这也可以被看作天空的回应。我想，随着你们越来越清楚我们怎样使用这些观念，批评自会出现。不过，这样处理问题实际上仍然过于轻易。

我们究竟在何处才能真正谈论交流？你们会说，答案不言自明：必须有回应。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我们是否要规定：从回应被登记的那一刻起，交流就出现了？而定义回应只有一种方式：有某种东西返回起点。这就是反馈图式。

任何包含自我调节的机器，也就是某种东西返回、在某处作为返回物被登记，并因这一登记触发一项操作——无论这项操作怎样发挥作用，都可以称作调节操作——这样的机器都执行了一项回应操作，交

流也从这里开始。不过，严格说来，我们是否已经因此抵达能指及其功能的层面？我要说，没有。由反馈维持的热电机器，并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说其中存在能指运用的东西。

要把能指本身析离出来，就必须从某一点开始——像任何辩证区分一样，它起初以悖论方式呈现：在接收者层面，重要的不是讯息内容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荷尔蒙抵达以后在器官某处触发某种反应，而是在讯息抵达之处，有人确认收到了讯息。

这是否意味着主体性？让我们细看。未必如此。能指的存在，是一个由诸要素构成的相关系统；这些要素彼此占据共时与历时位置。要有能指，就必须设想如下场景：我在海上，是某条小船的船长；夜里，我看到远处有东西在晃动，使我想到那可能是某种信号。此时可以有几种回应方式。

如果我还不是人，就会作出各种所谓模式化的运动和情绪表现。我满足心理学家的描述；我理解了某种东西，做了我告诉你们必须懂得避免的一切。如果我是人，便会在航海日志上记下：“某时，在某经度、某纬度，我们看见了如此这般的东西……”这才是关键。可以说，我把自己的责任置于掩护之下。

能指的区分就在这里：有人确认了作为信号的符号本身。对于不是产生意义、而是属于能指的交流，关键是这份收讫确认。

必须有力地分节这项区分；否则，你们会不断重新落回意指，落回某种只会遮蔽能指、使我们错失能指在行使自身功能时那个原初、固有

而独特机括的东西。我在这里用形象、甚至幽默的形式向你们呈现它，但它绝对关键。因此，请牢牢记住：

- 即使在一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有机体内部，发生着以全或无 [0,1] 的效力为基础的传递；

- 即使由于阈值存在，某种东西在一定程度以前并不存在，却忽然产生特定效果——请记住荷尔蒙的例子；

……只要我们在交流中包含能指秩序的独特性，就仍然不能谈论交流。理由是，某物成为能指，并不因为它采取全或无的形式；而是因为一个构成整体的东西——符号——恰恰在那里不意指任何东西。能指秩序正是从这里开始，并同意指秩序区分开。

如果精神分析教给我们某种东西，如果它构成一项新事物，那恰恰在于：人的发展，以及对他具有最大、最根本利害的功能，绝不能从各种意指——也就是本能——的建构、发展、干涉与组合中直接推导出来。相反，这些意指和本能的运作必须由能指加以分节，并组织成如下方式：

- 一个属人的世界能够由此产生；

- 我们所认识、生活于其中、在其中辨认方向，却又根本无法在其中彻底辨清方向的世界，不只包含意指的存在，而且包含一种能指秩序。

俄狄浦斯情结的组织次序和精细程度，对于性欲规范化至关重要……

正因为它以自身资格、明确地把能指本身的运作，引入对所谓“男人”或“女人”位置的取得；

……如果俄狄浦斯情结不是对能指的引入，我就要求别人给我任何一种说得通的观念。绝不能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同生殖器维度或倾向同时出现，就认为它因此对一个已经实现、完成，并具有属人现实结构的属人世界至关重要。

事实上，只需稍想片刻：

- 如果有什么东西最不适合把分节和区分引入世界，那恰恰就是生殖器功能；

- 相对于世界的一切实在结构化，如果有什么东西最具悖论性，那正是这种在自身本质中趋向最神秘交融的功能。

在必须跨越的俄狄浦斯阶段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本能维度。就这一点而言，情况很清楚：恰恰是前生殖器阶段向我们显示全部多样性和全部材料，使我们更容易设想所谓物质世界，怎样通过意指类比，同人立即置于自身领域中的各类事物联系起来。他对自身交换的全部操弄——身体的、排泄的、前生殖器的交换——足以构造一个客体世界，足以构造一个完整的属人现实世界，也就是存在各种主体性的世界。

主体性唯一真正科学的定义，就是主体能够为了纯粹能指性的、而非产生意义的目的运用能指；这些运用不表达任何属于食欲秩序的直接关系，而是使能指秩序运作，不只是把能指当作已经构成的状态来使用。

到这里，事情很简单。但主体必须征服、获得能指秩序，并被置于能指所在的位置，与之形成一种触及其存在的蕴含关系。换言之，必须发生某种最终形成我们在自己语言中所谓超我的东西。这个词恰好符合能指的定义——它什么也不意指，随时可以取得各种意指，尤其最愚蠢的那些。无须深入分析文献，就能看到人们怎样使用它。

超我确实是某种东西，恰恰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超我的图式究竟是什么？能指必须以何种顺序进入、被引入，并作为一个在场机关建立起来，才会使人的有机体作为人的有机体运作？也就是说，这个有机体不只处于自然环境，还必须依据一个能指宇宙、作为其函数并在与它的关系中得到安排和运作。

我们由此回到上次讨论神经症时留下的岔路口。症状始终是人的有机体被卷入某种以语言方式构成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其功能中的某个要素作为能指投入运作。上次我走得更远，用癔症为例向你们说明癔症性神经症的结构。它是一个问题，也就是围绕一个意指始终成谜的能指组织起来的东西。死亡问题与出生问题是最后两个在能指中恰好没有解答的问题；相对于上述定义，这正赋予神经症以存在价值。

精神病意味着什么？在精神病中，主体同能指的这些关系具有什么功能？我们已经数次试图圈定它。我们不得不始终从外围接近问题，原因想必就在问题本身怎样被提出之中。眼下，我们被迫把这种情形看成严格意义上的障碍和阻抗；只有当我们把研究推进得足够远，看清事情为何如此时，它才会终于向我们交出自己的意指。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并像每次一样打算再前进一步。我曾向你们指出我们在精神病中达到的这种图式：在某一时刻，能指领域中必定

有某种东西没有实现，受到了 Verwerfung，也就是遭到拒斥；随后，它在实在中重新出现。在我们依据经验所认识的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诸关系机制中，这个观念标出一种根本差异：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同别处发生的完全不同。

在分析理论中，弗洛伊德最先有力地分节了这一点；即使在我们研究的《施雷伯主席》等文本中，他也清楚标出了如下区别：

- 一种有意投射：例如我嫉妒另一个人，是因为我在他身上嫉妒自己的情感；实际上，是我把自己身上的不忠驱力归给了另一个人；

- 这种激情确信同妄想确信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谈到后者时，弗洛伊德试图给出公式："从内部遭拒绝的东西，会从外部重新显现"；或者，用一种更为铺陈的语言说，在观念中遭到取消的东西，会在实在中重新显现。

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神经症中，我们同样看到驱力的游戏，也看到它的后果。这个简单公式里面难道没有：

- 某种根本含混、直接无法思考的东西；

- 某种仍不能令我们满意的东西；

- 某种在这个简单公式中被处理得完全有缺陷、毫无意义的东西吗？

如果只停留在这里，我们便同所有作者一样止步于这个公式。我用这种形式向你们呈现它时，并不打算提出什么独创的东西。我想在卡坦的研究中找到一位可以帮助我细看问题的人；他研究了与施雷伯主席类似的病例，并试图紧密把握精神病新形成的机制。

你们将看到，如果在推进问题时，稍稍混淆现实与客观性、甚至与意指观念，就会陷入何等概念困难和离奇的死胡同；为了摆脱它，人们不得不投入各种彼此矛盾的公式。这里涉及一种关于实在检验、某种现实或现实感的独立实现。正因为卡坦的文本如此清楚地展示这些困难，它才很有说明作用。

有一整套现象学主张——眼下已远远越出精神分析领域，而且它在精神分析中占据支配地位，也只是因为它在别处同样占据支配地位——就建立在对意指作用领域与意指领域的混淆上。它从一些本来十分严谨、恰恰围绕能指功能展开的研究出发，却滑向意指领域；这就是所谓心理现象学中的根本混淆。它像一条母狗沿足迹受到牵引；也同那条母狗一样，永远不会被带到任何科学结果。

人们提出所谓 Erklären（说明）与 Verstehen（理解）的对立。我们在这里必须坚持：只有存在 Erklären 的地方，才存在科学结构；而 Verstehen 向一切混淆敞开。Erklären 完全不意味着机械论意指，也不意味着这类东西。Erklären 的本性，是把能指当作一切可设想、可能的科学结构化之唯一基础，对之进行研究并从根本上加以援引。

现在让我们处理精神病问题。例如在施雷伯病例中，起初有一段紊乱期，一个丰产时刻；其中出现一整套症状群。事实上，由于这段时期通常被忽略，恰好从我们指间滑走，它从未得到分析性澄清，大多数时候只能被重构。我们重构这段时期时，几乎可以在其中找到神经症中那套意指与机制运作的一切外观。没有什么比精神病前期的症状学更像神经症症状学。

当我们开始关注精神病本身、作出诊断时，面对的则是这样一个时刻；人们告诉我们：

- 属于无意识的一切都在那里，摊开在外部；
- 属于“本我”的一切都进入了外部世界。

这一点如此清楚；然而，这里显现的各种意指却造成一种真正悖谬的结果：我们恰恰不能在分析层面介入。这是经典立场，而且仍然有效。

没有人忽略过这个悖论。只是，为了解释它而提出的所有理由，全都具有如下性质……

我认为，正因为如此，分析我们刚才指出的那些文本才会很有意思；

……它们把我们带进同义反复、矛盾，以及由完全荒谬的假设构成的层层上层结构。只要稍微把分析文献本身当作症状来研究，就会察觉这一点。

关键机括在哪里？精神病的特征，是否在于客体世界受到某种同驱力有关的意指侵袭、捕获或诱发？如果相信人们给出的定义，精神病的特征是否在于“外部世界的建造”？因为，如果有一样东西同样可以用来界定神经症，那也是这个；神经症仍然是某种［……］。我们从哪一刻开始断言：“主体越过了界限”，越过这条线，进入了妄想？

以施雷伯主席为例。在精神病前期，他鲜活地经历着我曾说处于各种神经症形式根底的那个问题。正是在这段时期，事后通过一些碎片，他向我们显出自己曾受奇怪预感折磨；一种意象忽然侵入他，而对于

像他这样类型、这样风格的男人来说，似乎再没有什么意象比它更不可能进入心中：

“毕竟，作为一个正在承受交媾的女人，想必十分美妙。”

当然，对于跟随精神病全部发展的我们，这并不十分惊人。那么，为什么要在如下时刻之间划线：

- 他仍处在惊慌失措的混乱时期；
- 他的妄想最终实际建构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且不是随便哪个女人，而是神圣的女人，更确切说是“上帝的未婚妻”；这就是他的妄想建构。

这足以界定他的病例、界定跨越界限与进入精神病吗？当然不。卡坦报告过一例比施雷伯早得多发病的病例，主角是一名年轻男子；他得以非常直接地把握情形，几乎恰在病例发生转变时赶到。这是一名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卡坦很好地分析了整个精神病前期，使我们看出：在主体那里，一切能使他进入某种男性典型、实现自身的东西全都不在，一切都缺失了。

主体借助某种模仿，攀附着一名伙伴，并追随他的脚步……

我是在概括我们能够从其症状病例中取得的分析观念；

……总之，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男性态度本身的类型化。

他像伙伴一样、跟在伙伴之后开始青春期最初的性活动，尤其手淫；后来又听从这位伙伴的命令放弃手淫。接着，他在一系列所谓自我征

服练习中认同于伙伴；也就是说，他表现得仿佛自己受到一个严厉父亲的支配，而他的伙伴确实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同伙伴一样，对一名女孩产生兴趣；仿佛纯属巧合，恰好就是伙伴感兴趣的那名女孩。当他对伙伴的认同走得足够远以后，这个女孩便像准备妥当一样落入他怀中。

这显然就是海伦娜·多伊奇夫人在一篇文章中凸显的“仿佛”机制[注1]——我把它的要义告诉你们。她把这种机制视作精神分裂症症状学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维度。严格说来，这是想象补偿机制——你们应当在这里重新看到区分不同语域的用处——是对缺席之俄狄浦斯的一种想象补偿。俄狄浦斯原本会把能指交给主体；它给予男性气概的形式，并非父亲意象，而是父之名。

> [注1] 海伦娜·多伊奇：《“仿佛”及其他文本》，巴黎：瑟伊出版社，2007，“弗洛伊德领域”丛书。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替代物、取得等价的尝试，找到一种等价物。在这个病例中［……］随着不断失败［……］，精神病终于爆发。它所包含的意指同精神病前期并没有根本差异；主体将始终表现得像一个无意识的同性恋者。

他先前已经如此表现。他同那位朋友相处的全部行为——这位朋友是他在青春期尝试结构化自身时的领路要素——将重新出现在妄想中。他从何时开始妄想？从他声称父亲迫害他，要杀死他、抢劫他、也要阉割他的那一刻开始。用人们的话说，主体在这里包含了神经症意指所牵涉的一切内容。

然而，人们没有凸显那个真正的关键点：妄想开始于主动权来自一个大他者的时刻；这个主动权建立在一项主体活动之上："大他者想要这个。"而且还必须有所保留：他不只想要这个，最重要的是，他还想让别人知道，想把它意指出来。

妄想一旦出现，我们就扬起满帆进入主体间性领域；整个问题在于，它为何是幻想性的。但是，由于幻想在神经症中无处不在，我们如此依附幻想的意指，反而忘记了结构。这里涉及的是能指，而且是能指本身：一个主体为了能指性的目的运用它们；这种目的纯粹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意指往往始终成问题。在我们遇到的这套症状学中，意指越成问题，就越牵涉我今天要引入这场辩证游戏的东西。

因为我曾向你们许诺，每个主题都必须在适当时刻进入。这个主题，我去年谈论"伊尔玛注射之梦"时已经预告过，也就是所谓"诸主体的混入"机制。主体间性维度的特征，是你们在实在中面对一个能够运用能指本身的主体；也就是说，他运用能指不是为了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向你们提供信息，而恰恰是为了诱骗你们。

这种可能性至关重要，能指的存在正由此得到区分。但这还不是全部：只要主体和能指运用出现，"我际"（entre-je）——也就是一个被夹置其中的主体——就可能被使用。你们知道，诸主体的混入是"伊尔玛注射之梦"最明显的要素之一：弗洛伊德想知道伊尔玛喉咙里有什么，于是三个医生一个接一个地被叫来。

这三个滑稽人物动手、说话、坚持各种论点，却只会说蠢话；这些"我际"在那里扮演根本角色。他们位于弗洛伊德询问的边缘；这个询问关乎他当时最根本、最重要的关切。在致弗利斯的一封信里，弗洛伊德

谈到防御这一关切时，恰好同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相遇。他对弗利斯说：

“我正在——就防御而言——我正处在自然之外的东西的正中央。”

防御确实就是这样：它同能指有如此根本的关系，不是同意指的优先性相连，而是同对能指本身的崇拜相连，以至于无法以其他方式设想。这只是一点提示。

诸主体的混入，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在妄想中触手可及地看到的东西吗？它对一切主体间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我相信，没有任何语言会不包含某些特殊语法形式来标示它。为了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下面两句话完全不同：“主任医师让自己的住院医师给这名患者做了手术。”以及：

> “本该给这名患者做手术的主任医师，却让自己的住院医师给他做了手术。”

你们应当感觉到，尽管最后发生的是同一个行动，两句话却意指完全不同的事情。妄想中始终涉及这种东西：“有人”“让他们去做”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绝不能简单说，“本我”赤裸裸地在场，并在实在中重新显现。一切仿佛表明：主体面对处于精神病根底的那个能指，陷入某种死胡同或困惑；随后，他通过这种恢复尝试来回应，补偿那场根本爆发的危机——它在这里无疑也由某个问题触发：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假设，主体以格外用力地肯定一个大他者，来回应能指的缺席；而这个作为大他者的大他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成谜。我告诉过你们，大

他者遭到排除，是作为能指承载者被排除。正因为如此，它反而得到更有力的肯定；在它与主体之间——在小他者层面、想象界层面——发生所有这些“我际”现象，它们构成精神病症状学的外观。发生在“我际”层面的现象本性，恰好如此清楚地照亮问题；也就是发生在如下位置：

- 主体的小他者；
- 妄想中掌握主动权者；
- 施雷伯病例中的弗莱希希教授；
- 那位具有如此强大诱惑能力，以至于因吸引力而危及世界秩序的上帝。

重要的、揭示性的——而且正可以说是有意指作用的——是我们在“我际”层面看到话语显现。这个层面就是小他者、主体的分身，那个既是他的自我、又不是他的自我的东西。这些话语仿佛不断流动的生存评注；我们在精神自动症中看到对行动的评注、思想回声。不过，这里的情形强调得更厉害，因为能指本身仿佛受到一种戏弄式的运用。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有些句子开了头，随后中断，只为了［……］仿佛它们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它们组织着句子这种东西——在能指层面，句子不可能缺少这种组织：它包含中段、开头和结尾，不可能不结束；然而，它偏偏利用期待、时间关系和延缓来游戏。

整套游戏发生在能指本身的想象层面。谜由于无法以真正开放的方式得到表述，起初只能肯定小他者掌握主动权；仿佛正因为如此，它才通过展示问题所涉之物来给出解答：这里涉及一种能指本身的关系，所涉及的就是能指。

在“伊尔玛注射之梦”的根底，有一条粗体公式显现出来。它向我们展示弗洛伊德欲望终点处的问题解答：没有什么比一条有机化学公式更重要。同样，在妄想中，我们也从评注现象、从围绕现象产生的纯粹话语嗡鸣中找到一项指示；现象本身向我们指出，问题所涉及的是能指问题。

# 第16课 · 1956年4月18日

今年，我把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置于论述前台并不断坚持；考察精神病，应当尤其能够证明这项区分的意义。我已经从不同进路向你们展示过。今天，我想通过阅读施雷伯留给我们的几段见证，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

这个主体用自己的话说，具有“非同寻常的天赋”，能够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象，甚至追寻它们的真相。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正是它赋予这份见证非同寻常的价值。

在我选出其中一段同你们分享之际，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请注意，在运用分析思维方式接近一般的精神紊乱问题时——无论紊乱已经明显显现，还是潜伏在症状或行为中——我们所做的，始终是寻找意指。

这使我们与众不同，也使人们信任我们：我们仿佛懂得在更远之处、比别人更好地找到意指。我甚至要说，我们真正享有这项特权。精神分析获得的信任就在这里：我们不会在真正的意指上受骗。

当我们察觉某个客体对主体具有何等分量时，问题始终关乎一种意指：主体身上的某种东西在这个意指语域中被牵涉。恰恰在这里发生了分岔；我想让你们停下，看到这里存在一个十字路口。

也就是说，一旦开始追问主体在某种意指中被卷入的是哪一种利害，我们自然会被带向欲望平面，最终被带向本能平面。本能被当作主体欲望和欲求的类型、模具与预先形成；它把主体卷入这个意指，使主

体成为客体的相关项，并从此把他建立在某一种本能关系语域中。分析发现赖以奠基的整套本能理论，便由此建造起来。

这个领域只要稍稍被填满，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意指的操弄内部，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我要说，我们之所以不提出它们，恰恰因为经由这条路几乎立即抵达的意指语域太过丰富。这里有整个世界，甚至几乎是一座关系迷宫；它本身已经包含足够多的分岔、联通和回返，使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满足——也就是说，我们严格说来已经迷失其中。我们每天操弄这些意指时，这个事实清晰可见。以一个同我们主题十分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性恋依恋的力比多，怎样作为参与要素和根本成分进入俄狄浦斯戏剧。

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在这种固着中，同性恋关系的意指倾向于在俄狄浦斯关系、在倒置的俄狄浦斯中显现。我们会在这个语域中解释许多事情。谈到神经症时，我们通常会说：主体防御这种依恋和这种关系；它总是在主体行为中以或多或少隐秘、或多或少潜伏的方式试图显现。

我们会把什么当作防御的原因？主体有不止一种防御方式；而概括说来，有各种已经被称作“防御”的方式。我们还会给这种防御指定一个原因，例如把它界定为阉割恐惧。你们难道感觉不到，我随手取来的这个日常例子，被我们何等不加分辨、轻而易举地到处操弄吗？

我们从来不缺解释；如果不是这个，也会是另一个。任何最普通的分析文本都使人看到，问题从未被提出：这里究竟涉及哪一种连贯秩序？也就是说，同性恋取向的力比多投注究竟依据什么被设定？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直接承认，它对主体包含这种因果连贯性？被同性恋

意象捕获这件事，即使对主体本人而言，为什么会包含他将失去阴茎这个后果？

要作这种推论，我们至少必须在具体病例中确定一项特殊经验；然而，即使有一项特殊经验，我们仍要追问它属于何种秩序，并最终追问所谓原初过程包含何种因果秩序。

我们能够在原初过程中承认因果关系到何种程度？主体在某种想象捕获关系中把握的是哪些因果性方式？难道只要我们从外面看见这项想象关系，就能断言它——以及它包含的全部推论，因为这里涉及想象界；

而这些推论本身也是建构出来的——已经被给予主体了吗？

我并不是说，当主体不幸陷入同性恋关系的被动化捕获时，我们认为阉割恐惧及其全部后果会自动投入运作，这一定错误。我说的是，我们从不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不同病例中很可能有不同答案。这种因果连贯性绝非不言自明，因为它只是被重构出来，而且依据一种完全滥用的外推，把想象界中的事物假定会在实在中包含同样后果。

我要说，我们从不在这个平面提出问题。当我们需要时，会自然而然地悄悄引入某些东西……

- 在本来涉及快乐原则之处；
- 在本来涉及解决、恢复平衡、欲望要求之处；

……只要有助于说明某事，我们随时会暗中引入现实原则；如果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就换另一样东西。

这让我们能够重新把分岔当成一道问题，也就是回到这一时刻：对意指的询问，使我们重新看见主体在一种根本属于想象界的欲望关系中被卷入的利害；至少初看之下，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设想为本质上想象的。

在进入本能的目录、迷宫、复杂性，以及它们彼此等价、互为出口的关系以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问自己：

“人的主体具有意义的一切利害，难道不都包含对法则本身的考量吗？”

这里不只有生物法则——它使若干意指对人的主体具有本能、生物和个体层面的利害。还有：

“其中严格属于能指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换言之，就人的一切意指而言，难道不应追问能指自身游戏及其介入方式怎样持续作用于主体的全部利害……

无论我们把这些利害设想得多么深层、原始和基本；

……也就是把能指自身的法则作为法则来研究吗？

一连许多天、许多课，我以各种方式试图让你们隐约看到某种可以暂时称作“能指自主性”的东西：能指拥有自己的法则；这些法则无疑极难单独析出，因为我们总是在意指中看见并运用能指。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问题的意义就在这里。语言是人与人关系中最根本的现象；我已经向你们展示，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根本区分能指与所

指，便不可能把握、接近语言，甚至无法看出它怎样运作。这项区分使我们看到，能指拥有独立于所指的自身法则。所以：

- 如果精神分析发现的意义——这正是我要求你们在本研讨班迈出的那一步——不只是发现了一些意指，也不只是在意指读取上比以往任何人走得更远；

- 如果除此之外还有某种东西，如果分析发现的关键并不在此；

忽略这一事实，恰恰解释了分析研究所遭遇的死胡同、混淆，以及尤其常见的各种循环和同义反复。[注]

> [注] 斯塔费拉逐字稿此处作 le fait de ne pas s'occuper que de ça…，口语句法缠绕，若逐字处理容易把否定范围倒置。米勒定本第212页整理为 Qu'on néglige ce fait explique…，即"忽略这一事实解释了……"。格里格英译同样作 That this fact is neglected explains…。本译采用定本的逻辑："这一事实"指上文分析必须从意指的读取推进到能指。

而我要说，分析发现确实不只在这里。它的机括并不只在于——正如我们迄今一直误认的——为一系列人类行为赋予所谓力比多意指和本能意指。当然，这一层确实存在！

但关键在于，这些意指，也就是整整一个意指区域……

而且是最原初、最根深蒂固、最贴近需要的意义；这里的需要，指人以最接近动物的方式嵌入那既提供营养、又施行捕获的周遭环境；

……对人而言，这些意指在其延续、形成，甚至在其建立和显现中，都服从能指的法则。

我向你们谈“白昼”与“黑夜”，是为了让你们感觉到：在白昼所覆盖的一切之外，白昼观念本身、“白昼”这个词、“来到光天之下”这个观念，严格说来都无法在任何现实中把握。它没有任何定义或界限；唯一界限是“白昼”与“黑夜”的对立功能。它是一项根本的能指对立，远远越出自己可能覆盖的一切意指。我之所以选择“白昼与黑夜”，当然因为我们的主题正是男人与女人。

能指“男人”同能指“女人”是某种不同的东西……

不只是被动态度或主动态度，不只是攻击态度或退让态度；

……它们不同于各种行为。在这些行为背后，无疑存在一个隐藏的能指；它绝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彻底化身，但“男人”与“女人”这两个词的存在，仍然以最贴近的方式使它化身。

归根结底，如果这些存在语域存在于某处，那就是在词中。它未必是言语化的词，也可能是墙上的一道标记；对原始人来说，也可能是一幅画、一块石头。总之，它处在所有特殊行为方式、关系和模式之外，处在所谓女性或男性态度和行为之外。

说到“属人现实”，这并不新鲜。因为我一说出来，你们就应当认出：当我们声称俄狄浦斯情结对人进入实在的人化结构绝对关键时，所说的正是同一件事，也不可能意指别的。主体不能被看作只是被动卷入整个关系构型及其俄狄浦斯结晶。在三角关系的力线中，我们只有在主体既是他自己、又同时处于另外两个伙伴的位置时，才能分节俄狄浦斯情结、它的不同形态和结果，以及我们赋予它的一切后果。这正是你们不断使用的认同一词的确切含义。

这种主体间性在某个阶段以典型方式被亲历，并经历一场所谓“消解”的危机；这场危机通过向主体引入某种新维度而作出裁定——至于我们怎样称呼这个维度，始终存在讨论。总之，我们以俄狄浦斯为名界定和定位的这场危机，不只是具有这种结构；它无疑显然是象征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思考俄狄浦斯情结。如果俄狄浦斯情结中不存在辩证组织，如果不把它称作一种象征结构，我们就不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但如果我们再补充说，主体必须穿过这种象征或辩证经验，才能进入现实……

而我们通过各种道路，通过文献中流传的一切，通过自己解释事情、就若干基本原则取得一致的方式，确实这样说；

……那就意味着，要让现实存在：

- 要充分进入现实；
- 要让现实具有自身分量；
- 要让现实感成为我们的正确向导；
- 要避免“精神病性现实”，也就是在精神病中跨越现实；

……俄狄浦斯情结就必须被经历过。我甚至不认为这一点值得怀疑；它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不会改变问题。只要有些人确信这一点，问题就已经由此提出。

所以，人的主体在现实整体中的平衡和恰当定位，取决于某种纯粹的象征经验，至少它的某一层包含取得象征关系本身。如今仔细想来，我们甚至何须精神分析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哲学家很久以前没有强调：属人现实不可还原地以能指方式构成结构？我上次再次从这里出发；可以说，属人现实的拱架和力线，都是用能指本身建成的。

这里有一些要素；刚才我说到白昼与黑夜、男人与女人、和平与战争，还可以列举若干。这些东西：

- 并非从现实世界中析取出来；
- 却赋予现实世界以构架、轴线和结构；
- 组织这个世界；
- 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方向；
- 并使现实真正为他存在。

分析所引入的现实，预设主体内部有这张织网，有能指本身的这些筋脉。

把注意力引向这一点，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新发现带给你们。我的意思是，它一直隐含在我们的话语中，却从未被单独析离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本可不造成麻烦，但实际上确实造成了；例如，当你们阅读关于精神病的一切著作时，就会发现：我们谈论精神病所援引的吸引、排斥、冲突和防御机制，同谈论神经症时完全一样。

然而，两者的结果在现象学和精神病理学上终究不同；我们暂且不说相反，因为“相反”这个词在我们自身语域中是否有意义尚且成疑。可到头来，我们没有给出其他说明，只满足于同样的意指效果。

- 错误就在这里；
- 正是在这里，某种东西必然显得彻底不足；
- 正是在这里，我请你们稍停片刻，关注能指本身的结构在精神病中的存在。

事实上，如果意指在精神病中显现，而且我要说，它们增殖得比任何地方都更繁茂：

- 这并不是由于某种使精神病同神经症发生根本区别的动机、起点或根本关系；问题不在这里；
- 问题也不是主体在意指迷宫中的某种迷失，不是他停滞于所谓固着的某个死点，停在这些具有意义的关系秩序中；
- 而是在某个时刻有某种东西显露出来，显现在主体同能指的关系之中。

这包含什么，又能够意指什么？请试着思考一个纯粹能指的出现，思考一个本身同意指如此不同的能指。我们必须想到，能指的区分性就在于它真的有所区别，也就是它本身没有固有意指。依照定义，我们当然甚至无法想象一个纯粹能指的出现。然而，我们一旦提出起源问题，仍必须接近这种出现可能表示的东西。没有这些基本能指，人的意指秩序、这些利害的秩序就无法建立；你们难道看不出……

我们的经验时时使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所有神话所说明的，恰恰就是这些基本能指吗？

你们以为“巫术思维”这个术语……

每当面对某种似乎超出那些人萎缩小脑袋的东西时，现代科学的愚蠢就用这个词开口；这些人仿佛认为，要进入文化领域，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他们自己绝不能被任何使之成为人的欲望攫住；

……你们真以为“巫术思维”足以说明如下这些人吗……

这些人本来完全可能同我们一样理解出生，却把世界的诞生解释为白昼与黑夜、大地与天空；这些存在彼此结合、交媾，并组成一个充满谋杀、乱伦、奇异蚀变、失踪、变形，以及某个要素遭到肢解的家族；

……你们以为，这些人真的逐字相信所有这些事情吗？

若以为他们在解释某种东西，就真是把他们放到当今进化论的精神层次上；后者才真的自以为解释了什么。我认为，就思想不足的方式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不必羡慕古人。

这些神话的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它们恰恰瞄准对人在世界中定位、安置并站稳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

- 要知道哪些是原初能指；
- 怎样设想它们的关系与谱系。

无须到希腊或埃及神话中寻找。格里奥尔先生曾向我们讲解非洲神话：他们以为那里真有一个分成四份的胎盘，其中一份先于其余部分被扯下，还带走一片胎盘，由此引入最初的不对称；这四个原始要素之间的辩证法不断运作，用来说明田地的划分、衣服的穿法、衣服的意义、纺织、某种技艺等等。

这恰恰是能指的谱系；它对人至关重要，使人：

- 能够在其中认出自己；
- 能够重新找到方向；
- 不只发现像刻板外模一样贴在行为上的路标。它不只给人一些模式，而且使人能够在一个此后受到整理的世界中自由通行。

在所谓“现代人”的心理学中，问题难道不正是这一点吗？我们近来开始怀疑，现代人在这个意指秩序中辨认方向时，或许远不如所谓原始人富足；面对许多事情，他沦落到……

必须承认，这同原始人完全不同。原始人至少凭借自己的神话，拥有处理各种特殊处境的钥匙：即便他同一切决裂，仍会受到某种东西的承接，仍能重新找到支撑自己处境的能指；这些能指甚至会准确告诉他，越轨将遭到何种惩罚——越轨可能在不止一个层面造成紊乱——也告诉他那条把根本节奏强加给他的规则。

……而我们似乎只能战战兢兢地留在顺从主义中；只要说的东西没有同所有人完全一样，就害怕自己会有点发疯。这才更像“现代人”的处境。

当然，只要我们多少让能指在实在中的这种在场化身，就可以设想：如果发生了某种我们感到像一个能指出现的事情，这个能指的出现就会发生种种回响，一直深入最私密的行为与思想。一种新宗教之类的语域出现，当然绝不是我们能够轻易操弄的事情；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只用如下方式关注这些问题：

- 意指的转向；
- 感受的改变；
- 至少受到社会制约的关系的改变；

……就会错过新象征、新能指的创造，错过它确实在世界中的出现。我们知道，这种出现会伴随各种所谓启示性现象；而在承载它的人那里，这些现象常以颇为扰乱的方式呈现，以至于我们用来谈论精神病的术语，显得完全不适合指称他们的反应。

基本能指之间的关系若出现一种新结构，它最初会具有摧毁性的性质。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应当以能指秩序中一个新项的出现可能是什么为目标，对这种性质进行研究。

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实际上面对的，是某种处在残余状态、作为不可还原之核出现在一系列触手可及的现象中的东西；我们在某些主体身上考察这些现象，并且明显、切实地触及某种发生在所谓俄狄浦斯关系层面的东西介入其中。

我邀请你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或许我们无法研究一个能指的出现会构成什么——严格说来，我们在职业实践中从未把这种现象本身作为考察对象；不过，此前的全部论述都迫使我们把它推到前台。既然如此，在那些可以直接接近的精神病主体那里，考察一个能指之根本缺失的后果，是否不只可以设想，而且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设想？

在这里，我依然没有说任何新话，只是清楚表述我们话语始终隐含的东西。谈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我们有时会说一个病例或一种神经症是——措辞未必恰当——“没有俄狄浦斯的神经症”；我们不时甚至会想，或许真有这种病例？事实并非如此，但问题确实被提出过。

在精神病中，我们相当容易承认，俄狄浦斯层面有某种东西没有运作、没有完成。一位分析家曾经现场研究过一例偏执狂病例，在某些方面同施雷伯主席的病例完全同构；他也从根本上试图看出这一点。

他确实抵达了这里。从精神病前期一路发展到他作为恢复尝试而呈现的精神病结构全面展开，若不承认这一点，整个过程便无法设想。他清楚看到，这不是普通的恢复；他最后所说的一些东西，也十分接近我将告诉你们的内容。

但有一点不同：他显然不断把事情搅乱并迷失，因为无法像我向你们建议的这样表述问题——精神病在于某处存在一项缺失、一个孔洞，也就是能指本身层面的一项缺失。这可能显得不够充分、不够精确，但它至少已经充分到能够被表述；即使我们不能说——这自有充分理由！——这个能指是什么、将会是什么。

至少，我们可以在某个范围、某个领域中逐步逼近并圈定它。我要说，我们可以标出同它一同显现、并在接近它时受到标记的意指集合

——如果可以谈论接近一个孔洞的话；不过，为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比接近空无更危险。除了由受禁止的倾向或意指引发的防御以外，还存在另一种防御形式：例如不接近那个问题得不到回答的位置。当然，我们因此安稳得很。总而言之——不妨直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特征："不要提问题。"

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这里。不过，既然我们是精神分析家，就必须稍稍回头检视自己所受教育带来的这种原初后果。我们也许毕竟就是为了提出问题，至少在严格能够帮助我们照亮那些不幸者的限度内；他们确实曾经面对问题。

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现在确信：神经症患者那里有一道问题，他们肯定向自己提出过它。精神病患者则未必如此：也许答案在问题提出以前已经来到——这是一项假设。或者，问题自行提出了；这也不是不可思议。

我们已经相当熟悉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知道一道问题并不等于主体自己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会不被提出给一个小他者。最近，有人在分析中对我说："归根结底，我没有任何事要请求任何人。"这是一个悲哀的承认。我向他指出，无论如何，如果他真有某件事要请求，就必定要向某个人提出。这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我们牢牢记住这项关系，那么我说问题也可能先行出现、并非由主体本人提出，就不会显得离奇。

一切都发生在进入精神病之际！还记得我在病人展示中向你们呈现的人吗？有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小个子，看起来非常清醒。他在家庭处境的无政府状态中长大成人；这种无序只是比别人家稍明显一些。显

然，很久以来，他在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什么的情况下，依附于一位朋友；忽然，某件事情发生了，而他无法说明那是什么。

而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当他那位伙伴的女儿……

伙伴的存在已经真正成为他在生存中的扎根点；

……出现在他面前时，发生了某种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在这种病例中当然会把缺少的部分补全。我们会说：他把这感受为乱伦，于是产生防御，接着自然还有这一切。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确切分节并没有多大把握。

凭借弗洛伊德，我们知道矛盾律在无意识中不起作用。这是一个富于启发、很有意思的公式；但若停在这里，就略显简短。不过，靠着这个公式，我们在自己的话语中也可以少顾一点矛盾律。某件事若不能朝一个方向解释，就用它的反面来解释。因此，分析把事情解释得真是美妙绝伦。就是这样！

我们又见到这个“极其清醒”的小个子。他远不如我们懂得这些表现何等醒目，因为严格说来，他在那里撞上了某种东西。为什么不直说：他完全缺少借以辨认方向的钥匙。实际发生的是，他干脆躺在床上三个月，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处于困惑之中。

- 如果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亲手触及那个会一再出现的东西；
- 如果我们懂得时时观看，就会认出它叫作精神病前期：主体感觉自己已经抵达那个对他而言是孔洞边缘的位置；
- 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 如果我们懂得把它留住，只需我们的职业赋予最低限度的敏感性；

……我们便可以逐字认真对待所见之物——只要懂得寻找和观看，就逐字对待它；也许由此会看出，这里是否涉及主体对某种东西的承担，并理解在我们没有置身其中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这不关乎现象学。我们要知道，自己能否设想——不是想象，而是设想——如果从如下观念出发会产生什么后果：对一个主体来说，究竟会发生什么？

- 当问题从孔洞那里向他到来；
- 当起点来自没有能指的地方；
- 当恰恰是缺失本身被感受到；
- 当问题所涉的就是缺失。

我再说一遍，这不关乎现象学，也不是要我们装疯。相信我，我们在通常的内部对话中已经经常这样做了。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这样的病例，问题是严格地逼近一个如此确定的处境所能设想的若干后果。主体拥有一个隐含的能指集合；它足以让他作为现代世界人群中的孤独小人物，构成自己的小小世界。这一点十分清楚。

不是所有凳子都有四条腿；有些三条腿也能站住。我向你们保证，现代世界里大多数人的支撑点少得过分。一旦只剩三条腿的凳子，就绝不能再少掉任何一条，因为事情会立刻发展得非常严重。

问题也许就是如此简单。我们要知道：在主体生平的某个十字路口，他碰上一样从来就存在的东西时，会发生什么？循着这些事情的痕迹，我们一直满足于用 Verwerfung 观念来说明它：从一开始，凳子的腿就可能不够，但它仍能站上一段时间。

所以，问题是要知道，当主体面对的不是一项冲突时，会发生什么……

当然，这可能引起各种冲突，而且不止一项；

恰恰在这里，我们察觉冲突的特殊结构；

……我们不能止步于这个冲突星丛，而应查看冲突的结构是否不同。只有不把问题设定为神经症式的意义失代偿，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冲突星丛才能获得动机和说明。

如果我们看到实际发生之事远为显明，具有远更强的组织作用，就可以设想：若忽然出现某种情况——因为能指始终彼此连带……

我的意思是，由于能指本身的意指作用，所有能指的基本要素从来只会形成一个连贯的东西；

……那么，能指的缺失就必然迫使主体重新质疑整个能指集合。

我要说，这是定位问题的根本钥匙：

- 关乎怎样进入精神病；
- 关乎精神病各阶段怎样相继；
- 关乎精神病的意指。

精神病中的问题时时以隐含我正在告诉你们之物的措辞提出。例如，卡坦试图寻找幻觉的意义时，会怎样表述？他说：“幻觉是一种同其他防御一样的防御方式。”而且他也察觉，存在一些彼此不同、却十分相近的现象。一种可以简单称作解释，也就是我曾让你们感受到的那种没有内容的解释确信。

此外还有幻觉及其不同性质。对于两者，他都假定存在相同机制，以不同于神经症的方式保护主体。在神经症中，我们会说，消失的是意指；它躲到某处，一时被遮蔽，而现实仍然挺得住。

在精神病中，这些防御方式不够充分。为了保护主体，某种东西出现在受到深刻扰乱的现实中。主体从外部看见威胁可能来自何处，也就是看见某种会在他里面检验那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应对的本能驱力的东西。

总而言之，这样说还不够深入。我们含糊使用的现实一词显得完全不足。我们的语言谨慎得异乎寻常；然而，我们既然把“本我”当作一种机制，为什么不敢直说？归根结底，本我在这里拥有改变、修改和扰乱所谓物之真相的力量；而主体关心的恰恰就是这个物——依照定

义，人们也假定它必然关乎主体——因为施雷伯病例所涉及的正是它。

例如，问题据说是要保护他免受同性恋诱惑。因此，不只是让他看不见现实中的那个人。其实，从来没有人断言——施雷伯更没有这样说——永恒者忽然亲手给他的男性同类脸上全部盖上一层披风。他仍然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只是承认，他没有真正看见他们——也就是没有按照他们对他的所是来观看：他们是爱情吸引的实际客体。

一旦我们敢于谈论的不是含糊的现实……

仿佛我们撞上去的墙壁现实就是同一回事；

……而是能指性的现实，也就是某种对我们呈现为自我验证、自行建立并为世界定向，还把各种存在物——直呼其名——引入世界的东西，而不只是停顿、阻点和障碍。

既然我们承认各种神秘事物，为什么不也承认，其中尤为神秘的“本我”能够把物之真相变没？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提出问题。也就是，当如下情形发生时，会怎么样？

- 当物之真相缺失；
- 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按照其真相表征它。

例如，当父亲这个语域在其根本功能中缺失；“父亲”之所以被思作父亲，带有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全部内涵：

- 因为父亲不只是生育者；
- 他还有许多其他功能；
- 他是占有母亲的人；
- 他是有权占有她的人；
- 他是原则上和平地占有她的人；
- 还包括这一要求的各种语域和功能，尤其是父亲怎样介入俄狄浦斯的形成、冲突和实现。儿子——这同样是一项功能，而且与父亲功能相关——在其中取得形式；而这一过程似乎包含……

如果我们的经验确实存在的话，包含主体进入男性典型所必需的一切。

那么，如果这可以设想，究竟会发生什么？某个孔洞、某项缺失是否发生在某处？我们可以指出，这个“某处”怎样能够被思考和设想，也可以指出作为缺失的某种东西在何时发生：它缺失于父亲的塑形功能及其在场。如果父亲采取某种关系方式和实际关系，以至于事情的特征不再是冲突；如果儿子取得女性位置，并非冲突造成的效果——例如并非出于阉割恐惧——又会如何？

不妨直呼其名：如果父亲本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完全不必然是自身带有冲突的要素，而可能只是相关主体的呈现方式——成了某

种东西，会怎样？我们都知道，可以说，“怪物”在社会中的增殖会在某个层面造成何种后果，也知道成为其中某个人物的儿子会怎样。我并非徒然称他们为怪物：社会怪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神圣怪物”。这些人物常带有某种光辉或成功风格，但其发展极其单面，完全处在无节制的野心、支配、权威主义、才华或天才的语域中。

这里涉及的东西不必由天才、才华、平庸或恶劣来界定，只需由单面性和怪物性来界定，因为这在人际关系中包含［……］。我们很清楚地认识那类在一位非同寻常的父亲人格阴影下增殖的精神病患者或越轨者。这类越轨者或精神病性人格颠覆特别出现在这些特殊处境中，当然绝非偶然。

假设恰恰是这种情形，使主体不可能在象征层面承担“父亲”能指的实现，那么还剩下什么？

显然，仍然剩下想象关系，也就是一个意象。它完全没有铭写进任何三角辩证法；但现实中的人物本来就是一个意象，所以关系会被缩减为这个意象。镜像异化和榜样的根本功能——主体可以在想象平面依附它、从中把握自己——仍然存在。

它恰恰会存在于这样一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关系中：某个人物或类型只在力量秩序、而不是契约秩序中显现。由此出现的，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竞争关系、攻击性和恐惧，以及你们愿意加上的一切。但必须看见，由此可能而且确实会发生的事情走得很远。因为只要它停留在想象关系平面，被纳入一种纯粹二元而又极不相称的关系，就会取得完全不同于镜像对抗中相互排除关系的意指。它将承担想象界的另一项

功能，也就是想象捕获；从生物层面说，它会直接自行取得性化功能，无须任何中介，也无须认同母亲或任何其他人。

主体会像动物中所见的那样，采取鱼或蜥蜴受威吓时的位置。想象关系会自行、直接地建立在一个本身毫不典型的平面上；它只有一种去人化性质：不给相互排除的关系留下位置，也不给作为自我意象奠基机制的攻击性关系留下位置——在那种关系中，另一个更为完整的榜样提供自我意象运转的轨道。

在这个层面，我们已经可以设想某种东西，它会在主体关系中引入一种比其他形式更根本的异化；这无疑是一种异化关系：

- 但它并不与某种虚无化的所指相连，不同于父子竞争关系的某种方式；
- 它同一种能指的毁灭相连。主体必须长期承担其负担、补偿其后果；他会在一生中借一系列对他人的纯粹顺从式认同来补偿，因为这些人能让他感觉到，要成为男人必须怎样做。

处境可以这样维持很久。因此，我们看到有些精神病主体在生活中一直处于补偿状态，表面上具备一切通常被视为正常男性的行为方式；但不知为什么——天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忽然发生失代偿。

难道我们不能把它设想为：某种事情发生，使那些让主体补偿能指缺席的想象拐杖成为必需，而它们再也支撑不住的时刻吗？

能指怎样重新提出它的要求？缺失之物怎样介入并以自身资格发问？如果情况如此，主体作出的回应为什么必然要经过一系列被称作能指

现象的现象？也就是，主体内部话语会在现象层面发生巨大的紊乱。由能指缺失提出的问题进入时，会怎样显现？

起初，它通过一种必须视作边缘现象的现象显现；也就是让能指本身、主体同话语的关系、主体同内部话语以及始终处在我们里面的大他者之隐蔽话语投入运作。后者忽然被照亮，在自身功能中显露出来；因为此刻只有它还能把主体留在话语层面。整个话语层面已经受到威胁，随时可能从主体那里缺失和消失；这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构成现实真正受到威胁的黄昏，而它正是进入精神病时的特征。

下次，我们将尝试把这一点再向前推进一些。

# 第17课 · 1956年4月25日

> “由此便产生了我不得不假定上帝具有的无数误解；也由此产生了我多年来不得不承受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只要上帝通过我的中介观看，参与我的印象……”

研究任何病例——尤其这个病例——都会让人切实触及并验证：只有找到某种节奏，往往才能真正充分投入其中。在这项对施雷伯主席的分析中，我正试着为你们重新完成这项工作，并回到德文原文。

> “只要我心中的灵魂淫乐仍能带来享受，只要我的智力活动仍会产生用词语表述的思想，只要这三件平行的事情同时发生，上帝便可以说是满足的；他撤离我的倾向几乎、甚至完全不会被我感到，或者只会以最低限度被感到。正如我不得不假定的，这个最低限度是一种周期性危险，由多年前一度采取、却同世界秩序相矛盾的安排所决定。它用来使一切试图冲向上帝、集中到某种中心点的东西同他保持恰当距离；因为上帝自身的存在，会对世界里剩余的一切存在物施加吸引力。
>
> ……但另一方面，人不能不断享受和思考。因此，只要我任由自己什么也不想，又没有同时让严格意义上的淫乐照料发生……
>
> ……射线的撤离便立刻重新出现，并伴有对我或多或少令人不快的附带现象：痛苦感觉、吼叫发作，以及我附近的某种喧响。”

他还补充：

“在这些时候，人们总会通过奇迹闭上我的眼睛，剥夺我的视觉印象。否则，这些印象会继续对那些区域施加吸引作用……”

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读下去，但先停一下。我从这段开始，是要清楚指出今天准备怎样做：施雷伯的书有四百至四百五十页，是一部相当庞大的读物；我会把你们带到其中若干我认为选择得最恰当的位置，让你们看见某种——你们会说——确实位于现象层面的东西。

换言之，表面上，我们不只满足于充当所谓“精神失常者的书记员”——这个说法原本用来责备所谓“精神病医生”无能；经典精神病学研究长期止步于此——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以至于几乎可能遭到另一种更严重的责备：

- 我们不只是做他们的书记员；
- 而且逐字认真对待他们讲述的东西。事实上，迄今为止，这恰恰一直被看成……

必须避免的事情。

那些所谓精神失常者的书记员——也就是最早的伟大观察者，他们为疾病的不同形式作出最初分类——是否正因某种恐惧而停步？归根结底，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听取精神失常者时走得不够远，才把呈交给自己的材料弄得如此干枯，以至于材料最终只能呈现为根本成问题、支离破碎的东西？

回到日常经验：上周五，我见到一名“慢性幻觉性精神病”患者。我不知道在场的人是否注意到，只要不去不惜一切代价判定幻觉究竟是“言

语性的”“感觉性的”还是“非感觉性的”，而只是倾听患者，从中取得的东西就会鲜活得多；妄想的本性所提出的问题也更富启发性。

前几天那名患者使我们看到，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明出一种想象复制：它重现了各种问题。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问题在她先前处境中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情本身牵涉，尽管患者严格说来从未把它们表述出来。

你们觉得，这样概括上周五我展示的患者带给人的感受，真的非常糟糕吗？当然，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就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一切。问题是要知道，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

但如果我们没有在现象的能指—所指层面，按照这些事情自身的平衡来把握它们，而是用经典、传统的心理学或准心理学范畴来处理——问我们面对的是“幻觉”“解释”“感觉”“知觉”还是其他学派范畴——就会错过真正的问题。能指—所指层面绝不能由这些范畴穷尽。若从这里起步，甚至很难指望恰当提出如下问题：妄想是什么？主体相对于意义现象的移位、异常、偏离和位置变化，发生在哪个层面？

对大多数听众——无论心理学家还是医生——来说，这一切显然既是一种教学，也是一项练习。其实不必如此害怕，因为这类工作几乎从未有人做过；我们再怎样建议他们诉诸普通人的经验也不为过。现在，我要给你们一道这样的练习。

请想一想——例如有人就此询问你们——阅读是什么？你们把什么叫作阅读？阅读最理想的时刻在什么时候显现？你们何时能确定自己正在阅读？你们会说，这毫无疑问：人有阅读的感觉。我们以为，当我们开始把握那些字符时——这些字符必须在意识中出现，阅读才不是

拼字和解码——就会有某种像影响力一样强迫自己的东西产生，也就是某一条意指线索。这确实就是中心问题。

遗憾的是，许多事情同这种说法抵触。在梦中，我们也可能有同样感觉，以为自己读了某种东西，却显然无法断言它同哪怕一个能指存在最微小的对应。服用某些有毒物质也会带来同样感觉。这提示我们，不能信任对事情的情感把握；必须给出稍微更精确的公式，引入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客观性。一旦走上这条路，问题就开始了，你们同时也会看到复杂性随之开始。无须用装作阅读之类的极端病例来说明；我们当然都见过这种情形。

很久以前，我曾到一些早年取得独立的国家略作旅行。一位阿特拉斯山领主的管家负责接待我；他接过写给自己的小纸条。我立刻发现他什么也看不懂，因为纸拿反了。但他为了不在周围恭敬的人们面前丢脸，仍非常庄重地念叨着某些东西。他究竟读了还是没有读？无可争议，他读出了关键：我是否获得许可。

还有另一个极端：你已经把文本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即使你识字，这种情形也远比人们以为的常见。天哪，对于你们在心理和医学训练中日常使用的大多数弗洛伊德文本，可以说，你们早就全都背熟；而你们花大量时间读遍浩繁文献时，绝大多数时候只在阅读自己已经背熟的东西。

这使所谓科学文献的基础变得极其相对，至少在我们的领域如此；因为我们的领域在我刚才所谓所指与能指的问题上享有某种特权。归根结底，人们常有一种印象：在最深层引导科学话语意图的，或许恰恰无非是准确留在已经说过之物的界限内。

我的意思是，这种话语的终极诱惑仿佛只是要证明：从话语角度看，署名者就像向交流对象作出的一道手势，表明自己不是零——例如，他能够写出所有人都在写的东西。

既然我们毕竟如此重视话语，为什么反倒轻视一个被假定属于无意义秩序的主体所能提供的见证？它至少更加独特，有时甚至更为原创。在最普通、最日常的科学生活中，我们已经明显看到脱节：不同作者的智力能力无疑差异极大，可他们在话语中带给我们的东西，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我们确实可以推定，所谓主体的心理在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受到深刻扰乱；但为什么预先宣告他讲出的东西已经失效？也许，他告诉我们的事情仍保有自己的价值。

事实上，当我们发现……

不只在施雷伯主席这样非同寻常的病例中，而且在任何最普通的主体那里；

……只要我们懂得倾听，在妄想、慢性幻觉性精神病的秩序中主要显现的，就是主体同语言系统整体及其不同秩序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这个系统在主体那里显现并在场化；只有主体本人能够为这种关系作证，而他会以最大的力量作证。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借口某种不可言说、不可交流、存在于主体某种情感感觉中的东西，而不把这种见证本身收集下来……

你们知道我指什么……就是围绕所谓原始现象、初级现象搭起的那一切；

……主体真正作证的，反倒是语言关系中的某种转向。概括说来，可以把它称作某种“爱欲化”或被动化，称作以某种方式在整体上承受语言现象、话语现象。只要我们不再寻找各种心理的公约数和最小分母，而是拉开亲历的心理经验同一种半外部位置之间的距离，这种见证便确实向我们揭示出语言的一个维度。不只精神失常者，任何人的主体相对于一切语言现象，都处在这种半外部位置。

从方法论上说，我们有权接受精神失常者关于自己相对于语言之位置的见证，把它当作分析主体与语言之全部关系时必须考虑的东西。我们确实找到了这种见证。对于任何阅读施雷伯病史的人来说，他以《回忆录》——这些值得铭记、值得沉思的事情——留给我们的遗产，其最重大而持久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并非悬在空中。为了朝这个方向推进，我们已经通过主体本人知道：他里面的某种东西，在至少某个时刻显现为受到深刻扰乱；某种断裂、某道裂缝出现了，而且严格说来属于同大他者关系的秩序。

他神秘地称作“灵魂谋杀”的东西，一直处于某种半明半暗之中。我们的分析范畴经验，使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方向：其中的意象从根本上同自我的起源有关，也同主体存在之省略点的观念有关——主体正是在这个被称作自我的东西中映照自己。

如果这个平面上确实发生过某种事情，并且主体为之作证，我们就可以把它联系到一个问题：自我意象与一个相对于它被抬高、提升的大他者意象之间发生了什么？后者就是父亲意象，它在主体内部建立自

我与自我理想的双重视角——这里暂且不谈超我。我们还有一种印象：主体可能已经取得，又可能在某一时刻失去这个大他者；他本来可以在其中以自己的话语充分肯定自身。一旦失去它，他就在某个时刻遇到那个纯粹想象的小他者、那个变薄的小他者、那个失势的小他者；他同它只能维持一种关系：这个小他者使他受挫，从根本上否定他，确确实实地杀死他。

这种东西从根本上被缩减到最彻底的形式：

- 被缩减为纯粹想象的异化；
- 被缩减为这种异化所造成的纯粹捕获。由此非常明显、直接产生的，是所谓“永久话语”：它潜藏在主体整个历史的每一次铭写之下，是某种：
- 复现主体全部行动的东西；
- 始终同时在场的东西；
- 而且完全可能在正常主体那里涌现的东西。

我会给你们一些几乎可以通过亲历式外推来接近的例子。例如，独自生活在荒岛上的人物，是现代思想的主题之一。自从鲁滨逊·克鲁索被发明出来以后，这个主题绝非无缘无故；而我们甚至不必追溯太久远的例子。

据我所知，历史上的第一个例子由巴尔塔萨·格拉西安创造：我们看到一个人物在某一时刻生活于荒岛。这显然是一个即使无法通过想象，也可以通过经验接近的心理问题。

人的主体独自生活时，会发生什么？对于一个正要去卖木头的人，潜在话语“我要去卖木头”会变成什么？

只需询问：一个人在山里迷路时，也就是在一段时间里感到不知身在何处、孤立无援时，他的发声会发生什么……

这种现象更容易发生在山里，无疑并非没有理由；

也许，这些地方比别处更少受到人化；

……此时，外部世界会被明显调动起来，仿佛某种意指随时会从每个角落涌出。这足以让我们想到，一段半异化话语怎样永远“准备浮现”。

我认为，这种话语始终存在于主体之中。精神失常者那里发生的事情——例如施雷伯这样的妄想患者所呈现的言语化现象——归根结底只是把它加重了。从这里出发，我们要追问它为什么出现；依照我给你们的公式，要问：

- 它显现在什么的边缘；
- 是为了意指什么；
- 又由什么调动；

……它才出现在妄想患者与精神失常者那里。

我再取一段，同样可以说是随手选择。因为这一切在施雷伯那里如此突出、坚持、反复，以至于我们处处都能找到对我所说现象见证的印证：“不过，在我这里……”

他在谈其他精神失常者——他读过克雷佩林——他们的现象是间歇性的。

> “不过，在我这里，自从开始同唯一上帝发生联系以来，声音对话的这些现象从未停止；唯一例外是最初几周，当时除神圣时期以外，还有非神圣时期。因此，将近七年以来，除睡眠以外，没有哪怕一刻我不曾听见声音。无论身在何处、面对何种场合，它们都伴随我。即使我正同别人交谈，它们仍会继续被听见；即使我尽可能专心从事其他活动，它们也自由地继续进行。例如，当我读书、看报或弹钢琴时，只有在我同别人或独自一人大声说话期间，它们才会被说出词语的更强声音遮盖，使我在这些时刻听不见它们。但这些句子会立刻重新开始，以极响的声音从中断处接续；这无论如何都让我知道，对话线索从未中断。也就是说，在我大声说话期间，那些产生同较弱声音相应之听觉事实的意义刺激或神经振荡，也一直在继续。”

此后，他又考察了节奏减慢这一根本现象。我们必须在这里进一步推进分析：随着现象的推进、发展和演变，会显出某种对能指结构本身至关重要的东西。这里涉及一种可能性——它对意指现象本身绝对关键——可以说，能指是不可切割的。

我的意思是，不能像剪断一段录音带那样，截断一截能指。如果剪断录音带，句子产生的效果并不会停止在你从中间将它切断的那一点。换言之，能指本身包含各类蕴含；有时，你能够把句子补全，并不只因为自己是专业听者或解码者。

在另一些可能性极少、范围有限的情况下，句子最终必须怎样完成，会使人看出必须把什么引入能指。意指单位始终从根本上展示能指依照某些法则运作，而这些法则正是它的关键要素。妄想中的声音利用这项性质，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要解释的，恰恰是主体为什么同能指本身进入某一种关系。如果这种性质在妄想现象中明显呈现，并见于它的一切外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如下假设：精神病真正涉及的根本动因，是同能指现象本身一种更加根本、也更加整体的关系。

这是思考的第一步。从这里出发，我们会追问：为什么在主体生命的某个阶段，这种被视作关键而根本的能指关系，会——暂且只限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占据主体的全部注意，并投注他一切产生兴趣的能力？

在这个层面处理问题：

- 完全不是自我限制；
- 完全不是改变分析能量学与动力学的组织次序；
- 尤其绝不是以任何方式拒绝力比多观念及其经济学。

问题恰恰是看见：

- 对能指的这种整体关系、不同分节的关系或选择性关系，究竟会牵涉什么利害；
- 这种利害本身在精神病现象中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从这里分析精神病。

再看一则关于神圣智慧与人类智慧的简短说明：

> “我想我可以说，神圣智慧至少等于过去世代中存在过的全部人类智慧之和。因为上帝会在所有人死后同化他们的全部神经，由此把所有智慧结合在自身之中，同时逐渐剔除那些只对各个个体有意义、因而不能被视为普遍有效之智慧构成部分的记忆。例如，我毫不怀疑，上帝知道铁路是什么，了解其本质和确切目的。上帝从哪里取得这种知识？在符合世界秩序的条件下，上帝对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只有外部印象，如同对地上任何其他事件一样。他本可以凭借对某个人实行承担的力量……从铁路事务获得关于这些现象之目的与运作的情况说明。
>
> 但他几乎没有理由采取这样的措施。随着时间推移，一代代熟知铁路为何物及其用途的人都会回归上帝。因此，连上帝本人也取得了铁路知识。”[注]

[注] 施雷伯《回忆录》增补第一辑第二节的德文原文作 denen sämtlich die Bedeutung der Eisenbahn geläufig war；但同段先后用 Wesen und Zweckbestimmung、Zweck und Funktion 解释这种知识，故 Bedeutung 在此是“铁路是什么、有什么用途”，不是拉康术语意义上的“意指”。

这提醒你们注意一个必须原样把握的观念。无论它在主体那里显得多么精心构造，它都建立在一项原初经验上：所谓“神经”的观念，同那些把神经人格化的话语彼此等价。“神经”就是整个喋喋不休、叠句和言语化坚持的宇宙之总和；从某个时刻起，它们变成了他的宇宙。

反过来，从某个时刻起，周遭事物一切偶然、附带的在场，都被打上不真实的印记，变成那些“匆匆拼成的男人”。对这个主体而言，在场从根本上变成了言语在场；这些言语在场的总和，确实同神的全部在

场完全相同——它是对他而言唯一的在场，也变成他唯一的相关项和回应者。

所以，我顺带告诉你们的这个观念——神圣智慧是人类智慧的总和——在他那里有一种颇为严格、优雅的公式，甚至使我们觉得面对一小段哲学体系。只要略作改动，我便可以问你们："这是谁写的？"然后看它会不会是斯宾诺莎。真正的问题是，在整套异常连贯的见证中，主体的这份见证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它把他的经验交给我们，而且这种经验从此强行成为现实的结构本身。

其中，第五章特别讨论所谓"根本语言"。我曾告诉你们，依据主体的见证，这种"根本语言"由某种颇有风味的高地德语构成，其中还略微点缀着从德语词源底层汲取的古旧表达。

> "除了日常语言以外，还有一种神经语言；通常，健康正常的人不会意识到它。在我看来，要尽可能理解这种现象，就应当回想一个人试图依照特定顺序把某些词留在记忆中时所采取的过程。例如，一个儿童背诵学校要求朗读的诗，或者一位牧师背诵准备在教堂宣讲的布道。人会默默重复这些词语。"

我们正在接近问题。人可以感觉到，主体对言说涌现之本性的思考，肯定比我们迄今所作的还要多。

> "讲坛上的人邀请会众作内心祈祷时，情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人促使自己的神经作出同各个词语用法相应的振动；严格意义上的发声器官并不投入运作，或者只会不由自主地运作。"

他清楚意识到，言说现象及其特殊位置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有别于发声器官投入运作、或多或少使它在此刻物质化的层面。

> “在正常、符合世界秩序的条件下，这种神经语言的运用只取决于相关神经所属之人的意志。没有人能够强迫另一个人使用神经语言。然而，自从我的神经疾病发生关键转折以来，我的神经一直从外部受到不间断、永无休止的启动。以这种方式作用于人的神经，是神圣射线尤其具有的能力。上帝从古至今都能把梦启示给人，原因就在这里。”

他忽然把梦引入语言世界，把它看作从根本上属于这个世界。一个依照定义本不该知道弗洛伊德以后我们赋予梦以高度能指性质的精神失常者，竟作出这番惊人的非逻辑跳转；指出这一点似乎不无意义。施雷伯肯定对此一无所知。

> “我感觉到某种影响，仿佛一种来自弗莱希希教授的作用；对于这项事实，我只能解释为弗莱希希教授试图征服神圣射线。除弗莱希希教授的神经以外，另一些神圣射线也同我的神经发生联系，在我身边施加作用，造成违反世界秩序和人的自然权利的形式，支配这些神经的使用；如果可以这样说，其方式也越来越怪诞。这种作用很早就以被迫思考、思考强迫的形式显现；这个术语由内部声音本身使用，其他人几乎不可能知道，因为这种现象超出一切人类经验。被迫思考的本性在于，人被迫永不停歇地思考。
>
> 换言之，人本来拥有一种自然权利，可以不时让自己的智力神经通过什么也不想获得必要休息；但从此以后，这项权利被那些［……］进入我并不断想知道我在想什么的射线剥夺了。它们甚至用如下措辞问我：您在想什么？这个问题仅凭形式就已经彻底

> 无意义；人人都知道，人有时既可能什么也不想，也可能同时想到一千件事。我的神经不会回应这样一个自身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诉诸一种思想伪造系统，例如这样回答提出的问题：世界秩序正是这种欲望试图思考的东西。也就是说，人通过［……］语言的作用，迫使我的神经产生同这些词语用法相应的振动。正因此，产生神经附接的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
> 除弗莱希希教授以外——我只确定他至少有一段时间属于活人——主要是一些死者的灵魂，开始对我越来越感兴趣。”

关于这一点，他又在一则注释中作出考察和说明：

> “在这个回答中，‘思考’一词遭到删去。甚至在违背世界秩序的状态明显出现以前，灵魂彼此交往时就习惯以语法上不完整的方式表达思想，也就是删掉某些即使缺少也不会改变意义的词。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习惯退化为一种滥用。之所以可以这样少说，是因为人的智力神经深深扎根于根本语言，总会受到这些碎裂句子的刺激，并自动尝试找出缺失的词。只举无数例子中的一个：多年来，我每天都成百次听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不说出来？’而补全句子所必需的词遭到删去。射线大致这样给自己回答：‘因为我是蠢货。’多年来，我的神经不得不持续承受这类可怕、单调、仿佛自行涌出的无意义之物。以后，我会详细说明选择各个句子的决定性理由，以及人们意图产生的效果。”

这种现象学呈现一种含混关系，有时又极富意义。整章后续内容置于一个特定文化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周遭含义。这套妄想在一个出身于

悠久资产阶级传统的主体那里展开，绝非偶然。施雷伯家族从十八世纪起便相当杰出地参与本国知识生活，其历史确实有迹可循。[注]

> [注]　斯塔费拉逐字稿作“十六世纪”；米勒定本第238页和格里格英译均作“十八世纪”。施雷伯《回忆录》第二章也说相关发展的开端“也许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本译据三者校为“十八世纪”。

我以后还会回到施雷伯父亲的特殊人格。不过，这种妄想……

它在妄想某种第二个开端时刻涌现；

……同所谓“文化包围情结”紧密相连。我们这个时代曾极其悲惨地看见它在那个把整个欧洲投入战争的著名政党那里盛放，也就是被斯拉夫人、被犹太人“包围”。所有这些都完整存在于这个正派人的妄想中；在此以前，除了学生时期明确参加学生社团，他似乎从未热烈投入任何政治倾向。

另一方面，还有一系列远为深刻、奇特而成问题的现象。我在这里指出一个以后还会回到的东西：那些［……］表象相关地存在，并从此对他具有意义；也就是所有这些句子支架，从此仿佛不断把他卷入自己的喧腾。

他为这些灵魂命名、定位，并围绕它们扰乱整个宇宙。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逐渐缩减为那些著名的“小人”。小人吸引了分析家大量注意；卡坦尤其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由于“小人”的命运提供了一些意指要素，它们也许成为各种或多或少机巧解释的源泉。这些“小人”来到他的头里居住……

随着时间推移，经过神经一再缩减、减除或附加，它们仿佛被还原成一根神经；主体把这项吸收过程感受为它们借以融入他本人、从而毁灭他的过程；

……这些小人同时也是其他幻想性小他者的人物。分析家依照分析中寻找意指的法则，把它们等同于精子；从疾病的某一时刻起，主体拒绝失去精子——如果可以这样说——也就是拒绝手淫，正如病史所记载的。

没有理由拒绝这种解释。但在我们看来，即使接受它，问题也没有完全穷尽。这些人物仿佛退行并返回最初的生殖细胞；问题恰恰在这里。卡坦解释这些“小人”时，似乎忘记了西尔伯勒很早的研究，这一点十分醒目。西尔伯勒最先谈到有些梦，其中的某些意象明显涉及：

- 精子；
- 或者原始女性细胞，即卵子。

在那个可以被视作分析远古时期的时代，西尔伯勒已经清楚看到，问题不在于这些幻想或梦中小意象，在梦和主体当时的心理中发挥何种功能。有趣的是，早在 1908 年，他已经适时引入它们的出现意味着什么这个观念：这种出现是否恰好具有致死意指——返回起源构成此前一切的终点，等同于死亡本能的一次显现？在当前病例中，我们不可能不亲手触及这一点，因为关于“小人”的这些意指，发生在某种“世界的黄昏”语境中。在妄想开始、并且真正构成妄想运动的一个阶段，这场“黄昏”一直发展到周围所有人类都遭到彻底、完整的去现实化；这是最具特征的要素之一。

无论如何，如果施雷伯病例涉及父亲功能本身实现不完整，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作出评论。所有作者都围绕这一点打转。他们试图说明施雷伯妄想为何爆发、展开；并不是因为施雷伯当时同父亲冲突——父亲早已从舞台消失——也不是因为他的人生失败、无法进入充分的父亲功能。恰恰相反，他正以格外出色的方式跨越职业生涯的一个台阶，取得权威和自主的位置；这个位置似乎在此刻要求他真正承担父亲位置，并以它为参照。

因此，施雷伯主席的妄想更像取决于某种成功的眩晕，而不是失败感。无论作者们怎样试图对弗洛伊德的最初解释引入不同变化，他们对精神病决定机制——至少在心理平面——的理解始终围绕这一点运转。我们是否可以作出如下评论：如果确实要问，在临界阶段的主体身上，父亲功能可以采取哪些一般方式［……］，无论是正常还是病理方式，那么不妨就父亲功能给出三种回答。

在正常情形下，也就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我们会有一条道路——我不说它就是本质——通向俄狄浦斯实现，通向对俄狄浦斯意象的整合与内摄。不过，弗洛伊德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其手段、道路和中介是攻击性关系、竞争关系。换言之，弗洛伊德教导我们，正常情况下，象征整合经由想象冲突而完成。

还有另一条本性不同的道路；我们已从若干熟悉现象中看到它。民族学经验向我们显示了某种现象的重要性……

无论它在多数研究中只剩下多么残余的地位；

……那就是“产翁习俗”。其特征在于，想象实现通过行为在象征层面的投入运作而完成。

我们在神经症中定位的，难道不是某种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吗？

另一方面，我曾向你们谈到埃斯勒描述的那名男性癔症患者：某种创伤性断裂破坏其平衡以后，他开始呈现某种象征妊娠的全部症状；我几周前谈过的主体现象不涉及想象妊娠。妄想中难道没有化身为第三条道路的东西吗？我认为这里有某种十分醒目的东西。请看看这些存在物是什么；它们在施雷伯主席的妄想中具有明显相关项。

它们是吸收的形式；不过——分析家在这里确实触及了一些正确的东西——它们也表征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施雷伯说，世界将由所谓“施雷伯人”、具有施雷伯精神的人重新繁衍；也就是一群微小的幻想存在物，将在大洪水以后进行某种生育，构成指向未来的透视和消失点。我们刚刚看见前两种形式，即正常形式与神经症或类神经症形式。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

- 在一种情形中，重音落在经由想象冲突完成父亲的象征实现；
- 在另一种情形中，则落在父亲的想象实现；
- 它通过行为的一项象征操演来完成……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某种相当奇特的东西在想象界中实现；它既不使神经症患者感兴趣，也不使所谓原始文明感兴趣。我不是说原始人不知道父亲在生育中的实在作用；说他们不知道，我认为是错误的。只不过，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灵魂怎样被生出，是父亲的精神怎样被生出，也就是作为象征或作为想象的父亲。

然而，我们在妄想中看到一种想象功能以“小人”的形式奇异地涌现。假如我们接受分析家把这些“小人”等同于精子的做法，那么这项功能恰好无非是生育的实在功能。三项功能之间这种旋转运动，同时界定父亲功能的问题怎样在不同框架中得到运用；请你们记住它，以便我们在精神病秩序中加以使用。

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已经开始阅读这部文本，并试图最大限度地在能指—所指辩证语域中使阅读现实化，就可以把它用作标定精神病的方法。

我要对所有人，也对这里的每一个人说：如果你们在分析问题的根底处理存在问题——这当然完全正当——不要站得太高。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我向你们呈现的神经症与精神病现象学中，我们处在一套分节得十分清楚的现象辩证法层面。无论人们愿不愿给它命名，作为中心参照并承受主要重音的，终究是言说。

# 第18课 · 1956年5月2日

“Sie lieben also den Wahn wie sich selbst. Das ist das Geheimnis.”

“他们爱自己的妄想，就像爱他们自己。这就是秘密。”

[《手稿 H》，附于 1895 年 6 月 24 日致弗利斯的第 53 封信]

这句话收在《致弗利斯书信》中。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信里看见后来会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相继出现的主题初具轮廓；有时，它们在这里显得格外鲜明。即使没有这些书信，我们或许也并非无法听见弗洛伊德的语调。

5 月 16 日，我会试着接近并向你们再现弗洛伊德的这种语调。它从未减弱，无非就是那种引导并赋予研究活力之物的表达。我的意思是，即使在 1939 年写作《摩西与一神教》时，我们仍能感到，那个贯穿弗洛伊德始终的激情追问丝毫没有减弱。他仍以同样执拗、几近绝望的方式，竭力界定并说明：为什么人就其现实、乃至其存在位置本身，会如此依赖某种显然并非为他而造的东西？《摩西与一神教》已经把它准确说出并命名：它叫作真理。

有人委托我向你们介绍弗洛伊德这个人；为了准备这次介绍，我特意重读了《摩西与一神教》。在这本书里，我似乎再次找到对自己试图让你们感受到之物的印证：分析的中心问题，同真理怎样进入人的生命这项根本问题绝对不可分割。真理有一个神秘而无法说明的维度；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理解它为何紧迫、为何必要，因为人很容易安于非真理，却格外难以运用真理。

你们会看到，我将试着展示：直到最后，围绕《摩西与一神教》的问题抓住并折磨弗洛伊德的，仍然是这个中心问题。这本小书留下了始终鲜活的见证。人能感到那个放弃的手势、遮住面孔的身影；他真正接受死亡，却仍继续前行。文本不断围绕摩西这个人物、围绕假定中的摩西恐惧重新提问；若不是为了追问“真理的维度究竟怎样、沿哪条道路、从哪个入口进入人的生命？”，便看不出其他任何理由。弗洛伊德的回答是：它经由某种构成父亲观念之本质和最终意指的东西进入。

而要让它鲜活地进入人的经济学，就必须满足一项特殊条件：父亲必须同一种本身神圣的现实相连。这种现实比任何其他现实都更具精神性，因为严格说来，亲历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指示父亲的功能、在场和支配地位。

父亲作为生育者的真理、父亲身份观念的真理——弗洛伊德本人称之为精神性的真理——怎样被推到前台？只有借助一场把它一直铭刻到人的肉身和历史中的戏剧，事情才可以设想；也就是借助某种史前以前的现实——它意味着一切历史的起源——即“父亲之死”观念。这显然是神话，是极为神秘的神话；然而在弗洛伊德思想的连贯性中无法绕过，而且明显具有神话性质。

不过，在死亡、在弑父观念中，仍有某种东西受到遮蔽。去年我们的全部工作，现在必须汇流到这里，使我们听见：这种谋杀必须被理解为真正得到铭写的某种东西；弗洛伊德直觉的不可回避性质，不能被排除。

民族志批评没有击中要害。人们可以感觉到，弗洛伊德思想所关乎的，是一场根本的戏剧化；借助它，人内部对自己存在的一次超越——父亲的象征——进入生命。但另一方面，这里也必然照亮了象征自身的本性。正是在这里，我们把象征的本质——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精确地说，把象征的能指性质——同死亡驱力的介入定位在同一个发生点上。

我们所表达的是同一件事，并趋向一个汇合点。问题在于，人的生命中象征之存在具有怎样的根本意义：它作为能指发挥一种原初、而且创始性的功能；首先，它作为纯粹能指而存在。今年对精神病的研究，再次把我们带回这个问题。

我用作题辞的这句话，很能体现弗洛伊德的风格。他在这封信里谈到各种防御形式。我们使用防御观念时，已经把这些形式用得过于经典、过于陈旧，仿佛防御本身很容易设想，以至于不再追问：

- 是谁在防御？
- 防御的是什么？
- 又在防御什么？

人们会发现，精神分析中的一切防御，都是在守护一个幻景、一个虚无、一个空无，却抵御生命中一切有分量、实际存在的东西。当然，当我们在现象中抓住这道终极谜时，现象本身又以不同形式遮蔽它；这些形式出现在这封信中，并第一次格外清楚地向我们展示神经症与精神病的不同机制。不过，抵达精神病时，弗洛伊德开始提问。他仿

佛被一个更深的谜抓住；精神病现象内部的某种东西更强烈地触动他。他说：

“偏执狂患者、妄想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爱自己的妄想，就像爱他们自己。”

这里有一道必须赋予全部分量的回声；它同这条诫命所说的完全相同：

“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

连同它的文学回声，这句话的重音正在这里。这就是秘密，是秘密的意义。它从未缺席，同时构成弗洛伊德思想的开端、中段与终点。

我认为，一旦任由它消散，我们就会失去整个分析进路赖以奠基的关键；只要失去一瞬，我们便会重新迷失在另一种幻景中。弗洛伊德坚持的关键，是那种震动和启示：在实践中，必须谦卑地感知、深切感受到——在精神病主体同其妄想的关系中，存在某种东西，越出他当时能够在如下层面把握的一切：

- 所指的游戏；
- 各种意指的游戏；
- 后来我们会称作“本我驱力”之物的游戏。

这就是某种情爱与依附，某种东西的根本在场化；它对我们而言几乎始终是完整的秘密：妄想者、精神病主体爱自己的妄想，依附它，就像依附自身一样。

我们必须带着这种运动、语调和振动，回到我上次试图处理的东西。我说，我们不会只在这些所谓“言语性幻觉”的现象学中寻找，而要考察一种同语言结盟的特定关系怎样逐步结构化、怎样公开呈现；并试着看出，这种语言关系会在精神病的形式与演变中取得怎样的经济功能。

我想从一些材料出发，也就是施雷伯声称听到的句子。他从各种性质不同的中介存在物那里听见它们：天国的前厅、那些“死者灵魂”或“至福灵魂”，以及各种存在受到剥夺、与其说是存在物、不如说是“存在之影”的含混形式。它们承载声音，以持续话语介入他的生活；施雷伯在其他章节中再次描述，并展示它们的特殊形式。

“我想承认明证：我是蠢货；于是声音停了下来。他们必须被暴露在淫荡的淫乐中，或听凭自己沉溺其中。我想先思考……”

随后，句子中断。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我们可以说，句子中充实、包含语言学家所谓核心词的部分，并没有被体验为幻觉。它只是被隐含；声音故意停下，目的是把这个主题、这个词、这个句子所关乎的意指强加、暗示并迫使主体补上。

“现在是他该被制服的时候了！”

相关知识卡 施雷伯的语言现象：根本语言、新词、叠句与中断句

这里被隐含的是一个远更醒目、承载意指分量的词。然而，主体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它没有被幻觉听见。它仿佛悬在句子的空无上方，

使句子失去平衡；而真正被听见的是语法或句法部分，由助词、连接词、副词构成，是一些空词，却也是执行分节的词。

随后，某种必须强加给主体思想的东西被隐含；突然言语化的部分像一个外部行动，像小他者的一句话，也像那个我称作“妄想的我际”的、既空又满的主体所说的一句话。结尾隐含的是核心词，也就是赋予句子意义和意指的东西。这里同样暗示了某种在根本语言中得到准确定位的东西。

“所以，按照灵魂观念，这现在已经太过分了。”

所谓灵魂观念，在某些比承载叠句的主体略高一级的机关所言语化的东西中，具有自身功能。依照施雷伯，后者承载着他所谓“反复灌输、背诵下来”的词，也就是他认为非常空洞的词。而“反复灌输”被他设想为那套永远以他为对象的评注的一个根本维度。

灵魂观念暗示一些功能性概念；它们以某种风格形式分解不同思想，在妄想内部创造出一套妄想心理学。呼告他的声音拥有某种教条式心理学，向他解释自己的思想怎样构成。这种功能现象，正是这个［核心词？］所指称的东西；它只带来一个纯粹产生意义的要素。我强调能指连接本身受到的一种加重，正是要把你们引向这里；稍后我还会回来。以幻觉形式表达的，是一项缺失本身的表述。

随后，被隐含、却没有在幻觉中大声给出的，是“主要思想”。因此，我几乎要说，它无非就是这个［核心词？］。主体亲历的妄想经验，在现象中向我们交出它的本质。在这项亲历的幻觉现象中——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初级现象——主体本人指出：

“我所缺少的，恰恰是主要思想。”

其意思是：

“我们这些射线缺少思想。”

也就是缺少能够意指某种东西的东西。

这些受到承受的文本整体，为我们提供妄想的材料，甚至可以说妄想的链条。主体同它的关系极为含混，仿佛同时是行动者和承受者；但这套东西被给予他的程度，至少不亚于他组织它的程度，而且它无疑更多受到承受、更多已经结构化，建构尚未显现……这里有一件根本的事情：妄想最终确实作为成品呈现，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作“推理性疯病”。所谓“推理性”，是说它在某些方面合乎逻辑，从次级逻辑的角度看没有裂缝。不过，即使它最终抵达这种综合，它的存在本身仍然构成不小的问题：这套综合经历了一段发生过程；作为起点的要素也许已经孕育着建构，却在原初形式中呈现为封闭、甚至成谜的东西。

当我们关注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幻觉要素时，停留的正是这种原初形式；它们会在可以称作第一阶段的时期构造妄想现象。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疾病绝对的第一阶段：经过数月潜伏——我们以后还会回到它——主体先经历了几个月精神病前期，处在深度混乱中，并发生外部世界衰落、世界黄昏等现象；这段疾病开端约在 1894 年 3 月中旬。

他在前一年 11 月中旬进入弗莱希希的诊所；而到这里，幻觉现象和言语化交流才开始。他把它们归给这个世界的不同层级。这个世界随后重新构造为一个幻想世界，由神圣现实的两个层次［参见 1957—1958

年：欲望图］构成；他称之为“前部与后部的上帝王国”。此外还有各种实体，它们正在不同程度地接近、整合或吸收进这种神圣现实。然而，它们恰恰朝着与所谓“世界秩序”相反的方向运行；世界秩序是妄想结构中的根本观念。它们不是走向重新统一、重新整合进绝对大他者……

在极限处，这个绝对大他者似乎就是从他的妄想经验中涌现的神圣人物；

……反倒朝相反方向附加和依附于他本人。这些形式随着妄想演变而变化；妄想现象起初十分透明。施雷伯的亲历经验清楚表达了一种奇特的内摄现象：他有一处说，弗莱希希的灵魂从那里进入自己；还说它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的细丝，其中有某种东西大到使他无法同化，而这些东西又完好地从他嘴里出来。

这里有一幅亲历的内摄图式，非常醒目；后来，它会消失、减弱或受到打磨，变成远为精神化的形式。事实上，主体将越来越多地遭受这种含混话语某种程度的整合；它呈现为根本成谜、中断的东西。主体同它融为一体，用全部存在给它回应，确确实实像爱自己一样爱它。它于是成为主体同一个小他者之关系的根本要素。

从这时起，他完全整合进一种几乎不能称作“内部对话”的现象；因为能指游戏的优先性不断增强、意指越来越被掏空，而它的全部意指，恰恰围绕小他者的观念和存在得到定位。

这种能指入侵的意指是什么？它在主体内部经济学、根本力比多关系中占据越来越多位置，投注并占满主体的一切时刻、全部能力和全部欲望，同时又越来越被掏空所指。

我曾停下来考察一整系列这种文本；它们不断重复，在这里逐一展开会很乏味。有一点极为醒目：即使有些句子达到极限时可能具有意义，其中也从未出现任何类似我们所谓隐喻的东西。这是所有这些妄想句子的共同特征；请你们尝试进入这样一种询问秩序，因为人们从未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它。

隐喻不是世界上最容易谈论的东西。博叙埃说，隐喻是缩略的比较。人人都知道，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任何诗人会接受这个定义。我说“没有任何诗人”，是因为把诗性风格本身界定为始于隐喻、又在隐喻停止之处终止，也不失为一个好定义。它并不那么容易把握。

“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维克多·雨果

这就是一个隐喻。我们从哪里看出它是隐喻？它肯定不是某种潜在的比较，并不是说：

- 正如禾捆乐于散给穷人；
- 我们这个人物同样既不吝啬，也不怀恨。

这里根本没有比较，而是认同。我要说，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怎样称呼它，隐喻的维度对我们而言必定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容易接近；我们通常把它称作认同。

严格说来，我们对“象征的”这个术语的全部运用，甚至迫使我们缩减它的意义，也就是把隐喻维度同象征的运用区分开。某种意指作为既

定之物占据支配地位，使能指的运用发生偏折并受到指挥，以至于放弃一切预先建立的——我要说，词汇性的——连接。

因为字典用法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想到禾捆可以“吝啬”，更不用说“怀恨”。同样清楚的是，如果语言运用确实能够产生意指，那恰恰而且只发生在人能够说“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的时刻；也就是意指占据支配地位，带动并把能指从词汇连接中拔出的时刻。

这里有能指与所指的歧义，也有［……］达到最大程度、能指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形。能指如此占优势，反而遮蔽了如下事实：若没有能指结构，即没有谓词分节，没有在主体与属性之间保持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禾捆被形容为吝啬、怀恨——就不会有谓词句，不会有句法和能指的原初秩序。正因为有这套秩序，主体才可以同自身性质保持分离和差异，隐喻才可能被使用。换言之，动物绝不可能制造隐喻；即使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动物不能直觉感受到慷慨、热情洋溢，以及某个对象怎样轻易而大量地给予它想要之物。

但动物恰恰没有能指分节，没有话语性。后者不只是带着吸引或排斥的意指，而是能指的排列。正因为动物没有这种养料，隐喻在纯粹由吸引、食欲和欲望构成的动物心理中不可思议。

象征主义的这种用法、这个阶段在隐喻中表达，处在一种我们称作“相似性”的关系中；而这种相似性只由位置显现。换言之，禾捆成为“吝啬”和“怀恨”的主语，正因此，它同波阿斯在不吝啬和慷慨这一点上被认同。禾捆确确实实同问题所涉的主体、波阿斯这个人物完全相同。

这种相似性维度，无疑是语言产生意义的运用中最醒目、最惊人的东西；它如此支配我们对象征主义游戏的全部把握，以至于遮蔽另一维

度的存在。后一维度就是排列和句法；例如，只要打乱这个句子中词语的次序，它就会失去全部意义。谈论象征主义时，这一面受到遮蔽；我们省略了另一个维度，也就是同能指本身的存在及其组织准确相连的维度。

从这里出发，有一件事必然引人注意：有些明确称作失语症的功能障碍，如果在如下对立视角下重新考察，就会变得不同：

- 一边是我所谓“相似性关系”，也就是替代、选择、筛选或竞争关系，总之属于同义词秩序的一切；

- 这一维度同另一维度相对，后者可以称作邻接性、排列、分节和协调，也就是作为句法、作为能指协调的维度。

传统上所谓“感觉性失语症”与“运动性失语症”的对立，早已受到大量批评。如今十分清楚，在一边是相似性关系、另一边是邻接性关系的双重视角下，这种对立能够获得远为醒目的组织。失语症可能涉及的两类变化、两种语言障碍，正依照这两个视角排列。

你们都熟悉韦尼克失语症。你们会看到，这名失语症患者连接起一串句子；从语法角度看，其异常［……］。其中会出现所有连接词和副词；他会说：

“是的，我明白……昨天，当我在楼上时，他已经说了，而我想要；我对他说：‘不是那个，不是日期，不完全是，不是那一个……’”

也就是说，主体显出对句子的一切分节、组织、从属和结构化都很熟练，却始终留在旁边，停在某个东西的言语化以前。你们丝毫不会怀

疑，这个东西确实在场，关乎主体抗议所围绕的某一点；而且几乎毫无疑问，他的抗议有充分理由。他无法给出的，严格说来就是句子所瞄准的东西；他不能赋予它言语化身。但围绕这个受到瞄准的东西，他可以铺开一整圈句法言语化；其复杂程度、组织层次和高级性质，远远不能表明他失去了对语言的注意。然而，只要你想把他带向隐喻，逼他使用逻辑学所谓“元语言”——即建立在自身语言之上的语言——就会彻底抓不住他。

当然，这并不是要把韦尼克型障碍同精神病主体那里发生的事情作丝毫比较，而只是寻找类比。我们的主体听见——不是他自己说——“factum est”（已经完成），随后句子中断。这个现象在我所谓相似性关系层面显现；与之相对的是邻接性关系。如同失语症患者一样，这里有一个理由，使邻接性关系因为意义等价功能缺席、失效而占据支配地位；所谓意义等价，也就是经由相似性关系形成的等价。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我们发现，情形发生在同一个层面，无疑出于不同理由；但为了提出问题，并用相似性与邻接性这两个标题来界定、对照这名幻觉性妄想主体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极其醒目的类比。换言之，在幻觉现象中占据支配、走到前台的是连续性现象；而那些不间断言说的事实，已经把它显示得再清楚不过。这种言说确实得到投注、负载，不妨说，得到力比多化。

正是它把内部句子作为某种忽然变成典型句式、被强加给主体的东西。句子的能指部分、语法部分、仅仅凭能指性质、分节、排列及根

本的能指功能而存在的部分，得到了最强烈的保持；恰恰这一部分取得最大重要性，变成一种在外部世界中强行显现的现象。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换言之，在言语现象中，邻接性现象以这种方式支配相似性现象。失语症患者那里，这是由缺损造成的，缺损发生在那个作为主语的词上。语言功能中的某种东西，使另一样东西阻止他进入这里。我们不要试图把它进一步物质化。

他无法切中事实，无法抵达自己想说、意图说之物的那个词。支配他的，是这种貌似空洞的话语。奇怪的是，即使最有经验的主体——参加检查的神经科医生——面对它也总会发出某种尴尬笑声：这个人物使用大片异常精密、有时富于语调变化的空谈，却永远抵达不了当下必须交流之物的核心。

在失代偿、失衡、加重以及现象的外观中，存在某种类比；我轮流把这项现象称作能指的排列、句法或邻接性。归根结底，正是它在幻觉现象中走到前台，整个妄想也围绕它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首要事实；我们必须围绕它提出精神病意指的全部问题。

在一切语义现象中，我们已经引入能指与所指同等重要这个观念。但分析时，我们始终把所指推到前台，因为它无疑最具诱惑力，初看之下最像分析研究与象征研究的固有维度。然而，如果误认能指那个根

本、中介而原初的角色，误认实际上正是能指构成引导要素，我们不只会使对以下现象真正原初的理解全部失衡，例如：

- 神经症现象本身；
- 梦的解释本身；

……而且会使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

我要再强调：

- 分析研究有一个较晚、最后出现的部分，关乎我们不断运用的认同与象征主义——我们想象不到自己的用法何等片面而偏颇——它位于隐喻维度一侧；
- 另一边则是分节，它作为排列、邻接性和接触现象，使因果性观念中某种原初、结构化、原创和创始的东西初具轮廓。与隐喻相对的另一种典型、极端而示范性的修辞格有一个名字：它叫作转喻。

也就是说，当某个东西有待命名——我们由此处在名称层面——人们用它的容器、部分或与之相连的另一种东西来替代它。关联词语的用法非常清楚地显示这一点。例如，若采用实验室中最简单的词语联想技术，向主体给出“茅屋”这个词。

有不止一种回答方式。有些属于邻接性语域：我可以回答，“茅屋”后面可以接“烧掉它”，从而起一个句子。主体也可以给出各种能够放在“茅屋”位置的词，比如“破屋”或“小屋”，这里存在同义等价。再稍微走远一点，我们便进入隐喻；例如可以把它称作“洞穴”。

不过，还有另一个语域，例如“茅草顶”这个词。它已经不完全相同，而是茅屋的一部分。达到极限时，可以用“一座茅草屋”，或“由三座茅草顶组成的村庄”，来指三间小屋。你们能清楚感觉到，这里有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问题在于唤起。主体还可能说出“肮脏”或“贫穷”；由此你们会看出，我们不再处于隐喻，而是处于转喻。

隐喻与转喻的这种根本对立，是这里必须凸显的东西。为什么？请牢牢记住，在弗洛伊德最初从神经症机制或正常生活边缘现象——例如梦——中凸显的一切里，占据支配地位的并不只是哪一种隐喻或认同维度。

实际情形恰恰如下：

- 弗洛伊德所谓凝缩，就是修辞学所谓的隐喻；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 所谓移置，则是我刚刚通过转喻向你们说明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能指本身的存在与结构化，没有整个能指装置的词汇存在，那么这些现象……

- 无论它们怎样存在于神经症中；

- 无论它们怎样成为消失的所指借以表达自己的工具；

……能指本身的这种存在都绝对具有决定性。

因此，当我们捍卫能指、把兴趣和注意力重新引回能指时，无非是在回到弗洛伊德发现经验的起点。我们以后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在精神病中，这些能指游戏最终占据并投注主体整体；这项问题定位会使我们想到怎样的机制？因为这个病例涉及的当然不是失语症机制。

当然，这里涉及的是同作为缺失者、缺陷者的大他者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问题围绕能指本身同他异性的不同层次之关系展开：

- 这个想象的小他者；
- 以及这个象征的大他者。

今年论述开始时，我们已经把两者设定为同大他者关系的根本结构。能指本身在精神病中的支配、走到前台、入侵和真正的心理侵入，将围绕这项结构得到分节。

# 第19课 · 1956年5月9日

我曾试图用如下两个标题，在这里引入一项对立：

- 话语和语言功能中的相似性关系；
- 以及邻接性关系。

当然，我完全不是说，精神病中在言语秩序、正性言语现象秩序内受到承受的、或多或少带有幻觉性质的现象，可以同失语症现象比较。我甚至还要说：必须回到我谈失语症时指出的东西，才能清楚凸显我从失语症两类障碍的对立中保留了什么。

这尤其必要，因为我上次指出，这两类障碍之间存在一种秩序对立；而同样的对立不再以负面方式，而是以正面方式，显现在两个秩序各自最完整的语言表达或修辞格中，也就是隐喻与转喻。

听说这种对立多少吸引了某些人；遗憾的是，我还确定它使他们极度困惑，以至于彼此说：“隐喻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在隐喻里，对立、争辩和混淆多么重要”[？]。显然，运用能指与所指这些观念，并不是用它们简单替换那个著名而同样无法表达的对立——例如观念与词、思想与词语的对立。说来有趣，一位真正出色的语法学家[注1]写过一部杰出著作，只有一处错误，就是那个不幸的副标题《从词语到思想》；我希望，在你们当中已经没有任何人还能维护这种表述。

> [注1] 爱德华·皮雄与雅克·达穆雷特合著：《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巴黎：达特雷出版社，1911—1940；Vrin，2001。

能指与所指当然在游戏之中；我们已经看见它们处于何种语域。我们从我上次所举“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这个例子，亲手触及隐喻中所指转移的持久生命。这确实是一个隐喻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意指支配一切；它忽然把“他的禾捆”压印在主体身上，而禾捆仿佛自行慷慨散开。不过，另一方面，我想强调的——正如那位把隐喻视作根本修辞格和所指转移的人所强调——也确实至关重要。

这就是说，能指与所指两个术语始终处在一种可以称作辩证的关系中；必须把握这项关系的运动，才能把握它的分量。我想回到这里，好让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对立对子，最终又回到历来支撑“表达”观念的同一种关系：某个自身或多或少不可言说、却被假定存在的东西，例如所谓感觉或事物，总之某个受到参照的东西；词则被视作它的表达、标签和贴附在参照物上的东西。

我的全部论述，恰恰是为了消解这种观念，教你们使用另一件工具。因为这绝对关键，是看出语言功能的唯一方式。尤其每当误解倾向于重新建立——也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必须再回到这里。

我重新提起失语现象时，强调的是这一点。你们应当听说过所谓“感觉性失语症”患者。他们以异常鲜活、迅速、表面上甚至颇为流利的言说表达自己；但恰恰在表达的同时，他们无法表达。

他们异常出色地表达了一个主题——自己恰恰说不出那个词——并且运用一整套极为细腻的分节、连接词和话语句法结构：

- 向我们指明，他们瞄准某种东西；可以说，确切的词已经到嘴边，或准确的历史指示已在脑中，但他们只能围着它打转；

- 向你们表明自己确实拥有它，而且当下想让它出现。

此时令人震动、抓住并吸引我们的，是某种可以称作主体意向性的持续存在；尽管这种意向性局部无能，它仍在那里。人们曾多次讨论、甚至强调这些形式具有某种相关的智力缺损；这就是人们想要凸显的东西。你们若愿意，甚至可以称它为同言语无能相关的“痴呆前状态”。换言之，研究方向试图对最初那个笼统观念作出细化；原先，人们认为障碍只是无法被动把握言语意象。

寻找缺损的这类研究当然有所推进，表明障碍远比初看复杂。但眼下，当我们真正看见并把握我刚刚指出的现象时，更令我们震动的是，主体无疑……

无论他另一方面还会显出哪些缺损；

……如果按照测验位置的方式，给他规定一项任务，他确实会表现出某些缺损。然而，只要我们仍不知道其机制和起源，就什么也没有真正解决。

但在对话中，有一点十分确定、清楚：例如主体提出抗议时，针对的是观察记录中的某个完全明确的历史细节——一个日期、一个时刻、一项行为。就在此刻，主体从自己的话语中跳出来，无论那话语多么

紊乱、多么像语词杂拌。很容易看出，这并非偶然；即使他弄错了，他开始投入并进入对话，仍是围绕一个明确的历史细节，而且五分钟前他还掌握着它。

这种意向性在场的强度，以及正是意向性处于整段话语展开的核心、话语却无法抵达它，是感觉性失语症这个面向中真正醒目的东西。只要愿意，我们可以标出我想凸显的特征：这里涉及的是一种语言；由于某种障碍和缺损，它的机制中止了抑制——这是一项装置缺损。

我们面对的是错语性语言的现象学，换言之，是一种释义语言。感觉性失语症患者、［……］尚未深到完全成为语词杂拌的韦尼克失语症患者，会消解在释义之中；尽管语词杂拌的特征正是分节丰富而流利，句子即使越来越碎片化，仍然不断展开。很清楚，这是某种起初以我所谓释义显现的东西的最终状态。我称它为释义，因为这似乎是这里所谈感觉性失语症最应凸显的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支配他、构成其表达方式的释义，严格对立于可以称作“直译”的东西。如果把“直译”界定为一切逐字翻译秩序中的操作，那么他恰恰完全做不到。

也就是说，即使面对他刚刚交给你们的话，只要你要求他翻译、给出等价说法、用同义方式重复同一个句子，进入语言的另一个维度，他就做不到。相似性发生紊乱，正因为他不能在这个维度说出一个同自己刚说之句相似的句子。他可以接续你说的话，也正因此，这种主体很难进入并开始一段话语。

他们极其鲜活、充满激情地回应，努力使自己被听懂；但尝试彻底失败，几近滑稽。即使最有经验的人也忍不住微笑；除非真正对现象本

身感兴趣，否则很难不发笑。相似性现象就在这里：他们无法作出直译；他们要说的一切全都处在释义领域。

另一边是被粗略称作“运动性”失语症的障碍；一系列逐步加深的障碍都归入这里，从如今熟知的失语法开始，一直发展到词库的极端缩减，只能说出那个已经成为不朽病例形象的著名词语“铅笔”。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失语缺损，可以依照邻接性障碍来组织和理解；语言本身的分节和句法，会在病例谱系、乃至某些病例的演变中逐渐崩解。这些主体有时仍能保持完全准确的命名，却无法把正确命名之物分节进复合句；这种影响可以达到不同程度，最终形成某种命题能力的消解。

他们无法建构的是命题；相关要素在不同程度上不只仍由他们掌握，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完全可以被唤起。

语言现象向我们提出一场捉迷藏游戏；我们面对的困难大致应当这样理解。正因为能指与所指具有这些性质，才存在一个陷阱、一种永恒诱惑。就连语言学家也会掉进去，更不用说不是语言学家的人；他们因所处理现象的本性而浸没于语言功能，却没有接受任何关于语言本性的训练，自然预先就成了这种幻觉的受害者：把现象中最显眼的东西视作现象的全部。我甚至要说，某些语言学家也落入其中。例如，语言学家向来比对语言中属于转喻秩序的一切，更加重视我正在阐明的隐喻。

因为在充实而鲜活的语言中，它确实最为醒目、最为根本，也最成问题：语言为什么恰恰在这里取得最大效力——通过说出另一件事来说

某件事？这十分惊人而迷人。人们甚至以为自己抵达了语言现象的核心，也以为自己由此抗衡了关于语言的某种原始、天真观念。

受这种混淆引导，有些人以为：事物秩序上面叠放着词语秩序，仿佛后者是前者的描图。人们以为自己已经迈出一大步，却没看到迈一步还不够，必须再迈第二步；也就是重新回到语言现象，看出所谓“意义转移”、所谓“所指等价的奥秘”……

所指在语言中从来只有经由另一个所指、并指向另一项意指，才能抵达自己的目标；

……这仍只是第一步。还必须回到能指的重要性，也就是看见：若没有能指本身的结构化，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因此，上次你们中有些人正确领会到，我强调能指在隐喻中的角色，指的正是这一点。于是，当我们从缺损现象出发时——它未必最能照亮问题，却足够熟悉，至少能把你们引入问题真正的深度——会看见两个侧面：

- 第一个侧面，是意向意指同能指装置的连接发生某种消解；装置整体仍然存在，主体却无法依照自己的意图掌控它；

- 另一个侧面，关乎能指内部连接的缺损。这里在各个程度上呈现一种内部连接的退行性分解。例如，运动性失语症里发生的事情，颇符合杰克逊式障碍理论：功能按照与取得顺序相反的方向分解；这里不是发展，而是一种转折。随着逻辑连接的分解加重，语言越来越被缩减，最终抵达理想上属于儿童的“最初”语言。

我展示这项对立，是要强调这一点吗？我说，不是。因为依照一种可以称作语言现象之一般幻觉法则的东西，重要的并不是走到前台的表面对立。重要的是能指内部两种连接的对立。其中之一是位置连接；它构成我刚才所谓命题连接的基础，也就是在一种特定语言中建立词序这一根本维度的连接。词序对任何语言都绝对关键，尽管在不同语言中可能各异。只需记住，在法语中，“皮埃尔打保罗”不等于“保罗打皮埃尔”，你们就能明白。

这种位置连接绝对根本、首要而关键。关于第二种失语症障碍，最应注意的是：语言位置功能观念的保持，同一个足够词库的维持之间，具有完全严格的连贯性。这绝对关键，是无可争议的临床现象，向我们显出一种能指的根本连接。

在语法层面呈现为位置连接特征的东西，会在所有层次重新出现，在每个层次上建立不同项的共时共存：

- 例如最高形式的动词短语；
- 较低层次上的词；词似乎自身代表某种稳定性，但你们知道，这一点已经受到正当质疑。

词的独立性会在某些层面、某些角度显现，却不能被看作根本独立；词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被视作语言单位，尽管它确实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基本形式。再往下，还有音位配对中的对立；它们构成不同语言之间最后的根本区分要素。

位置连接秩序，同严格能指对立秩序的共时维持彼此连贯。例如在法语中，bou 与 pou 相互对立；无论你们带什么口音，哪怕因为住在边

境、倾向于把 bou 发成 pou，也会用另一种方式发出另一个 pou。法语是一种让这项对立有效的语言；另一些语言则拥有法语完全没有、却十分根本的对立。对立连接本身，以及作为关系性与对立性的区分，对语言功能至关重要。

我想标出的根本区别，是这个语域同相似性连接的对立——这里说相似性（similarité），不是相像（similitude）。因为相似性本身以自身资格蕴含于语言运作，是语言的另一维度。语言中之所以可能存在相似性维度，同替代功能的无限可能性相连；而替代本身只有把位置关系视作基础时，才可以设想。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所以，在“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这个隐喻里，隐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禾捆”能够来到主语位置，取代波阿斯。隐喻的原则，并不是意指可以从波阿斯转置到禾捆。此时，有人若真正关心问题，完全可以正当地问我：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 “这同转喻有什么区别？毕竟，波阿斯的禾捆本身就像这首壮丽诗歌从未命名、却潜藏在下面的东西一样具有转喻性——也就是他的王者阴茎；那并不是禾捆。这是同一秩序的东西，是转喻。”

不。此时赋予“禾捆”以隐喻力量的，是禾捆在“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这个命题中被放在主语位置。这里涉及能指现象。换言之，为了分节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我希望你们一直走到语音隐喻的极限。例如，你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作超现实主义隐喻；不过，不要以为人类等到超现实主义者才开始创造隐喻。

你们自己无法判定它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但可以肯定，它确实运作。我不会说这是表达事情的最佳方式，但无论如何，它能承载某种东西。再看另一个公式；我想你们不会否认我们仍处于隐喻中。由此可以看看，支撑隐喻的是否真是意义：

“爱是一块在阳光中欢笑的石子。”[保罗・艾吕雅]

这是什么意思？它无可争议是一个隐喻。它既然诞生，很可能就包含某种意义。至于为它找出一个意义，我完全可以开一场研讨班。它在我看来甚至是一个真正无可争议的爱之定义；至少，这是我最近停留的定义。我认为，如果想避免不断重新落入无法挽回的混淆，就必须把它留在心中。

问题恰恰在于：隐喻首先由位置分节支撑。即使在最悖谬的形式中，也能证明这一点。我想，你们都听说过当代诗人让・塔尔迪厄以《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为题所作的练习[注2]；那是一出独幕小喜剧。两个女人互相说着如下话语：一名女人被通报来访，另一名迎上去对她说：

> [注2] 让・塔尔迪厄：《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巴黎：Gallimard NRF，1951，第52、56页。原注所引舞台说明及完整对白为：夫人合上钢琴，走向朋友：“亲爱的，太亲爱的毛绒！自从多少个洞、多少块卵石以前，我就没有面包师傅给您撒糖了！”佩尔勒米努兹夫人深受触动：“唉！亲爱的！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玻璃！我的三个最小的馅饼一个接一个都得了柠檬水病。”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亲爱的，太亲爱的，自从多少块卵石以前，我就没有面包师傅给您撒糖了！”“唉！亲爱的，”另一个回答，“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玻璃。我的三个最小的馅饼，一个接一个……”

这证实，即使采取悖谬形式——也就是刻意把练习最根本地推向精神病方向——不仅意义得以维持，而且还倾向于以一种格外幸运而富于隐喻的形式维持。

甚至可以说，意义得到某种更新：无论诗人怎样竭力把练习推向论证方向，我们时时都只差一步就会抵达诗性隐喻。只要某种强烈意指被牵涉，自然诗意就会涌现；这里同它属于同一个语域。这一维度就是相似性，也就是语言的另一个维度。要紧的并不是看它由所指支撑——我们一直犯这个错误——而是：

- 所指转移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语言自身的结构；
- 整个语言都包含元语言；
- 语言在自己的维度、固有语域中，本身已经是元语言；
- 任何语言从根本上、潜在地都可以翻译；
- 语言包含直译与元语言，也就是谈论语言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也正是在同一个维度中，对整个人类生活如此关键的所指转移现象才成为可能；但这种转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能指的结构。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因为只有……

先牢固建立语言是一套位置连贯系统这个观念；

……随后才能进入第二个观念：这个系统会在自身内部自我复制，而且具有异常、甚至可怕的生产力。

“冗繁”与“增殖”两个词彼此如此接近，绝非偶然。“冗繁”是一个可怕的词，却又如此不恰当。事实上，任何语言运用中都存在一种恐惧，人们会在它面前停步；所谓“对智性化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的翻译。“他过分智性化”或“您过分智性化”，会成为这种语言恐惧的借口和托词。

这种托词为何会出现？请你们有机会时观察，它总是针对某种被称作——而且并非毫无道理——唯词主义的语言运用。因为在某种语言用法、体系或理论中，人们沿某个方向走得太远时，实际犯下的错误，始终是在每个病例中给所指本身过多分量，以为语言会停在一个支撑整个体系的特定所指上。

其实，只要沿能指与所指相互独立的方向再走一步，正在进行的理论或其他操作、逻辑建构操作，就会取得全部分量。换言之，至少对我们最关心的现象而言，只要转离所指，钥匙就会清楚显现。我们不久便能确切证明，例如正是当我们越来越贴紧我所谓“意义神话学”时，才真正遭到唯词主义的指责。

反过来，数学中的语言用法，是一种纯粹能指语言，是最典型的元语言。它把语言只当作系统来使用，缩减到系统功能，并在其上建构另一个语言系统，从而把握语言本身的分节；这种用法在自身平面上的效力显然毋庸置疑。

我想从起点重新处理事情，让你们感受到这种位置翻转。对于我暗示的那位没有把握好区分的人，其实不能责怪任何人；因为即使阅读修辞学家，也会发现他们从未对隐喻与转喻的对立作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定义。

由此产生一个公式：“转喻是贫乏的隐喻。”其实，应当完全反过来理解：转喻处在起点，这一点没有问题；正是它使隐喻成为可能。不过，隐喻又处在不同于转喻的另一个层次。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让我们从获得顺序、从最原始的现象来处理问题，并取一个对分析家格外鲜活的例子。如果要找某种意指——也就是欲望——最原始、仿佛最直接的表达，还有什么比弗洛伊德谈到自己最小女儿时举的例子更合适？这个女孩后来在分析界占据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她就是安娜·弗洛伊德。

安娜·弗洛伊德睡着了——一切以纯粹状态出现——梦见“大草莓、覆盆子、布丁和粥”。这看起来像纯粹状态的所指，确实很有说服力。然而严格说来，它是转喻最具图式性、最根本的形式。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明白她无疑欲望这些草莓和覆盆子。即使只在受到唤起和欲望的客体平面，也完全不能认为它们理所当然地全都同时出现。

它们并置出现，并在分节的命名中相互协调；位置关系把它们置于等价位置，这才是根本现象。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某种东西的纯粹表达现象，仿佛一种——不妨称作荣格式——心理学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受到召唤之客体的某种想象替代。理由是，这句话以什么开始？以这个人的名字，也就是“安娜·弗洛伊德”。这是一个 19 个月大的孩子。我们处在命名平面、等价平面、名称协调和能指分节本身的平面；只有在这里，意指转移才成为可能。

这项观念处在弗洛伊德思想的核心；著作的庞大体量及其全部主题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弗洛伊德著作从梦开始；而在梦中，从凝缩到移

置、再到表现手段的一切机制，只要得到正确理解，都属于转喻式分节的秩序；只有随后，以转喻为基础加以组合，隐喻才可能介入。我稍后会回到语言的爱欲化；在那个层面，这一点会更容易把握。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事实上，如果确有某种获得顺序，它肯定不允许我们断言……

……儿童会先取得词库中的这个要素，而不是那个要素。这里存在最大的多样性；人确实不可能从某一端抓住语言——不像某些画家从画布左侧开始。语言若要诞生，就必须始终已经被整体把握。

不过，要把语言作为整体把握，就必须先从能指这一端抓住它，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人们以为儿童语言中有某种具体、所谓具体的方面；同外观相反，它恰恰关乎我所谓邻接性。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有人告诉我自己孩子说的一句话。这个男孩看起来四岁，其实只有两岁半。晚上，母亲弯下身向他道别时，他一把抓住母亲，叫她“我这个满是屁股和肌肉的胖姑娘”。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它显然不同于“他的禾捆既不吝啬，也不怀恨”；儿童还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说“爱是一块在阳光中欢笑的石子”。

有人会竭力告诉我们，儿童理解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诗歌，以为那是返回童年；这完全是蠢话，因为儿童厌恶超现实主义诗歌，也排斥毕加索绘画的某些阶段。因为他们还没有抵达隐喻，而是处在转喻中。当他们欣赏毕加索的某些作品时，恰恰因为其中涉及转喻。

这里的转喻，就像托尔斯泰作品的某段一样明显：每当一个女人将要靠近时，取代她涌现的是一道蝇影、上唇的一块斑点……这是一种高超的转喻手法。你们会从中看到什么？会看到某种诗性创造风格中始

终遭到遗忘、因为最为明显的维度；它与“象征风格”相对，被称作“现实主义风格”，其实并不比任何东西更现实。它只是对语言另一项更根本功能的另一种运用——因为正是它支撑隐喻——但处在完全不同的邻接性维度。托尔斯泰散文把细节推到前台，这种所谓现实主义风格绝不比别的风格更现实，也并非因此就不属于诗性语言。

你们不要以为，离开那些使某个细节成为欲望功能向导的精确道路以后，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提升为整体的等价物。我们没有丝毫证据。证据恰恰是：在迷宫实验或其他旨在向我们展示所谓动物智力的实验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通过一系列意义转移来使某些细节取得价值。

我同意把它称作智力；这只是定义问题，也就是在本能和力比多层面使动物产生兴趣以后，我们能够把多大一片实在领域纳入其当前辨别能力。用细节来描述实在的所谓现实主义，只有在一个受到组织的能指语域中才可以设想。正因为母亲是“我这个满是屁股和肌肉的胖姑娘”，我们以后才能看见这个孩子怎样发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凭借早期转喻能力，屁股在某一时刻能够成为母亲的等价物。屁股在生命平面可能还具有这个或那个意义，并能引发何种敏感性，完全不改变问题。

只有以这种转喻分节为基础，事情才会发生。必须先有能指协调本身的可能性，所指转移才可能出现。这个秩序时时给我们一些极端而悖谬的病例，使我们清楚看见：能指的形式分节要素支配意义转移。语言在同小他者关系中的功能，以及小他者关系的一切紊乱会怎样回响于语言功能，正是在这里构成问题。如同我今天试图向你们坚持的隐

喻与转喻的对立，我们还会看见言说的两项根本功能相互对立：一边是已经凸显的奠基性言说，另一边是基本词语。

相关知识卡 隐喻与转喻：替代、邻接与能指位置

为什么二者都根本必要？它们又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当然是相对于第三项提出的。如果人如此需要运用言说来找到自己或重新找到自己，显然因为他的自然位置或自然倾向，会使自己在小他者面前分解。他怎样组成、又怎样重新组成自己？我们将在这里重新找到由隐喻与转喻构成的双重配置：隐喻与转喻的对立，严格对应于大他者的两种可能功能。

下次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现在，你们已经可以在施雷伯的现象中抓住某种极其醒目的东西：我上次在中断句子中展示的功能被凸显、提升到侵入性的分量；有时，它又采取问题与回答的形式。你们能看见它同我所谓“奠基性言说”之间的对立价值；后者在于让大他者以颠倒形式把自己的讯息送回：“你是我的妻子。”

在这个维度中，人不询问小他者的意见。相反，询问、问题与回答的功能通过言语起始得到赋值；它确实是奠基性言说的补充项和对应项，无疑也是其根源。相对于“奠基性言说”深刻产生意义的性质，它使这项言说在所有层面的能指基础赤裸并得到凸显。你们会在妄想现象中重新找到这种赤裸化、这种对能指功能本身的凸显。

我立刻再举一个例子：妄想者施雷伯报告的著名等价关系，始终让人困惑。那些“在暮色中列队飞过的天鸟”运用谐音：Chinesentum 或 Jesum Christum。［“所以，对它们来说，说 Santiago 还是 Karthago，

Chinesentum 还是 Jesum Christum，Abendrot 还是 Atemnot，Ariman 还是 Ackermann 等等，差别不大。”（第210页）］其中应当保留什么？

难道只是荒谬性？施雷伯本人感到震动的是，这些天鸟确确实实没有脑子。弗洛伊德对此毫不怀疑：它们是年轻姑娘。我们并非毫无理由地预期各种肤浅小游戏；这确实没错。但此后什么才重要？重要的是，同 Chinesentum 等价的并非任意词，而是 Jesum Christum；这不是随便一种谐音。关键不在谐音，而在彼此十分接近的区分要素逐项对应。对于施雷伯这样的多语者，它们只有在德语语言系统中才有分量：同一个词里相继出现一个 n、一个 d、一个 e。法语中找不到这种东西。同样，不会说法语的外国人也极少把［……］说成［……］；那并不存在。这里有一道二难。

也就是说，问题发生在音位等价、能指等价、纯粹能指的平面；显然，在这张清单中，空气需求同暮色之间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协调。当然，人总能找到一种协调，但初级现象显然不关乎它。施雷伯以一贯的敏锐，借 Jesum Christum 与 Chinesentum 的关系，再次向我们凸显：受到寻找的是能指秩序中的东西，即音位协调。拉丁语 Jesum Christum 在这里显然只因为德语词尾 -tum 具有特殊音响，才被取来充当 Chinesentum 的等价物。

能指本身被提升——正如我刚才说细节被提升——使语言功能始终隐蔽的下层结构，也就是转喻，被凸显并浮出水面。在对神经症或精神病中的语言功能障碍展开任何可能研究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枢纽和重音放在这里。

# 第20课 · 1956年5月31日

> “同样的类比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两种情形都省略了若干必须通过语境补充的关系。如果人们迄今没有采用这种关于梦之表现方法的观念，原因一望即知：精神分析家完全不了解语文学家接近梦所提出的这类问题时，必须采取何种态度和认识方式。”

我想，这段话足够清楚。弗洛伊德说梦用意象表达而不是用其他东西；你们或许由此看到形式上的表面矛盾，但我想，它立刻就得到恢复和重新定位，因为弗洛伊德随即会向你们展示这里涉及哪一种意象。也就是介入一种书写的意象；它们甚至并非为了自身意义而出现。正如他说，有些意象不是为了被读出，而只是给真正应当被读出的东西加上某种标定，否则后者仍将成谜。

这同我前几天写在黑板上的完全一样；当时，我举了汉字的例子。其实我也可以从古代象形文字中取例：用来书写第一人称代词的两个小符号具有语音价值，旁边可以配上一个人物图像——根据人物大小，图像会画得更为粗壮——以便通过它的意指给其他符号标明所指。但其他符号同这个小人一样具有图画性质，却必须在语音语域中读出。

总之，弗洛伊德在这一段给出的公式，使同象形文字的比较显得更加紧迫而明显；而这个比较散布在《梦的解析》全书。它之所以更加有效而确凿，是因为所有文本都证明，弗洛伊德不断回到这里。你们知道，他并非不了解象形文字书写究竟是什么；他热爱同古埃及文化有关的一切。他经常参照并比较古埃及人的思维方式、风格和象形文字的准确能指结构，也比较他们有时彼此矛盾、层层叠加的信仰。

他十分自然地乐于援引它们，以便给我们最富表现力的图像，说明神经症患者那里相互矛盾的概念系统怎样共存；这对他极为熟悉。在同一文本的末尾，我们就这种症状语言看到［……］。他谈到神经症与精神病不同形式中这种能指结构的特殊性。

随后，他以一个醒目的缩写，把三类主要神经精神病并置起来：

> “所以，必须把能指彼此关联起来，才能从整体上理解问题。例如：

- 癔症患者通过呕吐表达的东西；
- 强迫症患者会通过极其费力地采取防感染措施来表达；
- 而妄想痴呆患者则会被引向抱怨和猜疑。

在三种情形中，这些都是患者希望抵达自己无意识中受压抑之物的不同表现，也是他对这一事实的防御反应。”

这段话帮助我们开动起来。现在回到主题。我们其实离题不远，因为刚才涉及怀孕欲望和生育主题。我曾告诉你们，生育主题处在施雷伯病例症状学的根底；不过，今天我们仍不会直接抵达那里。

我想再换一个角度，也就你们周一晚上从我们朋友塞尔日·勒克莱尔那里听到的东西，重新提出我所谓神经症中终极能指的问题。我当然会向你们展示：它从根本上是一个能指，必须在能指秩序和侧面理解；不过，它当然不是一个没有意指的能指。

我强调的是：它是意指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意指。死亡主题以及性欲的男性与女性两个侧面，并非既定之物，也不是能够从经验中推导出的东西。如果个体尚未拥有能指系统，他又怎样找到自己？正是这个系统建立距离，使他得以把最难接近的东西——自己的死亡——看成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神秘客体。

同样不容易接近的还有……

请想一想：个体要回到这个问题，必须经历何等漫长而严格意义上的辩证过程；我们的全部经验，又怎样由这种接近的过度与不足构成；

……也就是一个现实的根本男性极与女性极。我们可以追问：即使离开那些把它隔离并精确规定的能指，也就是离开男性—女性两极性，这个现实是否还能被把握？

我们无疑把现实当作神经症中失败和阻滞所围绕的参照；但这不应使我们忘记：我们面对的现实，从根本上由构成它的这条能指辫带支撑并织成。必须从人的主体同能指本身的关系中，单独抽出其视角、平面和固有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例如，当我们说精神病中主体与现实的关系缺失某种东西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涉及的现实，由某个能指在其中的在场构造；这个能指：

- 是继承而来的；
- 是传统的；
- 又通过什么得到传递？

当然，只通过周围有人说话这一事实。经验及其引导弗洛伊德形成的理论向我们证明：存在某种进入基本能指这一凸起的方式；俄狄浦斯情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如今，我们很容易把没有通过俄狄浦斯考验视为普通经验事实……

也就是没有看见各种冲突和死胡同在自己面前打开，也没有通过某种整合方式解决它。这里的整合不只是把俄狄浦斯的要素整合进主体内部，而且是主体被纳入那些从外部给予他的要素之中；

……如果我们如此容易承认，没有完成这场考验会使主体处在某种缺陷中，使他无力实现所谓属人现实的恰当距离，那正因为我们认为，现实这个词包含对某种能指游戏的整合。我只是在明确表述分析经验中所有人以隐含方式承认的东西。

我们已经在途中看见并指出，可以怎样刻画癔症位置。它是一道问题，而且恰好参照男性与女性两个能指极；癔症主体以整个存在提出："人怎样才能是男人或女人？"这表明，他毕竟拥有这项参照。问题正是这样提出的。

强迫症主体以某种方式回答，或者更准确地说，以他的回答方式来回答……癔症主体的整个结构被引入、悬置并保持在这道问题中；他从根本上认同于异性个体，仿佛由此询问自己的性别。癔症主体以"或者……或者……"回答；与此相对，强迫症主体通过否认回答：他用"既不……也不……"回应"或者……或者……"，既非男人，也非女人。

否认以死亡经验为背景；主体的存在缺席并从问题中溜走，而这又是继续悬系于问题的一种方式。强迫症主体恰恰如此：如果你们找不到

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说两者同时都在。我略过这里，因为这一切只是为了定位精神病主体发生的事情，说明它怎样同两类主要神经症主体面对问题的位置相对。

如果我们经过反复返回，已经能够清楚设想，弗洛伊德理论和经验所呈现的神经症历史……

我在两周前关于弗洛伊德的讲演中称之为“被栖居的语言”。语言受到栖居，也就是主体有必要确确实实、但程度不一地在其中取得言说，并用自己的全部存在来言说——也就是有一部分不为自己所知；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主体被语言栖居

……那么，仅从精神病现象学，我们怎会看不出：任何精神病从头到尾都由主体同语言的某种关系构成；语言忽然被推到舞台前景，开始自行说话，高声到来，带着自己的喧响、狂怒、执拗和中性。它同那个公式相反地到来：如果神经症主体栖居于语言——他们正应当这样被设想——那么在这里，精神病主体则被语言栖居、被语言占据。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主体被语言栖居

某种东西走到前台……

它显出主体遭受的某种对抗、区分和考验；问题从根本上关乎永久话语中的某种故障，而我们必须设想，这段永久话语支撑着日常生活，支撑人类经验中随处可见的一切；

……支撑突然发生的行动、处境、态度、行为和情感。

可以称作“永久独白”的相关文本层面中，某种东西显现并析离出来，形成一种多声部音乐；它的结构值得我们停下来追问为何如此。因为在各种现象中，它最直接地向我们呈现为受到结构化的东西；结构观念本身就借自语言。反倒误认并把它缩减——正如人们所做的那样……

以显现出来的恰恰是结构事实为借口；

……把它缩减为某种可能只是机械装置的东西，既很能说明问题，也颇具讽刺性。

因为归根结底，克莱朗博以“精神病初级现象”之名析离出来的东西，当然显露了机制的一切特征……

- 这种被重复的思想；
- 这种受到反驳的思想；
- 这种受到命令的思想；

……它们不是别的，正是被复现、以反题方式重新说出的永久话语。

不过，正因为我们面对这种完全形式化的结构外观——克莱朗博千百次强调它完全正确——人们怎会看不出：据此推导、断言我们面对的只是简单的机械性延迟现象，远远不能说明评注并非只是另一件事的回声，而是反题、矛盾、乃至对话本身已经建立。我们更应以内在于语言的结构来设想它；这才最富生产力。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反过来，他首先展示了这些现象的结构性质以及结构的支配地位，也就是克莱朗博用自己的语言称作“观念中性的”性质。他只是想说，这些现象同主体情感完全不协调，任何情感机制都不足以说明。这是克莱朗博在研究中凸显的一个要点。

它确实构成其临床研究中富有成果的部分。与他凸显之物的价值相比，其病因学或发病机制推论强弱如何，并不重要。也就是：

- 精神病之核必须联系到主体同能指本身的关系，而且是能指最形式化、最接近纯粹能指的面向；一切建构都围绕它展开；
- 就连情感反应，也是对一种首要现象作出的情感反应，而这个首要现象就是同能指的关系。

我要说，如果精神病主体以这种方式被语言栖居，我们就必须思考这种格外醒目的外在性关系；所有临床医师都曾以某种方式强调它。影响综合征仍使某些东西含混不清；“外部作用综合征”听来尽管天真，却准确强调了现象的根本维度。精神病主体同整个语言装置之间具有这种外在性关系；它引出一个问题：主体归根结底是否曾经进入这门语言——这门栖居他的语言？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主体被语言栖居

许多临床医师都曾考察所谓“精神病主体的既往状况”。一定的经验使我们可以衡量它，而分析研究也使我们能够理解某种人格风格。

海伦娜·多伊奇凸显过一种“仿佛”状态，我有一次也作过评论。它似乎标记那些会在某个时刻或深或浅地坠入精神病者的早期发展阶段：主体从未真正进入能指游戏，只从外部模仿，没有整合进能指语域。

相关知识卡 精神病主体被语言栖居

这为精神病的前提问题指明方向。当然，这个问题恰恰只能通过分析研究来解决。我们有时会把精神病前期主体纳入分析，而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会产生精神病主体。

如果我们的经验从未让我们发现某些事情，分析的禁忌证问题就不会存在……

如果我们的记忆中，不曾保留自己或同事实践中的某个病例：一例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我是说不折不扣的幻觉性精神病，而不是突然加速的精神分裂症；

……在最初一两次稍显热烈的分析会谈中被触发；那位漂亮的分析家很快变成发射者，主体整天分析、听见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难道没有在自身经验中、而且无须到更远处寻找，就触及某种可以被安置在进入精神病之动因核心的东西吗？

毕竟，事情在这里呈现的方式，把一个人“在世存在”的问题投入运作；这些事情：

- 并非如此经常在场；
- 并非如此紧迫；
- 也并非来得如此早，以至于主体面对那项也许是人所能接受的最艰巨任务，会完全没有道理。

这项任务叫作“取得言说”：我指取得他自己的言说，而不是对邻人的话只说“是，是，是”。

当然，这不总是意味着它必须表达成词语。临床显示，只要懂得近看、懂得在极其不同的层面寻找，这个时刻有时只是一个很小的“取得言说”任务，而主体此前像蛾子一样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茧中。事情确实会这样发生。克莱朗博把这种形式描述得很好，例如所谓老处女的“精神自动症”——我想，正是他描述了精神自动症在老处女中如何常见，还有迫害妄想等等。他的风格具有如此惊人的丰富性，克莱朗博本人怎么会无法停留于事实？

根本没有理由特别打击这些不幸的人；他如此出色地描述她们被所有人遗忘的生活。只要受到最轻微的刺激，精神自动症现象、那段在她们那里始终潜伏而未表达的话语，就会涌现出来。

如果主体面对真正言说时的这种失效，确实可以定位精神病的进入、向临界现象的滑动以及精神病开篇的第一句话，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把相关含意连接起来。根据现象学，你们应当已经隐约看见我们的目

标。我引入并视作根本的 Verwerfung 观念，正是要指出：主体同能指本身的关系中，必定预先缺失某种东西。

主体起初进入、最初被引入基本能指的过程，在后来必定有所缺失。实验研究显然永远无法把握这种东西：一项缺失正在缺失的时刻，没有任何办法抓住它。例如在施雷伯主席病例中，缺少的恰恰可能是这个最初核心、最初萌芽的缺席，也就是能指本身。多年来，施雷伯似乎能够同它相匹配；我的意思是，他能够扮演男人角色，看起来像所有人一样。

男性气概对他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妄想现象刚发明出来时，它始终是他激烈抗议的对象；妄想立刻呈现为有关其性别的一道问题，呈现为从外部向他到来的呼唤，就像那句幻想："作为一个承受交媾的女人，想必十分美妙。"因此，我们似乎看到两个平面。妄想的全部发展表达了这样一点：对他而言，要把自己实现并肯定为性存在，除了接纳并认出自己是女人、因而转变成女人，再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构成妄想始终不变的线索、枢轴和两极轴线。

所以，有某种东西把如下两者区分开：

- 某种缺失的逐步揭露；
- 以及围绕这一点重建整个世界——我是说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全部组织——的必要性：存在一个男人，而他只能成为某种普遍上帝的女人。

问题正是如此。这同另一个事实之间存在距离：在生命某个临界时期以前，这个男人在日常话语中像所有人一样显现，知道自己是男人；

他在某处还说，妄想最初的钟声使这道谜、这个绝对大他者投入游戏，强烈刺激了他的男性荣誉，于是它便高声抗议。

总之，我们的进路以及询问必须采取的形式，把我们引向一项区分。它成为此前一切必要推论的判据与织网，而这些推论来自分析处境本身的结构化：主体面前存在我所谓的小他者……

- 以小写 a 表示的小他者；
- 想象的小他者；
- 使我们依赖同类形式的镜像他异性；

……与之相对的，则是绝对大他者：

- 我们越过同类向其言说者；
-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幻景关系之外，它构成一个点、中心和终点；
- 它面对我们时会接受或拒绝；
- 它有时欺骗我们，而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它是否正在欺骗；
- 事实上，我们始终向它言说；它的存在具有这样的性质：向它言说，也就是同它拥有某种语言，比在我们之间实际可以成为赌注的一切都更重要。

请仔细注意，分析中始终存在这两个他者，却不断有人误认它们；所有虚假问题都由此产生。尤其当人们极力突出并强调原初客体关系的绝对优先地位时，便会在如下两者之间造成你们熟悉的明显不协调：

- 弗洛伊德的立场：一个人的客体，也就是新生儿，进入世界时处于所谓自体爱欲关系，也就是客体不存在的关系；

- 临床观察提出的反对：这项主张完全不可思议；我们从生命开始就已清楚看到，对新生儿而言存在各种客体。

只有作出如下区分，问题才能解决：

- 这个想象的小他者确实能够、并且在结构上构成起源；

它是人的新生儿在其中构造众多客体的形式和领域；

- 以及这个绝对大他者、这个大写 A 的大他者是否存在。弗洛伊德谈到起源处不存在任何大他者时，瞄准的无疑正是它；后来的分析家却忽略了这一点。这里有充分理由，因为这个大他者确实："它完全在自身之中，"弗洛伊德说，"却同时完全在自身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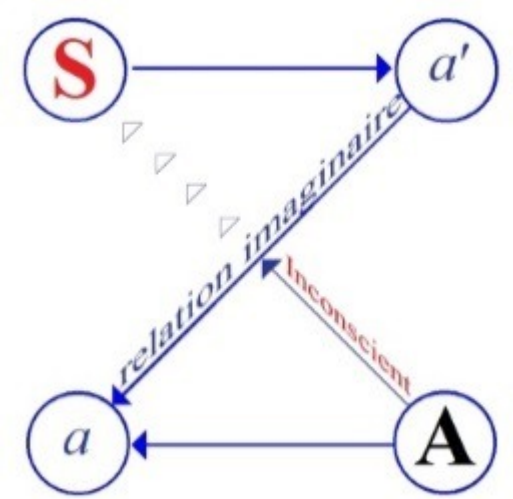
同大他者建立一种出神关系的可能性，是一道由来已久的问题。它曾在阴影中沉睡几个世纪，如今值得我们分析家时时处理并重新提出，即中世纪所谓如下两种东西的区别：

- 所谓爱情的"自然"理论；

- 所谓爱情的"出神"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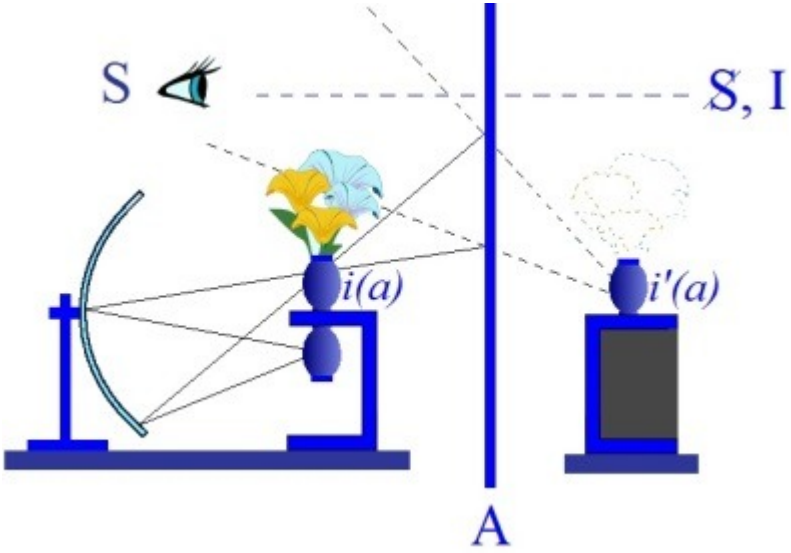
这里提出主体同绝对大他者的关系是什么；按照所谓“出神”理论，真正的爱、大他者的真正存在可以被定位于此。可以说，为了理解精神病，我们必须叠合：

- 我们关于 a’、小写 a 与大写 A 的小图式；其中，大他者把爱定位为同一个彻底为他者的大他者之间的关系；




- 以及这里 [a’_ a] 一切想象秩序之物可能形成的镜像、反射处境；

阿尼姆斯与阿尼玛会根据不同性别分别置于这一个或另一个位置。




正是在与一个大他者的这种关系中，在爱情关系的可能性中：

- 这种关系是主体的取消；
- 它承认大他者具有根本的异质性；
- 而且这种爱也是死的，……才存在精神病主体与非精神病主体之间的问题、区分和差异。

为了让你们感受到我的意思，我将……

因为你们也许觉得，用一套中世纪爱情理论引入精神病问题，是一条奇特而古怪的迂回；

……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件事。疯狂的本性若不引入这个维度，就完全无法设想；这一点如此真实，以至于只需从社会学角度想想迷恋、坠

入爱河在文化中得到观察、记录和证明的各种形式，就会发现：我这样提出问题，并非过分固守立场；它恰恰覆盖了最普通的模式心理学立场今天正在讨论的东西。

［速记稿缺一页］[注1]

> [注1]　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编：《精神病》，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第288页；该版本补回了缺失段落。

……已经沦为可笑之物；而我们所参与的整个过程，恰恰带有异化且使人异化的性质。我们无疑仍在游戏，却越来越外在、越来越疏远；过程支撑的整套幻景也越来越弥散。如果事情不再发生在一位美人或一位贵妇［参见宫廷爱情］身上，就会发生在黑暗影厅里的观众同银幕影像的关系中；所有人都同这个影像交流并共同参与。

不过，我要凸显的是：这个维度明显趋向严格意义上的疯狂和纯粹幻景。只要爱情关系本身、这项关系的原初重音遗失，它就会出现。对我们而言，原先的爱情看起来滑稽：一个存在向另一个存在作出全部牺牲。有闲暇只做这件事的人当然会有系统地追求它；但它确实具有精神技术的性质。你们知道，这种技术有自己的方式与语域；由于我们离这些事情太远，只能隐约看见。不过，仍可以从中找到若干十分明确、也颇为奇特的实践，它们甚至可能使分析家感兴趣。例如，一种由技术维持的感官性与贞洁的含混结合：它仿佛在一种特殊同居中进行，没有性关系，至少把关系不断推迟；这些细节无疑构成我所指爱情实践的基础。

关键是让你们看到：这种东西在社会层面遗失以后，可以说，它留下的废弃物和残余带有异化、疯狂式的降格性质。这为精神病主体身上

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类比，也赋予我前几天引用的弗洛伊德那句话以意义：“精神病主体爱自己的妄想，如同爱自己。”

这里涉及大他者之影；主体只能在同能指本身的关系中把握它，只能抓住一层外壳、包膜和言说的形式。言说缺席之处，正是精神病主体的爱欲所在；精神病主体在那里找到他的至上之爱。置于这个语域，许多事情都会被照亮。

例如，施雷伯以那个奇特公式进入妄想和精神病……

分析家仍能转过身来，从中找到颇易接近的意义；他把灵魂谋杀这个公式视作精神病最初的引入之物；

……你们必须承认，在这个语域中，它格外奇异地回响着技术意义上的爱情语言，也就是“温柔地图”时代谈论坠入爱河的方式。

这场“灵魂谋杀”带有牺牲、神秘和象征性质；我们不能不从中听见一整套语言的回声，尤其是在这套语言已经处于［……］的时刻。并非偶然，我会提到“温柔地图”，甚至那些“矫饰派贵妇”；因为“灵魂谋杀”这个术语正依照矫饰派语言形成，并出现在进入精神病之际。

总之，如果有某种东西可以被我们隐约视作进入精神病的代表，那就是：面对某种主体无法回应的呼唤　[A]，某种东西会在小他者层面发生；我们把它称作：

- 各种存在方式、同小他者关系的某种繁生，也就是想象繁生；
- 这种繁生支撑某一种语言与言说方式，也就是“妄想”。

我们必须按其自身分析并把握它。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若干路标；今天，我们会试着重新处理，并以几个章节标题的形式引入，以后再逐步填充。从施雷伯的妄想一开始，我就向你们指出、标出并强调：所谓“根本语言”的进入与侵入，同另一极相互对立；前者确实被断言为某种格外充实的能指。

施雷伯的措辞几乎同我使用的一样。由于这种语言的高贵与朴素，这位老德国人的文字充满回响；施雷伯也因此能把重音放在它上面，赋予它充分的客体和语言性质，使之成为最珍贵、最富回响，并与基本现象相对应的东西。“根本语言”的进入十分奇特。我以后会给你们读一些走得更远的段落；施雷伯在那里谈到“同上帝的误解”。误解建立在这一点上：上帝不能把根本语言同另一样东西区分开；施雷伯说，根本语言本身同人的神经相协调。我们已经看到，他所谓人的神经或灵魂的神经，几乎严格覆盖我们所谓话语。他说：“上帝无法区分什么表达小小灵魂的真实感情。”

也无法区分主体的真实感情，与主体在日常活动和同他人交往中通常表达自己的现实话语。

所以，在施雷伯文本本身中，一项区分确确实实已经被画出：

- 无意识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
- 主体以整个存在表达的东西与我所谓“语言之物”之间。

如果我们还会对此产生一瞬怀疑，那么相对于施雷伯提供的其他要素，这件表面完全多余的事情，恰好使我们明白：上帝什么也没弄懂。正如弗洛伊德在某处所说，施雷伯的妄想里比心理学家围绕他所

说的一切包含更多心理真理——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一点下注。只需阅读便会发现：

- 他承认，精神病主体的经验同它揭示并给予的一种现实相对；
- 施雷伯说自己远比心理学家更了解人的机制与感情；弗洛伊德赞同这一点。

我要说，仿佛还需要更多东西来印证它：上帝会在这门根本语言中立刻认出他所当作"人的全部"的东西；因为他不理解其他东西，不停留于人的一切日常需要。上帝不懂人，因为他懂得太好。证据是，他把人睡眠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梦，同样纳入根本语言。施雷伯确实准确点出了这一点，仿佛读过弗洛伊德、已经进入分析视角一样。

与此相对，从一开始就有能指的另一面：它凭自身性质和密度，而不是凭意义、而是凭意指作用被给予。这里有空能指，有仅因其纯粹形式性质而被保留的能指；这些性质使它们得以结成序列和相似关系，例如 Jesum Christum。总之，这就是天国前厅的语言，换言之，天鸟的语言；我们已经认出它们是年轻姑娘，而施雷伯赋予她们以无意义话语的特权。

可以说，进入精神病的整个发展，就在这两极之间展开：一极是揭示之词的宇宙，也就是词开启一个新维度，带来不可言说的理解感，但这种感觉并不覆盖此前体验过的任何东西；这是某种被给予的新事物。另一极则呈现为叠句与副歌的宇宙。

主体进入精神病的“钟声”使整个世界沉入混乱；此后，他逐步重建世界，而这种二分构成重建发生的内部空间。我们一步步跟随他；他以逐渐同意、含混、迟疑，也就是英语所谓 reluctant 的态度重建世界。

他逐渐承认，事情毕竟可以这样设想，甚至只能通过这条路走出困境：他必须设想自己以某种方式是女人。如果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同众多实体的关系中挽救某种稳定——这些实体支撑着失去缰绳的语言和内部喧响，而他体验到这些关系格外侵入、侵袭并充满欲望——那么他最终承认：“做一个有精神的女人，难道不比做一个痴呆化的男人更好吗？”

他承认，可以接受自己变成女人，并感觉身体逐渐受到这些意象侵入。正如他自己所说、所写，他会通过如今赋予自身身体的想象意图向它们敞开大门。他很清楚地说明自己怎样做：让女性认同意象进入，让它们扎根，听凭自己被它们占据，并把这视作第一次重塑。某则注释谈到，让意象进入自己。

从这个时刻起——日期很清楚，因为这里有若干危机——他以一种显然神秘的方式开始能够、也不得不承认另一点：危机延续、问题敞开已经数月，但世界外部至少表面上似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换言之，这是一种无疑成问题、令人费解的现实感。

我向你们指出这个以后会回到的点。我要说明，从我们的视角，也就是在这个迄今尚未得到照亮、而我们试图照亮的特殊领域中，重要的是发生了我所谓“意义的迁移”；也就是说，它并不发生在［……］

起初，言说的“充实”显现仍会奖赏、填满并满足他；随着他的世界在想象平面重建，它们仍然如此。但在实在平面，作为支撑的言说象征

意义却滑走，退到其他位置。施雷伯说，起初它发生在所谓“前部上帝的王国”中，也就是处于前方、面前的上帝王国。

随后，随着后退、距离，即 Entfernung、远离观念出现，与最初那些伟大能指直觉相应的东西不断溜走。因为他的世界越得到重建，离他很近的东西……

那个理解他、同他打交道的东西，也就是同他维持奇特关系的前部上帝；这种关系确实近似交媾意象，是精神病最初的侵入之梦；

……最靠近他的东西，便越进入反复灌输、叠句、空无意义、客体化和他所谓灵魂观念的宇宙。

这甚至形成对内省的一种永久振动；但它是一套受到建构、精心制作的内省，使他时时回应自己的思想，并伴随那种奇特而恒常的“记笔记”。它每一刻都为全部心理机制加注并定位，把它们个体化、认证、批准和登记。

下次，我想把你们的注意力引向主体同言说关系的这种移位现象；我会用明确例子，凸显言语性幻觉现象本身中，同这一种小他者关系与同另一种关系之间的区别，并展示大他者关系怎样始终在场，却又总是遮蔽在施雷伯那些仍有生命的言语性幻觉现象中。

我是说，那些对他仍有意义的现象始终处于呼告、反讽、挑战和暗示语域。总之，它们始终暗示大写 A 的大他者：它仿佛在那里，却从不可见，也从不被直接命名，只以间接方式显现。这个现象似乎绝对值得凸显。你们会看到，它将把我们引向一些语言学评论；我认为，只

有通过对现象作语文学分析，才能把握、理解它。它始终触手可及，你们却从未抓住。

我只举这样一点：人称代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一类人称代词可以变格："我（je）、我（me）、你（tu）、你（te）、他（il）或他（l'）"；整个人称代词语域都可能被省略。

另一种用法则是"我（moi）""你（toi）""他（lui）"，它们不变格。你们可以看出差异："我想要它（je le veux）"同"我想要他（je veux lui）"或"我想要她（je veux elle）"不是一回事。

今天就到这里。

# 第21课 · 1956年6月6日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我们面对的是哪一种问题。说得完全精确些：为什么在所谓的“幻觉”现象中——施雷伯把这些现象汇集在一起……

在这些现象中，同时表现出紊乱、某种缺失，也表现出——从我们严格说来属于分析的视角看——一种治愈的努力，一种作为精神病性世界的重建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某些形式？上次结束时我已经指出，只有参照某种东西，我们才能真正把握这些形式：

- 它属于话语的维度；
- 它要求我们不要误认言说这一特权行动究竟是什么——总而言之，不要满足于那种简单的参照。

主体是否用耳朵听到了某种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显然，那东西并不存在，因此它属于幻觉的秩序，是一种错误的知觉。

这就足够了吗？我们是否应当就此接受这样一种粗块式的现实观？归根结底，它只会导向一种神秘的解释：分析家所谓主体对现实的“拒绝知觉”造成了一个洞；本应在这里涌现的某种倾向、某种冲动，此刻被主体推开、排斥；然而，为什么在这个洞中出现的却是言说这样复杂、这样精心构造、这样丰富的东西？相对于把这一现象完全留在神秘之中的古典言说观，这当然已经是一种进步。不过，我们似乎还能

走得更远；可以说，精神病现象使我们得以恢复一种恰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整个分析工作中正越来越被误认。

全部关键都在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我来提醒你们注意精神病中、施雷伯主席个案中的某些现象。在大动荡、他的外部世界大解体的时期终结之际——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末尾，并且可以说是扎根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他与对他具有意义之物之间关系的某种结构化。

大体说来，这一结构呈现如下：在他的妄想经验的所有阶段、所有时期中——他在这部无疑堪称精神病理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著作里，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向我们报告了这一经验——始终存在两个层面。

这两个层面各自内部又不断细分。然而，他在自己的妄想世界中进行建构的努力——他总是先把某种经验安排在一个较前的关系中，再把另一些经验安排在超出它的关系中；这显然是他的经验强加给他的——恰好引导我们触及其结构中真正根本的东西。在临床讨论中，谈到对妄想主体的询问，谈到这种人所作的供认和吐露时，我曾几次让你们非常直接地触及这一点。

在第一个层面上，随着精神病的演变，发生了某种滑移。我们主要看到一些被主体视为已经中和的现象：它们逐渐退行，不再像一个真正的他者那样，在主体面前具有越来越少的意义。

他经常说，那些都是背熟的言语，是有人对向他复述这些话的人反复灌输的。而那些据说向他复述的人，本身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是“天空的鸟”——“鸟”这个词虽也会让我们想到鹦鹉——只不过转送

着某种空洞之物。它使主体厌倦、耗竭；它并非像这些现象初起时那样处在意指的边缘，毋宁说是意指的反面，是残余、废料、一具空壳。它还会以另一种同样中断的形式呈现：话语停下来，暗示尚有下文。这正涉及句子或能指经纬本身的性质：能指层面的单位，即句子中的完整单位——哪怕它只由一个词构成——只有在句子完成之后，才可能逐一确定其中每个元素的位置，甚至才谈得上这个句子在能指意义上是可能的。

这听上去也许推进得有点太远、太快。今天我会努力用例子说明它的意思，因为我认为这一点极其重要。在这些被截断、被悬置的句子中，句子通常恰恰悬置在那个能使它获得意义的实词尚未出现、却已经被蕴含的时刻。我们是在主体的评注中才发现这句话意指什么；主体所听见的东西赋予整个句子以全部分量和意义。

例子并不少，我已经向你们揭示过不止一个。比如："您还会说……吗？"句子停住了。它的意思是：您还会说外语吗？这里包含着一整套意指。所谓灵魂的观念，就是灵魂与他围绕他本人展开的那种更为充实的对话；借此我们可以辨认不同类型的思想：

- 底下的思想；
- 以及欲望思想——这是一整套心理学，它在一个更为退后的层面上与他所交谈的某物相互交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这个东西起初通过具有充实意义、甚至不可言说，却又负载极重、意味浓厚的表达方式显现出来；它似乎是他在妄想初期相当近距离地遭遇之物，后来却越来越远、越来越神秘，被安置到后方的层面，转入彼岸的上帝或上帝诸国。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出现那些令人惊异的幻

觉，不能不使我们发生兴趣、驻足审视。到了妄想较晚的时期，近处那些纠缠他的声音越来越多：它们陈述他、标记他、询问他，却总以荒谬的方式进行。可以说，在这些声音背后还有另一些声音，它们以一些惊人的公式表达自身；其中有些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另一些今天再告诉你们。我举一句并非最不醒目的话，这句我也曾引用过：

“而现在，主要思想缺失了。”

还有 Gesinnung：Gesinnung 可以表示信念，也可以表示信义。主体按后一种意义来解释它，他说：

“Gesinnung 是我们应当给予每一个善人的东西，也应当给予哪怕最恶劣的罪人——当然须服从宇宙秩序内在的净化要求；在交往中，在那种应当规整我们同人类关系的参照中，我们都欠他这一点。”

[Hin und wieder wurde auch und zwar in diesen Worten eingestanden : « Fehlt uns die Gesinnung », d. h. diejenige Gesinnung, die wir eigentlich jedem guten Menschen, ja selbst dem verworfensten Sünder gegenüber unter Vorbehalt der weltordnungsmäßigen Reinigungsmittel haben müßten.]

这里涉及的正是信义，是承认大他者存在这一事实所蕴含的最低限度的善意。到他的幻觉中的某一时刻，我们还会走得更远，遇到一个真正非常奇特的表达：

“经我同意，某种东西必须存在。”

这不是“解答”。这不是一种极其容易翻译的东西。它是一个罕见的词；在请教过懂行的人以后，我得到的看法是：它无非就是我所谓的“基础词”。它确实是“钥匙”。它也许接近“解答”，但更确切地说，是“最后的栓钉”、是“基础词”。

这个术语带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在狩猎技艺中有一层技术性内涵。它大概就是猎人以一个沿用到法语中的德语词所称的 fumets，也就是大型牲畜留下的踪迹。

总之，即使只在这些事情上稍作停留，我也要向你们指出其中在我看来最突出的要点：也就是我上次所谓意义的迁移，或意义的后退、意义的闪避；主体不得不把它安排在一个背景层面。此外，还有两种样式、两种风格、两种“作用域”之间的对立——我用“作用域”这个词，是因为它最接近语言学家所用的术语；也可以说是“指向”——即幻觉风格的指向，只要它们涉及主体：

- 一方面，是这种疑问式的风格，是一种利用能指本身的属性进行切分和中断的方式；文本中还隐含着某种询问形式，主体承受着它——是在这个词最充分的意义上承受，直至包括其中的强制意味。

另一方面，是这种就其本性而言会闪避的意义，甚至会明确把自身指认为正在闪避的东西；但它又仿佛是一种极其充实的意义，是某种极限意义。它通过自己的逃逸和闪避，通过主体在经验中对它的追逐，仿佛把一切吸引过去；它构成整个妄想现象的心脏、中心、某种脐点——而这一切本身也被如此把握。

你们知道，我所使用的“脐点”一词也被弗洛伊德使用，尤其用来指梦的意义似乎终止于某种洞、某个结的那一点；越过这一点，梦的现象本身就真正连接到存在的核心。弗洛伊德正是这样表达的。

这只是一种现象学描述，并无更多内容；你们要努力从中取得最多的东西。至于这里所涉及的工作，我要强调：

- 是找到一种机制，也就是解释；
- 找到一种机制，严格说来就是从事科学分析工作；只不过这项工作所针对的对象，其种种层次和表现方式对作为医生、作为实践者的我们来说并不熟悉。

而我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们：熟悉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会让整个分析经验全部滑到一边，简直丧失它的意义。必须绝对保留这种现象关系。它全部维系于我已经强调过上百次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别。随着我逐渐使它显现，你们最终大概会对自己说：

> “可是归根结底，当他向我们谈所指和各种意指时，其中不总是或多或少包含着某种显然属于能指的东西吗？整个分析经验难道没有向我们显示：那些给分析经验定向、使它极化的意指，其能指已经由自己的身体直接给出吗？
>
> 反过来，近来当我们谈论能指——谈论某个元素可能从中缺席的那种能指——时，他是否在玩弄某种据说只有他掌握秘诀的障眼法？

事实上，他把意指最充实的东西放到能指顶端，因而为了论证的需要，总是在不知哪一种戏法下把东西从一个层次偷渡到另一个层次。”

我还要更进一步。我承认，这里的确有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而这恰好就是我今天想向你们解释的。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让你们以最鲜活的方式感到那种东西——你们毕竟应当对它已有一种整体直觉。去年，我在分析弗洛伊德思想时，已经向你们展示了某些典型现象。

例如，我曾用一些人还记得的字母［α、β、γ、δ］说明神经症的某种现象；今年又谈到精神病。你们必须感到，关键在于把下面这一点变成一种在我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实践中始终在场的要素：

- 如果存在一些基本意指；
- 如果存在我们称作“欲望”“状态”“感情”或“情感性”的某种东西——无疑相当含混——这些波动、这些阴影、乃至这些回响，构成一个内部可以界定某种动力学和某种经济学的场域；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顾及作为现象摆在眼前的一切：与这种固有动力学同样重要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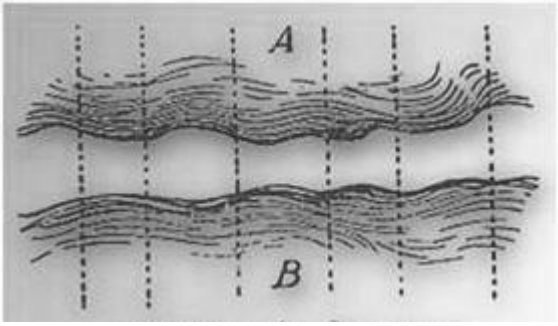
要解释这种动力学，缺少的要素实在太多；当我们纯粹在这一动力学层面解释事情时，常常不得不不断夹带进各种多少带有预设性质的东西

……还有另一种东西，严格说来，正是能指的层面：

- 因为它具有结构化作用；
- 因为它不只是给那种处于待定状态的东西——意指——提供外壳或容器；
- 因为严格说来，它使意义极化、使之结构化，并把它安置到存在之中。

若没有能指自身的秩序，没有对其属性的确切认识——这正是我们刚刚开始尝试在这里加以表述和解读的东西——就完全不可能理解任何事情。我并不是说不可能理解心理学，因为只要以某种方式界定和限制心理学，这句话就不再成立；但对于精神分析经验，它无疑成立。

你们知道，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构成费迪南·德·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础。在他的某一说明性章节中，这一点由著名的双曲线图式表达出来。




它非常确切地涉及我正在向你们谈的东西，即能指与所指。就此而言，甚至没有什么比索绪尔词汇的游移更能说明问题。在上面的层

面，他告诉我们：“这里有思想的序列。”他说得毫无把握，因为他的理论发展恰恰在于削减“思想”这个术语，把它引向更为精确的“所指”一词——所指既区别于能指，也区别于物。

他仅仅坚持说这里涉及的是一团“无定形的物质”，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话语进程中那种“情感物质”：它混沌地表达出来，其中会浮现一些单位、一些小岛——一幅图像、一种感情、一声呼喊、一个召唤——但它本身由一串连续之物构成。

而在下方［索绪尔图中］，能指被当作纯粹的话语链、词语的连续；甚至就在能指内部，首要之点也在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这条链中孤立出来。今天我想通过一项实验向你们展示这一点。

昨天晚上，在用一周时间从各种著作中寻找如何借助参照材料呈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后——也就是“我”作为主语与“我”作为重读形式之间永恒的差异——我转向人称代词，想看看是否能够在法语中向你们具体说明……

- 这两个“我”如何彼此区分、彼此不同；
- 主体如何可能在精神病经验中失去对它们的掌握，甚至失去同它们的接触；

……并由此更深入到术语本身的结构之中。因为一旦追究“人称”这个概念及其功能，我们立刻就会走得更远：不能停在人称代词的化身上；这里所涉及的是术语本身的结构。

显然，至少对我们的语言而言，涉及主体的人称时，就必须到术语中去寻找。这一切无疑为我今天想让你们迈出的步子作了准备。可以

说，到昨天晚上为止，我围绕这个问题已经积累了大量理论材料；而语言学家处理可靠文献的方式彼此抵牾，要向你们说明其含义、说明某位作者为什么处理它，就必须铺开许多个层面……总之，昨天晚上，我在纸上重新画出这两条链、这两重网：一边是就其纯粹言语、可标记的特性而言的话语链；另一边则的确是某种我们始终感到流动、始终可能解体的东西。

我们分析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经验，了解它何其难以捉摸；一个人在投身其中之前会怎样犹豫，又怎样随时准备回到其中；我们也感到，那里既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同时又最真实地给了我们各种人为手段，使我们能够尝试说出：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经验向前迈进一步，不只是补充说明它是什么，而且赋予它一种真正可用的意义。

你们知道，德·索绪尔试图界定某些片段及其长度，以便在这两股“流”之间把握某种对应关系。恰恰因为他的实验仍是开放的——也就是说，把短语乃至完整句子留作问题——它同时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方法的意义和限度。

好，我重新拿起这个问题，问自己：要进行实验，我们从哪里出发？我寻找一个句子，多少像一个重新创造诗歌过程的人：他无话可说，也无字可写，于是来回踱步，先念道：“To be or not to be。”他在那里久久悬置，直到重新从句首开始，才找到下文：“To be or not to be。”

于是我从一个“是的”开始；我不是英语使用者，而说法语，接下来浮现的就是：“是的，我到他的圣殿来朝拜永恒者。”这意味着能指不可孤立。马上就很容易具体看出这一点。假如把它停在“是的，

我……”上，为什么不可以？倘若你们真有一只像机器一样的耳朵，句子展开到每一个时刻都会产生一种意义；“是的，我……”也有意义。

这甚至很可能正是这段文本的作用所在。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帷幕会在这个“是的，我来了……”上升起。人们说，这是谈话还在继续。首先却是因为它产生意义！而且——我不想抢先讨论我们即将看到的另一面——这个开篇的“是的”的确有意义，它恰恰联系于法语 oui 一词中残留的那种歧义。

你们很清楚，甚至无需讲上流社会女子的故事，也能发现“是的”有时意味着“不”，而“不”有时意味着“也许”。法语的 oui 出现得很晚，在 si 之后，也在 da 之后；我们这个时代又在 dac 这个词里亲切地遇见了 da。Oui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由于它来自某种意为“事情正是如此”的说法，oui 通常是一种确认，至少是一种让步，而且最常见的风格正是“是的，但是”。

如果你们没有忘记，这个多少把自己往前推了一点、在那里登场的人物名叫阿布纳，那么开头的“是的……”——“……我到他的圣殿来……”——就很值得注意。很明显，句子只有完成之后才存在，因为那种使我们最终能够在事后知道它所指为何的预期，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直到达句子末尾，也就是到那个著名的“永恒者”那里。上帝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里；不过，说实话，如果你们记得剧情：这是王后——名叫阿达莉[注1]，这个小故事也以她为标题——手下的一名军官。她强有力地支配着一切事态，实际上是全剧的主角。一个人物开口说“是的，我到他的圣殿来……”，我们全然不知道它会通向哪里；

它完全可以用任何东西来结束，例如：“……我到他的圣殿来逮捕大祭司。”

> [注1]　让·拉辛：《阿达莉》，收入《戏剧全集》。原速记稿注释附有在线版本链接。

确实必须等句子结束，我们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我们处在能指的秩序中。我希望已经让你们感到能指的连续性究竟是什么：在一个能指单位中，只有在末尾闭合了某个环，能指的各个元素才各自获得位置。

我曾在这里停留片刻；说实话，刚才讲的一切本身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意义。这个小小的开头却有更大的用处：它使我发现，整个场景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更有效、更充分地让你们感到问题所在。心理学家最终总会在这里停步，因为他们的职能当然是去理解某种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语言学家也会停步，因为他们手里虽有一种出色的方法，却不敢把它贯彻到底。我们将尝试从两者之间穿过去，再往前走一步。

大祭司约雅达正在酝酿那个小小的密谋：它将使他的养子登上王位。这个孩子在两个半月大时被他从屠杀中救出，并在深深的隐居中养大。约雅达听着阿布纳。你们当然可以设想，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听这句宣告的：

“是的，我到他的圣殿来朝拜永恒者。”

这位老人完全可以在心里回应：“他来干什么？”主题的确继续展开：

“是的，我到他的圣殿来朝拜永恒者，

我依古老而庄严的惯例前来，

与您共同庆祝那著名的一天，

那天在西奈山上，律法赐予了我们。”

总之，他们谈了起来。“永恒者”被多少撇在一边以后——直到全剧终了，再也不会谈到他——他们开始追忆往昔，那是美好的年代：

“圣民成群结队，涌满门廊。”

总之，事情已经大不相同：

“……热忱的崇拜者只剩寥寥数人。”

到了这里，我们开始看到端倪——“少数崇拜者”。我们开始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认为现在该加入抵抗运动的人。于是，我们来到了意指的层面。也就是说，当能指继续走它自己的小路时，“热忱的崇拜者”已经指明了所涉及之事。

当然，我们很容易设想，大祭司的耳朵不会在经过时漏掉这种热忱（zèle）……

zèle 源自希腊语，意指某种竞逐、竞争、模仿［源自希腊语 ζῆλος：“嫉妒、热忱”］

……因为在这种游戏中，显然只有做合宜之事、把自己装得与他人相像，才可能胜出。总之，第一段话的锋芒终于显现出来：

“我不向您隐瞒，我战栗着，唯恐阿达莉，

命人把您亲自从祭坛前拖走，

最终在您身上完成她致命的复仇，等等。”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战栗”（trembler）——它在词源上与“惧怕”（craindre）是同一个词；我们将看到“敬畏 / 惧怕”（crainte）出现。这里无疑有某种东西展示了话语的意义锋芒：它带来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指示。倘若置身于上方的层次，即索绪尔所谓“无定形的思想物质”所在的层次，它之所以无定形，并不只是因为需要别人去猜；它自身就是一团无定形的物质。我们会在后文看到。阿布纳无疑充满热忱，但另一方面，待会儿大祭司稍稍扼住他的喉咙，向他说：

“少讲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凭什么认出那些不只是一味热忱的人？”

阿布纳于是会充分显示，事情归根结底何其棘手：自从那场巨大的衰落显现以来，上帝并没有提供多少力量的证明；相反，阿达莉及其一党的力量却显现出来，迄今始终凯旋。

因此，当他提出这一新的威胁时，我们并不很清楚他究竟想说什么。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是警告、善意的忠告、谨慎的建议，甚至也可以是一种所谓智慧的建议。对方的回答短得多。他有许多理由这样做，最主要的是他更强；可以说，王牌握在他手里：

“您今日为何——他只是这样回答——有这黑暗的预感？”

能指与所指在这里贴合得恰到好处。但你们可以看到，它严格说来没有透露这个人物想说的任何东西。阿布纳随后又作一番发挥，老实

说，他开始更深地进入意义的游戏。其中混合着奉承——“您以为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既圣洁又正义吗？”——也混合着告密：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名叫玛堂的人。即使阿布纳并没有走得很远，没有真正告发仍旧是他王后的那位高傲的阿达莉，玛堂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于是，一个替罪羊恰好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使这种“引饵”得以继续。

我们仍旧不知道他想把事情引向何方，只听到：

“相信我，我越想，就越无法怀疑，

她对您的怒火已经准备爆发。”

“昨天我观察她——我们来到情报军官的层面——我看见她的眼睛，

向圣地投射出愤怒的目光……”

我要请你们注意：在这个场景中，阿布纳作出了这一切善意表示之后，如果我们停留在意指层面，那么场景结束时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若只停在意指层面，一切都可以概括为：一些引子。每个人知道的都比他愿意说出来的稍多一点。

其中一个显然知道得多得多，那就是约雅达。他只给出一个暗示，仅此而已，以迎向对方自称知道的事情：这里别有隐情，换言之，圣所里藏着一个埃利亚辛。他的确知道某种属于传达秩序的东西。但你们可以从生动、甚至惊人的证据中看到，阿布纳是怎样真正猛然扑向这个暗示——我几乎要说，扑向这个召唤——从而激起他的激情：

“啊！倘若她在盛怒中弄错了……”他后来这样说，

也就是说：“她是否漏掉了屠杀的一部分？”亦即：“那个著名的大卫家族是否还有人活着？”

这个主动的表示已经足以说明，如果阿布纳来到这里，是被新鲜血肉吸引来的。对话结束时，他归根结底知道的并不比开始时更多，也不少。这第一场戏若要显出它的全部意义和全部效力，本可以归结成一句：“我来参加圣体节。”

“很好——对方说——进去吧，加入游行队伍，行进时别说话。”

事情根本不是如此，只有一个条件：你们要看出能指的作用。看出能指的作用，你们就会发现：有若干本质性的词、关键词潜藏在人物话语之下，并且部分相互重叠。这里有“战栗”“惧怕 / 敬畏”“灭绝”这些词。“战栗”和“惧怕”先由阿布纳使用。他把我们带到刚才指出的那一点，也就是约雅达真正开始发言的时刻。他开口说出最初几行诗：

“那位为狂涛加上缰绳者，

也知道怎样阻止恶人的阴谋。

我恭顺地服从他的神圣意志，

亲爱的阿布纳，我敬畏上帝，此外别无所惧。”

他继续说下去，并从这里把事情带向下一点：

“您说，‘我敬畏上帝’——尽管阿布纳从来没这样说过，他把这句话返还给他——您的真诚打动了我，

这位上帝现在借我的嘴这样答复您：”

于是，我们看到我开头向你们指出的“热忱”一词出现：

“用对我律法的热忱装饰自己，又有何用？

你以为用徒劳的誓愿就能敬奉我吗？

你们所有的献祭给我带来了什么果实？

［……］

从我的人民中灭绝罪恶，

这里重提了“灭绝”的主题。

然后你们才来为我宰杀祭牲。”

这里所说的祭牲，不能以为只是一些以多少固定的形式、在合适场所供奉的无辜牺牲。当阿布纳指出：

“圣约柜沉默了，不再发布神谕。”

对方立刻反驳说：

“……最伟大的奇迹难道总只能撞击你的耳朵，

却不能震动你的心吗？

阿布纳，难道非得要我向你重述，

我们这个时代成就的著名奇迹？

［……］

不虔的亚哈被毁灭，他用谋杀夺来的田地，

被他的鲜血浸透；

耶洗别在那片致命的田野旁被宰杀，

这位王后被马蹄践踏，

狗群畅饮她残酷的鲜血，

她丑陋身体的肢体被撕裂。”

于是我们知道，将要涉及的是哪一种祭牲。所以就在有人说上帝不在那里、并不介入时，他在两行诗之前告诉我们的事情已经宣布出来；我们听到这样的句子：

“阿布纳，难道非得要我向你重述，

我们这个时代成就的著名奇迹？”

下面是我刚才跳过的两行：

“以色列暴君们那些著名的灾祸，

以及上帝在他所有威胁中都被证明忠实；”

总之，我所谓能指功能的作用是什么？它恰恰体现为“害怕”与另一种东西之间的区别。“害怕”尤其具有一种暧昧而游移的性质；我们分析家并非不知道，它既是推动你前进的东西，也是把你拉回去的东西。它从根本上使你成为一个双重的存在；当你在一个想与之共同扮演害怕的人物面前表达它时，它每时每刻都把你放到一种姿态中：那个人既是他，也是你。

而与此相对，有一种看似同义、名叫“对上帝的敬畏”（la crainte de Dieu）的东西。恰恰在约雅达被人警告说有危险时，他谈到了这一点：约雅达从口袋里掏出这个相当刚性的能指，向对方解释何谓“对上帝的敬畏”。

我要请你们注意，“对上帝的敬畏”这个文化术语，在宗教思想的某一条谱系中绝对根本；你们若以为这只是普遍的宗教路线，就错了。卢克莱修想让同伴们摆脱的“对上帝的恐惧”或“对诸神的恐惧”，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比这里的“对上帝的敬畏”多形得多、混乱得多、惊惶得多。后一种敬畏在一条上溯至所罗门的传统中，被确立为智慧的原则和开端；不仅如此，它还支撑着一个非常确切地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传统。

就在对上帝之爱的根基处，“对上帝的敬畏”是一个不会到处滚动的能指。必须有人发明它，把它作为一种补救办法提供给生活在多重恐惧构成的世界中的人：去敬畏一个存在。归根结底，这个存在施加严酷惩罚的方式，也只能是那些在人类生活中多重在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一种敬畏”取代无数种恐惧。而这种敬畏要显明自己的力量，归根结底也没有别的手段，只能借助那些隐藏在无数恐惧背后、被人惧怕的东西。

你们会对我说：“这可真是神父的主意！”你们错了！神父绝没有发明过这种东西。要发明这样的东西，必须是诗人或先知。换言之，正因为这位约雅达多少是个诗人或先知——至少由于拉辛的恩典而如此——他才能以这种方式引入、使用这个主要而原初的能指。

我无法向你们讲述这个能指的文化史，不过：

- 它必须被定位，而且严格说来只能在这段历史中得到定位；
- 它绝对不能同某一种结构化分开；

正是这一种，而不是任意一种结构化；

- 正如我已经充分向你们指出的，就其自身而言，是能指支配着事物；因为说到各种意指，它们已经彻底改变。

这个著名的“对上帝的敬畏”之所以构成一场戏法，恰恰是因为它顷刻之间就把所有恐惧转化为完美的勇气：“我此外别无所惧”——一切恐惧都被换成了名叫“对上帝的敬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具有约束性，它恰好是恐惧的反面。到了场景末尾，发生的事情非常确切：约雅达把具有上述面貌的“对上帝的敬畏”传给了对方，而且传得恰到好处——从正确的一面进入，毫无痛苦。

阿布纳离开时已经坚定起来，身上带着那个与“在所有威胁中都忠实”的上帝相呼应的词。这里不再涉及热忱；从这一刻起，他将加入忠实的队伍。总之，此后他本人成了支架，成了被穿在那个引饵或鱼钩上的主体，而王后将来会咬上这个钩。事实上，整出戏到此已经演完、已经结束：正因为阿布纳将对王后真正面临的危险一言不发，王后才会被这个此后由他所代表的钩子钩住。

这里重要的是：凭借能指的效力，也就是凭借“敬畏 / 惧怕”这个词的效力，开头的热忱转化成了末尾的忠实；但这种嬗变严格说来属于能指本身的秩序，没有任何积累、叠加，或把各种意指汇总起来的总和

足以为它作出说明。正是在能指本身的介入对局势造成的这种嬗变中，这段对话取得了进展：一个人物从“热忱”——这个词在这里包含着全部歧义、可疑性，并随时可能翻转——转向了忠实。换言之，如果没有大祭司对能指的这种使用，这一场本来只会是“第二局”[注2]的情报戏。我所谓任何话语中的能指功能——无论那是神圣文本、小说、戏剧、独白，还是随便哪一种谈话——请允许我通过一种人为手段、一种空间化的比拟来表示它。

> [注2]“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法国军事情报部门旧时的通称。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比拟，因为它所呈现的东西正是每一次具体话语分析都应围绕其展开的真正中心点。我把它称作“绗缝点”（point de capiton）。那根软垫工的针在“上帝在他所有的威胁中都忠实……”这一刻穿进去，又从另一面出来，于是那个人说：“我要加入忠实的队伍……”这就是一个穿行点；它向我们指出，倘若像分析一部乐谱那样分析这一场戏，什么东西会在这里打结：

- 一方面，是这两个角色之间真正发生之事的各种意指——那团始终游移的“无定形物质”；
- 另一方面，是把它连到这篇纯粹而令人赞叹的文本上的东西；正因为有了它，这不是一出市民通俗剧，而恰好是一出拉辛式悲剧。

“敬畏 / 惧怕”这个词就是这个能指，它带有全部超越具体意义的内涵。一切都围绕它辐射、组织起来，如同绗缝点在一片织物表面形成的那些细小力线。这些汇聚点使我们既可以回溯性地、又可以前瞻性地定位这篇话语中沿着这一意义方向发生的一切。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好，这个概念、这个观念、这个图式、这个“绗缝点”的意象，正是人类经验中所涉及的东西；严格说来，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向我们提供的，正是人类经验的最低限度图式。它对我们保留着完全不可还原的价值；尽管如此，对于每一个接近过它的人，它可以说仍是“谜一般的”。

归根结底，为什么俄狄浦斯情结具有这种绝对特权的价值？为什么弗洛伊德总是如此坚持地要把这个事实重新找出来？为什么对他而言，它是全部思想进展中的本质之结，以至于哪怕在最小的特殊观察中，他也无法放弃它？如果不是因为“父亲”这一概念——它非常接近“对上帝的敬畏”这个概念——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向他提供了我所谓“绗缝点”的最本质、最可感的经验要素，还能是因为什么？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说到这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也许用了很长时间来解释它；不过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意象，也构成一个绝对根本的要点，使你们得以把握、理解：在某种精神病性经验中，能指与所指如何会突然以完全分裂的形式呈现。

因为我们可以说——而且人们也确实这样说过——在精神病中，一切仍然都在能指里，看上去什么也没少。施雷伯主席看起来极其明白，归根结底，被弗莱希希穿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后来还有其他人来取代弗莱希希——护士等等。令我们的理论为难的是，他恰恰说得再明白不过；既然他已经明说了，人们真不知道为什么它还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性紊乱。

我们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理解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除非你们隐约看出：由于某种原因，某一个这样的 x 不可能建立……

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数目，但我们并非不可能最终确定这个数目

……所谓　x，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根本系结点。一个人要被称作正常，需要若干这样的点；而精神病中，某个这样的点从未在任何地方建立，或者已经松脱。也就是说，这个点有时会显露出能指与所指之间一种早已确立的独立性；反过来说，它也可能让这种独立性爆裂出来，可以说炸开能指与所指之间根本的意义关系。

相关知识卡 **绗缝点：能指、所指与意义的暂时钉合**

这当然说得非常粗略。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关键的精确点；从这里出发，下次我们才能提出主体“人称化”（personnaison）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主体说“我”——无论非重读或重读形式——说“你”或说“他”的方式。这个“人称化”与这一根本机制、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之间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关系？我刚才已经打开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代词的使用，也可以通过动词的使用来探究和把握它。

当然——这也是今天我要引起你们注意的要点——在这个能指秩序中，没有任何一种特殊语言享有特权。因为，如果我们从话语作为某种［……］的表象来考察它，考察是什么界定了这种能指材料，我们就会发现，每种语言在这里拥有的资源极其不同，而且总是有限。另一方面，显而易见，任何一种语言始终都可以用来覆盖任何一种意指。

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人称在能指的什么地方？一篇话语如何站立起来？例如，它能够以非人称的方式站立到什么程度？而一篇

看似属于个人的话语，仅仅在能指层面上，又能携带多少去人称化的痕迹，以至于主体不承认它属于自己？

这里涉及话语的人称化或去人称化问题。我没有说这就是精神病机制的动力；我说精神病机制也在其中。我说，在找到、集中并圈定精神病机制的确切点以前，我们必须练习在现象的不同层级上辨认：绗缝在哪些点上崩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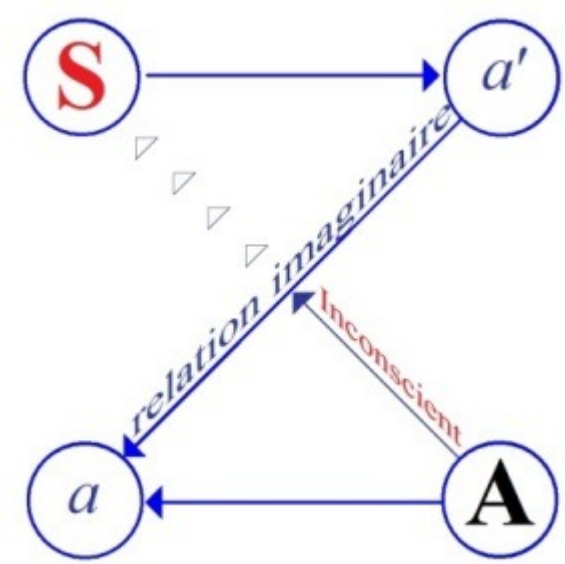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为这些点编制一份完整目录，就会看到，主体并非以任意方式使自己的话语去人称化。我们也会发现，这是一种真正触手可及的经验：只要某种东西……克莱朗博本人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他在某处谈到，当我们突然被过去或回忆中某种多少难以承受之物的真正情感唤起所攫住时，会发生什么。他提到这种逃逸点、这种意义唤起的丧失；所涉及的完全不是纪念性秩序，而是某个面向本身的重新涌现，它使得：

- 当我们回忆一场愤怒时，我们非常接近再度发怒；
- 当我们回忆一次屈辱时，我们仍在经历那次屈辱；
- 当我们回忆一种幻象的破灭时，简直就是重新把它经历为破灭；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重新组织自己的全部平衡、重新组织严格说来作为社会场域的意义场域……

在这个时刻，某些句子的碎片或残片最容易冒出、涌现——克莱朗博称之为“纯粹自动的”涌现。这些句片有时取自最直接、最近的经验，而严格说来与眼下涉及之事没有任何意义关系。这些自动症现象确实被观察得极为出色，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现象。只要我们拥有合适的图

式，就足以把这种具体表现安置到现象之中，不再停留于纯粹描述，而能真正作出解释。

我认为，正是施雷伯主席这种带有极其细致记载的观察，应当最大限度地把我们带向这一类事情。下次，我会从这里重新谈“我”和“你”；并不总是把它们当作明说出来的词，因为一句话无需出现“我”和“你”也仍是一句话。比如“来！”就是一句话，并且蕴含着一个“我”和一个“你”。




我曾给你们那个图式：S、小 a、a’ 和 A。这个“我”和“你”在其中位于哪里？

毫无疑问，你们也许以为“你”就在这里［A］。下次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你”在其言语化形式、能指形式中，远远不能与我们所谓大写 A

的极点——也就是大他者——混同，甚至远远不能哪怕近似地覆盖它。

# 第22课 · 1956年6月13日

皮雄与达穆雷特《语法》，第264页：

“我现在更是我自己了。以前我是一个相信自己才是真我的准我，而那个准我是绝对虚假的。”“无论如何，我要明确指出：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曾支持人民阵线……”

我会到结尾再作结束。

这些句子的意义在于，它们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语句。我是在皮雄与达穆雷特的语法书等资料中收集到的。无论这部书在整体和细节上有什么错误，它仍是一部篇幅浩瀚、极富教益的著作，仅仅那批经过相当明智分类的巨量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两句话，一句来自口语，一句来自书面语。它们向我们显示：今天我要让你们围绕其思考的东西，并非为了让你们进入某个问题而错误植入、凭文学机巧杜撰出来的东西。

第一句话显然是采集来的。皮雄用一位正在接受分析的女病人的姓名首字母作了说明；他说：某某夫人，某日。“我现在更是我自己了——她说；无疑，她对治疗中取得的某种进展颇为满意——以前我是一个相信（qui croyais）……”谢天谢地，法语口语虽常有歧义，在这里却因为辅音静默和词首元音相遇，使我们能够完全区分所涉及的形式：“正是我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准我。”这里用的是单数第一人称，是“我相信”（je croyais）。第一人称的主体之我穿过关系代词，传递进了关系从句。

你们会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最近我想让一位迷人的女士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向她提出下面两句之间的差别，她正是这样回答我的："我是那个不会抛弃您的女人"（Je suis la femme qui ne vous abandonnerai pas，关系从句动词为第一人称）与"我是那个不会抛弃您的女人"（Je suis la femme qui ne vous abandonnera pas，动词为第三人称）。今天我们只谈这个。我必须说，我完全没有成功。她拒绝对这个你们已经感到很重要的细微差别产生兴趣。用法已经充分显示这一点，因为同一句话里的那个人继续说：

"我现在更是我自己了。以前我是一个相信自己才是真我的准我，而那个准我是绝对虚假的。"

我认为没有哪句话表达得更准确了，它听上去丝毫没有走调。但你们完全能感觉到，"绝对虚假"并不属于前一个第一人称；"绝对虚假"没有贴到"我"上。是这个准我"曾经绝对虚假"（était，第三人称）。在后半部分它是一个"他"，在前半部分则是一个"我"。

皮雄的书里还有若干这类例子，另一些也颇为辛辣，并且始终切合时事。例如阿尔贝·迪巴里写道："无论如何，我要明确指出，我们当中许多人（nous sommes nombreux ceux qui）都曾支持人民阵线、投票给它的候选人，并且相信它所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理想、完全不同的行动和完全不同的现实……"这里关系从句先用第一人称复数 avons，随后又转为第三人称复数 croyaient。

另一个例子属于不同的层次。说到这里，请你们留意；借助这面可以称作屏幕或透镜的东西——也就是进入关系从句的入口——你们会不断成把地捡到这类句式中的例子。它使我们看出，主句中的人称化是

否穿过这面屏幕。屏幕本身显然是中性的，不会变化。因此要问的是，可以说，先行词的人称化具有怎样的穿透力。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待会儿我们会回到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小的语言学要点；它在其他语言中也以非常鲜活的方式出现，并不比法语弱，只是显然必须到这种句法形式之外去寻找。我们会再谈它。

上次结束时留给你们的问题是：我们围绕能指本身的功能迈出的这一步，能够给下面这个问题带来怎样的启明？这个问题就是：

- 分析关系中的大问题；
- 一般说来，在各种关系、在分析关系中的炙热问题；
- 归根结底，被客体关系的功能混乱地现实化的问题；
- 被精神病的结构本身和现象学格外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设想他者？迄今为止，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这个他者在想象的小他者与大写 A 的大他者之间的双重性。

去年，我在一次题为《精神分析中回到弗洛伊德》的简短讲话里谈到这个大他者；这篇文章刚以《弗洛伊德之物》为题刊载于《精神病学的演进》，其中有一节题为“言说的场所”。请原谅我引用自己，但如果不是为了使用，又何必把公式打磨得如此精细？

“因此，大他者是言说的‘我’与倾听者一道构成自身的场所。”[《文集》，第431页]

我是在作出若干评论后说这句话的；为了恢复今天的问题所在，我把最后一段评论引给你们：

> “通常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如同他自己一样，并不会受到理性约束；除非原则上接受一种辩论规则，而这种接受必然伴随着对所谓辩论基础的明确或默契同意——这几乎总是意味着预先同意它的赌注。所谓逻辑或法，从来无非是一套规则体系；这些规则曾在历史中某个有确切日期的时刻被费力调校，并盖有其起源地点的印章：广场、论坛、教会，乃至政党。因此，离开大他者的善意，我不会对这些规则抱任何希望；到无计可施时，若我认为合适或被迫如此，我也只会用它们来戏弄恶意。”[《文集》，第430—431页]

这段评论指出：在每一次具体对话、每一种主体间心理游戏之外，总还有一个大他者。它最终完成并收束于我再次重复的公式中；你们应当把这公式当作一个既定点、一个出发点：

“因此，大他者是言说的‘我’与倾听者一道构成自身的场所；一方所说的已经是回答，而大他者通过倾听来判定这一方究竟说了话还是没有说话。”[《文集》，第431页]

我希望你们感到，至少回想起来，这一视角同人们每次开始多少含混地谈论大他者时总会多少接受的视角有什么不同。说大他者是言说者与倾听者一道构成自身的场所，与从“大他者是一个存在者”这一观念出发，完全是两回事。

近来，分析在毫无可以辩护或说明的理由下，受到了某种东西的熏染。它无可争议地来自所谓“存在主义”话语：在那里，他者是“你”，或

者他者是“能够回答的人”；而且他以完全对称、完全对应的方式回答——一个另我、一个兄弟，一种从根本上互惠的主体间性观念。再加上归在“人格主义”名目下的几种感情混淆，以及马丁·布伯《我与你》[注1]的阅读，混乱就最终定型，并会在一段时间内无可挽回，除非我们回到经验。

[注1] 马丁·布伯：《我与你》，Aubier Montaigne，1992年版。

很清楚，所有这些存在主义经验非但没有澄清大他者存在的根基，反而只是把它越来越彻底地悬置在所谓“投射”这一根本假设上——当然，你们所有人都靠这个假设生活。归根结底，它认为他者——他几乎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不过是一个具有人的外表、由一个作为我的“我”之反映的“我”赋予生命的东西。

“万物有灵论”和“拟人论”这些术语以及人们对它们的使用所蕴含的一切，始终准备从这里冒出来，而且确实无法反驳。同样，人们还会极其粗略地诉诸“经验”，诉诸咿呀学语初期的语言经验：在儿童经验中，“你”与“我”并非立刻就被掌握；然而，儿童获得这种掌握，归根结底就是当你对他说“你”时，他能够说“我”，也就是懂得当你对他说“你会这样做”时，他不该重复“你会这样做”，而要说“我会这样做”。

在他的层次上，“你是父亲”就是“我是父亲”。于是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此对称。归根结底，这一切在分析层面——我是说，在分析家话语的层面——导向若干不证自明的真理，导向下面这种耸动而斩钉截铁的断言：

“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进行分析……”

我确实亲耳听到所谓“另一个团体”中的某个人说：

“无法分析一个他者对其并不存在的人。”

我想知道，“他者不存在”是什么意思。我甚至怀疑这个公式本身是否包含哪怕最微薄的近似价值。这里说的是什么？某种亲历感受？一种不可还原的感觉？

它是什么？确实无从知道。比如，看看我们的施雷伯个案：对他来说，整个人类在一段时间内显然沦为“依六—四—二仓促做成的影子”，

沦为人的假象；然而仍然存在：

- 一个具有结构的大他者；
- 一个甚至得到异常强调的大他者；
- 一个绝对的大他者；
- 一个完全彻底的大他者；
- 一个根本不是场所、也不是图式的大他者；
- 一个被他断言以其自身方式活着的大他者；他还强调，只要这个大他者是一个活着的存在者，它在受到威胁时，就会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具有利己主义。

上帝本人由于某种首先应由他负责的紊乱，发现自己的独立性处于受威胁的位置。从这一刻起，他便能够、也确实表现出一些多少痉挛性的防卫和利己关系。

不过，这个大他者仍保持着这样一种他异性：他对生命事物是陌生的，尤其无法理解我们的施雷伯的一切生命需要。这个大他者确实在此带有全部重音；施雷伯某一章格外辛辣而幽默的开头，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他在那里告诉我们：

> “我不是偏执狂。人们不是反复告诉我们吗：偏执狂把一切都联系到自己身上，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格外泛滥——因为他尤其读过克雷佩林——可我完全不同，是大他者把一切联系到我身上：一切发生的事，都是他把它联系到我。”

然而也必须承认，他这样说并没有显得多么聪明——这正是那种根本的误认。他断言结构有所不同，因为有一个大他者；而这一点对于个案的结构化的确具有决定性的、结构性的意义。

所以，我们应当弄清楚……

在把大他者说成某种被放置或没有被放置在一定距离上、某种我们能够或不能拥抱、扑灭、乃至吞食的东西之前——如今在分析中，人们越来越常以快慢不一的剂量吞下它

……应当弄清，事物向我们呈现于自身经验以及其他地方时，其现象学本身是否要求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

当我说大他者必须首先——在考察它会以多少程度实现之前——被当作一个场所、一个言说在其中构成的场所时，我正是在告诉你们这一点。为什么不呢？既然今天我们对“人称”感兴趣，它们总得来自某个地方。不过要听清楚：它们首先会以能指的、也就是形式的方式，来自言说为我们构成自身的场所。言说会从一个“我”和一个“你”出发——

无论这里是否真的涉及这两个相似者——对二者加以转化，赋予它们某种距离、无疑也赋予某种恰当关系；但我要坚持的是，这种距离并不对称，这种关系也不互惠。

你们将会看到，“我”从来不在它作为一个特殊能指出现的地方。“我”始终作为一种支撑整个话语的在场而存在，无论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我”是那个说出话语之人的“我”。每一句所说之物下方，都有一个说出它的“我”。正是在这一言说行为内部，“你”才出现。

这些都是最初步的真理；我几乎要说，它们如此初步，以至于你们可能会越过自己的鼻尖到更远处寻找。除了我刚指出的，并没有更多需要听懂的东西。“你”已经处在话语内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除了说出“你”的地方，从来没有别处存在过“你”。首先，我们就必须在那里找到它，真正把它当作“你”这一发声本身。让我们从这里出发。

至于“我”，这一点也许不会立刻显得同样明显：它并不像“你”那样拥有一枚在话语中流通的货币、一个信用要素。不过，我希望待会儿恰好能向你们显示这一点。现在我先断言并提出它，只是为了让你们不至于忘记，知道我要走向哪里。这个“你”远非指向某个不可言说的人、指向存在主义时尚想让我们看到其原初重音的那种彼岸；在实际用法中，它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想让你们在这类简单评论上停留片刻。

“你”远非总是那种被人们大书特书的充实的“你”……

你们知道，有时我本人也在一些重要例子中谈到它……问题在于：在“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的妻子”这些句子中，究竟有多少“你”？你们知道，我很看重这些例子，用它们来说明言说功能的某些东西。今天所要做的，正是校正并重新集中赋予这个“你”的作用域

……“你”远非总有这种充实的、奠基性的用法，仿佛它本身以任何方式构成这里的基础。今天我们恰好要考察这一点。我带你们回到一项初步的语言学观察：单数第二人称远非总带有这种重音。下面这个最常见的用法会让人说：

“人在这个地方散步，总会有人来搭讪你。”

这里没有任何特定的“你”，也没有任何特定的“您”；事实上，它既不是“你”也不是“您”。它几乎是泛指代词“人”（on）的反身形式，是与之对应的形式。再举一个意义更鲜明的例子：

“人一旦达到这种智慧境界，你就只剩下一死。”

这里又涉及哪一个“您”或哪一个“你”？我说这句话时，肯定不是在向任何具体的人说话；这里所说的甚至也不是某个作为他人的“您”……

请你们把整个句子拿来，因为没有一个句子能够从自身意指的充实性中脱离出来

……这个“您”如此缺少一个他者作为目标，以至于我几乎要说，它所指的是那些仍固执地活着之人的残余，仿佛他们独立于这篇谈论智慧的话语结束以后仍会留下的人；而这篇话语说，一切没有别的终点，只有死亡——你只剩下一死。

这已经充分向你们显示第二人称在这种场合的功能：它恰恰瞄准“人称”内部的东西，居于其中并发生去人称化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很熟

悉这个在这里被杀掉的“你”（tu qu’on tue）；它就是我们在分析和精神病现象学中完全熟悉的、在我们内部说“你”的那个东西：

- 这个总以不引人或引人注意的方式让人听到的“你”；
- 这个独自说话的“你”；
- 这个对我们说“你看”、说“你总是老样子”的“你”；
- 这个像施雷伯经验中那样，无需说出“你”，也完全就是向我们说话的“你”。

因为只须发生一点点解体——施雷伯所经历的已经绰绰有余——一整套这类东西就会冒出来：“不要向第一次召唤让步。”这里所针对的东西……

就像施雷伯内在经验中一切多少得到聚焦的东西一样

……没有被命名。我们可以把它重建为在那里起作用的同性恋倾向，但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因为邀请和命令并不少见，而是持续不断。这个句子事实上也是许多人的行为准则：不要随你的第一个动作平息下去——尽管人们总说，第一次也可能就是正确的。

人们教给你们的，不正是永远不要向任何事物的第一次召唤让步吗？而且，我们在这里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超我。它突然以一种面貌、以其现象形式向我们显现，而不是以那些讨人喜欢的发生学假设显现。这个超我的确很像律法，但它是一种没有辩证法的律法。人们多少有些道理地把它认作“绝对命令”，并非毫无缘故：内在敌人在我

所谓“恶意的中立性”中向我们说话；某位作者[注2]把它称作“内部破坏者”。

> [注2] W. 罗纳德 · D. 费尔贝恩：《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1952年；In Press出版社2002年再版。

如果我们误认这个“你”的“你”之功能，或误认它的各种属性，那就错了。经验告诉我们，它作为某种我们称作观察者的东西在那里：它看见一切、听见一切、记下一切。这正是施雷伯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是他同那个在自身内部通过“你”表达的东西发生关系的方式。这个不知疲倦、永不停歇的“你”刺激他作出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回答：它看见一切、听见一切、记下一切。

我几乎想用一句老广告语来收尾：“无人察觉。”它过去曾印在电话簿上，为一家私人警察机构作广告。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到，这何其像一种理想。当然，事情的广告功能也很明显：如果真能“无人察觉”，人人都会多么开心。问题恰好在这里：哪怕躲在帘子后面，总还有一双大鞋露在外面［参见《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之死］。超我也是如此。不过，它自己肯定什么都没有察觉。

这句话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凡是通过这个“你”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再没有比它更不容怀疑的了。换句话说，在开始这项探察时，我们毕竟必须发现：任何对“你”的构造，都会忘记这个最初的锐边，而我们的分析经验恰恰显示了它。

可是，我们竟会忘记“你”从根本上作为陌生者在那里，这件事似乎不可思议到了这种程度：一位分析家甚至一度把它比作某种发生在虾类小甲壳动物身上的事情。此类动物有一种特殊属性：生命初期，它的

前庭腔向海洋环境敞开。这里所说的前庭是调节平衡的器官。通常这个前庭腔是封闭的，包含一些散布在这些动物种类中的小颗粒。换言之，环境中的某种东西会标记主体的不同位置：主体处于垂直或水平状态时，会以不同方式携带这些颗粒。

这些小动物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自己悄悄把几粒沙子送进壳里的前庭腔；随后，前庭腔经由生理过程闭合，于是它就在自己的小装置里自行储备了这些漂亮东西。只需用几粒铁屑代替沙粒，我们随后就能用一块电磁铁把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带到天涯海角，让它们四脚朝天地游泳。好，这就是“你”在人身上的功能。伊萨科尔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我在话语的这个位置把它讲给你们，显然说明我很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护教式的典型参照，使你们首先理解“你”的经验涉及什么。姑且说，这是它最低的层次；不过，如果不知道它恰恰会通向这里，就会绝对误认“你”作为能指的全部功能和存在。请注意，事情在这里走得相当远；而且分析家们——我并不是独自在走这条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坚持。

我不能长篇讨论能指“超我”的这一功能——它无非就是“你”的功能——与现实感之间的关系。我也无需坚持，因为施雷伯主席个案的每一页都在强调它。主体不怀疑自己所听见之物的现实性，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妄想中的“你”所发命令带有异物的性质。

在另一个极端，我是否还需要提醒你们：说到现实，康德哲学最终认为，除“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之外，没有固定的现实。归根结

底，这个陌生者会像《伪君子》中的人物一样，成为房子真正的主人；一旦发生哪怕最小的冲突，它会对自我说："该出去的是您。"

当陌生感出现在某处时，它从不落在超我一边：

- 是自我再也找不到自己；
- 是自我进入"你"的状态；
- 是自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复本，也就是进入这种令人不安的状态：看到自己这个自我被逐出房子，而上述那个"你"始终保有对事物的所有权。

这当然是经验。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停在这里。不过，为了理解问题在哪里、结构问题在哪里，毕竟必须提醒这些经验真理。

当然，由于我们处在话语和言说层面，我这样把事情机制化，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你们也许以为，我仍停留在一种关于话语的初级观念：仿佛我设想或教导，一切都包含在"我"与"你"、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语言学家——更不用说精神分析家——每次接近话语问题时，正是在这里停下并开始……

……咿呀学语。

我甚至要说，令人遗憾的是……

在我刚刚谈到的皮雄那部很出色的著作里

……为了给动词的各大“分配类目”——用他的术语说——下定义，人们仍必须、或自以为必须把下面这一点作为原则和基础重申：话语总是向另一个人发出，因此我们要依据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确切地说依据……

- 说话者，即发话人；

- 与受话者，即话语向其发出的人之间的关系；

……来划分这些大的分配类目。我们先谈命令式“来！”中看到的简单发话层面。无须多说：“来！”预设一个“我”，也预设一个“你”。另一方面，还有叙事式，即“脱离发话者”的形式，它从其他某物出发。

其中仍总会有自我和“你”，但瞄准的是别的东西。人们大概并不完全满足于这种划分，因为只要你们查阅皮雄……

这也许会让你们想去看看他怎样处理疑问句

……他就会提出一些新问题，并用一种不对称来引入它；只要我们认为数字“三”最好，这个不对称也会构成对称。换言之，叙事式是“他来”（il vient），疑问式则类似“他来吗？”（vient-il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vient-il ?”中的 -t-il 功能并不如此简单。证据在于，法语会说“国王来吗？”（le roi vient-il ?，同时出现名词主语和倒装代词），这清楚地表明，疑问中的 -t-il 与叙事中的“他”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主体。

“国王来吗？”可以意指：

- 他是否到来；
- 是否有一个到来的国王；
- 或者，国王是否来。

一接近语言的具体用法，问题就复杂得多。命令式“来！”的确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我”和“你”以对称的两极同时在场。可是你们怎么说？在这个命令式中，在构成发话行为本质的叙事式中——例如“倘若他来”以及对一个被称作第三人称的第三方客体的指涉中——“我”和“你”是否同样在场？

所谓第三人称并不存在：没有第三人称。我顺便告诉你们这一点，好开始动摇小学语法教学在你们头脑里留下的几块顽固基础。没有第三人称，本韦尼斯特已经完美地论证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在叙事式层面，我要问：叙事式具有怎样的言说行为性质？正是在这里，我们要停留片刻，问一问：对我们而言……

在我们的陈述或论述已经达到的这一点上

……所谓问题——我所谓主体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向自己提出的关于“我是什么”或“我可以希望成为什么”的问题——能够处在何种询问形式中？

也许应从这个始终被遮蔽的根本位置出发……

它被遮蔽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在我们的经验中，主体总是在自身之外、在自己不知情时才表达它

……然而，它仍是根本性的，因为我们正是在那里揪住了“问题”的两只耳朵：这个问题是神经症的奠基性问题。

当这个问题浮现时，我们已经看到它以奇特的方式分解；它以毫无疑问语气的形式浮现，介于感叹、愿望和疑问公式之间，例如“但愿我能成功！”如果想让它稍微更有实质，把它放到脱离发话者的叙事式层次，也就是用陈述语气来表达，请注意我们会怎样自然而然地说：“你认为自己会成功吗？”

总之，我想把你们带向语言功能的另一种划分，带到它们的充分层次……

这不同于围绕发话、脱离发话、向受话者发话所作的那种牙牙学语

……这种划分是：问题始终潜伏，却从未被提出；如果它终于出现、终于涌现，恰恰是由于某一种言说的显现方式。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称呼它，我并不特别执着于其中任何一个：可以称作使命、委任、授权、授予；若参照海德格尔，则当然是根基，也可以称作奠基性言说。“你是这个……”——无论你是我的妻子、我的主人，还是千百种别的东西——我接收到这个“你是这个……”，它在言说中把我变成并非我原来所是的另一种东西。

问题就在这里。谁说出它？主体如何在这种充实言说中接收它？它同刚才例子里那个自由航行的“你”是一回事吗？

从现象上说，这一使命相对于问题，是原初的还是次生的？

问题当然恰恰倾向于在那里涌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一使命作答时。顺便请你们注意，这里所涉及的第三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像一个客体。

这里所涉及的第三项、将要涌现的“它”，始终是主体所参照的话语本身。换言之，对“你是我的主人”作出回应的是某种“我是什么？”“如果我确实是，我是什么才会是它？”这里所涉及的那个代词“它”，并不是把主人当作第三方、当作客体；它是整个言说行为，是那个说“我是你的主人”的句子。仿佛“你的主人”仅凭我对它表示的敬意便有了意义。但真正的问题是：“为了成为你刚刚说的那个东西，我是什么？”

基督教实践中有一篇非常美的祈祷，名叫《万福玛利亚》。没有人想到，它以佛教僧侣终日低声诵念的前三个字母开头：“AUM”。奇怪的是，两者恰好必须相同；这应当向我们表明，能指秩序中有某种彻底根本的东西。不管怎样！“万福玛利亚”。另有一首通俗小歌为了避免重复，用另一个公式唱道：“万福玛利亚——您将会无夫而生子。”

这与施雷伯主席的主题也绝非没有关系。回答根本不是“我是什么？”回答是：

“我是主的婢女，愿照您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原则上，婢女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我是婢女”只是说：“我消隐自身；为了成为您所说的那个人，我算什么？”可是，“愿照您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在最清晰的言说中，这正是此处涉及的应答秩序。从这里出发，我们也许会发现并准确定位：当这个所谓“授予”的句子充分

展开，使我们能够看见作为异物的“你”，与主体是否承担它之间的相互关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涉及钉住、绗缝，涉及重量，涉及主体被一个能指攫住。

所以今天请你们同我一起在若干例子上停留；这些例子对我们法语使用者具有语言学上的作用……

“我就是那个总想行善、却总在作恶的人。”

昨天晚上我顺手重新查了原文，好告诉你们自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原句说：

“我是那种总想行善、却总在作恶的力量的一部分。”

所以，照原文写法，我们无法拿它做任何文章。但我要问你们会怎样书写它。因为在德语中，人称也可以穿过关系从句这面屏幕；问题同样可能出现：我究竟是用第一人称说“我是那个总想……的我”，还是用第三人称说“那个歌唱的人”。顺便提醒你们，第一人称在这个场合与第三人称发生歧义，这也不是偶然。不过，让我们用法语来考察，两者有什么差别？重新拿起刚才的例子：

- “我是那个不会抛弃您的女人。”（Je suis la femme qui ne vous abandonnerai pas，关系从句动词为第一人称。）

- “我是那个不会抛弃你的女人。”（Je suis la femme qui ne t’abandonnera pas，关系从句动词为第三人称。）

可是，这也许会在你们心中唤起太多带有具体意义的回声。我换一个例子，让你们能够更自如地施展清醒的判断。下面两句有什么差别？

“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 partout，suivras 为第二人称。）

以及：

“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 partout，suivra 为第三人称。）

这里的主句是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人。”“那个……的人”（celui qui）恰恰是这面所谓“第三人称”的屏幕；它可能让“你”的统一性从句子的一部分穿到另一部分，也可能不让它通过。你们立刻就能看见：绝不可能把这个关于“你”的问题同能指 suivras/suivra（跟随）的意义分开。[注]

[注] suivras（第二人称单数）与 suivra（第三人称单数）发音完全相同，差别只见于书写；中文也只能把两句都译成“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因此正文保留法语词尾。拉康所强调的不是两个“跟随”的词典义差别，而是主句的 tu 是否穿过关系从句的 qui：第二人称式趋向委派或召请，第三人称式则趋向事实观察。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换言之，“那个……的人”是否会让“你”穿透，完全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跟随”的意义；还取决于我这个说话者——这个说话的我未必就是我本人，也可能是从整个句子下方的回声中听见它的人——赋予“你是那个将跟随我……的人”这句话中第三人称 suivra 或第二人称 suivras 的意义。

很清楚，使用第二人称 suivras 的“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至少是一种拣选，也许是独一的拣选；无论如何，它是我刚才谈到的委任，是一种授予、委派、赋权。它至少不同于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的同一句话；后者最低限度只是一项观察。我们很快就倾向于把它听成、感到是一项颇为无奈的观察。因为，如果“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真的以限定方式把主体规定为那个人，我们很快就会受够。总而言之，一边倾向圣礼和委派，另一边却很乐意、也很快滑向迫害；而“迫害”（persécution）这个词本身就包含“跟随”（suivre）的层次。总之，借助这个例子，你们清楚看到“你”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你们会再次对我说，这里涉及的能指恰好就是一种意指。我会反驳说，在我姑且称作疑问倒装词尾 -t-il 的层面上，我甚至不能说它比另一种形式更加强烈。某种东西像影子一样到处跟着你，当然可以被认为格外强烈；但就因为如此，它也相当不方便。

当我对某个我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为同伴的人说“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suivras）时，这里涉及的跟随则是另一回事；它可以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你是我的主人”的回答。它是一种其意指蕴含某种能指样式之存在的东西。我们马上就把它具体呈现出来。

法语在这里会造成歧义；我的意思是，它没有足够迅速地在自身内部标明“跟随”这个维度——真正的“跟随”——在能指上的独特性。跟随什么？这个问题仍是开放的。是跟随你的存在、你的讯息、你的言说、你的团体，还是你所代表的东西？它是什么？它代表着一个结，是意指束中的收紧点；主体可能已经取得这个点，也可能没有。恰恰因为如果主体尚未取得它，他就会按第二种意义听见“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第三人称 suivra），而不会按第二人称 suivras 所说的意义来听。这样一来，一切都会改变，包括“你”的作用域。

在 suivras 的第二人称词尾中“你”的这种在场，恰恰牵涉到受话主体的人称化。现在回到一个切实可感的例子。当我说：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 “你就是那个不会抛弃我的女人。”（Tu es la femme qui ne m’abandonnera pas，关系从句用第三人称词尾 -a。）

我对伴侣行为表现出的确定性，远大于我说下面这句话时：

> “你就是那个不会抛弃我的女人。”（Tu es la femme qui ne m’abandonneras pas，关系从句用第二人称词尾 -as。）[注]

[注] 斯塔费拉逐字稿在这里录成两句以 Je suis la femme… 开头的条件式，句法与下文的对比都不能相接。米勒定本第316页把对照校订为同一主句 Tu es la femme… 下 abandonnera（第三人称）与 abandonneras（第二人称）的差别；格里格英译也据此译为 will not / wilt not。两种法语形式读音相同，差别只在书写及人称关系；中文无法复现，故在括号中标明词尾。

要让人感到这个在听觉上无法区分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我表现出大得多的确定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则表现出大得多的信任。这种信任恰恰意味着，句子前半部分“你”中出现的人称，与关系从句中出现的人称之间的联系较弱。可以说，系结更松。恰恰因为它是松的，能指方面才显出一种特殊的独创性：它预设这个人知道“跟随”涉及何种能指，并且承担它；是她将会跟随，而这也意味着她可以不跟随。

我重新开始，援引一个有其意义的参照；它所触及的，无非是“我”与能指关系中最彻底、最根本的性质。

在古代印欧语言以及现代语言的某些残存形式中，有一种你们在学校都学过的所谓“中间语态”。按一种与学校教给我们的其他近似说法价

值相当的解释，中间语态不同于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之处，在于主体实施了这里涉及的行动。有些动词形式会说出若干不同的事情。比如“我献祭”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表示我作为祭司献祭；另一种表示我为了自身利益而奉献祭品。

对同时具有两种语态的动词而言，关键不在于深入中间语态的这种细微差别；因为我们自己不使用它，所以总会感觉不清。真正有启发的是发现：有些动词只具有其中一种语态或另一种语态，而语言学家恰恰会把这一点略过——除非他们格外机敏。

于是你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本韦尼斯特先生曾以一篇文章汇集这个问题的材料；我把出处告诉你们：1950年1—3月、整期讨论语言的《正常与病理心理学杂志》。我们会看到，以下都是中间态动词：出生、死亡、跟随和推动运动、做主人、躺卧、回到熟悉状态、游戏、获益、受苦、忍耐、经历精神激荡、采取措施——后者就是你们作为医生都被授予的 medeor，因为与医学有关的一切都源于这个medeor——最后还有说话。这些恰恰都属于我们分析经验中利害攸关之物的层次。

在若干语言中，有些动词只以中间语态存在和发挥功能。根据这项研究，这一语态恰恰指向这样的观念：主体在动词所表达的过程或状态中构成自身。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不要重视“过程”或“状态”这些术语；动词功能本身绝没有那么容易被任何范畴把握。动词是句子中的一种功能，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因为名词同样能够表达“过程”或“状态”。某个过程采用动词形式，并不会改

变主体在其中牵涉多少。它在句子里采用动词形式，本身不带任何特殊意义；关键在于，它会承载若干能指重音，把整个句子置于某个体貌或时态样式之下。

在句子内部的这一功能上，名词与动词没有其他区别。不过在动词形式中，有一些彼此有别的形式专用于主体作为“我”而在其中构成自身的动词。由于“跟随”这个动词的充分意义，拉丁语 sequor 正蕴含这一点。“我”在跟随行动中的这种在场，对我们具有说明作用；它引导我们理解，为什么第二个句子的 suivra 会或不会与主句中那个纯粹起呈现作用的“你”一致：“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

Suivra 会不会与“你”在人称上相配，取决于“我”的层面上发生什么，取决于这里所涉及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我”如何被牵涉、俘获、钉住，被纳入我上次所说的绗缝之中，取决于在主体与话语的总体关系里，能指如何钩住主体。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的整个语境都会改变：

- 随着赋予能指的样式和重音而改变；
- 随着“跟随”所蕴含的东西而改变；
- 随着这个“跟随”背后的存在方式而改变；
- 随着主体附着于某个能指层次的各种意指而改变；
- 随着“我是什么？”这种不确定性中的某种东西而改变；凭借它，主体出发时可能携带行李，也可能两手空空。无论这行李是原初的、

后天取得的、次生的、防御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无论它来自哪里，都不要紧！

毫无疑问，我们依靠若干对“我是什么？”的回答生活，而这些回答通常极其可疑。不必说，“我是一个父亲”若有完全根本的意义，“我是一个具体的父亲”的意义却完全成问题。也不必说：

- 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教授”虽然极其方便、也确实十分常见，但每个人都知道，它把“什么的教授？”这个问题完全敞开；
- 如果以千百种其他认同来称呼自己，例如“我是一个法国人”，这就预设把“属于法国”这个概念可能代表什么完全放进括号；
- 如果你们说“我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你对笛卡尔先生说过什么完全一窍不通，大概根本没翻开过他的书；
- 当你们说“我是那个有清晰观念的人”时，问题在于为什么；
- 当你们说“我是一个有性格的人”时，所有人都有权问你是哪一种性格；
- 当你们说“我总是说真话”时——好吧，你们还真不害怕！

为了理解“你就是那个会……的人”这一前半句在主体与话语的关系中将带有怎样的重音，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主体同能指的关系：能指的那一部分究竟已经被他征服并承担，还是相反遭到 verworfen、被拒斥。

为了把这个问题以全部意义留给你们，我还想再举几个例子。

这不只与“跟随”这个动词有关。如果我对某人说“你就是那个必须来的人”（Tu es celui qui dois venir，第二人称），你们应当立刻明白它预设怎样的能指背景。但如果我说“你就是那个必会抵达的人”（Tu es celui qui dois arriver），它其实相当于说：“你会到达！”我们看得出它留下什么预设。是的！但会以怎样的状态到达？必须坚持分析这些例子。

“你就是那个想要他所想要之物的人”，意思是“你是个固执的小家伙”。它也可以表示：“你是那个懂得如何去意欲的人。”而且，这里未必涉及你是否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你是那个会把自己的道路走到底的人。”“你是那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以及“你不是那个会把自己的道路走到底的人”，都是如此。这些区分的重要性在于：重音的改变——也就是说，那个把充实性给予他者、授予他者，同时主体也从中获得自身充实性的“你”——在本质上与能指相连。

如果这里涉及的能指被唤起，却又缺失，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我们既能从这一进路推演出某种东西，也能看到经验对它的证实。现在只需让我们的公式与以前给出的言说图式重叠；言说在该图式中从 S 走向 A：“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到处去的人。”S 与 A 自然始终互为对应。正因为奠立我们的讯息来自大他者：大写 A 位于“你”的层面，小 a 位于“那个……我”的层面，S 则位于“会跟随”的层面。

赋予句子分量、同时赋予“你”以重音的能指一旦缺失；这个能指虽然被听见，主体内部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回应它——在这种程度上，句

子的功能就会缩减为其余能指的作用域，缩减为自由的能指。这个能指从未被钉在任何地方，所以它的功能当然绝对自由。

- 不存在任何经由拣选而确立的“你”。
- “你”恰好只是我正在向其说话的那个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 “你”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固定。
- “你”只是后面跟随的全部东西，是那个死去的人。

这恰好就是那些聚焦句子的开头；句子恰恰停在一个能指即将涌现的点上。这个能指本身仍完全成问题；它负载着某种确定的意指，但没人知道是什么——严格说来，是一种缺失的、可笑的意指。它标示出裂口、洞，标示出主体内部恰好没有任何能指能够作答的地方。

恰恰因为能指受到召唤、被唤起、被牵涉，围绕它才会涌现那个与大他者发生关系的纯粹装置，涌现“你就是那个会……我的人”这句空洞的口吃。这正是施雷伯主席所听见的典型句子。它确实为我们产生了大他者的这种在场：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大他者安置在一个主体以某种方式与之相配的能指层面上，这个大他者就越是彻底地在场、越是彻底地成为大他者，越是成为绝对的大他者。施雷伯的文本里明确写着这一点。他说，在自己此后与大他者的关系中，只要大他者有片刻抛弃他、把他丢下，就会发生真正的 Zersetzung；他会被遗弃给自己的解体。

这种能指的解体，在现象中发生于一个召唤点的层面，并围绕它发生；这个召唤点由某个能指的缺少、消失或缺席构成，只要它在某一

时刻作为能指受到召唤。假设这里所涉及的是充分意义上的“你会跟随我”。那么，与之相近的各种意指都会被主体唤起：“我已准备好”“我会服从”“我会被支配”“我会受挫”“我会被夺走”“我会被异化”“我会受影响”。但充分意义上的“跟随”并不在那里。

在施雷伯主席的个案里，某一时刻逼近的究竟是哪种意指？问题正在这里：这个此前一直健康、完全适应语言装置——只要语言装置建立起他与同类的日常关系——的人，究竟有什么东西可能受到召唤？它以怎样的方式被召唤，才会造成如此剧烈的倾覆？

结果只剩言说本身的不断熨平，以一种半异化的形式成为他与一个大他者发生关系的本质而特选的方式。这个大他者从那时起可以说统一起来，成为唯一而绝对的他异性层次；与此同时，它打碎、驱散了施雷伯周围所有其他存在者层面的他异性范畴。这就是我们今天停下的问题。我已经向你们指明接下来考察的方向。我们将看到施雷伯的“关键词”、能指性的词：从“神经的承接”“淫悦”“至福”，一直到围绕某种从未说出的中心能指旋转的其他千百个术语。这个中心能指的在场支配着一切，正如他本人所说，具有决定作用。

他以提示的方式使用了自己妄想中全部事件的根本词。为了在结束时让你们放心，表明我们仍处在自己的领域，我要告诉你们：在施雷伯的整部著作中，他的父亲只被点名一次；那是在谈到《我父亲的室内体操手册》时——这是施雷伯父亲这个古怪人物最著名、即使未必最重要的著作。我曾想尽办法找来这本手册，里面全是小图解。他引用它，是为了说自己曾查阅父亲的著作。这是他唯一一次点名父亲，而目的竟是核对声音告诉他的事情是否真实：男人和女人做爱时应当采取的典型姿势。你们得承认，到《室内体操手册》里寻找这个，真是

个古怪的主意。人人都知道，爱情是一项理想的运动；可即使如此，也恰恰不是到那里去寻找规则。

无论这个切入方式多么幽默，它毕竟应当把你们引向我想说的东西。我们也仍处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当我们通过能指内部固有的关系、通过句子与句子的连贯来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只是用另一种语言提出它；而这种语言包含着对于我们整个领域绝对决定、绝对根本的结构化。我们要界定的是：能指层面的某种缺失会造成什么结果；主体怎样感受、知觉，并进入一种实际而根本的关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作为原因的主体，才把“你”说成“你”。

# 第23课 · 1956年6月20日

“你就是那个最懂得跟随我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suis le mieux，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像小狗一样跟着我的人”（qui me suit，第三人称）。“你就是那天跟着我的人”（qui me suivait，第三人称未完成过去时）。“你就是那个一路经历考验而跟随我的人”（qui me suivais，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遵循律法、遵循文本的人”（qui suis，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随大流的人”（qui suit，第三人称）。“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qui m’as suivi，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qui m’a suivi，第三人称）。“你就是那位是其所是者”（qui es，第二人称）。“你就是那个存在的人”（qui est，第三人称）。

我不认为这比按清单和类别列举精神病症状更徒劳。这是另一回事；至少对我们选择的视角而言，它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总之，你们的精神分析家职业完全值得你们花一点时间停下来思考“说话意味着什么”。毕竟，这项练习与邻近的数学游戏并不完全同类，尽管表面看起来可能相近；人们对数学游戏向来不够重视，而它始终有助于训练心智。

在这里，人们总感到事情越过了小小的文字游戏；你们恰好超出了眼前之物，因为这当然不是某种能够完全客体化、形式化的东西。你们处在某种不断闪避之物的层面；你们当然最不愿意在那里停留，可当你们同另一个人的话语发生关系时，事情的本质毕竟就在这里，即使只从最卑微的意义结果看也是如此。按这种方式回应，也并非总是绝对最好的办法。

现在回到上次停下的地方，即动词“跟随”的将来时：“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suivras，第二人称）与“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suivra，第三人称）。我们要尝试指出差异的方向。我们甚至已经开始标点那些真正的双重意义；它们取决于人称是否穿过“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中关系代词的屏幕——即第三人称 qui m’a suivi 与第二人称 qui m’as suivi 的区别。

指示词属于谁？所谓第三人称无非就是指示词；所有语言都用指示词构成它。也正因如此，它不是动词的人称。问题在于：“你”穿过或不穿过这面指示词屏幕，是什么意思？无论哪种情况，你们看到，所显现的东西早已处在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或第二人称 suivras 的“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这一层面。它由一个 自我 在我所说的这个“你”背后呈现得多少鲜明来界定。待会儿我会说，这个 自我 受到“召请”，但条件是我们把全部意义赋予“召请”一词。

我曾强调下面两者的对立：

- 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的“你就是那个必会跟随我的人”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这个陈述中存在一个迫害性侧面；
- 与它相对，第二人称 suivras 的“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性质完全不同，其中包含某种委任、委派或召唤。

还有另一组术语同样可以显明它们的差异：“预言”与“预见”的对立。这也值得我们停留；可以说，恰恰只有在一个使讯息获得化身的句子中，这种差别才可感。

如果把它抽象化，预言便有所不同。我们清楚看到，在处理动词的一致关系——更确切地说，处理动词的人称化——时，两者并非一回事。过去时的“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无论用第三人称 m'a suivi 还是第二人称 m'as suivi，显然也呈现类似的差异。

可以说，在第二人称出现的地方，时态——这种不能只归结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词体貌——受到牵涉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使用第二人称 m'as suivi 时，涉及的是时间中的一项行动：“你曾跟随我”，在当时属于现在进行的时间中；第一种公式表达的是一项已经被时间化、被置于完成行动之中的行为。在另一种使用第三人称的“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m'a suivi）里，它是一个完成体，是已经完成的事情；甚至规定得如此明确，以至于几乎成为对众人之中某一个的定义：“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

你们同样会感觉到，无论“我”这个宾语代词是否出现，一致关系显然都取决于动词及其意义——只要与动词相对的一切使它获得精确规定。这里无疑有一条规则，但必须给你们许多例子，才能把握它。“你就是那个最懂得跟随我的人”（me suis，第二人称）与“你就是那个像小狗一样跟着我的人”（me suit，第三人称）之间的差别，可以让你们开始做后续练习：空白处究竟该填什么？

“你就是那个——这里用未完成过去时——那天跟着我的人”（me suivait，第三人称）。“你就是那个曾在一段时期里一路经历考验而跟随我的人”（me suivais，第二人称）。我觉得，这两个公式之间包含的正是恒常与忠实之间的全部差别；即使“恒常”一词可能造成歧义，我们也可以说，持续与忠实之间的全部差别造成了这两种一致关系的区别。

同样，“我”这个宾语代词并非必须出现。“你就是那个遵循律法的人”“你就是那个遵循文本的人”，用第二人称 suis；在我看来，它们的性质和进入句子的方式不同于用第三人称 suit 的“你就是那个随大流的人”。从能指的视角——也就是从一个意义价值由开端一直组织到结尾的有机整体来看——这两个公式都是完全有效的句子。

皮若尔先生——它们在语音上没有区别，只有正字法上的区别。

拉康

这些例子被归在一起；我觉得它们并未虚构到失去效力的程度。不过，上次我已经指出，这条关系从句动词一致规则的末端是：当主句的先行词被人称化为第一或第二人称时，正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关系从句层面使用“你”或“我”。因为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的“我是那个会跟随你的人”，与使用第一人称 suivrai 的同一句话之间存在差别。这并非毫无缘故。

皮若尔先生

当人们说或听见“你就是那个曾跟随我的人”（Tu es celui qui m’as suivi）时，是另一个人在词尾加上 s，并不是说话的人加上它。

拉康

这里是另一回事。您进入了问题的核心，进入我今天想带你们前往的地方。它确实要求考察他人那里发生什么；更确切地说，考察你们的

话语预设了什么。您刚刚直接触及这个问题的中心，指出了我方才也指出的事情：在下面这个“你”背后……

- 我从自己作为大写 A 的大他者所在的位置，向这个“你”说话；
- 我向其说话的这个“你”绝不是某种只须简单视为对应项的东西；
- 这些例子中的这个“你”恰好证明，在它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就是您刚才谈到的那个 自我。例如，当另一个人跟随我的言说时，这个 自我 支撑着跟随我的那个人的话语；它在这里受到召请。正是它在场得多少、强度如何，使说话的我——而不是那个被谈论的人——采用第一种形式。

当然，最终裁定的是他；而且，正因为裁定取决于他，我们才会在这里关注这些例子之间的差别。正是“你就是那个人……”之外的这个 自我，正是召唤这个 自我 定位自身的方式，界定了具体情形：

- 在一种情况下，的确是“他”将要跟随，因此“那个……的人”便告失效：他将跟随；跟随的是“他”，而他将跟随的也是“他”；
- 在第二种情况下，处于问题中心的并不是“他”，而是“我”。某个不可能不跟随我、或当前只能被看作已经跟随了我的客体，围绕我形成引力。

总而言之，问题在于向你们显示：无论“你”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我的经验中，支撑这个“你”的都是一个表述它的 自我；但绝不能认为这个 自

我　完全支撑得住它。换言之，每当我通过这种讯息向他者发出召唤或委派，把他明确指认为……

- 必须……的那个人；
- 将要行动的那个人；
- 我把他作为 自我 召唤的那个人；而且更进一步……
- 我向他宣告他将成为什么的那个人；

……这个宣告始终预设他会支撑它；与此同时，在这种根本交流——这种宣告，甚至可以像我上次那样称作“报喜”——中，又始终有某种完全不确定、在严格意义上成问题的东西。

请注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由于它在本性上不断逃逸、从来不能完全支撑“你”，这里所涉及的“我”每次以这种方式受到召唤或挑动时——也就是说，每次我们接收到这个“你”时——最终都会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必须证明自己作为 自我 的存在是正当的。

或许可以说——待会儿我们会回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接近它——所谓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基础有一个最深刻的特征：言说相当清楚地总把这个“我”的存在勾勒为自己的最终底层；因此，在所有根本问题中，主体总是或多或少处在这种命令面前，必须为自己作为“我”作出辩护。

在每一种最根本的对话背后，都存在“你是那位是其所是者”（tu es celui qui es，第二人称）与“你是那个存在的人”（tu es celui qui est，第三人称）的对立；我们应当在此停留。因为只有那个绝对孤独的

“我”、那个说“我是自有永有者”（je suis celui qui suis）的“我”，才会在召唤中绝对彻底地支撑“你”。这正是我们所出的传统之上帝与希腊传统之上帝的全部差别。如果希腊传统之上帝能够以某种“我”的方式陈述自身，那么他无疑必须说：“我是那个存在者”（Je suis celui qui est）。

然而，那里根本没有这一回事。要说有什么东西勉强能够采取“我是那个存在者”这种不伦不类的形式，也只是希腊上帝那种被极度淡化的形式。我们绝不该嘲笑它，也不该以为它是上帝逐渐走向无神论式消散的道路：

- 伏尔泰非常关心的那位上帝——以至于他把狄德罗视作白痴——显然属于“我是那个存在者”的秩序；
- 但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却是你们的心智不愿准备去把握的东西之一，因为严格说来，它对我们已经变得不可思议。

为了正确定位主体与绝对大他者的关系，请你们暂且通过某种精神上的应用和沉思——这就是我上次谈到的 medeor 的方式，也是你们医学职能的原初动词——设身处地思考一下：一个亚里士多德弟子的世界关系会是什么？对他来说，上帝就是天上最不变的球层。这个球层究竟是什么？

它绝不会以任何言语方式宣告自身，也不属于我们刚才谈论绝对大他者时唤起的秩序；它就是那个东西：恒星天球中包含固定星辰的部分。世界中恰恰不运动的那个球层，就是上帝。

这会把主体放到世界中央的何种位置？我必须说，除非努力真正从这里出发，努力把握它所包含的那种与大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我们绝对陌生而不可思议，甚至比我们有时多少有理或无理地拿惩罚幻想开玩笑时触及的东西还要遥远——否则根本没人会在那里停留。

也没有人在下面一点停留：在塑造了我们的宗教思想底层，在那种……

我再次重复，因为刚才已经指出过，正是通过这里，它才与我们最日常的经验连接起来

……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与战栗”之中的宗教思想底层，罪疚的色彩在我们的全部神经症心理经验中如此根本——我们暂且不能据此预断神经症在另一种文化领域会变成什么。我们正是从罪疚进入神经症，并由此发现，神经症以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样式获得结构。

罪疚的色彩构成神经症的绝对底层，并不是偶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它是否就是我们与绝对他者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从根本上受某一传统牵涉。这个传统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以一棵据说正在燃烧的小树作为陪衬，宣告出这个公式：“我是自有永有者”（Je suis celui qui suis）。与它精确对应的，是一种与神圣相关的呼应和关系样式。

我们也没有离题太远，因为施雷伯主席那里涉及的正是这个：一种建构大他者——上帝——的方式。与此对应的是同上帝的一种关系方式。你们会很容易、很清楚地看到，“无神论”对我们的意义何以不同于它在亚里士多德神性参照中可能具有的意义。在后一参照中，问题是是否接受同一个更高“存在者”的某种关系；这个存在者是至高者，是所谓“恒星天球”中一切存在者的绝对者。我再说一遍，这已经足以

把从这里出发接近世界的一切，置于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能思考的光照之下。

你们清楚看见，我们的无神论处在另一视角、另一条道路、可以说另一种歧义中；它恰恰同大他者之“我”总在闪避的这一面相连。一个大他者能够把自己宣告为“我是自有永有者”，这个事实已经精确地宣告了一位上帝：他凭自身、在自身之中，并且仅凭宣告自身的这种形式，就是一位彼岸的、隐匿的上帝；一位绝不揭示自己面容的上帝。

从亚里士多德视角看，我们的出发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神论的。这是一项错误；但就像在他们的视角里这完全真实一样，在我们的经验中它也同样真实。因为任何以“我是自有永有者”宣告自身的东西所具有的问题性，恰恰就是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之核心：这种宣告在本质上无人支撑，甚至几乎可以说不可支撑，只有傻瓜才支撑得住它。

请思考“我是自有永有者”中的“我是”。它构成了我们传统中这种大他者关系的问题性作用域。与这一传统相连的，是完全不同的科学发展，是同“存在者”、同客体建立关系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正是这一点比所谓实验性质更深刻地标识出我们的科学。古人做的实验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令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实验。

问题显然不在那里。我们看待世界、切分世界、把它弄成细小碎片的方式，与古人的方式完全不同；差别在于，我们把众多他者、小他者放到最终大他者、绝对大他者的某种光照中。古人则参照某种“存在者”的最终极点接近世界；相对于什么？相对于某种正常地分层、在“存在者”的某种一致性阶梯上得到定位的东西。

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同，因为它一开始就彻底质疑那个把自己宣告为“是”而不是“存在者”的东西的存在本身。思考一下“我是自有永有者”：我们无法按第一种公式回答，因为第二种“我是那个存在者”只是自然神论的公式，并非对“我是自有永有者”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更不可能，因为面对“那位存在者”、面对“自有永有者”，我们算是谁，竟能回答？

然而，我们实在太清楚这一点了。当然，有几个椋鸟般的轻浮之徒——这种人至今还能遇到；说实话，大群大群的椋鸟从大西洋彼岸飞到我们这里——我最近又遇见一个。他在一些门徒之后向我断言：“可说到底，我就是我！”

这在他看来是最终确定性。我向你们保证，我并没有挑动他，当时也根本不是在作精神分析宣传或反心理学宣传；这句话就是自己冒出来了。

如果经验中有什么真正最起码的东西——它甚至无需是精神分析家的经验，而可以属于任何人，只须有哪怕最少的内在经验——那就是：正如我上次所说，我们越不是“我们所是者”，就越在内部清楚知道，面对任何事情、在每个转角、每种印象之际，种种抗辩会使我们在自身中体验到怎样的喧嚣、怎样可怕的混沌。

因此，我们亲手触及了这样一点：在宣告自身、或者由我们以一个“你”来宣告的这种言说的本质形式的连贯性中，我们身处一个复杂世界，身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这个关系被语言的属性所结构，被一项必须在其中把“能指”这个术语生产出来的根本区分所结构。

我已经把你们牵在手里足够久，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并定位能指本身的作用。我要把你们带回能指的一些极其简单的属性，说明我说下面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在向你们显示主体与主体关系的这种彻底根本性之后，我还必须把一系列术语一直带到某种最终关系，带到可以说在大他者边缘进行的某种询问；同时要知道，这个大他者严格说来不可把握，它从不、也绝不能完全支撑我们向它提出的赌注。

反过来，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坚持的这一进路、这一视角的另一面，甚至包含着所涉元素的某种唯物论。因为当我向你们谈能指的功能和作用时，我说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能指；我甚至不会说它们被化身了，而是说它们被物质化了。它们是四处行走的词；但正是作为这样的词，它们发挥着订住的作用。我在倒数第二次讲话中已经引入了这一点。

现在，为了让你们歇一歇，我会尝试通过一种隐喻、一种比较把你们带过去。当然，“比较不是论证”；不过，正因为我已经用多少更为严谨的例子加以说明，我现在要说的才可能给你们带来别的东西。

请回想，我是借助拉辛和《阿达莉》第一场戏来接近能指功能的。我向你们显示，整个场景的推进如何就在于以“对上帝的敬畏”取代对话者阿布纳。这个能指与阿布纳的各种害怕、与阿布纳的声音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比第一句第二人称 m’as suivi 与第二句第三人称 m’a suivi 之间更多。

插一句。我在5月16日第7期的一篇拉辛评论中读到，有人这样界定这出悲剧的独创性：拉辛有一种艺术和本领，能够在悲剧框架中——也就是几乎瞒着观众——引入某些属于高级婊子气的人物。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之间的距离，你们可以看到，从某种视角来看这东西会变成什么。《安德洛玛刻》《伊菲革涅亚》等剧呈现的根本音调，竟是“高级婊子气”的范例！不过，这仍不会使我们对《阿达莉》的参照失去用处。

那篇文章还顺便指出，弗洛伊德主义者在拉辛悲剧中作出了一项非凡发现。迄今为止我倒没有察觉这一点，这正是我的遗憾：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如此强调并津津乐道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寻找若干根本分析关系的说明和例证；相反，现在似乎到了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发掘一些参照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在那里找到别的东西，找到一些并不更缺乏说明力的东西——就像我上次试图做的那样——用来说明能指使用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现在进入我要给你们的例子，以说明当我们谈到在大他者关系的场域中建立能指——就其重量、其固有惯性及其严格的能指功能而言——时，可以理解什么、可能意指什么。

寻找一个能很好地使之物质化、强调这种物质化意义的例子。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必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完全配得上能指之名的说明。我会说，那就是道路，是你们驾着各种交通工具行驶的大路；是被称作“道路”的道路，例如从芒特通往鲁昂的大路。我不谈巴黎，因为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

从芒特到鲁昂存在一条大路，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供研究者沉思，立刻为我们关于能指所能说的东西提供完全明显的物质化。假设——就像英格兰南部那样，那里大路十分稀少——你们想从芒特前往鲁昂，却

必须通过一系列小路：先由芒特到韦尔农，再由韦尔农到随便哪一个地方。

只要有过这种经验就会发现，一连串小路与一条大路根本不是同一回事，而是绝对不同的东西。在实践中，仅此就足以让你减速，并彻底改变你面对起点与终点之间发生之事时所采取行为的意义。更不必说，假如整片风景、整个国家、整块地区只覆盖着一张小径网络，任何地方都没有那种自身存在的东西——无论你从羊肠小道、灌木丛、路肩还是乡间小路里走出来，只消一眼便会认出：这里是大路。

大路不是某种从一点延伸到另一点的东西；它作为大路在那里存在，是空间中展开的一个维度，是某种原初之物的呈现。我为什么选大路？因为正如德·拉帕利斯先生会说的[注]，它是一条交通线路。你们也许觉得这是个再平庸不过的隐喻：仿佛大路上除了经过的东西什么也不会发生，大路只是从一点前往另一点的手段。这完全错误。

> [注] 法语 vérité de La Palice 或 lapalissade 指不言自明、近乎同义反复的真理。这里说“大路是一条交通线路”，是故意借这个典故制造一句自明之语，随后才反转它“过于平庸”的表象。

大路与据说由赤道森林里的象群走动而踩出的路径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两者并不相同。那些小径无论据说多么重要，都恰好只是经过本身踩出来的东西，无非就是象群的经过。它并非什么也不是：它由象群迁徙这一物理现实支撑，而且的确具有完全明确的方向。

我不知道这些道路是否像有时所说的那样通向象冢；不过，象冢似乎仍然相当神秘，那些地方看起来更像骨骸堆积处，而非墓地。但把墓地放在一边。象群当然不会在道路上停滞。

大路与象径的差别在于，我们会在大路上停下来，而且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这里巴黎经验重新来到前景。我们甚至会聚集在那里，把这个通行场所弄得如此黏滞，以至于几乎变成死路。当然，不要只停在这个现象上；很清楚，那里还会发生许多其他事情。例如，我们会故意、有意地到大路上散步，在一段时间后沿同一条路反向走回来；也就是说，走向某种真正把我们带到无处的东西。

这种往返运动同样极为根本。它把我们带向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大路是一个地点；各种住宅、居留场所围绕它聚集。作为能指，大路使那些围绕大路本身聚集而来的意指发生极化。

人们把房子建在大路上，房子位于大路旁；它们层层排列、四处散布，仿佛除了观看大路以外别无功能。总而言之，在人类经验中，恰恰因为大路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能指，它才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尤其当它刻下罗马印记时，更是如此。罗马印记与能指有最深刻的关系；从人们把道路本身当作道路的时刻起创造的一切，都由它区分出来。罗马大道在人类经验中造就了一种一致性，绝对不同于东方帝国曾经用来维系一段时期的那些道路、轨迹——哪怕它们有驿站，能够快速传递消息。

凡被罗马大道标记的地方，都取得了一种风格；它远远超出大路直接可见的效果。罗马大道所到之处，几乎不可磨灭地刻下罗马印记，以及围绕它发展出来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传递书写之物的方式、提升人的形象与雕像的方式。

从艺术永恒博物馆的观点看，马尔罗先生有理由说，罗马雕塑没有留下什么真正值得保留的关联。然而，把人本身作为人呈现在雕塑中的观念，仍与雕像在罗马各地的广泛散布绝对相连。

能指关系的整套发展方式从根本上与此相连，使大路成为一个绝不可忽略的例子；它尤其切实而清晰地说明了我谈到能指功能时的意思：能指使意指极化，把意指钩住、束拢起来。总而言之，在能指功能与它对意指聚集所施加的诱导之间，存在一种真正的反律。发生极化的是能指；创造意指场域的也是能指。

请比较一部大型地图集中三种地图：

- 自然地理图：你们会看到各种被铭写在自然中的东西；它们已经具备扮演这一角色的条件，但多少仍处于自然状态。

- 再看一张政治地图：你们会看到某种以冲积物和沉积层的痕迹形式标记出来的东西——那是人类意指的全部历史。它们在某一点维持着某种平衡，形成一些多少神秘的图形；这些图形被称作特定土地之间的政治或其他边界。

- 再拿一张主要交通线路图：看看道路如何从南向北绘出，穿过一段段国土，把一个盆地连到另一个盆地、一片平原连到另一片平原，跨越山脉，借桥梁组织自身。你们清楚看到，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这恰好最能表达我们所谓能指的作用。从历史上说，事情的确如此；不是像那位惊讶于河流恰好流过城市的人所想的那样。假如看不见城市恰好在道路的结点上形成、结晶并建立起来，也就是形成于某条经线与某条纬线因道路的特定功能而交叉之处，那会是完全类似的愚蠢。正是在道路交叉点——尽管在历史中会有小幅摆动

——某种东西产生出来，成为意指中心、成为城市、成为人类聚居地；而能指的主导性把这一切强加给它。

如果没有这条大路，如果从一点到另一点时，我们不得不把一条条小路相加——换言之，把多少相互分割的意指聚集方式相加——会发生什么？这将把我们带到我真正想谈的“父亲”一词。

从任意两点之间必须经过网络中所有可能元素的时刻起，就没有大路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要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我们可以在网络的不同元素间作选择：

- 我们可以这样走；
- 也可以那样走，出于便利、漫游或只是在十字路口走错等各种理由。

首先，可以从这里推导出几件事。假如这里涉及的能指——我们由此来到施雷伯主席——同已经开始处理、下次将进一步展开的“生育”意指有关，那么你们将看到，这个根本能指会把我们带得非常非常远。

但现在必须承认，开端危机所悬置的正是这一能指：“生育”，而且是其最具问题性的形式。弗洛伊德本人谈到强迫症患者时告诉我们，父职与死亡所涉及的是两个能指。

这里的话取自一篇——只要懂得寻找——会最高度地牵涉强迫症患者的文本。“生育”中更成问题的形式，并不是“成为母亲”，而是“成为父亲”。理由很简单，值得你们在这里停留片刻加以思考：“成为父亲”这个功能，如果不引入能指范畴作为任何人类关系建构和加工的本质基

础，在人类经验中就绝对不可思考。毕竟，“成为父亲”——请你们想一想它可能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以进入博学的民族学或其他争论，追问那些说女人被放到某个地方就会怀孕、或说精灵使她们怀孕的原住民，是否拥有关于科学现实的观念，也就是是否知道女人在适当地性交以后才会受孕。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不过，有些人已经看出，这类询问完全愚蠢；很难设想人类动物会愚钝到没有发现，想要孩子就必须性交。问题绝不在那里。问题在于：与一个女人性交；女人随后在腹中携带某种东西一段时间，最后把它排出——把这些东西彼此并置、相加，永远也构不成一种使男人、男性主体由此获得“成为父亲”这个概念的东西。

我甚至还没有谈“成为父亲”一词所代表的整套文化意义束；我只谈成为父亲在生育意义上是什么。换句话说，“成为父亲”这个经由文化加工、具有能指性质的概念，必须产生一种反作用效果；借助它，性交这一事实对男人才会获得它实际、现实拥有的意义，而对于这个意义，不会有任何想象性的直接通路：

- 是他进行了生育；
- 这个孩子既是他的孩子，也是母亲的孩子。

……要产生这种反作用效果，必须：

- “成为父亲”这个概念及其加工，已由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某种工作，以某种方式提升到首要能指的状态；
- 这项工作由整套文化交换的游戏来界定；例如，它以言语或名称的方式，把某种意义同样赋予“成为父亲”一词——也可能经由任何其他道路，这无关紧要；
- 这个能指必须自身具有一致性和地位；由此出发，性交才真正、现实地取得“生育”的意义。主体当然完全可以知道，自己确实处在产生孩子所必需的因果链中；但只有这个能指才把它变成某种建立“生育”功能的东西，只要生育是一个能指。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我承认，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帷幕完全揭开，因为我要把它留到下次。你们每次都能感到，“生育”这个概念与对死亡经验之关系的知觉或把握之间的关联；正是死亡赋予“生育”一词以全部意义——对两性都如此。

无论如何，“成为父亲”这一能指可能建立、也可能没有建立一条大路；它位于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与对主体、对存在者而言进入生育关系这一事实之间——只要生育被视作根本能指。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假设大路不存在，我们面对的就会是若干条基本小路，例如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先性交，然后女人在腹中携带某物。这从此会成为困难和问题的来源。

你们已经充分看到：施雷伯主席看起来缺少“成为父亲”这个根本能指，因此他不得不犯下这种“错误”，把道路的第二部分更加紧密地纠缠起来……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从我今天给出的例子出发，我们可以设想这一机制

……即由他自己像女人一样携带某种东西。

施雷伯主席出于某种原因想象、而且不得不把自己想象成女人，在腹中怀着某物，以怀孕来实现道路的第二部分；两部分由此相加，才实现“成为父亲”的功能。这毕竟相当奇特。如果你们愿意把类比再推进一点，我会稍作停留，告诉你们这一切并不令人惊讶。

它如此不令人惊讶，以至于得到各种经验的证实。无论“拟娩”（couvade）经验在我们看来多么成问题，在这一普遍情形中都可以得到非常简单的定位：当主体对“成为父亲”功能的吸收不确定、不完整时，它满足主体的一种需要——以想象、仪式或其他方式实现道路的第二部分，从而不让“成为父亲”停在他需要实现的生育关系的半途。

为了把隐喻及其效用再推进一点，我要说：如果没有大路，所谓“道路使用者”要从一点到另一点、不得不经过小路时，你们会怎样处理？人们在路边竖起标牌；也就是说，在能指不能独自发挥作用的地方，路边的东西就开始独自说话。

没有大路的地方，会有一些词出现在标牌上。也许，我们那些产生幻觉的人所听见的细小听觉性、言语性幻觉，功能就在这里：它们是小路边的标牌。由于没有普遍能指，这些标牌就非在那里不可。

如果我们假定，无论自己是否留意，能指总是独自继续行进，那么在我们内心深处，就有一种由各种［能指？］构成的嗡鸣、真正的混沌喧嚣；从童年开始，它们就使我们震耳欲聋。使我们感兴趣的种种意指得以维持，才多少遮蔽了这种喧嚣。

那么，为什么不能设想：在某个确切时刻，索绪尔所谓“无定形能指物质”的这些钩连、无定形能指物质与无定形的意指及兴趣物质之间的绗缝，开始崩开或显出缺陷？

为什么不能看出：此时，能指及其连续流重新取得独立性？于是，在幻觉者如此经常向我们描述的那种嗡鸣中，在那些句子和评注持续不断的低语中——它们无非是无数条小路——一切都开始自己说话、自己歌唱。它们尚能隐约指明方向，已经算幸运了。

下次我们将尝试说明：在施雷伯主席的个案中，一切怎样分别在不同层面上被编排、组织进不同的言说层次；这一切在其层级与纹理中如何未经分配便显露出一种根本极化——它围绕某个突然遭遇、突然察觉的能指之缺失而发生。

# 第24课 · 1956年6月27日

我本想用训斥你们来开始每周的这段小讲话，不过一年已经到了这么晚的时候，看见你们如此乖巧地整齐坐在这里，浮现在我脑中的反倒是这句诗：“忠实的是你们……”我要重新谈谈上次学会会议所涉及的计划。很清楚，我带你们走的这些道路可能通向某个地方；但它们没有被踩得如此平坦，以至于当有人在其中行走时，你们会难于表示自己认得他走到了哪里。

可是，这毕竟不是你们闭口不言的理由，哪怕只须表示你们对问题有一个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本可以显出几分为难；如果不表示事情对你们尚未完全清楚，你们得不到任何好处。你们会说，所得的好处是：你们作为一整个团体被看成“闭塞”，而这种形式归根结底更容易承受。不过，谈到“闭塞”，我们不能不对下面一点感到惊讶：某些哲学家——恰恰是我不时含蓄提及的当代哲学家——得到这样一条摘要：在人这一切“存在者”当中，人是一个敞开的存在者。

我们不能不在这个界定我们时代的恐慌式断言——“存在的敞开”——中，在每一个开始思考的人都被它迷住的现象中，偶尔看出一种平衡和补偿。它恰好补偿“闭塞”这个如此熟悉的词所表达的事实：正如人们故作箴言式地指出，当科学谈到人时，其偏见与那些额外奉送给人的属性之间发生了断裂——人会说话、会思考、会感觉，总之，是一种理性动物；而科学越来越不能把这些属性纳入自身。

另一方面，这些人努力重新发现：处于思想底层的东西当然并非思想家的特权；人类在自身存在中哪怕最微小的行动里——无论当他恰好

想表述某物时，对自身存在发生怎样的迷失——仍是所有存在者中一个敞开的存在。无论如何，请确信，我们探究分析材料时所涉及的现实，并不处在这一层面……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囿于表面看法，试图传播相反的想法

……真正思考的人——至少他们自称如此——理应停留的层面，当然不是我们分析现实得到定位和构想的层面。

当然，若不把它重新置于我们所谓“存在的裂口”这一环境中，就不可能对它说出任何有意义的话；但这些裂口已经采取了某些形式。分析经验珍贵之处恰好就在这里：它绝不封闭于人的位置那种彻底质询、又可被质询的一面，但会为它带来若干规定因素。当然，如果把这些规定因素当作被规定之物，便会把精神分析投入科学偏见的道路，使人的现实的全部本质从中逸失。不过，只须把事情维持在这个层面，又不把它抬得太高，我相信，我们就能赋予经验以我所谓“平庸理性”的恰当重音。

明年——佩里耶的报告把我推向这个题目；此前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会处理客体关系或所谓客体关系的问题。也许我甚至会从比较恐惧症的客体与恋物开始。只消一眼，你们就会看到这两系列客体在清单上何其不同；比较它们或许正是引入客体关系问题的好办法。

今天我们回到上次停下的地方。说到我引入这些能指课程的方式，有人曾对我说：

> “您确实从很远的地方把它带过来；这很累人，也不太清楚您究竟想走到哪里。
>
> 可是回过头来，我们仍会发现您出发的那个点……总之，您从哪里出发、又到达哪里，两者显然有所关联。”

这种表达方式毕竟证明，再把道路走一遍不会损失什么。

这里的问题范围有限。我并不声称要覆盖仅仅施雷伯主席个案观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整个领域，更不必说覆盖全部偏执狂。我只想照亮一小块场域，采取这样一种进路：抓住某些现象，不把它们还原成与它们完全陌生的机制，也就是不强行把它们塞进通用范畴、塞进哲学课程所谓的心理学章节；而是尝试把它们联系到关于语言现实的稍稍更精细的概念上。

我主张，这也许能使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起源问题——是在决定论这一非常确切的意义上，在进入精神病的契机这一非常确切的意义上提出，即最终落实为严格的病因规定。让我们提出问题：要具备什么，它才会说话？

这是精神病最本质的现象之一。以这种方式表达，也许已经足以排除那些会把我们引向错误方向的伪问题，例如发现［精神病中］“它”、本我是有意识的，由此产生的问题。

我们越来越不需要诉诸意识这个参照和范畴。弗洛伊德本人始终说：

- 从字面上说，人们已经不知道该把意识放在哪里；
- 从经济论上说，似乎再没有什么比意识的影响更不确定；

从经济论视角看，它是否出现完全是偶然的

……所以，当我们说归根结底唯一需要思考的是“它说话”时，正处于弗洛伊德的传统中。

为了理解“它说话”，我们试图把询问集中于：它为什么说话？对主体本人而言，为什么是“它说话”？也就是说，为什么它以言说的形式呈现，而这个言说是“它”，却不是主体本人？

我们曾尝试把这个言说集中在“你”的层面。有人提醒我说，这个“你”的点离我后来用大路例子象征能指时到达的点很远。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你”，因为上次的全部进展以及有人对我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都围绕它集中。

我们不断使用这个“你”。让我们在这里停留。正如我所主张的，要从根源上把握我正带你们接近、请你们思考的东西，就必须围绕“你”的功能加以深化。

上次谈到“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第二人称）时，有人向我提出一个语法反对意见：把它同第二句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的“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放在一起，多少有些武断；两句的要素并不同源，因为其中那个“……的人”可以省略，而且“你会跟随我”是一个命令。

这与“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若按充分意义来理解，后者并非命令，而是委任。我的意思是，它蕴含大他者的在场，蕴含某种已经展开、预设在场的东西——由话语建立的整个宇宙。“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正处在这个宇宙内部。我们会再谈它。

首先，让我们在这个“你”上停留，并认真注意一件看似理所当然、却并不常被使用的事：所谓“你”没有任何固有意义。这不只是因为我可以不加区分地用它称呼任何人；我既能用它称呼自己，也能称呼你们，还能称呼几乎各种东西。我甚至可以用“你”称呼与自己极端陌生的东西，也可以称呼动物、无生命的客体。不过，问题也不在这里。

如果你们从形式、语法方面仔细观察，“你”非常接近某种东西：对你们而言，能指的任何用法都会被还原成这种东西；你们不由自主地把意指塞进去——因为你们相信语法！你们整个学校教育带来的智识收获，大体可以概括为让你们相信语法。人们没有明说目标就在这里——否则反倒达不到目标——但你们大致只收获了这个。不过，如果你们在下面这类句子前停下来：

“你要敢把一只眼睛探出去，人家就会把你打下来。”

或者：

“你看见桥，然后向右转。”

你们就会发现：

- 仔细看来，这个“你”根本不具有关于他者或伙伴之任何现实的主体价值；
- 这里的“你”完全等同于一个地点或一个点；
- “你”完全具有一个连词的价值；
- 这个“你”引入条件或时间性。

我知道，这在你们看来也许极为冒险；但我向你们保证，如果稍微接触过汉语，你们就会对此深信不疑：有一个著名的词，由“女”的字形……

……与“口”的字形构成“如”［rú］[注1]。不过，我们可以拿这些汉字玩出许多花样：“你”就是那个接受命令的受话者，也就是说，“正如应当对女人说话的方式！”还可以说出千百种别的东西，所以不要停留。

> [注1] 参见 Guy Sizaret 在 Lacanchine 网站上对本段的评注；原速记稿注释附有链接。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些句子。我不会花时间引用，因为也许会被认为滥用，不过正好可以借此向你们表明：“你”采用这种形式时，恰好就是同一个“如”，它可以用来构成“仿佛 / 如同”（comme si）；而“你”的另一种形式，恰如我刚才所说，也会非常确切、毫无歧义地构成“当……时”，或一个引入条件句的“如果”。

这项参照也许能够说明：在我们的语言中，这件事不那么明显，我们对理解和承认刚才的例子有所抵抗；但这仅仅是因为语法偏见强迫你们……

因为你们忽然俯身研究一个句子，而不是听它

……强迫你们借助词源和语法分析的人为手段，把单数第二人称赋予这个“你”。它当然是单数第二人称，但问题在于它用来做什么。

换句话说，必须发现“你”具有若干其他元素；在某些语言中，人们把这些元素称作……

那些语言具有稍微打开我们心智的好处……我说的恰恰是不发生屈折变化的语言[注2]

> [注2] 在没有名词屈折、所谓“分析型”的语言（如法语）中，语序用来区分主语与宾语：主语—动词—宾语。在有名词屈折、所谓“综合型”的语言（如拉丁语、俄语）中，语序较为灵活。

……所谓“虚词”。它们是一些奇特而多重的能指，有时其广度和多样性会让我们这些试图为此类语言建立理性语法的人产生某种迷失；但它们毕竟是一项普遍的语言学贡献。

只须以稍微近似语音的方式书写，就会发现：哪怕声调或重音的差异，也会突出“你”这个能指的某种用法；从意指视角看，这类作用远远超出、也完全不同于把它等同于“人称”时企图赋予它的所指自主性。换言之，在希腊语中，“你”具有引入语言学所谓前件（protase）、即“先被提出之物”的价值。这是表述前置部分的最一般方式；严格说来，前置部分的陈述赋予整个句子以重要性。

这里还可以说许多别的东西。如果进入细节，尝试明确“你”的能指，我们就必须大量使用“你只须……”（tu n’as qu’à…）这类公式；我们常常用它来摆脱对话者。它与后面的 que 如此缺乏关系，以至于口误会非常自然地迅速滑向“……去做这件事”。人们把它变成某种可以变格、可以屈折的东西。“你只须……”并不具有反思价值，否则本可容许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语义评论。

重要的是你们要把握：

- 这个“你”远没有单义价值，根本不是某种可供我们把大他者实体化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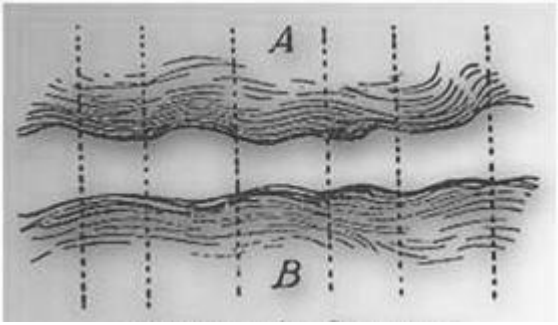
- 严格说来，在能指中，这个“你”就是某种我愿称作下钩的方式；

它钩住大他者，而且非常确切地在话语中下钩，把意指挂到大他者身上。

所以，它在本质上并不等同于所谓“受话者”，即话语向其发出的人。这再明显不过：受话者经常缺席；而在受话者显然牵涉得最深的命令式中——语言的某个所谓“简单发话”层次正是围绕这里界定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命令式中，“你”并没有显现；只有某种从信号开始的界线，我是说，从被表述出来的信号开始。例如“着火了！”无疑是一个句子；只须把它说出来，就会发现它并非不会引起反应。

接着出现无需任何成分的命令式；再往前一步，还有我刚才谈到的将来时命令中所蕴含的“你”。这个“你”是话语中对大他者的一种钩连，是一种把大他者钩住、把它置于索绪尔向我们呈现的意指曲线上的方式；这条意指曲线与能指曲线平行。“你”就是在意指波流中向大他者下的这只钩。




这个术语用来在波流的某一点指认大他者。归根结底，若把我们的理解、乃至我们的隐喻一直推进到最彻底的终点，这个“你”就是一种标点。只须思考在不分节语言的形式中尤其明显的事情：标点发挥着最具决定性的钩连作用；一篇古典文本会随着你把标点放在这一点或另一点而彻底改变。我甚至要说，这种可变性还会被用来增加文本解释的丰富性与意义的多样性。

传统文本中严格所谓“评注”的全部介入，恰恰就在于把握并确定：特定情况下，标点应当放在哪里。“你”是一个能指、一个标点，是某种把大他者固定在意指某一点上的东西。问题是：要具备什么，才能把这个“你”提升到主体性？

这个“你”以某种方式未被固定在话语的基底、纯粹承载和根本观念之中。它本身与其说指示大他者，不如说使我们能够在大他者身上操作；但它也始终悬置着在我们内部，完全可以比作我前几天谈到的耳石。当时我刚开始引入那些多少有点人为的公式；借助电磁铁，我们可以用耳石把小甲壳动物引到任何想让它去的地方。

只要我们让这个“你”自由悬置在自己的话语中，它就始终可能对我们实施这种钩连和引导；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反抗并作出回应。

要具备什么，才能把这个“你”提升到主体性？当我说“把这个‘你’提升到主体性”时，我的意思是：话语中以能指形式在场的这个“你”，怎样才能对我们而言变成某种被设想为支撑一种可与我们的 自我 相比、而又不能相比之物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神话？

这当然正是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归根结底，有些人像精神病者那样，把内在话语发声得只比我们自己稍多一点；听见这种人说话并没有那么奇怪。人们很久以前就注意到思潮奔逸现象；无论它们由某种东西引起，还是某种东西造成了与精神病者向我们作证的内容完全相似的现象——只要我们不认为他受到了某个发出干扰信号之物的影响——我们都会愚蠢地说，这个“你”预设了一个归根结底位于它之外的大他者。

我们的下一步确实应当围绕对“是”这个动词的分析展开。我们同样无法穷尽围绕它提出的一切。我作这些暗示时，参照的是一些我现在会更明确点名的哲学家，也就是那些把沉思集中在 Dasein 问题上的人。“是”这个动词的整个问题已经被重新处理；我们必须提到，它尤其在德语中得到了推进，因为 Dasein 正是在德语中取得其标识。

海德格尔先生在关于 Sein 的形而上学论著中提出一些思考，并先从语法和词源角度考察它。我马上告诉你们，我不太赞同。你们当中熟悉这些文本、或通过评论接触过它们的人，也许读过让·瓦尔最近所写的一篇文章；我必须说，那篇文章的评述相当忠实。Sein……

仅凭它在能指层面的贡献、凭词语分析和人们通常所谓动词变位分析，就会显出若干重音；更准确地说，应称作“变格”，因为海德格尔非常重视 Sein 这个动词在这个词的本义和物理意义上的“倾斜”

……使海德格尔先生提出那些不同的词根形式。你们知道，无论德语还是法语，著名的“是”这个动词都由它们组成；它远非一个简单动词，甚至不是单独一个动词。法语 suis（我是）显然与 es（你是）、est（他是）、fut（曾是）并不来自同一词根；而被纳入“是”这一动词功能的 été（曾经 / 存在过）也不与这些形式严格等同，尽管它在不同语言间都有对应。

这个 été——fut 在拉丁语里有对应形式，suis 与 est 系列也一样——则来自 stare，它的来源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起源。

在德语中，变体乃至分配方式也不同；你们清楚看见，sind 与 bist 归到一组，而在法语中第二人称却与第三人称归在一起。关键在于，人们为欧洲语言大致提出三个词根，分别大体对应 sommes、est 和 fut；后者又被联系到希腊语词根 φύσις［phusis］，与生命和生长的观念有关。

至于另外两个，海德格尔先生坚持 sten 的两层意义：一层接近 stare，即站立、独自站住；另一层 verbahen，即持续。后一意义仍被联系到 φύσις 这一面或这一来源。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词源分析再加上多少完整的语法分析，会向我们交出“挺立”“生命”与“持续”三个观念；“存在”观念则从一种施加于这些意义整体之上的还原和不确定性中涌现。

我只是概括一下，让你们了解其大意。总体而言，这类分析反而会略过、遮蔽……

这对于海德格尔试图引导我们进入的进展来说，颇为奇特

……“是”这个动词功能中绝对不可还原之物，也就是它最终被用来做什么。若以为这一功能是这些不同术语逐渐转向的结果，那就错了。

它纯粹就是系词功能。我们正在下面这个层次提出问题：在什么时刻、通过何种机制，这个“你”……

正如我们已经界定的，它是一种标点，是一种不确定的能指钩连方式

……如何到达主体性。

我认为，它在极其根本的意义上是在被纳入某种东西时到达主体性的……

我们正因如此才选择开头那些范例句：“你就是那个……的人”

……也就是被纳入纯粹状态的系词功能，纳入其纯粹状态中严格说来的指示功能。

我们必须找到那个提升“你”的元素，使它超出这种不确定的撞击功能一个层次，开始把它变成某种东西——即使尚非主体性，也至少是走向“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的第一步。这个元素就是“正是你会跟随我”（c’est toi qui me suivra）。

请注意，这并不是同一回事。“正是你会跟随我”是一项指示；它实际上预设在场的整个集会：其中所有人无论是否结合成共同体，都被设想为构成集会的身体、支撑“正是你会跟随我”这一指示所铭入的话语。仔细观察，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正是你”所对应的恰恰是第二个公式，即“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suivras，第二人称）。我说，使用第三人称 suivra 的“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则预设了那群支撑话语之人的想象性集会，预设见证者乃至法庭的在场；在他们面前，主体接到警告或通知，最终被命令以“我跟随你”作答，也就是服从命令。

在这一层面，主体没有别的回答，只能把讯息保持为它发送给自己时的原状，最多改变人称。也就是把“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suivra）铭入自身；它从此变成主体内在话语中的一个元素，无论他愿不愿意，都必须通过不跟随它来作答。

这个指示在某个场地上命令他作答，而主体恰恰必须完全不在这个场地上跟随它，也就是拒绝听见。只要他听见，就会被带到那里。严格说来，拒绝听见是一种没有任何主体真正拥有的力量——除非经过特殊的体操训练。话语自身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栖居并显现。

换言之，在我们到达的这一层面上，这个“大他者”或这个“你”，就是我通过自己的话语让人看见的大他者；我指示它，甚至告发它。大他者通过指示被纳入话语宇宙所预设的总体。然而与此同时，我并未把它带出这个宇宙，而是在其中把它客体化；我有时还会在话语中为它指出它的客体关系。只要它恰好只求这个……

众所周知，这恰恰是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人们就用这个向他作出指示

……事情就可能走得很远。

请注意，把人们所要求的东西给他们并非完全无用；问题只在于它是否有益。事实上，如果这种做法偶尔产生某种效果，恰恰是因为它补充了主体的词汇。

它当然并不是那些用这种形式操作客体关系的人所相信的东西，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确实指示出了这些客体关系。实际上，这种做法极少、并且纯属偶然才会产生有益效果；因为补充词汇有时确实能让主体摆脱那种构成其神经症症状学的能指牵连。

这也说明为什么事情在下述时候总会进行得更顺利：我们为妄想者添加的这种词汇仍保有某种新鲜感。然而，自从我们的小本子里有了供神经症患者使用的 Nervenanhang（神经附着物），对机灵人而言，这东西的价值已经大为下降，再也不能充分发挥我们原可期望的主体再主体化功能。

我所谓主体再主体化，就是从这种能指牵连中摆脱出来；我们已经把神经症现象的本质及其形式圈定在那里。换言之，人们想正确操弄客体关系；可要正确操弄它，就必须使人理解：在这种关系中，他自己归根结底才是客体；甚至正因为他把自己当作客体寻找，才把自己作为主体丢失。

不过，让我们说，在目前到达的点上，我们自身与那个已经使之涌现的“你”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尺度。那里只有一种必然由收缩接续的伸展关系，只有一种多少必然由分离关系接续的命令关系。归根结底，要在这一层面与这个大他者建立真实关系，只能沿下面的方向去寻找。

对于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的那个人，必须拉近目标。那个人变成“你就是那个跟随我的人”，再回答“你就是我所跟随 / 我所是的那个人”（Tu es celui que je suis；suis 同时是“跟随”和“是”的第一人称）。这为文字游戏和歧义敞开了空间：这里涉及的是对他者的认同关系。如果我们彼此通过相互认同而引导自己走向欲望，就必然会在那里相遇，而且以无可比拟的方式相遇：归根结底，不是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不是你就是我占有它；因为我正是作为“我是你”而存在，歧义在这里达到了完全程度。

Je suis 不只表示“我跟随”，也表示“我是”[注]；还有“我是，而你，你是”；也包括“你，那个将在相遇点杀死我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tueras）。换言之，在把他者当作客体纳入指示关系的这一层面上，唯一能使我们遇见与自身等同主体性的，是想象层面；在那里，不是自我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另一个，永远不能共存；我们的自我就是他者。也恰恰在这个层面上，客体关系可能发生全部混淆，我们爱的客体无非是自己。它就是“你就是那个杀死我的人”（Tu es celui qui me tues）。

> [注] 此处连续利用法语的书写与语法：suis 同时是 être（是）与 suivre（跟随）的第一人称形式；tues（“你杀死”）在字母上又可以拆看成 tu + es（“你 + 是”）。后一层不是严格的同音双关，而是字形和第二人称词尾的游戏，中文不能同时保留，所以正文保留法语。米勒定本第340—341页和格里格英译都按这条链处理。

这里可以注意到，法语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幸运的便利；它无非就是那个能指本身，而“你是”（tu es）形式的不同理解方式都处在其中……

就在“你”（tu）本身的意义中，我们有幸在法语里拥有这个根本性的 tu 能指；它在单数第二人称中，甚至以字母形式重现 tu 的铭写，并穿过“那个……的人”（celui qui）来到另一边。[注]

> [注] 本段只见于斯塔费拉逐字稿，米勒定本第341页未收，而把相关论述直接整理为 tu es / me tues / tutoïité 的连续。这里“以字母形式重现”可由下一段的 tues = tu + es 理解；由于底本文句残缺，本译保留其可以确定的书写层意思，不补足更强的语法结论。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使用它。我甚至要说，我们终日都在这样做。假如不说“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而说“你就是那个杀死我的人……”等等，事情就是如此。它构成与他者发生关系的基础。这意味着，在每一种想象性认同中，“你是”（tu es）都会通向他者的毁灭；反过来，因为这种毁灭只是以转移的形式在那里，又会闪避进我们姑且称作“你性”（tutoïité）的东西中。[注]

> [注] 斯塔费拉写 tutoïté，米勒定本写 tutoïité；这是拉康从 tu/toi 出发并仿照 tutoiement 造出的名词，格里格英译作 thouness。“你性”保留了第二人称被名词化的效果，但无法带出法语中 tutoyer/tutoiement（以“你”相称）的回声。

也许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文字，尝试进行这种格外令人绝望而愚蠢的分析；它属于同一学派那部名为《意义的意义》[注3]的著名著作中的类型。这最终会导向类似嗡鸣的、令人眩晕的东西。

> [注3] C. K. 奥格登与 I. A. 理查兹：《意义的意义》，Mariner Books，1989年版。原速记稿注释另附作者与检索页面链接。
>
> B001IXSASC

同样，为了翻译［皮雄？］一段确实著名的文字：它鼓励那些刚有一点德性萌芽的人，至少保持连贯，把德性补足到整个场域；其中某

处，“你”甚至说“杀死我”（tue-moi）。无法忍受它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作者把它应用到正义领域，也就是从下面这种合理观念出发：

> “你无法忍受‘你’的真相；在这个真相中，你随时可能被指认为你所是的东西——一个无赖。
>
> 如果想获得邻人的尊重，就把自己提升到正常距离的观念，也就是大他者、世界秩序与律法的一般观念。”

这个“你”似乎使评论者们完全不知所措。说实话，我认为今天讨论的“你性”会使你们相当熟悉这里涉及的层次。

迈出下一步：问题在于他者应当作为他者得到承认。那么，要让他者作为他者得到承认，需要什么？下一步是什么？

归根结底，当然是大他者，只要它处在那种我曾试图指出其层次的委任句中。我们必须在这里停留片刻。毕竟，这一步跨越并非如此不可企及。我们已经看到，自我的想象性认同具有一种消逝的他异性；它只有在一个极限时刻才遇见“你”，而在这个时刻，两者不能彼此共存。因此，大写 A 的大他者必须在这种关系、甚至这种相互排斥之外得到承认；也就是说，必须承认它与我在这种消逝关系中同样不可把握。换言之，必须把它召唤为它自己并不承认的东西；这正是“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suivras）的意义。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如果“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是一项委派、甚至祝圣，那是因为对它的回答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我跟随你”（je te suis）以及“我是”（je suis）——“我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东西”。这是第三

人称的一种用法，对话语而言绝对根本：它指示的就是话语本身的主体，也就是话语已经说出的东西。“我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东西”在这里恰好意味着：“我恰恰就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刚才所说的完全没有规定，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把我带向哪里。”如果对“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的回答是充实的，它必须说“我就是它 / 我的确是”（je le suis），恰恰是同一个 je le suis。

你们在《乌龟与两只鸭子》的寓言中会遇到这一点：当鸭子终于提议把乌龟带去美洲，大家都等着观看这只小乌龟咬住旅行木棒时，故事来到关键点。“女王？乌龟说，是的，我的确就是她”（je la suis；也可听作“我跟随她”）。皮雄由此提出一大堆问题：这里涉及抽象状态的女王，还是具体的女王？对于一个在语法和语言学上颇有敏锐性的人，他竟令人困惑地推测，乌龟是否本该说“我就是她”（je suis elle）。

如果乌龟谈论的是一位真正存在的女王，它也许可以说许多话，比如“我是女王”。但如果它说的是“我的确就是她”（je la suis），即你们刚才谈论的东西，就不必引入其他区分；只须知道宾语代词 la 指向话语中已经蕴含的东西。

问题恰恰就在话语所蕴含的东西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对话的这一开创性言说——“你就是那个会跟随我的人”——前停留片刻，衡量它的巨大之处：我们把“你”本身当作一个未知者而向其说话。它的自如源于此，力量也源于此；也正因如此，它从前半句的“你是”穿入后半句的第二人称 suivras，并持续在那里。它恰恰因为可能在两者之间失效，才持续存在。

所以，在这个公式中，我不是向一个被自己展示出来的自我说话，而是向构成眼前这个主体的全部能指说话。我说：向他拥有的全部能指说话，包括他的症状。我们既向他的神祇说话，也向他的恶魔说话。因此，我迄今称作“委任”的这种句式、这种宣判方式，从现在起会称作“召请”（invocation），并保留这个词的宗教内涵：我把属于我的信仰传进他体内，而不只是把一种惰性的公式传给他——这是一项召请。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顺便指出，在优秀作家那里，也许在西塞罗那里，“召请”严格说来以其原初宗教形式指示的，正是我刚告诉你们的东西。它是一种言语公式；战斗开始以前，人们用它争取神祇——也就是我刚才所谓能指、神祇与恶魔，敌人的神祇——的帮助。召请正是向它们发出。也因此，我认为“召请”一词严格指示句子的最高形式；借助它，我在召请中说出的所有词都是真正的词，是唤起性的声音，而每一个句子都必须对它们作答——这就是真正大他者的旗号。

相关知识卡 “你”的人称化、委任与召请

所以你们看见了；刚才已经通过两个层次看见：

- “你”如何依赖能指本身；
- 被呼喊出来的能指处在哪个层次，决定了被召来向你们作答的“你”的性质与品质。

所以，当那个承载句子的能指在他者那里缺失，向你作答的“我的确是／我就是它”（je le suis）便只能呈现为永恒的询问：“你就是那个会……我的人”——会怎样？在出现之物的极限上，句子退回前一个层

次：“你就是那个会……我的人”“你就是那个……的人”等等，直至“你就是那个杀死我的人”。每当向大他者本身发出的召唤使能指落入大他者的能指场域，而这个能指对大他者而言又被排除、遭到 Verworfen、不可接近时，“你”便重新出现。因此我说，此刻能指造成一种还原，但它被强化为纯粹的想象关系。

就在这时，那个使施雷伯主席个案的所有评论者挠头的奇特现象发生了：用他的话说，令人困惑的“灵魂谋杀”。对他而言，这是进入精神病的信号。当然，对我们这些分析评论者而言，它可以具有各种含义；不过，我们仍总把它放进想象场域，即把它联系到情感关系的短路。短路把大他者变成纯粹欲望的存在；在人类想象层次上，这种存在只能同时是一个纯粹相互毁灭的存在。

这种纯粹二元关系正是攻击性在其最彻底根源上的层次。就施雷伯主席的个案而言，弗洛伊德无疑是在同性恋关系本身的层次上评论我们的攻击性这种纯粹二元的涌现。

我们无疑拥有千百条证据。这与我们对攻击性来源的全部认识极其连贯：三角关系——换言之，俄狄浦斯关系——被短路、简化成二元关系时，攻击性就会涌现。

文本中缺少——或者据说缺少——一些可以让我们更严密逼近问题的要素：例如他与父亲真正具有怎样的关系，又与弗洛伊德提到的那位假定存在的兄弟有怎样的关系。不过，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就能理解：当“你”的层次越出［……］的界限，可以说变成一个本身受到召请和唤起的“你”时，它必然要经过这种与“你”的纯粹想象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你”由于原初能指的涌现而从大他者、从大他者场域中受到召唤；但他者无论如何都无法接收它，因为这个能指本身就是我上次命名的“你是那个作为父亲的人”，或“你是那个将成为父亲的人”。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它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接收，因为这里涉及能指本身：能指代表一种不确定的支撑；若干东西围绕它凝聚和聚集——甚至不只是若干意指，而是由于这个能指的存在、并从其存在出发汇聚而来的若干意指系列。

在“父之名”出现以前，并没有父亲，而有各种其他东西。弗洛伊德本人也隐约看到那里可能有什么、可以沿哪个方向去看——他正因如此才写了《图腾与禁忌》。不过可以肯定，在“父亲”这个词被确立到某个层次以前，从历史上说并没有父亲。

我在这里只是纯粹出于让步，才给你们这种历史视角，因为它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对史前史没有兴趣，除了用它指示一个层次：尼安德特人很可能缺少若干本质能指。不过，完全没必要追溯到这么遥远；精神病者同样缺少这些能指，所以我们也能在触手可及的对象上观察它。

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并请你们注意那个关键时刻、那一步绝对根本的跨越。只要仔细观察并懂得圈定，你们会在每一次进入精神病时找到它：从大他者本身、从大他者场域中，传来一个无法接收的本质能指的召唤。

我曾在一次病人演示中介绍过一位安的列斯人。他的家族史显示出始祖问题：一位法国人来到那里，过着格外英勇的生活；他像一个拓荒者，命运经历非凡的起落，后来成为全家的理想。

这个病人本人也被连根拔起，流落底特律一带，过着相当宽裕的手艺人生活。一天，他简直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个女人；她向他宣布自己要生孩子了。我们不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但非常确切地知道，这个人的最初幻觉就在此后几天内爆发。正是当人们向他宣告“你将成为父亲”时，某种东西发生了：一个人物出现，对他说“你是圣多马”……我认为，这里应当是“怀疑者”圣多马，而非阿奎那的圣多马。后续的“报喜”毫无疑问；它们来自伊丽莎白——她在年事已高时才宣告自己将怀有孩子。

总之，父职层次与若干现象的爆发相连；这些现象以“报喜”式启示呈现，涉及使一个人得以“构想 / 受孕”的一切，而这个人原本从字面上说无法如此——我使用“构想 / 受孕”（concevoir）一词并非偶然。

“生成”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严格说来并不能亲手触及它与两性的关联，那么“一代的生成”便等同于炼金术思辨的这个术语。它始终准备涌现，成为一种迂回的回答：主体试图作答，试图重建精神病主体严格说来无法接收的东西。

从这个时刻起，恰恰因为 自我 一度受到唤起——无论它首先以何种方式出现……

我请你们在每个个案中寻找这一点：自我 在任何可能对主体具有意义的能指之外受到唤起

……回答就只能是对能指整体的永久使用；我甚至要说，它持续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我们观察到，伴随所有人类行动的记忆性质，会以最空洞、最中性、最自我化的形式立刻获得生命、发出声音，成为一个 自我 的日常关系方式。这个 自我 在那里受到唤起，却无法在召唤它的能指层面找到回应者；它作为 自我 的能力受到召请，却无法回答。

于是，我们看到构成施雷伯主席个案格外丰富特征的全部现象展开：当下的一切姿势和行动不断受到评注。这并不特别，因为它甚至就是所谓“精神自动症”的定义。为什么？恰恰因为主体被召到一个无法作答的场地上，唯一能把他重新连到自己正趋于丧失的人化过程的反应方式，就是不断在生命流动的细小评注中呈现自己；这些评注构成所谓精神自动症的文本。对于跨过这一界限的主体，惯常的意义安全感已经不复存在，只剩这种言语伴随。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我认为，这就是精神自动症的深层动力；它还可以迂回地为“自动症”一词的这种用法辩护。能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话语最终似乎比人更聪明。精神病理学如此频繁地使用“自动症”这个词，却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这相当奇特。请仔细想一想：人们给了这个词多大的适用范围？

在神经病学中，某些释放现象被称作“自动症”，这个词有相当精确的意义；但精神病学重新借它指称精神自动症，至少仍然成问题。不过，在克莱朗博的理论中，“自动症”一词不能只按类比重新使用。尽管如此，它却是最准确的词。仔细看看亚里士多德用来同“机运”

［τύχη，tuché］相对的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这个区分今天已被完全忘记——如果我们直接走向能指，也就是在保留词源参照所需全部谨慎的情况下，会看到 αὐτόματον［自己运动之物］无非意味着某种类似“神话”“math”的东西，而后者恰恰意味着思考。

自动症就是真正自行思考的东西；它与彼岸那个赋予思想以主体、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某种始终十分可见而又成问题之物的 自我，恰恰没有任何联系。如果语言自行说话，那么再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使用“自动症”一词的场合了。正是这一点赋予克莱朗博使用的“精神自动症”以真实的回响；大概也正是它让这个术语令我们感到满意。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下次，我们会把刚才突出之物照亮的施雷伯主体进入精神病，同另外两个观点作比较；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每一个观点缺少什么。

首先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它丝毫没有改变真相的布局、布景以及各边界的总体平衡：潜在同性恋蕴含一个女性位置，而跳跃恰好发生在这里。弗洛伊德说，这是一种受孕、被授精的幻想，仿佛事情不言自明；也就是仿佛接受女性位置，便会额外蕴含那个在施雷伯妄想中如此充分发展的层次，使他后来成为上帝的女人。

弗洛伊德关于这一点的理论是：这是施雷伯回避阉割恐惧之结果的唯一方式。他将承受：

- 但它也可以不是去势，而只是去男性化或转变成女人；
- 不过，正如施雷伯本人在某处指出，做一个精神上的女人，难道不比做一个完全受压迫、悲惨、甚至被阉割的可怜男人更好吗？

总之，正是在扩展到施雷伯式上帝宇宙本身的尺度中，潜在同性恋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

大体而言，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的这套理论最尊重精神病进展的平衡。不过，艾达·麦卡尔平夫人的反对意见当然值得在这里作出回应；她可以反驳、甚至补充弗洛伊德理论的一部分。她恰恰相反，把精神病过程的决定因素置于怀孕幻想的方向。这个怀孕幻想暗中依赖某种会显示严格对称性的东西：两性各自都可能表现出两个具有致神经症作用的巨大缺失。

她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其中有些东西很有趣。文本里确实有无数材料可以支撑它。她甚至唤起某种太阳石文明的背景：太阳被视作女性并化身于石头，成为根本象征；它是古典理论中阳具获得提升的女性对应物。最有趣的是，施雷伯住院的城市名称恰好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响应：Sonnenstein，即“太阳石”。

我指出这件事，只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见能指的这类鬼把戏和嘲弄，完全没有理由不赋予它们全部重要性。即使在对最不神经症的人所作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也不断遇到这种情况：从地平线每个角落传来的奇特同音异义彼此交叉；有时，它们仿佛给主体的整个命运和症状赋予一种本来无法把握的统一性。

尤其当问题涉及进入精神病的时刻时，更不应该在这项探究前退缩。顺便注意，在施雷伯第二次复发时……

- 施雷伯极度不安地来到弗莱希希的诊室；
- 弗莱希希对他而言已经被提升到一位显赫父亲人物的价值；
- 另一方面，个案观察已经标出了所有此前因素；

可以说，它们使父职功能进入警戒或悬置：从他本人的证词中，我们知道他曾希望成为父亲；我们还知道，在第一次危机与第二次危机相隔的八年间，他的妻子经历过数次自然流产

……有一句话显得格外有意义，甚至很不幸。弗莱希希对他说了这句话；这个人物已经在他的梦中、通过“做一个承受交媾的女人会多么美好”这一意象的侵入显现出来。各种相互印证还告诉我们，弗莱希希对他说，自从上一次以后，精神病学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人们会让他享受一种非常“富有成效 / 丰产”（fécond）的小睡眠。

也许这恰恰是绝不该说的话，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施雷伯完全不再入睡，而且当晚宁愿尝试上吊。总之，我们在这里进入生育关系与主体同死亡的根本关系相牵连的层次。我希望把它留到下次。

**乌龟与两只鸭子**

有一只头脑轻浮的乌龟，
厌倦洞穴，想去看看外面的天地；
人总爱把异国他乡当回事：
跛脚的人也总爱憎恨自己的居所。

两只鸭子听这位大婶
说出她美妙的打算，
便说自己有办法令她如愿：
“您看见这条宽阔的大路吗？
我们会载您飞越天空，前往美洲。
您将看见许多共和国，
许多王国、许多民族；还会从
观察到的不同风俗中获益。
奥德修斯也曾如此。”谁也没料到，
此事竟会提到奥德修斯。
乌龟听取了这个提议。
交易谈妥，两只鸟造出一件机器，
运送这位朝圣的旅人。
一根木棒横穿过她的嘴。
“咬紧，”它们说，“小心别松口。”
两只鸭子各衔木棒的一头。
乌龟飞上天空，处处有人惊讶，
竟看见这般出行的
迟缓动物和她的房屋，
恰好悬在两只鸭子正中央。
“奇迹！”人们喊道，“快来看云端
飞过的乌龟女王！”
“女王？可不是吗，我的确就是她；
不要嘲笑我。”她若一言不发，
径直赶路，本会做得好得多；
可她牙齿一松，木棒便脱了口，

她掉下来，在围观者脚边摔死。
她的不谨慎造成自己的毁灭。
轻率、饶舌、愚蠢的虚荣，
　　以及徒然的好奇，
彼此之间都有紧密的亲缘；
　　它们全是同一家族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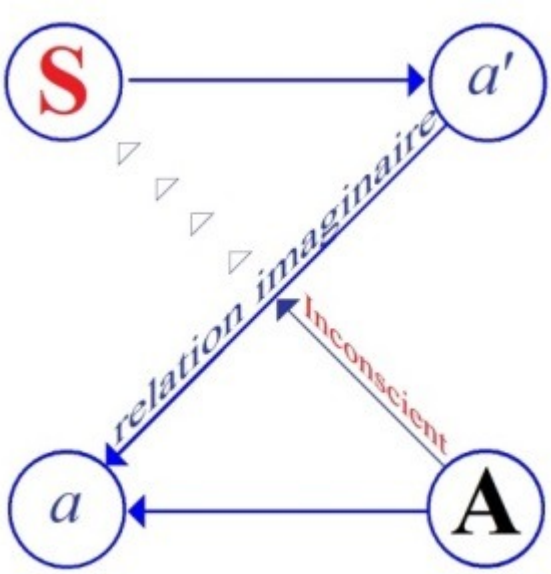
# 第25课 · 1956年7月4日

要结束这门课，我不太知道该从哪一头开始。姑且如此，我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小图式：

- 一个是你们应当熟悉的旧图式。它是一种格栅；今年开始时，我用它尝试向你们说明：如果我们想要……

……把妄想结构化，而妄想表面看来似乎在某个端点与言说关系相连，那么妄想问题应当怎样提出。我也许还会再度参照这个图式，所以在这里提醒你们。

我想，它对你们而言已经得到足够的评注。




- 另一个图式有所不同，是全新的；待会儿也许需要参照它。

今天，我们从上次留给你们的地方出发，也就是从两个相反的描述出发：

- 弗洛伊德的描述；
- 一位绝非没有长处的精神分析家的描述。她代表最现代的倾向，至少还有相当聪明地代表它们这一优点。

今年向你们描述的一切，首先围绕一个关切集中：重新强调妄想的结构。我想向你们显示，这个妄想的所有现象——我甚至认为可以说，它的动力——都会由一个根本视角得到阐明：把它看作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紊乱，因而当然也把它看作与转移机制相连。

不过，在我们处理问题的层次上……

也就是参照言说的功能与结构

……关键是把这种转移机制从不知什么含混、弥散的客体关系中拔出并解放出来。后者按其假设，会把我们碰到的每一种紊乱都视为不成熟，而且从整体上视之；这样便只给我们留下客体关系这种不成熟状态的一条线性系列。

它远远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置于这种发展论参照中……

只要这种参照无论出现什么，都恰恰蕴含一条单线进程

……我认为，经验显示我们会走入死路，得到一些不足而没有根据的解释。它们彼此叠加，最终无法区分不同个案，尤其无法区分处于最前景的神经症与精神病。

仅仅局部妄想本身的经验，就反对用不成熟、乃至退行或纯粹客体关系的简单变化来谈论它。即使我们没有精神病而只有神经症，明年也会看到，“客体”概念并非单义。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想从对比恐惧症客体与倒错客体开始。那将是在主体同大他者关系中的“客体”格子上，重新处理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在这里，在精神病层面，我会说，两项对立的术语就在这里。

让我们把范围限制在这里，快速概括弗洛伊德关于这个妄想的立场如何定位、人们对它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以及提出这些反对意见以后，是否勾勒出哪怕最微小的、更佳解决办法的开端。

人们在阅读弗洛伊德以后告诉我们：他把施雷伯的妄想解释为同性恋倾向的闯入，而主体否认了这一倾向。

它为什么被否认？待会儿我们会看到。这种否认……

我正在概括。你们可以回到原文——我想你们早已这样做过——看看我的概括是否准确、平衡

……在并非神经症患者的施雷伯个案里，导向我们可以称作“神圣的钟情妄想”的东西；它在两个层面发生双重翻转。首先在象征层面，象征这一局势的句子中有一个成分的重音被翻转。

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如何划分对同性恋倾向的不同否认方式。他告诉我们，在“我爱他……”这个句子内部，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引入否认，从而否定这个简单局势：

- 可以说：“爱他的不是我。”
- 可以说：“我爱的不是他。”
- 还可以说：“对我而言，事情不在于爱他；我恨他。”

他同时告诉我们，局势从来不简单，也不只限于这种象征性翻转……

原因被他视为已经充分蕴含其中；说实话，他并未坚持说明

……局势三个成分中只有一部分会发生想象性翻转。例如，通过想象性的投射机制，“我恨他”转化为“他恨我”。在我们的个案中，“我爱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这里的“他”是大写的，因为就是上帝本人

——像每一种钟情妄想一样翻转为“他爱我”。因此很清楚，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要对防御同性恋倾向的最终结果进行分类、定位和理解，象征装置本身必须先发生相当深入的翻转。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防御，以至于主体经历某些考验；在一个时刻，不只是整个外部世界，甚至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乃至他者本身都失去现实性？由此需要整套妄想重建；主体逐步重新安置一个可以在其中认出自己的世界，但方式已经受到深刻扰乱，而他的自我辨认也同样深受扰乱。他不会把自己认作一个在时间中被命定、被投向不确定未来的主体；在一个未定却必然无法逾越的期限上，他将成为最卓越的神圣奇迹之主体，成为整个人类重新创造的支撑与女性容器。

弗洛伊德对这个妄想的解释……

它的结局确实具有发展最充分的救赎妄想的一切夸大性质

……仔细逼近，会显得完全建立在对自恋的参照上。防御同性恋倾向从受威胁的自恋出发。夸大妄想表达自恋恐惧：主体的自我扩张到世界的尺度；这是一项看起来完全处于想象层面的力比多经济事实。主体把自己变成至高存在之爱的客体。由此，他完全可以放弃起初认为最珍贵、无论如何必须拯救的东西——男性气概的标记。

我们最终从弗洛伊德的解释中看到什么？我要强调，全部机制以及神经症的全部发展所参照的力比多辩证法之枢纽和汇合点，就是阉割主题。阉割制约自恋恐惧。主体接受阉割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对全部现实的改造。

弗洛伊德从未放弃阉割的优先性。可以说，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的材料秩序中，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变量。仅说不变量还不够，它是一个占优的不变量：任何精神分析现象的历史都铭写在主体间游戏中；在其理论条件里，弗洛伊德从未撤去、从未降低、甚至从未相对化阉割的位置。

所以，是弗洛伊德周围的分析共同体、而从不是他本人的著作，试图为这一中心赋予对称物和等价物——也就是赋予客体中心、姑且说“阳具”中心及其在男性和女性力比多经济中的根本功能以同等位置。

弗洛伊德给出并维持的理论化最本质、最典型的一点在于——无论他作过怎样的改造，请你们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在他为精神生活给出的任何图式化阶段中，这一点从未改变：一切围绕阉割组织。

而且，这件事格外醒目，因为如果你们仔细阅读文本……

麦卡尔平夫人的反对意见本可在这里取得价值；我说“本可”，因为她唯一没有真正突出显示的就是这一点。待会儿我会说明，她的论证围绕什么旋转

……她的评论中确有一点是真实的：施雷伯的文本从来不谈阉割。德语在那里使用由拉丁语词根构成的 Entmannung；阅读文本就会发现，Entmannung 非常正式地意指“转变”，包含过渡的一切意味，意指“转变成女人”，并包含生育、丰产的情感色彩，而完全不是阉割。无论如何，弗洛伊德文本中醒目而根本的一点仍是：他让施雷伯主体的全部动力围绕阉割主题、围绕阳具客体的丧失旋转。

显然，我们只能在没有充分解释的情况下承认这份总结：尽管弗洛伊德的论证有某些弱点——尤其是刚才这一处——但以同性恋倾向、力比多经济为枢纽，把它们置于自恋的想象辩证法中，并把男性客体作为冲突的根本赌注，确实使我们得以标示并理解妄想演变的不同阶段、各个时期和最终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顺便注意到各种精妙之处；弗洛伊德只是把它们作为引子留在一条已经打开、却未得到完全探索的大道上。例如，他表明：仅凭投射无法解释妄想；不能说妄想只是主体感觉的一种反映、一面镜子，而必须确定其中的阶段，并且可以说，确定某个时刻那种已经衰老的倾向发生丧失。

今年我曾多次坚持："内部被压抑的东西在外部重新出现"；它在背景上重新涌现，而且并不以简单结构涌现。我们已经看到，它占据一个可以说内部的位置，使得当前个案中作为迫害施动者的主体本身，也是一个暧昧、成问题的主体。

在最初接近时，他归根结底只是另一个主体的代表；后者不仅允许这一切，无疑还在最终层面行动。总之，这涉及他者之他异性的分层。弗洛伊德确实把我们带到这个问题前，却停在这里。离开他的文本时，事情大致就是这种状态。

艾达·麦卡尔平以不同术语、却比其他人更连贯地提出反对意见。她说，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把这个妄想设想为预设了所谓生殖器成熟；后者据说可以解释阉割恐惧。

同性恋倾向远没有表现为原初之物。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症状：先是疑病症状，是精神病性症状；它是一种处在精神病关系以及

各种现象底层的特殊东西，尤其是心身现象——对她来说，后者特别构成进入这个个案现象学的道路。

因为这位临床家尤其研究心身现象；她正是在这里直接把握到若干结构完全不同于神经症的现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某个时间特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冲突——在主体作为身体存在所呈现的“物质图景”上的直接印记或铭写。

某种症状，例如面部皮疹——无论皮肤病学怎样界定它——会随着某个纪念日而活动起来；它以某种直接方式……

- 不经过任何辩证法；
- 不经过任何中介；
- 不经过任何可供我们相互印证的解释；
- 也没有任何等价物；

……直接对应于主体过去的某种东西。

是不是这一点推动艾达·麦卡尔平提出这种直接对应的奇特问题？我说的确实是符号与症状之间的直接对应。“符号”装置在当今精神分析家的心智范畴中缺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只有借助某种幻想，才能设想这类关系。

因此，她的全部论证都会把施雷伯主席妄想的发展联系到一个幻想主题、一种想象固着上……

按如今这类论述中的通用术语：前俄狄浦斯的

……她强调，保持和支撑欲望的首先且根本是一个可以说自行追求的生育主题。它在形式上无性；主体进入去男性化、女性化的状态——正如我已经正式告诉你们的——只不过是这一要求的一种事后结果。

这个主体应当只诞生于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只要儿童在任何三角关系构成以前，会看到一种欲望幻想在自己内部诞生：希望在生孩子的能力上等同于母亲。

这就是艾达·麦卡尔平的全部论证，没有理由在这里追完每一处细节。它们很丰富，但毕竟触手可及：她为自己编辑的施雷伯文本英译本写了材料翔实的前言和后记，在那里陈述全部主题。

重要的是看出，这如何联系到整个分析辩证法的某种重新定向。这种方向倾向于把幻想的想象经济……

以及幻想的种种再组织或解组、再结构化或解结构化

……变成一切理解进展以及一切治疗进展的枢纽和有效点。

如今如此普遍接受的图式——“挫折、攻击性、退行”——确实处于麦卡尔平夫人认为能够用来解释这个妄想的一切之底层。她走得很远。她说：

- 对施雷伯主体而言，世界之所以衰落；
- 世界之所以黄昏化，乃至他的现实把握在某一时刻出现近乎意识混乱的紊乱；

……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必须得到重建。这就在精神紊乱最深的阶段本身引入了某种目的论。整个“神话”之所以建立，只因为这是施雷伯主体满足自己对生育的想象要求的唯一方式。

说实话，这种“图像化”（picturing）无疑能够使人设想主体要重生时发生的这种想象性受孕。不过，我们随即可以追问：想象活动究竟从哪里开始？我几乎要说，我在这里套用了主体的一个主题；你们知道，正是它的发动将造就整套妄想建构……

既然这里只涉及想象幻想，那么在艾达·麦卡尔平的视角中，是什么使我们能够理解父亲功能反而得到如此提升和突出？无论人们多想反对弗洛伊德在分析理论中赋予父亲功能的优先性，仍不可否认、也极为醒目的是……

无论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论证可能有怎样的弱点

……在这个妄想中，父亲功能被提升、被抬高到了这种程度：这个此前断言父亲功能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主体，需要的竟不是别的，而正是“父神”本人；只有“父神”本人出现，妄想才可以说到达完成点和平衡点。

在施雷伯精神病的整个演变中，父亲人物本身始终占优……

它们彼此替代，不断扩大并彼此包裹，直至与神圣父亲本身认同，与带有严格父性重音的神认同

……这一点始终绝对不可动摇，并迫使我们重新提出问题。某种东西可以说给了弗洛伊德如此多的理由，为什么他却仍只从某些侧面、以某些方式接近它，而这些方式无可争议地仍令我们感到不足？

实际上，在弗洛伊德那里，一切仍保持平衡；而麦卡尔平夫人试图作出的修正，反倒把一切留在开放而不足的状态。

不只是父亲幻想人物如此巨大，使我们无法立足于前俄狄浦斯幻想闯入的动力学。还有许多其他东西，甚至包括在两个解释中都仍是谜、也是我们今年特别紧抓不放的东西。

弗洛伊德无可争议地比麦卡尔平夫人更接近它：言语听觉化现象那种压倒性、占优、巨大、增殖、蔓生的面貌；主体被这个“言说世界”强力俘获，而它对主体而言不只变成持续的共同在场……

也就是我上次所谓伴随其全部行动的言语伴随

……而且是一种持续的训令、催促，甚至是要求主体在这一层面显现自己的命令。

问题在于，他本人没有片刻停止作证。在不断伴随他的言说邀请中，他并非必须回答，而是要证明自己在那里、在场；如果不回答，他也有能力不回答——因为他说，也许人们想强迫他讲出某种蠢话。但无论回答还是不回答，他都必须证明自己始终对这场内在对话保持清醒。如果他在这场对话的在场中哪怕只走开一步，就会成为他所谓 Verwesung 的信号；这个词已经被正确翻译为某种“解体”。

我们曾把注意力引到这里，并坚持说明弗洛伊德纯粹立场的价值：虽然精神病的某些表现相对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症中辨认的动力呈现悖论，弗洛伊德视角仍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接近精神病；因为这个视角中暗含着某种从未被完全析出的东西……

弗洛伊德没有从这条道路直接析出它，而只通过另一进路瞥见它；去年谈快乐原则时，我有意向你们展示过那条进路

……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动力学倾向于被还原成一种本能符号的平面化、被想象出来的本能。面对这种倾向，唯一支撑弗洛伊德立场的，是他从未放弃、并要求任何可能的分析理解都必须保留的那些术语。即使它们在某些地方只能近似贴合，这样的贴合仍胜过完全不让它们介入：

- 即父亲功能；
- 即阉割情结。

这里涉及的并不只是想象元素。你们都知道，在想象中以“阳具母亲”形式重新找到的东西，并不与被整合进俄狄浦斯三角局势的阉割情结同质。

俄狄浦斯三角局势在弗洛伊德那里并未得到完全阐明；但它始终得到维持，仅此就使它有待这项阐明。而只有承认第三项——弗洛伊德有理由视为中心项的父亲——中存在一个不可还原为任何想象条件的能指元素，才可能作出这种阐明。我并不是说“父亲”这个词、父之名是

唯一的这种元素，或我们可以这样断言；我要说，每当把握某种严格属于象征秩序的东西时，我们都能析出这种元素。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在我为此重新阅读的材料中，还有琼斯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看到这位大师的乖宝宝怎样努力逼近象征并向我们解释：若在象征本身中看见某种浓缩了一项伟大根本关系全部特征的东西，无疑是一种［……］偏离，这很值得注意。他举了不止一个例子，我选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说，戒指不会因为代表婚姻——连同婚姻所包含的一切文化加工——而以分析意义上的象征介入。别提这一切，我们听了都会起鸡皮疙瘩；我们可不是别人可以拿类比主义来糊弄的人。如果戒指有所意指，并不是因为它联系于这种“过度升华”的参照——他正是这样表达的。我们应当到升华中的某处去寻找：如果戒指是婚姻的象征，那是因为它是女性器官的象征。

这难道不会使我们陷入沉思吗？我们当然很清楚，能指在症状中被发动的意义，恰恰不受倾向秩序的约束，并且会建立最古怪的关系。但被这套辩证法带到甚至没有察觉“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女性性器官的自然象征，那就真的不明白下面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至少知道它的主题：中世纪的好故事《汉斯·卡维尔的戒指》，后来被巴尔扎克收入《诙谐故事集》[注1]。那个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的好汉——有时据说还是一位神父——半夜梦见戒指，手指正伸在戒指所召唤的地方［……］。即使暂且不作回答，也必须对自然象征怀有最古怪的观念，才会这样理解它。

[注1] 参见巴尔扎克《诙谐故事集》第二个十篇集序言；另参见拉封丹《汉斯·卡维尔的戒指》，《全集》第2卷第12篇，以及拉伯雷《庞大固埃》第三卷第28章。原速记稿注释附有在线文本链接。

因为必须明说：如果人们不是已经预先知道戒指是什么，那么经验中究竟有什么能够让对这个孔洞的插入经验——既然涉及的就是孔洞——与某种类似戒指的经验相互对应？我们不妨把话说透。戒指并非自然中会遇见的客体；而如果插入秩序中的某物类似一种多少紧密的穿入，也肯定不是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

我要援引——像玛丽·安托瓦内特曾说的那样——不是所有母亲，而是所有曾把手指伸进某处的人：伸进这个地方时的感受，我的上帝，当然更像软体动物，而不是什么戒指。自然中若有什么注定会向我们暗示环的属性，那也严格限于语言赋予 anus（肛门）这个词的东西——你们知道，拉丁语中它只写一个 n；古代词典的评注者以羞涩方式解释它，无非就是可以在后面找到的那个环。

若要从自然象征的角度把两者混为一谈，一个人在思维知觉层面必定糟糕到这种程度：连弗洛伊德本人都绝望到不再教你们区分，把你们彻底当作无可救药的笨蛋。

琼斯先生在这里的杜撰恰好向我们显示，我们也许正在意指一种原初之物。戒指之所以可能进入梦中，甚至进入一个最终通向性行动的梦中——高卢式译本以更幽默的方式把它呈现给我们——恰恰因为戒指已经作为能指存在，无论带不带那些内涵。

如果琼斯先生害怕文化内涵，那么错的正是他。他没有设想到，戒指恰好是一种使人凭借其在世界中的整个在场，结晶出远远不只是婚姻的东西。比如，相对于各种所谓元素——无限的圆、永恒轮回、重复中的某种恒常——戒指是原初的。它远非琼斯先生最终似乎相信的那种东西；那种信法像有人以为制作通心粉时，是先拿来一个洞，再把

面粉包在周围。戒指不是一个周围包着东西的洞；它首先具有能指价值，问题正是在这里。

我们甚至无须把戒指这个术语提到前景作为例子。

这篇话语归根结底朝着某种经由这条道路进入言说的东西前进。经验永远无法解释：一个人如何听懂——所谓听懂——哪怕最简单的一项表述；无论它是什么，只要能铭入语言，并被还原到语言功能最基本的言说形式“就是这个”（c'est cela），这一公式对人就具有解释意义。

他看见了某种东西，无论是什么，就在那里：“就是这个。”无论那东西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已经把某物定位；他处在它面前，无论它多么独特、古怪、暧昧。“现在就是这个”——如今它栖身于不同于先前所在之处的某个地方；而先前它无处可在。现在他知道它是什么了。

我想有意拿起人面前可能呈现的最不坚实、最纤薄的织物。我们只须去一个典型领域寻找，那就是任何一种气象现象。依定义，气象现象恰好“就是这个”；它是实在的，同时它又是什么？它是幻象。若说它属于想象界，那会完全错误。彩虹“就是这个”。当你们说彩虹“就是这个”、说“就是它”以后，接下来便开始寻找。

人们为此绞尽脑汁一段时间，直到笛卡尔先生把小问题彻底化约：据说，那是悬浮在某处、被称作云的细小水滴形成的一片虹彩区域。好！然后呢？随后仍剩下你们所说的东西：一边是光线，另一边是或多或少凝聚的水滴。“就是这个”原来只是外观。

请注意，问题绝未解决，因为你们知道，光线既是波又是微粒；而这滴小水珠也很古怪：归根结底，它并不真正处于气态，而是凝结，是回落到液态；可它又是悬置的回落，处在两者之间，达到了水作为伸展水层的状态。

因此，当我们说“就是这个”时，也蕴含“只不过是这个”或“不是这个”，即我们曾停留的外观。这证明，后来产生的一切——“只不过是这个”或“不是这个”——早已蕴含在最初的“就是这个”中。换言之，这个现象恰恰没有任何想象意义；你们从未见过动物注意彩虹。事实上，人对无数十分相近的现象也不会留意。自然中各种虹彩现象极其普遍；若没有观察天赋或专门研究，谁也不会在那里停下来。

如果彩虹作为某种东西存在，恰恰是由于它同“就是这个”的关系：我们由此把它命名为彩虹；向一个从未见过它的人说话时，会有一个时刻对他说：“彩虹，就是这个。”而彩虹“就是这个”，连同“就是这个”所预设的一切，也就是一种会使我们投入其中直至筋疲力尽的蕴含：

- 要知道彩虹背后隐藏着什么；
- 要知道彩虹的原因是什么；
- 要知道我们能够把彩虹还原成什么。

请特别注意，彩虹和气象现象从一开始的特征——而且人人都知道，恰恰因此才叫它气象现象——就是背后没有任何隐藏之物。它完全就在这个外观中。然而，它仍为我们持续存在，甚至使我们能够就它提出问题；支撑这一点的只有最初的“就是这个”，只有把它命名为彩虹这一行为本身。除了这个名称，什么也没有。

换言之，如果想再往前一步：这道彩虹不会说话，但人们可以替它说话。从没有人对它说话，这很醒目。人们会召唤曙光以及各种其他东西；彩虹与若干同类现象一起保留一项特权——人们不向它说话。

这无疑有其理由。它恰好格外缺乏一致性，也正因此才被选作例子。不过，假设有人向彩虹说话：很清楚，既然向它说话，人们甚至能让它开口；可以让它随便对谁说话，例如让湖泊与它对话。

如果彩虹没有名字，或对自己的名字充耳不闻，不知道自己名叫“彩虹”，那么湖泊除了向它展示千百道阳光在波浪上形成的小小幻影，以及升起的雾气长带，再没有其他办法。湖泊会尝试与彩虹相会，却永远无法相会；理由很简单：湖面跳舞的阳光碎片和逸出的雾气，与彩虹的产生毫无关系。彩虹非常确切地开始于：

- 太阳处于某个倾斜高度；
- 所涉水滴达到某种密度；
- 某种关系、指标与比例；
- 某种作为关系而存在的东西。在一个充实而绝对不可把握的现实中，只要这个现象尚未作为现象被命名，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寻找太阳的这种有利倾角，也没有理由寻找决定彩虹现象的任何指标。

我刚才围绕这东西作了长篇考察；我想你们应当已经看出，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具有球形腰带的性质，也就是某种几乎可以同时展开和重新卷起的东西，而人在其中受到了牵涉。想象辩证法恰好具有同样的结构。我的意思是，在分析越来越倾向于把想象辩证法限制于母

婴关系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些关系其实没有任何理由不能自足。经验向我们显示什么？一个母亲——据说她的要求之一恰好是以某种方式为自己取得一个想象阳具。

人们同样向我们解释过：她的孩子很好地充当这个想象延伸的支撑，而且是相当充分的现实支撑。至于孩子，我们同样知道，这毫无疑问：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据说他很早就定位了阳具，并慷慨地把阳具赋予母亲——无论是否通过镜像。因此很清楚，如果有某种东西介入，它必须发生在中介化层面，更准确地说，发生在阳具的中介功能层面。

这对母子本可围绕相互阳具化的共同幻象，在镜像中相处得如此融洽；如果他们反而各自在冲突、甚至内在异化的局势中，那恰恰因为阳具——若允许我这样说——到处游走，位于别处。每个人当然都知道分析理论把它放在哪里：父亲被设想为它的携带者。

难道不值得在这里停下来，对下面一点感到惊讶吗？母亲与孩子之间围绕这种想象的阳具缺失，确实建立了某种类似想象、情感交换的东西；阳具缺失构成二者之间组合和主体间接合的元素。而父亲……

被设想为阳具真正的携带者；儿童对阳具丧失的恐惧，以及母亲对阳具的要求、被剥夺、烦恼或怀念，都将围绕他建立

……在弗洛伊德这套辩证法中，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从未有人设想父亲要拿阳具做什么：作为父亲，他拥有它。他有自己的阳具，仅此而已；既不交换，也不给出去，不发生任何流通。父亲在三人组中没有任何功能，只代表那个阳具的携带者和持有者。作为父亲，父亲拥有阳具——句号。

换句话说，在这套想象辩证法中，父亲是那个必须存在、理应存在的东西；凭借他，阳具才不只是一个气象现象。事情如此根本：如果我们要在某个图式中定位那个支撑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构想的东西，你们已经看到，所涉及的不是“父—母—子三角”，而是“阳具—母亲—儿童三角”。那么父亲在其中哪里？父亲恰好就是把一切维系在一起的那个环。

只有为父亲概念配备整套能指内涵，它才可能被设想；这些内涵赋予父亲以存在和一致性，而远不能同生殖功能混淆。在所有语言传统中，“父亲”与生殖者在语义上都有所不同。我不会一直引用荷马和圣保罗来告诉你们：当人们召请父亲——无论宙斯还是其他什么人——所参照的完全不同于单纯的生殖功能。父亲还有许多其他功能。

从我们确定父亲是一个能指的时刻起，就会发现它最主要的功能恰好是：在世代谱系中成为某种东西……

只要生物显然会彼此生育，不是吗

……一个女人可以生出数目不定的存在者；我们假设他们有男有女，但请暂时只看女人。反正很快就会走到那里：据报纸说，孤雌生殖正在实现，女人将无需任何人的帮助生出大量女儿。

好，请注意，如果任意男性元素在这里介入，那么在这种图式中，只要人们还不需要别的，它们就可以在谱系任何层次发挥自己的授精作用和功能；如同动物界一样，它们只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侧面帮助、侧面回路。除了女人借助这些可以用来重启过程的侧面流产物而生育女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结构元素被引入。然而，一旦我们尝试按照男

性来铭写后代，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结构中才会介入某种使我们无法继续画出这张表、必须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的东西。［黑板图式］

这里有一个兄弟。我们不会停在“兄妹乱伦”这样轻飘飘的指示上；让他们结合，就会得到一个男性。只有从我们谈论后代、谈论男性与男性的关系时起，我们才看见一个切断被引入——而且每一次都有一道切断，也就是世代之间的差异。父亲能指的引入，一开始就在谱系中引入一种排序、一系列世代；而这个世代系列本身就引入一个绝对根本的能指元素。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我们不是来展开父亲功能的所有面向。我只请你们注意其中一个，而且是最醒目的面向之一：它明确引入一种秩序、一种数学秩序；相对于自然秩序，这是一个新事物、一种不同结构。问题正在这里。分析通过神经症经验训练了我们。在神经症经验内部，只要我们为想象辩证法画出的框架，已经为预期的实际用法蕴含着这种能指关系，想象辩证法就可以够用。

人们至少要花两三代时间，才会彻底不再理解任何东西，才会让各种解释和论述乱到连母猫都找不到自己的幼崽。不过总体而言，只要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仍在那里，我们就会保留根本能指结构这个概念，足以在神经症中辨认方向。

但谈到精神病，事情就不同了。精神病所涉及的是主体的关系：

- 所涉及的不是现有能指结构内部的一项所指纽带；
- 而是主体在特选条件下同能指本身的一次相遇——我有意说“相遇”，因为这里涉及进入精神病。

只要仔细观察和寻找，施雷伯主席个案就具有全部这些元素。施雷伯到达人生的某个时刻；在此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处在等待成为父亲的情形中。他本人说，自己突然被授予一项社会意义当然十分重大、对他也负载极高价值的职能：据说，他“升任院长”，成为上诉法院院长——不过，按他仍生活其中的公务员行政结构来看，它更像国务委员会。

他由此进入的不是立法等级体系，而是制定律法者的等级体系，来到一群全都比他年长二十岁的人中间——世代秩序在这里发生紊乱。凭借什么？凭借部长们的特别召请。他突然被提升到自身名义存在的一个层次；无论如何，这要求他进行一种更新性的整合，跨入这里涉及的另一等级，而它也许正是全部弗洛伊德辩证法所蕴含的等级。

既然这里涉及父亲，而且弗洛伊德的全部研究、他为主体经验引入的所有视角都围绕父亲问题集中，那么主体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会不会成为父亲。你们会说，人们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我很清楚。有了客体关系这套最新分析技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

如果你们还记得某些作者怎样描述那种看似至高的经验：在客体关系中取得著名的“距离”，最终竟意味着把分析家的性器官幻想化，再以想象方式将其吞下

……我会说这是一套关于口交（fellation）的分析理论……

我不是开玩笑，理由很简单：这个术语的用法与 felo、felal 词根之间存在关系，不过说到底，这并不十分确切

……无论如何，下面这个问题仍然开放：

- 分析经验究竟是不是这种淫秽的链条，即把一个终于从幻想中析出的客体以想象方式吞下；
- 还是涉及另一种东西：某种在特定能指内部包含着对欲望之承担的东西。

无论如何，对精神病现象学而言，我们不可能误认能指本身的独特性。主体受到召唤，必须接近并把握一个能指；但由于某种我现在不作详述的原因——我从一开始提出的整个 Verwerfung 概念正围绕它旋转——主体无法如此。顺便说，经过思考，在这一年结束时，既然以后还要重新处理它，我建议最终采用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法语术语："拒斥"（la forclusion）；因为我们先前的 rejet"排斥"以及由它引出的一切，归根结底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让我们暂且仍把 Verwerfung 现象本身留作出发点。

相关知识卡 Verwerfung 与 forclusion：遭拒斥者在实在中的返回

精神病中全部展开之物的现象本身，有一点切实可触：主体面对的是能指本身；仅仅因为无法接近能指本身，一个过程就被发动。这个过程从此相对于该能指获得结构，也就是把通常构成人类主体之能指关系的过程发动起来；其中包含我们称作"想象灾变"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说，主体同他者、同想象的小他者之间本身具有致命性质的关系，再也无法得到任何调节；随后，全部能指装置本身开始展开，而且与所指关系分离。这就是各种解离和碎裂现象，是能指以下列形式被发动：

- 作为言说；
- 作为迸发式言说；
- 作为无意义的言说；
- 或作为意义过度的言说，负载着无意义，既沉重又未知。

内在话语的这种解体标记着精神病的整个结构。施雷伯主席与那个无法吸收的能指相遇、碰撞、冲击以后，便必须重建它；他确实进行了重建。因为这个父亲不能是一个简简单单、圆圆整整的父亲——像刚才那个环一样——不能只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父亲的父亲；没有人知道自己怎样被嵌入父亲。然而，在今年结束、与你们分别以前，我还是想请你们注意：做医生时，你们可以天真无邪；但要做精神分析家，毕竟应当偶尔沉思，例如沉思下面这个主题。它不会把你们带得很远：太阳和死亡都不能被人直视。

相关知识卡 父之名与“成为父亲”能指：缺失、补偿与召唤

我不会说，最微小的减轻一种恶的举动只是为更大的恶提供可能；我要说，它总会引出更大的恶。精神分析家毕竟应当习惯这一点；否则，我认为他绝对无法以充分自觉履行自己的专业职能。

这不会把你们带得很远。况且，我说的事人人都知道；报纸也会告诉我们：科学进步，上帝知道有多危险，等等。但这对我们不痛不痒，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有人——包括我和你们一起——都被嵌入一个名叫“圣诞老人”（Père Noël，圣诞父亲）的主要能指。圣诞老人是一位父亲！有了圣诞老人，事情总会解决；我甚至要说，不只总会解决，而且会解决得很好。

然而，精神病者所涉及的情形是：假设有一个人真正不相信圣诞老人，也就是目前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的人；一个通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充分沉思而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人，一位所谓“色盲者”（daltoniste），如果这种人曾经存在的话。不要以为我会重视这些故事和传闻。

但这种做法恰恰在于训练自己，例如不相信做一件善事会带来善果；真正确信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善事都会引出等量的恶，因此不应该去做。在圣诞老人的视角中，这也许令你们感到可争辩；但只须哪怕片刻承认它，就能设想各种真正根本、位于能指层面的事情如何可能依赖于此。

好，精神病者相对于你们有一个劣势，却也有一项特权：他被置于一种有所不同的关系中。他不是有意如此，也没有从能指中自行脱身，而是发现自己被稍稍放歪了、放斜了。从被命令要与这些能指相配的时刻起，他必须作出巨大的回溯努力；这会产生一些人们所谓“格外荒诞古怪”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病的整个发展。说实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发展可能或多或少典型、有意义、漂亮；施雷伯的发展尤其丰富。

例如，它在施雷伯主席个案中非常有意义。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一旦取得这个视角，你们会在我的病人演示中与我们一道发现——今年我已经具体向你们显示过——即使面对最普通的病人，这个视角也至少能使我们看见比通常更多一点的东西。

我最近展示的病人就非常非常奇特；他来到精神自动症的边缘，却还没有完全进入。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恰好悬置在某种人为状态中，而他的确非常准确地界定了其坐标。他发现，能指对存在者的存在具有远为强大的支配；归根结底，他自己的存在在他看来远没有任何以某种能指结构呈现在眼前的其他东西确定。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明说出来。你们注意到，我问了他：

“这一切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您妻子怀孕期间吗？”

他愣了一会儿，后来回答：

“对，确实如此，我没有想到。”

这毕竟向你们证明，这些概念在临床现实中并非完全没有参照价值。还有另一点。可以肯定，在想象视角中，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顺便说了什么，越来越被认为毫无重要性，因为据说问题只在于是否受挫。既然他受挫，只须给他配上对象；他具有攻击性，于是退行，我们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原初幻想的涌现。

不幸的是，这并非完全正确的理论。换言之，我还没有回到或许必须说某些话的立场；但至少必须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就是让能指介入，却绝不是用下面这种方式：

“我拍拍你的背……你是个好孩子……你有个坏爸爸……事情会好起来……”

……而也许要以另一种方式使能指介入、对它们加以整备；或者至少不要误用某些能指，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某些能指。这一视角把关于某些解释内容的负面指示，提到当前议程的最前景。

最后，我只想让这些问题保持开放……这一年用方言结束；它为什么要以别的方式结束呢？

为了收尾，我想转向一种不同于我本人的风格，参照一位令人赞叹的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我在那里找到一页非常美的文字——几个星期前就决定要用它结束——出自《腐烂的魔法师》。

［……］小姐有幸前来参加我今年最后一次讲座，她不会反驳我。在《腐烂的魔法师》中，我们找到一幅分析在其本质上所代表之物的根本图像。一章末尾，魔法师正在坟墓里腐烂；像每一具好尸体一样——我不会像巴雷斯那样说他在含糊咕哝——但因为他是魔法师，所以即使在那里也施展魔法，反而说得非常好。

接着，湖中仙女坐在坟墓上。正是她让魔法师进去，同时告诉他会极其容易地出来；可她也有自己的把戏。魔法师就在那里腐烂，偶尔说话。事情进展到这里时，几个疯子随着各式行列到来。你们可以把我们惯常的团体想象进去；还有一个我希望你们会认出的怪物。这个怪物才真正找到了分析的钥匙、人的动力，尤其是“父亲—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中的动力。

“我喵了又喵，”怪物夏帕吕说，“我只遇到

几只角鸮，它们向我保证他已经死了。

我永远不会有繁衍能力。

可那些有繁衍能力的人都有一些品质。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有什么品质。

我孤身一人。我饿，我饿。

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品质：我饥肠辘辘。

去找东西吃吧。吃东西的人不再孤单。”

1955—1956年度研讨班结束

［掌声］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腐烂的魔法师》**

埃利诺尔——那位女士呢？那位女士呢？

洛丽——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死去魔法师的声音

我已经死去，身体冰冷。仙女们，走吧；我所爱的那个人比我自己更有学问，她没有怀上我的孩子，仍在我堆满美好礼物的坟墓上守候。走吧。我的尸体很快会腐烂，我不想让你们有朝一日拿这件事责备我。我悲伤至死；如果身体还活着，它会流下鲜血般的汗水。我的灵魂悲伤至死，因为我这场丧葬圣诞之故；在那个戏剧性的夜晚，一个非现实、有理性而又迷失的形体代替我遭到诅咒。

仙女们

既然一切已经完成，让我们到别处去沉思非自愿的诅咒。仙女们离开了；夏帕吕怪物又回到这里。它长着猫的头、龙的脚、马的身体和狮子的尾巴；与此同时，湖中仙女在魔法师的坟墓上颤抖。

夏帕吕怪物

我喵了又喵，只遇见几只角鸮，它们向我保证他已经死了。我永远不会有繁衍能力。可那些有繁衍能力的人都有一些品质。我承认自己不知道有什么品质。我孤身一人。我饿，我饿。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品质：我饥肠辘辘。去找东西吃吧。吃东西的人不再孤单。

几只斯芬克斯从潘神那群漂亮的牲畜中逃了出来。它们来到怪物近旁，在黑暗中看见它明亮而洞察一切的眼睛，便向它发问。

斯芬克斯们

你明亮的眼睛表明你是一个聪明的存在。你像我们一样多重。说出真相。这就是谜题。它并不深奥，因为你只是一头野兽。什么最忘恩负义？猜吧，怪物，好让我们获得自愿死去的权利。什么最忘恩负义？

魔法师

自杀的伤口。它杀死自己的创造者。斯芬克斯们，我把这句话当作人的象征说出，好让你们这些始终濒临死亡者获得自愿死去的权利。从潘神那群漂亮牲畜中逃出的斯芬克斯们扬起前腿；它们脸色惨白，微笑变成可怕而惊惶的恐惧。随即，它们伸出利爪，各自爬上一棵高树的顶端，从那里纵身跳下。

夏帕吕怪物亲眼看见斯芬克斯迅速死去，却不知道原因，因为它什么也没猜出来。它吞噬那些仍在抽搐的身体，满足了自己旺盛的饥饿。森林逐渐不那么幽暗了。怪物害怕白昼，加快下颌与舔舐之舌的工作。破晓之时，夏帕吕怪物逃向更黑暗的荒野。黎明一到，森林便充满喧响和耀眼光亮。

会唱歌的鸟儿醒来，年老而博学的猫头鹰则沉沉睡去。在这个夜晚说出的所有言语中，魔法师只保留了那位受骗的德鲁伊走向大海时说的话，准备深入思考：“我正在学习重新变成一条鱼。”他还记得喵喵叫的夏帕吕怪物说过的一句话，并拿它取笑：

“吃东西的人不再孤单。”